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建國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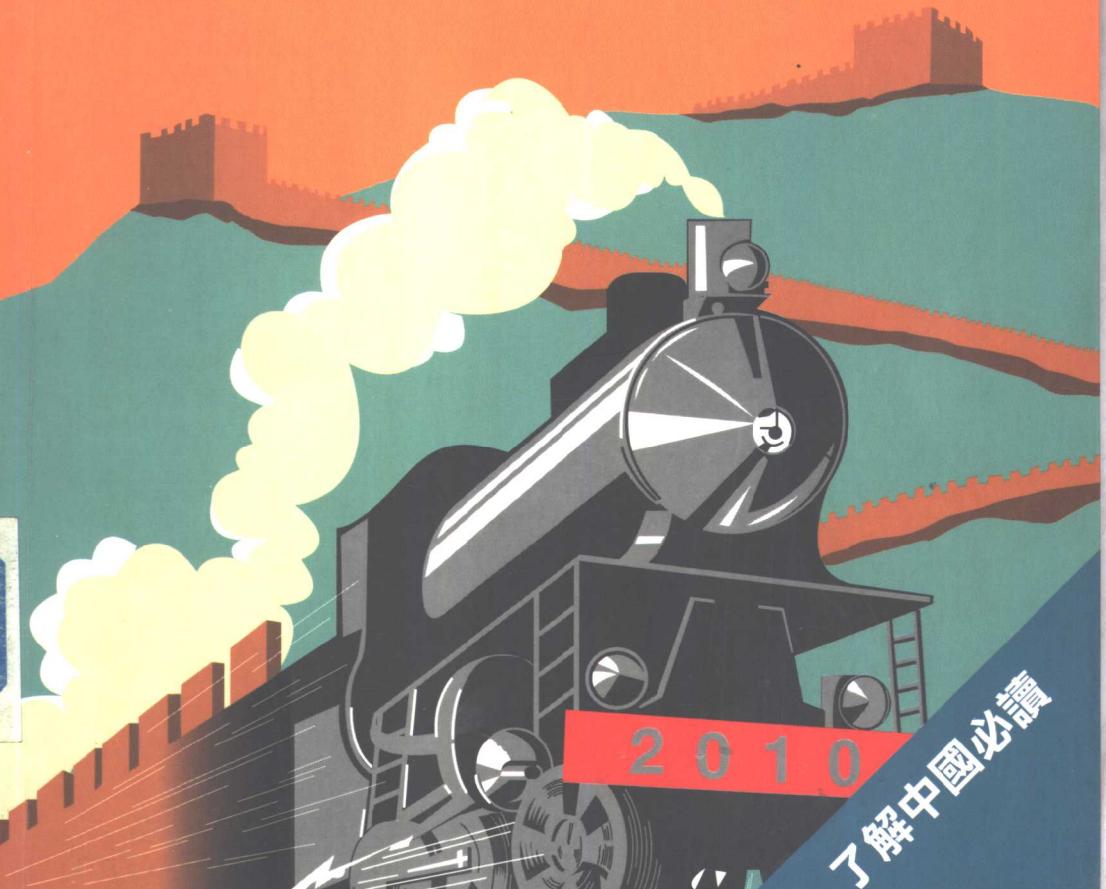
1949
—
1997

客觀、深入淺出的經濟政治述評

張家敏 著

【上】

香港政策研究所出版



2010

了解中國必讀

此書對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相對客觀的深入分析，作者利用近年來中國內部陸續公開的許多珍貴資料，重新描繪出四九年以來整個發展過程，使讀者可以擺脫舊有的意識形態迷執，清楚地認識其中的脈絡因由，有助於理解今後中國的發展，即使對從事中國貿易和投資的人，亦大有裨益。

陳文鴻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兼商學系教授

張家敏在香港大學讀書時，即積極推動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和研究。他博聞強記，實事求是，態度誠懇而客觀，不囿於任何黨派的立場，也不會走進意識形態的迷宮。十多年來，他仍能孜孜不倦，對中國的現代史繼續探索，並將心得編寫成書出版，在香港回歸中國的重要時刻，實在饒有意義，本書也當成為一般市民和年輕人的有用參考書。

陸人龍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助理校長 原香港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

在這本書中，家敏全面地及客觀地介紹了中共建國以來所走過的迂迴曲折的道路。書中且包括了作者個人的體會。對於希望認識當代中國的讀者來說，此書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入門讀物。

劉兆佳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

作者自求學時期已積極研習國是，對國情有透澈、獨到的觀察，本書讓我們能溫故之順逆而儆惕未來，亦為大眾研究分析中國經濟政治問題的必備參考。

何綽越先生 瑞士聯合證券 香港及大中華市場主管
獲亞洲貨幣雜誌選為 94、95、96 三年度之「最佳中國分析師」

此書史料詳實豐富，分析全面冷靜，甚有助把握中國四十八年波瀾壯闊的經濟演變歷程、政府在各時期經濟政策形成的背景、和中國今後經濟發展和改革的趨勢。

馬國南博士 美國經濟學博士 美國信孚銀行亞洲經濟學家

張家敏長期有系統地探研中國問題，並經常提出有創見的觀點。此書資料詳盡，並著重分析「文革」及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是一本難能可貴的紮實作品。

ISBN 962-8240-02-1

魯凡之先生 香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及政論家



9 789628 240029

定價(上下冊)：港幣二百八十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建國以來

1949-1997

客觀、深入淺出的經濟政治述評

張家敏 著

香港政策研究所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建國以來 (1949-1997)

著 者：張家敏

出 版：香港政策研究所

香港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10 號 6 樓

電話：2686 1973 傳真：2648 4303

製作承印：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 114 十樓 A 座

電話：2838 1699 傳真：2838 1786

封面設計：吳玉盈

定 價：港幣 280 元 (上下冊)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8240-02-1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獻辭

獻給自一八四零年以來為
爭取中國主權獨立及富強
民主而奮鬥的人們

獻給建設美好香港，譜寫
一國兩制新樂章的人們

獻給我的妻子李婉如

11/02

鳴 謝

我首先要感謝葉國華先生支持本書的出版，葉先生是一位家中坐擁書城、書不離手的知識分子型企業家，我很高興有不少機會與葉先生接觸，他很多精闢的觀點對我有一定的啟發。

在出版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李嘉詠小姐、鄺心美小姐、區萬德先生，劉白露小姐和很多的朋友的協助，陳少彬先生及羅慧瑩小姐更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亦要感謝傳真廣告印刷公司的謝國治先生及他的同事為本書的出版作出的協助。

此外，我希望在本書出版的時刻，感謝百富勤証券有限公司的上司及同事對我的支持和關心，百富勤是一家十分重視專業知識及研究的投資銀行，公司的工作環境及各同事的專業知識加深了我對經濟運作的理解。我特別要感謝我的老同學、好朋友及同事鄧克騰先生及黃灌球先生對我在很多方面的協助，他們對金融財經運作有透澈的認識，並給予我很多寶貴的意見。

我亦要感謝思想家及評論家魯凡之先生長期對我的指導，魯凡之先生曾出版有關文化、歷史、哲學、社會學、中國當代經濟及政治等學術著作二十本，他理論根基深厚，知識博大，對我理解各種不同理論有很大的裨益。

我特別要感謝敬愛的父母對我的教導、關懷與培養，使吾能在一個快樂的家庭成長。

最後，我衷心感謝我摯愛的妻子李婉如，她在我寫作的過程中給予我很大的關懷、支持和忍耐。她從事中國投資的諮詢工作，對大陸經貿問題有深入的認識，她經常和我討論問題，並給予很多很好的意見。

葉國華序

我很高興為張家敏先生這本百萬字的著作《建國以來》(1949-1997)作序。

我修讀中國歷史、哲學出身，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發展十分關心。我的興趣比較狹窄，喜歡看政治、歷史、經濟、社會科學各類書藉，以及邀請朋友來我家談天說地。早在五十年代，我還是年青小伙子的時刻，便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後來我從商，較早返大陸投資，故亦認識不少政府及商界的朋友。我想我跟所有的香港人一樣，受到三個很大的時代衝擊；一是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的逝世及四人幫下台，二是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中國宣佈收回香港，三是一九八九年北京學運事件，每次歷史事件都對我帶來很大的思想衝擊。在這裡，我希望將多年來思索的四點經驗與大家分享。

第一是要堅持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懷著對社會、對國家，甚至對世界的熱誠，以「一以貫之」的態度，盡自己的本份及貢獻。只有真正緊守立場，方能做到問心無愧，理直氣壯的面對時代的挑戰。

第二是獨立思考及包容性強。我們是獨立的個體，一定要有獨立思考及批判的能力，不人云亦云，不盲從附和，面對複雜的形勢，一定要以理性、冷靜的態度、對事物作全面的分析來作出合理的判斷。此外，在研究問題的過程中，在投入之餘，一定要有點「抽離」的態度，這樣才能避免各走極端，無法回頭，甚至作出無謂的犧牲。

我在強調堅持原則及獨立思考的同時，亦十分著重包容性。要實踐民主，一個大前題就是衷心考慮各方面不同的意見。社會是多元化的，存在著各種意識形態和力量，不同「力」的衝擊構成了整個社會，我們要有兼容的量度，不應片面的排斥「異己」，就如香港社會，她的成功實際上由於其兼容性，我喜歡稱之為「五元文化組合」，這個組合包括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文化；英國在港實行的文官法治精神及基督文化；美國戰後發展之系統理論如邏輯化、計量化及系統化等；傳統之日本文化

與西方文化交流激盪而成之企業及刻苦工作要求；以及中國在近數十年流至香港的中國文化意識等。

第三是要堅持一種「不斷實踐」的人生態度。在哲學上我受拜恩斯坦的影響，他說：「終極的目的是沒有的，運動便是一切」，我認為等待一個完美終極的社會出現是不實際的，最重要的是今日的所有行動、工作及生活，才是最有意義的。年青時我崇尚一個最後目標，所以無論生活多困苦，我也可忍受，因為我追求一個人間天堂，但經過多年的實踐，我發覺應把握每一日去創造、去實踐，這樣才能產生積極意義，至於五十年一百年後的事情，未經實踐，無人確知，故只能做好今日。

第四是物質與精神，或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我希望用「奶粉與傳道」來說明此道理。小時候，正值二次大戰後不久，物質很貧乏，那時有些傳道人來講道理，我們一群小孩子圍著聽，但眼睛只看著那些一罐罐的奶粉，目標只在聽完道理後拿奶粉，但是聽得多了，又慢慢覺得傳道人有點道理，這是說明一種意識形態，若加上即時的經濟基礎或物質報酬就更能突顯其說服力。好像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一套理念很完美，但其物質基礎很令人失望，故此，中國領導層在七八年改革開放政策確立後，便正視此問題，既重視精神文明，亦強調經濟發展，並在精神及物質文明兩個方面的建設中，既重視中國實際情況，亦關注與世界的接軌，這樣，中國政策的理念就更有基礎，更使人信服。

十數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在經濟體制轉軌及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中國亦面對不能迴避的挑戰，我相信要了解中國的現狀與未來，一定要對她走過的步伐有所理解，我認為張家敏先生這本《建國以來》有下列幾個特點：第一，這是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知識分子以獨立思考及新觀點評述中國自四九年以來發展的著作。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從多個不同角度，翻閱海內外，不同觀點的資料來論證他的觀點，是一本開放、客觀及具新觀點的著作；第二，此書著重資料性及分析性，全書百多萬字，重視資料出處及註釋，並從經濟、社會及政治層面綜合分析問題，既具學術嚴肅性，又深入淺出和易讀；第三，現實性較強及有一定的前瞻性。此書除從多角度評述中國四十八年的發

展之餘，尤著重經濟方面的分析，基於經濟建設已成為中國發展的最重要議題，故此方面的論述實有助讀者理解中國發展的重點。此書的最後一篇「改革十九年宏觀政策」中，作者以較大篇幅從社會、經濟及政府與民間政策三個方面分析十九年改革與發展的情況，頗具前瞻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八年發展史是一個十分大的題目，此書是現時唯一的論述這方面的著作，我期望社會上有更多這方面的著作，並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引發社會對中國發展有更多理性、深入及高水準的討論。

雖然讀者對中國這四十八年的歷史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觀點，但我希望指出，這書畢竟是一本了解中國四十八年以來發展及前瞻不可多得的著作，我誠意的向各位推薦。

一九九七年五月

葉國華先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特別顧問、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及運科集團主席

自序

醞釀出這本書是一九八零年的事，到現在已有十八年的光景了。

我在一九七九年進入香港大學，當時的學運正陷入低潮。七六年四人幫倒台，香港學界的理想隨即破滅，很多以前被認為是正義的、是社會主義的東西被否定。不少在七六年以前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學生無法接受這個衝擊，霎時間，學運迷失了方向，陷入一片沉寂的死靜。經過數年的沉思，香港年青知識分子總結出新的經驗，他們了解到再不能像過往那樣只倚仗豐富的感情及情緒，片面地了解國家和社會的情況。在學界處於較理性和開放的時刻，我在一九七九年底當上港大學生會國事學會主席。

十分幸運，幼年時的經驗使我沒有像其他學運前輩們面臨理想幻滅的衝擊，在剛進大學參與社會事務時，能夠以較理性的觀點看問題。我從小就十分喜愛看有關歷史人物的連環圖，影響我最深的是中國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飛，岳飛是一個逢戰必勝，保家衛國，抵抗外敵的長勝將軍，但後來卻給苟且偷安的人害死了，他的悲壯收場對當時就讀小學二年級的我衝擊很大，我的民族感情被岳飛的事跡引發出來。雖然我是一個富民族主義的人，喜愛看中國大陸的「創業」、「紅雨」等宣揚艱苦建國的電影，喜歡聽「我的祖國」、「歌唱祖國」及「我愛祖國的藍天」等歌曲，在八二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前已明確公開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但由於我小時候親眼見到一九六七、六八年文革期間香港的情況，因此，使我對大陸的觀感也帶上一點理性及疑問的色彩。文革期間香港十分混亂，經常有示威及放置炸彈事件，政府亦常宣佈戒嚴。當時，我家住在灣仔，在位於港島西區般咸道的聖保羅書院上小學，由於褓姆車載我們上學時要經過港督府，經常碰到示威，故為安全計，司機經常放棄只需十五分鐘的路程而繞道深水灣及南區，每次花上一小時接送我往返學校，當時我們根本不知危險，還對可以「遊車河」看風景感到十分愜意。當時真正令我感到害怕的是由於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出現武鬥，很多被縛

著手腳的浮屍漂流到香港。此外，有一次我的學校出現了一條大橫額，內容應是寫一些文革的口號，當時學校十分緊張，所有學生被指示站在操場，我們更見到有警察來到學校，後來更聽說有些高年班的同學被逮捕了。最令我親身感到恐懼的是有一次媽媽拖著我回家，有一個中年男子用水潑我媽媽，由於當時社會上有淋濺水的情況，我們十分害怕，飛跑回家。後來我從研究得知，香港文革期間出現的示威基本上是殖民地統治下長期經濟和社會矛盾的結果，所以才能捲入那麼多人。

此外，由於改革開放前大陸經濟較差，與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爸爸常長途跋涉走過羅湖橋，攜帶很多物資乘火車帶給在大陸的親人。一九七五年，我開始陪家人返大陸，在大陸期間，我一有機會便會以好奇但關心的心態詢問親戚及碰到的人的生活。七七年夏天，在到北京及上海的旅行中，儘管當時鄧小平仍未第三次復出，我已感到氣氛較以前開放。在七九年進入大學前，我再到北京及上海等地旅遊，更感到改革開放的威力，大陸市民不單生活有所改善，心情也較舒暢，並敢於向我這個小伙子喋喋不休提出他們面對的種種問題，如物價、住屋、就業及婚姻等。

「找方向，探前途，為中國尋出路」是我們一九八零年國事學會的政綱，我們認為國事學會除了向校內同學迅速報導及分析國內事情外，還有責任為中國的前途路向提出批評及建議。除爭鳴國事，共謀獻策外，我們也認為有責任為中國輸入新的管理知識，以協助日益重要的經濟建設。在研究中國及給予建設性意見的過程中，我與一些有心的朋友總結出兩點經驗：第一是假若要為中國出謀獻策，則一定要以理性的態度，從經濟、社會、政治、甚至人民心理的層次理解過去及現在的中國，分析她所面臨的各種國內外環境，切不可重蹈過往部分人士只著重激情、缺乏客觀分析的覆轍；第二，由於經濟建設是中國四人幫下台後最主要的任務，故要理解中國，則不得不對經濟，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有一定的認識。在此認識下，我決定主修經濟，希望這樣對我參與建設中國有一定的幫助。

從參與國事學會、學生會中央工作開始，直至大學畢業後的多年

裡，我經常接受多個不同機構及團體的邀請，就當代中國問題作出超過三百次的演講。早在八零年代，已有很多朋友建議我應將演講及一些發表過的文章紀錄下來，出版一本有關當代中國的書。從那時開始，我便開始有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的念頭。經過數年的準備，我於八六年乘在修讀碩士課程前的空檔時間，開始動筆。不知不覺，直至現在，已寫了十年多。寫作此書最大的困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一個十分大的題目，為尋求事情的真相並作出持平的評論，我不單需要參考大陸、台灣、香港及海外的書本雜誌，更要閱讀和接觸第一手資料，包括各種原始文件如中共官方政策文件、各類大陸舊報紙、紅衛兵和民間刊物。我個人尤其重視回憶錄，也喜愛聽一些從大陸到香港定居的朋友講述他們在大陸時的親身經驗。通過對各方面資料不同角度的相互對比，盡量保證寫出來的東西能較客觀及持平地評述中國自四九年以來的歷史。

由於我正常的工作佔用大部分的時間，而我自八五年開始亦參與不少社會事務，故只能在下班、假期或利用轉職時的空檔時間寫作，過程十分艱苦，經常徹夜不眠，常常為尋找一個資料而多次跑書店及圖書館，而家中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擺滿了書籍，更霸佔了整個飯廳，我已多年不能在飯廳吃飯了。而更要命的，其實也是一個可喜現象，是隨著中國經濟及社會進一步開放，出版學術界呈現一片活潑氣氛，很多過往未公開的材料及評論不斷展示於世，從而使更多歷史真相曝光，但這樣就迫使我不得不修改已寫過的內容。與此相關的，就是中國自七八年底改革開放，尤其是鄧小平九二年南巡以來，改革及發展的步伐實在太多采多姿，真可謂翻天覆地，令人驚訝讚嘆之餘又眼花瞭亂，中國不斷變化的形勢著實使我著迷，要將這些重要的變革冷靜地消化及分析使我的寫作好像永遠完了，不少知道我正在寫此書的朋友經常催促我盡快出版，我的太太李婉如也不斷勸告我要下決心收筆。在十年間不知不覺間本書已三易其稿，參考了約三千份材料，寫到九七年五月，完成了約一百萬字。

由於工作及參與社會事務的關係，我經常有機會往返大陸並接觸不同階層及各方面的人士，這些經歷給予我很多感性認識，並影響我對現

階段中國大陸發展的看法。雖然中國在經濟體制轉軌及經濟發展過程中面對著眾多不能迴避的困難，如通脹、失業、貪污、治安、娼妓、執法力度不夠，以及政制改革有待進一步深化等，但經過長期對大陸的理解及接觸，我感到隨著社會及經濟進一步發展，以及政府與各方面人士的推動及努力，情況將會進一步改善。記得我曾向一位很有才華，站在中國政府改革前線的年青官員請教中國經濟發展事宜時，他的話深深的打動了我。他說：「我們這代在四九年及五十年代初期出生，在發育時期，碰上了大躍進，糧食供應不足。年青求學時期，碰到文化大革命，社會一片混亂無法上學。等到七九年改革開放，希望大展拳腳為國家建設時候，政府開展了經濟體制改革，為提高效率及盈利，不少企業裁減冗員，很多與我同年代的人因而面臨失業，無法實踐理想。我現在有幸在政府工作，正遇上中國理性發展的黃金時刻，我必須珍惜這個機會，盡力把工作做好。」此外，在我參與香港回歸的工作中，我接觸到很多大陸官員，他們日以繼夜、默默地為香港實踐一國兩制做了大量工作。與這些站在中國改革各個崗位的官員接觸，使我感到縱使前路險阻，但中國仍充滿希望。

事實上，觀乎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現時中國的局面著實得來不易，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會思想日趨開放，出版異常蓬勃，書籍刊物種類繁多，人民在討論時往往觀點尖銳，比過往進步不少。本書希望以一種開放、客觀、持平的態度，通過對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各方面的分析，為讀者提供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的歷史發展情況。

這書的內容基本是依據歷史時期，突出每個階段的重點，而形成十二篇，共六十八章。在這裡我希望提出如下四點：第一，雖然此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四九年以來歷史的述評，但由於我個人喜愛研究文化大革命及七八年底開展的改革開放，故這兩部分著墨較多，我很希望此書能對讀者理解以上兩個題目有所幫助。此外，由於歷史原因，台灣的發展與大陸的經歷基本屬於不同範疇，故本書只在兩岸統一部分中才涉及台灣的情況。第二，基於經濟建設，可以說是四九年建國以來的重要國

策，故此書很著重討論與經濟有關的重要事件。然而，我希望強調此書並無艱深的經濟術語，在寫作過程中亦對不同概念深入淺出地闡析，務使一般讀者能容易理解；第三，此書雖著重過去，但亦強調現在與將來，希望從眾歷史教訓中總結出一些對將來有幫助的經驗。例如此書對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的發展作出較詳細的論述，希望使讀者能更易掌握中國將來的走向。此外，本書最後一篇「改革十九年的宏觀政策」亦用了較多篇幅，從社會、經濟及政策（官方與民間）的角度總結七八年底以來十九年改革開放的發展，目的也是為讀者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意見。第四，本書是本人獨立思考的結果，內容自然與中國官方的不少意見及其對某些歷史的解釋有所不同。雖然我本人擔任中國政府任命的某些公職，但我的意見絕不代表任何政府或團體的意見，我亦沒有和大陸的官員或朋友提及過寫作本書的事。

參閱過多方面的資料後，我認識為最有資格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還是大陸的專家，現時他們面對的問題主要是政府要小心處理社會輿論，以保持穩定局面，故有一些較敏感的材料及觀點仍不得隨意發表。我相信中國在不久將來再進一步發展和開放後，大陸將會有更多水平甚高的著作面世。

我希望強調本書之內容及意見，概由作者本人負責。此外，由於建國以來的題目十分大，再加上我的水平和見識有限，書中自有不少疏漏不妥之處，敬請各位專家和廣大讀者予以賜教及批評指正。我並懇切期望此書能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引發更多更高水平著作的出現，及帶來對中國問題更深入的討論。

一九九七年五月

目 錄 [上]

第一篇 建國奠基 恢復經濟(1949-1952)

第一章	中共建國——立國理論與政策	2
第二章	建國初期的困難、形勢和任務	21
第三章	建國初期的重大政治運動	58
第四章	抗美援朝與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	83
第五章	建國三年的成就與經驗總結	96

第二篇 工業化與公有化(1953-1957)

第六章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	100
第七章	建立重工業的基礎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與完成	103
第八章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112
第九章	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119
第十章	國家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44
第十一章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 ——對資本主義的國有化改造	150

第三篇 探索、徘徊與反右(1953-1957)

第十二章	清算高崗、饒漱石與毛、劉就建國方針的分歧	164
第十三章	共和國初期第一冤案——潘漢年、楊帆事件	180
第十四章	胡風事件與肅清反革命運動	187
第十五章	毛周衝突——反冒進與國力論的提出	198
第十六章	檢討蘇聯發展模式與第八次全國黨大會	207
第十七章	歷史的轉折——五七年的鳴放與反右	227

第四篇 經濟大躍進——災難與重建(1958-1965)

第十八章	大躍進時期的經濟、政治發展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	264
------	------------------------------	-----

第十九章	通往共產世界的烏托邦——人民公社化運動	299
第二十章	彭德懷廬山上書與「反右傾」運動	312
第二十一章	務實路線——經濟的大救亡	333
第二十二章	從獨立外交到中蘇分歧	363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1966-1969)

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成因與社會基礎	386
第二十四章	文革的醞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411
第二十五章	文革的發動 ——評〈海瑞罷官〉到全國第一張大字報	420
第二十六章	環繞派遣工作組的鬥爭 ——批「資反線」與劉少奇的跨台	432
第二十七章	紅衛兵運動與劉鄧的反覆掙扎	444
第二十八章	文革期間的派系鬥爭——「保守」與「造反」	458
第二十九章	全國的大清洗 ——「一月風暴」與全國的奪權行動	473
第三十章	軍事幹部對造反奪權的反擊 ——「二月逆流」與「三月黑風」	482
第三十一章	中央文革再度「支左」，引發大武鬥與武漢兵變	494
第三十二章	最高戰略部署——妥協局面與「新思潮」的湧現	512
第三十三章	大鎮壓、剷平山頭與文革的結束	526
第三十四章	文革期間極左思想統治下中國人民的心理狀態	546
第三十五章	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567
第三十六章	總結——對文革的簡短評論	574

第六篇 極左與穩健的爭持(1970-1976)

第三十七章	林彪事件——文革派的分裂	580
第三十八章	極左派與穩健派的較量到四人幫跨台 (一九七二——一九七六)	604

第一篇

建國奠基 恢復經濟

(1949—1952)

第一章 中共建國——立國理論與政策

第二章 建國初期的困難、形勢和任務

第三章 建國初期的重大政治運動

第四章 抗美援朝與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

第五章 建國三年的成就與經驗總結

第一章 中共建國——立國理論與政策

第一節 中共建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

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後的四年內戰中，中國共產黨經過幾場決定性戰役的勝利，基本上已控制整個中國。隨著戰爭勝利而來的便是共產黨政權的建立。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號召當時的獨立民主黨派，如中國民主同盟、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及農工民主黨等各個人民團體，以及各知名人士，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成立聯合政府。由於當時共產黨軍事勝券在握，中共黨員又積極的聯絡，再加上毛澤東和周恩來頻繁的請客電報，使到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的知名人士及海外華僑等熱烈響應，他們從全國各地及海外陸續來到中共統治下的解放區，與中共籌備成立政治協商會議，與會者同意將成立的政治協商會議一定要將國民黨政府人員排除在外，他們更討論兩個主要問題，分別是〈共同綱領〉——即臨時憲法的制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建立。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批准了組成政治協商會議以成立聯合政府的建議。同年六月，政協籌備會在北平成立，其主要工作為擬定參加將成立的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起草〈共同綱領〉，及擬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方案等。經過幾個月的工作，籌委會於四九年九月決定邀請六百六十二位人士出席政協會議。

這些人士分別是：一、十四個黨派的代表；二、中共控制的九個區域代表；三、中共解放軍的代表；四、各民間團體如工會、婦女聯合會、青年聯會、農會及工商團體等；五、以孫中山遺孀宋慶齡為首的七十五位知名人士。

在參與政協的各類代表議席中，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共表現了很大的包容性，容許兩個較大的民主黨派，即中國民主同盟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政治協商會議中佔有與共產黨相等的席位。

當時在北平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政協並暫代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類似西方國家的國會)的職權。中共黨主席毛澤東在政協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只要我們仍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只要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團結國際友人，我們就能在經濟戰線上迅速地獲得勝利。」(註一)會議通過了建國後的幾份重要文件，如扮演著臨時憲法角色的政協〈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等。

第二節 從共同綱領分析中共革命的本質——民族救亡運動

一 四大階級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共同綱領〉強調當時政府是一個由各階層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聯合政府不單包括工人及農民階級，更包括小資產階級(即小商販、知識分子及手工業者等)，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即與帝國主義有矛盾，希望中國能獨立的走向工業化及現代化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的主要任務是：

「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筆者按：即國民黨控制的大企業)，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註二)

簡而言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四大階級——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共領導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二 中國共產黨容忍私人資本主義的存在

雖然當時的聯合政府提出：「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

導」（註三），但中共實際上卻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私營企業繼續經營。這與一般理解的共產黨要沒收私人資本的政策是不相符的。毛澤東在其於四九年前後寫的建國重要文獻〈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提出中國革命須分「兩步走」的觀點：

「……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註四）

「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註五）

在四九年，中共黨內有部分幹部提出，在推翻國民黨政權後，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故新政權必須用主要火力去反對資產階級，對此觀點，毛澤東認為是不正確的，他說：「這將把目前尚能與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趕到帝國主義那邊去。這在目前的中國實行起來，將是一種危險的冒險主義政策。」（註六）

在一九五零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會議的一份發言稿中作了多處重要批語，反映出中共當時團結資產階級的政策，「主要的有：在『今天鬥爭的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處，毛澤東批：『今天的鬥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殘餘，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是有鬥爭的，但必須團結它，是採用既團結又鬥爭的政策以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第二，在談到對私營工商業的限制和排擠處，毛澤東批：『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工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應加以扶助使之發展。』……第四，在『國營經濟是無限制地發展』處，毛澤東批：『這是長遠的事，在目前階段不可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註七）

三 中共革命的本質——民族救亡運動

從上述中共推行極其靈活的政策可以看到，共產黨在中國的成立根本是一項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回應，中共革命的本質是一項中國民族的救亡運動。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從一個封建社會轉變為一個受多個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正如一些權威的西方批判發展社會學或經濟學者如巴朗 (Paul Baran)、法蘭克 (A.G.Frank) 及阿明 (Samir Amin) 等所指出 (註八)，帝國主義為更方便剝削、控制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與被侵略國的統治者互相合作，共同分享被侵略國的資源。中國的情況並不例外，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統治階級——即封建地主階級緊密合作，而舊中國政府在某程度上扮演著買辦階級的角色，即為帝國主義掠奪中國本地資源服務。

基於上述分析，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已清楚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是互相聯系的。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就不能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因為帝國主義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主要支持者。」(註九)。

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中共遂動員一切支持它的力量，這裡除卻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外，還包括資產階級，據毛澤東的分析，資產階級可分為帶有買辦性——即上述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官僚資產階級，以及希望中國富強、迅速走向工業化且能和帝國主義經濟成份激烈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將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去推翻三座大山的任務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基於推翻與帝國主義合作的統治政權，以及爭取民族獨立是中共革命的主要目的，故此，中共的革命本質實為從中國近代便開始的民族救亡運動的延續。

四 新民主主義革命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雖然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本質為中國民族的救亡運動，但據共產黨的理論，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的民族革命卻又與「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掛鉤，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份」(註十)。這是因為有下列政治及經濟的原因：

(1) 國際政治戰略的考慮

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主義革命後，帝國主義列強聯手以軍事介入的方式入侵蘇聯，意圖扼殺正在成長的、以列寧為首的共產主義政權，這種軍事介入迫使列寧組成共產黨第三國際，作為指導世界共產革命運動的司令部。列寧的目的在於支持這些國家內的反政府力量，去牽制各西方列強對蘇聯的侵略。

在這個背景下，在一九二零年東方民族會議中，列寧起草的〈巴庫宣言〉指出：

「只有八億亞洲人民堅固和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們攜手的時候，只有全世界無數人民準備接受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燃起世界革命之火……到歐洲之路是經過亞洲(中國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門。」(註十一)

其後，列寧發表的有關民族自決的文章中，均主張西歐各國的工人階級與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民族主義者合作，支援民族自決，打倒帝國主義，毛澤東亦回應指出：「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註十二)列寧深切了解，眾多如中國等受殖民地列強侵略的落後國家，仍未出現普遍的工業化，勞資鬥爭並不是這些社會的主要矛盾，故馬克思提出主要針對西歐社會的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並非被侵略國家的人民所需要的，這些落後國家人民所渴求的是反抗帝國主義，故列寧提出民族自決

以迎合這些國家人民的心理。

在行動方面，蘇聯透過第三國際派出軍事顧問到中國，支持中共——當時中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及北洋軍閥的鬥爭。共產國際的顧問亦鼓勵中共與其他革命黨派及民族資產階級組成廣泛統一戰線推翻帝國主義。由此可以從另一角度見到，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工人及農民主動聯絡民族資本家推翻帝國主義等三座大山的民族革命。

(2) 反對轉嫁經濟危機的鬥爭

在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為避免國內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並希望在殖民地國家掠奪更多資源及榨取更豐厚的利潤，故紛紛把其國內生產過多的產品向殖民地傾銷，把賺到的錢投資於各殖民地，開辦企業、銀行，並控制鐵路等運輸行業，以搜刮更多的資源。假若殖民地人民能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便再不能將其國內生產過剩的產品向殖民地傾銷，那麼其經濟危機便會更趨嚴重，在這情況下，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階級將可成功地策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家。

根據上述革命理論，如果在任何殖民地發生反帝國主義鬥爭，這種反對國際資產階級的運動，便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也即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簡單地總結，在國內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鬥爭，在國際領域上已成為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而這革命又得到新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所大力支持。

第三節 容許資本主義存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

一 中共容許資本主義存在

要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方能明白為何在四九年成立的中共政權內，竟包括資產階級分子，據毛澤東有關建國後經濟政策的論述，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不沒收官僚資本主義以外的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也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註十三）。毛澤東在其〈論聯合政府〉中指出：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將採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面，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註十四）

為向資本家闡明中共的經濟政策，中共領導人劉少奇於四九年四月下旬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專程來到天津，向各方面人士講述容忍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戰略決策。劉少奇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肯定資本主義剝削是有其歷史的功勞。

例如他在〈在工商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封建剝削除去以後，資本主義剝削是有進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廠開得太多，工人被剝削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農民的痛苦在於沒有人剝削他們。」

〈在青代會上的講話〉又說：「我們就怕資本家不來剝削你，資本家能夠剝削很多工人那才好，有人剝削總比沒人剝削好一點，沒人剝削完全沒有飯吃，有人剝削還能吃過半飽，這總是好一點。」

〈在青代會上的講話〉亦重申：「多剝削幾個人好呢？還是少剝削好呢？還是多剝削幾個工人好。失業的工人要求復工，他們想到資本家的工廠裡做工，也就是說『請你剝削我一下吧！』他們要你剝削，能剝削我們倒舒服一些，否則我們倒覺得痛苦……剝削越多功勞越大，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在青年時代是有歷史功績的。』我說這個功績是永垂不朽。」（註十五）

二 〈共同綱領〉的規定

在中共新政權的經濟政策下，四九年後中國的經濟構成主要有三個

方面，分別是：第一、國營經濟；第二、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第三、獨立小工商業者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以上的情況，亦反映在〈共同綱領〉（註十六）中：

-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
- (2) 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
- (3) 推行土地改革，凡尚未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發動農民群眾，經過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各項步驟，實現耕者有其田；
- (4) 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政府應鼓勵其積極經營，並扶助其發展；
- (5) 在上述原則下，准許國營、合作社、農民手工業者、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等五種性質的經濟形態同時並存，但須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
- (6) 認定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企業聯合經營，或用租賃形式經營國家企業等。

分析上述幾點經濟政策，可以發覺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時期，所推行的政策根本上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點毛澤東也是同意的，他說：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的路。」

（註十七）

第四節 各級政權建立與溫和政策分析

一 中央政府的組成

〈共同綱領〉除了申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性質及經濟政策外，還規定了政權機關、軍事制度、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總原則。

關於政權機關，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的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選舉方法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休會期間，各級人民政府成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機關，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休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

在一九四九年時，效忠國民黨的軍隊在中國仍擁有一定之實力，社會上仍有很多動盪及不穩定因素，故暫不能以開放的選舉方式產生人民代表大會。在中央方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由政治協商會議暫代，而在由選舉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中國政協仍繼續保留，向全國人大或中央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充當參謀及諮詢機構的角色。基於以上理由，中國在一九五四年人大正式召開直至現在，政治協商會議皆得以繼續保留，政協通常會在人大召開會議前一兩天舉行會議，其主要目的是提供機會予各民主黨派或知名人仕，就人大或國務院總理的工作報告作出研究並給予建議。

關於軍事制度，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一的軍隊，即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統率，此外還規定中國應實行民兵制度，以保衛地方秩序。而軍隊在和平時期，在不妨礙軍事任務條件下，應參予工農業的生產，幫助國家建設。

外交政策方面，綱領規定其原則是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凡與仍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抱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皆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立主權的基

礎上，通過談判，建立外交關係。

一九四九年九月卅日，政協會議發表了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會議還通過在天安門前建立一座紀念碑，以紀念在革命及反抗帝國主義鬥爭中犧牲的人。

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後的第二天下午三時，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三十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集會，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宣讀了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他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人員應迅速向尚留於國內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全中國。

據政協會議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指出，將會成立一個由政協全體會議選舉出來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這委員會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員五十六人，並負責執行下列幾項重要的職責：

- (1) 制定並解釋國家的法律，規定國家施政方針，並監督其執行；
- (2) 批准或廢除與外國訂立的條約和協定，並處理戰爭及和平問題；
- (3) 批准或修改國家的預算；
- (4) 有權任免政務院總理、人民軍事委員會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長、各大行政區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和其他重要官員。

在這個人民政府委員會屬下，設置四個常設機關，包括：一、負責執行共同綱領、國家法律及施政方針，領導全國地方人民政府工作，並擁有多個部門（如外交、貿易、農業、公安）的政務院；二、負責統一管轄並指揮全國人民解放軍和其他武裝力量的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三、負責領導和監督全國各級審判機關的最高人民法院；四、負責檢察各政府機關和公務人員嚴格遵守法律的最高人民檢察署。

在全國政協會議中，毛澤東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被選為副主席。四九年十月

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二 地方政權的建立與專家管理

建國初期政治形勢混亂，中央政府的政令未能暢順推行。當時中國共分為六大行政局，分別是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和西北等。除華北外，其他五個大區都設有行政機構，東北的被稱為人民政府，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皆被稱為軍政委員會，當時全國實際上都是實行軍事管治。

由於新解放區秩序尚未穩定，國民黨的殘餘勢力尚能發揮一定之能量，故此中共決定在剛解放的地方實行軍管，取消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政權機關，由軍政委員會負起建設政權的工作，在這六個行政區中，最大權力及最早成立的是由高崗任主席的東北人民政府。雖然經過多次戰爭的破壞，東北仍是中國重工業的集中地，而且又和蘇聯的關係最為密切，在一九四九年，東北的幾個重要戰略地點如旅順及大連皆仍為蘇聯軍隊所佔領。另外其他四個軍政委員會的負責人分別是西北的彭德懷，華東的饒漱石，中南的林彪及西南的劉伯承，而華北的大行政區由聶榮臻負責。

當時，從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到各經濟單位如工廠等，在管理階層內都出現一種三結合的現象，分別包括中共黨政人員、群眾組織代表及曾在舊政權工作的管理人員和專家，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年間，中共軍隊戰勝及進軍速度十分驚人，通常是國民黨軍隊在中共軍隊攻至前已迅速先行撤走，故此，共軍的任務主要是接手管理新解放地區的各項工作，但一下子要找這麼多管理人員極為困難，故此只好用上述三結合的形式，將在舊政權工作的專業人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以助建設的工作。

在東北，由於共產黨力量已鑽營多年，用舊政權的管理人員之情況較少，然而在新解放的中國南部，往往聘用很多曾在舊政府工作的管理

人員。由於有管理人員的存在，新政權遂走向規章化及制度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工廠裡的管理制度，共產黨一向強調經濟民主——即工人參與工廠的管理，故此工廠普遍成立三結合的工廠管理委員會，例如在北平解放後，大華礦業公司就改變了舊有的管理方法，建立了廠務管理委員會，以經理為主任，吸收工人參加，一切生產、管理、人事調動、福利、工資等問題，皆拿到此委員會討論，然而在一般情況下，實行的結果卻是毫無功效，權力基本上仍由管理人員控制，主要原因是由於專業人員掌握了重要的技術，黨政人員及工會代表根本無足夠的知識否決管理人員的決定。此外，若工會代表顯示出他們有管理工廠能力的話，他們更會被吸納到管理層中，故此，在工廠中權力仍掌握於專業人員的手裡。

三 容許非共黨人士出任政府高位的原因

從中央政府人員的構成中，可發覺非共產黨人士佔有一定的比例，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一半乃非共黨成員，在政務院的二十四個部門中，有十一位部長如交通部長章伯鈞、司法部長史良、郵電部長朱學範、輕工業部長黃炎培等皆非共黨人士。

除了人事構成及共產黨採取了溫和的經濟建設路線外，共產黨的多位領導人皆強調多殺亂殺的主張是完全錯誤的，它只會使共產黨失去各階級的支持，脫離群眾，陷於孤立的境地。在土地改革過程中，共產黨批評「貧僱農單獨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正確提法應是「僱農、貧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打江山」，並必須避免對中農採取任何激烈及冒險的政策，不得隨意瓜分富農的土地。在全國範圍內應是工人、農民、獨立工商業者、小資本家、學生、教員、自由職業聯合一道共同建設。

在城市經濟政策上，正如共同綱領指出，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繼續經營，究竟為甚麼共產黨要採取上述的溫和政策及容許專業人士及非共黨人士佔國家要津呢？這主要有下列幾點原因：

（1）穩定局勢的戰略步署

雖然共產黨的領袖如毛澤東及劉少奇等並不諱言他們的革命理想始終是實行社會主義。然而在建國初期，最迫切的任務還是維持穩定局面，安撫人心，防止人才資金大量外流，並建設經濟。對外則是爭取國際承認，孤立台灣國民黨政權。毛澤東十分實際地帶領共黨發動農村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及奪取城市的道路，如以馬克思、列寧的經典教條來衡量，中共根本是離經叛道。然而，對共黨領導人來說，他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強大富強的中國，建國初期穩定局面比實行社會主義來得更實際，這種實用主義在建國初期佔了上風，促使共產黨實行較為溫和的政策。

（2）缺乏管理城市的人才

共黨在革命時廣泛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經過多年的管治，中共於農村得到很深厚的支持基礎，然而在四九年後，他們需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管理局面，對於管理城市，共黨不單缺乏經驗，更無合適的人才，這情況共產黨也意識到，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開的共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中共號召黨及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需從農村轉向城市，並需用極大的努力學會管理和建設城市。共黨亦指出他們要依靠工人，並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工作。會議更發出警告說：「如果共黨在生產工作一無所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成績，使人民生活改善並減少失業情況，那麼，就將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及失敗。」（註十八）在這背景下，共產黨廣泛吸收舊政府及工廠的管理階層，準許他們繼續負擔起決策的工作，以維持經濟發展的局面。

（3）保護既有經濟基礎

一九四九期間的中國經濟十分落後，又遭戰爭破壞，雖然中共能迅速將國民黨政府所管轄的大型企業及財產收為國有，但它始終不能完全

沒收資本家的財產，主要原因是中共沒有足夠的人才去控制這些私營經濟。此外，中共領導人亦了解到在國內工業品仍十分缺乏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工業有助於增加國家的財富。

在四九年間，資本主義企業在輕工業方面佔著優勢，因為當時國家來不及亦無能力辦廠，故只好依靠這些企業所提供的貨物。另外，由於國營商業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建立全國的供應網絡和供應機構，為方便商業的發展及城鄉物資交流，只好容忍私營商業機構的存在。再者，共產黨也明白到，要儘早實現工業化，除了依靠自身的積累及農民支援外，更需資本家的稅款。

除了經濟方面對國家的利益外，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維持就業、協助國家訓練技術及管理人員方面也起著很大的作用。共產黨也發覺到資產階級較能掌握一些現代企業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是一個擁有比較多知識份子和專家的階級，而這些經驗又是建設社會主義必需要的。「根據若干行業的典型調查，中國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中，約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熟悉工程技術的專家。」(註十九)基於上述情況，難怪身居經濟決策要位的陳雲也說：「私營資本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部份，在私營工廠中的工人，應該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生產。」(註二十)而身為中共黨員及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的李立三更說：

「要資本家熱心經營，擴大生產，就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所以我們的工人的經濟要求不能過高；如果過高了，弄到資本家無錢可賺，甚至虧本，結果必然是資本家不願積極經營，企業垮台，大家失業，這不僅對資本家不利，對於工人也是不利的。」(註二十一)。

劉少奇亦同意：「國家現在接收官僚資本的工廠，管理後還不如資本家管理得好，何況再接收幾十、幾百個小工廠。……沒有那樣多幹部，就是將來你們大家能夠當廠長，但是因為經驗不夠，搞不贏資本家……我們看見過很多事實，資本家辦的工廠被工人收來辦合作社，但辦了兩個月就垮台。」(註二十二)

(4) 塑造溫和政府的形象

既然中共決定實行較為溫和的政策，故安排民主黨派或其他階層人士出任政府的職位，對內可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政府，使人民對其承諾推行的溫和政策更有信心，而對外則建立民主開放形象，爭取外國認同，及吸引更多華僑及政治游離份子的支持，使國民黨政權更為孤立。一般來說，中共對外宣傳某政策時必有不少民主人士發言，如張瀾、李濟深、宋慶齡等，使國外人士覺得發言的並非共產黨，而是一些多年為民主事業鬥爭的人，從而更增加他們對新政權的信心。

四 中共的嚴密控制

整個政協及聯合政府在組成時採取一種令人覺得開明的程序，例如周恩來曾指出制定〈共同綱領〉時，初稿為共黨起草，但初稿寫出後，便經過七次的反覆討論和修改，廣泛吸收各方的意見，才正式交予政協正式通過(註二十三)。然而這次會議仍受到一些與會者的猛烈抨擊。例如民主同盟代表周鯨文就批評每一個代表，除了一些重要的共產黨領袖外，根本沒有自主，整個會議根本沒有動腦筋的必要，他說：

「〈共同綱領〉由共產黨提出，大家也討論了，情勢所限，在小組討論時，代表所能建議和修改都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間，其他內容是不許刪動的，即使有人提出一些意見，也是經由共產黨人的解釋，予以否決……在選舉政府人名單時，事前也是由共產黨擬定，……在大會上全場投票一致通過。就是會上代表的發言，也是先擬好，然後交大會主席團看過批准，主持這件事的，不用說又是共產黨。」(註二十四)

周鯨文繼續批評道：「這樣一手包辦的事，共產黨說是『新式民主』，主要特點是『背後協商』……我所瞭解和體會的，這個『民主』的特點，所謂『背後協商』，實是『當面指示』。」(註二十五)

他並指出在四九年政協會議後，由於總的任務已完成，中共曾計劃取消其中較小的民主黨派而只保留幾個較大的黨派，然而後來毛澤東因

恐怕別人批評他「過河拆橋」，故此說：「既然開銷差不多，為何不多掛幾個招牌，看來也火熱。」（註二十六）。

雖然如此，實際上民主黨派也受共產黨控制的：

- (1) 所有民主黨派的財務，無論上級和下級的開支，皆全由國庫控制，由於財政不能獨立，民主黨派只得順從共產黨的指示。
- (2) 中共統一戰線工作部下設民主黨派處，凡是民主黨派的事如開會、討論題目內容、決議、聲明及吸收甚麼人入黨等，皆需向此部門報告，民主黨派會議中都有情報員向統戰部報告與會人們思想動態，有時統戰部更親自派員旁聽，以取得第一手資料。
- (3) 實際上，領導民主黨派的是在民主黨派中的共產黨員，他們加入各民主黨派，參與其各項工作，無形中成了這些黨派的主宰。大家說話先得看他們的顏色，決事則先聽他們的意見，待辦的事先由他們主張……在民主黨派中是直接的指揮官，透過他再呈上統戰部。」（註二十七）
- (4) 中共希望能聯絡各階層人士，保證他們能擁護新政權。故此，中共希望民主黨派能配合中共，主動聯絡多些知識份子、華僑及民族資產階級，中共理解民主黨派在這些人群中甚大的號召力，因為民主黨派人士懂得這群人的心理、感情、言語和習慣。為了達成這目標，民主黨派在中共實際的領導下進行了分工，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負責吸收和教育舊國民黨政府官員、民主同盟負責高級知識份子的工作、民主建國會負責工商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負責對台工作、致公黨負責海外華僑等。

五 對權力集中的分析

其實，出現上述情況是毫不奇怪的，在建國初期的混亂情況下，沒有一強大而集中的政治權力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毛澤東曾指出：「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

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的利益。」(註二十八)此外，他還指出假若人民不學會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推翻。故此在共同綱領中，明確提出了「人民」與「國民」的分別，「人民」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而對官僚資產階級則在其財產被沒收和地主階級在其土地被分配後，仍要嚴厲鎮壓他們的活動，強迫他們勞動以促使這群人改過自新，在改變以前，他們不屬人民範圍，而只是「國民」。

在建國期間，中國共產黨牢牢的集中權力，控制全國。其實從一九二七年的國共鬥爭開始，為著生存及革命，共產黨已成為一有高度紀律性及行政效率的組織，在這裡我們要了解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政權(如政務院、法院、軍事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關係，通常的情況是，中國共黨的領導人，基於槍杆子裡出政權的真理，往往掌握國家的實際政權，例如毛澤東既是黨中央及黨的軍事委員會主席，同時亦是國家政權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及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這種黨員與國家官員身份重疊情況從中央至地方組織都是一樣，黨員通常會成為政府機構的負責人或以黨委員身份，指導國家機關人員的工作，這種情況在中共紅軍中最為普遍，其實黨領導軍隊的方法乃源自蘇俄之紅軍，在解放軍各組織職級中，皆設有代表共產黨的黨代表，簡稱政委(政治委員)，他們的主要工作頗似中國之監軍制度，代表共產黨，監察紅軍，其地位在同級軍官之上，一切人事、行政等命令，一定要得到代表共黨的政委之許可。

除了在國家政權外，中共黨員還實際控制著各民間組織，如全國總工會、各農民團體、婦女聯合會、青年聯合會及民主黨派等。此外，中共黨員更控制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署。最後，所有的中共黨員皆須接受上級的指示，向中共黨中央負責。總結以上分析，當時的政權機關雖能容納各方民主、獨立人士，但在打擊國民黨剩餘勢力、建設政權及恢復經濟等大前提下，實際的權力仍牢牢地緊握在組織嚴密的共產黨手裡，或在幾個重要領導人的手上。

註 釋

- 註 一 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3-7頁
- 註 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全文〉載《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文化資料供應社出版，一九七八年，第262頁
- 註 三 同上
- 註 四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零年一月) 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627頁
- 註 五 同上註，第644頁
- 註 六 龐松、王東著《滑軌與嬗變——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備忘錄》，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92頁
- 註 七 毛澤東〈在全國統戰會議工商組討論會的一份發言記錄稿上的批語〉(一九五零年四月)，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292-294頁
- 註 八 1 Baran, P. and Sweezy, P. (1968), *Monopoly Capital*, Penguin, Harmondsworth, Originally Published 1966.
2 Frank, A.G.(1978.,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Macmillan, London.
3 Amin, S. (1977).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Harvester Press, Hassocks, a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ro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76.
- 註 九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同註四，第600頁
- 註 十 同註四，第631頁
- 註十一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中文圖書供應社，一九七四年九月，第6頁
- 註十二 同註四，第632頁
- 註十三 同註四，第639頁
- 註十四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 載《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983頁
- 註十五 〈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建國綱領」〉(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 載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一九七零年十二月，第407頁

- 註十六 同註二，第267-271頁
- 註十七 同註四，第639頁
- 註十八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載《中共黨史導讀》(上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第995-999頁
- 註十九 吳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改造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74頁
- 註二十 陳雲〈工人階級要提高政治覺悟〉(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載《陳雲文選》(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22頁
- 註二十一 李立三〈關於發展生產勞資兩利政策的幾點說明〉載劉少奇等著《新民主主義城市政策》，新民主出版社發行，一九四九年八月，第15頁
- 註二十二 同註十五，第406頁
- 註二十三 〈周恩來報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起草經過〉載同註二，第253頁
- 註二十四 周鯨文《風暴十年》，時代批評社，一九五九年，第59頁
- 註二十五 同上
- 註二十六 同上註，第61頁
- 註二十七 同上註，第71頁
- 註二十八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1368頁

第二章 建國初期的困難、形勢和任務

導 言

經歷多年戰亂，四九年的中國政府面臨一個極為複雜的局面。當時國家還未統一，農村仍受封建勢力剝削，整個國民經濟瀕臨破產，通貨膨脹、生產萎縮，人民思想仍然落後，外交方面又受到西方各國種種壓力及封鎖。中共建國初期的中心任務，主要是「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恢復國民經濟」^(註一)，以醫治戰爭所帶來的創傷，鞏固現政府的統治，為將來的建設奠定穩固基礎。

這章主要討論四個問題，分別是第一、中央政府在建國初期面對的困難；第二、中共在建國初期的主要任務及有利條件；第三、徹底摧毀國民黨政權及其社會經濟基礎，主要討論解放戰爭的繼續進行、中共沒收「官僚資本」，以及動搖農村封建地主制的土地改革運動；第四、中共恢復國民經濟的措施，分別為打擊投機資本、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調整並協助私營工商業，以及進行重點建設及救災工作等。

第一節 中央人民政府面對的主要困難

一 中國大陸仍未完全統一

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已取得根本勝利，然而仍未能對全國進行全面之控制，國民黨軍隊仍支離破碎的存在，控制不少地區。當時國民黨在大陸的兵力仍約有一百萬人，主要是國民黨將領胡宗南、白崇禧的部隊。另外，國民黨政府到台灣後，在大陸還留下一定的政治實力，對新政府進行種種牽制，使新生的中共政府在戰爭後的重建上面臨一定之障礙。另外，影響著全國統一的，還有少數民族問題，漢藏的衝突是紛爭的焦點，四九年七月，西藏首都拉薩發生了驅漢事件，西藏政府截斷拉薩與外界的電訊聯絡，通知當時仍統治西藏的國民黨政府人員撤離

拉薩，封閉漢人學校，驅逐居住於西藏的漢人，並提出西藏獨立。西藏的獨立運動得到英、美及印度等國家支持，她們抨擊中共的人民解放軍入藏是入侵行動，希望把中國的內政變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以方便他們的介入。

二 部份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封鎖

雖然中央對國民黨鬥爭的勝利得到東歐各國、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及部份歐洲國家的支持，然而，當時美國政府仍支持已遷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對中國大陸進行軍艦、飛機、水電的圍堵，並在經濟上進行封鎖，例如不買大陸出口的貨品，不賣給新政府所需要的物資，這對當時的中共政府構成很大的壓力。

三 農村仍維持著地主階級剝削制度

四九年農村中尚有二億九千萬農業人口的地區(約佔全國農業人口百分之七十)還沒有進行土地改革，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註二)。地主階級統治農村的局勢根本仍未改變。這亦即是說，在全中國大多數的農業地區，農民仍受著舊有制度和地主階級的統治，仍未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

四 國民經濟面臨破產邊緣

當時中國面臨的經濟困難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1) 全國工農業生產大幅下降

由於長期的戰爭及外國侵略者的劫掠，全國的工農生產受到極大破壞，一九四九年的工業生產與抗戰前的一九三六年比較，下降了百分之五十。農業生產方面，四九年糧食產量比歷史最高年產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左右，棉花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八，再加上四九年旱、凍、蟲、風、雹、水、疫等災禍相繼出現，尤以水災最為嚴重，全國受災面積達一億餘畝，受影響農民約四千萬。(註三)

(2) 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

嚴重的通貨膨脹，是當時中央政府面對的一個主要難題。通脹的出現有其歷史因素，從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到四九年的十二年內，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了一千四百多億倍，物價上漲了八萬五千多億倍。(註四)而新政府成立後，也由於下列幾個原因，使通脹情況延續下來：

1. 中央政府開支太大，入不敷支

新政府成立後，解放戰爭仍繼續進行，軍事開支未能大幅削減，四九年的軍事開支佔財政收入一半以上，此外，中共對不與共黨為敵的國民黨政府人員及軍隊，採取繼續留用的政策，這樣不單可以彌補新政權人才不足之問題，更可使他們不對新政府敵視。當時主管中央經濟的領導人陳雲曾指出：

「全部接收在舊政權下工作過的人，財政上負擔很大，但是，裁了這部份人，讓他們失業，沒有飯吃，問題更大。」「現在養著這部分人……待解放地區的人看到，這些人生活都有保證，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少了，這樣戰爭可以更快結束。」(註五)

故此中央政府便執行「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匀著吃」的政策，連同新政府的軍政公教人員，國家需要維持的脫產人員多達九百萬人，行政費用很大。此外，幾千萬的災民、農民和失業者需要救濟。被破壞的各種交通、工商、水利和房屋事業，皆須國家支持以待恢復。

然而，國家的財政收入卻趕不上支出的需要，在四九年前已被共黨長期控制的地區，由於屢遭戰爭破壞以及已對共黨軍隊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這些地區已沒有承受新負擔之能力，而新解放區的稅收，卻由於戰爭及季節的限制，暫時未能徵收。此外，用於恢復生產的投資，並不能於短期內收回成本及利潤，這就使國家收入與支出間出現了巨大赤字。

為了彌補國家的支出，政府不得不暫時大量發行鈔票，結果是一方面解決了戰爭的重點支出和恢復經濟建設的任務，一方面卻要承受通脹及物價波動的惡果。

2. 投機資本家的囤積居奇投機活動

四九年後中央政府還容許私營資本主義的存在，部分資本家見國家出現持續的通脹，認為囤積居奇的投機活動仍有廣闊的活動空間，而這類投機活動遂成為破壞國民經濟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參與投機的資本家憑藉在市場上的經濟優勢，以各種方法抬高物價，謀取暴利。他們主要的方法是組織「游資」（即用以投機的資本），在物資供應不足的地方突然大批購進稀少的貨物，以便在價格抬高後推出，賺取豐厚利潤。

例如四九年六月，美國和國民黨對上海進行封鎖，加上上海當時又遇著嚴重的颱風及水災，糧、棉供應十分緊張，於是某些資本家便大搞糧食投機，大量買入此等短缺產品以減少市場上已經甚為不足的供應，使價格進一步提高。市民見糧、棉價格突然上漲，出於保值心理，也爭相搶購其他貨物。而且，糧、棉等貨品也是其他工業生產的原材料，其價格上漲會從成本方面帶動這些工業或消費品價格的提高，再加上糧食等物資是普通市民生活的必需品，其價格上升意味著工人實際的工資下降，工人也會向國家或企業要求加薪以作彌補，做成企業成本上升而提出加價。故此，糧價上升促使一般物價亦跟隨上漲。以上海為例，從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十六日，糧價上升了四倍，其他各種主要商品的價格在七月時比六月上升了五成至兩倍。在其他地區，大都是糧價帶頭上漲，紗布跟著帶動全面物價上升。就這個問題，中共一時間亦沒辦法解決。陳雲曾指出：「由於蘇南、浙江的公糧尚未集中調運，游資專向糧食衝擊，居民見漲價而多買，如上海貿易公司因存糧少而心虛，不敢在市上大拋，因此糧價過分突出。」「有了糧食，控制上海物價就有了相當的把握了。」（註六）

某些資本家除了進行物資投機外，還搗亂金融，排斥中央人民政府發行的新人民幣，以達至投機獲利，並導致物價上升。在上海解放後，

投機資本家亦利用人民幣立足未穩的機會，有計劃地掀起金鈔銀元外幣的漲風，他們以證券大樓為指揮部，利用幾千部電話到處散佈消息，打擊市民對人民幣的信心，結果在十多天內，銀元價格被抬高兩倍，一般市民受謠言影響，對人民幣失去信心，爭相湧購外幣銀元物資以求保值，有些商號更拒絕接受用人民幣買賣，令人民幣不能有效反映其本身的價值，市民須付更多的人民幣才可買到所要的東西，這樣，人民幣便實際貶值，整體物價也因此上漲。故此，從四九年五月廿七日上海解放到六月九日的十三天內，物價上漲了二點七倍，黃金上漲了二點一倍。

3. 中央收支並未統一，造成調配困難

在四九年前，共產黨因為佔領的解放區被敵人分割，故採取各地區分散獨立經營、自行處理收支的政策，但在四九年後，共黨領導的五六百萬主力部隊及大行政區直屬部隊每月須由中央支付開支以維持。但在另一方面，公稅、稅收等均在各地方的縣、市、省手裡，中央根本無法掌握調度。面對龐大赤字財政上的不統一和收支機關之間的脫節現象，中央被迫發行貨幣，進一步引起物價上漲及金融波動。

4. 各級幹部大幹快上的思想

陳雲曾指出：「各部門、各機關的高級幹部對目前財政困難和解決辦法不甚了解。例如，開的預算太大，在恢復經濟和建設計劃中，不分先後和輕重緩急，甚麼都想幹。」(註七)由於這些高級幹部希望推行多項基本建設，儘快恢復經濟，但在國家當時薄弱的財政力量下，根本不能應付龐大的基建開支，故又只好發行貨幣來解決，引致通脹惡性循環。

對通脹的總結

惡性通脹出現，不單使市民生活水平下降，更會使工商界人士不敢進行正常的投資，他們恐怕利潤會因通脹而變為一文不值，在這情況下，工業生產以至整個國民經濟便會停滯不前，資本家希望通過不同的投機活動，以求保值，結果造成社會上缺乏正常的生產，以及供應更加

緊張的惡性循環局面。當時，陳雲曾精確地指出：「物價的波動，祇能打擊生產，使經濟停滯。」（註八）

（3）嚴重的失業問題

由於戰亂，農村破產，加上金融資本家的投機，使工商業無去正常生產，不少資本家只得參與投機活動，工廠萎縮倒閉，引致嚴重的失業問題。當時連一些生產高質素產品的企業也難以維持。一九四五年抗戰後，中國社會貧富懸殊情況嚴重，一些富有人家及國民黨政府官員由於有龐大收入，刺激起一些遠遠脫離一般市民購買力的高檔消費品的生產。然而，隨著共產黨解放戰爭的成功，加上經濟不前，這部分富有人士紛紛外逃，使上述高檔商品行業失去了顧客而面臨倒閉局面。

（4）交通運輸嚴重滯後

多年的戰亂使中國大陸的交通運輸業遭受嚴重的破壞。「運輸是全國經濟的樞杆」（註九），交通不暢順將嚴重影響各大城市重要物資的供應。舉例來說，上海缺乏運輸能力便是該市大米及棉花等重要物資供應不足的主要原因。

此外，掌握重要物資亦是政府打擊投機資本家的主要手段，假若投機資本家大量收購物資以作囤積居奇，掌握充份物資的政府可拋出其掌握的貨品，通過增加供應以平抑物價，使投機資本家大量虧蝕。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上海交通工具缺乏、行車速度慢、調度不靈和通訊設備嚴重不足，政府不能掌握物資，就不能有效地抑制投機資本了。

第二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主要任務及有利條件

一 建國初期政府的重點任務

面對複雜的政治經濟形勢，中共於建國初期的任務有如下五方面：

- (1) 加快推行軍事行動，消滅殘餘敵軍，解放全國領土。陳雲曾經指出，困難時期的長短，第一須視乎「解放全中國的快慢。解放戰爭結束得早，就能早減少我們的軍費支出，把錢用到生產事業上來。」(註十)；
- (2) 在新佔領的地區儘快展開土地改革，以發動農民推翻地主的統治，從而鞏固政權；
- (3) 執行適當的經濟政策，領導國內人民克服困難，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陳雲曾指出：「解決困難須決定於政府工作做得好不好。要在最困難的條件下設法維持生產，減少困難。」(註十一)
- (4) 掃除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
- (5) 鎮壓一切反對新政權的活動，並於國際舞臺上盡量聯合自己的盟友，以集中打擊仍支持台灣國民政府的國家。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有利條件

(1) 廣泛的群眾支持

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前的活動主要集中於農村，中共提出平分地權、土地改革的政策，得到農民普遍的歡迎。在城市，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及工商界人士對中共也表示擁護。當時各階層人士對腐敗貪污的國民黨政府所提出的各項改革已完全失去信心，再加上共黨統一戰線的運用，緊密團結著與資產階級有一定聯繫之民主黨派，並反覆強調中共政權將繼續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的經營及發展，從而成功地穩定資產階級的信心。當時一般知識份子的心態，可從一位教授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北京仍未由共黨控制之前四個月的言論中得到啟示：

「中國一般知識分子都希望能不理政治，但當他們聽到國民黨政府反覆宣佈其希望進行民主改革及改善管理的同時，他們也見到這些宣言從事實中失敗。政府不單沒改善，反而比以前更差，故此，根本很少人對現時的改革抱有信心……當初，我們大多數人皆支持國民黨政府，雖然知道其有很多問題，但仍希望其能改革……現在我們已完全對其失望而

希望儘快能推翻其統治。由於共產黨是唯一一個能帶出改變之力量，故此我們願意支持它，這也是基於兩害權衡取其輕的道理，我們其實希望能保持中立，但現在已是無可能的了。」

（2）從各「解放區」累積的管理經驗

中共在四九年前已成功地控制部份區域，當時這些「解放區」各自被國民黨軍隊封鎖，出現多個分割及分散經營的局面。由於各個解放區面臨的處境與困難不同，故迫使各地方的中共領導人須按當地實際需要彈性靈活地處理問題，這遂使他們累積了不少管理上的經驗。

此外，隨著軍事的勝利及解放區的擴展，亦促使中共逐步建立較完整的制度及管理系統以處理地方事務，此等工作使中共培養了一批管理人才，對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後的社會管治起著積極作用。

（3）較為安全的國際環境

建國初期，支持著台灣政府的美國對中共政權採取敵視態度，於聯合國中阻礙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得合法代表地位，對中共新政府實行貿易封鎖和禁運，並在太平洋上建立了自阿拉斯加軍事基地起，經過阿留申群島、日本、琉球、南韓、台灣、菲律賓、越南、一直到泰國的軍事基地網，對大陸進行軍事包圍。此外，美國並派出軍事代表團到台灣，供應台灣政府大量軍事裝備，這樣無疑是對新政權造成軍事上之威脅。

另一方面，新中國政府也力圖與其他國家建立正常之外交關係。十月二日，即建國後的第二天，蘇聯政府便正式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著，一些東歐國家如捷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一些西方國家如瑞士、瑞典及丹麥等，也先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而芬蘭、英國、挪威及荷蘭等國家也與新政府進行了建交談判。到一九五零年十月，即建國一週年，共有二十五個國家承認中共新政權。此外，對一些還未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新政府也與之進行各種渠道的貿易關係，為將來作更進一步的外交關係發展奠定基礎。另外，

為了打破美國的禁運政策，中國政府改變國內一些以往與國外有密切經濟關係企業的經營方向，加強這類企業與東歐及蘇聯的經濟往來，以發展自己的貿易網。

基於上述情況，建國初期的中國政府雖仍面對一定的外來威脅，但總的來說，卻沒有即時衝突的軍事危險。一個相對平衡的國際局面，使新政府能較安心地處理內部事務。

第三節 徹底摧毀國民黨政權及其統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一 解放戰爭的進行，實現全國（包括西藏）統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徹底殲滅國民黨軍隊，全面佔領華南、西南地區和沿海島嶼，人民解放軍便不停地向前挺進，打擊國民黨仍控制著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地區和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並集中對付國民黨將領白崇禧和胡宗南的兩支武裝力量。當時人民解放軍採取了大迂回、大包圍及大殲滅的作戰方法，發動了三次較大的戰役，即湘粵戰役、廣西戰役和西南戰役，並取得全面勝利。

在全面控制華南和西南地區後，中央人民政府希望以談判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然而，在西藏政府內部，以攝政大札為首的一派，在英、美及印度的支持下，希望西藏獨立。一九五零年十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金沙江、怒江、瀾滄江，開始進軍西藏，並於十七日成功佔據了西康西部重鎮昌都。由於藏軍主力被滅，西藏遂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全權代表團抵北京，與中央政府進行談判。經過一個月的商討，雙方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協議規定西藏須回歸至中國母體，西藏地方部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一切涉外事宜歸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在內部關係上，規定西藏有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並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與風俗習慣。（註十二）

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首都拉薩。至此，除台

灣及港澳等地區外，中國大陸得以統一。

二 在城市中沒收官僚資本，控制經濟命脈

中共在推翻國民黨政權及建立各級政府後，共產黨就運用政權的力量，摧毀國民黨統治的經濟基礎，沒收「官僚資本」（即由國民黨政府控制的大型企業）及廢除外國於中國的享有的特權，把國家的經濟命脈控制在政府手中。

在中共解放軍所到的地方，各級由中共成立的軍事管制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共同綱領〉的規定，沒收由國民黨政府以及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等國民黨大官所經營的企業，包括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鐵路、郵政及農場。據統計，到一九四九年底，國家沒收的工業企業共有二千八百五十八個，擁有生產工人七十五萬人。（註十三）一九五一年一月，政務院發佈〈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財產的指示〉，對於這部份人的財產進行沒收，並發佈了〈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對隱匿在一般私營企業中的官僚資本股份，進行了廣泛的清理工作。

由於中央人民政府沒收了前國民政府控制的企業，遂使國營經濟力量壯大起來。據統計，一九四九年的國營工業，在全國大型工業總產值中所佔比重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三，其中包括擁有全國電力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原煤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八，生鐵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二等等。（註十四）此外，中共並掌握著全國的鐵路、大部分現代交通運輸業、絕大部分的銀行業務和國內外貿易等的操縱權，奠定了社會主義經營的領導地位。

為了完整地把官僚資本企業接收，並迅速恢復生產，中共中央作出下列指令：

- (1) 為了抵制國民黨及其支持者的拆遷和破壞，從而使企業內絕大部分的設備、器材能保存下來，共產黨組織了這些官僚資本企業內的職工，開展護廠、護礦及護航等活動。
- (2) 不打亂原來企業的組織機構，並保留技術及管理人員。

中共實行「原職、原薪、原制度」的三原政策，以安定人心及穩定秩序。所有接管企業的解放軍代表，不直接參與經營管理，其主要任務是監督企業的活動，督促檢查，防止破壞，保證生產的恢復及發展。

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同時，中共政權也廢除一些西方國家於中國的特權，以及廢除她們過去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接管外國長期霸佔的海關，收回關稅和海關管理方面的自主權，統制對外貿易和實行外匯管理，取消某些西方國家的特惠關稅。然而，除卻一些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企業外，當時中國並無即時沒收西方國家在中國經營的企業，但由於這些企業多是靠外國的特權，如控制中國海關及壟斷中國的外貿權，使外國貨品可自由輸入中國而發展起來，這些企業在特權被廢除後也沒法生存。此外，有的企業是依靠外國原料的供應，韓戰期間，在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封鎖政策後，這些企業也因缺乏原料而不能經營下去，自動轉讓給中國政府，以抵償其債務。

為徹底肅清英美於中國的經濟勢力，並報復這些國家凍結中國於其國內的財產，中央人民政府於一九五零年十二月頒發了〈關於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美國在華存款的命令〉及〈徵用英國亞細亞火油公司財產的命令〉，並沒收其他外資企業的財產和外國人佔有的房屋地產，這就基本肅清了西方國家在中國的經濟勢力，而以往由外國政府控制的企業也逐漸溶入國營經濟中。

三 推行土地改革，推翻農村中的地主階級統治

中共領導人劉少奇曾對土地改革運動作了簡單的說明，他指出：

「土地改革的基本內容，就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這樣，當作一個階級來說，就在社會上廢除了地主這一階級，把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孫中山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權的口號，後來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註十五)

實際上，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七年建立起農村根據地開始便已實行土改政策，毛澤東亦曾指出土地改革就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註十六）

（1）共產黨推行土地改革的原因

1. 徹底推翻封建地主制統治，鞏固現政權於農村的社會基礎

四九年前中國的地主與國民黨政權保持著千絲萬縷的合作關係，經濟學家陳翰笙在其《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中指出：「許多的地主兼高利貸者，可以變為地主兼商人，又可變為地主商人兼政客，同樣許多商人政客又可變為地主。」簡單地說，地主、商人及官僚之間的關係密切，形成了國民黨政府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中國著名經濟學家王亞南曾精辟地指出：「大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就在帝國主義利益的統一要求下，變成了相互依存和三位一體的『通家』。」（註十七）在農村中，由於要保障其經濟利益及打擊共產黨的活動，地主階級往往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並與國民黨地方政府合作，建立起嚴密的保甲制度，控制著中國的廣大農村，成為基層政權的基礎。故此，在進行解放戰爭的同時，中共在農村中亦逐步開展打擊地主的鬥爭，廢除保甲制度，改造基層政權，削弱整個地主階級。

推行土地改革，將土地分予無地農民，不單可以爭取絕大多數農民對新政權的支持，更可在發動農民推行土地改革、鬥爭地主及分配土地的過程中，大大打擊地主的威信，並建立起由中共控制之農村基層組織，鞏固共產黨統治的社會基礎。

2. 改變貧富縣殊的情況，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實行土改的另一原因，是舊中國的土地制度不合理。當時佔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中、僱農及其他人口，卻只佔約百分之二十

至三十的土地。因此，無地及少地的農民，為了生計，被迫向地主租種土地，並忍受其剝削。由於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大受打擊，落後的農業遂成為中國工業化的基本障礙。因此，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解放農村生產力，激勵農民更勤奮的生產，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糧食、原料、勞動力、農村市場和積累建設基金。

就中國土地改革運動，曾出現過兩個不同的觀點：其一，認為中國農業落後的原因，主要是科技落後，包括缺乏機械化操作和先進的灌溉系統，肥料不足及人口不斷膨脹等，故此要改變農村生產落後的現象，並不一定要推行土地改革，而是要減少農村人口、注入新科技及積累資金，以發展農村的經濟；第二種觀點認為人口多、耕地少及缺乏科技是造成農村問題的原因，然而中國農村縱使在連年天災、戰火摧殘及農民受嚴重剝削的情況下，也能為地主積累到一定之盈餘，但這部份盈餘卻被花費在一些奢侈的個人消費及非生產的用途上，如購置土地以收租，而不是將盈餘投資於工業生產。在這情形下，如中國要推行工業現代化，則必須推翻地主制統治，將農民生產出來的盈餘用於工業建設。此外，雖然土改本身並不能徹底醫治貧窮，促進科技發展，但至少它可以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進一步提高生產力。

(2) 土地改革的重點政策與執行方針

1. 保存富農政策

在土改中，中共的總政策是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消滅地主，與過去的策略比較，有了重大的改變，「即由徵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註十八)，中共不僅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及其它財產，而且更准許富農保存出租予其他農民的小量土地。保護富農政策可使地主更加孤立，以減少土改的阻力。此外，由於一九五零年在大陸的戰爭已經基本結束，這情況與之前有所不同，在四七及四八年間，戰爭的勝負誰屬還未定，

富農基於自己的利益，站在國民黨政權及地主階級的一邊，他們不相信也不希望共產黨能勝利，並反對土改及共產黨。在另一方面，共產黨為了獲得更多收入以支持軍事行動，允許貧困農民沒收富農的財產，藉以發動農民的熱誠，參加及支援共產黨。但到了一九五零年，國家可以用貸款方法去幫助貧農解決生活困難，以補償貧農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此外，不沒收富農的土地，也可去除較富裕的農民對共黨政策的顧慮，有利於維持農村的生產。

2. 強調要有領導、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

解放後的土地改革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及最徹底的土地制度改革，共產黨強調要有秩序及計劃地推行，以避免過往在解放區內一些因外來軍事壓力下所造成的過激行動。劉少奇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四日〈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強調：

「我們在今後的土地改革，不能容許混亂現象的發生，不能容許在偏向和混亂現象之後很久不加糾正，而必須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人民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及其所決定的方針、政策和步驟，有領導地、有計劃地、有秩序地進行。」他並指出「在決定今年不進行土地改革的那些地區，就不要去進行土地改革，如有農民自發地起來進行土地改革，亦應說服農民停止進行。」(註十九)

此外，共產黨強調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土地改革更需小心，要視乎各少數民族內部的工作情況與群眾的覺悟程度狀況才作決定，盡量給予少數民族更多的時間去準備。

3. 實行群眾路線，發動農民推行土地改革

土改政策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發動農民以推翻整個地主制度，因此，共產黨強調放手發動群眾，批評和反對由政府下命令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之和平土改或官辦土改的方針。雖然共產黨了解到和平土改也能達至平分土地的目的，但由於在進行和平土改的過程中沒有發動農民參與，故

也不能藉土改的機會教育農民，將農民政治化，改變他們害怕地主的思想，而把他們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此外，共產黨亦了解推行土改將會是一場激烈的鬥爭，地主階級會以各種手段進行反抗和破壞，例如分散、隱藏財產和其他生產資料，利用金錢及財物對幹部行賄，運用親戚和宗族關係阻止土改的進行。

客觀理論上，農民反對農村中的不合理制度是毫無疑問的，但在主觀現實中，農民並不是一開始就有變革的決心，原因是農民長期受地主壓迫，對地主有一種害怕心理，恐怕以後會遭受地主的報復。此外，部分農民十分迷信，認為自己的不幸皆由於自己的命運不好。故此，毛澤東曾指出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願實行改革，故此要等待多數的群眾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願實行改革，才能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

(3) 推行土地改革的具體步驟及過程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對於土改的目的、土地的沒收和徵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問題的處理、土地改革的執行機關和執行方法等，作了詳細的規定。同年七、八月間，政務院又先後頒佈了〈農民協會組織通則〉、〈人民法庭組織通則〉和〈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等文件，以保證土地改革能順利執行。

當時推行的土改運動，是根據各地不同情況和不同條件，分期分批地進行，中央政府動員了四十萬以上的幹部，集中到以幾個省劃成的一個區，組成各級「土地改革委員會」，作為推動機關，並以「農民協會」和「人民法庭」為執行機構。農民協會是以鄉村為單位，其主體為貧農僱農，凡中央政府派到農村推行土改的幹部皆加入農民協會，使農民協會成為執行土改鬥爭的主要力量。「人民法庭」以縣為單位，由地方政府臨時派人組成，是專為審判土改案件而設的法庭，以解決土改過程中劃分階級、分配土地及其他有關的糾紛。

雖然中共希望有步驟及有計劃地推行土改，並儘量減少過激的行動，但韓戰的爆發及中國出兵朝鮮卻使這項溫和政策受到衝擊。韓戰爆發，一些地主認為國民黨有機會在借助外國勢力的情況下，可能很快反攻，並推翻共產黨政權。在此判斷下，部分地主遂對中央政府的指示，以各種方式加以抗拒，而新政府亦害怕韓戰會導致他們處於內外受敵的境地。而且，中共亦了解到縱使他們已打敗國民黨的軍隊及消滅了城市中的官僚資產階級，但在農村中卻仍有大量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地主存在，基於這種想法，土地改革逐步激進，導致很多劇烈的鬥爭。

土地改革大致分三個階段進行，即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及分配土地：

第一階段是發動群眾。各地組織了土改工作隊到農村，召開農民代表會議，舉辦短期訓練班，建立農民協會，同時以訴苦、挖窮根(筆者按：即分析為甚麼農民會那麼窮)等工作，用農民自身的經歷教育農民。為了發動農民，有些幹部更採取煽動手法，例如某些中共幹部向某貧農說：「你受了一輩子苦，現在是翻身的機會，沒有土地可得土地，土地少的還可多給，你如不鬥爭地主某人，你那來土地！你不鬥爭地主就是偏袒地主，你自己要吃苦頭的。」或向某中農說：「你不靠近黨，不在鬥爭會上說話，你是有問題的，有問題的就要小心自己的腦袋。」(註二十)中共幹部通過種種不同方法將農民發動起來，同地主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對於一些惹起民憤較大的惡霸地主，由人民法庭逮捕。地主階級的統治勢力被嚴重打擊。

第二階段是劃分階級，這工作一般經過宣傳、劃分、評定及批准四個步驟。首先由農民協會發動群眾，學習文件，掌握階級劃分的標準。先把地主、富農劃分出來，以分清陣線，再在農民內部，採取自報和公眾審議的辦法，以劃分農村內的各個階級，曾有研究指出：

「在農村中彌漫著一種緊張的氣氛，由於每個家庭都將被劃分入不同的階級，而這對他們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地位皆會帶來一定的影響。那些被劃為地主的家庭等待著死亡的降臨，那些被定為富農的家庭也深感

不安，雖然政府已強調了要暫時保存富農經濟，但將來的命運也是懸疑未決，而中農也不知道他們能再擁有其土地很久。此外，很多較為富有的農民也和富農的地位一樣，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何時會被上升為富農階級。」(註二十一)

第三階段是沒收及分配土地。在劃分階級後，便開始沒收地主土地、農具、耕畜和多餘的糧食，徵收寺院、廟宇、教堂在農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徵收的土地除歸國家所有外，其餘均由農民協會接收，以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土地分配之後，即進行土改覆查，以解決土改中遺留的糾紛，頒發土地證，並整頓和加強農村的政權和民兵組織。

(4) 土地改革的結果

1. 徹底推翻封建地主制統治，鞏固中共於農村的基層政權

由於農民參加了土地改革的鬥爭，使其政治化程度大大提高，他們團結在共產黨及農民協會的周圍，成為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的支柱。

此外，以分田分地為手段的土地改革，也使中國的地權高度分散，產生許多小自耕農，使中國農村出現空前分化。面對這一盤散沙的局面，中央政府更要擴大其權力，使整個社會揉合起來。在土改運動中，代表著地方權力的族權(即鄉紳父老)及其化身的紳權(即地方上有財有勢之人等)皆被徹底打倒，代之而起的是由共產黨牢牢控制的農會。這樣，中央的權力便能更有效而直接地下達地方，加強其統治社會的力量。

2. 增加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並帶動其他改革的發展

農民於土改中從封建生產關係中得到解放，成為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農具、耕牛)的私人擁有者，大大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的恢復與發展。據國家統計資料顯示，一九五一年全國農業總產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點八；糧食產量方面，一九五二年較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二點八。(註二十二)

此外，土改也促進農村文化的發展，農村普遍成立了識字班、讀報

組等，農民業餘學校入學人數、小學校數和人數也有顯著增加。從一九五二年冬季開始，農村中廣泛開展了認字活動和掃除文盲的工作，掀起了農村中的文化高潮。

3. 土地兼併及貧富分化的局勢再度出現

在土改後，由於把土地分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約半數的貧農變為中農，貧農約佔百分之三十，中農所佔的比例則從百分之三十上升到六十，亦即是出現了中農化的趨勢。然而，農村的中農化畢竟是暫時的現象，自發地發展下去，必然產生兩極分化。正如中國著名經濟學者薛暮橋等指出：

「土地改革雖然基本上是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但是由於原來中農的土地不動，農民對土地的佔有只是大體上接近平均而不是絕對的平均，農民對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佔有，差別要更大一些。此外，每個農戶勞動力的多少強弱也不相同，土地改革並沒有消滅農民各階層在經濟地位上的差別。」(註二十三)

因此，土改後不久，農村中放高利貸、經營投機行業、進行僱工的情況已十分普遍，例如：

「據河北省肅寧、河間、任焦、建國等四個縣的調查，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零年，有一百三十八戶出賣土地，佔總戶數的10.7%，共出賣土地三百八十四畝，佔總耕地面積的2.19%。在出賣土地的農戶中，由於生活困難被迫賣地的佔一半以上。」(註二十四)

由於貧富懸殊，土地兼併的情況再度出現，故此，中共的領導人便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避免土地重新兼併的情況再度主導農村的發展。

(5) 土地改革的理論分析及歷史性意義

1. 批評推行土改政策的觀點

有些批評土改政策的學者認為中國根本沒有甚麼封建的土地制度，

從春秋時代秦國的商鞅變法起，化井田為阡陌，土地容許自由買賣，農民已擺脫了被束縛於土地的身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崩潰，中國已建立起土地私有制。中國地主的形成，全靠個人獨立的經營，並非長期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而且地權分散，並不集中，興衰起落，尤屬無常，地主可變為農民，而農民也可從艱苦經營而上升為地主，他們同意一句老話：「沒有祖孫三輩的財主。」意謂一時集中的土地，經過分家或經營不善，在三五十年間，即會分散或易主轉手，使農村自然地接近耕者有其田的情況。

英國經濟學家唐尼 (R. H. Tawney) 在其《中國的土地與勞工》一書中說：

「中國沒有握有土地的貴族，沒有歐洲式大地主或鄉村紳士那種大權在握的階級，也很少有兇惡的人，中國沒有由封建的土地法律製造出來的複雜的不平等……中國的地主與佃農間的關係就等於簽了一個合同的雙方，而不是兩個不同的特權階級與服從階級。」

總的來說，他認為由於中國土地容許自由買賣，故中國農村家庭的興衰只是此起彼落，循環不息。既然如此，就無需把中國社會抨擊為封建制度，由於土地本來就是分散的，接近耕者有其田的情況，也就根本無需推行土地改革運動。

2. 中國歷來土地兼併及集中的實況

雖然中國土地歷來都是容許自由買賣，然而，土地集中的趨勢也是歷史上的現實，在土地容許自由買賣之下，有財力買土地的往往不是需要土地耕種的農民，而地主、商人及高利貸者，他們通過地租收納、不等價交換和放債利等手段，對農民進行榨取，並在此基礎上吞併土地。此外，由於中國政府歷來採取抑制工商業的政策，大批官員及工商業者，皆把其收入購買土地以累積財富，使地權大規模地集中。除此以外，官僚地主還利用特權勢力，強佔平民田產，故有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註二十五)，「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

居」(註二十六)，「有田者雜一，為人佃作者(即要租地耕作者)雜九」(註二十七)等等描述史不絕書。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辛酉的〈上諭〉中，就指出「田畝多歸縉紳(富有)之家……約計小民有恒產(田產)者十之三四耳，餘皆賃地出租。」從這裡可知「小民」僅佔土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而地主雖然在人口上佔很小比重，卻佔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土地，顯示土地集中程度十分嚴重。

假若中國的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而土地並非集中於少數地主手中，那麼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土地改革法中強調的「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觀點，便不可能在農村中得到強烈的反應，而由於農民對此政策的支持，直接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此外，在八年抗戰期間，為了爭取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中共也主動在農村土地政策中讓步，原來的「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改為承認地主私有土地及租佃關係，而只以「減租減息」作為爭取農民支持的方法。從以上事實可以證明，縱使中國土地一向容許自由買賣，但兼併及土地集中的情況仍十分嚴重，故此，土改政策也就有其客觀需要了。

3. 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

地主階級通過兼併集中大量土地，他們並不直接經營農業生產，而是將土地分散租給農民以取得大量地租。土地愈集中，意味著破產的農民也愈多，農民對出租的土地的競爭也愈激烈，結果是農民愈貧困。由於農民能租用的土地少，加上耕作技術落後，農民的生活無法改善，加強了對地主階級的依賴，故此，在土地兼併加劇之時，也是歷史上各皇朝面臨危機之日。貧富兩極嚴重分化，農民與地主間的階級矛盾激化，必導致農民起義或農民戰爭。在推翻舊皇朝後，新建立的皇朝為了穩定社會局面，自然要阻止土地兼併，並把土地分給無地農民，以恢復生產，與民休息。然而，由於土地准許自由買賣的制度仍存在，在過了一段時間後，社會又重新開展了新的土地兼併過程，而又需要以另一場農民戰爭來解決，這個循環不斷重複，形成了歷史上的「皇朝—農民戰爭循環」的現象。(註二十八)

其實，中共領導的土改運動，與歷史上開國皇朝初期或變法時期實施的限制土地過份集中、防止兼併的措施並無本質上的顯著分別，他們同是支持耕者有其田，維護土地私有制，不同的是，當土改後中國農村初步出現土地兼併現象時，中共便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共藉在建國初期的威望及推行社會改革的意識形態，趁富農的力量仍未壯大前便在農村推行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消滅地主經濟的基礎，並逐步通過合作化，消滅土地私有制，成功地將以土地私有作前提的「皇朝—農民戰爭循環」的傳統歷史規律結束。

通過上述的全國進軍、沒收官僚資本及土地改革運動，中共成功地摧毀國民黨的政權及支持其統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第四節 中共恢復國民經濟的措施

一 打擊投機資本，恢復正常的經濟生產秩序

上文指出共產黨新政權由於要開展交通、工業等重點建設，以至入不抵支，被迫要增發貨幣，導致物價上漲，物價的上漲又給予私人投機資本在市場上興波作浪的機會，他們乘國家困難，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抬高物價，追逐暴利，針對這個情況，中央政府遂推行了如下措施：

(1) 金融管理

在惡性通脹下，金銀外幣往往是市場物價波動之先驅。為此，中央政府於四九年分別在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地區先後頒佈了金銀和外幣管理辦法，禁止金銀外幣自由流通，嚴禁以金銀計價，並同時開展反對銀元、黃金、美鈔投機的鬥爭。當時中央政府在上海（中國的金融中心）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銀元投機，保障人民生活」的遊行和宣傳，政府還封閉了金銀外幣投機大本營「證券大樓」，並將操縱市場、破壞金融秩序的二百餘名「炒家」逮捕。對於市場上仍在流通的金銀外幣，

統一由中央銀行收兌，這就是解放初期有名的「銀元之戰」。（註二十九）

此外，國家對私營金融機構也加強了管理，取締經營高利貸的錢莊，實行工商業登記，嚴格管理市場交易和市場物價，更加強物資採購的管理，制止搶購等措施。上海於查封「證券大樓」的第二天，每塊銀元即從二千元人民幣掉至一千二百元，大米價格下跌百分之十。第三天，米價再下跌一成，食油價格下跌一成半。（註三十）

（2）控制主要商品

國家加強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及調運工作，迅速集中大量的物資，並通過拋售這些物資以打擊投機活動。陳雲曾經指出：國家掌握足夠數量的糧食和紗布，是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的主要手段，掌握糧食以穩定城市，掌握紗布以穩定農村，使投機資本家興風作浪的活動不能得逞。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列寧亦曾總結：

「如果我們能獲縱然是數量不多的商品，把這些商品掌握在國家手中……把這些商品投入周轉，那末作為國家的我們，就能夠除了政治權力之外再加上經濟權力。」

在幾次物價漲風中，國家均抓住時機，集中大量拋售物資，使物價下跌，嚴重打擊囤積居奇的投機資本。如一九四九年底上海漲風中，資本家的投機活動十分活躍，他們認為物價將由於貨品供應少而會大大上漲，而利息的增長亦將趕不上物價的升幅，因此，投機者皆舉債買貨以作囤積，而一般廠主寧可舉債以應付開支，也不肯賣貨。當時利息高至每借一元，月息二元，後來由於政府大舉拋售物資，物價開始下降，大大出乎資本家意料之外，於是他們便立刻拋貨還債，但愈拋則貨愈賤，愈不易脫手，急於舉新債以還舊債的情況愈多。不到半個月，許多投機資本家捉襟見肘，資金拮据，紛紛破產。通過這次反投機及穩定物價的策略，使投機資本家受到空前打擊，申新廠主榮毅仁事後曾指出：中共這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穩定物價，給上海工商界一個很大的教訓，因為在以往的投機風暴中，中共是用政治手段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

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始料不及的（註三十一）。上海商人大部分以為人民幣也會和國民黨發行的金圓券一樣暴跌，然而這次投機額愈大損失也愈多。而另一方面，根據陳雲「等到收縮銀根，物價平穩，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我們應乘機買進」（註三十二）的指示，國營貿易公司和其他國家金融機構，通過各種經濟手段有計劃地收購物資，奪得了穩定市場物價的主動權，並壯大了國家的經濟力量。

（3）加強市場管理

主要措施是公佈工商業登記辦法，未經登記核准者不准開業；嚴格管理市場交易，建立交易所，主要物資集中交易；運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場價格，保護國營牌價不受私營企業破壞，而成為市場領導價格；管理採購，把大量物資的採購置於國家監督之下；取締投機活動，對投機資本家予以法律制裁。

二 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改善國家財經狀況

反投機資本勝利後，市場物價出現了暫時性的穩定，然而，這種穩定並不是建立在財政收支平衡（筆者按：因當時通脹是由於國家財政赤字而被迫增發鈔票產生的）和市場供求平衡之上，因此，這種暫時的穩定局面仍然是危機重重。

中共也理解到不能單一依靠增發貨幣來解決財政赤字，所以便極力整理稅收，增加收入，並號召各政府部門厲行節約，增加生產。後方的部隊、機關、學校人員，也盡量進行生產，以自給一部份糧和蔬菜。毛澤東曾對解放軍表示要克服經濟困難，「首先是全國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逐步地恢復和發展生產，而人民解放軍則必須擔負一定的生產任務，方能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種困難。」（註三十三）然而，上述的措施仍未能大量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而生產自給的目標亦不可能立刻達到。因此，中央政府希望能發行一次公債，以彌補一部份赤字。雖然發行的公債得到工人的支持，然而工商界對購買公債的反應卻比較冷淡，他們明白發行公債後幣值及物價可以相對穩定，便於正常經營，然

而，大部分工商業者有兩怕：一是部分資金擋死於公債，不利他們經營周轉；二是由於把資金買公債，市場上資金供應少，以至銀根趨緊及物價大跌。也有些人怕像國民黨發公債那樣，有借無還。（註三十四）

一九五零年三月三日，政務院發佈〈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基本內容是：節約支出，整頓收入，統一全國的財政收支、物資調動及現金管理。

（1）統一全國財政開支

重點在使國家財政收入中主要部分統歸國庫，使國家能集中財政資源應付主要開支，以改變以往中央對各地區只統一支出，而不統一收入的做法。以往那種中央不能集中使用資金的管理辦法，使中央出現赤字，而不得不增發鈔票，加劇通貨膨脹。

新的做法要求以後凡是國家的各項收入，均需每日結算並交中央金庫。各地方政府假若沒有中央財政部的支撥命令，不得使用。所有物資倉庫，集中清理後皆須由中央統一據實況調度，而所有行政事業及經濟建設的費用，須以節約為前提，分輕重緩急以作重點的建設。

（2）統一全國的物資調度

主要是使國家所有的重要物資，如糧食、紗布、工業器材等，從過往分散管理的情況下集中起來，統一歸中央貿易部處理，使有限的物資能集中運用，通過國家的市場吞吐政策，以達到有計劃地調節國內供求、回籠貨幣及控制物價上漲之目的。

（3）統一全國之現金管理

把所有屬於政府但仍分散在各企業及其他機關的現金，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管理及集中調度，避免社會上通貨過多。此外又增加中央對現金的掌握。

以上三項工作，都同樣能達到集中使用資源的目的，這對於當時困難的經濟形勢起了積極的作用。雖然在統一管理的初期，由於間接減少

了地方的收入，使地方經濟出現困難，然而，陳雲卻指出：

「這種困難，比之因全國財經管理繼續不統一而致金融物價大亂所產生的困難，其程度要少得多，其後果要輕得多。我們必須忍受小困難，避免大困難，我們必須遵守這樣的原則：部分服從全體，地方服從中央。」(註三十五)

另外，為了貫徹節約支出、整頓收入、統一財政收支管理的原則，政務院又成立了兩個委員會。

第一個是「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這委員會以陳雲為主任，負責指導清查各地方政府、工商業單位及其他機關的倉庫存貨，要求各單位的負責人將有關存貨資料交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不得擅自運用。所有庫存物資，須經政務院統一調度，合理使用，以減少向外國訂貨及減低財政支出。

第二個為「全國編制委員會」，以薄一波為主任，主要責任是制訂並頒佈各級政府機關人員、馬匹、車輛及重要物資的編制，制止各機關不經批准便自行添招人員，假若各企業需增添人員，在經過一定程序的批准後，必先向全國編制委員會要求調配。這種措施可以避免各機關在招收人手時造成浪費，以控制國家支出。

為徹底打垮投機資本家的投機活動，並提供充分的物資供應，一九五零年間，中國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糧食調運，將東北餘糧調運到華北，並將另一部分的東北餘糧和中南、四川的餘糧調運到華東，使中央在全國範圍內掌握了充分的糧食、棉花、煤炭等民生必需品，打擊了投機資本家的擾亂活動。

三 協助私營工商業恢復生產，使其對中國的經濟發揮更積極之作用

(1) 私營工商業面臨經營上之困難

在金融物價穩定後，經濟出現蕭條，工廠減產，不少商店倒閉，隨

之而來便是城市工人大量失業，並導致勞資關係緊張。一九五零年五月份的產量與一月份比較：棉布減少百分之三十八，綢緞減少百分之四十七，卷煙減少百分之五十九，全國二十九個城市失業、半失業人數達一百六十六萬，僅上海的失業人數便有十萬人左右（註三十六）。據陳雲分析，出現上述情況是基於下列原因（註三十七）：

1. 通貨和物價的穩定，暴露了過去社會上虛假的購買力，過往人們為了避免在通脹時鈔票跌價的損失，故不願存放鈔票，而寧願競購和囤積各類商品。後來由於物價穩定，市民不但不再囤積貨品，反而將過去囤積的貨品拿到市場上出售，以致市場上一時供過於求，銷售情況不好，許多工商業者便陷入困境。
2. 過去適合於殖民地經濟而發展起來的若干工商業（主要是供應當時社會上層富有人士的奢侈品），由於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地主階級的消滅，使這類高價貨品失去市場。舉例來說，中國過去的地主約有一千多萬人，估計其中消費大而後來降低消費的至少有二百萬人。此外，新政府幹部的消費水平較國民黨時代的公務員低得多，上海市長陳毅每月能夠自由支配的款項僅為五十斤小米。官僚階級龐大消費力的消失，引起一部份工商業倒閉，從而引發工人失業的現象，需要救濟及轉業。
3. 許多私營企業機構臃腫，經營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潤少，甚至要虧本，這也引起許多工商業縮小規模，甚至停工歇店。
4. 當時不少行業內部盲目競爭，地方與地方之間供求不協調，引起許多企業減產、停工和倒閉。
5. 由於長期戰爭，以至人民購買力大為降低，工商業不景氣，企業面臨倒閉的危機。

（2）中國共產黨召開七屆三中全會，確定經濟發展方針

全國經濟開始穩定，但深層困難仍有不少，在這時候如何把群眾中不滿意共黨的人變成擁護共產黨，孤立和打擊最主要的敵人，鞏固新生

政權，是當時新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因此，五零年六月六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討論土地改革、財政經濟、外交、國內政治及黨組織等問題。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毛澤東並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面報告以及這個報告的說明——〈不要四面出擊〉。毛澤東指出在勝利的形勢下，中國仍面臨複雜的鬥爭和困難。新解放區尚未進行土地改革，新政權還不完全鞏固。革命勝利引起了經濟的某些調整，再加上共產黨成功地控制通脹以及其他原因，導致了工商業減產、企業停工和倒閉，失業人數增加。就當時國內的經濟情況，毛澤東概括地指出：「土地問題還沒有解決，工商業還沒有獲得合理的調整，失業現象還是嚴重地存在，社會秩序還沒有安定。」(註三十八)此外，針對上述困難，毛澤東明確指出建國頭三年的中心任務是：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恢復國民經濟。經過國民經濟的恢復，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條件，逐步實現黨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宏偉目標。

毛澤東認為：

「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註三十九)

共黨認為若不推行土改，農村生產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國的工業化就沒有實現的可能。

合理調整工商業，是為了解決物價穩定後商品滯銷、生產萎縮及工人失業等問題，國家根據統籌兼顧等原則，對私營工商業進行加工訂貨(即政府向私營工廠訂貨)及統購包銷(幫助私營工廠賣貨)，幫助他們繼續生產，並把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此外，中央更對私營工商業在經營範圍、原料供應、銷售市場及金融政策等方面作出支援。

此外，在新政府成立時，國家機關經費龐大，構成國家財政的困

難，假若能節減國家機關所需費用，對於財政收支平衡及物價的穩定有很大的意義。

為了實現上述三個條件，毛澤東在報告中具體提出八項任務，分別為：(註四十)

1. 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
2. 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領導，節省開支，以達到財政平衡及物價穩定。調整稅收和合理地調整現有的工商業，使各種社會經濟成份能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3. 在鞏固國防、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提高國家機關工作效率的條件下，整編行政系統，復員一部份軍隊；
4. 有步驟地謹慎進行舊文化教育事業的改革，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
5. 進行對失業工人、失業知識分子和災民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
6. 團結各界民主人士，開好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7. 清除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8. 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加強黨和市民的聯繫，並進行全黨的整風行動。

毛澤東在〈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中，分析國內各階級的動態，闡明共產黨應團結大多數人，集中力量打擊主要敵人的戰略方針。毛澤東指出：

「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第一，帝國主義反對我們；第二，台灣、西藏的反動派反對我們；第三，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反對我們；第四，地主階級反對我們；第五，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以及我們接收的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這場鬥爭是很激烈的，是歷史上沒有過的。」(註四十一)

因此，毛澤東批評一些過「左」的工作方法，並鼓勵團結各方面力量，反對提早消滅私營工商業，以免與民族資本家的關係緊張。

他指出：

「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一來，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註四十二)

(3) 調整私營工商業，繁榮城鄉經濟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三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調整工商業的問題，他指出今後幾個月內財政工作的重點，應放在調整公營企業與私管企業的相互關係方面。陳雲亦指出應注意統籌兼顧，既要照顧政府一邊，但也要為資本家著想，否則資本家的企業就會垮台，職工失了業也會埋怨共產黨。周恩來針對企圖擠垮私營工業的幹部，並指出：

「要把私營經濟由大化小，……不符合我們的政策。大的企業，你一擠，會跑到香港，小的，你一擠，就變成了一大批失業軍。」「這算甚麼繁榮經濟呢？」這樣「不反給我們找下了麻煩？就是從稅收觀點出發，也是不應該擠垮的，擠垮了，稅收也沒有了。殺雞取蛋總不是辦法，所以擠是不對的。無論大的或小的企業，今天社會都需要它。」(註四十三)

陳雲也說：

「一九五零年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只有兩個重點，一是統一，二是調整。六月以前是統一財經管理，物價穩定了，奪取了市場領導權，但東西賣不出去了，六月以後調整工商業，才使市場活躍起來，經濟形勢轉好，只此兩事，天下大定。」(註四十四)

由於當時私營企業仍佔國民經濟很大的比例，因此如只計劃公營企

業而不把眾多私營企業的生產計劃在內，整個國家的經濟計劃考慮將無法進行。

調整工商業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廣，但基本來說，主要包括了下列三個環節：

1. 調整公私關係

主要是調整公私工商業關係和調整負擔。建國初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佔有重要的地位，並對經濟發生積極貢獻，然而，共產黨卻恐怕任由資本主義自由的發展，將會出現無計劃狀態，私營企業的生產不能符合整體社會的需要。

故此，對於私營工業，國家乃通過加工、訂貨、包銷、統購等方式，把它們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把全國軍隊和政府方面的訂單集中起來，然後分配到各個私營企業，以組織私營工廠的生產和銷售，把它們的生產計劃納入整個國家的經濟計劃內。私營工業接受政府的加工訂貨任務後，其加工費和貨價皆由國家規定，由於國家控制了商業的批發環節，私營企業也間接地被政府控制著。

就調整私營商業關係中，國家強調價格政策及營業範圍上的放寬。在價格方面，容許批發和零售的差價作適當調整，並調整產區與銷區之間、原料與成品之間的差價，使私商能多賺利潤；在營業範圍上，當時政府沒有足夠的倉庫和公營貿易機構經營貨品的收購、分銷等工作，因此國營零售商業緊縮了規模，把經營的品種由過去的幾十種減為六種日用必需品，這樣便給予私營商業擴大經營範圍的機會。

調整公私關係的另一方面是減輕市民負擔。建國初期，為解決工商業不景氣及失業等問題，中央決定減低稅賦以刺激生產，而待生產逐步恢復後，稅收面自然會擴闊，國家收入亦將增加，此外，在戰爭後稍為安定的局勢下，以減稅方法予民休息，減輕其負擔，亦是爭取市民支持新政權的良好方法。

在農業稅方面，由原來佔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七減到百分之十三。工商業稅方面，貨物稅由千多種減為三百五十八種。(註四十五)此

外，以往只顧一些小稅目，反而忽略了一些較大的稅收項目，減少稅目及簡化稅收手續可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2. 調整勞資關係

中央政府處理勞資糾紛所採取的原則，包括如下三點：

- i 在私營企業中須確認工人的民主權利，資本家不能像過去那樣壓迫工人；
- ii 只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工人也不要對資本家提出過高的要求；
- iii 勞資糾紛採取協商方法解決，協商不成再由政府仲裁。於是，許多私營企業紛紛建立起勞資協商會議，由勞資雙方直接見面以解決彼此之糾紛。

3. 調整產銷關係

中央政府按照以產定銷的原則，具體指導各行業的產銷計劃，使社會的產銷逐步出現平衡，克服生產中的無計劃狀態，並使私營企業走上為計劃生產的軌道。五零年六月至九月，中央政府各財經部門先後召開了糧食加工、食鹽運銷、進出口貿易等會議，並按以產定銷原則，擬定各行業的生產計劃。此外，為擴大國內市場，各地區皆舉行物資交流大會，簽訂了上萬個成交合同。上述工作大大改善了因多年戰爭和通脹而造成的城鄉交流停滯狀態，使農民多餘之農產品得到銷路，而城市工業品也得以向農民銷售，加速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

經過工商業的調整，經濟狀況出現好轉，工業生產迅速發展，這段時間為私營工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一九五一年與五零年相比，全國私營工業戶數增長了百分之十一，職工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十一點四，生產總額亦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九。

四 進行重點建設及開展救災之工作

(1) 進行重點建設

正當中國工商業及生產有了起色的時候，中共在衡量國際形勢下參

與抗美援朝戰爭。參戰對國內的經濟建設帶來很大的影響，使很多本來可以用於生產建設的資金被調到戰爭方面去，陳雲曾指出：「戰爭第一，這是無疑問的，一切服從戰爭，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沒有戰爭的勝利，其他就無從說起。」（註四十六）因此，政府提出了國防第一、穩定物價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針。其後，隨著戰爭的緩和，中央加強了工業、農業及交通方面的生產建設，從一九五零年至五二年三年內，國家共聚集了用於基本建設的資金六十六億元，佔財政收入的十七點三。

這幾年經濟建設的重點，主要是水利、鐵路交通及原材料工業。貧困的中國要恢復生產，首先需要恢復農業，要增加農業生產，就必須做好防止水旱災害的工作。一九五零年，全國被水淹了五千萬畝到七千萬畝田地，加上各地方的其他天災，國家在每年的預算中都要列出一筆救災費用。防治水旱災害，是恢復農業發展的迫切要求，但只有發展農業生產，增加原料供應，工業的恢復和發展才有基礎去做這些工作。因此，在三年內國家對水利工程的投資達八億二千五百萬元，佔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十點五。此外，政府還組織二千萬人直接投入水利工程建設，並對全國四萬二千餘公里堤防進行維修。

其次，生產的恢復和經濟的繁榮極須倚靠交通，故此恢復交通運輸，尤其是鐵路，也就成了建設的重點。鐵路通車里程於一九五二年已達二萬四千五百一十八公里，比歷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點六。除了舊有鐵路得到恢復外，國家更建造了來陸、成渝及天蘭等三條新鐵路，促進了西南和西北地區的物資交流。

第三，要恢復生產還需解決動力和原材料問題，所以電力、煤炭和鋼鐵工業的建設也受到重視，而重工業建設項目的選址成為中央財經負責人注視焦點，重要項目的選址通常是在一些已有鞏固工業基礎的地方。陳雲在討論到遷移工廠問題時曾指出：

「例如，從原料的供應來說，紡織廠可以搬到棉花產地，但工廠生產需要有適當的廠房，還需有電力、機械等有關的企業與之相配合，這些條件棉花產地也就不一定具備。估計上海工業的主要部份不能搬，目前

應力爭維持生產。」(註四十七)

由於東北有較為深厚的工業基礎，故很多重點建設都於東北進行，「東北跟關內有很大的不同，東北工廠有了，機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資金，生產就恢復了，關內就不是這樣，開一個工廠需要相當時間，一般說，從開始訂機器到安裝好機器，沒有三五年的時間是不行的。」(註四十八)此外，陳雲還列舉一些有關建設的例子，來說明選擇廠址的重要性：

「我們在太行山區修過鐵路，事先沒有勘察設計好，從兩頭修起，修到中間碰上一座大山，過不去，後來又拆掉了。有的地方開煤礦，上邊的房子、機器都弄好了，但後發現煤層很薄，只好停止開採。再如開運河，運河挖好後，放水的時候，中間的一個地方是沙底子，水漏掉了。」「搞基本建設，事前一定要設計。一般的工廠設計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這個地方的地層怎麼樣，水夠不夠，水的化學成分對鍋爐有什麼損害，等等。」(註五十)

故此，東北的經濟建設便先走一步，關內則先集中力量搶修鐵路，建設電站，勘察資源，為以後經濟建設的工作準備條件。

在四九年至五二年中國恢復經濟的三年中，在恢復性建設與新建項目的投資分配上，重點為恢復性的建設。這三年用於恢復性建設的投資佔工業建設的投資總額高達百分之八十三，用於新建設的只佔其餘的百分之十七，(註四十九)直至一九五三年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國才重點進行大規模的新項目建設。

(2) 開展救濟失業工人的工作

1. 建國時期出現失業的原因

- i 由於連年戰禍，中國經濟遭受重大破壞，農村破產，工業也受嚴重摧殘，因而造成城市中廣大的失業群；
- ii 以往那些專供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及社會上流人士享樂的工商

- 行業，隨著政權的轉移而趨於沒落。農民購買力又因戰爭及災荒的影響，大為降低，社會消費能力的驟減引起需求不足，生產萎縮，工廠倒閉；
- iii 政府的經濟政策使物價趨向穩定，但也由於消除了過往虛假的購買力，帶來市場停滯和工商業疲弱，甚至關廠倒閉的現象。

2. 政府的回應

基於上述原因，政務院於五零年六月十七日頒佈〈關於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決定：

- i 摸出四億斤糧食作為救濟失業工人的基金；
- ii 凡舉辦救濟失業工人事業的地區，所有國營、私營的工商企業行政人員，以及所有在業工人和職員，均按月繳納一定的失業救濟金；基於上述兩項撥款及各界自願捐助的救濟金，中央成立失業救濟基金；
- iii 救濟方法，應以工代賬為主，首先為國家需建設的工程及市政建設的事業如修堤、植樹、修理碼頭等工作，以生產自救、轉業訓練、還鄉生產、發給救濟金等為補助辦法，以求達到救濟金的使用能減輕失業工人的生活困難，又有益於市政建設的事業；
- iv 在目前失業現象最嚴重的上海、南京、武漢、重慶、廣州五市組織救濟失業工人委員會和失業工人救濟處，向中央政府申請失業救濟金；各企業在擴大經營範圍及創立新工廠企業時，應優先錄用本企業原來解僱的工人和職員。

由於生產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就業人數也逐年增加。全國職工人數一九五二年達到一千五百八十八萬四千人，比四九年的八百萬人增加了近一倍，而失業的現象也逐漸消失。

總括來說，經過打擊投機資本、平抑通脹、統一中央財政、調整私營工商業、開展重點建及救濟失業等經濟措施後，中共已成功扭轉陷於破產邊緣的經濟形勢，使建國後的經濟發展逐漸走向穩定蓬勃的道路。

註 釋

- 註一 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15頁
- 註二 孫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稿》(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零年，第59頁
- 註三 同上註，第51至52頁
- 註四 王學啟等《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27頁
- 註五 陳雲〈目前財經工作中應注意的問題〉載《陳雲文選》(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15頁
- 註六 同上註，第17頁
- 註七 〈財經旬報二則〉載同註五，第57頁
- 註八 同上註，第58頁
- 註九 同註六
- 註十 陳雲〈工人階級要提高政治覺悟〉載，同註五，第22頁
- 註十一 同上
- 註十二 同註四，第19至21頁
- 註十三 同上註，第25頁
- 註十四 同上
- 註十五 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32-33頁
- 註十六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975頁
- 註十七 王亞南《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3頁
- 註十八 同註一，第18頁
- 註十九 同註十五，第29-47頁
- 註二十 周鯨文《風暴十年》，時代批評社，一九五九年，第171頁
- 註二十一 C K Yang,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pp.194.
- 註二十二 同註二，第71頁

- 註二十三 薛暮橋等《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57頁
- 註二十四 同上註，第58頁
- 註二十五 《漢書食貨志》(上)(五)，第1137頁
- 註二十六 陸贊《陸宣公翰苑集》奏議六
- 註二十七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第15頁
- 註二十八 魯凡之《論中國—神州巨變》，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77頁
- 註二十九 范守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恢復史》(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求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29頁
- 註三十一 同註二，第54頁
- 註三十二 陳雲〈上海工商界情況〉載同註五，第52頁
- 註三十三 陳雲〈制止物價猛漲〉載同註五，第31頁
- 註三十四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2頁
- 註三十五 陳雲〈為甚麼要統一財政經濟工作〉載同註五，第74頁
- 註三十六 同註四第，42頁
- 註三十七 陳雲〈關於目前經濟戰線上的一般形勢〉載同註五，第101頁
- 註三十八 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載同註一，第18頁
- 註三十九 同上
- 註四十 同註三十八，第18至20頁
- 註四十一 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載同註三十八，第21至22頁
- 註四十二 同上註，第24頁
- 註四十三 周恩來〈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作用的幾個問題〉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68-170頁
- 註四十四 陳雲〈一九五一年財政工作要點〉見《陳雲文稿選編》(一九四九—一九五六)，人民出版，一九八二年，第125頁
- 註四十五 同註四，第48頁
- 註四十六 陳雲〈抗美援朝開始後財經工作的方針〉載同註五，第112頁

註四十七 陳雲〈克服財政經濟的嚴重困難〉載同註五，第2頁

註四十八 陳雲〈調整公私關係和整頓稅收〉載同註五，第98頁

註四十九 陳雲〈一九五一年財經工作要點〉載《陳雲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31-132頁

註五十 陳國權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簡史》，中國物資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36頁

第三章 建國初期的重大政治運動

導 言

中共建國後，共產黨在進行軍事及經濟建設的同時，政治上亦開展了幾個廣泛牽涉群眾參與的大運動，包括鎮壓反革命運動、工廠企業民主改革運動、整頓共產黨、增產節約運動及三反五反運動等。雖然個別的運動有其自身特定之目的，但整體來說，這些政治運動的主要任務是要鎮壓國民黨於大陸的殘餘分子及其支持者、整頓共產黨內部的紀律、反對浪費鋪張及開展對私營資本主義企業進行整頓及控制等。

第一節 鎮壓反革命運動

一 鎮反運動初期的發展

鎮壓舊政權的支持者，是鞏固新生政權的一項必要措施。早在建國前，毛澤東便明確指出：「現時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是指軍隊、警察和人民法庭，以向著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國民黨政府及其支持者，實行專政獨裁，只許他們規規矩矩而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亂說亂動，則立刻取締並予以制裁。」(註一)〈共同綱領〉中也明確規定：「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反革命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註二)

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關於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中指出：國內反革命分子是十分猖獗的，對於這些反革命活動，各地必須給以嚴厲的及時鎮壓，決不能容其猖獗。六月六日，毛澤東分析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情況，規定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在一九五零年十月以前的大半年，全國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較寬鬆，出現了「右傾」偏向，公安部長羅瑞卿就曾指出：

「由於進行得不夠堅決和不夠徹底，特別是沒有發動群眾，因而就沒有擊中反革命的要害，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被放過去了，再加上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在我們的廣大幹部中產生了麻痺思想，對於反革命的復辟陰謀放鬆了自己的警惕性，在若干地區，對於我們對待反革命應當採取的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作了錯誤的片面了解，以致發生了寬大無邊的偏向，這實際上等於放縱甚至鼓勵了反革命的破壞活動，這也成為解放初期將近大半年時期內反革命能夠猖獗一時的重要原因。」（註三）

五零年十月，當朝鮮戰火漫延到中國邊境，中國決定派軍隊支援北韓，基於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於十月十日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批評前階段黨對鎮反問題的右傾傾向，並責令各地須按鎮壓與寬大相結合之方針，對一切反革命分子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該管的管，並規定各級黨委限期向中央作鎮反的專題報告。十月中旬，根據共產黨的指示，公安部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會議根據黨中央的文件，對鎮反工作進行具體部署，糾正了「右傾」偏向，積極推行鎮反運動。

二 從寬大政策轉變到嚴厲鎮壓的主要原因——韓戰爆發

鎮反運動初期，中共實有其客觀原因推行較寬鬆政策，這主要是共產黨在長期反國民黨的鬥爭中，推行了適當的社會改革，得到人民廣泛的支持，相反，社會上各階層人士皆對國民黨的統治完全失卻信心。故此，共黨在短時間內便得到全國軍事上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多原本支持國民黨的大資本家皆挾資外逃，更甚者，一些財雄勢大的資本家如孔祥熙及宋子文家族，甚至捨棄台灣國民黨政權而往美國定居。農村方面，中共由於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地主、鄉紳及族權的統治已為共黨控制的農民協會替代，而中國的第三勢力（筆者按：即民主黨派）之實力又十分薄弱，再加上共產黨於建國後推行一連串頗為成功的經濟及社會改革政策，已令到國民黨統治基礎（筆者按：官僚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完全崩潰，所以在客觀上根本無必要推行過嚴的鎮反政策。

令共黨領導人感到憂慮的，是西方國家為了避免革命運動蔓延，往往不借以戰爭干涉，謀求推翻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而這種武裝干涉往往又與被推翻的國民黨裡應外合，以求復辟。鑑於過往的歷史經驗，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政權，由於受外國干預，差不多被推翻，增強了中共領導人的警惕和危機感。

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爆發，十月初美軍逼近北韓首都平壤，戰火一直蔓延至中國邊境鴨綠江，美國軍機更入侵中國東北，濫施轟炸。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把第七艦隊開進屬於中國的台灣海峽，並相繼建立了針對中共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澳新美安全條約，隨後又與日本簽訂〈美日安全條約〉，又在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等地駐軍或設立軍事基地，其目的在於重重包圍中國，而台灣國民黨亦積極游說美國，希望美軍支持他們反攻大陸。

在國內，國民黨政權支持者認為第三次大戰即將爆發，反攻大陸的時機已到，因此乃積極活動，如炸毀工礦企業、破壞鐵路交通、燒毀倉庫、搶劫物資及刺殺幹部等。在農村中，地主紛紛對土地改革運動作出抗拒，令農村中的暴力鬥爭增加。一九五零年國慶前，中共揭發美國間諜策劃炮轟天安門檢閱台事件，美國間諜李安東、山口隆一等在美國戰略情報局、東京美國佔領軍總部等策劃和指揮下，繪製天安門形勢圖，並準備在十月一日國慶典禮時，用「六零」迫擊炮炮轟天安門檢閱台，殺害中央領導人（註四），但這行動於九月下旬被公安機關粉碎。

三 鎮壓反革命運動大規模展開

為更嚴厲的推行鎮反運動，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一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批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全文共二十一條，其中有關定刑的十一條條文，除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收買武裝部隊進行叛變、參加間諜組織外，其他如受國內外敵人指使擾亂市場或破壞金融、煽動群眾抗拒政府徵糧及進行反革命宣傳等，都可被判處死刑。自從頒佈此條例後，大規模的捕殺行動便開始了，從五一年二月直到五月，共逮捕反革命分子一百五十萬人，而被處決者多達五十萬人（註五）。反政府

分子紛紛自首，向政府認罪。

一九五一年公安部召開第三次公安會議，公安部長羅瑞卿在會上作出報告，會議並透過七個月來的鎮反經驗，確定了後來的方針，更通過由毛澤東親自修改過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鑒於當時有些地區開始發生「左」的傾向及草率定案現象，是次會議決定採取謹慎收縮的方針。決議的要點如下：

- (1) 決定今後鎮反工作應採用謹慎、收縮的方針；
- (2) 必須嚴格審查殺人名單。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
- (3) 從五一年六月至九月的四個月內，全國一律停止捕人；
- (4) 凡介乎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凡介乎可殺可不殺的人一定不要殺；
- (5) 從六月一日起，全國一切地方將捕人的批准權一律收回至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準權一律收回至省一級，離省遠者由省級派代表前往處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變此項決定。

在第三次公安會議後，政府便針對一些尚未全力推行鎮反及尚未發動群眾的地方，繼續大力推行鎮反運動，直到一九五二年底及五三年春才完成。

四 對鎮反的總結

推行鎮反運動，無疑鞏固了新政權的基礎，更促使抗美援朝戰爭有了穩固的國內支持，並促成了土改運動的徹底勝利。然而在另一方面，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造成很多過左及濫殺無辜的情況，導致全國陷入緊張恐怖的狀態。據有關資料顯示，鎮反運動共殺了「反革命分子」七十一萬人，關押了一百二十九萬人，管制了一百二十三萬人。(註六)而一九五三年中共「剿匪」作戰，共消滅敵對武裝二百四十萬人。(註七)故從五一年五月第三次公安會議有關糾正過左傾向的文件中可以反證，濫殺的情況非常普遍。

第二節 工礦企業內的鎮反與大規模改革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進入高潮後，全國的國營工、礦及交通企業內也開展了名為「民主改革」的運動，這運動可說是鎮反運動於工廠企業內的一個延伸。朝鮮戰爭爆發後，支持國民黨的分子紛紛於此等工礦企業內製造事端，對國家的經濟財產帶來一定之損失。此外，上述國營工礦企業在解放前多是由舊政府、大資本家及外國控制，企業內往往形成了壓迫及剝削工人的制度，如對工人的搜身制，以及「封建把頭」制度，工人想進廠工作，必須接受工頭的控制和剝削，工頭通過克扣工資及回扣等手法壓榨工人。

解放以後，為保障這些企業的生產照常進行，故中共對由一定舊勢力控制之原有生產機構，皆採用原封不動的接收政策，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然而，由於韓戰及鎮反運動的深入，政府亦開始對此等企業進行不同程度的鎮反及改革，以增強政府的控制。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即中共決定抗美援朝的後一個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廠礦交通等企業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指示分析了當時企業內部的情況，並規定運動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步驟，強調在推行運動的同時，應對維持生產的方針作出同樣的重視，其要點如下：

一 防止敵對分子對工礦企業的破壞

建議在運動開始之前，須先嚴密掌握工廠、礦山、交通等企業的要害部門，把一切有嫌疑的分子調開，並選派可信任的幹部去掌握。

二 保護技術人員、專家及高級職員

為維持生產的順利進行，故此對一些曾經壓迫過工人的專業人員予以保護，各級幹部更對要求鬥爭這批專業人員的工人進行說服工作，強調團結為主的原則，採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將專業人員與工人的矛盾當作工人階級內部的問題來解決。

三 避免影響生產

運動應利用不妨礙生產的間隙時間進行，在思想醞釀成熟和發動群眾之後，受批判者交代的時間不應拖得太長，以免影響生產。

四 總結經驗、慎重推行

指示指出在工廠、礦山及企業的鎮反和改革運動，必須更加穩步前進，用典型示範逐步推廣的方法，先由國營企業再到私營企業，先由主要的企業再到次要的企業。基於各地區發展有所不同，所以不應採取千篇一律的方法去處理問題，必須有適當的靈活性。

基於上述原則，全國國營工礦交通企業的改革分為三個步驟進行：

第一是鬥爭階段。初時，由於政府在企業中的力量較為薄弱，故此第一個步驟便是加強領導，由黨員對廠內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並訓練職工中的積極分子，以便建立領導的骨幹和群眾隊伍。在組織鞏固後，便發動群眾對工廠內的敵對分子進行逮捕；

第二為民主團結。為了維持生產，所以對一些曾壓迫工人或有輕微劣跡的職員及技術人員進行批評，並促其檢討錯誤及改變舊有的工作作風，整個基調都是強調批評與反省，改善內部關係，並增加領導與群眾、技術人員與工人以及工人與工人間之關係，加強團結；

第三為改善管理，破舊立新，廢除不合理的制度。首先是改革企業的領導機構，從以往派遣「軍事代表」進行監督的辦法，改為國家派遣領導人(如廠長、經理)直接管理企業的一切活動。同時，建立黨團組織，加強黨對企業的領導，並通過選舉，選出工廠管理委員、工會和治安委員會，以吸納更多工人參與工廠的管理事務。

總括來說，這個運動肅清了工人羣眾中的不穩勢力，將具有領導作用之異己分子清除，代之以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從而嚴密地控制著企業的運作。此外，運動亦達到了控制私營企業的客觀效果，以便將來能引發他們走上國有化的道路。

第三節 中國共產黨的整風與三反、五反運動

一 黨員違反黨政策的現象與原因

隨著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遂由一個反對黨變為執政黨，黨員的人數大大增加，但在執行共產黨政策的過程中，部分幹部卻做了不少違反黨政策和紀的和行動。據當時中共領導人朱德指出（註八），下面幾種情況比較突出：

（1）強迫命令，脫離群眾

很多黨員、幹部，特別是下級幹部，在進行徵糧、收稅、勸購公債及土改等各項工作中，往往為了完成任務而不擇手段，例如縱容壞份子隨便捕人，對吊打完全不聞不問。

（2）官僚主義作風滋長

有些黨員及幹部，不關心群眾痛苦，例如在救災時，有些地區的黨員幹部，沒有重視這個關係千百萬人生命的問題，以致在反映情況及佈置工作上都產生嚴重的錯誤，使人民痛苦加深。

此外，更有部分黨員，對國家財產漠不關心，令國家蒙受損失，如在興建鐵路、礦山時曾出現重大命案；工廠器材不斷地遭到破壞；許多倉庫被毀及霉爛等。據東北部分工礦地區的統計，四九至五零年三月期間，共發生二百五十三次較大宗的破壞事件，一百六十次盜竊國家資財事件。這些損失往往是由於幹部漠不關心，疏忽管理，以致破壞分子有機可乘。

（3）擺老資格，恃功挾賞的思想

部分黨員認為天下是他們打出來的，故以功臣自居，看不起黨外人士，看不起群眾，輕視黨組織和紀律，認為黨紀律祇是給一般黨員遵守，自己可以例外，更有些輕視政府和法律，認為政府無權管自己這個老黨員，而法律也是給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

(4) 貪污腐化增多

據北京市黨委報告，在四九至五零的一年中，黨員幹部違反政策和法律者共一百八十二人，其中違反黨的政策者九十人，貪污腐化者八十八人，其他四人。他們違法的具體行為有：盜賣國家公財、假公濟私、貪污舞弊、借政府名義向商店募捐敲詐、私自調解糾紛是時受賄、包庇特務、招搖撞騙、嫖妓甚至強姦婦女。濟南市在四八年一月至四九年一月，黨員幹部因犯黨紀而受處分者五十八人，其中屬右傾、享樂、腐化等案件佔四分三。從上述兩個例子，可見黨員自從由農村進入城市後，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發展了享樂思想，貪污腐化。

產生以上問題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革命勝利，容易使黨員產生政治麻痺、思想鬆懈及驕傲自大等思想，另一方面是周圍環境的影響，如與其他階級合作，與留用人員共事及被城市的生活引誘。(註九)此外，四九年是黨組織發展最大的一年，中共增加了一百四十多萬新黨員，其中有些人思想作風不純，而某些地區對接收新黨員的工作，沒有實行嚴格控制和認真審查，又沒對他們進行有計劃的教育及訓練，以致產生嚴重的後果。

二 整風及整黨工作的推行

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分析黨的思想及組織狀況，強調開展整風運動的重要性，並規定了整風的方式和步驟。指示指出：各級黨委必須「在中央的總領導下，領導全黨全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行動，嚴格地整頓全黨作風。」

整風的重點，放在各級領導幹部的身上，要求他們自行檢討及自我批評。整風的過程一般是先進行整風動員，使幹部明確知道整風的意義，接著便是學習指定文件，領會文件的精神，然後進行檢查工作和個人的反省，檢查他們思想作風中的主要偏向，找出工作中的重要問題，這是整風中最主要的階段。最後更進行整風總結，研究改進工作及作風的方法。這次整風，經歷了半年的時間，於一九五零年冬結束。

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中旬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中央作了關於整黨和建黨的指示，並強調在整黨時，須將「第四部分人」——即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叛變分子、投機分子及蛻化變質分子清洗出去。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劉少奇在會上作了報告，指出很多黨員不夠標準的原因，是由於黨的高級領導機關過去對於接收黨員的工作沒有實行嚴格的控制與檢查，因而使過去接收黨員的工作在某些地方、某些程度上陷於一種自以為的放任狀態。劉認為應把一些不夠條件任黨員的壞分子清除出黨，如不是壞分子，也應為他們作出適當的結論，具體指出他們在那些方面不夠條件，並請他們自行退黨。會議最後通過〈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和〈關於發展新黨員的決議〉，大規模的整黨行動便逐步展開了。

五一年的整黨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要黨員學習文件，提高思想覺悟；第二階段是登記、審查和處理，黨組織對每個黨員的歷史和表現，全部審查清楚，然後對他們作出結論和處理，這主要是改造那些不完全具備黨員條件的黨員，並清除黨內的異己分子。整頓的重點放在老區（筆者按：即四九前共產黨已成功取得控制的地區）和新發展黨組織的地區，特別是那些接收黨員過多的地區；第三階段是由黨的基層組織召開支部大會，總結工作及改選支部。

整黨運動開展不久，三反、五反運動也開始了。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三反」運動應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的指示〉，要求黨組織在三反運動的基礎上，進行黨員登記、審查和處理，對所屬幹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清除貪污腐化份子，並撤換一批有嚴重官僚主義、居功自傲、不求上進及毫不稱職的分子的職務，並大膽提升一些新的優秀黨員到領導崗位中。是次整風運動，到一九五四年結束。

在整黨運動中較為重大的事件是中共河北省委開除了原天津地方委員會書記劉青山及專署專員張子善的黨籍。據中共發佈的資料指出，劉青山及張子善為貪圖個人享受，不管人民疾苦，盜竊機場建築款、救災款、治河款、幹部家屬救濟糧及地方糧，又克扣民工工資，騙取銀行貸款共達一百七十多億元（舊人民幣）（註十），並藉口機關生產名義，進行

違法經營，交送四十幾億巨款給投機商張文義倒賣鋼鐵木材，使國家損失達十四億元。此外，他們更過著極其腐化的生活，如劉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癮。據他們的自供，劉、張二人開支及送禮花費竟達三億多元，為消滅貪污罪證，張子善曾親手一次焚毀單據三百七十八張。

為了針對曾批評他們的黨員，劉張等更極力製造一個唯我獨尊和揮霍有道的氣氛。劉青山曾說：「老子們拚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麼樣。」「老子們打天下，小子們來享受。」張子善說天律的地方委員會內只能有「一個頭」、「一個領袖」，其支持者在共產黨建黨紀念會上高呼「向我們英明的領袖張專員致敬」，「在英明領袖張專員領導下前進」。張子善則對人說：「應向這位同志學習」(註十一)。其次，他們在組織上抑壓民主，對一些曾批評過他們的黨員進行打擊及排斥，並結納黨羽，造成一個宗派集團。在整風整黨運動中，劉、張二人的行為被揭發，並於五一年底被開除出共產黨(註十二)。一九五二年二月，河北省人民法院召開公審大會，判劉張二人死罪，並立即執行。

在整黨運動的同時，各級黨委根據黨中央指示，進行建黨工作，發展黨員和建立黨組織。直至五三年六月，共有三十二萬八千人離黨，其中有二十三萬八千人是被清除出黨的，有九萬人是經過教育後而被勸告退黨。同時，全國，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止，黨組織共接收一百零七萬名新黨員，建立了八萬二千個新的黨支部，而在新的黨員中，產業工人、貧農和手工業工人佔了大多數。

三 三反、五反運動與共產黨的整風

(1) 三反、五反運動的宏觀背景

在前文曾經分析過，中共為了穩定經濟局面，維持生產，利用資本家的資金、管理技術及專業才能，故推行較為實際及適合戰後動盪局面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的經營與發展。然而，共產黨始終希望實現其消滅私人經濟、實行公有制及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理想，所以當政治及經濟局面較為穩定時，共產黨便希望能盡快與堅持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本家決裂，消滅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發展建立穩固的基礎。

三反運動的出現，主要是由於共產黨內出現了嚴重的貪污、浪費等現象，同時中共希望能透過此運動清洗一些有嚴重官僚傾向及蛻化的老黨員，以及一些在建國前未經嚴格審查而慄粹被批准入黨的新黨員及一些仍然在政府任職的舊國民黨政府時代的官員。而在審查這批人士的過程中，發覺他們的行動與資本家有密切的關係，故此，整黨及三反運動便迅速引發出五反運動，而以打擊資本家的行動為終結。

在一九五二年初，毛澤東曾明確地指出推行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的原因：

「進城時，大家對資產階級都很警惕，一直到今天，大家對資產階級不夠警惕了。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訂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一定地位，因而盛氣凌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如果不把資產階級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現在出現了一種很嚴重的情況，一部分，人家打進來；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要整黨內那些買房置地、入股、當董事經理的人；同時也要搞不法的資本家。這是一場惡戰。」（大略）（註十三）

（2）增產節約運動及三反運動的展開

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並通過「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的方針，節省財政開支，以應付抗美援朝戰爭，經濟建設與推行工業化任務的龐大支出，自此，增產節約運動便在全國發展起來。隨著運動的開展，中央發現了很多貪污、浪費及官僚主義的問題。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及反對官僚主義的決議〉，把貪污、浪費看成是增產節約的大敵，決定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作為貫徹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的重大措施，並要求採取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

法，以檢查貪污現象。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毛澤東在元旦團拜會上號召人民「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乾淨！」(註十四) 五二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單位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鬥爭，於是從五一年底，三反運動便在全國廣泛地展開。

當運動進行一個月，已發覺在政府系統二十七個單位中的貪污人數有一千六百七十餘人，例如中央公安部行政處處長宋德貴利用假條子的方法，貪污七億元；副處長劉玉澤受賄一億四千餘萬元，中央鐵道部衛生局副局長蔓焰與人合伙私買鴉片、私造嗎啡一百斤；而中國蓄產公司業務處副處長薛昆山，亦被控貪污盜竊國家財產折合現人民幣達二十三萬元。(註十五) 這批貪污犯皆被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極刑。

浪費的現象比貪污情況更多，軍委後勤和鐵路系統於五一年，因對油槽車處理不當，先後損失五千噸氣油，另有二千噸氣油，因技術人員缺乏知識，馬虎了事，以致把不同的油類混淆，使其完全失效。另外，政府共投資四千餘億元在中央紡織工業部所屬的紡織機器廠，但由於設計不周，施工不善，在工程尚未完成時，該廠房二百八十九根柱子中已有二百八十根不平衡地下沉。(註十六)

有關當時的情況，負責推行三反運動的薄一波指出：

「貪污、浪費和違反財政紀律現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和官僚作風分不開的。有些領導同志，沾染了官僚作風，整天高高在上，對實際工作既不了解，亦不研究，這種作風，無疑是貪污浪費最有利的條件。另外一些同志，終日忙忙碌碌，但是把精力消耗於次要的枝節問題上，而不能掌握問題的本質。例如中央貿易部於五一年向蘇聯訂購治口蹄疫的藥品『三』噸，由於擬稿者的錯誤，誤寫為『三百』噸，各級審稿、核稿、批准的負責幹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簽名蓋章，結果多買了二百九十七噸。又如天蘭鐵路某一段的定線設計，設計工程師設計了十三條線路，爭執了一年之久，沒有結果，延誤工期，不能及時施工，以致帶來一定的經濟損失。」(註十七)

總的來說，三反運動大致分為如下三個步驟進行：首先是發動群眾和打擊大貪污犯的階段；其次是處理及核實定案階段。三月十一日，政務院發佈〈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接著又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根據上述條文所規定的「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罰相結合」、「多數從寬，少數從嚴；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方針，對犯有不同程度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錯誤行為的人員，分別作出不同的處理；第三是建設階段。要求有問題黨員交待與資產階級的關係，並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結合「三反運動」進行整黨，搞好組織和制度建設，並確立編制，精簡機構及提高工作效率。

（3）五反運動

1. 資本家被批判的不法行為

隨著三反運動的開展，中共發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貪污行為，多數是和社會上的資本家配合起來進行的，因此要徹底清除三害，就必須同時在工商界中開展五反運動。所謂五反運動，就是反對資本家的「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據史學工作者王學啟等指出（註十八），偷稅漏稅是資本家普遍的違法行為，不法資本家偷漏營業稅和所得稅，偽造假帳、單據、證件，少記收入多記開支。例如，天津市在一千八百零七家納稅戶中，有偷漏稅行為的佔百分之八十二；上海市在三百五十一家納稅戶中，有偷漏稅行為的佔百分之九十九。偷漏的稅額十分巨大，佔一般應負稅款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甚至達百分之八十。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財產是不法資本家取得暴利的主要方法，他們互相秘密串連、相互合作，以提高成本、價格來迫使國營企業接受他們建議的加工訂貨任務與價格。此外，在承受國家機關、國營企業的加工訂貨時，採取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粗製濫造等不法手段。他們有些活動更是令人髮指，例如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部分資本家用一穿就斷底的膠鞋、用壞牛肉做成的罐頭、用發霉麵粉做

成的餅乾及甚至用屍體上和垃圾堆拾取的棉花，做成含有大量病菌的「急救包」，以高價賣給解放軍。而行賄則是不法資本家進行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騙國家財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手段，他們配合國家機關內部某些工作人員，利用金錢和享受以腐蝕國家機關的幹部，投其所好，送回佣、分紅利，由小到大，由淺入深，逐步把幹部拉下水，與其合作以牟取不法利益。

2. 五反運動的開展與劃分五種類型的資本家

五反運動原是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在政協常委會談話中號召而開始的，到三月進入高潮。這運動的過程是由共產黨員搜集材料，對私人工商業分類以發現問題及確定重點，並抽調大批有鬥爭經驗的工人、店員及國家幹部加以訓練，組成「五反工作隊」，他們有計劃地開進私營工廠商店，並依靠工人階級，以普通工人及店員為骨幹而開展對資本家的鬥爭。從三月開始，五反運動便逐步轉入了定案處理的階段。三月五日，毛澤東發出指示，規定處理違法工商戶的五條基本原則及具體劃分了商戶的五種類型。五條原則分別是：「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此外，政務院並根據資本家違法行為的輕重大小，違法性質的惡劣程度及違反戶在五反運動中是採取坦白悔改或拒不坦白怙惡不悛的態度，把工商戶分別劃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等五種類型。

在當時工商戶總數中，守法戶佔百分之五，基本守法戶佔百分之六十，半守法戶與半違法戶佔百分之三十，嚴重違法戶與完全違法戶佔百分之五。除守法戶外，對基本守法戶，一般來說不須他們退回非法所得，但少數情節嚴重，則須退還部分款項；對半守法半違法戶，只補退不罰款；對嚴重違法戶，除退出違反所得外，並須罰款；對完全違法戶，予以法辦，除命令其退出違法所得外，按其情節以處理罰款及刑罰，甚至判處死刑。

3. 過激行動的影響與中央的補救

五反運動對私營工商業之影響甚大，因為完全守法戶只有百分之五，故有問題的工商業佔了百分之九十五。此外，由於五反運動與整黨及三反運動同時進行，有些共產黨員為了表示和資產階級劃清界線，往往採取「寧左勿右」的態度，例如和資本家新簽訂的加工訂貨合同中，把貨價定得過低，使私營工廠不能獲得合理利潤，甚至不能抵償成本支出，在驗收貨物時又挑剔過嚴，挑出過多次貨等現象。資本家由於所得減少而又須補退與罰款，故往往出現資金不足及週轉不靈的現象。在這環境下，資本家被迫向銀行貸款，然而卻由於對資金需求過多而趨使利息上揚，導致資本家百上加千。

五反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一樣，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各地普遍出現採用土改中鬥爭地主階級的方式對待資本家，打虎隊、戰鬥隊、火線隊等一類組織，紛紛出現，對資本家採取逼、供、信等手段。差不多所有工商業者在商店或工廠裡，都遭受店員和工人的挑戰。此外，中共更規定在五反運動過程中資本家一律不許離開原住地，亦不允許停工或解僱工人。當時中共內的一些黨員，想藉五反運動消滅私人資本，實行社會主義，有些幹部「在基層單位，不管甚麼違法不違法，一齊反。」(註十九)

當時國內的氣氛十分緊張，薄一波曾回憶上海的情況：

「火力極為猛烈，逮捕了200多人，報刊宣傳仍在升溫，發生資本家自殺事件48起，死了34人。」(註二十)「我到上海後，先去幾家大的私營企業考察。記得其中有一個梅林罐頭廠，在鬥爭不法資本家時，出現了戴高帽和體罰現象，致使少數資本家跳樓自殺。」(註二十一)

陳雲亦指出中共算資本家的帳，「是不是算多了一點」，他舉例指出：

「蚌埠有一百五十家工商戶，資本只有一萬五千億元，要退補的就達三萬億元。浙江省有幾個工廠，『五毒』帳超過了加工訂貨的全部收入。

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腳」。(註二十二)

當時五反運動對經濟產生一定的衝擊，大批私人工商戶停業，經濟活動出現嚴重堵塞，商品貨幣流通遇到障礙，不少地區生產下降，市場清淡，稅收減少，失業工人增多。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鄧小平在一封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指出了西南地區經濟停滯的狀況：

- i 一季度稅收將減少一半，好多稅局已經垮了；
- ii 貿易額減少很多，國營公司百貨營業額只有原來的百分之三十，工業器材僅及百分之十五；
- iii 許多私營企業無事可做，有的有意用不發工資或要公家貸款維持的辦法抵抗「五反」運動；
- iv 工商停滯造成工人失業，也加劇了城市貧民的困難，如重慶一區有兩萬人(佔該區人口三分之一)到了無食或缺食地步，開始對「三反」、「五反」表示不滿；
- v 特務已乘機興風作浪。(註二十三)

華東局副書記譚震林亦指出，五反引起的新問題主要是「工人失業，成品積壓，物價下跌。」(註二十四)工人雖然希望公私合營，但現在卻擔心資本家作出大量退賠款項後，生產將不能維持，工人生活將出現困難。(註二十五)

基於經濟及工商業者面對的困境，中央決定調整並協助工業，降低銀行利率，增加放款，擴大加工訂貨及收購產品。五二年六月三十日，政務院更下令運動告一段落，放寬資本家退款限期，而真正無力償還者，需將該筆款項劃作為中央政府在該企業上的公股，或由人民銀行抵押貸款。

(4) 三反、五反運動及整風的總結

三反運動及整風運動與上述的整黨運動一樣，都是把一些貪污、腐化、蛻變的份子清洗，淨化中共的組織，鞏固了其統治的威望。

至於五反運動，則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1. 經濟收益

從經濟意義來說，新政權從此運動中所取得的補款與罰款相當龐大，可以應付部分因韓戰而增加的額外財政開支及經濟建設的費用；

2. 為國有化奠定政治基礎

從政治角度分析，五反運動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工商業的控制，資本家在共產黨的聯合陣線上的地位被削弱，加上大多部分資本家無力還罰款或退款，故只得將該筆應邀交的款項當作是中央政府於他們廠內的公股或投資，迫使一些私營的企業實際上變為公私合營。再者，在五反運動後，共產黨在一切大的私營企業中，成立新的或更鞏固的黨支部，並建立了工人店員監督生產和經營的制度，客觀上削弱了資本家的實際管理權，為以後的公私合營及國有化運動奠定了基礎。

3. 中共改變了建國初期團結資產階級的方針

由於在五反運動中，共產黨將鬥爭資產階級看成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關係到「我們的國家究竟要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要走向資本主義這樣根本性質的問題」，認為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註二十六）在此背景下，毛澤東於五二年六月六日修改了關於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的提法，他明確指出：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註二十七）

毛澤東的批語清楚無誤地表示要改變過往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做法，並將民族資產階級列為需要被打倒的對象。及後中共更於一九五三年推行「一化三改」，大規模地開展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將其國有化。

第四節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教育事業的改革

四九年的中國仍是一個經濟及文化落後的國家，故此，共產黨緊密團結知識分子，使他們能為經濟及各方面的建設服務。另一方面，共產黨也深切了解，在舊社會能獲高深教育的知識分子大多是出身於地主、大資本家及國民黨官員的家庭，長期受傳統舊有思想、資本主義以至西方思想教育的影響，未必能夠接受社會主義。故此，對這批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乃成為新政權的一項重要任務。

最初的思想改造運動是學習運動，從一九五零年開始，範圍主要限於大中學校，所有教授及學生都需要在半年內，學習馬克思、列寧及毛澤東的著作、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及黨的各項基本政策等。除閱讀指定的書本外，並須上課聽取共產黨幹部的政治及時事報告。此外，中共還組織知識分子投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大規模群眾運動。

在運動推展的過程中，文藝界出現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然而，共產黨卻認為這是錯誤的，暴露了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藝界知識分子)極端混亂的思想狀況，故有必要再把思想改造運動推深發展。

武訓是十九世紀清末時代的人物，由於家境清貧，失去入學機會而要靠行乞為生，在他長大後，為了推廣教育，不斷行乞籌款以建學校，由於他的努力，故其建校的理想終於實現，並受到當時滿清皇帝的嘉許。毛澤東批評《武訓傳》的主要論點，是武訓「處於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註二十八)毛澤東更指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就喪失了批判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

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

鑑於上述情況，五一年九月，共產黨召集了北京及天津兩地大學的教授共一千二百多人齊集北京，由周恩來總理作長達五小時之學習報告，就知識分子應如何確立革命觀點、立場和方法等問題，作出說明，周恩來並就自己的學習和過往的某些工作經驗，作出自我批評，號召教師們認真展開對他人及自我批評，開展了動員運動。（註二十九）

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指示〉，指出自從抗美援朝和鎮反運動以來，各類學校的政治思想情況，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但社會上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思想及組織不純的情況，故必須在一年至兩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進行思想改造工作，中共更要求他們忠實地交待自己的歷史。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政協全國常委也發出〈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組織各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及宗教界人士參加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從五一年的十月起，全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便迅速開展了。

思想改造運動主要分為「學習批判」和「組織清理」兩個階段。中共首先號召知識分子學習規定的著作和文件，並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及方法，進行自我批評。經過學習批判後，於五二年三、四月間，當運動進入了組織清理階段，共產黨呼籲有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忠實地交清自己的歷史。曾參與思想改造的民主同盟委員周鯨文，形容此運動是希望打碎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使他們絕對服從共產黨，整個運動並不是在和風細雨中進行，而是狂風暴雨般帶有殺氣，周鯨文舉出著名學者張東蓀、周炳琳及華羅庚等人的經驗：（註三十）

「張東蓀是知名學者，……共產黨就選擇此人作為思想改造運動的首先犧牲者，打下一座文化界的堡壘，給其他高級知識分子看看共產黨的威風。……張東蓀先生的思想檢討是在燕京大學進行的；在他作完第一次檢討，群眾的意見很多，風頭已經不對，他接著作第二次檢討，這時共產黨已經預備好了很多關於張東蓀一生的歷史材料，如他給人題書面

引用西方一位作家的話：『如果在共產主義與絞刑之間，叫我有所選擇，我寧願選擇絞刑』……有一天晚上他由燕京大學進城來，在他的大兒子張宗炳家我們會面了，他說：『情形搞得這樣，我的方寸已亂！』我瞭解當時共產黨為他佈置的情況，我很冷酷的問他一句：『你今年多大歲數？』他說：『六十三』……我回答說：『已經六十三，你還怕甚麼！』他體會了我的用意，向我點了點頭，接著我們談論一會，我以死的心情對待我的老友……最後張東蓀被共產黨以出賣國家情報的罪名被定為反革命分子，而中國民主同盟受了共黨指使又開除了張東蓀的盟籍，此後，他便開始在其燕東園的小屋中過其軟禁生活了。」

周炳琳是北京大學的法學院院長，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他對群眾向他進攻的批評堅決不承認，他自比鐵牛，而「共產黨把他稱做舊文化界的頑固堡壘」，「共產黨怎樣從內部攻破周炳琳這個堡壘呢？這次主要是動員他的家人，兒子和妻女……共產黨利用這群周炳琳的兒女在鬥爭會上檢舉周炳琳的錯過，同時回到家裡再行勸說……家的群眾都是共產黨的，說的話都是黨話，沒有了父子骨肉之情，一切都完了，剩下給他的只有悲哀。」

至於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則於群眾要求他交待與美國的關係時，由於他還保存著原有的出國護照，故引起群眾對他的鬥爭，批評他仍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由於受不了壓力，他曾自殺，但被及早發現。

根據周鯨文的評述：「以後是共產黨的指使，因為他（華羅庚）是民盟盟員，他的檢討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舉行，躲開它（指共產黨）自己在清華佈置的火網，這樣既可保護華羅庚過關，還可保全共產黨自己在群眾跟前鐵面無私的面孔，因為搞死或搞垮華羅庚都是對共產黨不利的，不用說它還想利用華羅庚的高級知識，就是它在爭取留美學生回國的工作中，死了一個華羅庚於它也是不利的。」

對於這段歷史，部分研究中共的歷史工作者也同意當時有些黨員看不到知識分子中間「絕大多數人的進步作用，因而採取簡單粗暴、急於求

成的辦法，在批評知識分子的錯誤立場、觀點的時候，不善於團結他們，教育他們，同他們合作。這就傷害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感情，造成了隔閡。」（註三十一）

在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完成後，中央政府便開始對舊有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建國後，中央政府接收了所有屬於國民黨政府開辦的學校，於全國各級學校中建立了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等組織，並開設有關社會主義的課程。五一年十月，中央政府公佈〈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新學制開始後，幹部學校取得更高地位；小學實行五年制，使農民子女能接受基本的教育；此外，各種技術學校被列入正規學校教育系統內，而各種學校教育在整個教育系統中都能夠互相銜接，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形成一個新的教育制度。最後，政府還領導各學校學習蘇聯辦學經驗，進行改訂教學計劃、改革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等連串工作。

第五節 其他方面的重大改革

一 司法改革運動

司法改革運動於五二年三反、五反運動之後開展。由於三反、五反運動中發現司法人員在判案時有貪污枉法的情形，故推行此運動目的，一方面要清除上述貪污枉法分子，另一方面是要打擊司法人員的舊有司法觀念。當時的司法部部長史良曾指出：「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暴露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還存在著嚴重的組織不純的現象。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幹部共約二萬八千人，其中舊司法人員六千名，約佔總人數百分之廿二，他們大部份充任審判工作，特別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中，舊司法人員更佔多數。」

在新政權成立初期，司法部門人才不足，故留用了一部份曾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的司法人員，然而在工作過程中，卻出現了「四幫五不」的現象。所謂「四幫」就是「一、幫反革命分子危害人民；二、幫封建地主壓

迫農民；三、幫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破壞國家建設和壓迫工人；四、幫各種違法分子開脫罪責。」所謂「五不」，即「對勞動人民的控訴不受理、不傳案、不訊問、不執行。」出現這個情況主要是由於「盲目的崇拜和重用未經徹底改造的舊司法工作人員，聽任舊司法觀點的氾濫，甚至要他們『帶徒弟』，思想上做了舊司法的俘虜」所致。故此，司法改革運動的兩個重點，是清洗舊司法人員和對司法工作的幹部開展思想改造的工作。

推行司法改革主要是由司法人員自我檢討過往如何錯誤地運用舊社會的法律觀點，然後再經群眾批評。此外，共產黨員並發動群眾檢舉舊司法人員錯判的案件，然後把不稱職的司法人員撤職。最後便是對司法人員的思想改造，糾正他們舊有的法律觀點，灌輸新的馬列主義法律概念，並以司法人員曾判決的案件為例，要他們改變立場，再作判決，以達至教育他們的目的。

二 推行〈婚姻法〉運動

〈婚姻法〉是中共建立政權後通過的第一個法律，一共有廿七條條文，其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婦女的獨立地位。故此，法律中列明「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納妾。禁止童養媳。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關係問題索取財物。」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於其重要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中國婦女除了與男子一樣受政權、族權、神權統治之外，更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權)，而這四者就成了束縛農民的四條大繩索。在農民起義的情況下、地主政治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故此，在革命後提高婦女的地位，乃成為新政權於社會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工作。《人民日報》於〈婚姻法〉頒佈前之同月十六日社論稱：「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重要標誌之一，婚姻制度的改革，在婦女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中，是具有重大意義的。」而於五月一日，即〈婚姻法〉施行之日，北京婦女聯合會等五個團體，發表共同聲明指出：「要認識婚姻制度的改

革，應該把這個工作，當成革命任務的一部份。」五零年政務院的指示也指出：

「婚姻改造不僅是法院和地方婦女團體的工作，而是每一個組織都須為此而合作……必須使人民參加控訴大會，揭發那些未能達到這個新法律規定的標準的人們，必須有大規模的民眾大會，婚姻改造須與土地改革相輔而行，以同樣手段用於這二者。」

根據上述指示，婚姻法運動便雷厲風行地在農村開展，形式是召開鬥爭大會，批判進行婚姻買賣的雙方家長或丈夫，他們被控告的罪名主要是曾經進行包辦婚姻及曾對媳婦進行種種壓迫與虐待。然而，隨著運動的深入，嚴重的事故亦不斷在農村發生，例如很多家長經不起控訴，雖未經判刑，便自行了斷，或者有些丈夫連妻子也一併殺掉。更為甚者，就是有些幹部藉推行婚姻法運動，干涉正當人家的家庭生活及正常的婚姻，有的甚至以婚姻自由和戀愛自由為藉口，向一些婦女進行誘脅，而導致很多婦女走上自殺的道路。周恩來總理也曾指出：

「幹部本身也做出直接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為，致使被干涉者和被虐待者得不到法律上和事實上應有的保護。」周恩來繼而指出：「據不完全的統計，各地婦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殺和被殺的，中南區一年來有一萬多人，出東省一年來有一千一百四十五人，蘇北淮陽專區九個縣在一九五零年五月到八月間有一百一十九人。這些數字必須引起各級人民政府嚴重的警惕。各級人民政府對此嚴重情形絕對不應容忍。」基於上述情況，他嚴厲地警告：「幹部中如有寬縱，袒護罪犯，或干涉男女婚姻自由因而促成婦女被殺或自殺者，應按責任輕重，予以應得的處分。今後如有婦女因婚姻問題得不到婚姻法所賦予的權利與保護而被殺或自殺者，區、鄉、村(街)級的主要幹部，首先應負一定責任。」(註三十二)

《婚姻法》的推行客觀上也鞏固了新政權，由於婚姻法運動所鬥爭及清算的對象是一個家庭內的成員，故使到「家庭」這個社會結構中最基層

的組織受到嚴重的挑戰甚至某程度之瓦解，使個人失去家庭的保護而暴露於整個中央政權之前，使到人人孤立，而更依賴新的政權。

註 穩

- 註 一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1357-1371頁
- 註 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文化資料供應社，一九七八年，第263頁
- 註 三 羅瑞卿「三年來鎮壓反革命工作的偉大成就」(一九五二年九月廿八日)載《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七)，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226-227頁
- 註 四 王學啟等《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78頁
- 註 五 林蘊暉等《凱歌行進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43頁
- 註 六 何理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42頁
- 註 七 同上
- 註 八 朱德〈在中央直屬機關黨的紀律檢查委員聯席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零年五月六日)載同註三，第40-43頁
- 註 九 同上註，第45-46頁
- 註 十 楚序平等《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華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368頁
- 註十一 同上註，第370-371頁
- 註十二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河北省委關於開除劉青山、張子善黨籍的決議〉
- 註十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165-166頁
- 註十四 毛澤東〈元旦祝詞〉(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0頁

- 註十五 薄一波〈為深入地普遍地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而鬥爭〉(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在中央，華北和享津兩市的幹部大會上的報)載同註三、第155頁
- 註十六 同上
- 註十七 同上註，第156頁
- 註十八 同註四，第89頁
- 註十九 同註十三，第171頁
- 註二十 同註十三，第170頁
- 註二十一 同註十三，第172頁
- 註二十二 陳雲〈市場情況與公私關係〉(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載《陳雲文選》(一九四九——一九五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172頁
- 註二十三 同註十三，第168-169頁
- 註二十四 同註十三，第175頁
- 註二十五 同上
- 註二十六 〈廖魯言同志關於結束「五反」問題的報告〉，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及薄一波〈為鞏固：「三反」、「五反」運動的偉大鬥爭而鬥爭〉載龐松王東著《滑軌與嬗變》，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06頁
- 註二十七 毛澤東〈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載同註十四，第65頁
- 註二十八 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載同註十四，第46頁
- 註二十九 同註五，第217頁
- 註三十 周鯨文《風暴十年》，時代批評社，一九五九年，第231-235頁
- 註三十一 同註四，第106頁
- 註三十二 周恩來〈切實執行婚姻法，保護婦女合法權益〉(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載《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56-57頁

第四章 抗美援朝與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

第一節 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

原則上，一個獨立國家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爭取其本身的利益。故此，國家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而只有永久的利益。而「國家利益」可以具體化為下列要素：

- 一 國家的生存或自保，包括領土完整、政治獨立和基本政治制度的保持；
- 二 經濟自給自足；
- 三 國家威信；
- 四 對外擴張。

中共在建國初期，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目標是爭取國家的安全和自保，此目標幾乎成為一切重要外交決定的依歸。第二個目標便是透過外交關係，爭取國際對中國國內經濟建設的援助，以取得經濟上的完全獨立和自給自足的效果，至於國家威信及對外擴張的考慮，在當時中國外交決策上的地位就遠遠不如前兩者重要了。

第二節 「一面倒」的親蘇外交政策與雙方分歧

一 中共推行親蘇政策的原因

有些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者指出，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即後來的中國共產黨，完全是由蘇聯孕育與培植，才得以成長及壯大。在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蘇聯將其於中國東北擄獲的日本武器交予中共，致使其反抗國民黨政府的實力驟然增加，故此當毛澤東成功推翻國民黨後，推行一面倒的親蘇政策，乃是十分正常之事，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發表的一份重要建國綱領文件〈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俄國介紹的。……走俄國人的道路——這就是結論……『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路是沒有的……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的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註一）

此外，學者們更指出毛澤東於政權成立後最大的一件外交任務，便是赴蘇「拜壽」，他於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抵達莫斯科，直至五零年三月始回北京，在蘇聯逗留達兩個多月，以一個國家元首於建國後便往異國逗留如此長時間，實足以證明中蘇關係異常親密。

上述的分析實際頗為表面，中國經過百多年的國家獨立運動，中共領導人於建國期間所面對的一個最重要問題便是如何維持國家的獨立、新政權的生存與自保。若各個國家能平等看待中國，尊重她的獨立及承認新政權，中國便可免除任何的外來威脅，而能專注於內部經濟建設事務。更理想的情況，便是能得到一些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如美國等的經濟緩助。此外，假如中國能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中間維持一個中立的地位，並採取較為溫和的外交路線，將使中國成為兩個超級大國爭取聯盟的對象。這樣中共便處於一個靈活的位置，能採取較為彈性及有利於本身的外交決策。

基於此，在二次大戰末期和國共內戰的初期，中共曾謀求與美國發展外交關係，例如邀請大批美國學者、作家及記者參觀共產黨革命根據地延安。一九四四年，毛澤東曾向美國記者謝思偉談到：「你們美國人與我們共產黨人的任何接觸都是好事。」（註二）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在一九四九年陷落後，「美國不僅未及時召回駐在解放軍佔領地區的外交代表」，而且，「當時駐中國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還留在原地和人民解放軍

的代表商討未來關係的問題……以便美國承認中國未來的新政府……四九年九月，周恩來還邀請了司徒雷登前往北京訪問燕京大學。」(註三)

此外，在建國前的政治協商會議中毛澤東也說：

「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註四)

然而，中國希望走中間路線的理想在美蘇冷戰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很快就破滅了。當時整個國際陣形兩極分化，走第三條道路的中間勢力根本難以形成，假若某國家稍為傾向一方，便會很快被另一陣營孤立及打擊。由於中共與蘇聯的意識形態相似，彼此關係較為密切，而美國亦無放棄支持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故此，與蘇聯結盟便成為中國最後的抉擇，一旦中蘇結盟，中共意圖與美國保持一定外交關係的希望便完全幻滅了。

二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其他協定的簽訂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以國家主席身份親赴蘇聯訪問，並慶祝史太林的七十壽辰，其主要目的在於商談現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貸款給中國、兩國商務協定及其他問題。此行中毛澤東受到盛大歡迎，據資深外交家伍修權的回憶：

「蘇將毛主席所乘專列到達莫斯科的時間巧妙地安排在中午十二點正，列車剛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宮的大鐘就『噹噹』地敲響了。除史太林(按慣例，他是從不外出迎送客人的)以外蘇聯最高黨政軍領導人，幾乎全體到車部歡迎。」「毛主席到達的當天，略為休息後，下午六時，史太林率領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會見了毛澤東同志，他一見毛澤東同志，不等介紹就上前緊緊握手，高興地說：『想不到你是這樣的年輕和健

壯！」在為史太林祝壽的大會上，史太林讓毛澤東同志居於各國兄弟黨領導人之先，緊挨自己並肩站在一起」。（註五）

此外，中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亦於五零年一月下旬抵蘇參與會談，雙方就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進行了討論，並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協定〉和〈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共有六條，主要是以日本為共同之敵國為目標，例如條約中列明要「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上與日本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這明顯是針對美日之同盟。此外，條約更指出：

「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這條約不僅表現在反侵略上，而且希望進一步發展經濟及文化的合作，如條文中提道：「締約國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並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係，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

在〈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中指出，蘇聯在五年內給中國三億美元貸款，而中國須用此貸款「償付蘇聯為恢復和發展中國人民經濟而由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而在〈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協定〉中規定蘇聯能繼續與中國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直至一九五二年。蘇聯若經中國長春鐵路到海參威，比走蘇聯本國的遠東鐵路近得多，所以蘇聯要求在短期內仍保持中國長春鐵路的管理權，而由於中國當時尚未有足夠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水平，故同意鐵路仍暫由兩國共同管理。此外「雙方同意俟對日和約締結後，但不遲於一九五二年末，蘇聯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至於大連的行政，則完全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

三 中蘇兩國間之分歧

雖然中國外交上推行一面倒的政策，又與蘇聯簽訂合作條約，但基於歷史、經濟及國家利益的衝突，彼此在中共建國初期已出現了很多矛盾，終於導致六十年代初期的大決裂。

(1) 中蘇兩國的共產黨在建國前後的爭執

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著親蘇的國際派與本土派的鬥爭。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大規模鎮壓共產黨後，有些共產黨員逃至江西繼續進行游擊戰，開展農民戰爭，這些人就成為中共的本土派，他們以毛澤東為領導。「本土派」與由蘇聯訓練而從莫斯科調回中國工作的幹部，無論在性格、策略及理論上皆有明顯的分歧。毛澤東一向反對照搬俄國革命的經驗，而在一九三五年的長征中奠定了他在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後，他更堅持走適合於中國的革命道路，擺脫莫斯科的控制。

據中國學者指出，當四五年國共內戰開始時，史太林「干涉中國內政，支持美、蔣和談，要毛主席親入虎穴，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達成協議，交出軍隊。還以蘇共中央局的名義嚇唬我們，要我們同國民黨取得和平不要打內戰。」蘇聯的要求遭到毛澤東斷然的拒絕。(註六)更甚者，就是在南京陷落後，很多國家如英、美的大使，皆有意地滯留南京，謀求與中共接觸，嘗試開展與中共的外交聯繫，然而，蘇聯卻依然承認國民黨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權，蘇聯的駐華大使甚至跟著國民黨政府撤退至廣州。更有學者指出，於抗戰勝利後，蘇聯將其在中國東北繳獲的日本武器交中共，使東北成為中國革命基地，這行動根本是要壯大東北的親蘇力量，以分裂中共，「因為當時中共中央尚駐節延安，所以領導滿州的東北局就具有甚大的自治權，特別是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陷於國民黨之後，中共中央已無法有效地指揮全國各地的鬥爭，因而東北局的自治作用更為增長。」(註七)。此外，蘇聯將東北所有能拆卸運走的機器設備和器材物資全運到蘇聯，使中國受到很大的經濟損失。

基於上述事件，中國領導人於四九年底訪蘇時，史太林曾對他們

說：「你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我們干擾過、妨礙過你們，我為此感到內疚。」雖然如此，蘇聯對中國的某些方針仍然懷疑，伍條權曾指出：

「過去我們不聽共產國際和史太林的錯誤主意，史太林就懷疑我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國的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了政府，蘇聯就懷疑我們會不會執行親英美的路線。」（註八）

（2）經濟上利益的紛爭

在〈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協定〉中，准許蘇聯能與中國共同管理在中國境內的長春鐵路直至一九五二年，但其實在日本投降後，蘇聯應立刻將中國長春鐵路交還中國，而沒有理由再重新侵佔中長鐵路的主權。在這點上，蘇聯其實是利用其已佔領中長路的既定事實，迫使中共領導人就範。

此外，蘇聯對中共的三億美元貸款，實在是微不足道，同時，這並非現款，而是一些機器設備與器材，在釐定人民幣與蘇聯盧布比值問題時，蘇聯又人為地壓低人民幣的價值，使中共得不到當初實際的款項，由於這筆貸款是以美金計算，在簽訂貨款協議時，每一美元換五盧布，但十四天後，蘇聯調高盧布與美元的匯率為每一美元只能換得四盧布，由於中共要以美元換取盧布以向蘇聯購物，所以轉瞬間中共便損失四分之一貸款。（有關中蘇鬥爭的情況，在「從獨立外交到中蘇分裂」一章中有更詳細的討論。）

第三節 中國參與抗美援朝戰爭

一 韓戰形勢與中國參戰

毛澤東從蘇聯歸國後，於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即在韓戰爆發前二十天，召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作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的好轉而鬥爭〉的報告，毛澤東指出新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可

以「推動著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和民主，反對戰爭和壓迫的偉大鬥爭」，並且「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並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國民黨反動派所散佈的戰爭謠言是欺騙人民的，是沒有根據的。」(註九) 從此報告內容可知中國當時最重要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以便從事國內建設，根本就沒有參與戰爭的意圖，即使在五零年六月下旬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方面亦反覆強調應停止戰爭，以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在韓戰中，美國堅決支持南韓，在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從其全球戰略利益，以及抑制傾向蘇聯的社會主義力量出發，作出武裝介入朝鮮戰爭的決定，美國總統杜魯門更宣佈為阻止中國大陸政府對台灣的任何進攻，命令美國的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並命令美國空軍十三航空隊和以各種顧問團名義出現的美國武裝人員，紛紛進駐台灣。美國遠東軍區司令麥克阿瑟親自到台灣，與國民黨政府密商共同防守台灣的計劃，公開參與中國的內政。同一時期，美國下令加強駐菲律賓的美軍，並在日本、南韓及泰國等地方駐軍及設立軍事基地，對中國大陸形成了一條嚴密的包圍網。

韓戰的爆發，使苟延殘喘的台灣國民黨政府，出現了轉機，當時台灣駐南朝鮮大使邵毓麟曾精確的指出：

「韓戰對於台灣，更是只有百利而無一弊。我們面臨的中共軍事威脅以及友邦美國遺棄我國，與承認匪偽的外交危機，已因韓戰爆發而局勢大變，露出一線轉機，中(國民黨政權)韓休戚與共，今後韓戰發展如果有利南韓，亦必有利我國……我還可能由鴨綠江，由東北而重返中國大陸。如果韓戰進展不順而不利南韓，也勢必因此提高美國及自由國家的警覺，加緊援韓決不致任令國際共黨渡海進攻台灣了。」(註十)

促使中國參戰的轉捩點，是五零年九月美軍以五萬名陸軍，在三百艘軍艦，五百架軍機掩護下，在朝鮮中部西海岸仁川登陸，截斷了北韓軍隊的後方交通。十月上旬，美軍更向中國東北的鴨綠江和圖們江進兵，把戰爭擴大至中國邊境。美國還多次派遣空軍進犯中國東北領空實

施空襲、美國軍艦也不斷炮擊中國商船，使新中國的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面對美國的戰事行動。中共於一九五零年十月八日，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出了〈給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的命令〉，命令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同時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

二 中共參戰的原因

(1) 中共高層對參戰的顧慮

新生的共產黨政權，面對國內百廢待興的局面，首要任務在於發展經濟，調動各方面力量支持新政府。故在一九五零年十月五日由毛澤東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不少中共領導人主張不出兵，有的主張暫不出兵，其理由有如下幾點：

1. 中國經過幾十年戰爭的摧殘，創傷急待恢復，而且財政十分困難，推行經濟建設已甚為吃力，更遑論多應付一場對外戰爭；
2. 國內還有部份邊遠地區、沿海島嶼及台灣尚未解放，約百多萬國民黨殘餘部隊仍待肅清；
3. 廣大的新解放區尚未進行土地改革，封建勢力尚在統治農村，新生政權的統治基礎仍未鞏固；
4. 中國軍隊裝備遠遠落後於美國，更無制空權及制海權；
5. 若中國出兵，美國可能對中國宣戰，出動飛機轟炸中國工業基地，並開闢其他戰場，而台灣國民黨便會伺機而反攻大陸；
6. 由於長期戰爭的艱苦生活，部隊已產生厭戰情緒。

毛澤東在聽完與會者的意見後發言說：「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危急，我們站在旁場看，不論怎麼說，心裡也難過。」(註十一)

(2) 中共決定參戰的戰略考慮

總的來說，促成毛澤東作出參戰的痛苦決定，主要有下列重要的戰略考慮。

1. 國家安全考慮

毛澤東多次強調中朝關係是「唇亡齒寒」(註十二)並指出：「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中國領導人從整個戰略局勢分析韓戰，如果不出兵拯救北韓金日成政權，讓其遭美國殲滅，則中國將損失一個可以牽制美國及南韓政權的盟友，並會鼓勵美國擴張，干預中國內政，聯繫到日本侵略中國的步驟，亦是通過朝鮮作為跳板，佔據東北而南下的慘痛歷史教訓，中國作出「救朝鮮，保中國」的決策。(註十三)

此外，得到美國支持的台灣政權，亦會藉韓戰，或在北韓戰敗後，依附於南韓政權策劃反攻大陸。其實，早在韓戰初期的五零年六月下旬，蔣介石便已決定派遣其精銳的五十二軍赴朝鮮支援南韓李承晚政府，此行動後因美國反對而未果。(註十四)令中國領導人擔心的，是在韓戰爆發初期，中國大陸內的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者，也以不同形式抵抗新政府的各項改革，最明顯的例子是農村中的地主對土地改革的頑強反抗，而在各地亦出現武裝叛亂。因此，為了徹底的解決國內外政治挑戰，中共只好起兵與美國抗衡。

總結而言，就算美國的軍事行動只是針對北韓而不入侵中國東北，但隨著北韓政權戰敗，中國將須永遠面對來自東北的潛在敵人——即美國支持的韓國及日本政府。中國的不參戰亦會被其他國家批評為懦弱無能，鼓勵美國及台灣的軍事聯繫，使中國統一的目標更難達到。

2. 經濟建設

毛澤東曾指出若不出兵，對東北十分不利，他說：「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註十五)由於中國領導人恐怕美國會將戰火蔓延到中國的工業重鎮——東北三省，摧毀其發展工業的基礎，以至國家無法進行經濟建設，故為長遠經濟建設考慮中國被迫出兵。

3. 與蘇聯關係及其他國際因素的考慮

站在蘇聯領導人的立場，雖然他們支持北韓政府，但蘇聯的大規模

軍事行動將導致美蘇兩國的直接衝突，極可能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基於這個考慮，蘇聯希望中國能出兵，使中共作為美蘇直接軍事衝突的緩衝力量，來抗拒美國的軍事行動。

站在中共領導人的立場來看，他們理解中蘇存在著不信任，中共亦希望透過韓戰打破莫斯科對中共的猜疑，以冀在將來爭取更多軍事及經濟的援助。後來（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指出史太林一直懷疑中共，「只是到朝鮮戰爭時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和其他各國兄弟黨對我們的懷疑。」（註十六）

此外，中共領導人亦深切了解，假若他們不積極參與韓戰，萬一將來各國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韓戰問題時，中國將喪失一切發言權，並將整個亞洲的反美軍事行動的領導權完全交給蘇聯，這不單影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威信及在亞洲的領導角色，也會令中國東三省境內的朝鮮少數民族對新政權產生不滿（筆者按：當時有朝鮮血統的少數民族約一百萬人）。最後，由於中朝兩國共產黨於歷史上的關係密切，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亦促使中國領導人在道義上認為需要出兵支持北韓政權。

（3）蘇聯對「以空軍支援中國軍隊」事宜上的反覆

就出兵援朝問題，中蘇雙方本有默契：地面軍力由中國負責，空軍掩護支援由蘇聯負責。（註十七）然而，當周恩來於五零年十月十一日會見史太林要求蘇聯提供軍事裝備及空中掩護時，史太林卻指出：「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須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能出動。」（註十八）蘇聯這個態度實是毛澤東等領導人所始料不及，並迫使中共領導人再次考慮是否還要出兵。

後來，史太林從維護蘇聯自身戰略利益出發，認為假若蘇聯空軍在朝鮮與美國飛機作戰，將引起美蘇大規模衝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故此，他改變以空軍掩護中國軍隊的承諾，並向周恩來指出：「蘇聯將只派遣空軍到鴨綠江北岸的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掩護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註十九）

在得悉蘇聯的決定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八日再

次召開會議，討論到蘇聯雖不願意出動空軍掩護中共軍隊，但畢竟答應給予中國軍事援助，再加上國家安全戰略的考慮，中共維持出兵援朝的決定。

三 國內抗美援朝運動之展開

在參與韓戰後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便宣佈成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作為統一領導機構，並在各大行政區、省、市，分別成立地方分會，廣泛召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以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韓戰。中央政府首先提出了仇視、鄙視、蔑視美國的口號，並採用集會控訴和遊行示威的方式，對內對外開展反美宣傳，接著並發動了「捐武器運動」、「青年參軍和參加各種軍事學校運動」，「肅清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影響運動」和「反對美國細菌戰」的宣傳。

「青年參軍和參加各種軍事學校運動」是於五零年十二月發起的，根據抗美援朝總會副主席彭真報導，全國當時有五十萬青年參加了各種軍事學校，此外並發動了大量青年參加人民志願軍，並組成運輸隊、擔架隊到朝鮮擔任戰地上各種運輸與勤務工作。而醫療工作者則組成大批醫療隊，以承擔醫療工作。「肅清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影響運動」是五零年底發動的，通過了〈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和決定〉和〈接受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登記條例〉，並立即開展對美國在中國開設的文化教育宗教慈善機構的接收工作，並在知識分子中開展思想批判，以清除親美、恐美及崇美的思想。「捐獻武器運動」於五一年六月開始，主要是制定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士家屬及軍人家屬的行動，至五二年五月，全國人民已捐獻了價值等於三千七百一十架戰鬥機的捐款。至於「反對美國細菌戰運動」，首先由北韓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在前線陣地和後方大批撒佈各種含有鼠疫、霍亂及其他傳染病菌的細菌戰，而中共遂成立「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出發往東北及北韓等地區進行調查。

上述反美運動，不單成了新政權動員人民參加韓戰的有效力量，更成為推行很多對內政策之重大動力，使人民知道新中國由於受到外來勢

力的威脅，須更積極的投入國內的各項政治運動。

經過三年多的戰爭和談判，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朝鮮人民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與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板門店簽訂了〈關於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結束韓戰，而抗美援朝運動亦告一段落。

註 釋

- 註 一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1360-1365頁
- 註 二 約翰·吉廷斯著，章兆政譯《世界與中國》，七十年代雜誌社，一九七八年
- 註 三 S謝爾蓋，楚克著《美國與中國》第13-14頁，同樣的資料可參閱黃華〈南京解放初期和同司徒雷登的幾次接觸〉載《新中國外交風雲》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22頁至31頁
- 註 四 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載同註一，第1353-1356頁
- 註 五 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驗〉《世界知識》，一九八三年，16-20期
- 註 六 余湛、張光祐〈關於斯大林曾否勸阻我過長江的探討〉載《新中國外交風雲》，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17頁。以及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432頁
- 註 七 O.B. 鮑里索夫等著《蘇中關係》，俄文版，第28頁
- 註 八 同註五
- 註 九 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15-16頁
- 註 十 請參閱李健編《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20頁。及鄭宇碩、石志夫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稿》第一卷（一九四九—一九六四），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第121頁
- 註十一 楊勝群、田松年主編《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一九四九—一九

- 六五，」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59頁
- 註十二 同上註，第60頁
- 註十三 楊得志回憶錄《為了和平》載鄭宇碩、石志夫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稿》第一卷（一九四九——一九六四），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第121頁
- 註十四 李健《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7-10頁
- 註十五 同註十三，第120頁
- 註十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326頁
- 註十七 同註十四，第32頁
- 註十八 同註十一，第61頁
- 註十九 同註十一，第63頁

第五章 建國三年的成就與經驗總結

第一節 建國三年來經濟恢復的成就

四九年前的中國工業生產落後，缺少重工業基礎，國內所需的機器及材料很大程度上依靠入口，農業生產更是長期停滯，糧食和棉花等主要農作物皆未能自給自足。經過長期戰爭破壞後，到四九年時經濟已面臨崩潰。

毛澤東曾在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假如這一任務不能完成，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註一)所以在建國初期社會政治鬥爭錯綜複雜、工作繁多的情況下，新政府仍堅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中心。到了一九五二年，即國民經濟恢復階段結束的一年，中國經濟獲得很大的成就：

- 一 工農業總產值達至八百二十七億元，比四九年的四百六十六億增長了百分之七十七點五，而工業與抗日戰爭以前最高年產量比較，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註二)
- 二 在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國家財政的收入和支出達到平衡，財政收支從有赤字到略有結餘。^(註三)
- 三 其他方面的成就：
 - (1) 物價能維持穩定。全國批發物價指數，以一九五零年三月平均價為一百，則五一年為九十二點四，五二年為九十二點六，可見中國已成功脫離通貨膨脹的局面。
 - (2) 隨著經濟的恢復和工農業生產之發展，交通運輸和水利建設事業也有很大的進步。三年內共修築鐵路多達三千公里，鐵路通車里程在五二年達到二萬四千五百一十八公里，比四九年的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九公里增長了百分之十一點五。國家對水利工程的投資亦達八億

二千五百萬元，交通運輸和水利工程的發展，在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和防預水災等問題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 (3) 由於生產事業的發展，就業人數也大為增加，全國職工人數於五二年達到一千五百八十八萬四千人，比四九年增長了百分之九十七點五，而工資則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工農業生產的增長、財政收支的平衡、金融物價的穩定、交通水利事業的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標誌著建國三年內已基本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目標。

第二節 總 結

總結建國三年來的經濟、政治、社會改革及外交等重大事務，可見新政權的工作核心是鞏固統治、恢復及發展經濟，並創造一切條件，為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鋪路。例如發動土改、鎮反、徹底打擊舊政權的社會基礎；推行三反、五反運動，打擊了民族資產階級，為日後消滅私營資本主義創造條件；發動思想改造運動，從知識分子入手，對全中國人民進行思想改造，令他們支持現政權及社會主義。以上的工作，基本上是為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並為下一步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建立基礎。因此，一九五三年新政府便宣佈國民經濟恢復期已結束，並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發動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運動，以推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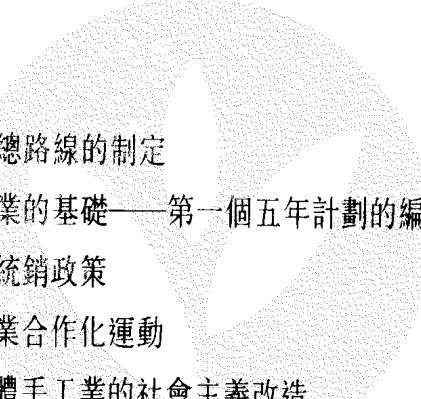
註 釋

- 註 一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1317頁
- 註 二 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三年級集體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73頁
- 註 三 王學啟等《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133頁

第二篇

工業化與公有化

(1953-1957)

- 
- 第六章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
 - 第七章 建立重工業的基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與完成
 - 第八章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 第九章 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 第十章 國家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 第十一章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對資本主義的國有化改造

第六章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

第一節 總路線的提出

在一九五二年，當國民經濟恢復後，中國共產黨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註一），而於五三年十二月，黨中央宣傳部發佈了經黨中央批准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系統地說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意義。

第二節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主要內容

一 推行工業化，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

實現工業化的中心環節是發展工業，而實現工業化必先發展國營工業、國營交通運輸業、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並逐步實行農業和手工業的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以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經濟的比重不斷增長。

二 發展工業與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互相聯系、相互促進

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任務，是發展工業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兩者互相緊密關連，缺一不可，中共指出：

「社會主義工業是整個國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只有充份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才能吸引、改組和代替資本主義工業，才能支持社會主義的商業，改造和代替資本主義商業，才能用新的技術來改造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的

農業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而聽其自流，那麼它們不但不能認真地支持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而且必然會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務發生種種矛盾。」(註二)

國家工業化，從來都是發展中國家謀求富強及爭取經濟獨立的必要條件。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個剛誕生不久的政權，政府極希望在較短時間內，最有效調動有限的經濟資源，集中於工業化及國防現代化的建設。然而，在一九五三年，隨著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開展，中央政府愈來愈感覺到，在過往新民主主義下容許繼續發展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消極落後的一面表現得更為突出。資本家們為謀取最大利潤，往往拒絕政府向其企業的加工訂貨，擺脫國家計劃而自產自銷；或任意撕毀合同，影響國家任務的完成；或搶購、套購糧食、原料，影響國家收購計劃的完成。總之，資本家為追求利潤，千方百計擺脫國營經濟的領導，自行發展，客觀上衝擊著國家經濟計劃的完成。中央認為若不解決這種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之間的矛盾，則社會的生產力就不可能獲得合理的發展，以適應經濟建設及國計民生的需要。

而改造個體農業和手工業，亦是發展農業和整個社會生產力的客觀需要。中央認為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限制了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不能滿足國家工業化對糧食與工業原料日益增長的需要，政府也很難對大量分散的個體農戶進行計劃指導，這就使個體經濟同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之間的矛盾日益暴露出來。

三 推行統購統銷計劃

在實現工業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亦同時對糧食和其他重要的農產品進行計劃收購（統購）和計劃供應（統銷）。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人和城市人口增加，對農業的原料作物、糧食及副食品的需求大為增加，然而由於中國農業的基礎是小農經濟，農業增長極慢，加上自由市場的存在及商人的投機活動，影響到農民囤積觀望，待價而沽，

阻礙了國家收購計劃的完成，嚴重影響市場供應。基於此，實行計劃收購與供應政策，可保証國家及人民的需要，穩定物價，並保障經濟建設。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供應，既然基本上取締了糧食的自由市場，就能夠削弱資產階級對農民的聯繫和影響，對農民及資本主義改造皆有促進作用。故此，統購統銷計劃是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

隨著宣傳提綱的公佈，全國開展了貫徹總路線的熱潮。

註 釋

註 一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89頁

註 二 〈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發）引自周鴻《國史通鑑》第一卷，紅旗出版社，第716頁

第七章 建立重工業的基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與完成

第一節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與基本任務

一 一五計劃編制的時間

第一個五年計劃(簡稱一五計劃)的執行時間是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這個計劃的草案於五一年便開始編制，並經過多次補充和修改，直至五五年二月，在計劃實際執行兩年後，才編制完成。這情況反映了當時中國的資源缺乏，調查，統計資料也很少，加上當時有多種經濟成份(如國營、私營、個體)同時並存，而中國亦沒有編制長期計劃的經驗。這一切皆增加了制定計劃之困難度。此外，中國由於五零年開始抗美援朝戰爭，此期間內的建設皆著眼於為戰爭服務，故對經濟發展缺乏明確的方針，直至五三年七月停戰後，情況才得到改善。最後是蘇聯協助興建的一百五十六個工業項目的主要部份，也是到五三年五月才確定。基於上述理由，在實際執行計劃的兩年內，只好一面進行建設，一面編制長期計劃。

為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央政府於五二年十一月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訂定計劃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又成立了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主要職權是規劃經濟發展的長遠計劃，如五年計劃等，而國家建設委員會則負責較為技術性的工作，如制訂各經濟建設項目的藍圖、估計各個項目之生產成本、擔任技術顧問工作等。

二 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

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中國設計的一百五十六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六百九十四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以建立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註一)這計劃的特徵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如鋼鐵、機器及電力等工業，其次為輕工業，

最後為農業。據國務院副總理及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李富春指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預計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用於工業發展的投資佔百份之五十八點二，在工業的投資中屬於重工業者佔八十八點八。而用於資源開發、交通運輸及農田水利等佔總投資的百份之四十四點二。

為什麼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要如此強調重工業呢？李富春解釋道：

「只有建立起強大的鋼鐵、機器製造、電力等重工業，我們才可製造現代化的工業設備，使重工業本身和輕工業得到技術的改造；才可供給農業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械；才可能生產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使運輸業得到技術改造。只有在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才能提高生產技術及勞動生產率，不斷地增加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的生產，保證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大略）（註二）

此外，一五計劃也希望能改善過往中國工業分佈極不合理的現象。據五二年資料指出，沿海各省的工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產值高達百份之七十。當然，利用沿海的有利條件，如較具規模的工業基礎、技術、人口及傳統商務關係，對發展工業事半功倍。然而，這樣的經濟佈局亦產生很多問題。由於中國幅員廣大而交通又極不發達，假若只重視沿海的工業生產，則在內陸的原料物資都須作長距離運輸以達沿海工業城市，這樣就會大大加重了原已不足的運輸系統的負擔。例如在一九五三年，鐵路某些區段已開始呈現不能滿足運輸需要的情況。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煤炭的運輸佔了鐵路貨運量的三份一。此外，從國防角度考慮，這種工業佈局也是危險的，在戰爭爆發時沿海工業城市肯定成為襲擊的對象，使整個國民經濟受致命性的打擊。

三 一五計劃建設的原則

基於上述原因，中央政府在設計工業區的位置時，特別重視下述幾個原則：

- (1) 重工業的設置，盡量向西北及華北等腹地發展，以改善以往過份集中於沿海城市的狀況；

(2) 輕工業的佈局，以接近市場及接近原料為原則。例如在西北產棉區擴建六間棉紡織廠，並於廣東的甘蔗產區，擴建原有的四間糖廠，新建紫坭製糖廠，改建廣州紙廠，並計劃建設一個以蔗渣為原料，年產達十萬噸的造紙廠。此外，中共中央並批准〈關於逐步推行煤炭分區產銷合理運輸制度的報告〉，根據全國產煤和用煤的情況，劃分十三個產銷區，在按地區進行產銷平衡的基礎上，規定煤炭運輸範圍，限制和禁止過遠的、對流的和重複的運輸。這個運輸制度的改革，對促進全國生產力合理佈局有很大的作用，而中央亦要求各種主要物資如糧食、木材等，也逐步推行這個方法。

第二節 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面對的困難和解決方法

一 中央政府在推行五年計劃時面對很多困難，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缺乏制定長期發展計劃的經驗，又缺乏準確的統計資料，使計劃往往不合實際需要

主持一五計劃的陳雲曾談到自己的經歷，他說：

「一九五零年毛主席和周總理在莫斯科訂了合同，請蘇聯的專家來給我們設計一個汽車工廠。專家到了北京，對汽車工廠設在甚麼地方，爭論很多，有的說設在北京，有的說設在石家莊，有的說設在太原，我說是不是可以放遠一點，設在西安好一點。後來才知道，這些根本不對頭。如果這個汽車廠全年的生產量是三千輛汽車，電力就需要二萬四千千瓦，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修電站就需要幾年時間。還需要鋼鐵，一年要二十幾萬噸，而石景山鋼鐵廠要五、六年以後才能搞起來。木材要二萬立方米，在西北砍木頭，山都要砍光。還有運輸問題，每年的運輸量是一百萬噸，而西安到潼關的運輸量不超過二百萬噸，光汽車工廠就

夠它運的了。討論結果，中國的第一個汽車工廠只能夠設在東北。」陳雲得出結論說：「不學習，經濟建設一竅不通，那就搞不成。」(註三)

(2) 資金缺少

五年計劃重點在於建立並改善工業基礎，而這亦需投入大量資金以進行建設，然而由於對外戰爭，如抗美援朝及援越等，使財政入不敷支。此外，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共實施禁運，亦使中國無法以出口賺取資金，而蘇聯的援助亦十分有限的，它只能提供整個經濟建設所需資金的百份之三，百份之九十七的投資資金都是來自中國本土的。

(3) 技術人員不足

中央政府文教委員會主任郭沫若曾指出，五年計劃約需要高級技術幹部和管理幹部約十五萬人。當時負責五年計劃的高崗也指出缺乏技術干部和熟練工人，正是中國大規模建設所面對的重大困難。東北工業部長王鶴壽曾指出：

「一九五零年基本建設中，由於沒有通盤計劃，沒有顧慮到主觀的設計能力，有些工程不經設計就開工，嚴重影響到質量，因而產生的損失，即達八千二百億元(即美金二千六百萬元)，等於五零年東北建築工程管理局的全年投資。」(註四)

針對上述問題，陳雲提出：

「有些項目可能要推遲。其主要原因為：我國技術力量弱，提供的資料不准確，又常改變，翻譯資料也需耗費時間，加上我國與蘇聯在交接中有很多的不便，蘇方提供的許多成套設備可能不及時，常常會發生停工現象。同時，如鞍鋼和長春汽車廠等大項目的建設，現在是以全國力量支持的。一百四十一項的建設全面鋪開之後，全國支持的力量也會更加分散，真正緊張的時期還在後頭。」(註五)「五年內工業和交通運輸兩項需要增加技術人員三十九萬五千人，但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的畢業

生僅為二十八萬六千人，相差近十一萬人。技術力量不足，當然會影響到建設的進度，並會使產量提不高，質量不好。」(註六)

二 中央政府對第一個五年計劃所碰到之困難的解決方法

- (1) 資金缺少之困難。中央政府除了靠一些經常性收入如稅收、國營企業的利潤以及蘇聯的援助外，還靠下列方法：

1. 厲行節約，緊縮開支

為糾正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財政出現赤字及影響建設的狀況，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通知〉，號召全國人民通過發展生產、降低成本、擴大收購和銷售，加速資金周轉，以增加國營工商業的收入。此外，更做好稅收工作，厲行節約，大力縮減軍費開支和行政經費，節約糧食，以保證財政部提出解決赤字的具體方案能實現。

2. 發行公債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命令公佈〈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條例〉決定發行總額為人民幣六億元的公債以協助政府增加收入。公債推銷的主要對象為城市的私營工商業者。

3. 壓縮進口

五年計劃的時期內中國要向蘇聯支付外匯一百三十六億盧布，以償還貸款及向蘇購買成套設備及其他物資。故為了保持外匯的收支平衡，減少不必要的資金支出，中國政府命令壓縮不必要的進口。

4. 農業的支援

這是籌措建設資金的最重要來源，利用農業支援工業的方法是徵收農業稅、工農產品不等價交換和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政策。通過上述方法，使農民收入的剩餘大部份歸入國家。此外，為保證農業能有較

快的生產，中共中央還決定推行農業合作化，使農業的生產能通過農村制度的變革而加速發展。（這點至為重要，將在下兩章詳細討論）

(2) 至於技術人員不足及技術基礎薄弱的問題，政府提出兩項解決方法：第一是推動工廠舉辦技術學校和訓練班，以便能在工作的過程中培養技工；第二是派遣學生到蘇聯實習。中共中央曾指出：一切經蘇聯設計和供給設備的新的重要企業，凡不能掌握新的操作技術者，主管部門必須挑選人員赴蘇實習。根據這個指示精神，政府加強了實習生的派遣工作，在五四年赴蘇的實習生約有一千三百人。

第三節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果與及出現的問題

一 「一五」計劃的成就

中國於一·五計劃期間，一方面傾全力於重工業的發展，一方面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政策，其五年計劃的執行，已有一定之成果。

(1) 重工業基礎的建立

鋼鐵、石油、機器、電力、水泥等重工業已有相當的發展。此外，工業設備和工人技術裝備程度亦有一定之增長，全國工程技術人員比五二年多了兩倍，而勞動生產力亦迅速提高。

(2) 內陸新工業的形式：

在這五年中，中央政府對東北、西北等地區進行很大的投資，以分散工業地區的分佈，這主要表現在沿海地區新建企業減少，而內地新建企業則增多，主要工業部門投資的地區分配，盡量和原料、燃料產品相適應，以減輕對運輸的需求。

(3) 交通運輸和郵電事業有較大的發展

在一·五計劃期間，用於上述建設的投資額為九十點一億元，為基建

總額的百分之十六點四，完成了鐵路五千公里。隨著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加促了城鄉物資交流，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二 經濟結構與就業的困擾

然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亦暴露了很多經濟建設中的問題，茲討論如下：

(1) 農業的發展落後於工業，造成經濟發展的脫節

據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農業的興衰，對整個國民經濟有決定性之影響。毛澤東就曾指出，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所以極要注意，如果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然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為了爭取於短期內建立起中國的工業基礎，故不得不壓縮在農業方面的投資，在全部基本建設投資中，分配予農林水利者僅佔總投資額的七點六。

農業生產落後的結果，影響到輕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無法得到充份的供應、使輕工業設備無法充份利用。據《中共學習半月刊》指出，在五七年主要輕工業的設備利用率中，紡織工業約為百分之八十五、食糖工業約為百分之六十六、皮革工業約為百分之六十九等。此外，由於輕工業是政府獲取資金的重要途徑，輕工業不能充份發揮生產力，對整個工業的發展也造成阻礙。

從上述資料得知，由於工業所需的原料及市民所需的生活資料都是直接和間接地來自農業，故農業收成的好壞對工業部門的影響十分直接，假若今年收成好，明年的工業產量就會增加，反之就會減少。例如五二年棉花與糧食豐收，五三年的手工業和消費品工業就有所發展。五四年由於長江和淮河流域受水災影響而減產，就影響到五五年的工業增長率下降。五五年農業收成好轉，五六年的基建投資額就擴大了。由於在一五計劃後期的建設規模愈來愈大，工人數量及整體工資隨著增加，故所需要的物資供應與及消費物品也相應愈來愈多，此時假若物資追不上基建的需要，就會使基建過程的某些環節受阻滯而對其他部門產生連

鎖反應的影響，造成生產上的浪費。此外，假若消費品供應追不上人民購買力的增長，就會購成嚴重的通脹壓力及黑市的出現。中央政府為緩和供應緊張及物價上漲的壓力，遂加強控制消費，並嚴格實施統購統銷等配給制度，並減低政府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從而使農民的購買力降低，以達暫時的平衡。

（2）城市失業人口增加，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中國大陸經濟的一個特點，就是人口過多而資金不足，當時每年就業人口增加四百萬人以上，五年即新增勞動力二千萬人。此外，更由於在農村中推行了統購統銷糧食政策及一些過急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導致農業生產下降，其中一個結果就是大批農民湧入城市尋找工作。然而，由於城市裡的工業生產是採取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模式，能吸收的勞動力極為有限。在一九五五年，中國每一工人所需要配備的資金為六千八百三十五元，即需要投資七千多元才能創造一個就業機會。企業所能容納的勞動力十分少，再加上中國是一個二元化的經濟體系，現代先進的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絕然分開，中間沒有一些以勞動密集的中小形企業以作緩衝。此外，當時中央政府推行得過急、過快的社會主義改造亦構成失業加重，當時個體戶被迫取消而把小集體企業合併為大集體企業，這樣對就業產生很不良的影響，主要原因是同數額的資金，投入一些小型企業所能容納的就業人員要比投入大型企業所能容納的就業人員多出幾倍。

第一個五年計劃只能平均每年提供就業額一百三十萬人，只佔增加勞動力之三份一。為解決失業問題，政府於五六年不得不大量增加就業人數，以致機構過大，人浮於事，故又不得不於五七年推行上山下鄉運動，下放知識分子及幹部二千萬人到農村工作，而這又造成農村沉重的負荷。

註 輯

- 註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18—19頁
- 註 二 同上註，第184—5頁
- 註 三 金春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開明書店，一九九二年，第46—47頁
- 註 四 《東北日報》，一九五零年八月二日
- 註 五 《陳雲文選》（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235頁
- 註 六 同上註，第240頁

第八章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第一節 經濟建設過程中出現糧食短缺

據中國官方資料指出，一九五三年推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建國以來政府在成功穩定物價後的第二次大戰役，是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及工業化的重要政策。在中國這個人口多而落後的國家，要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糧食是十分重要的問題，若人民吃飯問題得不到保障，市場物價就難以平穩，社會秩序亦難以安定，經濟建設的目標也會落空。

在建國的頭幾年裡，糧食市場相當穩定，國家收購的糧食不但完全可以應付支出，而且還略有積餘。然而從五二年下旬到五三年十月的時間內，國家每月銷售糧食之數量，都大於當月的收購量，而且情況愈加嚴重。例如在五二年到五三年的糧食年度內，銷售大於收購的將近四份三，國家糧食庫存逐漸難以應付全國糧食的調劑和週轉的需要，出現這個現象可歸納為下列幾個原因：

- 一 隨著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城鎮人口劇增，糧食需求也隨之大量增加；
- 二 為了滿足工業建設對原料的需要，種植經濟作物的地區不斷擴大，這樣不單使糧食生產減少，更使吃商品糧的農民人數大幅增加（以往他們能自給自足的），國家負擔供應糧食的責任也加重。每年國家須掌握七百億斤商品糧，才能有把握地控制糧食市場，保持物價穩定，並滿足城市和農村人口的需要。
- 三 農民的生活質素不斷提高，需要較多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以作消費。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需要增長速度，超過了農業生產發展速度。
- 四 由於糧食市場有一部份是容許自由買賣的，故農民出售的糧食有一部份被私商買去，商人乘糧食短缺機會，違反國家糧食價格政策，用高價搶購糧食和各種原料，有些地方之私人收購價格超過國家規定牌價的百份之二十至三十。例如在北京市的糧食市場，過去平均

每天賣出大米十萬斤，但在缺糧期往往超過這數目幾倍，絕大部份是被私商套購，倒運到外地以牟取暴利。這種投機糧食活動，助長了農村餘糧戶儲存觀望，待高價而賣予私商，而不願把剩餘的糧食賣給國家。

基於缺糧情況嚴重，全國不少受災及糧食脫銷地區發生了混亂的情況。糧食販子大批活動，從事這種活動的，有的是農民，有的是小販，數量多達幾十萬人，他們主要收買糧食囤積，待高價售出以獲暴利。只要糧食一波動，搞糧食投機者的人數一晚上就可增加幾十萬，如果波動維持幾個月，糧販子就可增加幾百萬，這種情況反過來又助長了農民不肯賣糧的情緒。此外，地區與地區之間互相封鎖，也造成了糧食的搶購和抬價。（註一）

第二節 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

為了保證糧食供銷長期平衡，保障市場物價穩定，政務院副總理陳雲廣泛徵求各方意見，並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指出要解決糧食供銷問題，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國家與農民以及國家與糧食消費者的關係，如果解決好與農民的關係，能向農民收到糧食，則向消費者分配糧食就比較易辦。陳雲為解決這兩個主要問題，曾考慮多個方案，經過反覆比較，最後下了決心，向中央提出了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即「統購統銷」的建議。當時陳雲曾指出糧食不足會引起包括工資在內的價格全面上漲，國家各項支出便要相應增多，導致財政赤字，這樣政府的物價穩定政策就有丟掉的危險。解決以上危機之方法是在農村實行徵購，即硬性規定農民一定要按國家規定的價錢將糧食賣給政府。在以往，國家採取自由購買，即不強迫的方法向農民採購，但這種會使政府天天做「叫化子」，天天過「年三十」。然而，可以預見強迫徵購的方法會遭農民強烈的反對，故此，當時陳雲曾慨嘆道：

「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

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傢伙。」(註二)「現在只有兩種選擇，一個是實行徵購，一個是不實行徵購。如果不實行，糧食會出亂子，市場會亂；如果實行，農村里會出小亂子，甚至大亂子。我們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跟農民結成了緊密的關係，如果大家……把工作搞好，也許農村的亂子會出得小一點。」(註三)

陳雲提出統購統銷的政策後，立即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及鄧小平等的支持。五三年十月，黨中央作出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文件建議採用以下措施以解決糧食不足的危機：

- 一 在農村向餘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簡稱統購)；
- 二 對城市人民和農村缺糧人民，實行糧食計劃供應(簡稱統銷)的政策，這即是實行糧食配給；
- 三 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對私營糧食工商業進行嚴格管制，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
- 四 實行在中央統一管理之下，由中央與地方分工負責的糧食管理。

此外，中央亦對糧食徵購的時間、數量和方法，作出深入研究，在保證國家得到需要的同時，不購過多糧食，以免影響農民口糧。至於糧食價格問題，政府希望能訂出既對農民有利，對政府又不吃虧的公道價格。

五三年十一月，國務院向全國人民宣佈了糧食由國家統購統銷政策的具體規定，農民除繳納公糧外，凡餘糧戶須按照國家的價格將一定數量的餘糧賣給國家，不許私商再向農民買糧食。此外，國家按照一定的價格劃成分銷區，將糧食按時賣予缺糧的人，不准任何人囤積居奇及倒賣，這樣除可穩定物價及節約糧食，更可以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糧食統購統銷後，對棉花、紗布、食油等幾種人民生活必須的農產品和輕工業產品，也陸續採用了統購統銷的辦法。

第三節 統購統銷政策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在實施統購統銷政策時，由於政府向農民多購了農產品，以致農民

負擔過重。政府提出了一個定產及定購的口號，著令農民須接受官方所定的一個產量指標。通常這個產量指標都是不切實際地過高，而農民卻須按這個指標的產量的某一百份比將糧食賣給國家。在秋收後，縱使農民發覺沒有達到這指標，但也要按照官方的規定，以這個指標的產量為基礎、將糧食賣予政府。結果是農民自己只能留下很少的糧食。

更嚴重的，是政府的糧食銷售計劃，並不將產糧區農民包括在「定銷」計劃內，使到即使手頭有錢的農民也買不到糧食，導致很多地區都出現飢荒。例如在一九五四年的糧食年度，長江、淮河地區和河北省遭受水災，嚴重影響糧食計劃的完成，然而，政府收購糧食的計劃指標並無削減、並出現了幹部強迫農民交糧的現象。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向中央呈交的報告指出：

「幹部對還未按通知書向政府售糧的農民，隨便輕易地加上犯法、自發資本主義勢力等帽子，並普遍出現了命令主義的作風。如新會縣蓮溪鄉黨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綁了八、九個人，竟將合作社的生產隊長捆起來，由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秤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高要縣第九區均發生嚴重的吊打現象，群眾反映『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厲害』，全省因購糧問題而自殺者111人。」(大略)(註四)

全國政協委員彭一湖在五五年四月下旬呈國務院的信件中，亦反映了其家鄉所在的湖南省東部地區農村的情況：一、農民留糧點過低，致使農民吃不飽，體力不足，農民無力養豬，副業也受到打擊。二、農地定產量過高，使農民留糧進一步減少。三、區鄉幹部作風問題。區鄉幹部為完成糧食統購任務，往往用強迫命令方式執行。(註五)《人民日報》編輯室於五五年七月編印的《人民日報情況》亦指出：山西省和順、昔陽兩縣農民缺糧情況十分嚴重，不少農民放棄了生產，成群結隊到外地投親或行乞，有的地方已出現賣兒賣女、離婚棄家等現象。(註六)

在糧食供應中，也出現了供應偏少或偏多的現象。城市管理偏寬，造成嚴重浪費，使國家糧食銷售量出現不正常的上升。出現上述原因，除了行政失誤，亦是農民根本不習慣統購統銷的方法，他們雖然把糧食

賣給國家，但又希望自由處理餘糧，故他們便採取了買回糧食的方法。一些排隊爭購糧食的農民並非缺糧戶，他們排隊的目的是裝作缺糧，避免政府再向他們購買糧食。在五五年春，又出現了糧食不足的局面，「許多地方幾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農民有意見，黨內外也有很多意見。」（註七）

此外，由於在推行統購統銷政策的同時，政府又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民感到十分焦慮，這種情緒與他們害怕其耕地被歸公的顧慮連結在一起，出現了不利生產的現象，再加上當時農業生產合作社管理不健全，農民擔心增產無望，加之春耕後農業又處於青黃不接時期，農民對政府統購的數量又摸不清，故此，農村形勢日趨緊張。為了穩定農民情緒及鼓勵他們繼續參與農業合作化運動，毛澤東召見了在農村工作的幹部，建議他們壓低徵購糧食的數量，指出這是一個讓步：

「糧食上減少一點，換來一個社會主義。」（意即希望通過壓低向農民徵購糧食數量，減輕農民負擔，從而使農民對農業合作化不致過份抗拒。）毛澤東當時更指出：「糧食定產要低於實產，要使農民多留一點，多吃一點，多喂一點，多自由一點，做到『人不叫、豬不叫、牲口不叫』。這就是『四多三不叫』。」（註八）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迅速佈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糧食「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以穩定農民情緒，緩和農村緊張氣氛。此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下列數點：

- 一 規定五五年七月到五六六年六月這個糧食年度內徵購糧食的數字為八百六十五億斤，這個數字三年不變；
- 二 要求各級政府對農民每畝田地的糧產量必須估得準確，定產時不准超過實際產量；按照各地現有的消費水平規定留糧標準，留糧必須留夠，並不購買農民的全部餘糧；
- 三 把農村的餘糧戶、自給戶、缺糧戶三種戶劃分清楚，允許自給戶、缺糧戶將賣出的糧食，照數買回；

四 在城市中採取必要措施，整頓糧食銷售工作，減少浪費，壓縮所有不應售出的糧食。

以上實務的政策，安定了農民情緒，使統購統銷政策成為長期的制度。

第四節 解決豬肉、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供應緊張的辦法

五四年六月後，全國生豬生產呈現下降趨勢，而另一方面，由於就業人數增加，城鄉人民購買力不斷提高，對豬肉及蔬菜等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供應不足引起市民普遍不滿，有些市民要半夜就去排隊，排到天亮。而在大中城市和工礦區中的蔬菜的供應出現問題。

當時負責解決上述困難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指出，豬肉供應不足主因是生產不夠。為了增加豬的生產，應增加豬飼料的生產和供應，並提高豬肉的收購價格以鼓勵農民養豬，使養豬成為一項普遍的家庭副業。至於蔬菜問題的主要關鍵是供應方法問題，蔬菜由於季節性強，容易霉爛，故適宜當地生產及當地銷售，不宜長途調運，對它不能統購包銷。此外，生產者和消費者應直接見面，中間環節減至最低，在價格上並容許一定靈活性，避免菜價賤傷農。

第五節 對統購統銷政策的評論

「統購統銷」政策的本質，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強制性的定額與限定價格的收購政策，與政府在同時間推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互相配合，將農民的部分積累向政府集中，變成國家的積累，從而使政府能集中物力、財力，推行「一五」計劃中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是項政策並對保障城市的糧食供給及穩定物價起積極作用。

此制度的弊病在於政府為向農民拿取更多產品以支援工業建設，往往徵購過量，農民承受的剪刀差（指工業品與農產品價格比例的差距，政府往往將工業品價格不合理的人為提高，以獲取更多農產品）負擔越

來越重，影響農民生活並打擊他們的生產情緒。此外，完全依賴行政手段執行的「統購統銷」制度亦限制了價格規律在農業生產中起作用，使農產品生產不能適合市場需要，並影響工商企業經濟核算的實施（因這些企業的成本不取決於反映農業市場實況的價格）。再者，隨著種糧成本增加，但銷售價格不能變的「倒掛」現象普遍的出現，政府為保證農民經營不致虧本而對農戶作出大量價格補貼，這又造成國家財政出現沉重的負擔。

統購統銷制度實際上實施了三十二年，直至一九八五年國家推行「糧棉合同定購制度」才基本取消。政府得以改變統購統銷制度，在於一九七八年後中央推行務實的農村政策，糧棉連續六年豐收，農產品大幅增加，在農產品供應充沛的前提下，政府才敢放鬆「統購統銷」的行政措施，採取較靈活的制度收購農產品，以供應城市的需要。

然而，值得留意的，就是當中國出現缺糧的形勢時，政府為保證城市或缺糧區居民的基本食糧以及物價穩定，往往重新採取統購政策作為權宜措施，避免糧價猛烈波動，這情況在一九九四年曾經出現，但政府卻基於市場經濟規律，一俟經濟形勢有所好轉時便將「統購」政策予以取消。

註 釋

- 註 一 《陳雲文選》(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203頁
- 註 二 同上註，第207頁
- 註 三 同上註，第210頁
- 註 四 林蘊暉等《凱歌行進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536—537頁
- 註 五 林序平等著《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華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449—450頁
- 註 六 同上註
- 註 七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273頁
- 註 八 同註五，第451頁

第九章 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導 言

一九五二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曾指出在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要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一節中，將集中討論農業改造情況，而在下兩章，將分析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的改造問題。

第一節 土地改革後農村情況及推行農業合作化的原因

有些歷史學家曾批評中共推行土改只不過是一場騙局，目的在製造農村的階級鬥爭，屠殺地主，使農民手染血污而不得不跟共產黨走，此後便立刻推行農業集體化運動，將農民從土改所分得的田地沒收，違背了當初承諾的耕者有其田，將農民完全受制於共產黨的統治。其實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農業合作化實基於土地改革後農村情況的變化而推行的。

一 階級分化在農村中重現

土改後，農村出現了中農化的局面，這主要是把地主之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分給了無地、少地的農民，同時富農的經濟地位也下降了。然而，中農化畢竟只是暫時過渡現象，若容許農村經濟自然發展下去，由於個別農民對土地的擁有並不是絕對的平均，農民對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佔有之差別更大，再加上農村農戶的勞動力強弱也不同，所需養活的人口及其他負擔等也有區別，農民作為小商品的生產者，總須依賴市場銷售其農作物，並依賴信貸以作資金周轉，自發地發展下去，階級分化難以避免。

據中共山西省委於一九五一年四月的報告指出：

「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民自發力量……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的最根本原因。」(註一) 中共東北局亦指出：「農民思想上……邁向單幹的路，這也是必然的。」(註二)

在五二年以後，農村中放高利貸者逐漸活躍，富農和富裕中農僱工情況逐年增長，土地出租情況不斷增加，而最重要的，則是土地買賣情況日益嚴重。五二年九月，華北局指出，中國農村的自發資本主義表現在「農村僱佣勞動債務剝削，土地買賣，租佃和典當，均有了相當的發展」，而據山東省於一九五二年對十九個縣內八個鄉和四十一個村的調查，發覺「在土地改革後，有十份之一的農戶曾出賣土地，有十份之一的農戶買進土地。貧農賣地最多，其中因生活困難、婚、喪、病和缺乏勞力賣地者佔賣地戶數的百份之六十一，而買地者中以富農為最多。」(註三)

在生產資料集中的基礎上，有一部份富裕農民變成了富農。據黑龍江省克山、海倫、肇源三縣五個村的調查，一九五二年，新富農佔總農戶的百分之三，其耕地佔耕地總數百分之四，耕畜佔百分之十，農具佔百分之七。這些富農不僅僱工經營，而且在農村放高利貸，用種種方法剝削經濟條件較差的農民。假若容許農村兩極分化下斷發展，貧農將失去生產資料，走向破產邊緣。因此，走農業互助合作化的道路，是貧下中農避免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再產生兩極分化的客觀要求。

二 小農經濟難以發展，不能改善農民本身的生活

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其所佔有的生產資料非常單薄，就全國來說，每戶佔有的耕地平均不足五畝，且耕畜不足，農具缺乏。這狀況表明，中國的個體農民之生產規模十分小，生產資料異常薄弱，一年勞動的成果，除扣除交納農業稅及扣除補償生產資料的消耗外，絕大部份用於全家人的消費，根本不能積累資金以擴大生產，遇到天災、疾病、喪亡等事，則連簡單的繼續生產也難以維持，再加上農村人口增加，對個人平均消費構成很大壓

力，在農業生產力不能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必定會降低農民的生活水準。

此外，由於生產規模小，佔有的耕地少而分散，故此當時根本不能採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的耕種技術。當然，以小農經濟有限的購買力也根本承受不了任何較為大之投資，即使富農買了耕具，也出現了操作等技術問題，他們往往由於缺乏知識技術，不懂得如何操作農業機械。此外，由於個體農戶的土地私有，稍具規模的水利建設也由於資金不足及農民怕修好的水道霸佔自己的耕地，而結果往往修不成。

當然，造成農業生產率低的原因也是由於國家在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著眼於建造國民經濟基礎的重工業，而對農村的投資不到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十。此外，農民須向國家繳交頗重的農稅，以及在統購統銷政策下，他們須按一個較低的價錢將農作物賣予國家，這些也是造成農村生活水準不能改善的原因。基於上述情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初期很多農民由於生活困難，造成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情況，構成城市更嚴重的失業問題。

發展農村生產是改進上述困難的唯一方法，在中國資金短缺、工業基礎薄弱的客觀條件下，根本不能生產大量農業機械(就算有也不適合小塊的上地所有者)，故此只有依靠農業生產方式的改革，以簡單協作的合作勞動以提高農業生產率。毛澤東曾指出：

「一般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體農民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勞動之中，那麼全邊區的生產力就可提高百份之五十到百份之百。」(註四)

三 小農經濟生產與工業化的矛盾

(1) 農業與工業的關係

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工業發展極需農業的支持，這表現於下列方面：

1. 提供原料

工業所需的原料，一部份是由農業提供的，例如紡織工業所需的棉花，建築業所須的水泥與木材，食品業的肉類和蔬菜等；

2. 提供市場

農業對工業產品的需要可分為兩類，分別是對日用輕工業消費品及農用產品如各種農業機械與化肥等。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民購買力增強，對上述工業產品的需求就愈大，為工業提供了廣大的農村市場；

3. 提供資金

這包括通過對農民的稅收，以及國家規定的以較低的價錢向農民購買之農產品，或是發展農產品的出口以增加工業所需的外匯。此外亦可鼓勵農民儲蓄，使農民的剩餘金融資產通過儲蓄的形式轉化為工業投資之資金，以協助工業的發展。

由於農業對經濟的重要性，假若其發展緩慢的話，一定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一九五二年中國農業豐收，五三年工業增長了百分之三十點二，五三及五四年農業生產增長速度下降，工業生產增長速度亦隨之而下降，這是因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開工不足。僅棉紗、棉布、卷煙及麻袋這四種產品的減少，就使全國工業增長速度降低百分之四。（註五）

（2）小農經濟不能適應加速的工業化之發展

1. 隨著五年計劃的開展而建設了多間新工廠及招聘新職，這一切皆使社會的購買力出現增長。此外，在農村中工業原料作物種植地區也擴大，農民由於生活改善，需要的餘糧增多，也使糧食的供應量減少。基於供不應求的關係，國家於推行五年計劃的同時，開展了對糧食及其他主要物品的統購統銷政策。這點在上面已詳細分析，然而這，亦可間接反映出農業對工業發展的制約關係；

2. 在小農經濟佔優勢的情況下，新式農具，農業機械，化學肥料等工業產品不可能有廣闊的農村市場。農民的小塊土地亦根本不適宜採取先進的技術，更遑論農民根本沒有運用這些先進機械的知識。
3. 在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的小農經濟下，農民根本拿不出較多的農業品交換輕工業品，也沒有足夠的購買力，這不但影響輕工業的發展，落後的農業也不利於國家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資金。

四 推行農業集體化的好處

推行農業集體化的好處，可以簡單歸納為發展農業生產、支援工業；及平均財富、避免階級重新分化等兩個方面。

(1) 發展農業生產，並支援工業

通過農業生產方式的組織改革，廣泛利用簡單的協作勞動，可以使農村在農閑時間時能夠調動季節性的剩餘勞動力去協助進行一些集體組織之工作，例如進行興建灌溉工程，如小堤霸、水塘、井、運河及水渠等，此外並能開墾農地及大規模的植樹以保養土質。以上兩項工作都是個體農戶無法單獨完成的，而只有在集體化的農業組織下才能調動足夠的人手有系統地完成。第二個效益就是集體化農業組織能將個別農民所擁有的儲蓄集中起來，而成為生產性的資金以購買擴大生產所需的農具及藥品，增加農業的收成。最後，合作化經濟組織能更有系統地管理農業，改變個別農民的生產為大規模的生產，有效地因地制宜，種植各種不同需要的農作物。

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曾總結地指出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不可分離的原則，他力主加速農業合作化以和工業化相適應：首先，毛澤東指出來自農村的商品用糧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甚低，遠遠趕不上不斷增長之工業化的需要，他說：

「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於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底之間的矛盾。」(註六)

其次，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份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國家發展農民所需要的大量輕工業生產，拿這些輕工業出品去同農民交換，這樣既可滿足了農民和國家的互相需要，更可為國家積累資金。

第三，就是只有合作化的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以前「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註七)，來購買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械、化學肥料及運輸工具。最後，更為直接的就是重工業部門所生產的農業機械，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註八)

基於上述考慮，毛澤東總結地指出，由於中國工業基礎薄弱，國家不可能有財力在很短的時間內用很多農業機器把農業裝備起來，故只有先實行農業合作化，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以農業支援國家工業化，然後才能在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步實現農業本身的機械化。

(2) 避免農村階級重新分化，並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鋪路

在農業集體化發展至較高階段的時候，實現了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化，而將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扣除了農業稅、生產基金、公積金以外，乃作為社員的勞動報酬，按勞分配，這就避免了土地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兩極分化的可能。

毛澤東曾指出當時的政府有兩個聯盟，一個是同農民的聯盟，一個是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政府利用同資產階級的聯盟，得到更多工業品以換取農產品，同時，利用同農民的聯盟，取得糧食和原料去控制資產階

級，資產階級希望得到原料，就得把工業品按國家的價格賣給國家，若他們不跟隨國家的政策，則斷絕其原材料來源，這樣就把資產階級要搞自由市場、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銷售工業品這一條資本主義道路制住了，並使他們不得不接受國家的計劃。

第二節 農業合作化中幾個過渡性的經濟體制模式

由於農民具有濃厚的私有觀念，故要他們走上合作化道路，放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私人擁有權，變成集體經濟無疑十分困難，故此中國政府就採用漸進方式，經過幾種過渡性的經濟形式，由農業生產互助組發展為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一 互助組

黨中央在五三年二月發出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組合作的決議〉，通過互助組的組織形式開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互助組是在個體經營的基礎上，通過勞動力和農具、耕畜的交換使用來進行集體勞動。就是說，農民在擁有土地的基礎上使用別人的勞動力和其他的生產資料，他自己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也要在別的農戶的土地上被使用。它最初只是在播種、收割等農忙季節進行互助，其後又進一步發展為常年互助組。臨時的互助組完全不觸動私有制，常年互助組則可視乎需要而設置一些公有的農具、耕畜及少量的公共財產。

互助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勞動力、牲畜和農具不足的困難，依靠集體力量進行生產，能迅速地提高生產效率，並可限制農村中僱用勞動及土地買賣等發展，因為在互助組中，貧苦農民依靠集體勞動以克服他們在生產上的困難，避免受到富農的剝削。

二 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黨中央制定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決議指出在推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同時，要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以土地、牲畜和大農具等入股，統一經營，歸合作社統一集中使用，並進行集體勞動。合作社的收入在扣

除賦稅、公積金及公益金後，其餘部份按勞動報酬、土地報酬、其他生產資料報酬等項在社員個人間進行分配。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對農戶的財產如土地、耕畜和大農具等生產資料給予相當的報酬，適應了農民的私有觀念，並照顧到貧農、中農尤其是富裕中農在經濟情況上的差別。

據中國政府分析，初級農業合作社有很大的優越性，如在土地統一經營的基礎上，能夠因地制宜，進行合理的、有計劃的分工分業勞動。集中經營可更好的利用新農業技術，擴大農業生產，更好地發展農副業。由於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夠逐步地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因而也能在供、產、銷方面更容易和國營經濟結合，使農村經濟逐步地納入國家經濟計劃的軌道。

三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在五五年六月時，全國已有高級社五百個。與初級社不同，高級社的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已不歸個別農民所有，而變成了合作社的公有財產，社員只保留小塊土地、零星樹木、家禽、小工具及生活資料等私有財產。在產品分配上，已取消了按照社員入股的生產料進行分配的原則，土地、耕畜和農具的報酬不復存在。合作社的總產品，在補償了生產資料的消耗後，除了用於向國家納稅和扣除公積金、公益金外，全部按照社員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政府指出取消了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報酬，實行單純按勞分配的原則，能進一步發揮社員的勞動積極性，使勞動生產率更為提高，增加生產及社員收入。

第三節 農業合作社的兩次冒進與共產黨內激烈的爭論

一 組織合作社的第一次冒進（五二年底——五三年）

(1) 農業合作化的開展

中國的農業合作社在四九年十月展開，在開始時，以互助社為主，

並試辦初級形式的合作社。

五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並指出：在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必須堅持自願互利原則，採取典型示範，逐步推廣的方法，由小到大，由少至多，由低級到高級，要反對強迫命令和放任自流這兩種錯誤傾向。(註九)

到五二年底，加入互助組的農戶佔全國總農戶的百分之四十，而加入初級社的有三千六百戶，佔全國農戶的百分之一。

(2) 農村整黨及互助合作運動中的急躁冒進

五二年八至九月期間，中共召開第二次互助合作會議，處理農業事務的重要官員指出：「與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的鬥爭，仍須加強。」(註十)

五二年秋天，中共開始在農村整黨，重點在加強農村黨員的教育。整肅敵對分子，並明確強調農業經濟發展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而在某些地區，農村整黨還同時批判了在互助合作中的右傾思想。

從五二年冬開始，互助合作運動中出現急躁冒進，一些地方領導人為了多建合作化程度較高的「農業合作社」，而拆散了互助組，並強迫農民入社，耕牛農具一律折價歸公，這些領導人認為合作社應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註十一)例如在五區堤上的兩個社，發展社員時在街上擺了兩張桌子，村幹部向群眾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你走哪條……誰要不參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註十二)

此外，追求公共財產的現象亦極為嚴重，「如長治專區新建的千餘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中，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將牲口、農具等全部歸社公有的，有的甚至連棺木壽材，老羊皮襖也歸了社。」(註十三)上述過左措施，導致農民產生極大恐懼，不少農民為保護自己利益，加速賣土地、賣畜牲、宰殺牲畜及伐樹，避免自己的財產被充公入「農業合作社」。

(3) 鄧子恢穩步前進、糾正冒進的建社方針

針對農村的混亂情況，中共農村工作部在五三年四月召開第一次農

村工作會議，中共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在會上批評了急躁冒進的建社傾向，鄧實事求是的指出要改變農村貧困的面貌，唯一的辦法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然而為了引導農民走向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則必須經過互助組和初級社的形式，為將來的集體化和機械化準備好群眾、幹部條件，并積累經驗。故此，鄧子恢認為：

「互助合作是走向集體化的不可逾越的過渡形式，不能跳過這一關。」(註十四)此外，他並嚴正地指出：「今天在全國範圍來說，急躁冒進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險。」「互助合作運動必須採取穩步前進的方針，絕不能操之過急。」(註十五)

經過農村工作部的大量工作，各地在組織農民互助合作中的盲目冒進偏向，在五三年六月已經基本上得到糾正。

（4）毛澤東批評農村工作部解散不應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五三年春糾正冒進建社的偏向後，一些幹部又對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在一條件成熟的地方亦不敢放膽發展互助合作組織。

對此，一向堅持加速合作化程度的毛澤東表示十分不滿，五三年十月、十一月間，他在第三次農業合作會議中兩次批評農村工作部，毛澤東指出：

「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會去佔領……如果不搞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勢必要泛濫起來。」(註十六)十一月四日，毛澤東再次批評農村工作部，「糾正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吧，吹下去了，吹倒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註十七)

是次會議及毛澤東的發言，使中國農業合作運動從發展互助組轉變為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

二 五四、五五年合作社發展的冒進與黨內激烈的論爭

繼五三年底毛澤東批評農村工作部後，五五年中，中共內部又在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的問題上再次發生激辯，與五三年的情況類似，毛澤東在五五年中對鄧子恢再作猛烈抨擊，指他在五四、五五年合作化運動中作出悲觀主義的估計，對農業生產合作社採取了堅決收縮的「右傾方針」。是次爭論，集中反映在兩個問題上，這分別是第一，對五四、五五年合作社發展中出現冒進的處理方法；第二，是大發展抑或是小發展的問題，即對一九五六年度發展合作社數量的釐定。

是次論爭實際上屬於執行工作中具體方法的分歧，而不是根本指導方針上要不要搞合作社的問題，然而，毛澤東卻把此爭論提升至階級鬥爭的高度，使黨內民主辯論氣氛受到不利影響。

(1) 〈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的提出及其間出現的問題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大張旗鼓的宣傳〈總路線〉聲中，黨中央在毛澤東的建議下，通過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決議總結了兩年來各地農業生產互助組合作運動的經驗，提出了辦合作社的十大優越性和辦好合作社的經驗，為各地大力發展合作社提出了明確的方針和辦法。文件以毛澤東的階級觀點分析農村經濟發展的可能趨向，指出土改後農民在生產中所表現的「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和「個體經濟積極性」，實是反映了農民本身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的雙重性質，前者表現出農民可以走向社會主義，後者表現出農民的自發趨向是資本主義，這就不可避免地在農村中產生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發展道路的鬥爭。如果我們對於互助合作運動採取消極的放任自流態度，安於小農經濟的現狀，那就一定會發展到放棄社會主義在農村的陣地，幫助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生長。

在決議通過後，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全國發展得很快，參加互助合作組織的農戶，由五三年的百分之三十九點五，上升到百分之六十點三。合作社由五三年的一萬四千個發展到十萬個，這些合作社大都是增產

的，但是在合作社大發展的過程中，有些地區出現急躁冒進的傾向，主要表現在下列兩個方面：

1. 合作社數量發展過速

這情況與五三年初的情況甚為類似，不少幹部以強迫入社的手段把不自願的農民強拉入合作社內，使富農及中農甚為反感，因為他們的生產水平高，要他們參加合作社，和他平分，他就不幹(註十八)。為強迫農民入社，一些幹部強調「單幹就是犯法」，「不入社就是資本主義」。中國在五四年亦進行統購統銷政策，有些地方在定產量時，把個體農民的產量定得比合作社高，使個體農民吃虧，要多納糧食，這些個體農民為免要交納過多糧食，只好主動要求入社。後來這些農民說出他們要求入社的真實背景：

「同志，我對你說老實話，那時我是為了購糧這一關。你說這是強迫還是自願！」「另外，有些地方清算富農，是殺雞給猴子看，他對富農砍一刀，叫中農看，你說這不是強迫！」(註十九)

此外，有的社過早地將農民的生產資料折價歸公，折價偏低，侵犯了中農和富農利益。農民的投資又無利息，果樹、桑樹等入社又無報酬。

2. 統購統銷中多購糧食，使農民口糧不夠

政府在五四年的統購統銷中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影響農民的留糧，導致農村關係全面緊張。(這情況在統購統銷一章中已作詳細討論。)

3. 影響——生產力遭破壞，農民大量出賣和宰屠牲畜

農民為免自己的財產被無償或低價充公，紛紛大批宰殺及爭取時間出賣牲畜，致使各地牲口價格普遍大幅下降。牲畜被大量屠宰和出賣，農民不願飼養牲口，對農村生產力產生極大的破壞。

此外，在過速公有化的陰影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為降低，如五四年春耕生產資料準備很差，農民不願添加及維修農具，而水利、治蟲等計劃亦無法完成，農民出勤率亦大為降低。

再者，農民出現了不滿的情緒，他們埋怨「共產黨變了面」；「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等。群眾見了幹部就走開，區幹部也不相信農民，對農民動輒批判，幹部亦不敢將農民的憂慮向上反映。(註二十)在上述情況下，毛澤東在五五年上旬亦得承認合作化出了不少亂子。

(2) 整頓收縮工作的推行

黨中央專責處理農業的領導人鄧子恢十分重現各地發生的急躁冒進偏向，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糾正。五五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合作化運動應進入控制發展、著重鞏固的階段，要求：第一，凡完成發展計劃的地區，停止發展，全力轉向鞏固；第二，計劃還未完成的地區，在鞏固中繼續發展，計劃過高的要適當收縮；第三，條件不具備的社要進行整頓。三月廿六日，毛澤東找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鄧子恢、廖魯言等談話，支持中央農村工作部糾正冒進的措施，毛澤東提出生產關係(即合作化的發展)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毛并提出了「停止發展、實行收縮、適當發展」的「停、縮、發」三字方針。(註廿一)

為糾正合作化運動在發展中的急躁冒進偏向，在這段期間，黨中央農村工作部進行了幾項主要工作，以搞好合作社的整頓：

1. 解散不成熟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當時浙江省的問題較為突出，合作社發展的速度十分快，由五四年三千三百個發展到五萬五千個，驟然增加十六倍，當地中農憤而殺豬、賣牛及砍樹，加上中央政府購了額外的糧食，造成農民糧食不足，貧農不滿，農村形勢十分緊張。鄧子恢建議浙江省的合作社停止發展，並作收縮，當時浙江省委副書記林乎加一口氣解散了一萬五千個社。

一九五五年，在一次毛澤東缺席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鄧子恢提出了鞏固合作社之方案，要求把條件不夠而搞起的合作社解散，鄧的建

議獲得通過，政府一連解散了二十萬個不成熟的農業合作社。這個穩步前進的方針，得到大多數地方領導支持，例如廣東省委領導人陶鑄就認為合作化速度不能過快，認為廣東群眾覺悟程度不及一些解放已很久的老區。而內蒙古的烏蘭夫在後來的檢討中承認當時「因為沒有從階級關係上來分析，過份地強調了辦合作社的困難」，這亦從側面反映出地方幹部對過速發展合作社的抗拒情緒。中央在五五年春發佈了全力整頓鞏固，秋前停止發展，秋後再看的指示後，各地便大力開展壓縮建社計劃。更有甚者，有些幹部批評由國家貸款而搞起來的自發合作社社員為「老發」，罵他們是投機分子，很多有實際經驗的農村基層幹部認為合作社之所以有急速的發展，並非農民真正的支持合作社運動，而是由於貧下中農中的「老發」和投機分子貪圖合作社的基金和國家對合作社建設的基本貸款。

2 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統一思想與部署

是次會議分析了五四年合作化運動的形勢，同意成績是主要的。但存在著三個嚴重問題：一是發展六十萬個社的計劃太大了，原因是對農民的主觀參社願望估計得過高，把辦好社看得太過容易。二是政策上違反了自願互利原則，在土地評產、土地勞力分紅比例、耕畜樹木入社等問題上侵犯了中農的利益。三是不走群眾路線，不少以貧農為骨幹辦起來的社，為解決生產困難，硬拉中農入社，侵犯了中農利益，以致農村中出現砍樹、殺牛等破壞生產的現象。

根據上述情況，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今後的總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這主要是全面停止發展，秋後再看情況而定，並全力鞏固可鞏固的社，而發展過大的，應進行收縮，務求糾正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增加生產並緩和緊張的農村形勢。當時，毛澤東是支持農村工作部這個決定的。（註二十二）

3 統籌安排好一九五五至五六年度合作社的發展計劃

這主要是研究下一年度合作社發展的速度，中央農村工作部考慮到

當時鞏固已成立的合作社的任務已異常繁重，主張發展的速度稍為慢一點，並認為五五至五六年是打基礎的一年，假若基礎搞得扎實，優越性就能顯示出來，對將來發展合作化的影響十分大。

在這背景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中定了四條政策：

- i. 「要求一般停止發展，原來我們說今年秋天停止下來，以後主席（指毛澤東）說乾脆就停止下來，到明年秋後再看，停止一年半。」
- ii. 「立即抓生產，全力鞏固。」
- iii. 「少數的省要適當的收縮。」
- iv. 「把互助組辦好，整頓好，照顧個體農民。」（註二十三）

(3) 五月的變化——毛澤東對穩健派的抨擊及農業合作化的加速進行

1 五月的變化

在五五年五月以前，毛澤東對鄧子恢及農村工作部反映的農村情況是深信不疑的（註二十四），故此，毛澤東對鄧子恢等提倡解散部份不成熟的合作社，以及在將來發展合作社時需穩步前進的觀點表示大力支持。

然而，毛澤東的態度在五五年五月發生明顯的變化。促使毛澤東思想改變的原因，是由於毛在同年四、五月間在外出視察時，發覺農村的形勢並非如農村工作部匯報的那樣壞。毛澤東曾指出：

「說農民生產消極，那只是少數部份的。我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所謂缺糧，大部份是虛假的，是地主、富農以及富裕中農的叫囂」，是「資產階級借口糧食問題向我們進攻」，農村工作部反映部份合作社辦不下去，是「發謠風」。（註二十五）

五五年三、四月間，中央陸續收到材料，說明所謂缺糧並不是真缺糧，「有些戶本可自給自足，看到別人向國家買糧食，自己也跟著喊糧食不夠。有些戶本來有餘糧，只為害怕別人批評自己售糧太多或前來借糧，故意和別人一起喊叫缺糧。」（註二十六）由於以上這些材料，加上實地

視察，使毛澤東得出缺糧情況並不真實的判斷。

而更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柯慶施向毛澤東提出，說他經過調查、縣、區、鄉三級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願意搞社會主義。柯慶施的話隨即使毛澤東聯想到：這種「不願意搞社會主義」的人，下面有，省裡有，中央機關幹部中也有。(註二十七)

2 毛澤東對鄧子恢及農村工作部的抨擊

毛澤東態度的改觀促使他對以鄧子恢為首的穩健派的砍社行動作出重新評價，他在五五年五月十七日的十五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積極發展合作化的精神。重申了「停、縮、發」的三字方針，但著意強調要「發」，他說：

「縮有全縮，有半縮，有多縮，有少縮。社員一定要退社，那有什麼辦法。縮必須按實際情況。片面的縮，勢必損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後解放區就是要發，不是停，不是縮，基本上是發；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發」。(註二十八)

至於合作化發展的速度，毛澤東與鄧子恢圍繞者五五、五六年度合作社數目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鄧子恢堅持經政治局曾批准的中央農村工作部建議的翻半番(即增加百分之五十)的主張，但毛澤東卻認為這數字太少，主張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一倍，即翻一番，增加一倍。在這期間，毛澤東調了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文件檔案，從路線及方針上進行檢查，得到的結論是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幹部思想右傾了，對合作化不積極。

七月廿九日，毛澤東指出(大略)：

- i. 在發展合作社問題上，現時並非批評冒進，而是批評不進的問題；
- ii. 在改變所有制的問題上，只要合作社能增產，入社時小小的不公道，可以就算了；
- iii. 要堅定方向，不要動搖。(註二十九)

在這期間，黨中央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一個是在七月三十一日召開的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一個是在十月召開的黨七屆六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和〈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階級鬥爭〉兩份重要文件，毛澤東的堅持與表態頓使整個形勢為之改觀。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開始就強調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註三十)毛澤東指出，這種態度是合作化運動的錯誤方針，正確的方針應是積極地、熱情地和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在十月的七屆六中全會及在十二月出版的由毛澤東編輯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和按語中，毛澤東對穩健派的攻擊更加猛烈，他批評五六年砍社行動是烏煙瘴氣，陰霾滿天，痛斥鄧子恢及中央農村工作部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甚至把這場爭論，說成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決戰。此外，在七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所提交的〈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中，毛澤東批評了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觀點，「沒有農業機器能不能辦社的問題，一定要有機器才可以辦社的空氣現在不大了，可能也還有這個觀點。這一條迷信也是能夠完全破除的。」(註三十一)毛澤東並大力讚揚了河北安平縣三戶貧農，指出他們不顧三戶老中農退了社，而繼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堅定性，「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

3 加速發展合作化

在毛澤東批判穩健派以後，中共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便三易合作化的發展計劃。在五六年七月〈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設想以五年時間完成初級農業合作化，高級農業合作化於六零年以後才再開展，然而，在同年十月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中所通過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中央決定在三年內，即於一九五八年在多數地區完成初級合作化。至十二月中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又提出只需一

九五六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而在六零年基本實現高級合作化。這幾個月中，全國加入合作社農民之數字，一直作幾何級數的上升，就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其草擬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達到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又要求合作基礎較好並已經辦了一批高級社的地區，在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其他地區則於一九五八年基本上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六月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只佔總農戶的百分之十四點二，在上述指示下達後，到一九五六一年一月，就猛增到佔總農戶的百分之八十點三，基本實現了初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初轉入辦高級社以後，到五月份就有一半農戶加入高級社，年底達到了百分之八十點七，基本實現了高級合作化。

伴隨著「高潮」而來的是幹部強迫命令作風，各個系統的幹部都不願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往往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佈置工作，要求得很急。由於形勢發展太快，辦社工作根本跟不上，在將農民的生產資料歸公時，又再一次不執行自願互利的原則，對耕畜、大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折價偏低，償還時間過長，甚至不兌現，折價成為一紙空文，大大損害了中農的利益，有的地方甚至把不肯入社的農民集中起來「訓練」，不准回家吃飯睡覺，並強迫農民交出土地證，答應入社才能回家。此外，由於興辦高級社時間過促，社內的勞動組織、生產責任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沒有建立起來，經營管理十分混亂。更為甚者，就是在推行高級合作社時，並不是區別情況，因地制宜，在一些人口分散的山區，經濟落後的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一概用一個模式、一個速度的方法組成高級社，大大打擊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這個後果在生產上開始反映出來，從五六年後，糧食、棉花、生豬、水牛的生產呈現下降趨勢。

更為諷刺者，就是在面對眾多的問題時，中央不但沒有正視合作化進行過速，反而要加快推行公有化。在一年後，即一九五八年，更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中國農村元氣大傷，並種下了日後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第四節 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幾點總結

一 農業合作化打破歷史上「皇朝——農民戰爭循環」規律

就整個中國的社會發展史而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意義十分重大。在土地改革基礎上採取打鐵趁熱的方針推行互助合作運動，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貧下中農生產及生活的困難，避免農村兩極分化，更使中國跳出控制其發展長達二千年的「皇朝——農民戰爭循環」的歷史規律。

中國從秦朝開始，政府便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商人、官吏、高利貸者利用各種手段吞併土地，成為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在土地集中、貧富嚴重分化的情況下，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導致了推翻舊皇朝的農民戰爭。新皇朝往往依然如故，繼續容許土地自由買賣，過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開始了土地兼併的過程，而需要另一場農民戰爭以作解決。中國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周而復始，形成了「皇朝——農民戰爭循環」的局面。

中共在土改後土地開始出現兼併，而富農力量尚未上升的情況下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本質就是消滅中國自從秦朝以來的土地私有制度，使中國從以土地私有制為前提的「皇朝——農民戰爭循環」的歷史規律中跳出來，走上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這個消滅土地私有制的運動中，時間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熟悉蘇聯農業集體化歷史的中國領導人深知，假若不是在土改後便立刻進行合作社的話，則會使農村中的富農有足夠的時間發展從而鞏固其力量，這樣在以後推行合作化運動時便會遭受他們極大的反抗。在一九三零年蘇聯推行農業集體化期間，為了防止富農的抵抗，政府容許地方政權有權將反抗的富農流放到很遠的地方去，在此數年間，被殺及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農民甚多，土地無人耕種，牲畜被大量屠宰，農業生產受到災難性的破壞。故此在中國領導人看來，在富農力量尚未上升時便推行農業合作化，實是防止以後農村生產力遭受嚴重破壞的一項正確策略。

二 農業合作化——中國推行工業化的前題

要正確及全面評價農業合作化運動，一定要聯繫到當時中國正全力推行的以發展重工業為基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由於中國工業基礎薄弱，資金缺少，故此有相當大的一部份累積需要從農業中抽取，然而在土改後農民形成自給自足傾向，加上經營條件的限制，引起商品糧食生產減少，影響到工業成長，形成了小農經濟生產與工業化的矛盾。在這個情況下，要使農業繼續增產，運用的方法不外乎：

- (1) 以工業化支援農業的發展。這是一個最為理想的方案，然而，在當時的中國，所面對的就是缺乏資金，無法實現工業化，故以工業支援農業發展只可以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完全單純的「先機械化、後集體化」的觀點主要是忽略了中國本身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而又不能通過除了抽取農業剩餘之外的其他辦法以籌募資金，建立工業；
- (2) 運用刺激農民需求的方法來誘導他們增加生產和向國家出售農產品。這個方法的前提就是國家能向農民提供大量的工業消費品，但假若市場上國家訂定的工業消費品價錢過高，就會使工業品與農產品的價格出現剪刀差(即差距很大)的情況，而使農民不願出售糧食，解決的方法便是國家多投資於消費品工業，降低價格，以便宜價錢賣予農民從而刺激其商品糧食的生產，但這樣將無可避免地減少國家對重工業的投資，違反了優先建立重工業的發展策略；
- (3) 以增加農業稅收，加重統購統銷的方法以抽取更多農產品。然而這樣做的後果並不是刺激生產，而只是改變了農產品在個別農民及在國家間之分配比例，使農民生活水平進一步降低以便累積更多資金讓國家進行工業化，但這將會引起農民極大不滿而動搖新政權的統治基礎；
- (4) 在農村中走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就是在農業中培植資本主義的方法，容許土地兼併，使富農上升為地主，從而發展有雄

厚資金基礎的資本主義大農場。但這種方法不單違反共產黨社會主義的理想，更會使中國重新墮入「皇朝——農民戰爭循環」的歷史困境中，而釀成新的農民革命；

- (5) 剩下來的方法便是通過農業生產組織的改革為特質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希望藉著組織強化、規模經濟、簡單協作及精神鼓勵以刺激農業的生產，從而使農村能提供更多的剩餘產品以支援國家的工業化。

三 穩健派循序漸進的正確主張

雖然農業合作化是中國發展的正確方向，但中央在推行合作化過程中，兩次出現急躁冒進。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以鄧子恢為首的穩健派的循序漸進工作方針，更符合中國實際的需要。這裡希望能重點分析穩健派的主張，以為將來借鑒。

(1) 穩健派與激進派就農業合作化所爭論的核心問題

這一場有關農業合作化路線的論爭，亦即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急進派與以鄧子恢及中央農村工作部為首的穩健派的分歧。是次爭論自一九五一年起，歷時六年。爭論的焦點有兩方面，這就是在機械化與合作化的孰輕孰重，及在五三年後，完成合作化的年限。毛澤東主張先合作化後機械化，以合作化積累足夠資金以推動機械化，即工業化的發展。而在完成合作化的年限上，毛澤東以農村中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可能，故此應打鐵趁熱的消滅農村中有自發走向資本主義的個體經濟，並壓抑中農及富農在農村中優越的經濟地位。

對於鄧子恢及黨內多數幹部來說，這次論爭並不是爭論中國是否要走合作化道路，而只是合作化、機械化先後主次和發展速度快慢之爭，完全是一些方法及技術上的問題，他們一方面堅持進行社會主義的理想，但亦以蘇聯發展的經驗為借鏡，謹防重蹈蘇聯一九二七年史太林在農業集體化上所犯的錯誤之覆轍。當時的農業集體化由於進行過急，引起大部份富農大規模宰殺牲畜、砍掉樹木，甚至武裝抵抗。由於矛盾加

深迫，使政府作嚴厲鎮壓，引致國內生產力大跌，農村形勢緊張。故此鄧子恢等人常常以保持農業增產及農民收入每年應增多為考慮，從鄧子恢等看來，整個農業合作化的運動，不論在任何階段，都應按照自願互利原則，保證合作社的質量，即農業增產、農民收入增加，須按生產的需要及可能的條件穩步前進。他這一觀點受到黨內大多數幹部的支持。

（2）穩健派提出先機械化及保護富農的觀點

早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的土地改革法中，便明確規定了保護富農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毛澤東亦曾指出「不但不動資本主義富農，而且不動半封建富農」。（註三十二）而劉少奇在五零年作出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對此政策作出解釋：

「我們所採取的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是一種長期的政策。……只有到了這樣一種條件成熟，以至在農村中可以大量地採用機器耕種，組織集體農場，實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時，富農經濟的存在，才成為沒有必要了。」

故此，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必須具有一定生產水平的支持，如已實行機械化，才會有一定的物質條件，否則任何違背自願互利原則的合作化必然會產生打擊生產積極性的不良效果而破壞農業的生產。在中央的幹部中，較重視機械化的是薄一波，他曾指出「中國將來一定要達到農業集體化……而要達到農業集體化。還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的強大工業，沒有強大的國有化工業，就不能有全體規模的農業集體化。」基於上述原因，他們認為在中國尚未有足夠條件去實現集體化，他們以為要先實現工業化，以創造強大的工業基礎，由國家提供足夠的農業機械，以幫助將來在農村搞起來的合作化組織，這樣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增長就有足夠的保證，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會吸引更多農民，包括中農及富農在互利的原則下，自願參與合作社。劉少奇和薄一波的觀點可視為一種較平衡的農村合作化發展策略，即在堅持合作化的同時，亦同時照顧到合作化組織的生產成果，並希望通過國家的支持，以農用機

械來支持合作化組織，提高生產率，以引導更多農民參與合作化組織。(劉薄的觀點與完全機械化的、單純的「先機械化，後集體化」的觀點不同)此外，較務實的幹部也認為農民和地方幹部的政治覺悟和管理知識，還未能夠實行規模大的高級合作社。基於上述原因，保存富農經濟便成為中央政府的正統觀點。

然而，後來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劉少奇被猛烈抨擊為阻礙農業合作化的運動，「隱藏在黨內的大叛徒劉少奇，竭力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提出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狂熱地鼓吹『確保私有財產』，大肆叫囂『僱工，單干，應該放任自流』，『流出點富農來好』。他還宣傳僱人種地『不要限制』，是『合法的』、『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是一種長期的政策』等等。『四大自由』(即僱工自由、土地買賣和租佃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的錯誤口號也提出來了。」(註三十三)。其實在建國後初期，農民(尤其是中農及富農)對於發展生產有所憂慮，他們考慮到反正將來終歸要過渡到集體化，所以對增加土地投資的態度十分消極。例如在土改後的華陽村，一個農民對另一農民說：「你真是天下第一號的大傻瓜！你不會像我一樣，把分到的土地賣了，也樂得到鎮上去痛痛快快的地吃幾頓……橫直將來還有口糧可以發的，土地也有一天會重分，何必老實到這種地步！」此外，一些發展得較好的農民也不敢擴大投資，怕被別人批評他們為富農及剝削別的農民。農民由於對前途不明確，影響其生產及擴大投資的積極性。因此，劉少奇等人提出確保私有，保護富農的口號，以解除與日俱增的中農及富農的顧慮，其實他們所提的口號不單完全符合中央當時法令，更可保證農村增產，故此對他們的批評是不公正的。

(3) 對過急推行農業合作化的看法

總括而言，務實派幹部對過急推行農業合作化表現了下列兩個顧慮：

首先是違反了農民自願互利的原則，過份強調國家及集體的利益而忽略了個人的利益。在農村有些幹部為了趕任務，常常強迫農民入社。

此外，他們甚至侵犯了農民土地財產的所有權，例如土地及耕畜入社的折價極不合理，導致了宰殺耕牛的情況。在對農產品作分配時，又傾向於多扣少分。故此，鄧子恢曾提出需要保證社員個人收入每年都能有所增加，這樣才能夠發揮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其次，穩健派擔心貪大求快的併社狂潮。持急進辦社意見的幹部認為社的規模越大，就越能發揮規模經濟的優點，通過協作方式而大大提高生產力，然而大規模生產也有由於管理方面的困難，而出現的規模不經濟的缺點。由於集體勞動有賴負責人統籌安排，假若負責人缺乏組織經驗，就會發生很多生產不協調的問題而產生浪費。此外，在舉辦初級合作社時，社員將土地、耕畜和農具入股，按其質素和數量而取得報酬，這樣就需要有一個合理及統一的計劃標準，以確定社員每年從這些物資中可得到的收入，這樣亦須一定的技術及管理知識，然而在當時的農村中，能掌握這類知識的幹部並不足夠。

由於互助合作可達至平均財富及發展生產的目的，故可以總結地說，在五三年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可說是一項正確的決策，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對五四至五六年推行速度過急及命令主義泛濫的錯誤工作方法視若無睹，穩健派提出的穩步前進、強調自願互利、保證增產及樹立成功典型的穩重工作方針，是將來推行農業集體化所需遵守的方針。

註 譯

- 註 一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第35頁
- 註 二 中共中央東北局農村工作部編《東北農村調查集》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二年，第55頁
- 註 三 《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下冊，第251頁
- 註 四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東北書店，一九四六年，第163頁
- 註 五 蘇星《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19頁
- 註 六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九七七年，北京，第181頁
- 註 七 同上註，第183頁

- 註八 同上註，第182頁
- 註九 廖蓋隆著《當代中國政治大事典》，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571頁
- 註十 林蘊暉等著《凱歌進行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337頁
- 註十一 同上，第340頁
- 註十二 蔣伯英《鄧子恢傳》，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296頁
- 註十三 同註十，第340頁
- 註十四 同註十二，第299頁
- 註十五 同註十二，第300頁
- 註十六 〈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九七七年，北京，第116—124頁
- 註十七 同註十，第376頁
- 註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353頁
- 註十九 同上註
- 註二十 同註十，第539頁
- 註二十一 同註十，第540頁
- 註二十二 同註十，第552頁
- 註二十三 同註十，第554頁
- 註二十四 同註十八，第371頁
- 註二十五 同註十八，第372頁
- 註二十六 同註十八
- 註二十七 同註十八，第373頁
- 註二十八 同註十，第556頁
- 註二十九 同註十，第558頁
- 註三十 同註六，第168頁
- 註三十一 同註六，第201頁
- 註三十二 同註六，第13頁
- 註三十三 同註五，第17頁

第十章 國家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一節 個體手工業的特點及其對國民經濟的作用

首先，中國手工業具有悠久歷史，從業人數眾多，據一九五四年估計，全國個體手工業的從業人數約二千萬人，而手工業的產值佔工農業生產總值十分之一左右。城鄉人民，特別是農村人民所用的生活資料及生產資料如鋤、鐮刀、水車、傢俬、炊具等，長期以來依靠手工業生產供應，許多手工業的修理和服務行業更為城鄉人民之經常需要。此外，手工業又是近代大機器工業的助手及後備力量，為基本建設和國營大工業生產服務，進行配件、修理和小型產品的制造。例如，建築材料的生產如石灰、磚瓦、砂石的開采，各種小型配件、零件的製造，以及對車輛、船舶的修理和製造等，手工業並可以輔助大工業生產某些半成品或加工品，承擔著與大型工業分工合作的責任；第三，手工業可容納幾千萬勞動者，幫助訓練工人，有利於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第四、有的工藝美術品的生產，將長期需要進行手工勞動，而不能由機器代替。此外，這些工藝美術手工業產品又為中國傳統的大宗出口商品，對於獲取外匯有重要作用。故此，手工業生產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手工業者可說是個人經營的商品經濟，他們生產出來的全部產品都是作為商品來售賣的。同時他們必須購進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品，並同市場、商業、銀行信貸等有著更密切的聯繫。手工業行業複雜，產品繁多，除了小型的製造業外，還有各種修理性的行業，他們有些是直接接受消費者的定貨而進行生產的。

中央政府覺得手工業的個體經營方式是落後的。手工業生產者不但要從事生產，而且要自己採購原料，甚至要負責銷售產品，缺乏分工，他們的經營極度分散，生產規模極端狹少，技術落後，勞動生產率也十分低下，資金積累也有限。由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及技藝程度的差別，並

存在著師徒關係、僱傭關係等剝削狀況，故亦具有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所以也必須加以改造。

第二節 手工業個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 手工業合作化的幾種形式

由於個體經濟是商品生產者，原料的供應和產品的銷售對他們有重大的關係，因此，必須首先使手工業者在供銷方面組織起來，與國營經濟建立聯繫，以解決原料供應及產品銷售的困難，並切斷手工業和私營商業間的聯繫，擺脫對私營商業資本的依賴，然後再進一步把他們在生產方面組織起來，改變家長制的、師徒的、及僱傭的關係，使他們成為集體所有的合作化經濟。它所採取的幾個主要合作方式如下：

(1) 手工業供銷小組

這是手工業合作化的低級形式。參加供銷小組的個體手工業者向國營商業及供銷合作社購買原料、推銷成品或接受加工訂貨。小組的成員仍私自佔有生產資料，獨立進行生產，自負盈虧。由於組織起來初步解決了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方面的困難，生產者可較專心的進行生產。然而這種小組運作方式基本上沒有改變落後的個體經濟的生產關係，生產的發展極為有限，而且一樣會滋長資本主義自發的傾向。例如有些小組把好的產品留給自己出售，次貨才賣給國營企業；在旺季要求自產自銷，淡季要求加工收購。

(2) 手工業生產供銷合作社

最初，生產工具私有狀況仍得保留，各手工業者分散生產，而只是統一領取原料交付成品，後來隨著生產的發展，在生產過程中的某一部分，開始進行了集中生產，也有按照生產技術進行產品的分工協作。在手工業供銷合作社中，還從所賺取的利潤中抽取一部份，用來購買生產資料，使一部份工具設備成為社員所有。擴大了社會主義的因素。

(3) 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它是手工業供銷合作社的進一步發展，改變了供銷小組只有商品流通領域活動的範圍，而有意識地把手工業者集中起來進行生產。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把參加生產的學徒、幫工及手工業者家屬吸收入社成為社員，並改變原來師徒的、僱傭的和家長制關係，主要生產資料由個別手工業者折價而歸合作社公有，實行集體生產、統一經營及統一計算盈虧。合作社的收入除交稅和提取部份公益金及公積金外，採取領取工資的形式使生產成果在社員間實行按勞分配。隨著公共積累的增加，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逐步過渡到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生產。

二 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歷程

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確定了對手工業進行改造的方針及政策。在方針上，應當是由手工業生產(供銷)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在方法上，應當是從供銷入手，實行生產改造；在步驟上，應當是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在五四及五五年，手工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進行得較為穩妥，主要的合作形式是初級的手工業供銷小組及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在五五年底，全國的手工業合作組織總共組織了二百萬人。

由於五五年下旬正是農業合作化大力發展的時刻，毛澤東認為當時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太過落後於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故他指出中國的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去完成，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於五六六年一月七日，黨中央發出指示提出手工業從發展速度來看，顯然是落後於一步，因此，迅速改變領導落後于群眾的情況，加快手工業的發展速度，是當前一項迫切任務。故此在五六年的頭兩個月間，參加手工業合作社的社員便一下子從二百萬人增加至三百萬人。由於手工業合作化運動進行過速，又增生了很多缺點和錯誤，例如組織管理混亂、社員收入下降、生產情緒低落等。此外由於高級形式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不顧慮到手工業分散靈活、能適應群眾不同需要

和市場千變萬化的特點，過早地過急地集中生產和統一計算盈虧，盲目地辦大社、并大社，將各種性質不同的行業組成混合社。這樣做的結果，不單使領導很困難，生產秩序混亂，產品種類減少，產品質量下降，而人民也感到十分不方便。

針對上述的情況，中央於五六年三月召開了全國城市手工業改造工作座談會，研究了城市手工業合作化工作中存在的集中生產和手工業者一貫採取的分散生產的問題，會議認為應按照有利於生產和有利於服務的原則，結合製造性或修理服務性行業的不同情況，分別採取集中或分散的形式進行生產，從而改變以往那種不顧手工業生產特點的盲目集中大生產的情況。此外，會議並指出有些地方不問具體條件，過早、過大的集中，以致生產下降及群眾不便的情形出現，這類問題應加以防止和糾正，而會議對過早過急進行統一計算盈虧、增加社員收入及發展生產等產生不利情況的問題也加以注視。在七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當前手工業合作化中幾個問題的報告〉，報告要求各黨委、政府設立專門機構負責領導手工業生產和改造工作，根據不同行業的特點、社員自願、有利生產及服務居民的原則，處理手工業的集中生產和分散生產問題，並允許手工業合作社對其產品(除接受國營企業加工訂貨外)進行自銷和其他原料的自購。對手工業者的工資必須貫徹「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原則，技術人員及老師傅的工資不應低於原來的水平，要糾正工資方面的平均主義傾向。此外，報告還對手工業改造範圍的劃分、生產資料和股金處理、小業主人社以及保護和提高特種工藝等問題作了原則規定。由於解決了這類問題，使手工業合作社更為健全和鞏固。在五六年底，大陸已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手工業者被納入合作社組織，其產值佔全部手工業產值的百分之九十三。全國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完成了。

第三節 總結和分析

中國的個體手工業，經過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及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間的種種限制，加上在文革期間，個體經濟更被視為「資本主義尾

巴」、「滋生資本主義土壤」而被排擠及取締。儘管這樣，個體手工業並沒有被砍絕，它仍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生存，在不同場所上為工農業生產及城鄉人民服務，特別是中共於一九七八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個體手工業又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及被廣泛的承認。中共領導人承認由於國家的生產水平低下，國營經濟還不能把過去個體勞動者所從事的有利於發展生產和滿足人民需要的勞動及服務，如服裝加工、修理及小型製造機器和裝配零件等工作全部承擔起來。而「恢復和發展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對於發展生產，活躍市場，滿足人民的需要，擴大就業，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註一）。趙紫陽於八一年「國務院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更提出：

「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附屬和補充。應當允許個體經營者招少量的幫手和學徒，這對發展生產，活躍市場，滿足人民需要，擴大就業，都是有好處的。」

建國後中國大陸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是十分不平衡的，有的大城市基本上已實現機械化的大生產及建立健全的大型商業單位，故對手工業的經營可能覺得不太重要，但在農村，有很多的地區還使用著一些陳舊的生產工具，並處於刀耕火種的落後生活，手工勞動仍佔有主要地位，故此便不能不允許分散的、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的存在。他們的存在與發展，不需要政府的投資及不需其遣派干部，手工業由於靈活的經營，能彌補國營企業的不足及能滿足居民千變萬化的日常需要，又能協助解決就業不足及由之而帶來的種種嚴重社會問題，有利於傳統手工藝品的製造與繼承，通過出口賺取外匯，為國家帶來建設資金。故其存在實是適應中國的客觀環境，對國家帶來種種好處。

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五三年的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毫無必要，當時中國急欲走向社會主義，取消各種形式的私有制，而在手工業內無疑是存在著僱傭關係的剝削情況，而個體經濟的繼續發展亦會通過優勝劣敗，集中兼併而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故此，當時中央政府對此問題加以正視是需要的，然而卻無可否認他們當時的考慮過份地以政治掛帥，

著眼點只在於消滅各類形式的私有制而忽略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客觀狀況及其對個體手工業的實際需要。

註 釋

註 一 〈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一九九一年

第十一章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對資本主義的國有化改造

第一節 中央政府開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工作

中國政府在建國初期，推行新民主主義，實行統一戰線的策略，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集中力量對付地主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等「三座大山」。為了打擊主要敵人，政府必須團結所有力量，不能樹敵太多，故此毛澤東曾批評一些想過早消滅私營資本主義的幹部，認為他們的工作方法「過左」，並指出中國政府不能四面出擊，而應該在一個方面作出讓步，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不反對新政府。在此背景下，中共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中確定了對私人資本主義利用及限制的大方針。因此，中國共產黨當權的初期，並未立即沒收私營工商業，而繼續允許它們發展和經營。

建國初期沒有立即沒收私營工商業，另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當時的私營工商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有十分強大的經濟地位，如果貿然加以取消，立刻會引起生產萎縮及工人大量失業。當時中共決定限制和排斥的是那些投機商業及高奢侈品工業，而並非有利國計民生的工商業，相反，政府對這些私營工商業更加以扶植，從而達到團結、共同發展經濟的目的。因此，政府在建國初期提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一方面勸服工人要為生產發展及全局經濟利益著想，暫時容忍資本主義的剝削，共同與資本家合作而發展生產；而另一方面則通過價格政策、稅收政策、勞動保護政策及規限私營企業盈餘分配的方法，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更通過控制原料供應、成品銷售等活動，將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逐漸納入符合國家經濟政策需要的計劃中，避免出現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使資本主義工商業變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是指由支持推行社會主義的共產黨領導下的、有所改良的資本主義。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下，資本家與工人仍存在著僱

傭、剝削的關係，但資本家卻不能像過去般任意地榨取工人，也不能自由地追逐高額利潤，他們必須服從政府的法例和經濟政策。

然而，一九五三年推行的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企業始終水火不容。為完成第個一五年計劃，政府希望迅速調動有限資源建設經濟，但資本家為謀取利潤，往往拒絕政府的加工訂貨，擺脫國家計劃而生產，衝擊國家經濟計劃的完成。在此情況下，政府認為必須改變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消滅資本主義，方能有效調動資源，完成工業化。所以，在一九五三年開展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其中一個無可妥協的任務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毛澤東當時就清楚地指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資本主義絕種。」(註一)

新政府消滅資本主義的方法分兩個步驟進行，首先將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然後再從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以達至最後消滅資本主義的目的。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可以說是一種既團體又鬥爭、既容忍資本主義又限制及改造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

第二節 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兩種形式

一 初級形式國家資本主義

「初級形式國家資本主義」的本質是私營工商業與國營企業建立了聯繫，這種聯繫是資本主義經濟同國營經濟在企業「外部」所造成的固定關係。舉凡一個生產的過程都不可能孤立地進行，工廠的生產必依存於生產資料，尤其是機器設備及原材料、燃料的供給，在產品經過生產程序製成後，又需依賴市場將產品賣出，賺取金錢，以進行下一過程的生產。

「外部」聯繫的重點在於國家掌握了大部份原料及生產要素，以及控制了產品出售的銷售渠道與市場，即是掌握了前後兩個流通環節，使資本主義企業不得不依靠國營經濟，接受國家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計劃，否則，企業將無法獲得生產要素及出售商品。故此，國家資本

主義的初級形式，是一種「抓兩頭(原料及市場)、帶中間」的辦法，把企業的生產歸納到國家所訂定的生產計劃內。

(1) 在工業方面推行的初級形式國家資本主義

這方法主要是國營企業通過合同將原料或半製成品委托私營工廠加工，或國營商業機構向私營工廠訂購產品，進行統購及包銷，即政府按某一個價格長期收購私營工廠的產品，如綿紗、棉布及糧食等，並由政府以法令規定私營工廠產品不准在市場上自行銷售，這樣就限制了私營工廠經營的活動範圍，並從產品價格方面限制資本家獲得之利潤。

(2) 在商業方面推行的初級形式國家資本主義

這商業方面，它的形式主要如下(註二)：

1. 經銷。國營商業機構將商品按批發價賣給私商，讓它們按照規定的零售牌價出售，私商從批發價和零售價格的差額中獲得商業利潤。
2. 代銷。國營商業機構把商品交給繳存保證金的私營零售商店，委託他們按照規定的牌價銷售，私營商店從中獲得一定數量的代銷手續費。

私營商店在接受經銷及代銷後，不得再從自由市場購進同類產品，從而限制了私營商業的資源及商品種類，這亦壓縮了私營工廠的銷售市場。

在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下，企業的資產還屬於私人，政府只是運用各項經濟手段把私人資本的活動範圍加以限制，使生產和流通都納入計劃。此外，政府並審核各企業的生產成本，限制私營企業所能獲取的利潤。一九五二年「五反」運動後，國家規定私營企業可按其資本計算每年可獲得百分之十至三十的利潤，使資本家有利可圖，激發其生產之積極性。而在一九五三年開始，國家推行「四馬分肥」的分配原則，企業的利潤按照資方股息紅利、所得稅、工人福利獎金和企業公積金四方面

進行分配，這樣，資本家的利潤實際只能佔企業全部營利的四分之一。

然而，繼續採取加工訂貨的辦法，將不能刺激資本家提高生產力，陳雲曾分析道：

「這是因為，加工訂貨，原料是我們給他，資本家拿加工費，加工費則是按他的成本計算利潤的，假定成本是一百五十元，他的利潤是百份之十，便是十五元；如果成本降低到一百元，利潤是百份之十，利潤只有十元。這樣，資本家也不願意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降低了他的利潤，資本家也不願節約原料，他節約公家原料，對他並沒有好處，用料少了，貨色不好，還要退貨，資本家還會用增加工資的辦法來增加開支，提高成本。總之，資本家在加工訂貨中是要用各種方法提高成本，增加利潤的。」（註三）

此外，由於政府控制著銷售市場，受政府訂單的牽制，資本家無法根據市場變化而制定生產計劃。更為重要的，就是資本家對自身發展的前景感到迷惘，了解到將來始終會被取締而惶惶不可終日，故此，他們對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及更新設備等根本毫無興趣，阻礙企業發展。

從中國領導人的角度來看，當國營經濟還未強大時，對私營企業需加以利用，但當國營經濟迅速發展後，形勢就不同了。由於私人工商業投資意慾低，生產效率明顯地落後於國營企業，它們生產東西往往不合規格，沒有人要，然而國營企業卻為著他們的生存，需要在加工訂貨時特別遷就這些廠，甚至要國營工廠讓出生產任務給他，這樣把先進工廠的任務讓給落後工廠的做法極不符合經濟原則，但為著避免這些私人企業倒閉及帶來工人失業，國家又不得不這樣做。此外，由於在工業中尚有百份之四十二的工廠還未接受政府的加工訂貨，他們自由競爭、追逐利潤的行為往往衝擊國家計劃的完成，故此，為發展生產力及改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無政府狀態，中央領導人決定將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推向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二 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本質是使國營企業成份和資本主義成份由企業外部的聯繫發展到企業「內部」的聯繫，即實行公私合營。其實個別行業的公私合營，在建國初期經已出現，其後逐年有所增加，個別公私合營企業的主要來歷為：

- (1) 中共於建國後發覺一些企業中包含有原國民黨的官僚資本、外國資金及抗日時期之敵偽財產，遂將企業內這部份資財加以沒收而變為國家的公股。
- (2) 部份企業由於經營上發生困難或需發展而缺乏資金，請求政府援助而轉變為公私合營。
- (3) 一部份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在「五反」運動中，被指責為偷稅漏稅，然而卻又無力償還債項，為避免此等企業倒閉，政府便批准將其違法所得部份轉為公股，企業遂變為公私合營。

一九五四年是有計劃擴展公私合營工業的第一年，當時政府的方針是「鞏固陣地，重點擴張，作出榜樣，加強準備」，政務院頒佈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由國家或者公私合營企業投資，並由國家派幹部，同資本家實行合營的工業企業，是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故此，在公私合營階段中，社會主義經濟已正式進入原來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中，並佔領導地位。政府派遣幹部作為公股的代表參加企業的領導和管理工作，原來擔任企業領導職務的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則由政府任命繼續參加企業的管理工作。至此，政府已充份控制整個企業之生產和流通過程，使生產和銷售納入國家計劃，公私合營企業乃成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

然而，個別行業在進行公私合營時，出現了很多公私間的矛盾。由於在合營的階段需要對資本家原有的資產核算而成為私股，而國家的新增投資作為公股，在清產定股時，資本家往往就原有資產的估價與政府幹部發生紛爭，他們有些更調走資金，隱藏或轉移財產，當中有些人也

不甘心把企業的管理權交給國家，所以在企業領導層的人事安排問題上與政府產生很多磨擦。然而，資本家始終鬥不過政府，在種種政治及經濟的壓力下，只得屈服而接受改造。

雖然如此，在公私合營企業的發展中仍產生了一些新矛盾：第一，在公私合營企業中，企業利潤是按公股和私股的比例來分配的，資本家的利益隨著企業盈業的增加而增加，故從政府來看，這對工人的積極性及貫徹社會主義的目標皆產生了不良的影響；第二，公私合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也出現很多矛盾。公私合營企業一般來說規模大、資金雄厚和設備較好，所以私營企業往往不能面對公私合營企業的競爭，故此便有推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需要，使整個行業的各企業能夠全面改造。陳雲曾經指出，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現在既然按整個行業來安排生產，實行改組，那末，整個行業的公私合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它打破了廠與廠的界限，不僅可以提高生產力，而且便於過渡到完全的社會主義所有制。（註四）

自五五年以來，由國家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和收購的產品已佔全部私營工業產值百份之九十九，許多工廠實行了公私合營，並且在方式上已由個別合營發展到合併改組、全行業合營。根據此形勢，毛澤東於一九五五年十月邀請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成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改造，要求資本家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並指出只要資本家能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前途，把自己從剝削者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同時宣稱將貫徹「贖買」政策，對接受改造的工商業者給予政治上及生活上適當的安排。

毛澤東在座談會上指出：

「現在中國處在大變革的時代，社會動盪不安，農民私有制要變集體所有制，資本家也要改變所有制，許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運，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了解趨勢，站在社會主義方面，有覺悟地逐漸轉變到新制度。」

毛澤東進而指出，共產主義這個問題要講開，好像怕鬼一樣，大家

一談就不怕了。我看共產是好事，沒什麼可怕。不是今天說了，明天就共產，而是講要準備共產，要廣泛宣傳，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改造，其實就是贖買政策。安排人員，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工作崗位，一個是政治地位，把兩個統統都安排好，大家要安下心來，不要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大略）（註五）

同年十一月，黨中央召集各省市黨委代表舉行「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會議」，提出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規劃，直至五六年底，實行公私合營工業企業已達私營工業總數及職工總數的百份之九十九。在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後，中共根據「贖買」政策而展開了一連串工作。

第一是查定資產，進行定股工作，政府採自報公議方法，即由資本家根據原來私營企業的資產和負債情況，自行申報企業的資產淨值，而由國家幹部及企業職工，對資方申報的產值進行評估，核定私股的股額；

其次為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企業的盈虧，由國家根據私股股額發給私股股東固定息率（一般是年息5%的股息）。實行全行業合營及定息後，資本家已喪失對企業的控制權，其生產資料亦已轉歸國家使用，失去了賺錢的功能。資本家雖然保留某些財產，但這些財產只可給他們帶來固定利息，然而，這些股息更已同企業盈利完全脫離關係；

第三為人事安排。私營企業在全行業進行公私合營後，政府對在職的原資方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政策，安排工作給他們，使其變為國家幹部；

第四為經濟改組。私營企業在全行改組後，各企業的資產已全歸政府支配。政府認為某些工廠太多，規模過小而散，生產設備亦殘缺不全，因此必須依據需要，進行合併、改組改建、擴建或淘汰，以統一調配各企業的設備、資金及技術，從而加強各企業間分工協作關係，轉變過往資本主義企業互相盲目競爭的無政府狀態。

第三節 公私合營中的問題與解決方法

根據中國共產黨於八一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中指出：「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於一部份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註六)

一 生產經營過份集中，造成群眾不便

以往由於個體商業(零售商)廣泛的存在，以及靈活分散經營的方式，為老百姓帶來便利，但公私合營高潮到來時，它們就統統合營了，這樣對其經營是很不利的。例如陳雲指出有些小型店舖，未合營前有很多適合當地居民的東西，如文房四寶、牙刷牙膏、針頭線腦、甚至郵票等，而其經營方式與大型百貨公司不同，很少數量的物品如一張信紙也肯賣。又例如修理腳踏車的行業，差不多每條馬路都有。此外，它們為便利居民需要，往往工作至深夜，但公私合營後，統統合併起來，小型零售商店變為國家企業，店員變為領固定薪金的國家幹部，他們經營的靈活性也就消失了。而由於修車單位合併起來，市民很難找到修車的地方，以上的情況皆對市民帶來很大的不便。

故此，陳雲便指出對不僱店員的小舖子，在政策上要區別於資本主義商業，應該長期保留其單獨經營的方式，這樣做，有利國家及人民，而盲目合併的要立刻分開來，退回去。

二 不懂實際情況，改變原有生產經營方法，以致造成服務及產品質素下降

當時的企業由於沒有競爭，產品統統由國家收購，結果是各企業只顧大批生產，而不願意生產數量比較少和質量較高的產品。此外，由於政府輕率地改變了一些行業的規矩，以致嚴重影響製成品的質素，陳雲曾舉出涮羊肉及北京填鴨的例子，來說明以上的情況：

「它原先只用二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這種羊，肉相當嫩，

我們現在山羊也給它，老綿羊也給它，凍羊也給它，涮羊肉怎麼能好吃？」又如北京『全聚德』用的鴨子……飼料主要是綠豆和小米，糧食統購統銷以後，給它勞改農場養的老鴨子，烤的鴨子就不好吃了。」(註七)

基於此，一九五六年二月，國務院通過〈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事項的決定〉，規定私營企業在改造的時候，照舊生產經營，不得輕易改變它們原來的生產和運銷規律、經營制度和服務制度等。

三 對原資方人員的處理

由於工商業者大部份懂得生產技術和有業務經驗，故此他們乃得到國家的安排留用，但是他們對前景及工資等問題還不放心，所以政府明確指出將不會降低其工資，並對他們的前途作出合理的安排。

第四節 資本家對資本主義改造的真正感受

雖然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採取和平的贖買政策，但對資本家來說，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始終是變相沒收他們的財產。一九五三年，當中共公佈過渡時期總路線後，工商界出現很大震動，資本家惶恐不安，他們懷念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容許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民主主義時期，認為五十年代初期「是睡在席夢思床上，現在是睡在炕上」，並提出「讓我們多喊幾聲新民主主義萬歲吧！」他們對社會主義改造十分反感，驚呼上了賊船，認為「政府對資本家是一刀的來，慢慢把你吞掉。」公私合營是「借地插秧」，到時候「那有你的份兒？！」(註八)

不少財團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大勢下，為保護私人資產，寧可交出一個企業，亦不願意公私合營。也有少數資本家以停工、停薪或抽逃資金、破壞生產等手段與政府對抗。

至於一部份願意與政府合作的資本家，他們也是出於無可奈何心態，正如周恩來指出的，資本家對待社會主義改造，白天敲鑼打鼓表示擁護，晚上則回家痛哭。周恩來並以著名資本家榮毅仁為例子說：

「他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的一個人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裡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這種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現，如實地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心態。」(註九)

在一九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中，部分資本家曾道出他們在資本主義改造前後的心情和境況(大略)：

一 工商界在合營後，思想上普遍出現抵觸情緒

中共建國以來，通過五反運動及自我審查，資本家已被弄得遍體鱗傷，公私合營後的清算資產，更把半生心血化為烏有，暗裡痛心，表面擁護；(註十)

二 社會地位低落

雖然他們已喪失了資產，但中共還經常提到資本家的「兩面性」，他們整天耳聞目睹的都是「私方」、「資本家」、「剝削」等字眼，所以，不少資本家皆希望取消公私合營企業的公方、勞方、私方等不同稱呼，認為這樣會造成三個小宗派，特別應該取消私字，以示一視同仁。(註十一)

部分資本家更提出他們經常受中共幹部批判，「人事部們對私方人員總不離五部曲，第一批評，第二批罵，第三勒令寫檢討，第四處分，第五調走，私方們十分反感。」。(註十二)

個別資本家更提出「共產主義為官僚主義準備溫度，官僚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可怕，今天資產階級只好低頭做人，逆來順受」；

三 工作及報酬的困擾

部份資本家反映雖然政府安排他們工作，但他們既要察看公方代表顏色，又要受工人的氣，縱使安排一些管理業務，實際亦是有職無權，徒有虛名，精神很不痛快，私方人員的積極性無從發揮。

此外，部份資本家也無興趣拿取定息，正如毛澤東提出的：

「現在資本家當中大體有70%左右對定息沒興趣，一個月拿幾毛錢，他們要求放棄定息，摘帽子入工會，享受勞保待遇。」「把小的佔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不劃入資產階級範圍內，拿到的定息只能買幾包煙。」按毛澤東的意見，除了數量小的定息可以取消外，大資本家繼續持定息，而且定息時間延長，「拖到三個五年計劃，帶個尾巴進工會。」（註十三）

第五節 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總結

在古今歷史上，要消滅某一個經濟制度，往往需要很大的社會動盪及生產力破壞，然而中國在消滅資本主義的過程中，雖然經歷了複雜和困難的歷程，但基本上沒有造成社會震盪，生產不但沒有破壞，反而有一定的增長，這樣的和平改造（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可謂社會主義革命史上一項創舉。當然，能成功的執行和平消滅資本主義的任務，也是有其歷史根源的。

- 一 中共經過革命戰爭，奪取政權，控制著強大的軍隊及嚴密的組織，使資本家在政治上處於無可反抗的地位；
- 二 政府沒收官僚資本，發展各項企業，掌握了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絕大部份和輕工業的一部份，並在農村中推行合作化運動及實施統購統銷的政策，使資本家喪失了原材料的來源而陷於孤立，私營企業在各項物資供應上完全依賴國家，這也是私營工商業不得不接受改造的經濟方面的原因。

毛澤東曾指出，中共有兩個聯盟、兩種合作。一個是同農民的聯盟，一個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這兩個聯盟中與農民的聯盟是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基礎。沒有與農民的聯盟，中共就沒有力量。必須依靠工農聯盟，才有力量去聯合和改造剝削分子——即民族資產階級。（註十四）

在一九五五年，毛澤東曾精辟地分析中共政權與農民及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毛澤東指出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原因：

「是為了搞到更多的工業品去滿足農民的需要，以便改變農民對糧甚至一些別的工業原料的惜售行為。這是利用資產階級聯盟，來克服農民的惜售(筆者按：即中共從資本家手中得到工業品，並以之投向農村，使農民願意將其農產品向國家交換)。同時，我們依靠同農民的聯盟。取得糧食和工業原料去克制資產階級。資本家沒有原料，國家有原料。他們要原料，就得把工業品拿出來賣給國家，就得搞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幹，我們就不給原料，橫直卡死了。這就把資產階級要搞自由市場、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銷售工業品這一條資本主義道路制住了。」(註十五)

三 經過了建國初期的各項政治運動，尤其是針對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五反運動，已使資本家喪失了獨立性，正如毛澤東於五三年指出：

「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份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繫著的，並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

註 釋

- 註 一 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198-199頁
- 註 二 薛暮橋等著《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116頁
- 註 三 陳雲〈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新形勢和新任務〉(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載《陳雲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281-293頁

- 註 四 同上註，第286-287頁
- 註 五 楚序平、劉劍主編《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華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665頁
- 註 六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
- 註 七 陳雲〈公私合營中應注意的問題〉(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載《陳雲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294-297頁
- 註 八 同註五，第657頁
- 註 九 同註五，第667頁
- 註十 《鳴放回憶》，自聯出版社印行，一九九六年，第31頁
- 註十一 同上註，第29, 34頁
- 註十二 同上註，第34頁
- 註十三 同註五，第673頁
- 註十四 同註五，第656頁
- 註十五 毛澤東〈農民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載同註一，第197-197頁

第三篇

探索、徘徊與反右

(1953-1957)

- 第十二章 清算高崗、饒漱石與毛、劉就建國方針的分歧
- 第十三章 共和國初期第一冤案——潘漢年、楊帆事件
- 第十四章 胡風事件與肅清反革命運動
- 第十五章 毛周衝突——反冒進與國力論的提出
- 第十六章 檢討蘇聯發展模式與第八次全國黨大會
- 第十七章 歷史的轉折——五七年的鳴放與反右

第十二章 清算高崗、饒漱石與毛、劉就建國方針的分歧

導言——高饒事件的本質

高饒事件，即指高崗和饒漱石等共產黨高級幹部因被指為組織反黨聯盟而被整肅的事件。該事件發生於五三年底至五四年初，其案在五五年三月的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公開。毛澤東曾經指出：「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即指高饒)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幹戶。」(註一)

高崗、饒漱石事件的本質，為高、饒希望排擠劉少奇、周恩來而爆發的權力鬥爭。據高崗後來的交待，他的目的就是「企圖把劉少奇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註二)在這場鬥爭中，高崗利用毛澤東與劉少奇就建國初期發展路線的分歧，並標榜自己為軍人集團的代表，鼓動各個軍事將領，針對並企圖打倒中共革命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白區」工作的中共領導人如劉少奇等，從而掌握黨政大權。這場鬥爭以高、饒的失敗而結束。

第一節 東北特殊化——高崗、饒漱石事件的國際背景

高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中央東北局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於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黨，為資深黨員，於四五年被調到東北，五三年底、五四年遭整肅時被批判為經常強調「東北特殊」、「東北先進」、「東北一貫正確」為理由，拒絕執行中央的指示，並對抗中央各機關對東北地區工作的檢查，把東北當成「高崗王國」。高崗之所以被批判為搞東北特殊化，與他過份靠向蘇聯有關。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蘇聯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希望把與其邊境靠攏的中國東北地區納入其影響的範圍內。為達此目的，史太林極力拉攏高崗，並設法協助其製造「東北特殊化」的地位。

在四五年後國共內戰期間，蘇聯曾將大批軍事與援助的物資給與共產黨在東北建立的基地。由於中共中央將重要部署集中延安，所以領導東三省的共產黨東北局就有甚大的自治權，「特別是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陷於國民黨之後，中共中央已無法有效地指揮全國各地的鬥爭，因而東北局的自治作用更為增長」(註三)，而逐使東北成為革命之重心。

據與蘇聯最高層有密切關係的前蘇聯援華專家組負責人H.科瓦廖夫回憶，在其有份參與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的聯共(布)政治局會議上，高崗建議宣布東三省為蘇聯的第十七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照高崗的意見，這可以保障東三省免遭美國人侵犯，並把東三省變成繼續南下、以徹底殲滅蔣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崗還建議在青島駐扎蘇聯艦隊，建議加強遠東的蘇軍，增加蘇軍人數，並以這些想法證明上述建議是有根據的。高崗發表完意見，與會者響起掌聲，但從劉少奇的臉色看出，他已怒不可遏。」(註四)由於高崗是次行動受到中共中央指責，故「他認為毛的許多戰友都中了托洛茨基右傾的毒。他還說，他想就某些中國領導人對聯共(布)中央不真誠和反蘇行為發表一項重要聲明。」(註五)四九年七月，高崗率領代表團往莫斯科，與蘇聯簽訂《蘇聯與東北人民政府貿易協定》，使東北儼然成為一股強大、實際上獨立於中國母體的、可與蘇聯簽訂條約的勢力。

中共建國後，高崗領導的東北人民政府在很多問題上出現特殊化，並不時與中央產生磨擦，如人民幣不能在東北流通，而東北自行發行流通券，在全國所有鐵路均歸政務院鐵道部統一管轄，各處均設有鐵路管理局。但唯獨東北例外，鐵道部東北辦事處卻不能領導東北人民政府鐵道部。東北人民政府下設有榮軍復員事務委員會、經濟計劃委員會及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等機構，但這些機構在國內各大軍政委員會中是沒有；而令中共中央領導人憤怒的，是東北中都掛著史太林的肖像，而幾

乎見不到毛的肖像。史太林的肖像在多數情況下畫得根本不像史太林，他的臉形被畫成東方人，中國人的樣子。

據科瓦廖夫的回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我們和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同史太林談判時、毛指示在沈陽停車，並邀我遊覽市容。」「在沈陽所有高大建築物上都掛著史太林身著元帥服的巨幅畫像，沒有一處掛毛主席的畫像。毛當時顯然非常氣憤。當我們回到車站時，市委書記向毛報告說，東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崗同志、林彪同志個人為史太林七十壽辰準備了整整一節車廂的禮物，這節車廂已掛在他的列車上了。毛對此表示說：『把車廂摘掉，把禮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請你告訴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國給史太林同志帶去了禮物，東北現在還屬於中國……』。」(註六)

蘇聯《真理報》在提到參加克里姆林宮宴會的國家時，往往把東北人民政府代表與其他國家代表並列，這些表現使人感覺到東北是一個獨立於中央的地區，毛澤東後來於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講話中指出：「史太林很欣賞高崗，專送一輛汽車，高崗每年『八一五』都給史太林打賀電。」(註七)

此外，高崗鋒芒畢露，在東北以「東北王」自居，與毛澤東並稱主席，東北大型集會呼喊「高主席萬歲」，他欣然接受。

第二節 劉少奇、高崗的鬥爭

一 高崗、劉少奇的矛盾

一九五二年，為加強中央政府的集中統一領導，削減各地方政府的權力，中央政府將地方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把以往隸屬於軍政委員會的各部們歸劃到中央政務院各主管部門直接管理，並決定將

各地的主要領導官員調到北京工作。同年八月，鄧小平由西南來京擔任政務院副總理，高崗、饒漱石、鄧子恢和習仲勛等也分別從東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北局來京擔任國家主要職務。

高崗來京之前已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四九年開國大典時，他站在毛澤東身旁，屬於中共第一級領導人。五二年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高崗在當時地位甚為顯赫，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稱（註八）。高崗在擔任計委主席後，「自稱組織了經濟內閣，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對抗。」（註九）

然而，高崗對調到北京不滿意，向人說這是調虎離山，此外，他對其職位處在劉少奇之下，亦一直耿耿於懷。（註十）

高崗對劉少奇的不滿由來已久，劉少奇在共產黨內是一個較為實際、傾向執行溫和政策的領導人，他在建國初期曾依照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過「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強調要保存並發展私有制，以恢復生產，並反對過早實行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

劉少奇於四九年中上旬在天津發表講話，明確提出要保護資本家，因為這措施「實際上就是保護生產」，他並提出私營工商業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內的發展，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所允許的。「這樣做，對工人階級的好處多，壞處少。」劉少奇在天津講話後不久，曾批評東北局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上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而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劉少奇更針對東北有百分之七十的農戶參加了變工互助，又對把有三馬、犁車的農民看成是富農的「左」傾情緒，提出批評。（註十一）為鼓勵生產，劉少奇甚至幽默的稱讚「剝削」，因為這實際上是提供了就業機會：

「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剝削是救人，今年關裡大批難民到東去，關外的富農能剝削他，他就會謝天謝地。」（註十二）

對於劉少奇對東北的批評，高崗強烈的不滿，並埋下雙互鬥爭的種子。

二 毛澤東與劉少奇對建國路線的分歧，激發了高崗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和劉少奇便對建國方針出現過不同意見，而分歧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五一年：

(1) 對山西省委推行合作化的意見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華東局寫了一個題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重點指出農民的自發力量是朝往富農單幹，而不是向集體化的方向發展，如果不注意，將使互助組涣散解體。故此，山西省委主張應增強互助組內「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兩個因素，以戰勝農民之自發發展趨勢，削弱私有制的基礎，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的形式。(註十三)

對此，劉少奇表示反對，並提出：

「現在採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生產合作社。」(註十四)

劉少奇的觀點受到當時的財政部長薄一波的支持，薄一波曾指出：「要達到農業集體化，還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的強大的工業，沒有強大的工業，就不能有全體規模的農業集體化。」(註十五)七月三日，劉少奇更明確指出山西省委的觀點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註十六)

七月三日，一心希望儘早推行合作化、促進社會主義因素的毛澤東找了劉少奇、薄一波，明確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並指示陳伯達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起草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

(2) 工會工作方針

中共建國後不久，怎樣處理工會與政府及工人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被提出來。五零年七月，鄧子恢提出有些工會不重視維護工人的利益，

脫離工人群眾，放棄了獨立的、主動的工作，認為工會工作者與企業行政管理及政府工作人員之間，在「基本立場」一致，即雙方都是同時為國家及工人的利益服務。然而，在「具體立場」上，由於雙方工作崗位、任務不同，故在處理問題上卻仍有分別。工會需要代表工人利益，不能盲目跟著企業行政領導走、成為廠方的附屬品，如廠方某些規定對工人不利時，則工會必須根據工人的意見，同廠方商量修改。對於鄧子恢的意見，劉少奇表示支持。

然而，高崗卻對鄧子恢的意見持否定態度，他指出公營工廠中沒有剝削及階級矛盾，行政管理人員與工人利益是一致的，他並批評「具體立場」不同的提法，認為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第二是模糊了公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模糊了公營企業與利營企業在本質上的區別。(註十七)高崗更於五零年七月廿一日於東北總工會執委擴大會議中指出：「黨政工一個目的，親密團結搞生產，切忌對立起來提問題。」

五一年十月，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表態支持鄧子恢的意見，認為在工人生活的問題上工人與管理層確實存在矛盾。

不久，李立三意見被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批評李立三在工會工作的根本方針犯有狹隘經濟主義的錯誤，在工會和黨的關係上犯了工團主義錯誤，「表現了社會民主黨的傾向」，李立三被解除全國總工會主席職務。

(3) 毛澤東批評劉少奇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之觀點

毛澤東與劉少奇另一個更大的分歧，就是在國民經濟恢復、土地改革完成後，是否仍要執行「新民主主義」政策，當時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經已過時，國內的主要矛盾已演變為工人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澤東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更隱晦地批評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主張，毛澤東指出：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

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註十八）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中共自一九五三年夏天開始，黨內開始公開批判「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提法。

（4）毛澤東評薄一波「新稅制」的「錯誤」與改組中央領導機關

五三年一月，中央財經委員會及政務院通過由財政部提出的〈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簡稱「新稅制」）。由於「新稅制」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納稅」，取消了對國營企業和合作經濟的各種優惠，故被批評為增加了國營企業的稅收負擔，偏幫私商，打擊了社會主義經濟。

毛澤東於五三年二月對推行新稅制提出強力的責難：

「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反對主觀主義。」（註十九）

由於薄一波為當時的財政部長，毛澤東尖銳的批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的反映。」（註二十）

毛澤東認為出現「新稅制」的問題是由於政務院在組織上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在五三年三月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決定針對性的指出，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黨中央領導（筆者按：實質為毛澤東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工作中的重大決策，必須經黨中央先批准。〈決定〉並提出政府部門的黨組工作必須加強，各黨組直接受黨中央的領導，而現存的由周恩來任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幹事會應即撤銷。更為重要的，是〈決定〉提出重新安排政府各領導官員

的分工，各領導官員直接向中央負責：

- 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
- 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等負責；
- 財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等負責；
- 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
- 外交工作，包括對外經濟及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
- 其他不屬於這五個範圍的工作，由鄧小平負責。(註二十一)

撤銷由周恩來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重新調動政務院各部領導的負責職務、以及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等人的批評，明確顯示毛澤東已剝奪了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領導政務院的權力，高崗在政府中的地位得到加強。雖然名義上國家計劃委員會仍隸屬政務院，唯政務院的經濟權力卻劃予高崗，而他直接向中央(筆者按：實即毛澤東)負責，故他實是名乎其實的領導著「經濟內閣」。

三 高崗開展對劉少奇、周恩來等的鬥爭——黨軍論

(1) 批評劉少奇右傾

高崗與劉少奇的矛盾由來已久，在五二年高崗進京後不久，他便把劉少奇在工作中各種資料集中起來，整理成系統的材料，準備日後作批判之用。

後來，高崗發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組織和社會主義過渡等問題上出現分歧，判定劉少奇已得不到毛澤東的信任，他於是便發表〈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一文，針對劉少奇關於對待民族資產階級、農村互助合作、處理富農黨員的觀點，當為「黨內的右傾思想」，加以批判。(註二十二)

(2) 爭取蘇聯的支持

高崗曾在多個場合與蘇聯的政府官員主動提出他與劉少奇的矛盾，例如他曾在當時擔任東北鐵路系統的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面前指出：「中

國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科瓦廖夫隨即寫信告訴了史太林。高崗訪蘇回國以後，又向人散播說，史太林不喜歡劉少奇，也不重視周恩來，而最賞識他高崗。」（註二十三）

此外，他亦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說：「你說中國要不要消滅資本主義？」捷沃西安望著高崗，毫不遲疑地回答：「當然要消滅！」「我就是這個意見。」高崗點點頭，然後用抱怨的語氣說：「但是我的意見在我們黨內卻得不到支持。」高崗要求捷沃西安：「請你回去報告蘇共中央，就說在我們的中央有人反對我。」（註二十四）

（3）提出黨軍論、兩黨論，針對劉少奇

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高崗利用批判「新稅制」的機會，實施「批薄（一波）射劉（劉少奇）」（註二十五），將劉少奇許多講話加在薄一波頭上批判（註二十六），並把劉少奇個別的、已經改了的講話批判為路線錯誤，並指出：

「劉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他並不成熟。他只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只依靠華北的經驗指導全面工作，而看不起東北的經驗。」（註二十七）

除此以外，高崗並批評劉少奇在黨內搞小圈子，薄一波後來曾指出：

高崗「無中生有地說某個領導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註二十八）

在財經會議中由於高崗在會內外串連，使財經會議批判薄一波的調子居高不下，會議無法作出結論。毛澤東雖然對新稅制不滿，但卻不希望高崗等利用批判新稅制的機會製造黨內鬥爭，故在會議無法進行下去之情況下，毛澤東批評說：「有意見請提，破壞黨的團結是沒有臉的。」（註二十九）他並請陳雲及鄧小平出來講話，平衡高崗的觀點，這才在八月

上旬的會上由周恩來作結論報告，正式否定了高崗提出的「錯誤路線」的提法。

再者，高崗還把他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議論過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拿來批判，說名單來自劉少奇，此份名單本來有薄一波及林彪，但高崗卻指出名單中只有薄一波而無林彪，「連朱(德)總司令也沒有了。」據薄一波的回憶：

高崗「利用請客，組織舞會等活動，散布流言，拉攏幹部，逢甲說乙，逢丙說丁，製造黨內不和。他時而說毛主席現在不滿意某個人了，對某某又進行批評了，時而捏造說毛主席講過某個同志為惡霸，時而吹噓說毛主席對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經濟工作，如果他離開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註三十)

一九五三年，中央曾醞釀召開全國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及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而在八月份的財經會議結束後，黨中央更提出了中國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用部長會議制、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在這關鍵的時刻，高崗以休假之名，到華東及中南等地區串連，並散佈其「軍黨論」和「兩黨論」，爭取軍隊中的高級幹部支持。

高崗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由「根據地的黨」和「白區的黨」兩部分構成，整個黨都是軍隊創造的(註三十一)，「槍杆子上出黨」(註三十二)，更指出中共的幹部分為兩部分，說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而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他就是這個主體的代表人物，但現在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卻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們手裡，故應當徹底改組。(註三十三)他更提出編黨史，並質疑過往中共歷史決議指出的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作結論。

對於高崗拉攏各實力幹部的做法，鄧小平後來曾回憶道：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

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推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很不正常的。」（註三十四）

四 饒漱石配合高崗

在高崗南下爭取各地方領導人期間，饒漱石首先開展了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鬥爭，然後在五三年九、十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饒漱石再以批評安子文為名，將矛頭直指劉少奇。當時的東北局組織部長在會議上猛烈抨擊五三年以前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批判中央組織部「敵我不分，對壞人沒有足夠的警惕」，領導上有「右傾思想」，沒有保證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執行。（註三十五）後來，由於毛澤東指示要把中組部的爭論拿到桌面上解決，劉少奇主動承擔中組部的某些錯誤，以及鄧小平明確表態肯定中組部的成績，方能保持黨內團結，打破了饒漱石等利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攻擊劉少奇的策略。

在五三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討論在毛澤東休假期間，由誰代理中央領導工作的問題時，高崗便提出反對如過往般由劉少奇代理的做法。此外，他要求由他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並撤換政務院總理的人選，即是由他來擔當政務院總理。

第三節 中共中央開展對高、饒的鬥爭

一 毛澤東的表態

據薄一波的回憶，從五三年全國財經會議的後期開始，毛澤東已開始留意高崗及饒漱石的行動，毛澤東曾針對高崗指出：

「說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線錯誤，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錯誤的說法。」少奇同志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他決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毛澤東更針對「宗派」的問題，指出：「中級幹部北方人多，高級幹部南方人多，是歷史形成的，這是因為，在早期南方革命運動發展較為普遍，後來革命運動轉到北方來了。」(註三十六)

當時，毛澤東所考慮的，是盡快推行「過渡時期總路線」，通過工業化及對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從速將中國經濟推向另一台階，而經濟建設工作是極需要劉少奇及周恩來等推行的，故此，毛十分希望黨內能團結，故對高崗、饒漱石製造黨內鬥爭的做法極為不滿。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四日，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揭露了高、饒的問題，毛澤東明確表態：「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註三十七)毛更提出增強黨的團結建議，政治局並就其建議起草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並提交五四年二月召開的中央委員會通過。

二 中共開展對高、饒的批判

在五四年二月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中，毛澤東因休假而缺席，劉少奇針對高、饒的活動，論述了增強黨的團結的問題。此外，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四十四人在會上批判了高、饒的反黨活動，會議通過要求黨的其他幹部要聯繫實際作自我批評。經討論後，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註三十八)

這個〈決議〉強調團結的重要性，指出黨經過長期鬥爭中，已經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統一領導，然而部分高幹（指高、饒）對於黨的團結、集體領導及鞏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等重要性認識不足，他們在革命勝利後滋長著一種極端驕傲的情緒，忘了謙虛和自我批評的精神，誇大個人作用和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針對上述情

況，決議指出黨的唯一中心是黨中央，任何地區及部門的黨組織，都是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堅決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當作獨立王國。

在五四年二月中旬，黨中央書記處召開黨內高級幹部出席的兩次座談會，揭露高、饒進行陰謀活動的事實。在會議期間，高崗自殺，而饒漱石亦作出了檢討。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周恩來於高崗問題座談會上作總結發言，系統地批判高崗的錯誤，分別是：

- (1) 在黨內散佈所謂「槍杆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以製造「黨軍論」的荒謬理論，作為分裂黨和奪取領導權力的工具；
- (2) 進行宗派活動，反對中央領導同志；
- (3) 謠言挑撥，利用各種空隙，製造黨內不和；
- (4) 實行派別性幹部政策，破壞黨的團結，尤其是對幹部私自許願封官，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和企圖騙取別人的信任；
- (5) 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作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
- (6) 假借中央名義，破壞中央威信；
- (7) 剽竊別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 (8) 在中蘇關係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蘇團結；
- (9) 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高崗生活腐化墮落，野心權欲極強，驕傲自滿，專橫跋扈，終於從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變為一個篡黨奪權的野心家。(註三十九)

在五五年三月下旬，黨中央召開全國黨的代表會議，鄧小平代表中央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毛澤東更作了結論。毛澤東指出：「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於每一個重大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學高崗、饒漱石那樣玩弄陰謀手段。」(註四十)此外，在各同志間，對於違反黨的原則的言論、行動，應當經常主意保持一個距離。毛澤東並要求全黨要戒驕戒躁，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

義兩種傾向。會議經過討論後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並決定開除高、饒的黨籍，以及撤銷他們一切黨內外的職務。

第四節 高饒事件的總結及評論

高饒事件並不是純粹的權力鬥爭，背後實有極為重要的政治涵意。

首先，此事件反映了毛澤東與劉少奇兩種不同建國發展方針的觀點，毛劉間的分歧為一九六五年開始的文革埋下伏線。

其次，高崗與劉少奇的分歧亦反映中共於革命期間佔據根據地之軍人幹部與在國民黨統治（白區）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間的矛盾，部分軍事幹部認為打江山者應坐江山，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們出生入死，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立下不巧功績，他們對一些並無戰功、曾遭國民黨逮捕，甚至被懷疑可能曾叛變的黨員在建國後出任政府高位深感不滿。在此背景下，高崗提出的「黨軍論」必定受到不少中共高級將領的支持，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就高、饒事件的談話中提到：「沒有受影響的同志，不要驕傲，謹防害病」（註四十一）以及「要幫」（註四十二）助受高、饒影響的同志之談話中可以反映參與高、饒事件的幹部為數不少，例如在五九年彭德懷事件後，國防部長彭德懷及中共總參謀長黃克誠就被指責曾參與高、饒反黨事件，而林彪在七一年敗亡後，亦同樣被指稱支持高崗的反黨計劃。從上述資料可從側面顯示，介入此事件之軍事幹部肯定很多。

此外，值得分析的是毛澤東的態度，從意識形態來說，毛澤東當然傾向高崗所支持的較為激進的建設社會主義路線，然而，毛澤東卻對高崗打擊別人、破壞黨的團體的做法有戒心，再加上他此時極需要劉少奇、周恩來等協助其推行〈過渡時期總路線〉，故在平衡利害後，他決定支持劉少奇鬥爭高崗。而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卻又要求黨內人士放棄過往曾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思想，全力支持他推行總路線，正是在這背景下，在一九五四年二月批判高崗、饒漱石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中，中共中央通過了〈過渡時期總路線〉。

註 釋

- 註一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147頁
- 註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315頁
- 註三 O.B.鮑里索夫、B.T.柯洛斯柯夫合著《蘇中關係——一九四五—一九七零年》俄文版，第29頁
- 註四 文博編著《中共十大路線鬥爭內幕》，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185-186頁
- 註五 同上註
- 註六 同上註
- 註七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三月，）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163頁
- 註八 同註二 第308-309頁
- 註九 王學啟、楊樹標、姚鴻瑞《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196頁
- 註十 同註三，第308-309頁
- 註十一 同註二，第52-53，311頁
- 註十二 林蘊暉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296頁
- 註十三 薄一波〈回憶劉少奇同志建國初期的一些經濟建設思想〉載呂星豐編《劉少奇和他的事業》，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319頁
- 註十四 同註二，第187頁
- 註十五 同註十二，第319-320頁
- 註十六 同註二，第189頁
- 註十七 同註十二，第320-322頁
- 註十八 同註十二，第324-325頁
- 註十九 同註二，第235頁
- 註二十 同註一，第90-95頁
- 註二十一 同註十二，第326-327頁
- 註二十二 同註二，第308-309頁

- 註二十三 同註二，第311頁
- 註二十四 楚序平、劉劍主編《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華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529頁
- 註二十五 同註二，第311頁
- 註二十六 同註二十四，第523頁
- 註二十七 同註二，第312頁
- 註二十八 同上註
- 註二十九 同註二十四，第528頁
- 註三十 同註二，第313頁
- 註三十一 同註二十四，第528頁
- 註三十二 同註二，第314頁
- 註三十三 同上註
- 註三十四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一九八零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引自《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255-274頁
- 註三十五 同註十二，第330頁
- 註三十六 同註二，第319-320頁
- 註三十七 同註二，第320頁
- 註三十八 〈關於增強黨團結的決議〉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載有林等編《國史通鑑》第一卷（一九四九——一九五六），紅旗出版社，第722頁
- 註三十九 同註二十四，第533頁
- 註四十 同註一，第140頁
- 註四十一 同註一，第149頁
- 註四十二 同註二，第149頁

第十三章 共和國初期第一冤案——潘漢年、楊帆事件

導 言

「潘楊事件」是中共建國初期由高崗、饒漱石事件所引發的一宗冤案。作為國共鬥爭年代的中共特工首腦潘漢年，在被捕的過程中曾發出了「翹首望雲天，何日見青明」的呼喚。該案從一九五五年事發到徹底平反的廿九年裡，潘漢年和楊帆的罪名很少被披露。平反之日，海內外知情人皆感慨萬分，有人甚至稱之為「共和第一冤案」。（註一）

第一節 楊帆受審

一 上海推行「以特反特」的政策

一九五四年高崗、饒漱石被清算後，中央審查饒漱石在華東地區工作所犯的錯誤時，認為饒漱石在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問題上，片面強調寬大，並批評其在建國初期於上海推行的利用原國民黨特務反國民黨特務——「以特反特」的策略，掩護了大批國民黨特務，犯了右傾錯誤。而在追究饒漱石的責任過程中，把當時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也牽連進去，其實這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

中共於四九年接管上海期間，面對種種困難。首先是國民黨在被迫撤離上海時，其「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系統部署了龐大潛伏勢力；其次是國民黨後來又陸續派遣特工進入上海進行包括暗殺中共領導人的行動；再者是在舊國民黨政權下的既得利益者不甘喪失他們昔日的地盤，經常趁機搗亂，而國民黨軍隊潰敗時留下的散兵游勇到處流竄等，這一切皆使共產黨新生政權面臨很大威脅。

為更有效地打擊國民黨特工，解放初期上海公安局在楊帆主持下，建立了一個名為「情報委員會」的機構，其成員多是從國民黨特工陣營分

化出來的分子，由於這些人熟悉國民黨特務系統的運作，故能協助中共偵破國民黨特工的活動。例如在一九四九年底，公安機關能破獲國民黨特務企圖謀殺上海市長陳毅一案，就是起用了一位原國民黨特務。(註二)

二 中央質疑「以特反特」與楊帆被捕

然而在一九五一年，中央公安部對上海公安機關實行「以特反特」的政策提出三個問題：第一是使用「自首特工」時過於放手，「內外不分」；第二是由於控制這批「自首特工」不嚴，致使其中某些並未真正改正的人鑽了空子，幹了壞事，造成不良影響；第三是對被中共控制的「敵台」(即在上海與台灣保持聯繫的國民黨特工電台)控制不力。(當時有些「敵台」已被中共偵破，但為蒙騙台灣國民黨政府，中共仍保留這些「敵台」繼續發假情報擾亂敵方)，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五零年二月六日台灣飛機轟炸上海電力公司，而在此前不久，一個被中共控制的「敵台」曾向台灣提供過一份有關上海電廠等生產企業的情報，因而懷疑這其中有因果關係。(註三)

基於「以特反特」政策由饒漱石提出，具體負責「情報委員會」的則是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故一九五四年高崗、饒漱石被清算後，楊帆由於與饒漱石的關係遭受牽連。當時楊帆被指控的罪行主要為：第一 抗拒中央的鎮壓反革命份子政策；第二 「千方百計地將一大批敵特反革命重要骨幹份子用於內部，授予大權，實際上維持了反動統治階級的舊秩序，同時，他又與饒漱石相互利用，採取各種手法抵制中央，向黨委鬧獨立，並在公安系統內採取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培植個人勢力，專橫獨裁，搞獨立王國。」(大略)(註四)

第二節 潘漢年被捕

一 潘漢年報告曾被挾持往見汪精衛而被毛澤東下令逮捕

四九年夏至五五年春，潘漢年曾先後任上海市黨委常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等職務，並分管上海市的公安機關，進行

對國民黨隱蔽鬥爭。

有些歷史學者提出一九五五年中央審查饒漱石及楊帆於公安機關工作的問題時，由於潘漢年亦曾領導公安機關的工作，故他也受到一定的牽連。然而，據歷史的資料顯示，潘漢年於一九五五年四月的被捕卻與其在上海曾領導公安工作沒有直接關係。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底楊帆被扣押受審後，潘在黨及政府內的地位根本毫無影響，一九五五年三月他還以上海共產黨的代表團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出席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議期間，他亦參與了會內外的一切活動。

是次於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全國黨代表會議，討論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開除了高崗及饒漱石的黨籍。在討論高、饒事件的過程中，部分受高、饒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並同時交代自己的問題。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賞，並說：

「高級幹部本人歷史上如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的，都應當主動向中央講清楚；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能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想一想，寫成材料；現在把問題講清楚，我們一律採取歡迎的態度；尤其是裡通外國的問題，都得向黨交代，否則罪加三等。」（註五）

由於毛澤東的說話令到當時中共黨內氣氛十分緊張，潘漢年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動，在此背景下，他向華東組組長陳毅表白了一九四三年他被挾持去見汪精衛（日本侵略中國時的傀儡政府首腦）的經過，並檢討自己長期未向組織報告的錯誤。潘漢年將寫好的材料托陳毅交中央，陳毅由於感覺問題嚴重，故直接把材料交予毛澤東。

潘漢年沒有就被挾持見汪精衛一事報告中央，主要是基於當年中共黨內正進行整風，期間他曾被批評為犯了「自由主義」。潘亦指出：「在當時的氣氛下，他顧慮說出見汪情況，會被嚴重懷疑而無法弄清楚。」（註六）再加上當時潘漢年目睹新四軍三師保衛部部長楊帆被康生指責為「特務頭子」而被逮捕審查，更加深了他的憂慮。（註七）

陳毅的報告到了毛澤東處時，毛澤東先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隨後即作出立即逮捕審查的決定。潘漢年當時的罪名主要有兩條：

- (1) 在抗戰時期曾經背著黨同汪精衛勾結，並長期隱瞞、欺騙組織；
- (2) 在饒漱石、楊帆包庇掩護特務份子問題上負有直接責任。

故此，潘漢年被認定是隱藏在中共黨內的「內奸」。

二 潘漢年案件的五大反證

為審判潘漢年，周恩來指令中共情報科要員李克農組織小組，調查潘漢年於四九年以前與中央來往文電等有關檔案。一九五五年四月，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寫了正式報告，對潘漢年案件提出五個反證，分別為：

- (1) 中央早有打入敵方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這是革命的兩面政策的決定；
- (2) 潘漢年與日本人和漢奸的關係都有向中央呈交正式報告；
- (3) 潘漢年利用種種關係為中共提供了多項重大決策情報；
- (4) 中共特工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
- (5) 潘漢年的種種關係，當時正起著重要的作用，是毛澤東、周恩來所知道的。(註八)

雖然李克農的報告十分有力，但中共當時正進行肅清反革命工作，左風越來越盛，再加上潘漢年的問題由毛澤東親自定案，故李克農先後三次提交報告都沒回音。

潘漢年案件在一九五七年已調查完畢，而負責調查的機關亦解散，然而，此案件卻成為一宗懸案，只審不判。直到一九六二年檢討「大躍進」政策失誤的中共七千人大會中，毛澤東於是次會議上發表談話，指出：「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就得殺。」(註九)

基於毛澤東的表態，最高人民法院終於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對潘漢年案作了判決，認為第一，潘漢年在一九三六年國共談判中投降了國民

黨；第二，一九四零年前後，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第三，於四九年上海解放後，掩護台灣特務並向台灣供給情報，引起一九五零年的「二六轟炸」。（註十）根據上述三條罪名，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十五年，但不久卻根據寬大處理精神，將其假釋。然而，在文革期間，潘漢年再被收監，後來更遭改判無期徒刑，於一九七七年含冤病逝。

第三節 潘楊案件平反經過

「潘漢年、楊帆案件」的平反，是從楊帆開始。在打倒四人幫及以鄧小平掌權為標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楊帆案件於一九八零年四月初步平反，繼而於一九八三年全面平反。

至於潘漢年的平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陳雲起著重要的作用。陳雲說：

「當時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和主管同國民黨接觸的三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個人。我再不說話，沒有人知道了。」
(註十一)

一九七九年十月，陳雲因病入院動手術，手術前，陳雲給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寫了一個條子，鄭重地提出要複查潘漢年的案子。在另一個場合，中共高級幹部廖承志於一九八零年在黨的一個會議上發言，亦指出潘漢年案件是冤案，因為當時潘漢年對地下黨情況很清楚，但這些地下黨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因為他而遭破壞。（註十二）

基於中共高幹的爭取，潘漢年案件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全面平反，並發出通知，對潘漢年的一生作出崇高評價，徹底否定一九六三年加予潘漢年的三條罪名。重點來說，通知指出一九三六、三七年間，潘漢年是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正式代表，並無投降國民黨；其次，在抗日期間，是中共中央決定要滲透入敵偽政府，至於秘密會見汪精衛，根本是潘漢年在被突然挾持下發生，潘與汪見面後，中共地下黨並沒有受損害；第三，有關上海解放後掩護國民黨特務，引致「二六轟

炸」的問題，經查核後，根本不存在掩護國民黨特務問題，而「二六轟炸」亦與潘漢年毫無關係。(註十三)

第四節 總結

潘楊案件在當年引起震撼，不單因為潘楊是中共高幹，更由於潘是一位久負盛名、富有傳奇色彩的特工首腦，在普遍中共幹部心中，他們都是最可靠的、為共產黨深入虎穴的、不計個人生死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的風雲人物。當時出現這宗冤案，主要有下列三個原因：(註十四)

第一，案件由毛澤東親定。在盛行個人崇拜的時刻，一切審查工作全循毛澤東已肯定潘漢年有犯罪的思路進行；

第二，一九五五年，中共正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在文革期間更是階級鬥爭論流行，對敵鬥爭的左傾思想主宰著辦案者的思維，沒法冷靜行事；

第三，參與辦案的大多數幹部來自中共以軍事佔據的根據地，他們閱歷有限，未能洞悉在國民黨或日本統治區鬥爭的複雜性、特殊性和靈活性，往往只抓住一點不放。例如，潘漢年在敵方獲取許多重要情報的功績往往被忽視，而潘為了取得敵方信任不能不適度向敵方提供某些情報的情況卻被看得極為嚴重。

在上述歷史背景下，終於製造了中國共產黨內一樁牽連多達千人的冤案。

註 釋

- 註 一 楚序平、劉劍編《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華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535頁
- 註 二 尹騏〈潘楊案件始末〉載《潘漢年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372-4頁
- 註 三 同註二

- 註 四 林蘊暉等著《凱歌進行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524頁
- 註 五 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載同註二，第364-5頁
- 註 六 文光〈潘漢年冤案的前前後後〉載同註二，第424頁
- 註 七 同註六
- 註 八 同註五，第366頁
- 註 九 同註六，第417頁
- 註 十 同註四，第525頁
- 註十一 同註五，第367頁
- 註十二 同註四，第527頁
- 註十三 同註四，第528-9頁
- 註十四 同註二、第383頁

第十四章 胡風事件與肅清反革命運動

第一節 胡風與中共文化部門當權者的權力鬥爭

胡風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是四九年解放前「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的一個領導成員，從事左翼的文藝活動，早年追隨作家魯迅。早在一九三零年，在文藝戰線上，左聯和共產黨建立了良好關係，但胡風卻對共產黨的文藝路線作出批評。共產黨為了爭取左聯支持、團結魯迅，故把魯迅推舉為左聯的負責人，但實際的工作則由共產黨員周揚負責，魯迅曾對此表示不滿，並指出「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由於魯迅、胡風一派與共產黨的鬥爭，使共產黨感到無法利用左聯來推動革命，故於三六年在未經魯迅同意下解散左聯，另組「中國作家聯合會」。後來魯迅一派還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與周揚等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對抗，周揚對胡風等不服從中共的政策大為不滿，矛盾從此產生。

此外，中共與胡風等就文藝理論亦有不同的觀點，這亦加深兩者的矛盾。

據中共視為文藝理論的權威論著——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而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要為工農兵服務，就必須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徹底改造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大略)(註一)

至於胡風，他特別強調「文藝家的人格力量」和「對於現實生活的深入和獻身」在文藝創作上的關鍵作用，他更主張「實真實」和「主觀戰鬥精神」，簡而言之，胡風所注重的是作家的「主觀能動性」。

建國後中央政府為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控制，一方面通過各種政治運動如反武訓、反紅樓夢研究及反胡適思想等以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而對一些較為傾向政府的作家，則委任他們當人大代表或文聯正副主席的職位。此外，政府並成立了文聯和作家協會，把全國所有的報刊雜誌，

變成各文聯作協的機關刊物，任何作家如希望發表他們的文章，都要先加入這些組織，於是作家都需要於組織之下工作了，這樣他們就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控制了。

一向在左翼文壇中處於反對派地位的胡風集團，當然成為文化當權派的打擊對象。當時，中共文藝界領導人周揚指責胡風為「小集團的核心人物」，《人民日報》亦批評「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後來，由中共控制下的文藝報開始動員批判胡風。在這情況下，胡風文學流派人物要刊出作品就十分困難了，就是僥倖能成功出版，又可能會被當權派的惡意批評而大大影響銷路，有時當權派甚至乾脆要求書局禁售他們出版的書刊，所以胡風曾指出「文藝這領域，籠罩著絕大的苦悶，許多人等於帶上了枷，但健康的願望普遍存在著。小媳婦一樣，經常怕挨打的存在著。」(註二)

為了應付文化當權派的鬥爭，胡風及其支持者採取了多種應付方法如申請加入共產黨、寫一些支持正統文藝觀點的文章及聯絡知識分子、學生和某些中共幹部，以爭取他們的支持，以建立一定的群眾基礎。而最為重要的，就是直接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告狀，以批評文壇的不平等現象。

第二節 胡風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及其主要內容

在高崗，饒漱石事件後，中共於一九五四年二月發表針對高、饒事件的公報，指出：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的一些幹部滋長了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註三)

胡風對高饒事件並不知情，但卻認為周揚等在文藝界的做法，正正

就是如上述公報批評的壓抑不同意見，而自己多次遭批判亦是由於與周揚等有矛盾有關。現時既然中共已公開批判上述行為，故胡風認為是一個絕對有利的時機，為自己翻案。

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風向政治局呈交了長達三十萬字的意見書，內容主要批評中共的文藝理論和政策，並要求當時文化界的當權派要負起對建國後文藝作品缺乏，作家不敢寫作的問題負責。

胡風認為，共產黨文藝政策要求作家掌握共黨主義世界觀、同工農兵結合、改造思想、發揚民族形式、寫重要題材的五個原則，乃是加在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

這五把理論刀子的第一條是「作家要先有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才可從事創作，否則就產生不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胡風批評說：只要作家能感到人民的痛苦和渴望，用藝術形式把人民的感想寫出來，就是成功的作品。

第二條是「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就不是生活的觀點」，胡風反對此觀點，並堅持到處有生活，到處有鬥爭，只有理解市民日常生活的作家，才可以真正把市民的感受表達出來，而無須要整天機械地描述工農兵的生活；

此外，對於第三條的思想改造問題，胡風指出「只有思想改造好才能創作……這就使作家脫離現實，脫離勞動，使現實內容無法走進自己的內部」，胡風認為作家「應該在忠於『事實的教訓』的態度下事創作實踐，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實踐過程去逐漸達到變革世界觀」，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思想改造。

在第四條有關民族形式問題上，文壇當權派批判胡風的論點是對民族文化遺產的徹底否定，但胡風指出，現時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國際革命文藝，他批評當權派說「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文藝的經驗，那就呈拜到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

胡風更批評當時當權派在第五條中要求重視題材的指示是「題材決定論」，「所謂重要題材，又一定是光明的東西，革命勝利後不能有新舊，更不能死人，革命勝利了不能有落後和黑暗等等，這就使作家甚麼也不

敢寫，寫的當然是通體『光明』的，也就是通體虛偽的東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後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進之光明。」

最後，胡風指出：「問題不在這五把刀子，而是那個隨心所欲地操縱著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義。」

在批評了上述觀點後，胡風便向黨中央提倡改革文藝界的方案，他強調文學有自己獨特的領域，文學並不從屬政治，也不應該受政治所支配，作家的活動不應受黨的領導，也不能以行政領導方式強求文藝的平均化及少數服從多數，他強調「必須保證個人創造性，個人愛好的廣大空間，思想和幻想、內容和形式的廣大空間」，胡風更責備當時的文壇是受一批文藝官僚所控制，他們對作家及作品操著生殺大權，實行「軍閥統治」，故此胡風建議必須解散目前由這些「軍閥」控制的文藝刊物，並解散由行政管理的「所謂創作機構」，再由作家自由組合重新創辦新刊物，而將來各有關選稿及發表之問題，全在作家手中，黨不應加以干預，黨應尊重文藝的獨立性，不應影響作家們的決策。

總括而言，胡風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作家的創作活動不應受黨的領導，他這種觀點與毛澤東所強調的文藝必需為政治服務的說法是大為不同。毛澤東認為文藝既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故受黨的領導是理所當然的，胡風的意見書無疑是對這個最高原則的挑戰。

第三節 批判胡風運動

胡風的文藝理論直接挑戰中共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原則，故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作出研究後，於一九五五年一月向中央作了〈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報告批判胡風：

「誣蔑現在文藝界的領導是『瘋狂』的『宗派主義』的『軍閥統治』……實質上是取消黨對文藝工作統一領導的原則，取消作家的統一組織，使文藝運動成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動。」（註四）

報告進而指出胡風及其一派的錯誤思想為：

「(一)在文藝和政治的關係上，否認藝術服從於政治的原則和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否認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二)不承認革命作家的根本問題是階級立場問題——而是加強固有的所謂『主觀戰鬥精神』；(三)否認作家應具有先進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四)否認文學反映人民的重大政治鬥爭和表現現實中的迫切題材的意義，而片面地強調描寫自發鬥爭。」(大略)(註五)

中共中央同意中宣部的報告，並指出應對胡風加以徹底批判，並把是次批判看成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文藝界遂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活動。

在遭受猛烈批判期間，胡風寫了〈我的自我批判〉，但卻未能過關，與此同時，中共文藝領導人多次找過往曾與胡風交往的作家舒蕪談話，鼓勵他將胡風過往寄給他的信件發表，在此情況下，舒蕪把四九年前胡風給他的信摘錄並加以注釋來公開。

毛澤東看了舒蕪整理出來的材料以及胡風的檢討後，斷定胡風等人是「反黨集團」。在五五年五月及六月間，《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胡風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的三批材料，使運動走向高潮，《人民日報》把胡風這個在抗戰時反帝反國民黨的左翼知識分子攻擊為帝國主義走狗及國民黨特務，毛澤東更批判胡風集團是：

「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註六)

胡風在重重壓力下作了多次自我批判，但仍過不了關，除將他所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及全國人大代表的職務撤銷外，並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將其拘捕及監禁，同時又在學校、機關和團體中，大肆搜捕暗藏的胡風集團者，使很多無辜的知識

分子受到迫害。

胡風一案直到四人幫下台後才逐步得到平反。八零年初，中共中央正式下達七十三號文件，宣佈為胡風案件正式平反，文件指出，胡風案件一共觸及二千一百人，逮捕九十三人，最後定為胡風分子七十八人，定案的時候，主要是根據毛澤東於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按語，按語指出胡風分子乃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特務、潛在於人民內部，希望進行反革命勾當，但七十三號文件卻指出經過查明後，發覺胡風集團中根本無人犯過上述按語指出的罪行。此外，文件也指出胡風於五四向黨中央呈交的卅萬言意見書，也是循正當途徑提出，並未擅自公開發表。因此不應將胡風等人作反革命處理，原單位應要給他們安排工作，恢復黨籍，對經濟有困難的人要給予照顧。

第四節 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的開展

一 推行肅清反革命分子（肅反）運動的原因

在胡風被捕後，中共於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五七年開展了一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簡稱肅反）。在某程度上，肅反是由胡風事件引發的。據共黨的邏輯，既然胡風反革命集團能在人民內部暗藏了這麼久的時間，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其他反革命分子也會以各類方式暗藏於人民內部以進行破壞。

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以胡風事件吸取教訓〉一文中，提出「如果胡風反革命集團能夠混到我們的隊伍中來，為甚麼別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用類似胡風的兩面派手法，暗藏在我們的機關中呢？」《人民日報》在七月三日的社論〈堅決肅清胡風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進一步指出：「當前的迫切任務就是要通過胡風事件，在所有我們的機關、團體、企業、部隊、學校和合作社以至城鄉的廣大人民群眾中進行廣泛深入的教育。這是肅清暗藏敵人的鬥爭順利開展的根本關鍵之一。」

雖然胡風事件使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得到敵對分子「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註七)的判斷，然而，其實在一九五五年推行的肅反運動卻仍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1) 打擊隱藏敵對勢力

中共認為一九五一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打擊對象主要是公開反對現政權的分子，然而，「大批的採取兩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則我們還沒來得及實行堅決的揭露和處理。」(註八)據政府資料指出，單在一九五四年全國工礦企業內的破壞事故多達三百四十宗，十三個省發生暴亂八宗和十九宗騷亂事件，共有八千多幹部被不法地主兇殺及暗害。

(2) 為社會主義改造奠定政治基礎

推行肅反運動的最主要原因，是由於五五、五六年將是農業、手工業及工商業等三大改造的高潮，要將新民主主義容許的私有制，改變為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由於變更所有制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將有可能受到農民、手工業者及商家的反抗。而以上所指之破壞及謀殺的案件，政府都認為乃是由於不法地主和反動富農，為了破壞合作化行動、破壞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而發動的進攻。故此，在推行合作化高潮之前，進行一場肅反運動，打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壞合作化道路的人，這樣無疑可以為政府的經濟目標掃清道路。

《人民日報》社論指出：

「在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運動中，階級鬥爭更加尖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進行破壞活動……這就要求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充份注意加強自己對群眾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組織領導工作。」(註九)

二 肅反運動的開展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中指出：「國內

反革命殘餘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計劃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去，借以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安全。」(註十)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全黨必須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進行鬥爭的指示〉，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再支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七月一日的文件指出：

「高饒集團、潘楊集團、胡風集團的揭露，僅僅是我們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的開始，在很多部門，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還沒有被揭露和肅清的。」(註十一)

文件進而提出肅反運動的目的是：「第一，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提高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第二，利用胡風事件，在全國各個工作部門和各條戰線上，經過坦白檢舉，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文件更批判黨內對反革命分子不予鎮壓為麻木不仁的右傾思想，並規定了在領導機關的領導下，要大張旗鼓地推行肅反工作，並就各項的工作作了具體的部署。

在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再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作出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份子均佔百分之五左右的估計，明確的為肅反運動定出需打擊對象的數目。

根據中共的部署，肅反運動共分四批推行。第一批在中央和省市兩級的黨政軍的領導機關進行；第二批在縣區兩級機關幹部和廠礦、基建單位的職工及中小學教職員中進行；第三批在縣區的附屬單位、小學教員及一些分散的小型廠礦中進行；第四批在街道居民中舉行。(註十二)

而每一批的肅反工作，大體上經歷四個階段：第一為理論學習和運動準備階段；第二為小組鬥爭和揭發階段；第三為定案階段；而第四則為複查階段。整個運動至五七年底五八年初結束，清查了一百七十多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其中問題嚴重的近十三萬人。

三 運動的偏差與糾正

反胡風集團及於校園內進行肅反運動差不多是並肩進行的，在校內搞的肅反運動，有時為了湊足中共中央所指出的每個組織內至少有百分之五的壞分子之指示，往往出現無理批判及擴大化的情況。據民盟會員周鯨文指出：

「反胡風運動主要是在學校、文化機關團體進行……討論時要結合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工作。……在學校……先是教職員進行學習檢討，不少教職員因為檢討胡風問題，自己也不是胡風集團份子，但檢來檢去，變成了反革命份子。每個大學或專門學校至少搞出幾十個人。」(註十三)

另據曾經歷過肅反運動的北京學生唐柱國指出：在肅反運動前，各大院校內的黨組織早已透過告密者提供資料的途徑搜集了校內每一個師生員工的資料，在肅反運動開始時，他們便根據中央指示成立了「肅反核心小組」，根據校內每個人的資料而確定「肅反對象」，不幸被選為對象的人，往往是一些平時喜說調皮話，對告密制度不滿或和共產黨員有所爭執的人。當「對象」確定後，他們便將這些「對象」按比例分給各小組去鬥。而各小組的任務是用盡一切方法，迫令這個被鬥者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假若小組不能完成任務，則全組的人都有反革命的嫌疑。被選做對象的人，往往先被幽禁，並被著令把自己和家庭歷史，從八歲起所認識的親戚朋友、老師等社會關係的人的歷史，以及他們各人的政治面貌、思想狀況全部寫出來，當被告人在寫自白書的時候，共產黨就會聯絡其朋友「大義滅親」，否則，他們自己也可能被牽連，被控告以同樣的罪名。

當這些工作做好以後，「對象」會被帶到小組會中接受批判，要「對象」自己承認一切被加諸於其身上的罪名，否則將受到酷刑對待，在神智昏迷及拳打腳踢的情況下，被告往往只好低頭認罪。(註十四)

周鯨文在視察上海和杭州監獄時，發現了三個特點：第一是監獄裡的犯人有百份之九十五是犯了所謂「反革命」罪；第二是他們被判的刑罰

往往高達五年與十五年之間；第三是他們都不希望上訴。周鯨文解釋縱使政府允許犯人上訴，但他們並不敢這樣做，因為共產黨對囚犯往往是「抗拒從嚴」，幹部為免麻煩，經常恐嚇犯人不許上訴，而犯人為避免遭受更大的報復，故也不敢上訴。（註十五）

其實，中共中央對於肅反運動中某些過火的過激傾向亦有所察覺，為控制這類問題，中央在對各地上報的材料的批示中一再強調要嚴禁採用體罰等各種「逼、供、信」形式。五六年三月十日中央十人小組公佈〈關於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時規定〉中指出：「只有特務間諜、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頭子、惡霸、土匪、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托派分子、漢奸、蔣匪軍政警憲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才可定為反革命分子；只有是政治騙子、叛變分子、流氓分子、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分子，才可定為壞分子。」（註十六）

在同年九月，公安部長羅瑞卿曾指出：

「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開始的肅反運動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在社會上捕了一些本來可以爭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錯捕了個別的好人。在機關內部，某些單位也有鬥爭面過寬的缺點，鬥了少數不該鬥的人。……黨中央最後決定：對於運動中錯鬥、錯捕、錯關、錯判的人，必須認真進行檢查，做到甄別、平反工作。」（註十七）

註 釋

- 註 一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804-835頁
- 註 二 《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五月廿四日
- 註 三 林蘊暉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513頁
- 註 四 同上，第517頁
- 註 五 同上，第517-518頁
- 註 六 毛澤東「〈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載《毛澤東選

- 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163頁
- 註七 同上註
- 註八 〈堅決肅清胡風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五五年七月三日
- 註九 〈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 註十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三月)載同註六，第141頁
- 註十一 同註三，第530頁
- 註十二 楚序平、劉釗主編《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華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584頁
- 註十三 周鯨文《風暴十年》，時代批評社出版，一九五九年，第256頁
- 註十四 唐柱國《北平學生反共抗暴紀實》，第21-26頁
- 註十五 同註十三，第271頁
- 註十六 廖蓋隆等《當代中國政治大事典》(1949-1990)，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557頁
- 註十七 同註三，第532頁

第十五章 毛周衝突——反冒進與國力論的提出

第一節 一九五三及一九五六六年經濟出現兩次冒進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五三至五七年）執行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的進度上，出現了兩次急躁冒進傾向，分別為五三年的「小冒進」與五六年的「大冒進」。

一 一九五三年的「小冒進」及糾正

中國政府在五三年初制定財政預算時，把上年已作為銀行信貸資金使用的財政結餘重複列為本年收入，用於本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犯了雙重支出，或「一女二嫁」（註一）的錯誤，嚴重加強社會上的需求。

此外，在一些省市及部門中，各級幹部為加快建設速度，出現了不顧條件、盲目冒進的投資傾向，加大了政府開支，造成了在五三年六月財政上出現赤字二十一點五億元。六月至八月間，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要求今後的建設要防止盲目性，計劃必須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財力務須集中，並強調節約。到五三年底，財政收支情況好轉，並出現財政結餘二點八億元。（註二）

二 一九五六六年「經濟的大冒進」

經過五三年經濟的調整，中國經濟連續幾年皆健康的發展，成效顯著，農業更在五五年獲得大豐收，接二連三的建設勝利成果，使毛澤東等領導人信心百倍，頭腦更開始熱起來。毛澤東豪氣萬千地說道：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註三）並把當時黨內對進行得如火如荼的「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上主張緩進的觀點，當作「右傾機會主義」批判。

五五年底，毛澤東更開始注視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十二月，他在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指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發展，「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這些都應該適當地擴大加快。」此外，毛澤東更指出現在應批判在農業、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中的右傾保守思想，「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註四)

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人民日報》於五六年一月一日發表〈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的社論，號召全國人民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

然而，中國的經濟卻由於指標過高。任務過重，以致產生很多問題：

(1) 基本建設規模過大

在五六年夏天，政府將五年計劃期間的基本建設項目由原定的六百四十九個猛增到八百多個，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一，超過了財政收入速度。此外，農業生產急於求成，企圖在兩、三年內就完成十二年的任務，故在制定農業生產計劃時，指標一再提高，如糧食由原定增長之百分之一點七上升為百分之九點一，棉花由原定減少百分之一點三改為增長百分之一十八。

(2) 工資的開支多了六至七億元

在五六年各個企業招收的工作人員，比原計劃的八十四萬人多了一百萬人，而部分工資亦增加得過多，機關、企業人員的升級機會加多，有些獎金制度也不適當，使政府多開支了六至七億元。

以上急躁冒進的行動，給國家帶來很多困難。表現為財政緊張，入不敷出、國家在財政支出和銀行信貸方面多支出了近三十億元。此外，基本建設和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鋼材、木材、水泥、煤炭等出現了供應緊張的現象。人民生活的日用消費品也供不應求。由於缺少原料，手工業者到處抬價搶購廢鋼鐵，有的地方發生了手工業者搶去供銷合作社

原材料的事。此外，市場亦出現黑市買賣及囤積投機，一些工廠更出現了產品質量下降、忽視工業安全及工傷事故偏多。當時，國家的物資儲備被過多的動用，造成國民經濟相當緊張的局面。（註五）

其實，按物資的數量來說，一九五六年比五五年增加，而出現了物資供不應求的情況，則主要是財政及信貸多支付三十多億元。

第二節 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反冒進問題上的衝突

在五六年初，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已敏銳地察覺處在萌芽狀態中的經濟緊張形勢，他指示國家計委及財政部對各項經濟建設的計劃要「壓一壓」。（註六）周恩來於二月八日指出：

「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註七）

在二月十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周恩來針對嚴重脫離物資供應、破壞國民經濟整體平衡的指標，進行大幅度的削減，將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七零多億壓到一百四十七億元，是次會議歷史稱為「二月促退會議」。（註八）

然而，嚴峻的經濟緊張局面並沒有改變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急躁冒進情緒。五六年四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建議再追加一筆大數額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直言勸阻說：「如果還要追加建設投資，經濟秩序就要搞亂了，將會繼續加重物資供應的緊張程度，增加城市人口。還會帶來其他的一些困難。」（註九）但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仍堅持己見，而當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

面對毛澤東的壓力，周恩來並沒氣餒，五六年五月十一日，周恩來以「敢於抗大流」，「只要摸（清）了實際情況，就要敢於抗大流」的無畏精

神，在國務院會議上指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註十)

六月二十日，周恩來建議《人民日報》發表〈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社論的基本觀點是：

- 一、描述已出現急躁冒進的客觀狀況；
- 二、尖銳地指出：「急躁冒進所以成為嚴重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於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
- 三、糾正急躁冒進「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

毛澤東對這篇社論十分惱火，後來(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中)毛澤東尖銳地指出：

「……五六年六月一篇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三扁擔，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麼看……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註十一)

五六年十一月，中共舉行八屆二中全會，周恩來聯繫蘇聯、東歐的民主化浪潮，談到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繼續批評五六年的急躁冒進，指出五七年計劃的方針應是「保證重點，適當收縮」，否則，將進一步影響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的平衡，也可能出現中國的波茲南事件(指波蘭的群眾運動)。(註十二)

毛澤東對八屆二中全會發展為一次全面反冒進的會議，感到意外，並明確表示不贊成反冒進的繼續展開。

五七年一月下旬，主管經濟事務的財政部長李先念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上談到經濟平衡的重要性，毛澤東卻對是次會議中出現的反冒進氣氛不滿，他指出：

「要足夠地估計成績……估計低了，那就要犯錯誤，可能要犯大錯誤。」「這個問題，本來是二中全會解決了的，但是這次會上，還有許

多同志談到這問題。可見得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還有問題。」（註十三）

從五七年中旬開始，毛澤東開始將注意力從蘇聯共產黨批判史太林及東歐的民主化浪潮，再次轉移到經濟建設速度問題上，並接二連三的猛烈批判反冒進，而在此基礎上推行大躍進政策。值得留意的，是毛澤東針對周恩來的反冒進，在五八年上旬竟有撤換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之構想。（這將在〈大躍進時期的經濟、政治發展（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的一章中詳細討論）

第三節 解決急躁冒進的措施

針對經濟過熱，各項物資供應緊張的形勢，周恩來、陳雲等領導人在五六、五七年初採取了下列措施：

一 減緩經濟增速

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額，並將工業總產值降為增長百份之十九點七；糧食產量降為增長百份之八點四等，這樣做之目的，在於使五七年的建設規模，能適應國家財力和物力，如鋼材、木材等原材料供應的實際情況。

二 控制社會購買力增長的速度

在五七年後兩年，減低工資的加幅，凍結政府對農業產品的收購價格。在提供就業機會方面，除安排大中學畢業生外，各部門不准增加工作人員，升級加薪一般停止兩年。同時，政府還要積極推銷公債，鼓勵儲蓄，使市民購買力的增長能在計劃控制下，以保證消費品的供應能和社會購買力平衡。

三 展開增產節約運動

在增產方面，農業和有銷路的副業產品，有原料、有銷路的工業和手工業產品，應該盡量增產。在節約方面，要求大量節減行政部門、事

業單位和企業單位的行政管理費用，嚴格限制工作人員的增加，調整現有的機構和人員，不合理的工資福利制度，消滅鋪張浪費。

第四節 陳雲「國力論」的提出

針對五六年的冒進，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在五七年一月於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會議上發表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重要講話，提出了著名的「國力論」。(註十四)陳雲認為在實際工作中，最關鍵的是要控制建設規模，使建設規模與國力相適應。而適應還是不適應，將是經濟穩定和不穩定的界限。雖然國力論的觀點是在五七年提出，但它卻是一九七九年後中國推行新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理論根據，其經濟理論如下：

一 建設規模的意義

建設規模也即是國家基本建設如興建新工廠及發展各項新的事業的規模。基本建設的規模與投入的財力物力是成正比的，基建規模越大，則需投入的財力物力就愈多，而這是不僅由國家當年投入的財力物力而定，而且要由國家連續投入的財力物力而定。這就是說不能按某一年的特定情況如農業大豐收而釐定建設規模，因為假若在以後幾年農業失收的話，新的基本建設便由於缺乏原料而不能運作，新建的工廠便須關閉，這無疑會造成很大的浪費。此外，搞基本建設不能單看投資的項目，而更須考慮配套的能力。

二 國力的意思

所謂國力，是指在維持現有生產和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以後的那部分剩餘產品。不能把當年生產的全部產品用作為搞基本建設的國力，而必須從中進行一系列的扣除。首先，要扣除滿足現有企業繼續生產而所必須用的原材料，以及維持現有職工生活的消費產品，這即是要維持現有的生產和市民生活，其次，要扣除各種非物質生產部門如政府機關

及學校等不可缺少的需要；最後，還要將全年產品拿出一部分來改善人民生活。就拿城市職工住宅做例子，由於城市人口從五二年的七千一百萬人開始大幅增加，但由於住宅建設增長十分慢，以致城市人口的平均住宅面積還低於四九年。面對居民生活下降情況，國家有需要從全年產品上撥出一部分以改善市民的生活，在扣除了這幾個需要之後的剩餘產品，才是用來搞基本建設的「國力」。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就是建設規模要和這部分剩餘產品相適應。

有一點要強調的是，國力是指剩餘產品，是一個「物資」的概念，與鈔票不同，鈔票只是物資的籌碼，加印鈔票十分容易的，但假若鈔票多了而沒有相應物資的提供，只會造成通貨膨脹或市民需輪候購物的局面。

三 基本建設規模過大的後果

基建的規模超過國力的可能時，會造成嚴重後果：

- (1) 必然會佔用原材料，從而影響現有企業為繼續生產而需使用的原材料的供應，使生產出現閑置及浪費現象；
- (2) 建設的規模過大，佔用的物資過多，必會影響人民生活的改善，限制著科學、文化、交通、醫療及房屋等事業的發展；
- (3) 建設規模太大，將影響基本建設項目的經濟效果。由於建設項目太多，必會分散國家的財力物力，並由於配套如交通、電力、各種燃料的提供不能配合，必會延誤工期，造成工程價格過高、經濟效益差甚至工程不能完成而出現完全浪費的現象。

四 防止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制約方法

- (1) 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結餘，這樣社會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之間，也將出現平衡。這就是陳雲著名的財政、信貸及物資「三大平衡」理論。一九五零年到五五年，財政收支平衡和物資供需平衡的狀況，從正面證明了這一點。在五六年，由於有了

赤字，即是入不敷支，收進的物資不足以應付支出所需物資的數量，以致造成了物資供應不平衡，也就從反面證明了這點。

- (2) 物資要合理分配、合理地安排。應該先保證必需的生產和消費，然後再進行建設，一定要避免盲目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影響生活必需品的生產。這裡要留意的是基本建設搞多少，不決定於鈔票有多少，而決定於原材料有多少。
- (3) 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一定要和能夠供應的消費品相適應。這裡就要特別留意工資的增長及農產品提價之問題，因為涉及了工人和農民的購買力之增長；
- (4) 基本建設規模和財力物力間之平衡，不單只看當年，而要從長遠考慮，保證前後銜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波動。
- (5) 要重視農業對經濟建設規模的重大約束力。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生產緩慢，必影響工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影響一般在次年就可表現出來。故此，基建的規模要充份考慮到農業的約束力。

註 釋

- 註 一 柳隨年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明教程》(一九四九—一九八五)，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119—120頁
- 註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一九四九—一九八五)，第48頁
- 註 三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
- 註 四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關於〈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23、224頁
- 註 五 林志堅《新中國要事述評》，中共中央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38頁
- 註 六 林蘊暉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626頁
- 註 七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190頁
- 註 八 同上註

- 註 九 同註五，第139頁
- 註 十 同上註
- 註十一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152頁
- 註十二 同註五，第147頁
- 註十三 同註五，第150頁
- 註十四 陳雲〈建設規模和國力相應應〉載《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48-57頁

第十六章 檢討蘇聯發展模式與第八次全國黨大會

導 言

中國在五三年開始的五年計劃的經濟發展策略，基本上是模仿蘇聯的情況，正如毛澤東後來指出：「解放後，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對於中國而言，蘇聯是第一個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亦是經濟成功的典型，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當時所面對的困難，也與蘇聯於二十年代所遇到的問題相似——被帝國主義圍堵，新生政權面臨生存的威脅，國內重工業及國防基礎薄弱，極須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等。^(註一)再加上蘇聯於一九五三年與中國簽訂協議，願意支援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一百四十一個大型基建項目，接受蘇聯的經濟援助也意味著接受蘇聯管理經濟及訓練人才的方法。故此，中共乃強調「蘇聯過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榜樣。」^(註二)

然而經過數年的實踐經驗，靈活及實際的中國領導人開始發覺蘇聯曾走過的道路並不一定適合中國，面對著經濟上種種的困難，他們開始思索一條能突破蘇聯模式而適合中國實際環境的發展道路。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的文章，標致著中共領導人探索的初步成果。毛澤東曾指出：

「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指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註三)

第一節 蘇聯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模式與中央計劃 經濟制度及其弊病

一 蘇聯模式

為了高速發展經濟，建立重工業及國防工業基礎，蘇聯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提出以大量工業投資方式來發展經濟的「大推進」理論，「大推進」理論 (Big Push Theory) 的原則是只有全面地、大規模地投入資本，工業化才能從速實現，停滯不前的經濟才能有所發展，在「大推進」理論底下，蘇聯又採取「不均衡成長」(Unbalanced Growth) 的發展策略，即集中主要力量投資於一部分工業，以之為動力，逐步去擴大對其他部分工業的投資。(註四)「不平衡成長」理論提出了有名的「聯繫效應」(Linkage Effect) 概念，即指一個部門在投入和產出上與其他部門之間的關係，例如外國對某一個國家的某類產品需求增加，這將刺激到此出口行業及與其相關的商品的生產並增加從事此等行業人員的收入，而此等行業人員在國內的支出將刺激其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令到一個長遠的聯繫效應開始，使整個國民經濟得以被此出口行業的帶動而成長。蘇聯的情況，是特別強調重工業比消費品生產行業優先的增長，故此在經濟發展策略上，重工輕農，而在工業中又突出重工業的決定性作用，其特點可分述如下：

(1) 高累積、低消費的「大推進」理論

強調假若能將國民收入的大部分用於投資，建新廠房，將會提高國家的經濟基礎和能力，有利長遠的利益。然而，過份強調高累積意味著市民的消費問題不能得到重視，並將影響著生產者的情緒而導致生產效率的下降，而且過高的投資率，會分散了國家用於建設的財力物力，使各項物資供應不能趕上，影響各項建設項目的經濟效果，更會由於將過多的資源用於重工業，影響消費品的生產，使居民有錢也買不到日常必

需品，形成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及黑市場的出現；

(2) 重工輕農的投資策略

蘇聯一向強調投資的重點放於重工業，故對農業及輕工業的投資也就較少。政府相信投資於重型工業，即製造機器的工業，長遠來說對經濟最有利益，因為這些重型重工業能生產出大量機器以支援一些落後的勞工密集工業及農業的發展，史太林曾經指出：「生產資料生產(筆者按：即製造機器設備的行業)的增長之所以必須佔優先地位，不僅是因為這種生產應當保證自己的企業以及國民經濟其他一切部門的企業所需要的裝備，而且是因為沒有這種生產就根本不可能實現擴大再生產。」(註五)

然而，由於此政策往往忽視農業及輕工業的生產，而導致重工業所需的燃料及原材料不足，反過來影響重工業生產的能力，在這種「不平衡發展」策略下，蘇聯的農民成為最受剝削的一群，國家為保證以農養工，除了採取強行徵收和不等價交換工農產品外，更積極推行農業集體化以達至規模經濟，提高生產率以支援工業的高速發展。史太林曾斷定小農經濟不能支援重工業的大量投資，故必須推行農業集體化：「能不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就是說，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後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基礎上呢？不，不能。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使整個國民經濟全部崩潰。」(註六)

(3) 推行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制度

為保證生產的發展次序能按國家的計劃安排，蘇聯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所有重要的經濟決策均由中央的官員控制。當時推行這種經濟管理制度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原因有二：首先，有必要集中較多資源來達成工業化及國防需要的目標，並避免資源虛耗於其他與高速工業化不符的目標上；其次，懂得工業管理的幹部十分缺乏，管理水平亦不高，故此，管理權的高度集中將更有效地調動這批職員工作。

二、蘇聯模式的弊端

蘇聯模式的管理體制在經濟發展後卻面對很大問題：

(1) 生產與需要脫節

隨著經濟規模日益龐大，經濟結構的日益複雜，政府的計劃往往與社會的需要脫節。政府由於無能力估計市民千變萬化的需要而作出錯誤的生產決定，以致一方面國營企業商品滯銷，而市民卻又買不到合適的東西。

(2) 低落的生產效率

由於負責生產的部門往往只重視完成國家分配下來的生產任務，對產品質量及生產成本等問題毫不考慮，以致形成很大的浪費。

(3) 缺乏橫向聯繫

部門系統的行政命令，只能維持一個由上而下的「縱向聯繫」，而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橫向聯繫，卻得不到承認，以致有些工廠想購買一些十分簡單的零件時，明知隔鄰的工廠有所供應，然而卻由於管理的程序要一級一級的向上級申請，以致浪費了不少時間及形成了很大的混亂。

(4) 容易造成決策失誤

在集體經濟的體制下，企業受到各方面的限制而缺乏自主權，不能靈活處理生產事務，而另一方面國家計劃機構的負擔卻十分沉重，容易犯上決策失誤而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

(5) 形成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

由於要維持著一個高度集中的經濟制度，客觀上便需要將生產權力中央化、絕對化。要使整個經濟體制聽上一級的調配，無可避免地要將權力上交。然而，權力容易使人腐化，在蘇聯隨經濟權力集中而來的便

是各類特權的出現，這對整個社會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第二節 蘇聯模式下的中國經濟及其產生之間問題

一 蘇聯模式下的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

(1) 「一五計劃」的局限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中國基本上執行「大推進」及「不平衡發展」的經濟策略，採取高累積、低消費的方法，更把投資大部份集中於發展重工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建中，政府將大部分基建投資於重工業，而投入農業之資金僅佔總投資額的極少比例。由於基建資金大部分取於農民，故此，政府乃實行統購統銷及農業合作化的政策，以貫徹以農養工的目的。但農業的發展落後於工業，造成經濟發展之樽頸，使輕工業設備無法發揮其潛力；另外，資本密集工業所能吸取之勞動力極為有限，無助解決失業，使就業不足繼續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再者，一五計劃所採取的經濟發展方法基本上是「外延式」的發展方法，即是以增加資本及勞動力的方法進行建設，而不是採用「內涵」的方法，即更好地利用現有的生產能力，通過提高科技，更有效率地結合勞動力和資本，以達增產之目的。

(2) 「一五計劃」採納蘇聯模式，發展重工業的客觀原因

雖然，一五計劃出現了一些問題，然而根據整體客觀的分析，政府有必要將投資集中於重工業。雖然有些經濟學者認為從一般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通常是先發展農業，後輕工業，在累積到一定資本後，才從事重工業的發展，故此，在中國人口多，資金少的情況下根本不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應將有限資金，均衡於農業、輕工業及重工業，以農業及輕工業的發展來緩和緊張之市場形勢，及開拓海外市場，累積資金，為發展重工業奠定鞏固的基礎。

以上的分析當然是反映了經濟理論的觀點，然而卻忽視了中共建國

初期面對的問題，那時是美國圍堵，國內經濟崩潰，外憂內患，政府的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是要恢復並加速經濟的發展，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假若中國依從上述的純經濟理論，以農業及輕工業的出口累積資金，將會面很多的問題，如農業初級產品通常會被先進國家的關稅壁壘及國際市場價格的限制，使國內農業不能發展起來。

若以發展輕工業來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先不說當時由於在國際外交緊張的形勢下，外國的主要市場根本不會進口中國產品，就算是容許中國貨品進口，站在中國政府角度來說，則無疑是要將解決提供重工業設備的方法寄托在對外貿易關係上，這對於一個面對外來威脅，急需建立自己重工業及國防工業的國家來說，絕非一個理想的政策。此外，在工業基礎異常薄弱，技術異常落後的情況下，採用以增加投資及人手進行增產的「外延發展」方法，來發展經濟也屬迫不得已，但問題是政府應該在經濟發展有一定成果後，便須重新檢討這個生產方法，如應利用更多科技及較高技術的人才，增加效率以便資金能更有效地運用。

二 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制度的設立

（1）中央集中經濟權力

建國初期，全國有東北、華北等六個大行政區，大行政區乃領導各省、自治區及直轄市的一級政權機構。一九五四年月，中央政府為了加強統一領導，乃撤銷了大行政區，中央並相應地增加和加強有關經濟管理的部門，形成了以中央各部門管理為主的經濟體制，這個經濟體制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直接和間接相配合的計劃制度。重要物資和專用物資，由主管部門實行計劃平衡分配。對國營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實行直接計劃，由國家下達指令式指標，而對手工業，私營企業，實行間接計劃，國家主要通過各種經濟政策及合同等經濟手段，把這些企業的經營活動納入國家計劃中，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直接計劃的範圍不斷擴大，指令性的指標不斷增加。

實行集中統一管理的經濟體制，能夠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主要

技術和管理幹部來保證重點建設的需要。然而，這種集中的經濟體制，實有其歷史的局限性，隨著經濟的發展，基建項目的增多，也就加重了中央部門的負擔，而在一五計劃的後期，集中過多、統一過死的弊病也暴露出來了。

(2) 經濟權力過分集中之弊端

在工業管理方面，中央直接管理的企業過多，由五三年的二千八百個，增加到五七年的九千三百個，權力過於集中，而企業領導人對企業的管理權限則太少，嚴重影響了企業和職工積極性的發揮，一些基層企業的領導人對此反應十分強烈。在一九五六年，一般國營企業的廠長在財務方面只有二百至五百元的機動權，公私合營企業的財權更少，例如在五六年夏天，上海天氣酷熱，國務院指示南方各工廠中的高溫度車間中應設降溫設備，而由於許多企業沒有降溫設備的裝置，故要向上級打報告要求申請，上海公私合營潔晶玻璃廠就為了此問題而同主管的專業公司先後聯絡過十一次，直到報紙對這件事作出公開的批評後，事情才得到解決，可是這時候天氣已轉涼了。從這事件得知，假若上級機關權力過份集中，事無大少一概包攬，就不能靈活地解決一些即使是十分簡單的經濟事務。

由於取消了大行政區，實行中央管理，並過份強調中央對地方的領導，因而產生了一定的問題。這主要是在整個政府財政管理權方面，中央政府財政權所佔比例偏高，佔總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地方政府只能享有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由於太重視中央對各企業的行政管理，割斷了地區內不同部門、企業之間的橫向經濟聯繫，影響了地區內的專業化運作，造成很大的重複及浪費。

此外，中國土地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十分複雜，經濟文化發展極不平衡，假若地方政權辦一點小事也要向中央請示匯報，那一定會妨礙地方政權因地制宜地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不僅不能及時滿足地方的迫切需要，更會助長官僚主義，扼殺地方的主動性及積極性。舉例來說，在洛陽市，一方面由中央建築工程部領導的洛陽工程局負責的洛陽拖拉

機廠等工程已接近完成，工人及大部分施工力量將要外調，而在隔鄰街道，中央的冶金工業部、電子工業部及紡織工業部則由於各自計劃於洛陽建設新廠，分別從全國不同的地方調動職工及各項施工力量往洛陽，而要調動一支大型的建築隊伍，往往要涉及成千上萬職員及其家屬，並要興建一批附屬企業和職工生活福利設施。假若洛陽市政府有一點權力，則可把興建完竣拖拉機廠的員工留下來，調配他們興建其他中央部門的工程，這樣可省下大筆費用。否則，只會延誤工期，浪費人力物力及使到職工遇到工作及生活上的困難，而且不利於職工技術水平的提高。

再者，中央集中分配的物資亦過多。由國家計劃委員會支配的物資由一九五二年的五十五種上開到五七年的二百三十多種，中央部門的物資分配計劃不僅要制定受支配物資在市場上長期及短期的流通量，更要制定這些主要物資的價格，在中國當時技術幹部缺乏及統計分析發展不足的情況下，一下子要求國家多掌握上二百種物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列寧就曾批評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為官僚主義的空想，萬一分配失當，將使企業的生產打斷而造成浪費。

三 一長制的建立，等級森嚴管理體制的形成

中國建國初期強調平等的理想，在工廠中實行工人民主制，例如在享有全廠最高決策的工廠管理委員會中必須有不少於半數的工人代表參加。當時推行這個制度除了是強調經濟民主，工人有權參予管理的原則外，還有一個客觀因素，就是當時政府面對接收了的大批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企業，但卻嚴重缺乏熟悉生產技術及了解工廠實際情況的幹部。原有的管理人員，有的故意躲避，有的拒絕與新政府合作，故此，為提升工人對工作的投入，便需由工人和技師選出代表，與政府委任的廠長共同管理工廠，使工人意識到主人翁精神，提高生產熱情，保護廠房設施，又可以訓練他們熟悉及處理廠內事務，逐漸培養他們為管理人員，然而這制度也有很大的漏洞，例如多頭領導、無人負責、因循拖延、推卸責任、意見過多和外行領導等。

推行一五計劃時，有需要對新建的大型工廠進行有效率的管理，再加上接受了蘇聯管理大工廠的經驗，中共決定採取蘇式的「一長制」，根據列寧的論述，一長制的基本內容是「要求群眾無條件地服從勞過程中的領導者的統一意志。」(註七)，領導者——即廠長對工廠的工作完全負責，被賦予獨裁無限制的權力。這種管理制度可以說是一切大型工業生產組織的客觀要求，列寧指出：

「任何大機器工業……都要求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意志，以指導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的共同工作。這一必要性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歷史上看來，都是很明顯的」。(註八)

由一個內行，懂得生產技，熟悉整個生產過程的人做領導企業的工作，可使一切進程更有效率，避免了決策過程中拖延的現象。

推行一長制最徹底的是東北地區，東北的領導人高崗在五零年代初期曾經發表了一份〈站在東北經濟建設的最前面〉的報告，報告指出國家企業必須在整個國家經濟計劃下工作，而這整個國家經濟計劃是在黨中央或黨中央的代表機關的領導下制定下來的，廠長是由上級國家機關賦予責任的，廠長負責，不但是工廠所必需的，而且是國家經濟計劃一元化所必需的。

推行一長制乃是大生產的客觀要求，縱使削弱了工人參與的成份，也是形勢使然，本身並無值得批評的地方，然而，從整個政府系統來說，一長制的推行無疑意味著整個統治架構權力的進一步集中。在缺乏有效的監察制衡下，幹部特殊化，脫離群眾是常見的現象，毛澤東曾批評「一長制」，指出：「蘇聯……軍隊和企業實行『一長制』，我們就不學。『一長制』這個名詞有些獨裁。」(註九)在五七年中共發出的整風運動指示中也明確指出由於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處理問題，「就容易沾染舊社會國民黨作風的殘餘，形成一種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

有部分工廠領導人，為了完成國家派給的任務，往往漠視工人的權利和工業安全，五五年人民日報就曾轉載山東某製衣廠內領導階層對工

人的生活病苦採取了冷酷無情的態度，報導指出：根據勞動保險條例規定，女工生產時應給假五十六天，產假期間工資照發，可是……女工諸秀蘭懷孕快要臨產，星期日已經流了一天血，第二天廠方還要她上班。……這個廠對分娩後的女工也絲毫不給以關懷和照顧，如女工李筱春產後只在醫務室躺了兩小時，就被送回宿舍；因為宿舍冷，無人照顧，得不到休息，結果得了產後瘋嘴病，此外，瀋陽耐火材料廠職工就批評廠內領導人經常為生產任務的完成，任意違反安全操作規程，保安制度規定出窯溫度不得超過攝氏八十度，但為了安全完成生產任務，廠內領導人往往不管工人的安全而隨便提高窯溫度，對工人的安全及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

隨著漠視工人困苦而來的就是幹部特殊化泛濫的情況。一九五五年十月十日人民日報指出「江西上饒建築工程處的領導工作人員，不關心工人羣眾的福利事業，經常任意侵用職工的福利經費，他們曾經藉口要為工人蓋俱樂部和浴室，把醫藥衛生補助金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九元拿去修建幹部宿舍和辦公室，……據去年九月到今年二月的統計，困難補助費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補助』了少數生活並不困難的領導工作人員；百分之四十補助了一般工作人員；給工人羣眾的補助還不到百分之十。」

第三節 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一 〈論十大關係〉的發表

經過一五計劃的數年實踐，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對的種種困難，再加上國際事件如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批評斯大林及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要求民主，反抗蘇聯的事件後，中共領導人曾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和總結這些國內外事件發生的原因和教訓，當時很多領導人都以東歐經驗為借鑒，總結中國的發展經驗，對前景開展了探索。

薄一波曾回憶道：一九五六年春天，先是劉少奇同志找工業交通部門的負責人座談、匯報，毛澤東聽說此事後，表示也要聽一下匯報，並請薄一波為他作出安排，從此，毛主席在兩個月內親自聽取了中央工

業、運輸業、農業、商業、財政等三十四個部門的匯報，毛主席那時工作得很緊張，叫做「床上地下」，就是起床就聽匯報，聽了匯報才上床休息！這些報告根據周恩來的紀錄稿整理成文，而中央其他一些領導人也經常參加匯報會，以總結建設的經驗。（註十）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根據各匯報會及研究結果，在中央政治局內作了〈論十大關係〉（註十一）的報告，十大關係包括：第一，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第二，沿海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第三，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第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第五，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第六，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第七，黨和非黨的關係；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第九，是非關係；第十，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報告開頭就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毛澤東強調應該批判地參詳其他國家在發展經驗中的長處，不能盲目地學，切忌一切照抄，機械搬運。

毛澤東後來曾針對性地指出：

「各部都有規章制度問題，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建國之初，沒有辦法，搬蘇聯的，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註十二）

二 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措施

在五六年九月的全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五七年二月毛澤東發表的〈關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中，都將論十大關係的重要精神再作強調及引申，這些文件主要表達在解決經濟建設速度及策略、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及改善共產黨領導作用等三個主要方面：

（1）經濟發展速度及投資策略

針對投資過多，發展速度脫離實際財力、物力的問題，周恩來及陳

雲於出一九五六年春天提出了反對急躁冒進的主張。陳雲更於五七年一月提出「國力論」，強調建設規模要與國家財力物力相適應，並建議壓縮一些超越國家能力所能負擔的基本建設項目，毛澤東於論〈十大關係〉中也提出了要改善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亦是建議逐步改善以往高累積、低消費的「大推進」經濟發展策略。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亦指出應重視高累積、低消費的問題，他批評蘇聯過份壓抑農民的消費以爭取工業資金積累的發展方針。毛澤東指出：

「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累積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極大的損害。」（註十三）

毛澤東提出應徵收較輕的農業稅，縮少農產品及輕工業品的翦刀差（即價格差距），國家採用薄利多銷、穩定物價及適當降價的政策，向農民推銷輕工業品，而在農產品收購價格方面，為了不使農民吃虧，建議將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逐步提高，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此外，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國家亦應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並增加福利及工資，以改善工人生活。

就投資策略方面，開始逐漸改變一五計劃時「不平衡發展」的方針。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指出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過去在經濟建設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片面地強調重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毛澤東看出重工業的發展，需要從輕工、農業方面積累資金，而且又需要輕工業、農業的發展以擴大重工業產品的市場。而輕工業、農業發展又需要重工業提供機械化、技術化的條件，因此是相輔相成，兩者不可偏廢。他強調要加強對農業及輕工業的投資，這樣「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得更多更快。」（註十四）他堅持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須與農業共進，這才是工業化的正確道路。

(2) 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

就經濟管理體制過份集中的問題，中共領導人也特別加以重視、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探討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他提出：

「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甚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把甚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註十五)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大會上，劉少奇也提出「應當保證企業在國家的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在計劃管理、財務管理、幹部管理，職工調配、福利設施等方面有適當自治權利。」

陳雲在八大會上的發言，十分全面地論述了管理的問題及應該採取的改革措施，這就是「三項經濟綱領」及「五項經濟措施」。

1. 三項經濟綱領是：

- i 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
- ii 在生產計劃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
- iii 國家市場是整個市場的主體，但仍容許在一定範圍內由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它是整個市場的一部份；

2. 五項經濟措施是：

- i 工業、手工業、農副產品和商業的很大部份必須分散生產、分散經營：

- ii 改變工商企業之間的購銷關係，強調過去政府為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而採取的一些措施必須改變，除一部分有關國計民生和規格簡單的產品可以繼續由政府實行統購包銷外，對品種繁多的日用百貨，應改用選購的方法。「凡屬選購的商品，商業部門有權優先選購，沒有選購和過剩的商品，可以由工廠自銷」(註十六)，同樣地，工廠在購買原料時，除某些供不應求的原料由國家分配以外，其他原料可由工廠自由選購。在商業方面，上級批發公司不准向下面派貨，下級商店可以向全國任何批發機構或直接向工廠自由選購。這樣，就減輕了國家在物資分配時所須負的責任，也使整個物資市場靈活起來；
- iii 在市場管理上，取消為了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投機活動的某些做法，把部分農業副產品及土產由當地合作社的統一收購，改為允許各地國營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和供銷合作社自由收購、自由販運，禁止封銷。這樣，就可使那些小土產避免由於當地供銷合作社不注意收購或者收購價偏低而減產，使貨暢其流，刺激這類貨品的生產，活躍商品的交流；
- iv 商品價格的改革。計劃經濟的一個嚴重弱點就是不能運用價格以調節經濟，而往往傾向於把價格定到一成不變。故此，陳雲指出應靈活運用價格這經濟調節器以刺激生產，他建議提高工、農產品的價格，從而使工農產品的生產有所增加。陳雲亦指出：長期以來凍結價格的政策使不同質素的產品差價極少，優質產品並不能賣得較高價錢，故不能鼓勵提高產品質量，因此，應容許按質論價，適當地批準提高部分高質產品的價格，以改善產品的質素；
- v 適當變更國家計劃管理的方法。把國家計劃中對一些產品規定的指標只作為一種參考指標，讓生產這些產品的工廠按照具體市場的情況，自定指標，進行生產，而不受國家參考指標的約束。此外，在計劃內，「對於日用百貨、手工業品、小土產、

都只是把個別品種列入國家計劃。」(註十七)這樣就減輕了國家對過多產品的計劃，而使過份集中的經濟體制有所緩和。

為了落實經濟改革的意見，國務院於五六年五月召開了全國體制會議，提出了〈關於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指出凡關係到整個國民經濟而帶全局性、關鍵性的企業和事業，由中央管理，而其他企業和事業，應盡可能交地方管理。在下放企業和事業單位的管理權時，有關的計劃、財務管理和人事管理權一般也應該隨著下放，而某些主要計劃指標和人員編制名額等，應留給地方一定的調整幅度和機動權。這個草案由國務院發到各地，廣泛徵求意見，在此基礎上，又陳雲主持修改為三個草案，即〈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關於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和〈關於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這三份文件主要是調整中央和地方、國家和企業的關係。其主要內容為：一是調整企業的隸屬關係，把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業下放給省、市、自治區管理；二是擴大地方和企業的財權、物資分配權、人事管理權及計劃管理權，以發揮地方企業的主動性。這三個草案五七年十月召開的黨八屆三中全會中通過，經國務院的批准後，從五八年開始實行。

(3) 改善共產黨領導的問題

為針對權力過份集中及幹部特殊化的問題，周恩來於五七年曾指出共產黨的「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歷史經驗是可以借鑒，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也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沒有很大的強制性、但是，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劉少奇也指出中國社會主義下出現了一種等級制度，「等級制度是一種封建制度，我們抄襲了封建制度。」

中國共產黨到一九五七年的黨員人數已發展到一千七百多萬人，在人民中享有一定的威信。然而，由於權力的過份集中，使部份黨員產生了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故此，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

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並在這基礎上開展大鳴大放運動，以鼓勵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以克服上述官僚主義的現象。

總結上述各點而言，在五六、五七年間，中國領導人圍繞著蘇聯和東歐發展的問題和教訓，總結了中國發展的經驗並提出自己的道路，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這對中國的發展無疑有很大的價值。然而一九五八年出現了一個極端，中央將權力在無足夠制衡及缺乏條例監管下大幅下放，在十幾天的時間內將絕大部分中央企業下放予地方（註十八），此外，中國在五八年開展大躍進，使經濟體制改革在經濟不正常的高速發展中運行，混亂情況無法避免，從而使很多本來正確的經濟體制改革設想無法落實，令中國經濟走了一大段彎路。

第四節 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八大）。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召開。那時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將完成，而生產資料和私有制的農業、手工業及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基本成功，八大的任務主要是檢討建國七年來的經驗，為日後的發展制定一條合適的路線。

在一九七八年中國開展改革開放後，對五六年八大所通過的各項決議內容重新作出肯定，並認為將來發展的路向基本上應以八大的正確路線為依歸，八大之各項決議如下：

一 階級鬥爭已經完結，國家的主要任務在於發展經濟

劉少奇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複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註十九）這段話表示，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私有制度的消滅，階級鬥爭已再無存在的必要。

八大根據劉少奇的政治報告而制定的決議指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就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因此，八大指

出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從經濟的發展逐步滿足市民的需要。

二 為了發展生產力，八大制定了符合中國實況的經濟建設方針

八大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周恩來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有意識地批評了五六年的冒進問題，並根據陳雲的「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的方針，對將來的經濟發展提出很多建議。

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由於五六年的建議規模定得過大，而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也出現了齊頭並進及急於求成的傾向，使到「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且造成國民經濟各方面相當緊張的局面。」周恩來並指出：

「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在建設工作中曾經發生過到處鋪開、百廢俱興、不顧條件、盲目冒進的偏向，結果，影響到國家的重點建設，並且造成了財政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

基於上述的教訓，周恩來提出：

(1) 制定穩進的發展計劃

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穩妥可靠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

(2) 調整產業結構

針對以往過份突出某種項目如重工業的發展，以致同其他方面脫節，「某種工業企業由於前進過快，所需要的原材料無法全部供應，因而發生了生產能力不能充份發揮的困難」的問題，周恩來指出應該使重點建

設(如重工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按比例地發展。

(3) 應該增加後備力量，健全物資儲備制度

(4) 正確地處理財政和經濟發展的關係

這就是說財政收入的增加必須建立於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由於在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是保證經濟發展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有些幹部往往希望政府能增加財政開支，以加快建設速度。但政府是否有能力增加財政開支，卻要視乎經濟的發展狀況，假若經濟發展停滯，政府硬要多抽市民一點稅以增加財政開支，則無疑改變了國民經濟的積累和消費比例，使市民生活受到一定的影響。(註二十)

三 打擊官僚主義、限制個人崇拜，以加強黨的建設任務

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建議時指出，執政黨的地位，容易使黨員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群眾的現象，故此，執政黨須經常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並警惕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由於權力過份集中，也是產生官僚主義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八大要求黨的上級要給予下級獨立處理問題的廣泛權力，使地方政府能因地制宜地解決地方事務。

鄧小平亦根據蘇聯的教訓，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及加強集體領導的建議，他指出應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此外，在制度上，也增加了黨中央集體領導的成份，而對毛澤東個人的權力作了一定的限制，這些改革有以下幾點：

- (1) 從共產黨黨章中刪除「以毛澤東思想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那句話，及學習毛澤東思想為黨員的義務的規定。
- (2) 撤銷由毛澤東兼任的中央書記處(主持黨日常工作的組織)主席的職務，並設立黨總書記的職位，由鄧小平擔任，並使由總書記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向政治局負責，從而改變過去向毛澤東個人負責的局面；

- (3) 政治局委員由十三人增加到十七人，擴大了政治局的民主基礎；此外，政治局設常務委員會，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任委員，組成集體領導的核心。
- (4) 黨的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增設副主席四名，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擔任，既分散了毛澤東的權力，更加添了集體領導的色彩。

註 釋

- 註 一 〈關於十大關係思想的形成與提出〉載楊勝群、田松年編《共和國重大決的來龍去脈》(一九四九—一九六五)，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第192頁
- 註 二 《人民日報》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
- 註 三 薄一波《論十大關係形成前後的調查和探索》載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469-471頁
- 註 四 楊君實《蘇聯模式與中共的農業集體化政策》載楊君實著《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53頁
- 註 五 史太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53頁
- 註 六 史太林《列寧主義問題》，第331頁
- 註 七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載《列寧選集》第三卷(下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北京，第521頁
- 註 八 同上註，第520-521頁
- 註 九 同註三，第484頁
- 註 十 同註三，第466-469頁
- 註十一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267-288頁
- 註十二 毛澤東《對待蘇聯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一九五八年三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國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310-311頁
- 註十三 同註十一，第274頁

- 註十四 同註十一，第269頁
- 註十五 同註十一，第275-277頁
- 註十六 陳雲〈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載《陳雲文選》(一九五六年—一九八五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6頁)
- 註十七 同上註 第12頁
- 註十八 同註三，第489頁
- 註十九 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第218-219頁
- 註二十 周恩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載《周恩來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218-223頁

第十七章 歷史的轉折——五七年的鳴放與反右

第一節 大鳴大放運動的時代背景

一 勵員知識分子參與社會主義建設

知識分子是建設中國的一大力量，然而在建國後，因政治運動頻繁，他們得不到充份發揮才華的機會，例如繼建國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後，又推行因批判《紅樓夢》研究而引發的「宣傳唯物主義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運動」，同時由於胡風事件的影響，教界更進行了肅反鬥爭，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使到知識分子遍體鱗傷。知識分子在中國有「六不」現象，即「使用不合；編排不當；信任不專；支持不夠；工作條件不好；待遇不適當。」周恩來在五六年一月作出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指出：

「當前根本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知識分子的力量，無論在數量，業務水平方面，政治覺悟方面，都不足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急速發展的需要；而我們目前對於知識分子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現象，特別是一部份同志對於黨外知識分子的某些宗派主義情緒，更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知識分子現有力量的充份發揮。」(註一)

他並批評有些領導人低估了知識界在政治上和業務上的巨大進步，低估了他們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大作用，不認識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認為反正生產依靠工人，技術依靠蘇聯專家，因而不認真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註二)

由於知識分子未能得到妥善的待遇，學非所用的情況十分普遍，再加上他們不被共產黨幹部所信任，時常要他們檢討，不斷的要他們揭自己過往的所謂「複雜歷史和背景」，這一切皆使知識分子感到異常反感，

對建設社會主義漠不關心或心灰意冷，況且，他們根本亦無發展才華的機會。

中央政府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後，發覺中國科技底子異常薄弱，事事皆須倚靠蘇聯專家，故希望再動員知識分子的力量。在一九五六年起，中共提出了「加強黨對知識分子領導」的政策和文藝工作上的「百花齊放」與科學工作上的「百家爭鳴」的政策，希望從此能再鼓勵科學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周恩來的報告中，他強調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註三)，而且他們「已經成為我們國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更充份地動員和發揮他們的力量，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也就成為我們努力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一個重要條件。」^(註四)周恩來建議應把知識分子的專門人才安排在最需要的地方工作、對他們應加以信任和支持，使他們有職有權，並尊重他們的專業知識及建議，最後，給予他們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

二 蘇共清算史太林及匈牙利事變對中國國內的影響

一九五六年，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於內部會議中作出猛烈批判前任領導人史太林的秘密報告，指出其極端的個人崇拜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在肅清反革命問題上擴大化等，這份文件在國際上產生很大的影響，對中共亦造成一定的震盪。由於赫魯曉夫在批判史太林前並無知會或給暗示予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困惑，不知如何向市民交待及解釋。雖然中共領導人與史太林及莫斯科之間有數不清的矛盾及鬥爭，然而在公開的場合或在各種傳播媒介上，中共一向把史太林及蘇聯作為學習榜樣，如公開稱讚史太林為「被壓迫者的救星」、「世界革命的領袖」，為慶祝其七十生辰，毛澤東更親赴蘇聯賀壽，在其五三年去世的時候，毛亦著令人民致哀。所以，當蘇聯對史太林的評價一下子翻轉過來時，要向中國人民解釋史太林原來有這麼多的錯誤，實令中共領導人有措手不及的感覺。

蘇共在清算史太林的個人崇拜及獨裁後，便改行集體領導制，這件事對中國政壇及其他東歐國家產生很大的迴響，並牽起一股民主改革浪

潮。順應著時勢，中國共產黨於五六年九月召開的第八屆黨代表大會中，也採取相應的措施，增加了黨中央集體領導的成份，並對毛澤東的權力作了一定的限制。

此外，由於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被公開，激發了其他東歐國家人民反抗獨裁政權的浪潮，這些東歐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後照搬蘇聯的經濟建設經驗，片面發展重工業，造成物資貧乏、貨幣不穩及通貨膨脹，引致人民不滿。此外，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上更孕育著嚴重的官僚主義獨裁制度。最後，由於蘇聯過份干預各東歐國家的內政，遂激發起這些國家的人民產生強烈的反蘇愛國情緒。

一九五六年六月波蘭爆發了「波茲南事件」，由於一些困難企業內的工人對生活條件的不滿，爆發了嚴重暴動、罷工和流血事件。十月，華沙學生上街遊行，波蘭共產黨為穩定局勢而重組中央。十月廿三日東歐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由於政府未能克服國內政治及經濟等困難，再加上赫魯曉夫批評史太林事件的影響，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開始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波及全國地區。由於恐怕事件會再波及其他東歐國家，所以蘇聯於十一月三日出兵鎮壓了群眾運動。

為了回應國際性的群眾運動浪潮，中國共產黨亦開始進行整風，讓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宣洩其潛在的不滿情緒，以避免將來事件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國自五六年下半年起，由於經濟建設冒進等原因，一些農村和城市發生了約萬餘名工人罷工，部分農民退出合作社及上京告狀；以及三十餘宗學生罷課請願事件。毛澤東指出：

「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註五)

三 毛澤東發動黨外鳴放，提出「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配合黨內整風行動。

雖然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中國建立了一定的重工業及國防工業，但就

整個國家來說，仍未能擺脫貧窮的困境。從毛澤東個人角度來看，過份著重重工業的投資及大城市建設，將大大加劇城市及農村的貧富差距。在工廠普遍實行一長制下過份注重技術專家，也容易走上蘇聯般的科技官僚統治的道路，而使一切平等、群眾參與管理的理想受到壓抑。毛澤東希望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能加強對農村及輕工業的投資，在農村中辦小型企業，使城鄉的差距拉近。此外，毛澤東亦建議應發展勞動集約式的小型工業，並以精神鼓勵取代普遍採用的物質刺激。然而，毛澤東這些富有濃厚浪漫主義色彩的理想，並未得到黨內其他領袖所接受，故毛在很多時候都陷於孤立的處境中。

令毛澤東更為憂心的，是黨內逐漸發展出脫離實際、不了解群眾的官僚主義，故此，他希望能藉黨外的鳴放運動以配合黨內的整風，引進外部力量對執政黨施加更大壓力，打擊嚴重侵蝕黨員純潔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在這時儼如一個支持民主、反對官僚的革命者，他站在黨的最高層，發號施令，鼓勵群眾批判官僚主義。（這情況在六六年文革時重演。）毛澤東就一些幹部提倡取消大民主時十分自覺的指出：

「任何民主都沒有，大民主沒有，小民主沒有，小小民主也沒有，橫直是官僚主義……罷工、罷課，對這種反官僚主義我們如果不允許他，我看是不好的……我們提倡反官僚主義……用批評鬥爭沒有辦法的時候，對嚴重的、頑固的官僚主義者用這種辦法是應該允許的。」「××縣三萬人鬧事，是最大貢獻，下了一道赦令，把所有地主帽子都摘掉，推翻了鄉政權，這就是打了一次防疫針……××林學校三百人鬥的天翻地覆，無可奈何。共產黨不怕蔣介石、帝國主義，怕學生鬧事，農民鬧社，這是新問題……鬧事原因：我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犯了錯誤，工作方法生硬。」（註六）

基於共產黨的黨內建設在建國後出現不少問題，為改善此情況，毛澤東指出：

「因此我們要進行整風，我們自己來批評自己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

和宗派主義，這會不會使我們的黨喪失威信呢？我看不會，相反的，會增加黨的威信。」(註七)「現在把火放起來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們的同志燒好。我們每一個同志，都有一點毛病，那有沒有毛病的呢？」(註八)

為了進行整風，毛澤東還鼓勵市民要使用大字報，他說：

「大字報是個好東西，我看要傳下去……我看用大字報好，越多越好。大字報是沒有階級性的，等於語言沒有階級性一樣。」為了保證整風及鳴放的運動能順利進行，毛澤東更指出幹部應該對不同的意見加以容忍及重視。「沒有民主黨派行不行？不行，蘇聯就沒有，聽不到反面意見，文匯報上批評要全面分析，這批評是有益的。」(註九)「對鬧事如何處理？鬧得對的就承認錯誤，滿足要求；鬧得不對的，要給以批評，爭取群眾，孤立壞人，除了兇殺人的以外，不要亂捉人，不要挫傷學生們的積極性，要逐步引導他們。」(註十)

基於鳴放前國內外的形勢，可知共產黨推行鳴放運動的主要原因是順應著國際共產主義陣營開放的風氣，發動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對社會不公平現象作出批評，以舒洩他們的怨氣，避免將來可能發生的更大事故。其次，以鳴放為工具，令民眾和黨外人士對黨和政府的官員作出批評監察，從而協助黨內整風；以剷除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及主觀主義。

現時有些分析家認為，共黨發動鳴放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引蛇出洞，用鳴放為誘線，以便發現右派，然後加以打擊。這點是否正確，相信只有黨內高級的當事人才知道，但有幾點可以肯定的：第一就是鳴放期間批評共產黨的言論之激烈程度，超乎了毛澤東當初所預計。毛澤東在發動鳴放初期十分有信心知識分子會大力支持其政權，而有關的批評將只會針對個別官員的行政措施失當或個人道德操守，而不會涉及整個共產黨制度，毛澤東曾自信地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百分之十懂馬克思主義，百分之八十是愛國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可見毒草只是少數，

似毒非毒野草鮮花中間的是多數。」(註十一)第二是大部分的共產黨幹部由始至終皆極力反對毛澤東推行鳴放運動，他們知道鳴放的結果將嚴重挑戰其權力及共產黨領導的威信，局面將發展至一發不可收拾。

據曾參與鳴放運動的唐桂國引述當年轟動全國的民運青年學生林希翎指出：「毛澤東在宣佈實行大鳴大放的時候，就曾受到他左右的極力反對，在最後決策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竟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退席。」(註十二)而在鳴放進行的時候，各地的共產黨幹部紛紛上書中央或表達不同意見，要求毛澤東停止鳴放，其中一個例子是青年作家王蒙，他由於在一九五六年發表文章批評北京某單位的官僚主義，而被其他對鳴放有保留的黨員作家批評，這些黨員作家認為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出現官僚主義。對此，毛澤東即時明確表態，支持王蒙，他說：

「小說揭發官僚主義，很好」，又說：「馬寒冰批評說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能發生官僚主義現象，不曉得這道理來自甚麼馬列主義？……中央也出官僚主義……怎麼能說批評不得。」(註十三)

另一個例子是五七年一月，共產黨員陳其通等人發表文章，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異議，毛澤東即時提出反擊，指出此文章不堪領教，並批評此文章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思想方法是教條主義，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註十四)然而，毛澤東卻承認：「陳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黨內同志，我就沒有群眾基礎。」(註十五)

從上述例子可以清晰看到，中共能夠推行鳴放主要是毛澤東的堅持，黨內反對力量很大。後來當鳴放運動持續深入發展，連毛澤東也認為批評的言論及局勢超出其控制範圍。當在黨內高幹壓力之下而作出反右決定時，一向反對鳴放政策的幹部自然會變本加厲的推行反右，嚴懲曾批評過他們的人以作報復。

四 知識分子的經歷與反抗情緒

這裡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值得深思，就是為甚麼鳴放運動在發展起來後能夠引發這麼多的知識分子與大學生產生共鳴？當然，毛澤東的

鼓勵與其三申五令要求幹部及共產黨員不得干預及打擊鳴放者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但是，假若綜觀建國以來的多個政治經濟及社會範疇的運動，其特徵都是由上面發出政策和命令，精密佈置，層層規範，由中層或基層幹部成立專責委員會，深入群眾引起討論，官員們教導群眾了解共產黨制定的政策的重要性及正確性，繼而鼓勵並領導群眾召開大會，以落實共產黨所制定的政策。從這種發動群眾的方法得知，所有運動基本上由上而下，由共產黨牢牢地牽引。

然而，這次鳴放卻打破以往運動的慣例，群眾有巨大的主動性，在運動進程中逐步脫離黨的領導，群眾並希望把運動帶到他們認為正確的方向去。鳴放運動之所以這樣得民心，主要是它的發展有深厚之社會基礎，觸及知識分子及學生的實際感受，使他們產生極大的認同感。據鳴放期間的著名青年學生林希翎指出，當時她曾擔任《中國青年報》的記者，由於採訪關係，曾到中國的西北去看：

「因為我原來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一下了到農村，到山區，到玉門油礦，到甘肅蘭州，都跑了一下，就完全感到農村生活，不是像《人民日報》吹牛吹的那樣子——電燈、電話，甚麼農民生活怎麼好怎麼好；有的苦的要死，也沒飯吃，我非常痛苦，我覺得要說，我們那個時候非常理想主義，想為人民服務……結果呢？人民生活這麼痛苦，我們卻在北京城裡過不錯的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我對這些問題，就開始深思：究竟為甚麼？」(註十六)

另據唐桂國指出，共產黨的教育制度使學生及教授產生極大的反感，內行的專家要聽命於外行的幹部，無論自己的學術活動和私人活動，都得由他們擺佈。此外，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使無數知識分子受到無法形容的肉體和精神蹂躪，再加上告密制度的泛濫，使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人情味，互相猜忌，就連夫婦、父子都不敢向對方透露內心的真話，他更指出當時曾有一群學生進行過幾份有關農民、工人、士兵、幹部、商人及知識分子等人的生活的調查報告，揭露出當時社會的種種黑暗面，更使他們的反叛情緒如箭在弦，一觸即發。(註十七)

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國家集團內的變化如赫魯曉夫批史太林，波蘭及匈牙利的民主運動，皆給知識分子製造了一個榜樣和希望，殘酷的鬥爭事實中更促使他們反省。在五七年五月三十日的人民大學演講中，林希翎說：

「對於史太林過去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因為蘇聯電影和小說我看得很多，當史太林逝世時我在部隊裡帶上了黑紗哭腫了眼，當最初聽說赫魯曉天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史太林時，我想不通，也很生氣。但當我親眼看到這個〈秘密報告〉後，我才大為震驚，我感到我過去的眼淚都是白流了，還幸虧史太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幾年，還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蘇聯共產黨人和公民，我感到對他在軍事上、農業上和對外關係方面犯的錯誤都還可以原諒，只是在肅反擴大化這個問題上所犯下的嚴重錯誤，甚至也可以說是對黨和人民犯下的罪行，在感情上是不可原諒的。」（註十八）

林希翎進而指出，在面對各種社會及國際政治問題的時候，中國報章的報導更令當時的年青人反感，「報紙也是吹牛，許多事實不是真實報導，匈牙利事件說有幾個青年喝醉酒，糊塗去參加遊行，這都是撒謊不高明。」（註十九）

以上的問題，就如《光明日報》指出，大學生在思想上潛伏著一種不滿情緒，近來突然萌起，發生了許多問題，無法及時克服，如反抗學校的紀律和制度，蔑視共黨派來的老師，思想上極端民主化，歸結起來，就是反抗集體、反抗紀律、反抗集中的自由思想。

第二節 鳴放運動的經過

一 中國共產黨發起除三害及鳴放運動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發表講話，討論到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並提到由於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及經濟政策上犯了錯誤及在生硬的工作方法下，出現了一些

鬧事的問題，他並建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讓黨外的知識分子批評黨內的種種問題。

然而，在鳴放運動初期，大多數知識分子皆抱著冷漠的態度。從當時中山醫學院教授葉鹿鳴在鳴放中期發表的一講話中，可以理解為何知識分子對毛澤東的號召不敢貿然回應：

「大概是一九五三年罷，在杜老(國庠)主持的一個座談會上，要求大家向黨提意見，我當時反映了光華醫院(即現在中山醫學院)黨的領導缺點和錯誤。誰知道，這次所提的意見竟成罪狀，成了在肅反運動中被鬥爭的條款之一。在肅反中，我是一個遭受過大會、小會鬥爭的人，精神上受到的創傷是難於用言語表達的，當時，他們質問我說：許多人向黨提意見都是說好的，為什麼你卻反映壞的呢？由此可見你是一向仇視黨員、仇視黨、仇視人民的，這是多大的罪惡啊！」(註二十)

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曾指出群眾不敢相信共產黨的原因：

「群眾在八年中體會到共產黨善變……黨組織對人，認為有用時，把殺過朋友、殺過同志、殺過黨內人的人都當作寶貝；不用時，把流過血的人關在大門外，冷若冰霜。」(註二十一)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著名文章〈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中把知識分子的心情描繪成春天乍暖還寒的天氣，他們對毛澤東的號召還是顧慮重重，不敢鳴、不敢爭，因為：

「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過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帶上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一直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薪評級，修進出國，甚至談戀愛，找愛人都會受到影響。」(註二十二)

為了鼓勵知識分子推行及參與鳴放運動，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如劉少奇等，在五六年底開始便不斷發表談話，鼓勵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毛澤東曾指出：「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的矛盾等量

齊觀，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註二十三）

五七年二月下旬，毛澤東在一千八百多人出席的最高國務院會議中，發表了長達四小時的講話，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進一步作出深入、系統、全面的論述，這篇講話後於六月十九日正式發表，定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註二十四）。文章從哲學的觀點出發，論證矛盾是宇宙發展的規律，並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也存在著矛盾，但這些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毛澤東這篇講話更把複雜的社會矛盾劃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並強調：

「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後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毛澤東進而提出「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方法。」

文章提出一系列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政策，在政治上要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在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上，採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學文化方面則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除了上述較為原則及理論性的問題外，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也涉及很具體的政治及經濟問題。毛指出在一九五六年，個別地方發生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合作社社員鬧社事件，發生鬧事的主要原因，就是領導人的官僚作風。要安撫鬧事人民便必須克服官僚主義，他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共產黨的長期方針，並說民主黨派可監督共產黨，使共產黨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同時，毛澤東亦強調接受批評的重要性：

「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鬥爭的風雨中

間，鍛練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同錯誤思想作鬥爭，好比種牛痘，經過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強免疫力，在溫室裡培養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

他提出應把在肅反運動中錯把好人當壞人的案件平反，並實行「有反必肅、有錯必糾」，並建議在五七或五八年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發現了錯誤，便要改正，原來在甚麼範圍弄錯的，也應該在甚麼範圍內平反。最後毛澤東就經濟發展策略問題發表意見，認為學習蘇聯經濟建設的經驗時要結合中國的情況來考慮，並指出在堅持重工業發展的同時，要加強對農業及輕工業的投資等。

在毛澤東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後，共產黨便推行整風運動，整風文件指出黨內有許多人對新時期新任務缺乏應有的認識，習慣於用老觀點觀察新問題，有的人甚至濫用黨的威信，以單純行政命令的辦法處理問題，用打擊、壓迫的態度對待群眾，以致脫離群眾及使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在黨內有了新的滋長。在五七年四月廿七日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指出黨內有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等不良作風，故此必須進行一次「普遍而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為甚麼要整風〉的社論，指出「擴大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使領導者和群眾之間的矛盾變得容易發現和容易解決，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註二十五)

共產黨更邀請非共產黨人士參加整風。五月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政黨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說最近兩個月以來，在各種有黨外人士參加的會議上和報紙刊物上所展開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分析和對於政黨所犯錯誤缺點的批評，對於黨與人民政府改正錯誤、提高威信，極為有益，應當繼續展開，深入批判，不要停頓或間斷。(註二十六)為徵集黨外人士的意見，毛澤東邀請了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進行座談。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共十三次，而各有關的報紙亦發表了人民的講

話內容。經過這樣的鼓吹，鳴放運動真正的展開了。

二 大鳴大放運動的全面開展——學生及教師的活動

(1) 「新五四學生運動」

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毛澤東發佈整風命令後，引發起年青人極大迴響。五月四日，各校舉行五四紀念晚會，場面非常熱鬧。北大在民主廣場舉行的大會，場面熱烈，廣場上聚集著數不清的人，見面的人打招呼不先叫名字，而是笑容滿面的一揮手，叫一聲「賽因斯」(Science)「德謨克拉西」(Democracy)，使這古老的大學變得年青了許多。大會主席在開會時的簡短致詞裡沉痛地說：「五四」精神被人家扼死已經八年，「民主」、「自由」照當權者的解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別人窒息了我們的精神，如果我們抗爭，還要毀滅我們的肉體，年青人們，「五四」之家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我們不要再允許別人將我們的血來塗灑廣場的土地了，要使這民主廣場上發出民主自由的芬芳，用我們大家的力量，借北京大學的屍，還「五四」的魂！主席致詞完畢，場上掌聲雷動，高呼「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五四精神萬歲」等口號。(註二十七)

繼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專院校舉行慶祝五四晚會後，由學生自發組成的「百花學社」，可以說是這運動開始時的一個高潮。在五七年五月五日，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貼出一張大字報，名為《教條主義及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註二十八)，他指出「自從一九五三年以來，大陸不是人民民主專政，而是三害分子的統治。從黨中央到全國各地都是官僚化的黨員的統治、專制、獨裁、蹂躪人權。」譚天榮繼續道出學生感受到的親身經歷、不平及怨憤：

「我是本屆畢業生，但是在畢業前夕的今天，我還不知道自己將來要到那裡去；因為我像每一個畢業生一樣，沒有選擇自己前途的權利。黨要我們服從分配，隨便把我們分配到自己不願去的地方，擔任自己不願做的工作，盲目的服從被認為是優秀的青年。」

譚天榮這張大字報貼出後，立即帶來很大迴響，北大附近的各校學

生都擁到北大讀他的文章。在群眾支持下，譚天榮發起組織一個學術研究團體，名為「百花學社」，學社的宗旨是從哲學上探討中國的出路問題，探索史太林學說的本源究竟與馬克思、恩格思的理論，有沒有邏輯上的聯繫，列寧、史太林思想體系究竟是馬恩思想體系的發揚或是歪曲。由於譚天榮的威望及學生的興奮心態，百花學社在成立兩天後，成員人數已發展到二千人。

自從譚天榮的大字報問世以來，北京各大學也相繼貼出各類的大字報。在這時期，各校的大字報都是有組織地出版，各校都有一塊供學生自由發表言論的陣地，如北京大學的《民主牆》、人民大學的《民主論壇》、農業大學的《噴火口》等。大字報的主題主要是針對共產黨的全權統治、階級鬥爭、無情的清算、共產黨員的特權及在黨領導下，國家經濟在各部門、各事業單位出現的混亂情況。

除用大字報批評時弊以外，學生更舉辦一些群眾演講大會，藉以喚起同學的情緒，最令海內外注意的是林希翎的演講。「會議的氣氛是熱烈的，廣場上坐著和站著幾千個有秩序的人，人們還是不斷的從各條路上擁入。那天北大各個傳達室都接應不暇，事後據說會客單全用光了，部份外校同學麇集在擴音器下面聽著會議的進行情況。」(註二十九)據現任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的幹部王文指出：

「她(林希翎)先後四次在北大、人大辯論會上演講，引起廣大群眾熱烈的反響，曾經博得過雷動的掌聲和經久不息的歡呼。據北大有的同學說，從解放以來在北大作過報告的任何一個首長、學者、專家、教授，都從未收到過這樣的效果。用反右派鬥爭的『英雄』的話來說，林希翎的演講『具有極大的煽動性』。這裡值得深思的是：這樣一個當時不過是二十一歲的青年學生，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魔力和能量？唯一的原因就在於她說出了廣大人民想說還不敢說的話，道出了群眾的心聲，反映了群眾的願望。」(註三十)

《人民日報》五七年六月一篇八千字批評林希翎的新華社專稿中也稱：

「一部分同學認為林希翎勇敢、大膽、能獨立思考。」報導說，人民大學的幾十處校舍裡，「到處可以看到同學就林希翎的觀點進行辯論，甚至在晚上，有些人還在圖書館翻閱有關書藉，研究演講中提到的論點。」(註三十一)林希翎在北大的發言中強調要為胡風平反，她指出：

「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他批評庸俗社會學、要動搖機械論的統治是對的，因為現在的文藝創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很嚴重。」「今年四月，最高檢察院譚副檢察長到人民大學作報告時，有人問他胡風問題怎樣了，他說：『現在偵查工作已經結束，但胡風很不虛心！不接受意見！』同志們，這說明甚麼呢？根據譚副檢察長的話，胡風能算反革命嗎？兩年還不公佈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臺，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註三十二)

林希翎並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在封建基礎上產生，並非典型的社會主義，封建氣味相當濃厚。她指出「三害」的根本原因，在於政治制度、人事制度及等級制度不好，不能適合公有制的經濟基礎：

「我認為領導與被領導就有矛盾；統治與被統治的地位不同，看問題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共產黨是執政黨，威信很大，實權都在共產黨手中。法律是形式主義。……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審判員說了算。如肅反問題……我感到是擴大了。殺了七十七萬人，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七十二萬。」(註三十三)

在當時很多大學生心目中，胡風及肅反問題一直使他們感到忿忿不平，故當這兩個問題被林希翎及其他學生主動提出來的時候，很快便得到學生的響應，大字報的言論比以前激烈，學生要求人大交待胡風案及肅反案的結果，「各個學校的學生，都將本校『肅反』的案件，自動的提出來重新審查，聽取被害人的申訴，選出典型的案件召開大會。」(註三十四)以為受害者平反及控告當時曾製造這些案件的共產黨員。

隨著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學生們便開始籌辦刊物，期望能將校內的訊息帶出社會，以產生更大的呼應。但是要創辦一份刊物並非易事，「第

一需要有錢；第二要有人；第三要有可能辦刊物的環境，即所謂『出版自由』；第四要考慮其銷路。」^(註三十五)當時的學生出版了一份名為《廣場》的刊物，「因為北大有個『民主廣場』，北大的『五四』民主晚會在那裡開的。《廣場》的名字是要大家不要忘記『五四』民主會上所作的諾言，以後的行動都是這些諾言的實踐。」^(註三十六)為了解決錢的問題，負責辦刊物的學生四出奔走募捐，募捐不單受到學生的支持，也受到老師們的贊助，就連北京大學校長、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也曾希望支持這刊物，然而卻由於共產黨員的阻撓而不能成事。^(註三十七)雖然錢是籌足了，但採辦紙張的問題也使同學大傷腦筋，由於中國採取了統購統銷的政策，故此買大批的紙張必須到國營商店購買，然而學生的行動又得不到國營商店的合作。「回校之後，只得使出非常手段，動員了一大群同學，輪流去零買，」^(註三十八)以解決紙張的問題。紙張問題解決後，又要解決印刷問題；由於印刷廠是屬於國營機構，此等機構當然不肯接手印刷這份刊物，「市委曾有指示給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不要讓事件擴大到學校範圍以外，靜候中央指示。』」，為了解決印刷問題，學生們只得買了一架小印機，一切由同學們自己動手，油印了第一期刊物。這份刊物出版不到一天功夫，第一期七千份完全賣完了。^(註三十九)不過，由於刊物的影響太大，故連第一期第二版還未印出，油印機已被共產黨沒收了。

在中國華北地區，除了北大的活動外，各大學皆組成不同會社，部分會社指責中國的憲法是「掛羊頭賣狗肉，在現在專政下，言論、出版、新聞毫無自由」。在華中地區，南京大學的某些學生發表了二十條大綱，包括爭取自由平等、反對黨員獨裁與特權等。華南地區的中山大學部分學生發表宣言，指出「波蘭道路是民主之路，共產社會中的人類方向」。華南工學院的學生首先行控訴及追掉大會，並張貼大字報，更遊行抗議，要求撤換黨委書記及幹部。除上述的地方外，其他的大學如蘭州大學、雲南大學及四川大學等，學生們皆有激烈的言論和行動。

(2) 教師及高級知識分子的鳴放

鳴放運動開展的時候，很多教師和高級知識分子基於過往政治運動

之經驗，皆保持審慎、保守的姿態，林希翎曾指出上面的是老頭子，不大膽，世故深，不敢說；為了鞏固他們現有的地位，不敢和共產黨鬧翻。知識分子及教師產生顧慮，有其客觀原因：第一，他們為了要維持家庭生計，使他們對激烈行動有所顧慮；第二，在周恩來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發表後，他們認為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政策已作自我修正，殘酷的鬥爭過去後，隨之而來將是安穩及有所發揮的時代；第三，在建國數年來，老師由於經常受到學生的批判和鬥爭，故逐漸對學生深懷介心，使到雙方關係日漸疏遠，而表現出一種集體的對立狀況，所以他們在運動初期並不怎麼支持學生。（註四十）

然而在五七年五月中旬之後，由於學生運動的影響及民主黨派的活動，使教師們的態度日益激烈。他們曾分別就校內知識分子及教師的地位、學術自由及學生質素等種種問題，發表了很多發人深省的意見：

1. 有關知識分子地位問題

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曾指出黨對學校行政的干預無處不在：

「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許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為另外有一條線，總比你快。對於校務，我只能在事情還沒有作出決定之前提意見，決定以後就服從執行。但究竟其間是怎麼決定的，這些關鍵性的問題就茫然不知了。校務委員會每當開會決定學校裡的一個重大問題時，總是由黨內負責幹部介紹一下情況，問題分析得很全面，誰也不會投反對票，就這樣順利通過了。黨內有好多資料，黨外人不知道，很難發言，校務委員會實際是個形式。」（註四十一）

南京大學氣象系主任朱炳海亦同意錢偉長的觀點：

「現在卻是對業務不了解的人可以決定一切……學校的大行政方針決策，都由幾個科長決定，校務會議一開就是一二百人，只是聽聽報告；行政會議也是首長報告，報告往往又長得把人弄至筋疲力盡，只好散

會。」(註四十二)

華南農學院教授林孔湘指出，「在高等學校和科學機關擔負領導重任的黨員，大多數不懂業務，他們處處擺出一副『我是黨的領導者』的架子，不懂裝懂、還要獨斷獨行。」「這不是個別黨員專橫的問題，是一個制度問題。」(註四十三)圖書館學專家劉海興指出：

「一個黨員館長助理，成了我的『太上領導』……館長同意的，他不同意，就不能辦，他的主意，館長不同意，也要執行」(註四十四)「在人事安排上，表面上是說要衡量德才智，實際上就看是不是黨員，過去東北師大中文系主任是個黨員，工作上一塌糊塗。……可是人家是黨員，一直當了五年的系主任。對老師那就不同。例如在會議上，老教師發言約可分三等，第一等(算是好的)，要你『精簡一些』。第二等要你『等一等』。第三等根本沒有發言權。」(註四十五)

民主黨派民主同盟會員尹肇雄指出：

「(一)八年來斯文掃地，知識分子被一棍子打死，過去的經歷、學歷、知識、經驗幾乎全盤被否定。因此，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養成自卑感，抬不起頭。(二)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實際上是思想統治。讓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強迫接受改造，搞不通也要通。知識分子被迫在不同的場合上裝出不同鬼臉。……(三)一些共產黨員以解放者、打天下者的特殊材料製成自居，驕縱橫蠻，氣燄萬丈。不尊重知識份子的德和才，任意侮辱知識分子。」(註四十六)

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教師座談會上，副校長、名數學家傅種孫發言說：

「你們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自己不行。要讀書人幫，幫忙是可以的，你們對我們的人格要尊重點，不要整得知識份子不死不活，打了用，罵了要用，眼淚流到盆裡洗臉還是要用。你們要我們死，就一刀殺了，不必這麼刻薄的折磨我們，你們搞甚麼制我都不管，就是不要打不

要罵，我就夠了！」這番話說得非常懇切，在場的人都很感動。（註四十七）

2. 學術自由的問題

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曾指出：過去的幹部包括知識分子被毀掉的相當多。高等院校不講課的有四千人，給院系調整時廢除科目的一些人毀了。資產階級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廢除了。此外，共產黨更把傳統戲曲劇目毀掉，將藝術家當作落後份子，著名戲劇家吳祖光因此氣憤地說：「如果一定要領導的話，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曹雪芹、魯迅的？領導的思想，完全出自獨裁，認為自己就是政治。」

3. 學生質素問題

北大化學系教授傅鷹曾舉出他在美國工作的實例，並公開讚揚美國的教育制度能培養出天才。傅鷹指出：「他在美國指導的幾個研究生沒有一個不成器的，有的甚至成了權威」，但在中國以同樣方法指導學生時，則沒有太多成器的例子。究竟大學生質素低劣的原因是甚麼呢？這是北京大學的教師一個極為注重的問題。綜合他們的意見，主要有下列幾點：

- i 招生時太注重政治及背景，而不重視學業及成績，有些高級「貴族學校」只有高級幹部的子弟才能入學，但他們有時連起碼的基礎都沒有，更有很多依靠組織推薦的「調幹」學生被保送入大學，這就使學生的質素更為參差；
- ii 由於黨的干預過多，令教師失去教學自主性，「黨委對老教授總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多數系主任與研組主任沒有真正當家作主。」「老教授認為沒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讓他進研教室當助教。」「你在學術上幫他，他卻抱懷疑批評的態度來學習，甚至還要鬥爭你。試問這樣如何教呢？」（註四十八）錢偉長這番話實足以說明為何在學校裡面老師沒有積極性；
- iii 鬥爭知識分子的運動在校內連綿不絕，使人人自危，老師和學生間出現嚴重的隔膜，使老師無心教學，學生也沒心學習；
- iv 學生不能掌握自己明天的命運，正如譚天榮在北大的大字報中

- 所說的，他們大學生根本無選擇前途和職業的權利，所有的調配皆由在計劃經濟下的的官員包辦，只要政治背景良好，即使無真才實學也能分配到良好的工作，得到留學及當助教的機會，所以學生對學習的積極性也就大大降低了；
- v 政治學習及各項政治運動，花費了老師及學生大量寶貴時間。此外，知識分子的待遇差，他們又要於工作後花費很多時間在處理家務上，更添了他們不少的生活壓力，對教學也造成很大的影響；
 - vi 死板的學習蘇聯教學經驗，一切照搬，提出懷疑及不同意見的，反而受到了批評。西北畜牧醫學院教授楊詩興曾道出他的經驗：

「獸醫系某教授曾率領畢業班學生去東北實習，當時對蘇聯學者關於兩匹馬鑑定提出不同意見，事後證明他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但回校後，黨領導幕後策動學生召開『學術討論會』批評某教授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並戴上『反蘇』的帽子。」(註四十九)

故此費孝通便指出教授們「寫文章、上講堂多引幾句引經據典的話，找幾個英美學者罵上一番。這些都好辦，而且很多人是這樣辦了……有一點像小孩子看草臺戲，劇情看不懂，就看白臉還是紅臉，白臉挨打了就叫好。」(註五十)

在整個鳴放運動當中，大學裡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是在校內的座談會或在接受大眾傳媒訪問時發表言論，他們一般並沒有像學生般進行各方面行動，如主動舉辦公開論壇、辦刊物及遊行抗議等以表達他們的憤怒。不過，由於教師與中國民主同盟在組織或間接上有聯繫，他們便在中國民主同盟與學生之間扮演著一個橋樑的角色，促成雙方的合作。

三 中國民主同盟的介入

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為了能更緊密的聯繫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孤立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所以便對建國後仍生存的民主黨派採取溫和政

策，藉著他們扮演橋樑，以加強與社會的聯繫。中國民主同盟（民盟）是保留下來八個民主黨派中最大的一個，民盟的成員大多數為高級知識分子，而其聯絡網亦散佈在各大專院校。中共在整風及鳴放初期，曾多次主動邀約民盟及其他黨派的人士參加座談會，並要求他們協助發動鳴放運動，以配合黨內整風。基於此，民盟便從一個消沉的組織轉變為一十分活躍的團體，其領導人經常穿梭於各大專院校，舉辦座談會，到處串連職員，在各種會議上帶頭鳴放，一時間民盟的地位剎時提高，儼然與共產黨平起平坐，民盟的負責人希望在北京各大專院校內發動職員及學生批評現政策，從而改革高等學校的體制，甚至希望使民盟取代共產黨於大專院校內之角色。

民盟通過了老師的聯繫與學生接觸，老師常將學校裡發生的事，迅速轉告民盟中央，使他們能及時向共產黨施加壓力。此外，接近民盟的《文匯報》也經常報導學生的言論和學運的動態，以增強學運在社會的影響力，而民盟亦藉這張報紙的關係與學生建立合作的基礎。在北京，當學運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民盟中央由章伯鈞出面，邀請在北京各高等學校工作的民盟高級負責人於六月六日參加一個重要會議，這就是有名的「六、六、六」會議。應邀出席會議的有六位著名的教授，即師範大學的陶大鏞、黃藥眠，人民大學的吳景超，清華大學的錢偉長，民族學院的費孝通，高級教育部副部長曾昭掄等。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民盟中央常務委員閔剛候的文章，題目是〈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內容就是紀錄這次會議的討論，從文章中可以得知民盟的高級人員對學運及鳴放運動的估計。現將討論的重點介紹如下：

費孝通：

「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動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次運動揭發出來的問題看情況十分嚴重的，學生們控訴在肅反中被清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和知識分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

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現在學生到處找領頭的，如果老師加上去，事情可就鬧大，當然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這時錢偉長插口說我是堅決不參加共產黨的），有人說，沒有黨的提名，我們甚麼都當不上，我不相信，要是能夠參加競選，看群眾是不是贊成我。」

曾昭掄：

「今天學生的問題很多，一觸即發，他們一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因為今天群眾對黨也是不滿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黨嚴重地脫離群眾，加以波匈事件的影響形勢，就一觸即發，目前情況很像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的前夕，這次整風可能黨的估計有錯誤，黨可能認為高級分子問題多，青年學生一定不會有甚麼問題，結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動……西安交大已鬧事，上海問題可能比北京更嚴重。」

錢偉長：

「近來有些學生的家長寫信給我，要我勸勸他們的子弟不要參加鬧事，我曾做過，但學生的表示十分堅決，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們做學生的時代一樣不接受家長的勸告……知識分子最根本的問題是出路問題，學生鬧事原因是沒有出路，人有沒有出路，命運是掌握在黨員手裡，有發展前途的課程都得由黨員來擔任，……而將一些真正的專家放在一邊……無恥的積極分子（他說這句話是引用別人所說的）隨時隨地記錄別人不正確的言行，向上級彙報……然後層層佈置，批評這個，批評那個……上星期蔣校長在報告中居然說了這樣的話，他說今天知識分子是吃共產黨的飯，這句話引起老教授們很大的不滿（這時費孝通很激動地說：誰說我們吃共產黨的飯，我們從來也沒有吃共產黨的飯，我們是吃勞動人民的飯）……現在的情況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黨派站出來說話是有力量的，學生到處找自己的領袖。」

章伯鈞：

「學生要請願，其他地方也有學生罷課，形勢十分嚴重，……共產黨內部問題也大，……但辱罵李富春的大字報貼在李的門口，這是估計不到的。……我主張民主黨派要大大的發展，至少應該一兩百萬人，無黨派的人都應該參加組織。」

在是次會議中，章伯鈞更提出：

「民盟對高等學校體制問題的建議草稿予與會者研究。其中主要內容是提高民盟在高等學校中的地位。使民盟能與共產黨平分高等教育的領導權。」

由於學生運動進行得那麼激烈，他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共施加壓力，要求共產黨接受他們的主張。章伯鈞繼六、六、六後在民盟中央召開的另一會議中指出：

「我已將高等學校的情形打電話給陸定一，他說沒有辦法，他作不了主。李維漢則告訴我黨中央連夜開會，現在仍沒有具體決定怎樣處理。在國務院全會上，周總理五心不定，和平常大不相同，我想和他談談他似乎有所顧慮，沒有表示態度。我們也不再用等下去了，學生們愛怎樣就由他怎樣好了！到時候共產黨自己會找上門來，我們現在不必自貶身價。」(註五十一)

然而，一切並非如民盟及學生估計的那樣樂觀，共產黨開始反擊了。

第三節 共產黨對鳴放的鎮壓——反右運動的展開

一 中共開展反右的原因

共產黨迅速採取反右運動，除了因為學生及知識分子的激烈反應與民盟的介入外，鎮壓鳴放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鳴放的期間，有一

部分共產黨員宣佈退黨。雖然退黨的黨員多是知識分子，而退黨的行動亦只集中在學校黨組織之內，然而這些行動使共產黨大為震驚，恐怕退黨的風潮會波及社會，動搖共黨的內部根基。

此外，令共產黨擔心的，就是學運已有與社會各階層掛鉤的跡象。在鳴放運動進入高潮後，有部分學生領袖意識到除非把校內的抗爭擴散到社會層面，否則運動一定沒有出路，故此，也有學生組織小組探訪農民、探訪工人，進行訪貧問苦的工作，以擴大學生的社會支持基礎，甚至發動工農作實際的抗爭，這一切工作雖然只在萌芽階段，並無太大的成果，但對深懂群眾運動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訊號，假若群眾運動再被民盟會員乘勢領導，這一股反抗勢力有可能直接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基礎。

二 反右過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幹部閱讀。六月八日，黨中央在黨內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佈置了反擊鳴放分子的策略和步驟。《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這是為甚麼〉的社論，正式開展了反右派鬥爭。

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內部指示中說：

「無論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動分子，在此次運動中鬧得最凶的就是他們。」「各民主黨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進等頗好，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拚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毛澤東混不過去了，所以想辭職。共產黨內部分裂，不久將被推翻。他們的野心極大，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動派的比例較大，大約有10%以上，霸佔許多領導地位。」(註五十二)

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正式發表了毛澤東於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所講的〈關於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然而文章的內容

曾有所增減，內容對「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定下了六條新標準，包括擁護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建設等。七月一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由毛澤東親自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使反右運動走向高潮。七月七日，黨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又發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註五十三)七月九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更號召要「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註五十四)在上述毛澤東發表的反右文章中，他對民盟、文匯報及建議揚棄共產黨領導的觀點作出重大的批判：

- (1) 毛澤東談到黨員脫黨的情況，「上海不曉得，北京學校的黨員大概崩潰了百分之五，團員(筆者按：指共產黨領導的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崩潰得多一點，也許百份之十，或者還多一點。這種崩潰，我說是天公地道。……崩潰了我就高興得很。你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滿腦子唯心論，你鑽進共產黨、青年團裡頭，名為共產主義者，實際上是反共產主義，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份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
- (2) 毛澤東大力批評知識分子，「他們違背願意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諾言。他們企圖擺脫這種領導，而只要沒有這種領導，社會主義就不能建成，我們民族就要受到絕大的災難。」毛澤東繼而批判民盟的行動，「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他們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章伯鈞)羅(羅隆基)同盟。」毛澤東更猛烈批評《文匯報》「在春季裡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

行猖狂的進攻……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

三 揭露章羅聯盟

五七年六月廿六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變成了反右大會。在七月二日，共產黨揭露章羅聯盟，指控這個聯盟：

- (1) 企圖獨霸民盟，控制文教界；
- (2) 企圖將所有民主黨派發展成為一個政黨，發展黨員一二百萬人，與共產黨分權掌政；
- (3) 在鳴放期間到處煽動，並企圖與工商界建立聯繫，以挑戰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在會議後共產黨更命令各民主黨派召開會議，進行自己內部的整風運動，並對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及錢偉長等人，發動鬥爭清算。在重重壓力下，以上人物只得認罪，他們被嚴重批評，更撤免一切職務，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在學校內，由於學生之反抗情緒激昂，故鬥爭較為激烈，然而，共產黨始終成功地發動學生組織公審大會，鬥爭所有反抗的學生，這些行動曾經引起激烈的辯論及毆打事件。

鳴放反右運動就這樣完結了。

第四節 鳴放中值得反省的一些言論

在鳴放運動中，知識分子及學生除了就教學及肅反問題發表意見外，他們還就社會上種種不公平現象作出討論及提出改革意見。雖然這些意見部分已過時，可能並不一定適合今天改革開放的需要，然而他們討論到的問題也是有其歷史意義的。

一 互不信任，人心惶惶的生活環境及虛偽性格的養成

「我們這個革命的社會，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

互相之間存在著一種戒備狀態。譬如說，挨了批評明明心裡不服，不還嘴，反而搶先檢討之類。這種『革命世故』的表現還有：對人不即不離，發言不痛不癢，下筆先看行情，甚麼號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態度，可對甚麼也沒有自己的看法。」(註五十五)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學校有一批所謂積極分子，專門偷聽別人的話，記在小本子上，作為將來『整』人的材料。」(註五十六)

「一般人只要有一兩句話被人抓住，甚至只是開玩笑的話，便可作為證據，說是思想如何，要追究動機，運動過後，大家都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掏一片心了。」(註五十七)

建國後的共產黨，在內外的重重壓力下，經常處於一種備戰的心理狀態，對非同道者極為防範。為希望能有效地推行其政策，故對任何相左的思想或行動，均加以阻止，以期保持著社會上的絕對控制優勢。計劃經濟的實施，更使幹部的權力進一步強化，能直接控制人民的經濟生活。在缺乏監察制度平衡的狀況下，權力過份集中往往造成獨裁、專制及腐化。為打擊曾批評自己的異已者、製造鬥爭對象及領功以保「純潔」共產黨員的地位，故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不少幹部為表示其積極性，便加倍地整人，甚至不惜苦打成招，更著令市民互相告密，一些市民為避免與黨的異已者發生聯繫或甚至希望藉著整人以博取當權者的歡心，往往不惜偽造證據，誣告他人，社會因此形成一種恐怖氣氛，使人人都處於一種互不信任的戒備狀態，而在一盤散沙的基礎上，客觀上共產黨員便更能鞏固其統治基礎。

二 黨天下——共產黨領導一切

「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註五十八)憲法規定人

民有選舉權，然而人民代表已由黨內定，人民不認識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台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

知識分子更進一步批評共黨完全控制著國家機器，「憲法規定政府向民主機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然而實際上政府的一切政策均由黨來決定，政府只對黨負責。」（註五十九）「實際上『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裡，『人大』只是走走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幾年來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真正的討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動議……更可笑的是號稱統一戰線的政協，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有關學習問題的工作上，實際是不問政治，……『人大』與『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著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和『政協』，責在黨中央，黨對『人大』與『政協』來說，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黨代政，而且是似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註六十）民主黨派亦指出：「國務院每次開會，總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意見。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甚麼意見可提了？」「比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案，向大會宣佈，就算通過，強制執行。」（註六十一）

三 特權情況出現

在權力高度集中及缺乏制衡力量下，特權的出現可說是一件極其自然的事。民盟會員曲北韋於青島市政協演講時提到只要是共產黨員，不論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別照顧……舊的統治階級是沒有了，但是，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陝西師範學院王尊也說：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成四等，第一等最高貴的人是共產黨員，第二是共青團員，第三是民主黨派，第四是群眾。現在我們國家除了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以外，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設複職，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的形式，除了本質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甚麼區別呢？

四 改革的意見

(1) 平反冤獄，取消思想改造的工作

羅隆基曾主張由人大及政協聯合設立一個專門機構來檢討去三反、五反肅返運動的偏差，他並主張取消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認為思想改造是造成知識分子和黨隔閡的原因。

(2) 黨與行政分開

俞礪於《光明日報》提出：黨和政必須分開，不應以黨代替行政，黨不能發號施令，他並建議開放言論，允許私人辦報，使各種意見有地方發展，趕快制定刑法和民法，並取消由黨員控制的負責監察人民的監察部和政治部等。

(3) 提倡司法獨立

北京司法部官員基於中共幹部過多干預審案過程，提出尖銳的意見，他們指出：「單憑市委的指示辦案是違法的，破壞了法院進行審判的獨立地位。」「現在審判獨立不起來，主要原因是黨委干涉。」更批評：「黨委過問具體案件就是違法。」他們進而指出為保證司法獨立，黨委不應再過問具體案件。（註六十二）

(4) 設立政治設計院及輪流執政

章伯鈞曾指出希望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能成為政治上的設計院，並希望共產黨於推行政策前，真正和這些組織商量及交換意見。而黃心平更進一步指出既然民主黨派的黨綱與共產黨一樣要求走共產主義，那麼在這前提下應容許各政黨輪流執政，通過群眾自己選擇，使真正得民心者能上台，為人民服務。

(5) 學習資本主義的長處

章乃器針對公私合營企業效率差的情況，提出應參考資本主義的長

處。資本家除了要圖利外，還有一種企業心，為了圖利，為了搞好企業，他們自然要用人才，他並提出應該學習資本主義生產和經營的經驗及知識。

第五節 反右運動的影響

一 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

在五七、五八年的反右鬥爭中，全國共劃定右派份子五十五萬多人，到一九八零年共平反了五十四萬多人，後來除了幾個「大右派」分子不予平反外，其餘幾乎所有人皆獲平反，從此可以看見反右鬥爭擴大化的嚴重程度。

此外，被劃為右派人士受到嚴重的打擊，輕則降級留用，重則送往勞改、被劃為右派的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均被開除黨或團籍，有些更被開除學籍及公職，以及在相當長的時間把他們等同「地、富、反、壞」，使在以後的政治運動中這群「右派分子」及其家人皆受牽連。

反右運動不僅影響知識分子建設國家的積極性，更影響海外華僑歸國建設的決心。千家駒曾說：

「反右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它挫傷了愛國知識分子的心，傷了國家的元氣，其消極作用不下於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甚或超過之。例如當錢偉長被劃為右派時，當時有許多我國留學生科學家準備回到祖國，參加祖國建設，他們已經到了香港或東京，一聽到錢偉長劃成右派，於是趕快回到美國，申請加入美國國籍，說像錢偉長這樣愛國的留學生還劃成右派，我們還敢回去嗎？」（註六十三）

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的原因，在於中國領導人長期在革命戰爭和激烈的鬥爭環境中成長而養成的高度警惕經驗，再加上五六年間中國對蘇聯十二大批判史太林浪潮，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西方各國乘東歐混亂而掀起國際反共潮流，致使中國領導人對五七年期間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尖銳批評的行動，引起了疑心，歸結為階級鬥爭沒有搞好，並把

匈牙利群眾反政府的狀況硬套於中國。中國領導人一旦把人民內部矛盾看成是階級鬥爭，就必會產生重大失誤。

此外，中國缺乏法律，以群眾運動代替司法的做法也容易出現隨意劃定右派的情況，再加上不少在鳴放初期受衝擊的幹部，藉反右運動報復，促使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

二 「階級鬥爭」觀念擴大化

反右運動是建國以來的一大轉折，對於意識形態及經濟的發展，皆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中共八大曾經指出，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已經解決，階級鬥爭再不是社會上的基本矛盾。但在五七年下旬，卻由於「右派分子」的「進攻」，使毛澤東覺得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所以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由於毛澤東這個論點，直接地否定了八大有關階級鬥爭經已結束的決議，使中國在大躍進及文革期間又走了一段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道路。

三 人民不敢再說真話

右派分子多是有骨氣、敢說真話的人。千家駒曾指出：

「在反右運動中，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都不是因為他們說錯了話，而是因為他們說了真話，老實話，或者發表了正確的意見，而被劃為右派的，其餘百分之九，可能是說了錯話或過頭話。其中也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是借整風的機會而向黨進行攻擊，這是極少數。即使有，也是斷章取義歪曲事實真相的，例如當時大肆宣傳的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說要殺共產黨的話……原來他說的是國民黨做了壞事，所以被推翻，共產黨做了壞事，人民也會殺共產黨的。《人民日報》把他截頭去尾，變成葛佩琦要殺共產黨。」（註六十四）

故此，在反右運動後，黨內外都噤若寒蟬，再加上毛澤東後來在五

八年中曾大批周恩來及陳雲等人提出反冒進(詳見大躍進一章)，在這情況下，基本上整個國家出現了「假、大、空」的情況，沒人敢再說真話。後來，在毛澤東大力提倡脫離實際的大躍進時，全國上下竟歌功頌德的齊聲響應，各級幹部為顯示躍進決心，爭相攀比發展速度，而最終把中國的經濟帶往破產邊緣。

第六節 對鳴放反右運動的總結

鳴放運動的特點，是整個過程局限於社會上有地位的知識分子或大學生發洩心中不滿的情緒。雖然學生曾有意識地去發動群眾，把運動推向社會層面，但由於時間限制及共產黨迅速回應等因素，這些運動未能發揮效果，引發大多數的工農群眾的共鳴，在面對共產黨的反右運動時，知識分子根本全無反抗的力量。

雖然共產黨批評這些舊知識分子由於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而以非馬列的角度去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而得出黨天下是三害的根源，要求黨政分家及輪流執政這些「削弱黨的領導」的「錯誤」言論。然而我們卻要問在大鳴大放中，有所謂「平反冤獄」、「共產黨的全權控制」、「操縱選舉」、「黨的特權」、「虛偽的性格」等說法，是否真的一點道理也沒有？在一九七八年後中國的改革行動中，共產黨不也是同意並批評上述所出現的種種問題，謀求解決的方法嗎？為甚麼當時一定要說這些言論是「大毒草」而以一個反右運動加以鎮壓呢？需要知道以運動形式打擊對方或解決問題，結果是會將鬥爭擴大化，提供一個好機會予一些幹部藉著運動的形式來打擊及報復過往曾批評過他們的異己者。鄧小平在八零年也指出反右運動的問題在於擴大化，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而造成了不幸的結果。

當時學生曾往農村及工廠發動群眾，而民盟的介入確使鳴放運動加了一層行動的色彩。無可否認民主黨派是希望結合學生運動的力量給予共產黨一定的壓力以推行民主黨派的改革建議，客觀上，其目的亦實際是要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權。故此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正如鄧小平於八

零年所指出的：

「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註六十五)

然而，假若能深一層分析，三害的根源不正是由於「黨天下」、人民不能監督共產黨嗎？所以要求共產黨不要過份地干預社會上每一個環節的運作，實行黨政分家，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說，中國憲法中明列市民有遊行、示威、集會、結社及選舉的自由，由民主黨派推舉代表與共黨競逐人大議席、讓人民有所選擇，也完全符合憲法的精神，發動群眾，舉行遊行示威，給予當權一定的政治壓力，也是憲法容許的，又怎能隨意以運動形式而加以鎮壓呢？

從鳴放反右及以後的政治運動如文革及北京之春等可以看出，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個人，為了進行黨內整風，以消除官僚主義、特權階層及對立的政治路線，往往會容許甚至主動發動黨外群眾，對這些他們認為會危害共產黨員純潔性的行為加以清洗。然而，隨著批判運動的開展及深化，群眾自然會從無數的不平事件中反省到出現這麼多問題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整個由共產黨控制的制度出現了問題，社會缺乏民主監督及其他力量對黨作出抗衡而使官僚主義及特權層的出現。故此，當群眾提出對整個制度作出改革時，則必須在某程度上對共產黨的無限權力作出挑戰，但共產黨卻認為這些建議根本上是否定了「社會主義」及「黨的領導」，共產黨希望解決的只是作風及政策的問題而並非整個制度的改革，所以，一幕又一幕的反右鬥爭往往隨著運動的深入而展開。

當然，這並不是說共產黨在本質上否定任何制度的改革，七八年後的改革浪潮中，也可以看到共產黨也希望從制度中加強市民或專家的參與而對黨的權力作出某程度的限制，故此，人大及政協的角色明顯加強，傳媒對各級政府的監察亦加深，立法速度及執法力度亦大幅加強，專家及人民的意見更多被重視及接納。然而改革的步驟和幅度卻受到慎

密的控制，一切改變都經由上而下穩步的進行，中共始終對於自發性的群眾行動存在著一定的戒心。嚴密及慎重的規劃固然可以避免過份挑戰黨權及其他過激行動的出現，從而保持社會穩定，維護改革成果。可是從另一角度來看，改革的幅度和深度也受到了明顯的限制。

註 釋

- 註一 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158-189頁
- 註二 同上註，第161頁
- 註三 同上註，第162頁
- 註四 同上註，第160頁
- 註五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3頁
- 註六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87頁及93頁
- 註七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10頁
- 註八 同上，第442頁
- 註九 同註五，第105頁
- 註十 同註五，第87頁
- 註十一 同註五，第103頁
- 註十二 唐桂國《北平學生反共抗暴運動紀實》，第136頁
- 註十三 林志堅《新中國要事述評》，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98頁
- 註十四 同上註，第195頁
- 註十五 同註五，第105頁
- 註十六 《林希翎自選集》，順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219頁
- 註十七 同註十二，第56頁
- 註十八 同註十六，第135-136頁
- 註十九 一九五七年五月卅日林希翎於人民大學發言
- 註二十 《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
- 註二十一 《中國青年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 註二十二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

- 註二十三 叢進《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曲折發展的歲月》
- 註二十四 同註七，第363-402頁
- 註二十五 同註二十三，第49頁
- 註二十六 同上註
- 註二十七 同註十二，第117-118頁
- 註二十八 葉洪生《中國往何處去——大陸新起一代的吶喊》，成文出版社，第6頁
- 註二十九 同註十二，第131頁
- 註三十 同註十六，第137-138頁
- 註三十一 同註十六，第138頁
- 註三十二 同註十九
- 註三十三 同註十九
- 註三十四 同註十二，第138頁
- 註三十五 同註十二，第165頁
- 註三十六 同註十二，第166頁
- 註三十七 同上註
- 註三十八 同註十二，第167頁
- 註三十九 同註十二，第168-169頁
- 註四十 同註十二，第152頁
- 註四十一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 註四十二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
- 註四十三 《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
- 註四十四 《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 註四十五 《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
- 註四十六 《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 註四十七 同註十二，第156頁
- 註四十八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 註四十九 《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 註五十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

- 註五十一 同註十二，第221
- 註五十二 同註二十三，第7頁
- 註五十三 同註七，第456465頁
- 註五十四 同註七，第44-455頁
- 註五十五 《人民日報》九五七年六月一日
- 註五十六 《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 註五十七 陳垣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在中共統戰部座談會發言
- 註五十八 《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
- 註五十九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大學大字報
- 註六十 《瀋陽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
- 註六十一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九十年代雜誌社，一九九一年，第77頁
- 註六十二 同註六十一，第87頁
- 註六十三 千家駒《七十年的回憶》，鏡報文化企業，一九九二年，第255頁
- 註六十四 同上註
- 註六十五 《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258頁

第四篇

經濟大躍進

——災難與重建

(1958-1965)

- 第十八章 大躍進時期的經濟、政治發展(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
- 第十九章 通往共產世界的烏托邦——人民公社化運動
- 第二十章 彭德懷廬山上書與「反右傾」運動
- 第二十一章 務實路線——經濟的大救亡
- 第二十二章 從獨立外交到中蘇分歧

第十八章 大躍進時期的經濟、政治發展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

第一節 「大躍進」政策的背景

一 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

作為大躍進的積極發動者毛澤東無可置疑是希望盡速改變中國人民貧困生活，據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

「大約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份前後，戰士馬維同志探家回來，不但寫了調查報告，還帶回一個窩頭，又黑又硬，交給毛澤東說：『我們家鄉的農民生活還很苦。他們就是吃這樣的窩頭，我講的是實話。』

毛澤東接過窩頭，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紅了……這一次，他接過窩頭，掰一塊放在嘴裡，淚水立刻溢滿眼眶。當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窩頭時，豆大的淚珠便順臉頰淌落下來，鼻子也壅塞了。他一邊哭，一邊掰窩頭分給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吃，你們都吃一塊。這是我們農村的口糧，這就是種糧的人吃的糧食啊！……』

那天，毛澤東失眠了。嘴裡不斷喃喃：『為什麼是這樣呢？為什麼……人民當家作主了，不再是為地主種田，是為人民群眾自身搞生產，生產力應該獲得解放麼……』。(註一)

後來在「大躍進」初始進行而表現理想的期間毛澤東非常興奮。在一九五八年初大躍進仍未進行的時期他還寫道：「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到八月初，他極其興奮說道：「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註二)

二 檢討蘇聯模式發展經驗，走適合中國自己的道路

「一五計劃」後期，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皆意識到蘇聯經濟發展的策略未必合乎人口多、資金少及科技基礎薄弱的中國，再加上計劃經濟制度的局限性，使地方的潛力不能充份及靈活的發揮，令經濟發展受到阻礙。

中國原定於五八至六二年便推行第二個五年計劃，其目標基本上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相似：以發展重工業及國防工業為核心，繼續進行農業、手工業等社會主義改造，並加強科技人員的訓練，來促使經濟發展。然而一五計劃的經驗及效果，使當時處理中國經濟的官員面臨著以下的困擾：

- (1) 雖然該計劃的基本目標仍是發展重型工業，但在實際上，中國資金稀少，工業原料及輕工業品供應不足，再加上城市失業人口日增，迫使政府不得不優先發展農業及輕工業。正如毛澤東於其五六年著名論著〈論十大關係〉中指出的，假若發展重工業，「那你就要注意發展輕工業，就要注意發展農業，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積累就會更多些，幾年之後，投到重工業的資金也就會更多些。」(註三)
- (2) 由於中國本身資金不足，故極希望獲得蘇聯援助，可是，當時中蘇關係已開始惡化，蘇聯援助中國的條件甚為苛刻，使中國難接受。

基於上述原因，中國一方面仍努力爭取蘇聯援助，以發展重工業及國防工業；而另一方面，則希望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及較為容易掌握的「中間技術」，加速農業及輕工業的生產，以突破經濟上的樽頸。

三 毛澤東提倡不斷革命論，藉發揮「人的積極性」以推動經濟發展。

傳統左派理論界在解釋馬克思主義時，機械地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下才有可能實現。然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尚未充份的發展，經濟上的生力亦異常低下，假若真正依循傳統的馬克思主義

教條，則中國革命根本不會發生。

當然，歷史已證明這種純粹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變化(如革命)的傳統教條，已早被蘇聯及中國的共產黨成功奪取政權的歷史所否定。共產黨的革命家藉著軍事及群眾的力量，推翻當時統治的政權，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後才在新政權的基礎上推動經濟的發展。毛澤東相信事在人為、人定勝天。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毛澤東曾指出：

為了「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揮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註四)「只要有了一人，甚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註五)

戰爭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覺得「人的問題」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他相信人民的自覺性能帶來爆炸性的巨大的力量。毛澤東一貫對蘇聯的經濟管理體制所採取的由上而下絕對垂直領導，以及工廠中普遍實行的「一長制」十分反感，認為是壓抑人民的主動性，使勞動者的力量不能積極地發揮。

基於對人性的理解，毛澤東堅持要發動群眾，而要發動群眾，則首先要改變他們的思想，務使人民能夠全心全意地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而奮鬥。毛澤東曾指出：

「我們的民族是個熱情的民族，現在有了熱潮……我們民族像原子……把我們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釋放熱能，力量真大，過去做不到的也能做到，所以我們這民族有這麼一股勁，十五年要趕上英國。」(註六)

在大躍進前夕，毛澤東曾在上海與一位教授談論《人民日報》的社論〈乘風破浪〉，那個教授對毛澤東說要鼓起幹勁，力爭上游，而若要逆流而上的話，則需要費多一點勁。毛澤東對這番話十分受落，並說：

「說得很對，我很欣賞這個人，這是好人，這個人有正義感。有人批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鄙過去，迷信將來』，甚麼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這有甚麼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註七)

在發動起群眾積極性後，毛澤東更建議採取「不斷革命」的方法以建設社會主義，他曾豪情地說要「讓高山低頭，要河水讓路」。(註八)以下是毛提出經濟建設上不斷革命的構思：

「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一九四九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合作化……社會主義大改造……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

「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幹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勢情……新任務壓來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務的問題上面去了。」

「我主張不斷革命論，……革命就是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著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前進，湖南人常說：『草鞋無樣，邊打邊像』。」

四 當時中國國內外的政經形勢

就國內局勢而言，那時一五計劃結束，中國經濟縱然出現一定問題，例如不少農村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但總的來說，經濟形勢比起建國初期已有急速的發展，一九五七年更可說是一九七九年之前中國經濟搞得最好的一年。三大改造完成後，政府已穩固地掌握全國的經濟命脈，中國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政治方面，鳴放反右運動後，更開展了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整風，整風的口號是燒五氣：「官氣、驕氣、嬌氣、闊氣、暮氣」，經過多次黨內整風後，中共改善了官僚主義情況，進一步加強與工農之關係，客觀上造成有利於動員農群眾「大幹快上」的條件。對知識分子來說，經過

多次文藝界及教育上的整風運動，他們再也不敢隨意批評政府，一切事宜皆唯唯諾諾，明哲保身的思想蔓延，面對著將來大躍進及人民公社運動中很多不合乎科學及情理的事，他們也不敢堅持己見。從發動大躍進的過程看來，毛澤東是刻意貶低知識分子，以讓工農能大膽的發揮其能動性，毛澤東曾坦白地剖析他對知識分子的態度：

「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甚麼都不行。」

他進而勉勵自己：「不要『自慚形穢』。伯恩斯坦、考茨基、後期的普列漢諾夫，馬列主義比我們讀得多，但他們並不行，把第二國際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僕從。」(註九)

在國際方面，蘇聯在五七年十月首次發射人造衛星，使毛澤東感到社會主義陣營在科技發展上已勝過西方，國際形勢已到了一個新的轉捩點。他在五七年於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時，曾指出當時的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但在另一方面，蘇共自其二十次黨大會以來，中蘇分歧便不斷增加，毛澤東於蘇聯提出經濟援助中國推行第二個五年計劃，亦未能得到蘇聯同意。從一九五八年起，蘇聯對中國的貸款不但完全停止，更向中國索償舊債本息共七億六千萬元，對此，中國於事後曾經批評：

「我們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並且主要是通過貿易形式進行的。對於蘇聯向我們提供的所有成套設備與物資，包括通過貸款提供的設備和物資，連同利息在內，我們都是用物資、黃金和國際貨幣償付的，還應當特別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說，是貴得多的。」(註十)

中國領導人在面臨要同時應付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壓力下，產生了躍進的心態，希望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起自己的經濟體系及國防基礎，以應付將來可能出現的突殊變化。

第二節 「大躍進」經濟政策的本質——速度、權力下放與中間技術

為了將大躍進時期經濟發展的脈絡交待清楚，使讀者能從一個全面的宏觀角度分析經中國領導層反覆思考(針對蘇聯模式)而推行的經濟政策，故在這裡將大躍進的內容大致介紹，而於下面的章節中再就一些較為重要的問題詳加討論。基本來說，大躍進運動包括下列幾方面：

一 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發動群眾，以累積資金

強調人的力量，以戰爭時期的拚命忘我犧牲精神，日夜苦戰，打鐵趁熱，以求一氣呵成，高速度地增加農工產品的產量，結果就出現了農業大規模興築水利工程及全民大煉鋼的兩大群眾運動。由於此兩項運動皆需抽調大量資金和勞動力，為方便調動安排，產生了合併合作社和擴大合作社規模的要求，使群眾能通過組織集約(即統一調配及發動)的方式於合作社的集體範圍內從事忘我的生產活動。此外，由於這兩大運動抽調過多農村人口，令耕作上的勞動力不足，故又需要成立人民公社，提供公共食堂及公共托兒所等設施，使家庭中的婦女勞動力，能夠拋開煮食及育兒的家庭事務而幫助應付農務，支持生產。

就大躍進的經濟意義分析，此運動希望在不需增加額外資金的前提下，通過意識形態鼓勵及組織人民公社來集中中國充裕但分散的勞動力，加速生產，大幅提高各類農產品的供應，以累積資金，為工業的發展奠定堅固的基礎。

二 經濟權力下放

為配合高速度的發展及補救控制過嚴的計劃經濟制度所造成的壓抑地方靈活性之弊端，中國政府在大躍進期間進行經濟制度改革，將原本屬於中央擁有的經濟權力大幅地下放到地方，中央只保留著部分重大建設和主要企業的管理權及全國經濟協調的工作。而地方政府則負起生

產、建設及管理現有企業之任務。

以上之改革希望能增加地方政府在經濟事務方面的積極性，促使地方政府能就各地區千變萬化的狀況來制定適合當地經濟需要的措施。此外，中央亦希望藉著地方幹部與基層工農較為密切的關係，能更有效的發動群眾，為高速度的發展貢獻力量。

三 平衡發展經濟

中國政府改變了經濟發展策略，「大躍進」時期的經濟發展策略為「兩條腿走路」，即是由「一五計劃」時期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改變為工業和農業同時並重。此外，政府亦減少對大型企業投資，改而支持運用中間技術(即採用一些非高技術水平，而注重勞動密集技術)的中小型企業的發展。由於中國人口多、資金少、科技基礎薄弱，中小型企業既可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且成本廉宜，需要掌握的科技水平亦不太高，更能符合中國的國情。

在上述經濟戰略調整的原則下，當時的經濟政策有「五並舉」的提法，分別是：

- (1) 農業與工業同時並舉；
- (2) 輕工業與重工業同時並舉；
- (3) 大型企業與小型企業同時並舉；
- (4) 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
- (5) 土法生產(中間技術)與洋法生產(先進技術)同時並舉。

大躍進期間，中國政府更希望拉近城鄉、工人與農民收入之差距，為此，政府大力提倡農村工業化、倚靠人民公社的組織力量，將農村的人力資源、資金及技術力量組織起來，以創辦農村的小型工業，通過農村工業化改善農民生活，吸引更多城市人口移居，以解決城市人口膨脹，並吸引更多技術人員下移以支援農村工業化的持續發展。政府於一九五七年曾大量下放技術人員及管理人員往農村，以增強農村的科技力量。

四 政治特點——黨權力的膨脹

在五六年的中國共產黨八大裡，中共領導人已指出黨應管理社會上各項事務。在一五計劃期間曾強調企業內「一長制」，由專家治廠，個人指揮一切，分工細緻，制度嚴密。然而這種管理制度無疑與毛澤東建議的發動群眾、鼓勵發揮個人積極性的思想大相逕庭，垂直領導體制不單造成組織科層化，更使工人和管理層、技術人員與非技術人員之間造成明顯的等級關係，有違群眾參與治廠的原則，抑制了群眾的創造性。當時共產黨對「一長制」的批評是針對此制度只能引導幹部只專不紅，脫離黨的領導和群眾的監督。故此，在八大期間共產黨正式廢除「一長制」，並確定了由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以增強黨的領導力量。

在新制度下，企業內嘗試推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改革，「兩參」是指工人參與管理，經理及技術人員參與勞動；「一改」是指改變過時及不合理的規章制度；而「三結合」是指工人、幹部和技術人員的三結合，縮少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差別，並刺激整個工人階級提高技術的水平。

由於中央政府「國務院」內分工精細，各部門需要的科技及管理水平亦較高，所以國務院招聘了大量知識分子及專家，以處理專門事務，他們當中有些並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憑他們掌握的專業而得以參與決策。故此，國務院是一個較為獨立的系統，黨在裡面的影響力相對較少，相反地，地方政權差不多都是由黨委全面控制。黨中央在廢除「一長制」及實行黨委領導制度，以及實行將中央權力下放的政策後，實際上是剝奪了中央政府「國務院」各部門過往由上而下的對企業廠長實行的垂直領導權，而把原由中央管理的各個地方企業全交予地方政府管理，不過，由於地方政權受黨權牢固的控制，故此，施行中央經濟權力下放的政策其實是黨權的進一步擴張。

另一例子是大躍進的發展亦促成了農村建立人民公社，乍看起來，權力似乎是進一步下放，將地方事務交由最基層的政權單位——人民公

社管理。但是實際上，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權力是更朝地方政權集中。由於「鄉社合一」政策使原本不直接領導經濟的鄉級行政組織變成公社的幹部，直接領導生產，而使農村的資源進一步向地方政權集中，令黨的控制更加全面。

第三節 中央經濟權力下放與反地方主義鬥爭

一 中央經濟權力下放

中國政府為改善中央集權式經濟管理制度及實現大躍進，務求各地區能盡快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故在五八年間進行了第一次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擴大地方權限，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

(1) 把中央各部所屬企業下放予地方政府管理

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央決定把各個工業部門管理的企業，除卻一些重要和試驗性質的企業外，原則上一律下放予地方政府管理。這樣，中央所屬企業和事業單位，就從五七年的九千三百個減少到五八年的一千二百個，下放了百分之八十七。

(2) 下放計劃管理權

中央提出了「專業部門和地區相結合的計劃管理體制」，規定地方可對本地區的工農業生產指標進行調整，並可以對建設規模、建設項目和投資作統籌安排。根據這個規定，計劃權限產生了一系列的變化，並使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所管理的工業產品，從五七年的三百種減少到二百一十五種。

(3) 下放基建審批權限

為了使地方能於計劃管理權下放後盡快發展工業，中央決定放鬆基本建設項目的審批程序，讓地方有擴大基本建設規模的權力。地方在進行基本建設時，除非牽涉的款項超過國家所規定的限額，否則全部建廠

等決策皆由地方自行決定。此外，更規定地方只要有資金，便可自行決定興辦工廠，包括一些大型和限額以上的項目。

一九五八年四月，國務院更決定增加地方的財力，例如在收入劃分方面，過往中央企業的收入完全上繳，地方政府不能參與分成，但在新制度下，有些省有百分之二十的企業利潤由所有省(市)參與分成。此外，從五九年起，為了支持地方的發展，國務院決定停止發行全國性的國家經濟建設公債，而各省、市、自治區則可發行地方經濟建設公債，以加強地方政府之財力。

再者，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由於生產建設規模日益擴大，各地區紛紛要求增加職工，因此，中央決定各地招工計劃，經省、市確定之後便可執行，無需再經中央批准。由於放鬆了招工控制，遂使職工人數與城鎮居民大量增加。

由於中央將大部分經濟權力下放，使地方政府成為推動整個「大躍進」運動的核心。故此，地方政權的純潔性及確保地方領導人能貫徹中央指示，執行有關大躍進運動的各項經濟政策也就異常重要，毛澤東就曾經指出：「二十六個省市區，十三個發生問題。」一九五八年左右，中央或由中央發動地方政府開展了一項反地方主義的鬥爭，鬥爭的矛頭指向一些搞「獨立王國」、抗拒中央命令、不同意過速進行三大改造及高速發展經濟的地方領導人。

二 反地方主義的鬥爭

五八年五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中(簡稱八大二次會議)，浙江、甘肅、安徽、雲南、廣西、青海、河北、廣東、新疆、河南、山東等地方代表，在大會發言中報告了本地區黨組織的整風運動情況，並聲稱曾對「地方主義分子」、「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激烈鬥爭，打擊了他們的右派及反黨集團，會議並對這些被鬥爭的地方領導人進行正式點名批判。

五三、五四年間，為針對「高饒事件」，黨中央已開展過反地方割據的行動，並指責某些高級幹部「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

本和獨立王國」。五四年四、五月間，《人民日報》曾連續發表四篇社論，評論宗派及向黨爭取獨立的活動已是黨內相當普遍的狀況。在那期間，黨中央及各地方黨組織，相繼召開會議，就地方主義傾向問題檢討自己的錯誤，後來中央更對地方人事作大規模的調整，以整肅山頭主義。

一九五八年的反地方主義運動，矛頭主要針對下列三種地方領導人：

(1) 原地方幹部的地方主義勢力。

例如廣東省在四九年由中共佔領後，原廣東地方游擊隊領袖古大存、馮白駒、方方等在葉劍英(廣東人)的領導下，分別擔任了廣東黨政機關的主要職位，客觀上形成一股地方勢力，這實際上是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種正常情況。

一九五零年開始，大批北方軍隊及幹部南調廣東，他們針對南方土改較為溫和的狀況，領導廣東全省開展較為激進的土改運動，南下幹部更被派往廣東各級機關擔任主要職務，打破地方勢力壟斷廣東之局面。

由於葉劍英等地方領導人在領導土地改革時，對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採取較溫和的政策，而受到南下幹部的攻擊。五二年六月，毛澤東特將葉劍英、方方等召至北京開會，批評廣東省領導人在農民問題上右傾，在廣東土改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註十一)，存在著地方主義。後來在廣東的南下幹部更把反地方主義提到敵我鬥爭的高度。(註十二)

面對這種新情況，原地方老資格的幹部當然不滿，經常與南下幹部發生衝突，熟悉地方具體情況的「土共」對南下幹部推行的某些不適合地方實際需要的政策深感憤慨。一九五七年間，南下幹部如陶鑄等在毛澤東、劉少奇的支持下，於廣東省開展了反地方主義行動，大舉整肅地方幹部，而古大存及馮白鈞於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會議中受到點名批判。

此外，山東省亦進行反地方主義及分散主義的運動，前副省長王卓如和袁子揚等被批判為鬧獨立王國，抵制黨委的領導，被批判經常以「地

區論」、「條件特殊」等理由，對黨委決定的決議「拒不執行」。此外，他們亦被批評為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及否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獨攬山東省的「財政、糧食、貿易及計劃等部門」，「並製造財政赤字」來攻擊地方黨組織，他們更「在組織上自成系統」，「企圖把他們領導的部門變成『獨立王國』」。(註十三)

(2) 對中央政策持不同意見的「右派反黨地方集團」

這些被批判的「右派反黨地方集團」與上述原地方幹部的地方主義勢力有一個較明顯的分別，就是他們除了與地方上其他領導幹部進行權力鬥爭外，也對中央所制定的種種經濟及政治政策深感不滿。例如前廣西省副省長陳再勵等人於五八年就被猛烈批評為犯了下列種種「罪狀」：

1. 「打著『反冒進』、『反主觀主義』的旗幟，極力詆毀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取得的巨大成就」(註十四)
2. 他們藉著「廣西因災餓死人事件」，「硬說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認為黨在農村工作上『犯了路線錯誤』，要求『重新估計農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錯誤』。」(註十五)
3. 「他們根本否定廣大農民實現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迫切要求……說成是『強迫出來的』。他們……把合作社的生產說得一團糟，說合作社『只顧集體，不顧個人』，要求無限制地發展社員的家庭副業，借以瓦解合作社的集體生產。」(註十六)
4. 他們對「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糧食增產的數字……說成是『吹牛』、『虛夸』，是『報喜不報憂』的表現。他們更批評前省委貫徹執行中央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方針……為『教條主義』、『好大喜功』、『不從實際出發』。」(註十七)
5. 「替地主、富農、壞份子和反革命份子『伸冤』叫囂，硬說所謂『冤案』、『錯案』佔50%以上，甚至竟把反革命暴亂分子殺害我們幹部的事件，也稱為人民內部矛盾。」(註十八)

雲南省黨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因被批判為搞「地方主義」

及「篡奪省委領導權」而被開除出黨。他們被批判為「以雲南地方幹部的『領袖』自居，竭力利用地方主義的遺留影響，培植個人勢力」。(註十九)對中央政策不滿方面，他們被批評「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後和右派分子向黨進攻之時，……利用全省取得高級合作化勝利後的個別缺點，跨大所謂『陰暗面』，率領親信，調派『骨幹』，到處搜羅所謂農村的『黑暗』，到處散佈『無敵論』的毒素，污蔑社會主義革命為黑漆一團，從而對農村的基層組織進行猛烈進攻。」(註二十)

(3) 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

一九五八年六月廿六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舉行擴大會議，共有三百八十一人參加，發言的次數多達一千三百七十八人次，主要內容是針對「地方民族主義」分子，自治區黨委書記賽福鼎作出了〈堅決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報告，肯定了中央政府在新疆八年來所取得的成就，並開除「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如自治區文化廳廳長、自治區文聯主席孜牙·賽買提、自治區民政廳廳長、作家協會自治區分會副主席依不拉音吐爾的，以及烏魯木齊市市長阿·賽德等人出黨。他們被批評的罪狀主要有如下五點：

1. 「反對祖國統一、主張分離主義。……要成立『獨立的共和國』或『加盟共和國』，要將『自治區』改為『維吾斯坦』或『東土耳其斯坦』，有的甚至還盼望國際形勢緊張，國內發生匈牙利事件，使新疆得到『獨立』。」(註二十一)
2. 「主張民族分裂……排斥漢族……反對其他民族的幹部擔任黨政領導工作，要把漢人趕走或遷走。」(註二十二)
3. 「削弱和破壞人民民主專政……對於反革命分子組織暴亂寄予深厚同情，說是人民的『正義行動』；他們包庇和無原則地釋放反革命分子，甚至把地主、富農、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安插到國家機關和企業、事業、學校內部。」(註二十三)
4. 「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他們說新疆合作化與土地

問題有矛盾，不能搞起社會主義經濟，說合作化是搬用了漢族地區的經驗，沒有照顧所謂『民族傳統和民族特點』。」(註二十四)

5. 「為了達到分裂黨……的目的，竟污蔑：『黨成了漢族人的黨』、『馬克思主義被一個民族來獨佔了』，進行反黨宗派活動，在黨的組織內排斥漢族領導同志……提出黨委也要民族化。」(註二十五)

政府經過對地方異己分子進行整肅後，加強了地方政權對中央政策的擁護。而在五八年將中央經濟權力大量下放予這些會貫徹中央政策的地方領導人後，「大躍進」便雷厲風行地開展了。

第四節 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前奏曲——猛烈批判 「反冒進」

從一九五七年底至五八年四月期間，毛澤東先後主持召開了在杭州、南寧、成都及漢口舉行的多位省市領導人參與的會議，就醞釀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發動大躍進運動等問題進行討論，毛更於這些會議中發表了很多重要的談話，為整個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及發展方針。

一 號召破除迷信及樹立正確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於些會議上強調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對經典著作或有學問的專家過份迷信，他相信在「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了學問多的人」毛提出這點主要是號召幹部及工農群眾應勇於創新，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及毅力以征服大自然，促進生產的發展，而不需被墨守成規的清規戒律束縛。他也曾表示無產階級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並特別強調縣以上幹部要敢說敢做，敢作古人、洋人沒有做過的事。

毛澤東更提出了兩種個人崇拜的觀點，他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我們必須崇拜；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

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他指出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故此正確的個人崇拜應被提倡。(註二十六)

作為大躍進運動的倡導人，毛澤東希望通過個人崇拜以增強幹部及群眾對他及其政策的向心力，而在破除迷信的號召下，希望群眾能衝破客觀條件上的限制，透過自身的創造力來加速經濟的發展，趕上世界上其他國家。

二 毛澤東步步進逼，大力批判五六、五七年的反冒進

為了鼓吹經濟能加速發展，毛澤東大力批判五六、五七年由周恩來及陳雲提出的反冒進政策。毛批判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將東歐國家人民的反政府行動和五六年國內反冒進事件，說是給右派進攻共產黨造成重要藉口，他提出：「反冒進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民一泄了氣不得了。」並要求以後不准再提反冒進這個名詞。(註二十七)

《人民日報》於五七年底的一篇社論亦指出：

「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因為不懂得這個廣道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

為了進一步打擊「反冒進」的觀點，毛澤東步步進逼。在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中，毛澤東批評反冒進挫傷了農民及群眾的積極性，給群眾潑了冷水，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害。他更批評了五六年六月人民日報的一篇〈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三扁擔，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甚麼要看？」(註二十八)

在是次會議中，毛澤東拿著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

主義的新上海》，對主持反冒進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註二十九)

周恩來在南寧會議上遭毛澤東批評後，表示會為自己在「反冒進」行動的「錯誤」，在五八年五月即將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出公開檢討。在寫檢討發言的過程中，周恩來承受著極大的壓力，周的秘書范若愚形象地描繪當時周恩來的境況：

「周恩來同志指示我：過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談內容，由我記錄下來整理成書面材料。這次發言，不能像過去那樣，因為這是我自己的檢討發言，不能由別人起草，只能他講一句，我記一句。……

周恩來說得很慢，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後來，范若愚在周恩來談話中，引了一句成語說：我與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時，竟遭周恩來嚴厲批評，周說：『……在整風後，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是在整風以前，不能引用。』『這也說明你對黨史知識知道的太小！』周恩來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大略)(註三十)

在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中毛澤東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同時正式把反冒進與右派進攻直接聯繫起來。毛說：

「我們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對反冒進負有主要責任的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先念分別作了公開檢討。周恩來說：

「反冒進的錯誤挫傷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對我國一九五七年建設事業的影響還是不少的。反冒進的錯誤是嚴重的……一九五七年春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成就，把一九五六躍進中某些缺點誇大為全面冒進，並且進一步否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就。」（註三十一）

據中共中央黨校於九四年下旬推出的《開國總理周恩來》一書中，披露一九五八年上旬毛澤東竟有以柯慶施取代周恩來為總理之構想。雖毛澤東並無正式提出，但周恩來仍能察覺。周恩來感覺到如提請辭，會被指為頑抗。因此，在五八年六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周委婉地提出：請考慮他繼續擔任總理是否適當？會議挽留了周繼續任總理。會後，鄧小平草擬會議紀錄，寫道：會議認為周恩來應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紀錄報送毛澤東，這樣，周仍任總理，但是此後，周遇事發表意見就比較少了。（註三十二）

在毛澤東之角度看來，既然周恩來及陳雲等在八大二次大會上已作出檢討，還是讓他們留下，因為毛認為，國家經濟建設還得「靠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周恩來等還是心存不滿，留下他們也只是迫於无奈。故此，在八大二次會議中，毛仍不斷發出「我們黨內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尤其強調「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大局」，毛的威脅客觀上給一向採取務實態度以建設經濟的領導人不斷施加壓力，保證他們在大躍進期間不要潑冷水。在這情況下，大躍進期間各級幹部只敢爭表現，互相攀比，而對很多違反日常知識的荒唐事件，亦只得噤若寒蟬。（註三十三）

三 提出國內當時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

五六年的共產黨八大曾總結：「我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而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

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故此，應快速發展經濟，而將中國從一個落後農業國家改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家。

然而，由於五七年鳴放運動中曾出現不少批評黨領導及質疑計劃經濟的言論，故使毛澤東感覺到當前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毛曾指出階級矛盾主要是三千萬資產階級，四千萬小資產階級（富裕中農）和他們的知識分子，這七千萬人是主要矛盾。毛澤東提倡新鬥爭的論點是基於他察覺到中央到地方仍有不少阻礙發展大躍進及其「冒進」政策的力量，而他亦認為堅持這種觀點的人是「非馬克思主義」，故他將他們就「冒進」及「反冒進」之分歧提升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從而給這些「保守」力量一個更大的罪名，以便更徹底的消除他們的影響力。

四 苦戰三年、技術革命的理論

一九五八年安徽省曾提出「苦戰三年」，使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變，隨後河南省亦提出「一年改觀」，各省並互相攀比發展速度。在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中，通過了經濟建設的「兩本帳」。國家的第一本帳是公開的、必須完成的，而第二本帳則不公佈，但要爭取完成。兩本帳的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帳，組織第一個平衡，同時放手發動群眾，挖掘潛力，突破第一個平衡，編制第二本帳，組織第二個平衡」，目的是「促進生產建設的高速度」。在是次會議中，規定工農業總產值分別比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八和百分之二十四點八（「兩本帳」計法），鋼的產量比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十九點二和三十三點五。毛澤東更提出了改革規章制度，認為當時的規章制度有相當部分需要廢除，並鼓勵群眾去打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在思想戰線上「不斷革命」的同時，還要求一個「技術革命」，建議各幹部要學科學、學技術，毛澤東深切了解「嚴重的經濟建設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註三十四）故此，毛澤東指出在一九五八年時

黨的主要注意力應轉移到技術革命方面去，為保證在學科技的同時不會忽略政治，他建議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

五 強調加速經濟發展的積極平衡論

一個現代的國民經濟總體，分工協作程度高度發達，各個生產部門密切相聯，一環扣一環，只有保持彼此間的相對平衡，經濟才能穩定地發展。五七年陳雲針對五六年基建規模過大導致物資嚴重緊張而提出的「國力論」，可以說是「綜合平衡」理論的一個經典。陳雲建議在經濟建設中應根據國情和國力，安排好農、輕、重及各項物資的整體協調，才能為高速發展提供穩固基礎。

然而，毛澤東並不支持上述的論點，他認為不平衡才是經常的經濟基本法則，平衡只是暫時現象。毛澤東曾提出「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過渡的，要不斷用先進的經驗在前進中把原來的平衡打破，只有不斷打破平衡，事業才能前進。不要把平衡當作主要的，平衡是革命的平衡，積極的平衡，不是消極的平衡。」從此，共產黨在制定經濟計劃中便提倡「積極平衡」的理論，有些報章甚至宣傳：「只講躍進，不講平衡。」

其實，激進派的「積極平衡」理論可以說是「不均衡成長」(Unbalanced Growth) 發展策略的一個引伸，提出集中發展某幾個部門，而通過「聯繫效應」(Linkage Effect) 以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見前章——經濟發展的總結，蘇聯模式的再考慮)，大躍進批評四平八穩的綜合平衡是保守的計劃方法，代之以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的計劃方法，認為抓住這兩個主要矛盾，問題就可以解決。拿「以鋼為綱」來說，提出一個鋼產量的高指標，迫使燃料、運輸及其他原材料工業迅速跟上。毛澤東更相信只要能夠在思想及政治上教育群眾，使他們產生社會主義覺悟及積極性，就能發揮無窮的潛力，突破經濟發展的常規。

第四節 大躍進運動的全面展開——農業、工業的飛躍

一 八大二次會議

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簡稱八大二次會議)中，正式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議提出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將集中更大力量放在社會主義建設，而建設的重點在於「速度」，「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八大二次會議黨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一個馬鞍形，兩頭高，中間低。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在生產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躍進—保守—大躍進，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嗎？」

會議更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基本內容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實現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件下，實現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

毛澤東於會議中發表講話，要求大大縮短超英趕美的時間，爭取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筆者按：毛澤東於三個月前的成都會議上還指出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毛更指出從中央到各級政府中還有一部分「觀潮派」、「秋後算帳派」，這些人永不去找積極因素，只找消極因素。毛澤東更要求每個山頭、村落、機關、部隊、工廠都要插紅旗，技白旗。他提出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斷語，目的是剝奪一些有學問的人和教授的資本，讓工人、農民和幹部發揚敢說敢做的精神。

由於大躍進強調速度高於一切，速度就是一切，故此標誌著「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高度密植」、「大辦水利」、「大搞衛星田」、「地方—農村工業遍地開花」等大型群眾運動便次第開展。

五八年八月，共產黨政治局於北戴河會議中更進一步強調由於農產品將「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要求各地黨委把注意重心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走，以致「全民辦工業」、「全民大煉鋼」、「全民大挖煤」、「全民辦交通」等工業方面的群眾運動也相應而起。在「一天等於二十年」、「大搞群眾運動，不要怕天下大亂，有了亂，才有治」、「打破思想，破除迷信，打破常規，敢想敢做」等口號之下，原有規章制度差不多全盤被打亂，整個經濟發展速度也脫離了預定的目標。中央政府由於下放了大部分經濟權力予地方黨委，使黨的力量更為集中，掌握了更大的決定權，再加上在反地方主義勢力後，地方黨委為了爭取表現，皆對中央指示唯命是從，並千方百計尋求更佳的成績，爭相攀比發展速度。

二 農業方面的大躍進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村辦水利，除能灌溉田地，更可利用水的落差及衝力興辦發電站，引起連鎖過程，促進小型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減省勞動力與創造積累，加促地方工業化，從而有助於城市和工農差別的消滅。河南省長葛縣領導幹部於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上指出，其縣曾將三十三萬畝地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五左右，還說土地經過深翻，可以增產百分之幾十至一倍，毛澤東當即稱讚了他，提出長葛縣能做到，別的縣難道不行嗎？於是全國就掀起深翻和改良土壤的運動，爭取到五九年春天，就把全國需要改良的十六億畝土地，普遍深翻和改良一遍；對土層太薄的田地，要在三年內，採取「借客土」的辦法，把土層加厚到一尺以上。同時，全國三億三千萬畝鹽鹹地、紅壤土等瘠薄田地，要於兩三年內全部完成改良。當時政府還規定各地應集中搞好水利、積肥、深耕、密種等四項措施，以提高農產品產量。於是在五八年冬全國每日投入興修水利的人數達一億人，群眾性的積肥變成黃土搬家，深耕的深度達七、八尺，密種的密度奇高，一畝地多達兩千萬根秧苗。

在這一段時間內，全國各地便開始大搞高額豐產的衛星田（指產量如衛星般高），並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想到了，我們就能

做到了」，「人有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一九五八年夏收之後，人民日報開闢一個豐產榜的專欄，報導各地豐產田的產量。初期各地只報導每畝地生產糧食從幾百斤至一千斤，但接著便層層加碼，各地不斷宣傳「高產衛星」，小麥從每畝產幾千斤上升到每畝幾萬斤，早稻從畝產幾千斤上升到畝產幾萬斤及十幾萬斤。有關部門曾匯總各地的報告，推算全年糧食可能突破一萬億斤的天文數字。在這個背景下，就出現了下列這些令人不敢相信的高產量數字：

不切實際的農業產量

日期	地區	糧種	畝產量(斤)
1958年1月3日	廣東汕頭	旱稻	3,000
1958年6月11日	河北魏縣	小麥	2,394
1958年6月16日	湖北谷城	小麥	4,353
1958年6月18日	河南商丘	小麥	4,412
1958年6月30日	河北安國	小麥	5,103
1958年7月12日	河南西平	小麥	7,312
1958年7月22日	福建閩侯	旱稻	7,275
1958年8月1日	湖北孝感	旱稻	15,000
1958年8月13日	湖北麻城	旱稻	36,900
1958年9月18日	四川郫縣	旱稻	824,525
1958年9月18日	廣西環江	旱稻	130,434

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竟然用通欄標題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宣稱：「山東省壽張縣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1000-2000斤，根本沒人提了。」他們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註三十五）

毛澤東曾於五八年八月上旬視察河北省的徐水縣、安國縣及定縣等地方，面對著畝產極高的衛星，毛澤東竟然擔心糧食過多的問題：

「……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主席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平均每畝兩千斤。張國忠又說，主要是山藥高產，全縣共種了春夏山藥三十五萬畝。毛主席聽過以後，不覺睜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裡的人，說道：

『要收那麼多糧食呀！』……『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季就收十一億呀！你們全縣三十一萬人口，怎樣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

大家一時都被毛主席問住了。後來，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主席說：『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們的糧食呀！』……

毛主席呵呵笑著，左右環顧地看看大家。大家都不覺地笑了起來，張國忠也笑道：『我們只是光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

毛主席說：『也要考慮怎樣吃糧食哩！』(註三十六)

後來毛澤東說道：『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當時各地方上報的估計產量，十分脫離實際，然而這種浮誇風卻是當時的一股潮流，假若不跟著走，不提出虛假數字的話，則會被批判為保守落後，並需再重計產量。不過假若真正完全相信報紙報導的產量，則一定會像毛澤東一樣，認為需要考慮處理糧食供過於求的問題。既然糧食充沛，有些地方幹部就命令不許種蕃薯，指出糧食過多，根本吃不完，故無需種蕃薯。有的了解事實的幹部就提出說，即使人不吃蕃薯，豬也要吃吧。但上級卻會說，豬也不需要吃蕃薯，可吃大米吧，結果很多縣都沒有在秋冬種蕃薯，使後來更無能力應付饑荒的災難。

究竟前述高產衛星田是怎樣產生的呢？現特舉出一些實際的例子，廣東某縣僅兩畝的「縣委試驗田」提出畝產二十萬斤的天文數字，原來是由以下方法產生的：

「筆者(齊辛)一位友人所親自見到的例子……『在這不到兩畝的土地上，動員的突擊勞動力有數百人』，包括縣委幹部、學生、軍人、工人，分批進行勞動，硬要創出『奇跡』。最困難的工序是深耕，要把泥挖到一米深，不能光用普通的犁耙，而要用鶴嘴鋤，鐵鍬等工具，逐步逐寸地深挖，耗費不少勞力。把深層的紅土挖出來後，就在上面蓋上幾千擔的土雜肥、泥肥、農家肥等。翻得那麼深，又壓上如此多的肥料，在田裡插秧就很困難了，人一下田裡，泥土已齊腰深，寸步難移。於是只好出動小船，人坐進船裡插秧，進度非常慢，但好在人多。要畝產二十萬斤，當然要把秧苗插得很密了，結果禾苗插上去，還未到抽穗揚花，已發熱枯死，試驗田一片枯黃。『縣委試驗田』豈能失敗？於是立即又作出決定，把枯死的秧苗全部撥出來，重新平整土地，然後把附近二十畝原來長得好好的農田中的水稻移植過來，硬要它們在這塊縣委試驗田上生長，那二十畝地的小稻已開始結實，再過二、三十天就可以收割了。移到那不到兩畝的『縣委試驗田』以後，當然是高度密植了。由於禾長得太密，不通風，顆粒就有燒爛的危險，於是又再採取緊急措施，在試驗田周圍出動了十多台鼓風機，不斷向田裡吹風，把熱驅散。」(註三十七)

中國著名人士千家駒亦指出畝產萬斤田製造的方法：

「它是把若干畝地上種的已長熟的莊稼移植在一塊地上，密密麻麻。太密了，不通風，怎麼辦？來是上面架了若干架電風扇，吹著。陽光不足怎麼辦？晚上開了強度很高的日光燈照著。這叫畝產一萬斤的大田。為了這一畝萬斤田，毀了其他數百畝莊稼。」(註三十八)

除了上述這些荒唐浪費的例子外，有些農村為了表示先進積極，學人家的經驗，竟然完全不考慮本身的實際條件，導至很大的損失。據一位曾經歷農業大躍進的人的回憶：

「我們村有的是上好水田，為了學人家沒水田的經驗，竟然硬迫著我們要把穀種播在旱地上。找不到旱地，要在禾棚頂上鋪上黃泥漿，把穀種播在黃泥漿上，然後每晚把水擔上棚灌溉。五九年夏，大熱天時，秧苗都死了，覺悟時已太遲，再在水田播穀種，已誤農時。」（註三十九）

而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地方竟然以狗肉湯來當肥料灌溉。

浮誇的風氣及盲目的措施，使中國浪費了無法估計的人力與物力，在五九年下半年，農業大躍進及大豐收的假像被事實所粉碎，而國內遂發生了連續三年的大饑荒。

三 工業方面的大躍進

在農業虛報浮誇的情況下，五八年八月共產黨政治局於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估計一九五八年糧食產量將達六千億斤到七千億斤，棉花產量將達七千萬擔左右，農產品產量將「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嚴重的浮夸數字迷惑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大部分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對大躍進注意的重心遂由農業轉向了工業。簡單地說，轉向了鋼鐵。於是會議要求各省、自治區黨委把注意重心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來，並正式決定五八年的鋼產量要比五七年增加一倍，即要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其實，這是當時開採、治煉和運輸能力所不能達到的。當時會議文件更指出實現了九年具有決戰性質的計劃，中國的鋼鐵和其他一些主要工業品的產量將超過英國，苦戰三年，再苦戰幾年，就可趕上美國，再往前走，就可以超過它們。

一九五八年八月，共產黨中央提出有條件的省份應該建立起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當時毛澤東曾將糧食和鋼鐵相提並論，強調「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個東西就甚麼都好辦了。」（註四十）所以中國便從「地方工業遍地開花」發展成為「全民大辦工業」，而終走上「全民大練鋼」的道路。

九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

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的社論，指出：

「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趕上去……會議決定，全國的省和自治區黨委的第一書記，從現在起，就必須首先注意工業的領導……工業的中心問題是鋼鐵的生產和機械的生產，而機械生產發展又決定於鋼鐵生產的發展。會議……決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一九五八年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即比一九五七年的產量五百三十五萬噸增加一倍而奮鬥。」

雖然中央在一九五八年六月號召在年底前鋼鐵產量翻兩番，但直至八月，全國鋼鐵量仍只是四百多萬噸，這就表示有七百萬噸的鋼鐵生產要於四個月內完成，任務異常艱辛，毛澤東遂引用唐朝詩人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詩句來形容他焦慮的心境。

為了加速鋼鐵生產，北戴河會議後，中央連續召開了四次電話會議。「譚震林傳達說：主席提出，明年糧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一千一百萬噸鋼一噸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敗。彭真說：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鋼鐵有一個大躍進，因為九月是要命的一個月。」(註四十二)

據統計，七月份用於鋼鐵工業的勞動力只有幾十萬人，到八月份增至幾百萬人，九月份增至五千多萬人，十月份六千多萬人，年底增至九千萬至一億人以上。群眾性的大煉鋼鐵運動，席捲全國城鎮農村，各地普遍舉辦「小土高爐」，土洋結合，土法上馬，小土爐更是星羅棋布，遍地開花。當時強調要「打破對鋼鐵工業的神秘思想」，「發動全黨全民來辦鋼鐵工業」，「不僅工廠可以辦，而且機關、部隊、學校、街道、手工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都可以辦」。大煉鋼鐵成了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其他各條戰線為鋼鐵這位「躍進元帥」停車讓路。中央政府容許各級政府在安排計劃時，允許擠掉其他一些東西，力保鋼鐵。五八年九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全力保證鋼鐵生產》的社論，要求一切部門需為鋼鐵讓路，強調：

「不管那一個地方，那一個部門，有材料、有設備、有交通工具，必

須首先讓給鋼鐵工業，有製造能力的，必須首先為鋼鐵工業而生產；電力必須首先輸送給鋼鐵工業；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須首先滿足鋼鐵的需要；有勞力和有技術力量的，必須首先調給鋼鐵工業。」

在這情況下，共產黨的領導重心皆差不多完全轉向鋼鐵業，為了超額完成規定任務及向上級繳功，各級地方黨委均親自「掛帥」，成立「鋼鐵指揮部」或「鋼鐵辦公室」專責其事。他們均製定每月、每周、每天的鋼鐵、煤炭和交通運輸的計劃，並把執行的結果上報中央。其他的工業部門則集中力量趕製治煉設備，設計機構則調動技術力量，交通運輸部門展開全民運輸，保證出鋼，人民公社社員被大規模動員上山採礦，就地設立「小土高爐」煉鋼。

五八年山東省報導於兩個月內建立了「小高爐」一千多座；河北省保定專區建成高爐一萬多座；四川省日產生鋼鐵兩萬噸及河南省投入鋼鐵生產的達一百萬人等。當時曾估計政府投入「全民辦工業」和「全民大煉鋼」的資金高達兩百億元。在那時期，可以說每個階層的人都被大躍進運動鞭策得精疲力竭，疲於奔命，甚至可以說整個國家簡直到了極度緊張及瘋狂的狀態。當時，一些被譽為先進的煉鋼單位往北京匯報，住進旅館，行李一放下，面不洗，便在院子裡砌起小高爐煉鋼，以示其先進。中國的人民在這運動中忘我地工作著，挑燈夜戰，連續三四十個小時不眠不休的例子隨時可見：

- (1) 在東北鞍山第一煉鋼廠中，「當平爐剛剛完出鋼，爐膛還是通紅的時候，修爐工人就裹著澆上水的草袋，奮勇地鑽進爐膛，他們就這樣地戰勝了一千度的高溫，使小修時間，比原計劃縮短了三十小時。」
- (2) 「廿七日夜晚，河南省成千上萬的土高爐，徹夜火燄熊熊，火光映紅了紅夜。這一夜，是禹縣英雄公社青年東風煉鋼廠，分秒必爭，斤兩必爭，為鋼鐵奮戰的第十六個夜。當夜幕剛剛降臨，落起了一陣小雨，工人們怕雨下大了路濕不好走，就把足供十五天用的礦石、焦炭運到爐前。二十三歲的青年工人傅江，三天前在鋼鐵戰線

上參加了共產黨，他已經四天四夜沒有睡覺了，但是在運礦石的時候，幹勁特別大。別人挑一擔，他挑兩擔。他說寧肯把人累倒，也不肯叫爐子停住。李天祥、李東方父子二人，已經戰鬥了六晝夜，別人再三叫他們休息，但李東方卻堅持不肯，一直戰鬥到下半夜三點鐘。」

- (3) 在江西「不論是白髮老人或幾歲孩子，不論工人、農民、婦女、幹部，都拿起鐵錘和筐子，奔向山頭。廿七日是中秋節，按照這裡農民的習俗，這一天都要全家團聚，歡度節日。可是這一天天還沒有亮，各路採礦大軍就來到山上。晚上燈光照耀，爆破聲仍徹夜不停。」

當時，由於中國煉鋼的原材料根本不夠，鐵礦對全國性的煉鋼運動供應不足，所以有些人竟將所有鐵製的門窗欄杆、家具甚至飯鍋等都砸爛送進「小高爐」作為煉鋼材料，然而整個運動卻由於治煉設備及原材料不合標準而根本煉不出鋼，就算煉得出來的也因雜質太多而只能用來製造十分簡單和粗劣的農具，造成嚴重浪費損失。

第五節 對工業大躍進運動的客觀分析

一 大躍進經濟理論的合理性部份

歷史已告訴我們大躍進運動由於好高騖遠、不顧現實的虛誇風氣所影響而失敗，然而，這並不等於當時政府提出的經濟發展策略完全沒有可取的地方。政府於五八年提出的發展方針，主要是根據由多個中央部門提供資料為基礎的〈論十大關係〉所發展出來的。從經濟發展策略觀點分析，大躍進運動是解決人口膨脹、資金不足、技術落後與城鄉的隱藏失業問題及增加工業生產的辦法。在當時情況下，下放城市人員以及大量利用農村閒散勞動力來發展小型的、技術水平較低的工業，可以說是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當時中國領導人相信發展地方及農村工業，可以加速國家工業化的

過程，加速農業機械化及縮小城鄉的差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對中小型企業的重要性提出了如下論點。

- (1) 中小型企業需要較少的投資和便於吸收分散的資金；
- (2) 需要較少時間建造，而能於較短時間內提供生產，使投資效果能更快的發揮；
- (3) 由於中小型企業所需的技術較簡單，可以由當地人負責建造，以訓練基層科技人才，實現毛澤東提出的幹部學科學的技術革命；
- (4) 中小型企業可以廣泛地在全國發展，有利於促進全國工業化及科技力量，促進各地區經濟的平衡發展；
- (5) 由於中小企業可以生產各式各樣的物品，改變產品方向也容易；小型企業接近原料和市場，可以靈活地運用地方資源，節省運輸費用，使供應、生產和銷售等互相關係的問題能更妥善地解決；
- (6) 更為重要的，是中小型企業能有效地運用農村的勞動力和一些非經常性的勞動力。假若政府將投資用於建設大型企業，按每勞動力佔投資額一萬元計算，能夠吸納的勞動力十分有限，而中小企業的投資，一般平均每人只需幾百元甚至幾十元，便能創造一個就業機會，這對解決中國失業問題有積極的意義。

二 西方發展經濟學的論証

以上提出的經濟政策，其實與很多研究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西方經濟專家所建議的做法十分相似：

(1) 充份調動資源，強大資金實力

將中國城市失業及農村「假裝失業」(筆者按：即勞動力其實是過多，但為保證人人有工做，只好將工作攤分來做，故就算移走大部分從事農業工作的人，也不會減低農業產量)的勞動力集中調動起來從事水利及農村工業化等經濟建設，其實是與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努路枯斯(NurKse)所提出的剩餘勞力就等於有潛質的儲蓄的觀點相同。他的觀點

是為了克服落後國家資金不足的問題，政府應通過各種方法將社會上的儲蓄或積累資金集中起來，將這筆款項用來聘用失業的勞動力，使他們從事有實際貢獻的經濟活動，這樣失業者不單不需要成為社會負擔，更可以從其賺取的收入中為社會提供儲蓄或資金。故此，努路枯斯曾指出在人口過剩的小農經濟裡，假裝失業可以說是含有對於經濟發展可資利用之隱藏的儲蓄泉源，「故應引導這些勞動力作經濟建設。」^(註四十三)

在中國，劉少奇指出只要我們善於依靠五億多農民這個偉大力量，即使國家不增加農業的投資，也可以使農業建設的規模大大地擴大。

（2）強調發揮聯繫效應的「不均衡成長策略」

「積極平衡」，「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的觀點，根本是「不均衡成長」發展策略的引伸，相信在通過「聯繫效應」影響下，能通過集中於某部門發展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迅速成長，而其發展速度會比採取平衡增長戰略所能取得的發展更要快些。

（3）支持運用「中間技術」的中小型企業之發展

發展中小企業的策略也與美著名經濟學家舒馬赫 (Schumacher) 所寫的「小是美的」(Small is Beautiful) 中論述的觀點十分相似。舒馬赫針對一些落後國家，不理會資金稀少、人口過多及科技水平薄弱的國情，而盲目追求需要浩費大筆成本的西方「尖端科技」及「現代化」，結果往往是使這些落後國家外債纍纍，以至過份依靠西方。

舒馬赫認為企業規模及科技水平的發展應得到更多全面的內在因素配合，例如人的能力、人的反應和當地資源等。故此，舒馬赫建議落後的國家應採用「中間技術」(Intermediate Technology)，由於中間技術皆採用勞動集約的發展模式，既可製造更多就業，更由於其所需資金及掌握的技術水平不高，故對一些人口多、資金少及科技薄弱的國家更為適合。^(註四十四) 舒馬赫的觀點對西方文明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影響到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

(4) 吸納剩餘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

中國政府深切了解根本不可能在城市搞工業以吸納農村過剩的勞動力，而只好將製造就業的責任交給農村。此外，政府也明白一個龐大的農業社會中，根本不能將一切經濟活動如投資、消費及就業等，全交由中央政府統籌負責。這些觀點其實也與諾貝爾經濟獎得獎者墨岱爾 (Myrdal) 的論點相同，墨岱爾曾花上十多年的時間對東南亞的經濟結構作出廣泛及深入的研究，並提出多項解決途徑，受到經濟學界的極大注意。(註四十五)

三 大躍進失敗的原因

既然發展策略及方針如此正確，何以工業大躍進會失敗呢？原因十分簡單，當中種種改革如中央經濟權力下放、發展中小企業及農村工業化等雖然有合理的因素，但是，由於大躍進期間所提倡的高指標、瞎指揮及虛誇風氣，往往使很多改革的積極性、靈活性變成盲目性和無政府主義。為了向上級繳功及因應上級鼓吹速度要加快的壓力，農村基層幹部不惜誇大農產品產量，瞞騙上級。中央由於覺得農業生產已完全過關，故可轉移力量，集中發展工業，在「以鋼為綱」，「一切為鋼鐵元帥開路」的口號下，實際上排擠了農業及輕工業的發展，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工農業生產大幅下降，市場供應緊張及通貨膨脹。假若我們從經濟的觀點分析工業大躍進的實際推行情況，可以發覺它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1) 中小型企業根本不能用作重工業生產

以中間技術及勞動集約為特徵的中小企業，應該用以發展紡織、木材加工、家具、食品及陶磁等農產品加工工業，但利用這些中小企來發展鋼鐵，從「規模經濟」的觀點分析，根本有很大的問題。

「規模經濟」是指一間工廠在生產規模擴大後所能帶來的利益，如這工廠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購入大量原材料，實施更高的管理水平，採用更

多自動化及機械化設備。中小企業在這方面所得到的利益，自然較大型企業為少，假若政府利用中小企業用於生產輕工業品或農業加工品，則中小企業自可以應付自如，但利用中小企業來發展重工業如煤炭及鋼鐵等，則一定會發生很多問題，因為重工業所需的管理水平、自動化和機械化等規模經濟的水平十分高，而中小企業根本無可能提供這些服務。再者，中小型企業根本不可能生產出與大型企業相同的高質工業產品。

(2) 技術能力不足，缺乏通盤計劃，造成嚴重浪費

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任何生產活動必需是有意義的勞動，意即是所增加的收入必要超出投入的成本，否則便無意義。以煉鋼運動來說，由於沒有具體的計劃，認真研究煉鋼軋鋼的設備，產品的規格以及技術等問題，再加上沒有考慮到投入煉鋼的勞力根本是農業的勞動力，其教育水平及生產效率很低，又沒有大工業生產的經驗和技術。利用這些人蓋小高爐，進行土法煉鋼，不單會消耗極多燃料，而且技術及溫度不夠，煉出來的只是一些質量甚差的鐵，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在經濟效果上可以說是負數。換句話說，不煉鋼比煉鋼還可為國家節省金錢。

(3) 大煉鋼運動嚴重影響了原有的經濟活動

當時大煉鋼運動曾出現了與農業爭勞力、資金和土地，而與國家工業爭原材料的現象。由於小土爐消耗大量原材料，以致影響一些大規模鋼鐵廠的生產任務，一些由群眾建的小土爐，伸手向大鋼鐵廠要材料，在那時社會風氣下，廠方為了表示支持群眾大煉鋼，只好把根本要用的原材料送給群眾，引致其本身無法完成生產計劃。很多時候地方上因小土爐提煉鋼鐵成本比現代方法提煉的要昂貴得多，而群眾煉出來的鐵又不合格，造成很大的浪費。更為甚者，就是一些幹部為了尋求足夠的煉鋼原材料，不惜將正在使用的鐵器如窗戶鐵枝、廚具及鐵鑊等通通拿到小土爐燒打一番，就算是煉出鋼鐵了。

此外，為推行大煉鋼，大批勞動力被無償地調動，由於興辦地方工

業沒有充份的計劃，使很多治煉地點離礦場甚遠，人民除了要投入煉鋼工作外，更需充當運輸工具，將礦石運到煉鋼高爐。中國農村雖然有大量過剩勞動力，然而這個剩餘是有季節性的，農閒時勞動力或會過剩，但農忙時則往往不足。大煉鋼期間將一大批勞動力在農忙季節從農業調到煉鋼工業，使農業出現嚴重的勞力短缺，農產品收成時只好利用婦女和兒童去搶收，有些地方甚至沒有收割，眼白白看著農作物爛掉。當時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十大元帥之一的彭德懷在北戴河會議後，到鄭州、蘭州及湖南等地調查大躍進實況，在面對農產品實際上減產及無人收割的慘狀時，一位老紅軍戰士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的詩句，正正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過？請為人民鼓與呼。」

此外，煉鋼需要大量原料，由於煤炭缺乏，只得調動大批勞動力上山砍柴，甚至毀壞山林，當作燃料，這些皆對農林業帶來極壞的影響，令土質鬆落，容易造成泛濫。此外，也有一些礦藏被隨意開採，使後來鋼鐵工業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障礙。

(4) 放權過速，造成混亂

大躍進前期進行的經濟改革，將權力大幅下放地方，對發揮地方積極性極有好處。然而，值得商榷的，是中央在將經濟權力下放的同時，卻沒有同步制定調控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規章制度。面對當時「大幹快上」的躍進心態，以及須考慮毛澤東及其他部分中央領導人對加速經濟發展的期望，各地方官員皆不敢怠慢，在制訂地方濟發展計劃時不顧實際，互相攀比，以求政績。在此環境下，使本來合理的下放經濟權力的改革，變成支持地方盲目發展的制度保証，而最終導致總理需求過盛，混亂情況叢生。

註 釋

- 註 一 呂廷煜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艱難探索》(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紅旗出版社，第122-123頁
- 註 二 叢進《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41頁
- 註 三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引自《毛澤東選集補遺》第三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九年)丁望主編，第77頁
- 註 四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45頁
- 註 五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01頁
- 註 六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同註三，第161頁
- 註 七 同註六
- 註 八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192頁
- 註 九 同註八，第174-175頁
- 註 十 《中國人民手冊》，一九六五年，第193頁
- 註十一 鄧力群等著《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490頁
- 註十二 華南分局：〈分局及各地區反地方主義會議情況給黨中央、中南局的綜合報告〉，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九日
- 註十三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及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 註十四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 註十五 同上註
- 註十六 同上註
- 註十七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 註十八 同上註
- 註十九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 註二十 同上註
- 註二十一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 註二十二 同上註
- 註二十三 同上註
- 註二十四 同上註

- 註二十五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 註二十六 同註一，第129頁
- 註二十七 同註二，第122頁
- 註二十八 同註八，第152頁
- 註二十九 香港中通社北京一日電，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
- 註三十一 范若愚《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引自林蘊暉等著《人民共和國春秋實錄》，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384頁
- 註三十二 同註二十九
- 註三十三 史唯《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載一九九零年第2期《黨的文獻》，同註三十，第385頁
- 註三十四 丁望《毛澤東選集補遺》第三卷，明報月刊社，一九七一年，第169頁
- 註三十五 數字及上列表引自同註一，第63頁
- 註三十六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
- 註三十七 齊莘《中共的思潮與鬥爭》，七十年代雜誌社，一九八零年，第44-45頁
- 註三十八 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第258頁
- 註三十九 丁赦《中國農村側記》
- 註四十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
- 註四十一 同註一，第73頁
- 註四十二 同註一，第74頁
- 註四十三 Ragnar Nurkse, "Excess Population and Capital Construction." *Malaya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1957
- 註四十四 E.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Blond & Briggs Ltd 1973
- 註四十五 Gunnar Myrdal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 Vintage Books Edition, September 1971

第十九章 通往共產世界的烏托邦——人民公社化運動

導言——人民公社的本質

人民公社是配合大躍進運動所建立的一種制度。大躍進期間曾出現大規模興築水利、泥土深翻及全民大煉鋼等運動，由於這些運動需用大量資金和勞動力，故若能組成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單位，則可更有效地調動人手進行建設，而通過公共食堂、托兒所及幼兒院等成立，更可以解放家庭中的婦女勞動力，發動她們進行經濟建設。故此人民公社，乃是「大躍進」運動與著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組織產物。「大躍進」運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形式，而政社合一的集中統一領導、集體勞動、集體生活、分配絕對平均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便於搞「大躍進」的組織形式。正如毛澤東後來說：

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註一)

第一節 成立人民公社的過程

一 人民公社出現的背境

共產黨建立人民公社之前，原無通盤計劃，就是黨的內部也準備不足。從毛澤東的發言分析，中國共產黨於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四月漢口會議，五月八大二次會議上都沒有提到人民公社的名稱。據毛澤東指出，人民公社的出現，這是四月成都會議，五月黨代表大會沒有料到的，其實四月已在河南出現，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發現。從這裡可以知道，人民公社在開始時是由農民基層幹部先搞起來的。當然，成立人民公社仍有其一定的經濟背景，五八年初當大躍進正式開展後，為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毛澤東曾於三月提出把一些小型的

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為大型合作社，繼而由黨中央發佈〈關於併社問題的指示〉，正式開展併大社運動。其實早在五六年，由毛澤東親自編輯的《中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曾指出：

「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該逐步合併，有些地方可以一個鄉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個鄉一個社。」

可見，在推行公社化運動之前，中央領導人也不以農業生產合作社為滿足。

人民公社發端於五八年四、五月間，河南一些合作化搞得較好的地區，多個大的生產合作社自發聯合起來試辦人民公社，當時定名為「衛星人民公社」。五八年八月上旬，毛澤東到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視察、他多次與地方負責幹部談到小社併大社的問題，認為大社可以包括工（工業）、農（農業）、兵（民兵，即全民武裝）、學（文化教育）、商（商業、交換）。而許多地方幹部在匯報時也向毛澤東強調辦大社的迫切性和優越性。毛澤東於河南視察時向當地幹部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加上個地名、或者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同時指出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這些消息在報紙發表後，全國許多地方相繼效尤。

二 毛澤東號召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提倡供給制

五八年八月下旬，毛澤東指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他認為按勞分配、工資制度、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者收入差別等，都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所謂「資產階級法權」的原則，就是每個勞動者按照自己的勞動量，獲得與其勞動支出等量之報酬，但是，由於每個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因其本身的條件如體質、家庭背景及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故此他們實際上取得的好像是平等的報酬，其實也是不平等的。基於這個原因，毛澤東建議應考慮逐步廢除有「資產階級法權」性質的工資制，而代之以每人真正平等之供給制。

毛澤東對工資制十分不滿。他說：

「抗戰時期，二三百萬人，解放戰爭時期，四五百萬人，是在軍事共產主義下生活，沒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領導之下，沒有甚麼『花』，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現在有『花』，發薪水都要分等級分將、校、尉，結果是脫離群眾，兵不愛官，民不愛幹，因為這一點和國民黨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辦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農民不喜歡我們。這種不平等的幹群關係——貓鼠關係，必須破除。」

毛澤東又說：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問題。這種共產主義精神很好。過去實行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二十二年戰爭都打勝了，為甚麼建設社會主義不行呢？」(註二)

基於毛澤東的觀點，經濟理論界遂圍繞著「資產階級法權」問題開展了一場討論。有些人拒絕實行物質利益原則及工資制度等，統統批評為「金錢掛帥」，他們並主張立即取消工資制，實行供給制度。這些理論問題的討論對實際經濟運作影響十分巨大，在農村推行人民公社化過程中，有些幹部從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出發，建議取消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工資制度，而主張社員吃飯不要錢，而且穿、用以及其他各種需要也都應當由公社包下來。當時較典型的例子是徐水縣，〈中共徐水縣委員會關於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的試行案〉指出：

「全縣人員搞供給制的『十五包』：吃飯、穿衣、住房、鞋、襪、毛巾、肥皂、燈油、火柴、烤火費、洗澡、理髮、看電影、醫療、喪葬，全部由縣裡統一包起來。」(註三)

三 中共通過成立人民公社的決議

五八年八月下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佈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要求全國各地盡快將小社併為大社，轉為人民公社，決議內容有如下幾點：

- (1) 確定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相結合，公社的規模，一

般是一鄉一社，在進一步發展後，將可能是以縣為單位組成的人民公社；

- (2) 強調在併社過程中，要以「共產主義精神」去對待各個小社的財產及債務方面的差別，不要算細帳，將各小社的財產交給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社員的自留地一般為集體經營；零星果樹仍暫歸私有，過些時候才再作處理；
- (3) 強調在小社併大社的時期，可以採取「上動下不動」的方法，首先由原來各小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聯合選出人民公社的管理委員會，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來，而有關合併的各項具體問題，將來再逐步解決。

在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報刊皆相繼發表社論，號召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要求先把公社的架子搭起來。至此，公社化運動即由華北地區席捲全國。從五八年夏季開始，只短短幾個月內，全國七十四萬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合併改組成為二萬六千多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民有一億二千萬多戶，佔全國總農戶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第二節 人民公社的特點與功能

一 人民公社的特點

一九五八年中國成立人民公社時，指出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大綜合體，強調公社已有「共產主義的萌芽」，提出「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口號，並預期人民公社將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總的來說，公社的特徵主要有如下四點：

- (1) 它是一個「大」型組織

就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人多勢眾。當時除一鄉建立一個公社外，還要求以縣為單位向「縣聯社」(即一個縣一

個社)的方向發展。當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化運動進入高潮後，將原有七十四萬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歸併轉化為二萬六千多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擁有農戶四千六百多戶，規模比高級社大得多。

「大」還有一個意義，就是人民公社採取了「政經合一」的制度，即是除經營農業、林業、畜牧業、副業和漁業等經濟生產外，還要經營所在地方的工業、手工業、信用、商業、學校教育與民兵之組織和訓練等業務。在工商業方面，公社主要負責水力發電、農產品加工工業、開採礦產與治煉鋼鐵等。關於教育方面，公社負責設立小學和業餘補習學校，必要時還可設立專科學校及大學等。在公社成立時，曾強調應以民兵的形式把人民組織起來，以落實全民皆兵的原則。毛澤東曾指出應當推廣既是軍事組織，又是勞動、教育及體育組織的民兵組織，以在有需要情況下對付外國侵略。故此，所有適齡男性和復員退伍軍人，均需編入公社民兵組織，接受軍事訓練及擔當由國家分配之任務。

(2) 人民公社是一個「公有化」程度甚高的組織

政府規定各農業合作社併入人民公社後，都要將其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農業社社員轉入公社時，要將自留地全部交出，將私有的房產、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全部轉為公社所有，而個人只能保留少量的家禽。隨著自留地的公有化，社員的家庭副農也被取消，而農村間的貿易市場也相繼關閉。

公社在分配方面設立消費基金，而消費基金亦分為「工資」基金與「供給」基金兩種。一般來說，公社社員在分配上一律實行工資制，即由群眾評定每個勞動力的工資等級，以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方法按月發給一定之工資。此外，有的公社並實行糧食供給制，即全體社員，不論家庭勞動力有多少，不論其工作量有多少，均可按照家庭人口免費供應糧食，這實際上就是將工作與收入脫鉤。

五八年九月時，毛澤東曾到湖北、安徽及江蘇等省份視察，當聽到安徽省舒茶人民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他便指出：

「即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全國很多公社也先後成立了公共食堂，實行糧食方面的供給制。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紅旗》雜誌公開發表〈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規定……分配上一律實行工資制，同時實行糧食供給制，即全體社員，不管家中勞動力多少，都按照人口免費供應糧食。

當時，公共食堂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因素。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而薄一波在一九八零年回憶說：「有的幹部執行這個口號很積極，看到過路的人走了多遠，還強拉他回來，說天晚了還不吃飯？反正不要錢，非要他吃不行。」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報紙上也出現了「吃飯競賽撐死人的消息」。^(註四)當然，當時推行公共食堂制度，亦有釋放婦女勞動力的經濟功能。從上述資料可知，供給制的提出，主要原因是希望逐步取締仍有「資產階級法權」色彩的工資制，使人民公社有更多共產主義社會所特有的「按需分配」的性質。

（3）人民公社的組織體制

由於公社是一個政經合一的組織，一鄉為一社，故此，鄉長就變為社長，鄉黨委書記就是社黨委書記，鄉人民代表大會就是社的代表大會，鄉人民委員會就是社的管理委員會。由於公社需統籌工農商學兵等事務，故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單位，更是一個基層政權組織，使到本來並不直接管理生產事務的鄉級行政機構，現在直接變成領導生產的機關，使基層政權幹部的權力大大加強。

在人民公社內部，實行三級所有制。意思是將生產資料如土地、機器與產品分別歸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三級集體所有。「公社一級」所有的財產，屬於全公社範圍的集體共同擁有，它包括生產大隊及生產隊無力或不宜經營的林場、畜牧場、工業、較大的水利工程和交通運輸服務等。「生產大隊一級」所有的財產，歸全大隊範圍內的隊員所有和支

配，這些財產包括歸大隊管理的土地、山林、水利設施及農業機械等，大隊經營的所得由大隊本身統一掌握和分配，不受公社的影響。「生產隊」是經營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是三級所有制的基礎，生產隊所擁有的土地、山林、水利建設和農具等，由生產隊本身支配和使用，而公社及生產大隊對生產隊的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不得隨意侵犯。

(4) 人民公社的勞動管理形式

為支持大躍進運動的土法煉鋼、深耕翻土及大興水利等工作，公社除調動大批人力投入工作外，更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延長工時，強調「吃在田頭，睡在工地」、「三日三夜不下馬」，更採取下列三項措施：

1. 「組織軍事化」

這就是將男女社員分別編為師、團、營、連、排等單位，以軍事紀律作為組織條例，使曠工、怠工等事情更難發生，藉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2. 「生活集體化」

就是辦公共食堂、養老院及幼兒園等福利事業，使「家庭勞動社會化」，從而解除了婦女家務勞動之負荷，使他們能投入農業生產。

3. 「生產戰鬥化」

就是在進行田間或基本建設工作時，由公社統一調配，以整齊劃一、迅速敏捷之「大軍團」作戰方式進行積肥、除草、除蟲及農忙季節時種種工作。

二 人民公社的功能

從上述人民公社的四點特徵分析，對於人民公社將勞動力按軍隊編制組成班排連營，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從事農業生產，毛澤東積極地肯定，他說：「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這「三化」的口號很好……這種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動輒夜以繼日，不顧嚴寒酷暑，

連續作戰。」^(註五)人民公社可以對整個社會發揮下列的重要功能：

（1）動員農村勞動力，促進經濟高速發展

人民公社利用強化的組織以發動農村的經濟資源，促使農村的「剩餘勞動」（筆者按：假裝失業）能轉化為生產資本，大大緩和了生產大躍進以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其次，透過集中運用資源及統一規劃，可更有效地進行一些對地方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大工程，例如在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中，需要上下游一併策劃、左右岸兼顧，統籌籌集資金和調動勞力。另外又如一些地方工業及郵電交通網，沒有大量資金及勞動力的統一運用是很難進行的。第三，公社有能力進行一些帶有冒險性的發展項目，如沒有較大的組織支持是很難發展起來的。小規模的合作社由於資金不足很難開展類似計劃，因這等項目的失敗亦會對小規模合作社的社員帶來難以承受的經濟損失。

（2）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

基於政社合一的體制，中央政府能通過人民公社直達基層，而公社作為農村與國家的中介，協助國家政策在農村實施。其次，地方幹部利用對經濟資源的集中控制，更有效的打擊傳統農村勢力及農村中自發的資本主義活動等。第三，利用全民皆兵的策略，大大發展了地方的武裝力量，使中央政府能更有效的平定任何動亂及進行對外戰爭。

（3）拉近貧富差距，逐步消滅城鄉及工農的差別

隨著經濟的發展及供給制逐步增加，縮短了社員間生活水平的差距，並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此外，由於農村工業化的逐步實現及教育知識的普及，將有利於逐漸縮小工農及城鄉的差距。

第三節 人民公社出現的問題

由於人民公社推行過急，而它亦是在大躍進時充滿浮誇風氣的情況下搞出來的，故此產生了不少問題，終於爆發了三年的經濟災難：

一 平均主義大大打擊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基於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批評及部份供給制的推行，使社員個人的生產活動與其收入，無太大的直接關係，這樣就造成各生產隊之間及個人之間的收入沒有明顯的差別，既然農民在分配方面不是多勞多得，他們便失去對工作的積極性。此外，公社化開始時，即否認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集體所有制，要農民們將過往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切公共財產及社員以往准許擁有的生產資料全部歸公，實行貧富拉平。

在這裡可以清楚看到雖然中國政府提出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筆者按：即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及生產隊），然而，實際上公社和生產大隊只是空架子，要發展公社和生產大隊的經濟，客觀上必須調用生產隊的財產，這樣就必然侵犯生產隊的利益。此外，公社和生產大隊幹部人數眾多，他們只負責管理，脫離生產，要養活這些幹部必然會加重農民的負擔，以上的情況遭受農民強烈的反抗，他們的具體反映有如下幾點：

(1) 平調後果

人民公社造成嚴重的平均主義，社員的個人財產都統一收歸公社所有，政府和公社還經常無償地調用生產隊的土地、物資和勞動力，使農民驚恐不安。為避免自己的財產被政府沒收後一無所有，農民紛紛殺豬宰牛、砍樹伐木，預先消費，造成生產力的很大破壞，給農業生產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平」、「調」的對象，不僅僅是土地、糧食、物資等生產和生活資料，還有更重要的勞動力。

人民公社的「公」和「平」、「調」，還表現在侵犯農民利益。不但自留地、牲畜、樹木、房屋，有的地方連阿貓阿狗、鍋碗瓢勺也被無償「調」到公共食堂，共了產。（註六）下面是廣東省一些社員在寫往海外的信件中表露出的不滿：

「隨著人民公社的建立……，所有的房屋、家具都變成政府的財產。公社可以為所欲為……」

「你知道嗎？縫紉機必須歸人民公社公有……，我已經同五爺、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了，最後我們決定盡快地把縫紉機賣掉，但縫紉機的價格太低了，因為賣縫紉機的人太多了。」

由於對「共產風」的不滿，許多地方出現了糧食的瞞產私分問題。例如，廣東虎門人民公社虎門寨生產隊，在合作社時期是比較富裕的，但自從併入人民公社以後，人們的家庭收入下降，出現了隱瞞糧食、資金和副食品的問題。徐聞縣在反瞞糧運動中，揭露出三萬八千噸糧食，總共約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層幹部受到了批評。又如山東省的全國勞動模範呂鴻賓的公社，開條子到生產隊調東西調不動，讓許多人帶秤去秤糧食，翻箱倒柜，進而進行神經戰。(註七)

(2) 消極怠耕

既然人民公社破壞了多勞多得的原則，農民也知道縱使收成再多，對自己也無益處，在這情況下，勞動進度很快就慢下來。在山區的窮隊社員鬆弛下來，是因為他們感到現在有更多的機會依賴富隊了，所以在秋收時，農民還杯葛割稻和搬運，任由農作物腐爛。共產黨的機關刊物「紅旗」也承認這點，許多農民在公社化後，「認為既然不記工分了，因而勞動就可以『磨洋工』了，他們說：『公社活，慢慢磨，磨到響午吃蒸饅。』」有的農民為抗拒工作，實行裝病，他們千方百計從醫生手搞來一張病假單，使他們不需勞動。

(3) 浪費物資

由於農民對生產不滿，也使他們對公社周圍的事物漠不關心，例如在黑龍江雙城縣，即有大批糧食散堆地上，任由蟲咬，而各地公社糧庫保管工作也普遍呈現混亂。五八年十二月《大公報》指出：「河南省實行公社化後，對糧、棉、煙、麻等的收打、採摘、調運、入庫等方面，丟失現象極普遍，甚至有十幾包棉丟在大路上，四五天沒人過問現象。」此外，中國農田的肥料，數千年以來都是靠人糞與豬糞的積蓄，公社運動

後，農民也故意不將大小便遺在公地上，造成農業肥料不足。

二 權力過份集中，命令主義泛濫，使生產大受影響

公社在作出重要決策時，往往是由黨委第一書記說了算，破壞由黨委集體決定的原則。由於四九年以來一連串建設的成功，使地方領導人頭腦發熱，只向上頭反映有利的事情而將缺點隱瞞，他們習慣了捉摸領導人心理，投其所好，不說真話，為了放更高的「衛星」及超額完成上頭交給他們的生產指標，有時竟採取強迫命令的手段，毆打不能完成任務、出工遲到及有微言的農民，更有些地方高幹不照顧婦女生理的狀況，「致使不少婦女發生子宮下垂和停經的疾病。」(註八)

公社化的大規模生產雖然可發揮「規模經濟」的優點，但由於當時公社的規模過大，又沒有足夠的專門管理及會計人才，故使管理事務難以進行。此外，由於爭水源或其他利益之衝突，有些村落根本是世仇，而在併社運動中卻硬要把他們拉起來共同合作，這也產生很大的矛盾。

在權力集中、管理不善及好高騖遠的虛誇風氣影響下，很多決策嚴重違反農民利益，並造成經濟災難。例如幹部為完成龐大基本建設的任務，往往強迫農民作長時間勞動，公社的幹部違反規定，任意動用生產大隊及生產隊的資產，作無償的使用，侵犯了三級所有制，使公社中的平均主義更加嚴重。為了擴大生產，某些基層幹部不惜命令農民毀森林、砍樹木，並罔顧農業的輪種與交植辦法，而在一地不斷的種植，引致土壤瘦瘠。

三 限制商品流通，打擊城鄉經濟交流

人民公社是個組織龐大的單位，生產和消費可以在社內直接進行分配，因而商品生產和流通的範圍大大縮少，隨著私有制及家庭副業被公社取代，商品交換的數量也大為降低，令農村自由集市(自由市場)在農村經濟中所發揮的集散貿易作用日趨削弱，城鄉的經濟交流也因而減少，造成商業市場物資供應十分緊張，繼而影響城市工人的生活。當時

很多工人因副食品顯著減少而營養不良，他們要求「勞逸結合」，從各種途徑申請病假，即使是照常上班的工人也開始怠工，而導致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的影響。

四 公共食堂引起社員的不滿

由於各地普遍虛報大豐收，再加上大辦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有些地方幹部竟號召群眾「放開肚皮吃」，再加上公共食堂對吃飯的需求也較難估計，燒多了飯便會造成浪費。照原本構思，舉辦公共食堂是希望能解放被束縛於家務之上的婦女勞動力，發動她們進行經濟建設以解放人手不足現象，然而公共食堂在實際上佔用了大量勞動力，使公社得不償失。

從社員的角度來說，他們對公共食堂也有很多意見：

(1) 社員吃得不夠標準

由於每人的需要不同，有些社員在食堂吃完飯後，回家又要再煮飯，引致人力、物力很大的浪費；

(2) 對社員不方便

有些社員分散居住在山區，要長途跋涉到公共食堂吃飯，一來一回往往需要很多時間，很不方便。在打風落雨的情況時問題就更嚴重，食堂內人口太擠迫，有些社員被迫拿著碗筷在外面吃飯，使吃飯更加困難；

(3) 社員不能自己掌握糧食

在以往糧食分給個人，由他們自己負責調劑，社員也可以把糧食節約下來，用來餵雞、鴨或豬等。由於農民各有各使用糧食的習慣，分散消費可能更節省。

基於人民公社出現上述的問題，使到糧食大幅度減產，然而在浮誇風氣及高估產量的影響下，國家的糧食征購量竟從五八年上半年的九百

六十億斤增到一千一百多億斤，增長多達百份之二十以上，使農民更百上加斤，一些地方農民開始逃荒，很多人患上因營養不足的浮腫及肝炎等病，而不正常死亡的問題也大量發生。全國饑荒情況最嚴重的是河南、安徽及甘肅等省份，很多農民餓死，另外有很多人逃到其他城鎮討飯，有些地方差不多整個生產隊的隊員全部餓死，而沒死的人也沒有氣力去埋葬死者，讓屍體暴露在田野。農村的災難使軍隊的情緒也受影響，士兵從家庭來信、家屬來訪及回鄉探親的機會了解到農村的慘況，有些士兵曾批評「現在老百姓吃的連狗都不如。」「好點心，好糖農村就沒有，家裡有病人還要吃山藥乾。」「我討厭公社不讓社員休息……公社化後，我家每天吃十二兩糧食，肉都買不到，勞動強度增加了，村幹部打人、罵人和舊社會一樣。」(註九)這些問題均引起軍隊們思想波動，情緒不穩及工作鬆懈。

註 釋

- 註一 叢進《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45頁
- 註二 呂廷煜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艱難探索》(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紅旗出版社，第122-123頁
- 註三 同註一，第159頁
- 註四 同註二，第91頁
- 註五 同註二，第94頁
- 註六 同註二，第100頁
- 註七 同註二，第102頁
- 註八 《彭德懷自述》第274頁
- 註九 〈關於中央警衛團思想情況的報告〉引自《彭德懷問題專題》丁望編，明報月刊社出版，一九九六年，第457-458頁

第二十章 彭德懷廬山上書與「反右傾」運動

第一節 大躍進後中國面對的經濟困境

五八年的全面大躍進打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農村組織過急的公有化，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力受到很大損害。總的來說，全國經濟出現了如下的問題：

一 農產品發展速度放緩

由於農村中抽調大批人手大辦鋼鐵，使五八年的農村勞動力比上年減少了三千八百萬人。在去除高估產量及浮誇風氣所做成的大量虛假數字後，發覺農產品只比上年增長了百份之二點四，而生豬的頭數更比上年減少了百份之五點二。

二月廿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市場情況和輕工業生產問題的報告〉，承認五八年冬季以來，市場副食物嚴重不足，糧食全年庫存比去年減少五十億斤。在食油方面，許多城市只能供應幾天或十幾天。(註一)五月廿八日，中共中央再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一些大工業城市調入的糧食不夠銷售，庫存幾乎被挖空，假若不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這些城市就有脫銷的危險，糧食調運的情況萬分危急。(註二)

二 基本建設規模及積累率急劇上升

五八年國家用於基本建設的投資比上年增加了百份之八十七，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比上年增加了五百九十多個，在「農業過了關，工業怎麼辦」的幻想指導下，動員了七千萬人上山，二千萬人進城，大搞基本建設。當時政府的財政資金不足，只好動用企業用來應付日常運作的流動資金及擴大銀行貸款來進行基建，由於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及失去控制，遂使積累率從上年的百分之二十四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嚴重影響資金流

向消費品的生產及工資的提高，阻礙市民改善生活。

三 在基本建設中，過份突出重工業的發展

當時由於確定了以鋼為綱的建設方針，希望迅速加快鋼鐵生產，希望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帶動各產業興旺，結果卻由於把大量投資集中在鋼鐵工業和重工業，擠掉了農業和輕工業，使國民經濟不僅沒有長足發展，反而發生了嚴重的農、輕、重比例失調。

總的來說，「大躍進」、「大煉鋼鐵」、「公社化」的後果十分嚴重，因為經濟崩潰，不少農村和城市陷入破產，全國供應緊張，日用品如火柴、紙煙之類，都告匱乏，米糧和副食品則更為短缺，有錢也買不到。很多人皆患了由於營養不足而發生的浮腫病。至一九五八年底，已是哀鴻遍野，一九五九年春，情況更趨嚴重，農村餓死人的事情已不斷發生，農民離鄉別井逃避饑荒的情況十分普遍。

第二節 中共第一次糾左（五八年十月——五九年七月）

一 毛澤東組織人員分析大躍進

毛澤東早於五八年十月，即大躍進進行了兩個月的時候，便對由大躍進引發的經濟困境作出反思，更迅速組織工作人員微服出巡，了解經濟實況。可以說，毛是最早提出要糾正大躍進的左傾路線的領導人。據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之回憶，毛澤東曾為大躍進引發的問題作個人解釋，指出他這段時間把很多精力放在處理國際及台灣問題上：

「毛澤東說，中國今年（指五八年）出了兩件大事，一是大躍進，二是公社化。其實還有第三件大事，就是炮打金門。他說，大躍進是他發動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這兩件大事到八月的北戴河會議時達到高潮，但那時他的心思並沒全花在這兩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國際問題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魯曉夫大吵了一頓（赫魯曉夫七月底到八月初訪

華），不久又炮打金門。」「毛主席說，他在這段時間想了許多國際問題……如戴高樂上台、黎巴嫩事件、緊張局勢、封鎖禁運等等。」（註三）

毛澤東進而批評大躍進的錯誤：「現在看，人們的頭腦發熱，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註四）故他發動其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全國各地了解情況，更再三叮囑他們要重視調查的方法，以保證能了解真實情況，不要單單聽取幹部的匯報，毛澤東提出：

「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只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幹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找群眾談話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幹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註五）

吳冷西進而回憶道：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接觸到的幹部和群眾，生產熱情很高……十分感人。但……由於大辦鋼鐵，地裡的庄稼沒人收，只見低年級的小學生在拾谷穗。地裡的棉花大部分沒摘下來……據財貿幹部對我們說，本該收籽棉900萬斤，到十月底只收到159萬斤。敞開肚皮吃公共食堂當然大家高興，許多人都說一生也沒有像這兩個月吃這樣飽的飯。但好幾位老人都在發愁，說『這樣吃法長不了』。……我們調查了一個公社……實行房屋公有，搞集體宿舍，……社員男女老幼分開……大多數社員意見很大，只有少數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願意分居。」（註六）

二 中共第一次糾左的具體內容

為解決上述經濟困難，中共中央於五八年底至五九年七月期間於鄭州、武昌及上海等地舉行一連串會議，並通過多項決議，在肯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對一些農村和經濟建設中所出現的問題作出調整。於五八年底，由中央領導的幹部和省、市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武昌會議中，更決定不再提名毛澤東作為下屆國家主席的候選人，總的來

說，當時調整經濟的工作包括下列幾個方面：

(1) 對人民公社制度的調整

毛澤東曾指出在公社成立後刮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註七) 即無償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毛澤東批評在一些公社內，幹部盲目尋求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勞動成果，而罔顧多勞多得的原則。公社或大隊幹部對其管轄下之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賠償的上調及運用，侵犯了生產隊擁有其自己財產的權利，使農民產生嚴重的抗拒情緒。在地方銀行方面，也把很多曾發放給農村但還沒到期的貸款一律收回。這種「一平、二調、三收款」的政策使農村引起很大的恐慌。(註八) 對此，黨中央有如下決定：

1. 制止無償佔用富隊的財產

基於平均主義泛濫及個人與生產隊的財產被無償上調，農民普遍存在著「瞞產私分」，企圖避過上級幹部的搜刮。毛澤東在經過對洛陽、許昌、信陽及新鄉等地的調查後指出：「我相當支持（農民）瞞產私分，除了貪污以外，是正當權利。」毛澤東並指出一些幹部將富隊的財產毫無補償的調到窮隊，從而將富隊窮隊的貧富拉平是毫無道理的，這根本上是破壞了生產隊的所有制，「是掠奪，是搶劫」。(註九)

既然是劫財而非善財，故此，共產黨改變了「舊帳一般不算」的指示，命令凡是無償平調的東西一定要簽定單據。毛更指出：「包括桌椅板凳都要打借條，十年償還。」(註十) 並強調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此外，再次肯定了生產隊的所有制，決定生產隊對土地、耕畜、農具和勞動力有固定的使用權，公社和生產大隊不能再調用。

2. 保障農民個人財物

為緩和農民的不滿，黨中央批評一些公社把社員的私有財產歸公的做法，並宣佈社員個人所擁有的生活資料如房屋、衣被、家具及在銀行的存款等，在實行公社化後，仍歸社員永遠擁有。五九年五、六月間，

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三個指示，決定恢復私人佔有的自留地制度，允許社員私人餵養家禽家畜，宣佈屋前屋後的零星樹木歸社員私有。中央明確指出：「這種大集體當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允許這種私有，實際上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並不是發展『資本主義』」。（註十一）

3. 容許多勞多得的分配制度，以調動積極性

針對分配方面搞供給制的現象，中央指出在公社社員的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期內仍須佔重要及主導的地位。基於每個人生產和勞動情況有所差異，中央認為人民的收入也應有所差別，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

中央這個提法實際就是否定在大躍進初期所大力鼓吹的「吃飯不要錢」、「按需分配」的「供給制」的共產主義原則。此外，中央亦提出公社需保證農民應有一定休息時間，來糾正過份勞動的流弊。每天給予社員八小時睡眠，公共食堂亦應整頓，毛澤東曾指出：

「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採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延安時期的供給制，是屬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後就改行工資制了。」（註十二）

基於中國的實際情況，毛允許社員在家自己做飯，以緩和農民在膳食方面的不滿。至於集體住宿，毛澤東很生氣地說：

「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幹部頭腦發昏了。怎麼共產黨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為好。」（註十三）

4. 肯定商品生產和貨幣的作用

針對企圖取消商品生產和貨幣作用而對公社產品實行無償調撥的主

張，黨中央指出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人民公社的生產，與國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間的商品交換，仍須有更大的發展，直接否定了無償調撥的主張。

(2) 削減基本建設，保證生產的需要

就調整大躍進期間經濟發展過速問題，陳雲受黨中央委托，領導中央財經小組，於五九年五月建議將鋼鐵指標下調。他指出：「為著退到可靠的陣地、站穩以後再前進，我們的生產和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地進行有計劃的安排。同時要使廣大幹部和群眾懂得，站穩以後的前進是踏實的前進，不致因此而泄氣」。(註十四)毛澤東亦針對農業生產的浮誇風及不講真話的問題，向全國各級幹部發出通令，提醒他們不要高估產量，不要過份密植，要抓緊節約糧食、擴大播種面積及講真話等問題。他指出：

「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對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註十五)

為保證生產，陳雲在這段期間曾作出多項建議：

1. 基建項目的安排

陳雲指出，基本建設項目的施工次序，應全面安排，保證重點。在注重速度同時，須強調質素，這樣才能使各個經濟部門能協調地、按比例地發展，而不致過份突出某部門而使整個經濟的發展脫節。(註十六)

2. 調整工業佈局及興辦中小型企業

由於建設力量有限，不能一下子便在各省內建立完整無缺、萬事不求人的獨立工業體系，而只能首先從全國範圍開始，量力而為的建設重點企業，然後才是一些有條件的省和自治區。在企業分佈上，不能把企

業集中地建設在大中城市，而應該把多數企業分散在中小城鎮或者有礦產資源的地方。在企業的規模上，不應集中興建大型企業，而應該興辦中小型企業。在技術方面，應該是設計和建設機械化程度比較低、設備不那麼先進的企業。(註十七)

3. 滿足市場的需要

陳雲提出應撥出一部份原料、材料和運輸力量，以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產。此外，並組織十億元的豬、雞、鴨、魚和蛋類，供應市場。畜牧方面，國營、集體、個人三種形式均可同時發展，而家禽由農戶分散餵養是最可靠及收效最快的辦法。(註十八)

(3) 緊縮社會購買力

五八年以來，由於基建增加，職工人數不斷擴大，使社會上整體購買力增加過多，造成供不應求，市場緊張。中央決定除了努力發展工農業生產及增加商品供應外，還必須大力壓縮社會購買力，主要工作有：

1. 節約公共開支八億元，暫停撥發機關、部隊、企業事業單位的辦公雜支、器具購置等方面的經費；
2. 控制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要把縣以上企業職工人數在五九年內減少八百至一千萬人，從而減少工資支出十五億到十八億元。
3. 按國家計劃，嚴格控制農村貨幣投放。各地農業貸款指標，一律不再增加。
4. 勸員城鄉居民積極參加儲蓄，以減少社會上的購買力。

總括而言，中央上述的措施，對解決人民公社及經濟計劃指標過高的「左」傾錯誤，有一定的幫助，更使很多人面對現實，開始冷靜地思考問題，初步緩和了緊張的形勢。

三 第一次糾左的局限

不過，這些對「左」傾錯誤的糾正，只是在充份肯定大躍進的前提下

的一些技術性調整，糾正的目的是希望在更鞏固的基礎上進行更大的躍進。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說：

「壓縮空氣已有兩個月……還要鼓足幹勁，總路線不能改，還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十一月、十二月壓縮空氣，群眾也要休息休息，鬆一點不足為奇、再鼓幹勁。」(註十九)

基於此，毛澤東一面批評人頭腦太熱，一面又在指導思想上繼續反右，批評有些人愛冷不愛熱，是「觀潮派，算帳派」。黨內不少人也附和毛澤東的思想，指責降低指標是「右傾保守主義」，為保護這些幹部和群眾「左傾」的幹勁，毛澤東更規定不准公開反冒進，這樣就使中央陷入一個兩難的困境當中。

這裡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就是很多地方領導支持大幹快上的觀點，反而勸喻毛澤東不要降低躍進的速度，吳冷西指出毛澤東曾設想把「鋼產量的指標從3000萬噸減為1800萬噸。他原想說服他們，結果反而是各組長力圖說服毛主席維持原來的指標。毛主席說，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根據。」

毛主席還說：「中央已有十二個部長寫了報告，指示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一九五九年要修二萬公里鐵路。周總理主持制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五年內才修二萬公里，他誇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麼完成得了呢……大家頭腦還是發熱。」(註二十)

出現上述情況，除了地方幹部的過份樂觀情緒及希望迅速改變中國貧困面貌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親身感受到周恩來、陳雲等人在五七年「反冒進」後遭毛澤東大力批判的慘淡收場，既然毛澤東仍執意推行高速度的發展策略，在寧「左」勿右的考慮下，幹部自然提倡比毛澤東更冒進的發展指標。

第三節 廬山會議及對彭德懷的批判

一 彭德懷、周小舟等對大躍進的反思

彭德懷元帥是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及國防部長，在國內的聲望十分高，他也是唯一一位被毛澤東作詩讚許的將領。在韓戰時，中央政府派他率領志願軍赴韓協助對美戰爭，而與美國這個超級軍事大國打了個平手。在大躍進期間，彭德懷曾多次到西北及湖南等地區視察，發覺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為了煉鋼，他故鄉湖南家裡人把鍋都砸爛了，使到煮飯十分不便。他還發現當時很多地方幹部在上報糧食產量時故意誇大，瞞騙上級以爭取信任，例如在平江縣時，他發覺當地官員有意識地將五七與五八兩年度的生產數字顛倒公佈，將五七年高產數字公佈為五八年的生產數字，而將五八年較低的數字公佈為五七年的。更有些幹部，為完成上一級交給他的層層加碼的生產指標，竟採取毆打及強迫命令的手段，使打人情況成了風氣，這一切皆使彭德懷十分反感。更使他感到難受的是在大躍進期間，農村抽調了過多精壯勞動力前往煉鋼，導致農忙時農村勞動力不足，而需動用婦孺收割，造成農產品很大的浪費，可是基層幹部還仍在吹牛，宣傳糧食怎樣的高產，使上頭向農村徵收更多農產品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令到出現大饑荒。在湖南視察時，彭德懷給當地幹部規定了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揮，不准浮誇，不准說假話，不准搞強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罰口糧，不准拆社員房屋，不准毀風景林。

曾有一篇紀實性的報導形象地描述彭德懷進行農村調查的情況：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彭老總……回到離別三十年的故鄉。……一個大隊幹部興衝衝地向彭老總報喜……彭老總皺緊眉頭，打量一下周圍的群眾，問大家：『想不到家鄉的產量翻了幾番。真有畝產三千斤的衛星嗎？』大家哄然大笑，不置可否。彭老總對著那隊幹部嚴厲地說：『你莫瞎吹了，剛才我到田裡看過了，你們的禾苗插的板板寸，一兜禾只有姆指粗，能打三千斤？有三百斤谷就不錯了！』」

「下午，彭老總來到大隊煉鐵廠。煉鐵爐前，擺了一堆砸爛了的爐鍋、甕罐……這是從各家各戶強徵來的……而煉出來的，卻是一堆沒甚麼用途的鐵疙瘩……彭老總壓抑著自己的感情，耐心地對廠負責人說：『照這種辦法練鐵，用俗語說，是黃瓜打鑼——丟了一長串，用文雅的話說，是得不償失！』」(註二十一)

另一位與彭德懷有同樣意見的是黨中央候補委員、湖南省黨委第一書記、湖南省副省長周小舟。作為一位地方幹部，他對大躍進期間所發生的問題有更深厚的認識，對於大煉鋼問題，周小舟曾邀請一些工程師給予意見，了解到土爐煉鋼經濟效果十分差，煉出來的鋼也不適用。對於人民公社，周小舟強調規模不能過大，以公共食堂為象徵的「供給制」不能搞得過多，對於公共食堂，他曾提出三個處理辦法：一、群眾願意，辦得好的，可續辦下去，現有的少數大食堂，必須堅決分小；二、群眾願意回家做飯，聽其自願；三、一般地提倡農忙食堂及工地食堂，避免農民長途跋涉的回食堂吃飯。(註二十二)在五九年五月於湖南省委會議中，周小舟談到農民心態時指出：

「去年一年變得厲害，影響人心極大。現在，老百姓也好，幹部也好，總希望有個准。群眾說『一年有收我拚命幹，幾年有收我絕不幹。』這都是人心不安定的說明。」(註二十三)

基於對實際情況的認識，周小舟決定把群眾的意見，如實的向黨中央及毛澤東反映。

二 廬山會議及彭德懷的萬言書

(1)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發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為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黨中央於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除政治局成員及部分中央領導人外，還邀請了各省委第一書記參加。會議計劃於七月二日至十五日總結經濟建設經驗教訓，並討論下半年及以後四年的經濟任務。

七月三日至十日上午，會議分組討論，總結經濟教訓，彭德懷參加了西北組，並作了多次發言，（註二十四）他提出：

1. 毛澤東家鄉的公社，實際增產量並不是如他們上報的那麼高，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
2. 因黨的威信提高，群眾信任，無產階級專政後便易犯官僚主義；
3. 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解放以來一連串的勝利，造成群眾頭腦發熱，向毛澤東及黨中央只反映可能和有利的因素，而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面的東西，故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
4. 現在要注意基層組織的民主問題，現在不是黨委的集體決定，而是第一書記說了算，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十分危險的。
5. 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剛發揮，還沒充份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未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2）彭德懷上書予毛澤東

七月十日，毛澤東在組長會議上講話，批評黨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評黨內有些幹部說大躍進得不償失，毛說從全局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算總帳不能說得不償失。而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出現的問題，經已逐步解決了，他還一再提出堅持農村公共食堂和社員分配中的部份供給制，在工農業生產指標上，他仍期望較高的指標。由於毛澤東的影響和看法，故此，很多高級幹部皆不願多談缺點和教訓，不能虛心傾聽對大躍進比較確切的批評。

彭德懷看到這種情況，又聽說會議初步安排到七月十五號終結，耽心會議匆忙結束，他鑒於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調，對是否能克服「左」的錯誤十分憂慮。他原本決定於七月十三日早上向毛澤東反映意見，但由於毛澤東剛睡著，而彭德懷亦要出席西北小組的會議，故此於十三日晚飯後，彭德懷起草了一封信給毛澤東，十四日清晨呈交，這封

信在肯定大躍進的前提下，分析了一九五八年以來左傾錯誤產生的原因，並提出改進的建議。

彭德懷的信分為兩部份。第一部分是肯定五八年的成績，他並舉出工農業生產增長的統計數字，認為公社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困難，經過一系列會議後，已基本解決。在談到大躍進時，彭德懷指出五八年的基建規模過大過急進，導致分散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需項目，而五九年不僅沒控制而繼續躍進。此外，還有一些生產物資特別短缺，以致生產不能成套，這些不平衡的現象若得不到調整，將使生產出現很大的困難。至於全民煉鋼，雖然多辦了一些小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無疑是筆較大的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中規模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付出了這筆學費，也是「有失有得」的。信中的第二部份是強調「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彭指出「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彭更指出在過去一段時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出現了兩個問題：

1. 浮誇風氣普遍增長

彭德懷指出浮誇風吹遍各地區和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使各級幹部腦子發熱起來，在糧棉高產的假象下，覺得可以騰出資源來搞工業，但對鋼鐵工業的認識上，卻有嚴重的片面性，使鋪張浪費的現象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顧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

2. 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彭德懷批評有些幹部為大躍進的成績及群眾運動的熱情迷惑，總想一步達到共產主義，他們不注意當前實際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穩妥基礎之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十幾年才能

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幾個月就要做到的目標，有些技術不經鑒定貿然推廣，經濟及科學法則被輕易否定。

三 黨內高幹支持彭德懷的意見與毛澤東的反擊

(1) 部分高幹發言支持彭德懷

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與全體幹部，並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當時，彭德懷感到問題嚴重，以倉促成書沒經深入考慮為理由要求收回自己的信件，然而卻未果。接著，會議便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在小組發言中，意見分歧比較大，有些人贊同信中的看法，有些人基本贊同，但對某些提法不贊同，也有部分人認為彭的信在總體的估計上是錯誤的。七月十七日認同彭德懷的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發言，認為公社制度是優越的，但「去年搞好還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從長遠說搞了好，從短期說，不搞更主動些。」(註二十五)

七月十九日，周小舟發言強調「廬山會議是高級幹部會議，所以在肯定成績之後，應該著重總結經驗。」他並表示贊同彭德懷信的總精神。七月二十一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長篇發言，系統地闡述了他對大躍進的觀點，並明確支持彭信中的觀點。他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缺點是嚴重的，第一是「指標太高，求成太急，比例失調，造成很大損失。」第二是「共產風，一平二調」，造成損失相當大，並打擊了黨於人民心中的威信。最後，張聞天指出：

「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提出了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註二十六)

(2) 毛澤東對彭德懷的猛烈批判

然而，整個形勢急轉直下。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講話，發動了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註二十七)，毛澤東指出黨內外的右派在夾攻我們，我們一定要硬著頭皮頂住。他批評有些同志在大風大浪中是

不堅定，站不穩，現在又表現出資產階級動搖性及悲觀性。他們不是右派，但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跟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里，十分危險。毛澤東並對彭德懷信中所講的「比例失調」、「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有失有得」等，逐一批判，他指出：「比如說『有失有得』，『得』放在後面是經過斟酌的了。」更嚴重的，是毛澤東竟然提出了解放軍跟誰走的問題：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

當時，由於毛澤東在全黨內享有崇高威望，故在毛澤東講話以後，會議氣氛驟然緊張起來，在對彭德懷信的評價上，即時形成一邊倒的意見，集中批判彭德懷等的「右傾」。

八月二日至十六日，黨中央繼續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毛澤東再度批評彭德懷希望造成緊張形勢，攻擊總路線，他說：「我們反了九個月『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一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從八月三日至十日，全會繼續舉行小組會議，批判彭德懷，並要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交代他們在廬山會議上彼此的交往和談話，更羅列他們幾十年在黨內歷史鬥爭的缺點錯誤，逐條進行批判，會議更指出他們四人在搞「軍事俱樂部」。八月十六日，毛澤東又在一個批示中說：

「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註二十八)

四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中從糾左轉變為反右的原因

在廬山會議前，毛針對大躍進所造成經濟災難的情況，從戰略方面調整大躍進的步伐，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以便將來更快速的推行躍進

路線。故此，毛澤東從來沒有公開否定大躍進的意義，然而在廬山會議上，手握軍權的彭德懷高姿態的批評大躍進，並得到不少實力人物的呼應，如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等，而張聞天的長篇發言，更促使毛澤東立下整肅彭德懷的決心。張聞天發言的記錄，全文八千多字，而成績只有二百七十餘字；用了三十九個『但』字，十三個『比例失調』，十二個『生產緊張』，一百零八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多』一大批『太』字。(註二十九)

明眼人看來，張聞天等根本就是否定大躍進運動，他之所以不明目張膽的提出，只是為毛澤東留面子而已。毛澤東基於黨內出現根本否定大躍進這群眾運動的觀點，若他不及時加以抑制，否定大躍進的呼聲肯定會星火燎原，這對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堅持要保護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熱情的毛澤東是絕不能容忍的。

五 中共中央批判彭德懷的決議

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說彭德懷等於廬山會議的意見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政的綱領」，是「向黨的總路線、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進行猖狂進攻」，「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全會決定將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基於毛澤東的權威，批判彭德懷的決議被順利通過，然而後來文革時揭露的資料指出，在批判彭德懷時，鄧少平以有病為理由離席，而劉少奇則保持沉默，在事件中保持低調。

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中央軍委會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繼續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同時外事部也召開外事工作會議，揭發彭德懷和張聞天的裡通外國(蘇聯)問題。當時彭德懷在整個被批判的過程中，採取了「要甚麼就給甚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

討。」(註三十)而周小舟在面對重重壓力時再次給毛澤東寫信，信中內容誠懇，感人至深，信中寫道：

「從當前反彭總反右鬥爭總形勢來看，勢有必然，而解剖我自己，披肝瀝膽，又感覺與實際情況確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這兩頂帽子，我對主席、中央、全黨、湖南黨員和人民、甚至對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須說明我犯了反黨、反中央、反主席、反總路線，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兩條錯誤。然而再說下去，勢必淚潸潸下，不盡欲言。」(註三十一)

雖然彭德懷對扣上他頭上的帽子皆逆來順受，但對於指責他搞「軍事俱樂部」的罪名，始終不肯承認。當時逼供現象十分嚴重，只要他不供出「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和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在軍委擴大會議作檢討時，有些人大呼「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這些話逼得彭德懷氣極了，便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罷！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罷！」

六 廬山會議的影響

廬山會議這黨內鬥爭，對中國的政治及經濟皆產生了嚴重不良的後果：

- (1) 違反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嚴重破壞了黨內的民主生活，並助長了毛澤東個人崇拜及獨裁的發展

彭德懷作為黨的其中一位領袖，在廬山會議檢討大躍進得失時發表自己的意見是理所當然，從他在會議前期西北小組發言中，可知道他是光明正大，公開自己的觀點，並無搞甚麼組織和陰謀詭計。此外，作為毛澤東三十年的戰友，在私底下寫一封信予毛澤東也是更正常的事，就算毛澤東不同意彭信觀點，在情在理，也應找彭談一談，當面說清楚不同意見的原因，而不要搞甚麼反右運動，導致黨內形勢緊張，破壞團結活躍的準則。

(2) 將黨內分歧意識形態化，無限擴大

毛澤東錯誤地將一些意見上的觀點分歧無限擴大，說成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死鬥爭，更把黨內的矛盾輕率地、無根據地與國際上的鬥爭聯在一起。彭德懷被指責為親蘇，把問題變得極其複雜化和嚴重化，使中共黨內意識形態推向更左的方向發展，最終引致文化大革命。

(3) 影響糾左努力，延長經濟危機

這場鬥爭中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使「左」傾錯誤延續了更長的時間，使經濟發展大受影響，把人民推進饑餓及死亡的深淵。

第四節 全國反右傾鬥爭的開展與經濟進一步失調

一 中央開展反右傾運動

在批判彭德懷期間，為了進一步在全黨範圍內進行反右鬥爭，各地方政府紛紛召開緊急會議，部署自己內部的鬥爭工作。八月七日，廬山會議仍在進行中，中共中央就向全黨發出〈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這種「右傾思想」正在「動搖軍心，瓦解士氣」，「妨礙人民公社的鞏固和順利發展，妨礙建設事業的躍進。」並要求立即在各級黨組織中，加以檢查和克服。當時，毛澤東曾批准了幾個由地方呈交中央的報告，他在介紹江西省反右傾經驗材料上批示：「開頭一陣烏雲，結果一片晴天」；在討論到湖南省談嶺公社關於重辦公共食堂時指出，「不應當在困難面前低頭」，「某些食堂可以一風吹掉，但總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辦起來」；在遼寧省的報告上批示：「遼寧做得很快，步驟也好，成效顯著。他們取得了主動權，迫使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處於被動。這個經驗值得各地注意。並要求各地按照具體情況，加以分析，把這股歪風邪氣打下去。」

八月廿四日，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人民公社、工廠、礦山、交

通、貿易等企業及國家機關都應舉行群眾大會，反右傾、鼓幹勁，並討論如何提前和超額完成本單位今年生產計劃的任務。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又陸續發表評論，強調要「反右傾、鼓幹勁」。由於中央不斷批發文件、推廣經驗，加緊各地反右傾鬥爭的開展，從五九年十月底，各機關逐步進入「反右傾」整風運動，農村也開展了整社整黨，使反右鬥爭達到高潮。據有關資料顯示，安徽、甘肅、湖南、貴州及福建等省、市都有一些主要負責幹部被批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撤銷了領導職務。此外，還有相當多的縣、公社及幹部和基層幹部受到打擊。後來中央有個文件規定，要把農村重點批判的人數控制在全縣農村人口總數百分之一以下，更可反證當時的鬥爭面相當廣泛。

二 繼續躍進，並重提平均主義

在「反右傾，鼓幹勁，繼續大躍進」的口號下，一些原先確定縮減的建設項目重新開始，黨內還批評五九年上半年因調整過高指標而出現的生產正常下降為新的「馬鞍形」，並斷定「右傾機會主義」是生產躍進的「癌症」。一九五九年基建投資上升到三百四十四億元，比五八年增長了七十七億；五九年糧食實際產量為三千四百億斤，卻高估為五千四百億斤；職工人數年中一度壓縮到四千萬人，但到年底卻又上升到四千五百六十一萬人。此外，黨中央於六零年一月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論討制定的一九六零國民經濟計劃，更加脫離實際。這個計劃規定六零工農業總產值為三千零六十億元，比五九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其中工業總產值為二千一百二十億元，增長百分之二十六；農業總產值九百四十億元，增長百分之十六；鋼一千八百四十五萬噸，增長百分之三十三。

當時，黨中央更提出了五年實現趕上英國的口號和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設想，並要求全國各地於本年內大辦公共食堂。一九六零三月，黨中央在有關文件中強調公共食堂是「我們必須堅守的社會主義陣地」，「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並要求「把安排好生活和辦好食堂提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五九年底全國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總人數已佔農村人民公社總

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二。中央的指示更建議應當更大力的發展公共食堂，爭取全國農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飯，爭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更好。六零三月廿二日，中央將鞍山市委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批轉各地區及部門，中央讚揚鞍山市委在企業中加強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做法，並鼓勵全國學習「鞍鋼憲法」，以便在六零內，有領導地展開城鄉經濟技術革命。在「左」的形勢下，一些地方出現了「早過渡，早翻身」，「今年苦戰，明年過渡」的急性病。

此外，一度下降的「一平二調」又重新湧現，再次取消了自留地和准許私人飼養家禽的規定，並以發展公社一級經濟為名，無償地抽調大隊及生產隊的物資和勞動力，這種平均主義共搞了一年。到一九六零五月全國各大主要城市糧食告急，國家需採取緊急措施調運糧食，降低城市居民糧、油、棉布供應標準。在經濟情況日益惡化下，黨中央雖同時將某些生產指標進行調整，加強農業的發展，然而鋼鐵指標仍舊不變。毛澤東更強調要在「右傾機會主義」進攻面前「爭氣」，要在國際鬥爭中「爭氣」，把完成鋼鐵任務提高到國內外注目的政治問題。

三 災荒嚴重，經濟續步失調

由於一九六零年六、七月間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單方面取消了與中國簽訂的多個合同，並在世界範圍內攻擊中國，這又促使毛澤東決心要煉「爭氣鋼」、要搞實力政策，鋼的產量無法降低。於是，全國各行各業咬牙大煉「爭氣鋼」，給毛主席爭氣，給國家爭氣(註三十二)。

一九六零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指示提出，當前擺在全黨面前的緊急任務是鼓足革命幹勁，掀起一個群眾性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六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於是全國只好不顧一切地猛煉鋼鐵，雖然到了六零年，鋼的產量達到預期指標，但整個國民經濟的元氣已大傷，許多企業陷於停頓。(註三十三)

一九五八年七月，蘇聯領導人向中國提出建立海軍聯合艦隊，意圖

控制中國，但遭到拒絕。五九年六月，蘇聯更單方面毀了兩國政府於五七年十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至六零七月，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蘇聯突然知會中國，取消與中國簽訂的六百多個合同，更撤走全部在華專家一千三百多人，帶走全部設計圖紙和有關資料及停止供應中國建設急需的設備，使中國很多重大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被迫中斷，使到一些企業被迫停工，對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極大損失。此外，中國從五九年到六一年，連續發生了多宗嚴重的天然災害，大量農田受影響，使農產品生產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反右鬥爭及經濟建設進一步失誤，使農村出現嚴重災情，很多農民餓死。一九六二年更發生數以萬計廣東和新疆饑民外逃事件，成為震動中外的「五月大逃亡潮」，中國進入了四九建國以來最暗淡的日子。

註 釋

- 註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八)，紅旗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131頁
- 註二 同註一，第151頁
- 註三 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94頁
- 註四 同上註，第95頁
- 註五 同註三，第96-97頁
- 註六 同註三，第98-100頁
- 註七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285頁
- 註八 同上註，第282頁
- 註九 從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73頁
- 註十 同上註
- 註十一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
- 註十二 同註三，第102頁
- 註十三 同註三，第103頁
- 註十四 〈落實鋼鐵指示問題〉《陳雲文選》(一九五六至一九八五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120-129頁

- 註十五 同註七，第294頁
- 註十六 陳雲〈當前基本建設工作中的幾個重大問題〉《紅旗》，一九五九年第五期
- 註十七 同上註
- 註十八 同註十四，第116頁
- 註十九 同註七，第271頁
- 註二十 同註三，第107-108頁
- 註二十一 翟禹鍾等著《彭大將軍回故鄉》《中國青年》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 註二十二 《周小舟傳》，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60頁
- 註二十三 同上註，第64頁
- 註二十四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西北小組會議上的發言〉《彭德懷問題專輯》丁望編，明報月刊出版，一九七九年，第1-4頁
- 註二十五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137頁
- 註二十六 〈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480-560頁
- 註二十七 同註七，第294頁
- 註二十八 同註七，第307頁
- 註二十九 同註二十六，第157頁
- 註三十 《彭德懷自述》，第278頁
- 註三十一 同註二十二第，68-69頁
- 註三十二 呂廷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紅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9-10頁
- 註三十三 同上註

第二十一章 務實路線——經濟的大救亡

導 言

自大躍進運動於五八年下旬呈現失敗跡象時，毛澤東在五八年十二月召開的武昌會議中便不再被提名為下屆國家主席的候選人，當時毛澤東把政治局劃分為第一、二兩線，第一線專注負責實務工作，而他則退居第二線，不再過問黨中央的日常工作而集中理論研究，分析蘇聯變為「修正主義」的原因。在彭德懷事件及「反右」鬥爭後，經濟再進一步失去控制，出現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此形勢下，以劉少奇、陳雲、周恩來、鄧小平等為首的一群國家領導人，在一九六零至六五年期間採取了很多與毛澤東構思不同的經濟措施，如強調物質刺激、按勞分配、循步漸進的發展方針，挽救了六十年代初期經濟面臨崩潰的局面。這段期間（六零—六五）實行的政策通常簡稱為「務實路線」。當然，眾所周知，劉少奇等的經濟政策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徹底否定，被批判為修正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而劉少奇本人亦被批鬥至死。

第一節 五九年底、六零年初的經濟危機

六零年初，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由於「反右傾」等運動所引發的極端平均主義而再一次嚴重下降，使農業危機連年持續，再加上基建投資超過國家的財力物力，於是便發生了工業、商業、財政及通脹等危機，主要情況如下：

一 糧食及農副產品嚴重不足。

由於共產風、瞎指揮風及政府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基建事業的發展亦要求過急，因而令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由於過份樂觀估計農產品的收入，所以六零年的糧食雖然實際減產，但國家的徵購任務仍比五九年增加了六十億斤，造成國家收購了農民的口糧，農民不得不吃

牲畜的飼料，這又造成了牲畜大量減少。

雖然政府曾指中國應集中一切力量支援農業，然而農業之生產資源還是供應不足，影響春耕進行。例如廣東省委曾對從化縣春耕農具供應情況作出調查，發覺在春耕需要的十一種重要的農具中，其中有九種都是供不應求，相差很遠，在縣中更有些地方平均每三戶才有一個好的和一個壞的秧盆。良口公社甫林大隊有耕牛一百零七頭，但卻只有鐵耙八十九張，而其中三十張還要維修後才可使用。雖然耕具不足，但由於政府及公社財政皆出現赤字，使積累基金用罄，無法增加(甚至減少了)對農業的貸款，導致農民無法通過貸款購買農具，改善生產條件。

由於國家沒有充份的商品滿足城市人口的需要，故只得容許農村開辦自由市場。在一般情況下，自由市場的價格較靈活，沒有太多的限制。在物資嚴重短缺的情況下，農副產品的價格大幅上升，使城市的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使農民手中掌握了很多鈔票。雖然，經濟獲益可以誘使農民積極生產，增加供應，但由於城市提供的輕工業產品不足以換回農民手中的鈔票，使農民手裡的錢越來越多，但卻買不到相應的物資，出現了有些農民不願向國家繼續出售農副產品，使物資供應進一步下降，增加了經濟的困難。當時中國各種物資嚴重缺乏，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國營牌價和自由市場差價高達五倍至十倍。(註一)

二 基本建設規模過大、重工內部比例失調

由於大躍進期間權力下放過多，使分散主義嚴重增長，中央政府亦要求地方政府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而當時的建設規模是建立在五八年糧食產量七千億斤、棉花產量七百萬擔及農業已經過了關的基礎上，令全國的基建規模超過國家的人力、物力及財力所能負擔。由於基建規模太大，不僅擠了農業、輕工業及人民生活，而且這樣發展亦難以為繼。

此外，重工業的內部也比例失調，設備嚴重損壞，許多企業無法繼續生產，問題較大的是採掘工業和加工工業失調，燃料工業及木材工業也十分嚴重。六零年的煤產量雖然增長很大，但仍不能滿足煉鋼及發電的需要，為了保鋼、保電的發展，人民用煤逐年下降，許多工業交通企

業也被迫停產。

三 鈔票發行太多，通貨膨脹，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由於建設太多，國家多發了幾十億元鈔票。另一方面，農業、輕工業減產，使供需方面失卻平衡，市場供應緊張，城市人民的生活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很多。

由於大躍進時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加上在物資減少，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不變的工資使購買力下降，增加了城市人口的困難。根據一些典型調查，職工實際生活水平下降百份之三十，有的地方更為嚴重，餓死的人很多。

四 工業和企業管理混亂，浪費驚人，損失嚴重

在大躍進期間，過去一套管理制度被否定，使經濟效果顯著下降、成本提高、虧損增加及產品質量下降。例如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六零年比五七年下降了百份之十二，而虧損額直線上升，到六一年達到一百零五億元。在未完成的基本建設中，六零年以前停止建設及報廢的，即達一百五十億元。開灤煤礦總工程師陳甲三曾指出大躍進其中一個後果，就是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山東及山西等省之煤礦，由於掘煤過度，不注意安全，在五九年到六一年三年內共發生塌礦七十一處，而這些倒塌礦井之產煤量，佔上述各省總產煤量百分之四十以上，而情況嚴重者，非三至五年不能恢復原狀。因此，北方在六零年最嚴寒之季節中，也缺乏煤供給。

至於農村人民生活的苦況，據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等在「魚米之鄉」富春江流域進行調查時看到下述悲慘的景況：

「我們進村後……相迎的每張臉，幾乎都是兩腮塌陷，眼大無神，接著便是一陣訴苦或哀號；……他們的家裡，不僅生產資料所剩無幾……有的床上僅有一床破被甚至是一張草席……我們走訪一次，不知要流上多少眼淚。……當食堂開飯的時候，人們眼巴巴盯著的是大鍋裡的稀

粥……當調查同志們端起自己的稀粥時，一口也吃不進……在我們面前一群孩子正伸出他們的空碗，你怎麼能咽得下？……生產隊長是個老實農民，他雖然每天照例喊人，派活，但響應者寥寥無幾，因為主要勞動力，已經棄家外出，……有的另謀生路，有的出去討飯。」(註二)

據測算，中國人口總數在一九五九年是六點七二億人，一九六零年為六點六二億人，即減少了一千萬人，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九年減少了三千三百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一九六一年總人口應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二千七百萬人，兩者相加，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註三)

在死亡人數方面，城市與農村比較，農村中死亡人數更多。雖然城市中消費率的下降幅度比農村更大，但城市人均的消費絕對數量始終比農村大得多，事實也證明，雖然城市亦出現多宗浮腫病，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仍絕大部份集中在農村。(註四)

第二節 黨中央及政府對經濟危機的處理

一 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由於經濟出現嚴重危機，黨中央於一九六零年七月在北戴河召開會議，提出要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在六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寫道：

「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

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研究六一年經濟計劃時，提出要按「調整、鞏固、提高」的精神安排計劃，後來經周恩來的提議，正式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然而，當時主管經濟的幹部仍沒有貫徹執行「八字方針」，全黨的工

作反而仍在集中生產鋼鐵，盲目追求高產。同時，黨內對「八字方針」及經濟形勢的理解並不一致，糾正「大躍進、反右傾」等「左」傾錯誤仍有重大阻力，有些幹部對大躍進產生的挫折拒不認輸，還想堅持大幹快上；有的幹部認為困難並非想像般嚴重，困難已到了谷底，再往前進就是上升了；有的認為中國經濟的困難主要集中在農業，是農業拖了工業的後腿，工業基本上沒有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很多幹部恐懼怕被戴上右傾帽子，被指責為從根本上反對大躍進，他們憂慮政策多變，猶疑觀望，不敢大幅度對經濟進行調整，以上一切皆阻礙了八字方針的具體落實。

當時，十分諷刺的是各級幹部仍力求保住一九六零年計劃的高指標。(註五)一直到了六零年十二月初，中共中央還發出關於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強調「能不能完成一千八百六十萬噸鋼的生產任務，是國內外注目的大事情，是一個政治問題。」

二 中央領導人的「糾左」談話

到一九六一年一月，黨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會上決定調整國民經濟，降低高指標，停建一系列工程，大量節省財政開支，保證重要項目，改善經營管理及提高產品質量。毛澤東在會議上說，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要搞半個世紀，要搞幾年慢騰騰，不要務虛名而導致災禍。他批評「一平二調」、「共產風」是「人禍」，要求大家勇於承認錯誤，有多少錯誤說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甚麼反甚麼。這實際上等於否定了「大躍進」的方針。(註六)

然而，當時由於左的思想還控制著人們的思想，故此在建設工作上根本沒有按實際情況降低指標，而調整工作也沒有切實執行。當時，為糾正幹部中「左」的傾向，劉少奇曾多次出外視察，並發表批評三面紅旗的言論，他希望製造一種輿論氣氛，影響社會上「左」傾的風氣。六一年五月十三日劉少奇在湖南長沙市聽取潮陽縣負責幹部的匯報時指出：「有些地方元氣傷大了點，人死亡多了點，東西平調得多了點，恢復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在這些地方，應該說是一次破壞。」他並將大躍進的興築水

利比做秦始皇修長城而加以批判，「要知道秦始皇、隨煬帝是修長城垮台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還多……現在不是甚麼人興財旺的時候，死的人超過了生的人。」（註七）此外，劉少奇在巡視黑龍江和內蒙時，在黑龍江省委書記匯報會上支持當地幹部抵制三面紅旗，指出：「你們三級幹部會議上有人懷疑三面紅旗，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客觀上存在一些現象，大躍進現在有些躍退了，公社優越性不那麼明顯，減產了。」「人家發瘋狂的時候，你們沒有發瘋？當然人家發瘋你一點也不發也不可能，發一次也好，有了教訓了。」他並批評人民公社搞得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公社一級幹部亂調勞動力，把三級所有制搞亂，侵犯了生產隊的自主權。（註八）劉少奇在六一年四月於湖南之行對鄉親痛心地說：「中央有責任、要向你們承認錯誤。退賠賠清以後，立塊碑，或者寫一個大單子，用鏡框鑲起來，掛在公社裡，這個帳要記住，這次教訓很深刻，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註九）對於公共食堂，劉更指出這是中央靠威信、命令強制組織起來的，違背了大多數農民的意願，並指出「在食堂問題上我們同農民的矛盾很大，很尖銳，而農民則是忍，或用怠工消極方法抵制我們，促使我們醒覺。」

當時總書記鄧小平亦批評了各方面調整不力的狀況：

「去年北戴河會議提出八字方針，究竟怎樣貫徹，一年多了，還沒有具體化，各部、各地區計委都沒有具體安排。」他進而批評繼續保持高指標的錯誤：「去年鋼完成1840萬噸，……今年又是高指標1800多萬噸鋼。……指標定高了，大家為完成指示而奮鬥，對貫徹八字方針，填平補齊的勁頭就少了。」（註十）

在劉少奇等領導人進行了醞釀工作後，為了糾正調整工作的阻力，統一黨內的認識及總結經驗，以克服經濟的嚴重困難和貫徹八字方針，黨中央於六二年初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全面地總結大躍進以來的問題，並作出具體改革方針，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會」及「西樓會議」。

三 七千人大會（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

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於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在北京召開，歷時二十八天，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省、市、縣、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還有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共七千餘人。會議原定主題是討論劉少奇向大會作的書面報告稿，後來更發展成為發揚民主的「出氣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而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大會上都講了話。

這次會議對當時的經濟困難和工作指導上的錯誤，作了較實事求是的分析。中共過去一直把五八年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歸咎於自然災害及蘇聯單方面之背約，而這次會議則指出經濟困難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作上的錯誤所導致的。劉少奇指出，一條是天災，一條是一九五八年以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他說：

「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正如有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而突破了一向說法歸咎天災的框框。（註十一）

劉少奇又強調：

「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註十二）

突破了總把缺點錯誤與成績說成是「三七開」的框子。劉少奇的〈書面報告〉中指出工作存在的四點錯誤，這分別是一、生產指標過高，基建戰線過長；二、人民公社工作中，犯了刮「共產風」和平均主義的錯誤；三、權力下放過多，分散傾向嚴重；四、農業增產速度估計過高，造成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加重了供應的困難。

〈書面報告〉分析了產生這些錯誤的原因是由於工作經驗不足及不少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並在不同

程度上削弱了民主的原則，使黨不能及時地糾正工作中的錯誤。「書面報告」更總結了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這主要是（註十三）：

- (1) 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發展的規模必須同農業生產水平相適應；國家的經濟指標一定要符合實際，留有餘地，注意綜合平衡；
- (2)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不能混淆，必須發展商品交換，學會做生意，並強調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要貫徹按勞分配及等價交換的原則，實行經濟核算；
- (3) 國家計劃的統一性和地方的積極性要結合，充份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既反對個人的專制，又反對不服從整體的分散主義；
- (4) 精兵簡政，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努力認識和掌握經濟工作的客觀規律，鑽研業務，反對政治空談，必須尊重科技人員的職權和建議，加強黨的領導。

〈書面報告〉發表後，更由劉少奇組織了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員會，經八天討論後，對〈書面報告〉進行修改。〈書面報告〉的第二稿，於一月二十六日印發給與會者再評論。後來劉少奇在全體全議上再發言，對第二稿之修改情況作補充說明，一般來說與會者對劉少奇的講話表示滿意，認為「說出了多年想說的話。」

會議原定是在修改及通過劉少奇〈書面報告〉及其他中央領導人講話後便結束，但在會議過程中，有些幹部認為時間太短，有些問題仍未能充份討論，應該於會議中強調一下民主和反對官僚主義，因為自從五九年廬山「反右傾」後，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下面不敢講話，上下關係不融洽。因此，在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澤東講了話，提出了發揚民主、上下通氣的問題。（註十四）他說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關鍵要上下通氣。他並號召要發揚民主，「開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他並再三說要跟七千人一起過春節。三十日下午，毛澤東正式發言，一共講了六點，中心是談民主集中的問題，他批評黨內違反民主集中制的種種現象，強調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鞏固。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

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此後，會議各大組都對各有關負責幹部提了批評意見。省委、中央及國家機關一些部、委的負責幹部也對工作中的缺點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二月七日下午，會議正式閉幕。

這次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在經濟中的經驗教訓，認識到錯誤發生原因在於驕傲自滿、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和不調查研究，草率決定。此外，七千人大會更在發揚黨內民主的基礎上，動員全黨貫徹執行八字方針，以恢復經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會上講到困難形勢，已經退到山谷了，以後就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劉少奇根據此點在會上作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結論，但這個結論不久就被中國極為惡劣的經濟現實所否定，劉少奇本人也很快收回了這個估計，(註十五)而毛澤東、劉少奇對經濟形勢的不同判斷卻種下了將來雙方路線分歧的禍根。此外，令毛澤東對劉少奇極為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一些令他不滿意的話，如「三面紅旗究竟對不對，過十年後再來總結，可能就看得更清楚等等。」(註十六)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一些領導幹部看法，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的。」毛澤東更認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的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註十七)

四 西樓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南海西樓召開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樓會議。為什麼在七千人大會後不到一個月，又要再召開另一重要會議呢？主要原因有兩點：

- (1) 七千人大會後，財政部門向中央反映，六二年的財政預算中有二、三十億元的赤字，這是以前沒有估計到的，當時國內的經濟已經十分困難，又增加二、三十億元赤字，故劉少奇決定開會討論。
- (2) 七千人大會雖初步總結了三年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對調整的迫切性

提高了認識，但當時黨的高級幹部對經濟的看法仍不一致，他們對人民困難的程度及經濟恢復的快慢，看法仍有差別。為了統一黨內對當時經濟形勢的認識，加快調整步伐，實有需要再召開一個會議。

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會議由劉少奇主持，討論了六二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問題。陳雲在會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隨後，又根據劉少奇的建議，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的會議上作了同樣的講話，再強調當時的經濟處境是極之困難的，農業大幅減產，要恢復過來，需三至五年時間。另外，已進行的經濟建設，超過了實際的可行性。這兩方面的困難，導致財政赤字，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農民手中有了錢，但由於城市輕工業供應不足，使農民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導致他們不願意向城市增加供應，以及城市人民生活下降等問題。

針對當時經濟情況，陳雲提出六條解決困難的方法（註十八），主要是把今後十年分兩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這階段需要更多的集中統一，集中統一的程度可能超過建國初期，而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這十年中主要工作是減少城市人口、壓抑通脹、保證城市人口最低的生活水平，他更號召各國家機關集中注意力以協助農業增產及抑止通脹。陳雲在發表談話後，全場自發地去熱烈鼓掌，足見他的建議受到與會者的衷心支持。這篇講話完結後，各部、委都紛紛要求傳達，中央書記處在討論時，鄧小平指出應把講話全篇傳達，陳雲怎樣講就怎樣傳達。

西樓會議後，黨中央更醞釀恢復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大家一致推舉陳雲為小組之組長。三月七日，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再發表講話，強調調整計劃的實質，就是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發展放慢，而將工作重點放在農業及市場上，陳指出：

「今年的年度計劃要做相當大的調整。要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重點是傷筋動骨這四個字。要痛痛快快地下來，不要拒絕『傷筋動骨』。」周恩來更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

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註十九)概括了陳雲講話的基本精神。劉少奇更修改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說：「有些地區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裡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註二十)

當然，絕大多數幹部都同意陳雲的論點，然而仍有個別的人，如被認為是親毛的柯慶施就不贊成，他指出在七千人大會上中央對形勢已有了正確的估計。現在才幾個月，又講一篇同那時估計有很大區別的話是不正確的。柯的發言立刻受到劉少奇的反擊，劉少奇指出形勢的估計，應該按客觀情況變化而變化，召開七千人大會時，仍未發現財政赤字，現在發現了，對形勢的估計也應該跟著變化，這才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

第三節 第二次糾左努力的困擾——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

一 包產到戶的湧現

當劉少奇、陳雲等領導人糾正農村中刮共產風的左傾錯誤時，中共中央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修訂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為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六十條〉明確規定恢復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並重開集市貿易，以方便農民將其於自留地生產的產品往之銷售。

在推行〈農業六十條〉的進程中，一些省份均制訂以「生產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經營管理方式，增加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例如六一年春，在大躍進期間受災嚴重的安徽省農村的農民自發推行「責任田」、「聯產計酬」、「包產到田、責任到人」等不同名稱的經營管理新形式，後來被統稱為「包產到戶」。這制度的主要特點是以「個別農戶」為單位進行經營的聯產計酬(即聯繫產量以計算報酬)的「責任田制度」，其出現是對人民公社「大鍋飯」的分配制度和權力過於集中的管理模式的一項變革。

包產到戶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故極受農民歡迎。安徽省委應農民要求，正式試行責任田，然而由於責任田強調個別農民的獨立生產，與毛澤東經常強調的互助合作概念有明顯的衝突，故安徽省主要領導人如曾希聖等曾於六一年三次報告中央和毛澤東，爭取其批准推行「責任田」。在毛澤東看來，雖然「包產到戶」強調個別農戶的「單幹」，有違社會主義「合作化」的理想，然而在當時農村極度惡劣的環境下，此制度畢竟是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作為一權宜措施解決農村飢荒，亦不失為一有效辦法，故毛澤東還是勉強表示支持，同意地方幹部「試試看」。

一九六一年部份地區推行包產到戶的增產成果，使不少與農民聯繫較密切的幹部堅決的支持農民推行此制度。

二 包產到戶的夭折

毛澤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同意試行責任田，這可從他對其秘書田家英就責任田看法的轉變可清楚看到。田家英在開始時是極不贊成包產到戶的，在六一年三月他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安徽省一些窮戶反對包產到戶的情況，田家英的信中有下列一段話：

「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們說：『如果實行包產到戶，不帶我們的話，要求給一條牛，一張犁，8個寡婦互助，爬也要爬到田裡去。』看到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要實行甚麼包產到戶，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開不管，作為共產黨人來說，我以為，良心上是問不過去的。」田更指出：「依靠集體經濟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我們不能動搖的方向。」

田家英在信中表達的思想，與毛澤東完全一致，毛於是立即將田的信轉給其他領導人傳閱，各領導人卻有不同的反應，例如陶鑄表示支持田家英的意見，但陳雲卻對田的意見不以為然，指出「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註二十一）

在六一年十二月以後，由於經濟狀況逐漸改善，毛澤東對推行責任田等權宜措施的看法也完全改變。毛澤東認為農村應繼續推行合作化制

度，只要生產隊的主權能落實，就不需再搞「責任田」。

但在此時，田家英卻改變了對「責任田」的看法，他認為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克服經濟難關，個體家庭經濟有其優越性，而實際情況亦證明包產到戶對恢復生產有利，但當田家英將這個觀點向毛澤東匯報時，毛澤東明確表態：

「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註二十二)

一九六二年一月舉行的七千人大會普遍被認為是中共全面推行務實路線的起點，毛澤東在會上作出自我批評，劉少奇明確提出「七分人禍」的觀點，然而，諷刺的是，包產到戶在七千人大會上受到廣泛的批評，大力提倡責任田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因此而被免去職務。

三 意識形態逆轉，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

一九六二年，國際形勢逆轉，分別是：

- (1) 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一九六二年夏天，接連出現新疆居民集體逃往蘇聯事件；
- (2) 印度藉中國在大躍後經濟元氣大傷的機會，越過「麥克馬洪線」，佔領中國領土，造成大規模邊境軍事衝突；
- (3) 美國加緊在越南南方的戰爭，牽制中國，使中國深受威脅。

在同一時期，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亦藉中國經濟困難的處境，提出並策劃「反攻大陸」的行動，並派遣特務潛入東南沿海地區，伺機行動。在國內，由於經濟形勢仍困難，生活品短缺，公社和企業內的管理制度混亂及不健全，幹部出現貪污、欺壓群眾的情況，亦加強了社會緊張的氣氛。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即離七千人大會僅七個月，中國的政治形勢明顯產生變化。八月六日，在為準備八屆十中全會而於北戴河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猛烈抨擊包產到戶。

八月九日，毛澤東在另一個講話中提出「共產黨垮了誰來」這樣難以置信的詢問，^(註二十三)這樣就把階級鬥爭作為隨即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更進一步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著名講話，並圍繞階級鬥爭這個中心開展對「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的大批判。毛澤東指出：

「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幹、集體兩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幹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註二十四)

在批評黑暗風及單幹風的基礎上，毛澤東更批判在彭德懷事件後，對一些被批判為「右傾」的幹部平反工作做得太快、太多，並明確表示：「還來刮平反之風不對，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註二十五) (有關八屆十中全會前後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一章中再加以討論)

由於毛澤東在黨內的崇高地位，其意見很快就主導了整個中共中央的意識形態。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即八屆十中全會最後一天，劉少奇作了一篇重要講話，基本上完全迎合毛的觀點。劉少奇說：

「贊成主席的講話。我們黨在革命勝利以後，在毛主席領導下，一直是比較順利的發展，但到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因為受到天災和我們工作中的錯誤，算是遇到一些比較大的困難。我們在困難面前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種，在困難面前被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向後倒退、單幹，這是鄧子恢同志的態度。第三種，利用我們暫時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這就是彭德懷，習仲勛的態度。第一種是正確的；第二種是動搖，不堅定，喪失信心，不懂馬列主義；第三種是敵對的態度。劉少奇又繼續說：單幹是沒有出路的，只有社會主義大農業才能使農民免於貧困和破產，農業才能過關。」^(註二十六)

雖然毛澤東緊緊握著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但基於中國經濟的境況仍未從大躍進的破壞中恢復，故毛澤東仍將處理國家各種具體事務的工作交予劉少奇、周恩來及陳雲等人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六年前的悲劇在於正如毛澤東處理責任田、包產到戶的情況一樣，一到經濟境況稍為好轉，毛澤東便徹底否定實務方針，改變主張以物質刺激鼓勵生產的領導人的經濟路線。一九六五年末，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鄧小平及陳雲等相繼下台。

在下面，將先討論六十年代初期主張採取務實政策領導人的各項經濟救亡措施。

第四節 勿實路線下的具體經濟政策

總括來說，勿實路線的核心是中央政府重新集中經濟權力，大力壓縮基本建設，精減職工，以減少對產品的過度需求，並改變毛澤東提倡的「精神刺激」、鼓勵大幹快上的建設方針，而強調「物資刺激」，鼓勵多勞多得，個人收入與投入勞動成正比的發展策略來增加個人的積極性及促進農業與輕工業的發展。他們期望在增加供應的情況下，可以抑止社會上的通脹壓力，從而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 中央重新集中管理經濟的權力

六零年初隨著八字方針的提出，經濟體制相繼進行第二次改革，針對大躍進時期宏觀經濟失控、權限分得過散的弊病，中央再度重新強調集中統一，將大量曾下放予地方的權力上收，保證地方政府再不能以建立完整工業系統作理由，大幅增加基本建設。後來，隨著國民經濟情況的逐步好轉，政府又進行一些探索性的改革。當時，配合國民經濟調整而採取上收權力的措施，主要有（註二十七）：

(1) 加強國民經濟管理

強調中央再度集中統一控制經濟，財權基本上集中於中央。此外，

中央收回物資的管理權和分配權，貨幣發行權歸中央，規定國家下達的勞動計劃不准地區突破，所有生產、基建、收購、財務等工作，上下一本帳，絕不許地方層層加碼。後來更規定所有基建投資和大中型項目都須由國務院批准，才可以列入國家計劃內，而任何部門、任何地區都不准在計劃外安排項目。在計劃管理上，按照「統一計劃、分級管理」的原則，強調堅持「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各部門、各地方必須在國家統一計劃下發揮各自的積極性，防止和克服各自為政的分散主義。

（2）上收企業

五九年中央企業只有二千四百個，六二年中央各部門開始收回大批骨幹或較為重要的企業管理權，六三年增加到一萬零二百個，六五年達到一萬五百三十三個，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三。上收企業加強了對重要企業的集中統一管理，克服了企業管理上的混亂現象，調度較為靈活，能夠保障中央對企業產供銷（生產、原材料供應及銷售）活動的統一指揮，保證中央對財力、物力的需要，企業的經濟效益也有了提高。但是，這也帶來一定的弊病，如上收企業過多，使中央管理工作負擔過大，並把主要精力花在企業日常的產供銷調度上，削弱了中央制定各行業規劃、技術標準等戰略問題研究。因此，隨著經濟的進一步好轉，中央便進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以緩和過份集中的問題。

（3）加強物資管理

物資調配工作集中統一管理，由中央物資部門統一調動，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垂直領導的物資管理系統和業務經營網。中央分配物資從二百八十五種增加到五百二十二種，大體上恢復到五七年前的狀況。

（4）調低企業留成比例

由於中央財政出現赤字，故決定從六一年一月下旬起，把國營企業利潤留成比例由過去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降為百分之六點九，使中央能掌握更多財力，以解決財政危機。

二 削減需求，以緩和經濟緊張局面

大躍進期間的建設及生產規模，遠遠超出當時國家的物質基礎，使物資供應異常緊張。為解決過量需求情況，中央採取了下列削減需求的措施：

(1) 壓縮基本建設，降低累積

六二年基建投資六十七億元，比六零年減少了三百多億元。大中型基建項目一千零三個，比六零年減少了八百一十二個，而累積率從六零年百分之三十九降到六二年的百分之十點四。

(2) 縮減重工業規模，實行必要的關、停、併、轉

首先壓縮了鋼鐵及煤炭的指標，其次對一些企業進行了關、停、併、轉。全民所有制企業從六一至六二年合計減少了四萬三千多個。並強調要按照農、輕、重次序進行綜合平衡的方針，把生產及建設規模調整到與工農業生產水平相適應的程度，以保證農業生產所提供的糧食和原料能滿足工業生產的需要。

(3) 精減職工，減少城鎮人口

各地區及部門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從六一年起，大力精減職工和城鎮人口。當時中央領導人十分了解城市生活比農村好，要動員人口下鄉是件困難的工作，但假若不能動員的話，將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問題，如劉少奇曾指出：「現在我們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會回到蘇聯一九二一年內戰時期的情況，全國人民是各奔前程。」(註二十八)陳雲更具體指出不下放人口會出現下列情況(註二十九)：

1. 假若城市人口不下去，勢必要向高產的農村要糧食，這樣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平均主義，高產地區農民糧食多了，但不能多吃，一定要把糧食交給國家，這樣，勢必打擊他們生產的積極性，對農業發展十分不利。

2. 牲口要繼續大量死亡。由於農村糧食不足，牲口和人便需爭飼料糧來吃，當然牲口是無可能爭贏的，結果將造成牲口大量死亡。當時農業生產主要靠畜力和糞肥，畜口死亡將對農村經濟帶來嚴重的影響。
3. 經濟作物如棉花等產量一定會下降。假若政府對糧食的徵購任務增加、農民吃不飽，為了吃飯，就不肯種經濟作物而多種糧食，這樣將對輕工業的發展帶來嚴重的打擊。
4. 糧食進口要增加。城市人口不下鄉，一年要進口一百億斤糧食，這個負擔十分沉重，以往都是利用外匯換來成套設備和重要工業的原材料，假若要削減這些重要物資的進口來購買糧食的話，對工業建設將有很大影響。

陳雲曾指出，假若能動員城市人口到農村安家落戶，參加農村裡的集體生產和分配，加上自留地的收成，他們將不需要再向國家伸手要糧食，這樣就大大緩和上述四點困難。此外，政府還改變當時以固定工為主的勞動制度，由於固定工有勞動保險，很難辭退，使國家開支很大。故此，劉少奇建議在招收工人時，不要增加固定工，而招聘工資及福利較低及可以容易辭退的臨時工及合同工以解決國家開支不足的困難。（註三十）

基於精減城市人口是克服經濟的一項重要措施，故從六一年開始，此工作便大規模地進行。精簡的主要對象是五八年以後來自農村的新職工，工作重點是動員他們回到各自的家鄉，參加農業生產。精減工作到六三年六月完成。在兩年半時間內，全國共精減職工一千八百八十七萬多人，城鎮人口二千六百萬人，大量減少工資和糧食銷量。

三 強調「物質刺激」，支援農業生產，在供給方面緩和經濟危機

劉少奇曾多次強調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把生活搞壞，而是為了把生活搞得更好，而假若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則必須熱心於發展生產力，

故此，怎樣才能發展生產力就成為劉少奇及其他務實的幹部最關注的問題。他們十分反對個人生產活動與收入無直接關係、完全平均主義的供給制，他們並批評供給制在一定的情況下(如缺乏應有的政治領導和群眾覺悟)有麻痺勞動積極性的可能。這種做又三十六，不做又是三十六的平均主義，只對懶漢有利。

早在五七年，劉少奇就曾指出：

「如果不按勞取酬，公平合理，就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如果按勞取酬貫徹得比較好，分得比較公平合理，大家滿意，就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劉少奇還說：「工人農民分配不當就要鬧事」，「人民為了關心自己經濟生活，就要過問工資、住房、吃飯、坐車這些事。這就表現出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積極性了。」(註三十一)

基於強調「物質刺激」的原則，劉少奇及其他領導人便從改變人民公社制度入手，解決供給制及各種平均主義，以發揮個人的積極性，為增產奠定鞏固的基礎。

(1) 改革農村經濟體制，並加強對農業的支援

在改革農村經濟體制方面，規定生產隊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單位，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及收益的分配。生產隊的規模一般以二、三十戶為宜，在生產隊範圍內的土地、大牲畜、農具、勞動力等歸生產隊集體所有和支配，公社和大隊不得隨便抽調。

至於農村體制改革的核心主要反映在分配方面，由黨中央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六十條〉)(註三十二)強調指出，社員個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資料及自有自用的小農具和工具等生產資料，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為了在收入分配上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避免平均主義，〈六十條〉取消了實行部份供給制的規定，並指出需按照社員勞動的質量和數量付給合理的報酬，嚴格實行評工記分，按照勞動工分進行分配。同時，還改變了過去要求每個生產隊辦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的硬性規定，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

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這就實際上廢除了脫離實際的供給制分配辦法，平均主義有所克服，按勞分配的原則有所體現。

在刺激生產方面，主要政策包括恢復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在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時，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全被納入公社所有，再加上平均主義影響，工作多少與收入並不掛鉤，大大打擊農民生產情緒，為解決農業生產危機，〈六十條〉明確規定農民可保留一小塊土地，名為「自留地」，以及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家庭副業的產品歸社員所有及支配，社員在完成國家定購合同後，可將由自己分配的產品拿到市集出售。在自留地和開荒地生產的農產品，政府不計口糧，不徵農業稅。上述種種規定，對提高社員生產的積極性，活躍農村市場，有極大的積極意義。(註三十三)

推行上述政策雖可大大發揮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然而，由於各農戶本身的條件根本不同而使收入出現顯著差別，再加上自由市場的制度，使貧富差距有擴大的趨勢。面對增產及收入不均的兩種困難，劉少奇迅速作了決定：

「自由市場還是要搞下去，農村自由市場會產生一些資本主義，產生一些資產階級分子，產生一些暴發戶，有些小商販會變成暴發戶，……社會上產生一些資產階級分子並不可怕，不要怕資本主義泛濫。」對於劉少奇的意見，鄧小平表示全力支持：「只要能增產，單幹也可以，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註三十四)

除了改革農村體制外，國家更加強了對農業的支援，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以克服糧食不足的困難。

1. 國家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加強對農業的支援，這主要是通過縮減城鎮人口，壓縮農村水利建設規模和精減農村文教等事業，以充實農村的勞動力。六二年農村勞動力比五八年增加五千七百多萬人，超過了五七年的水平。

2. 素正由浮誇風導致的高徵購，減少了國家對糧食的徵購量，使農民得以休養生息。按生產年度計算，六二年糧食徵購量比六零年減少了二百五十多億斤。
3. 盡可能增加農村社隊所需的物資，增撥了一批木材、鋼材、毛竹等用於製造小農具的物資，並增加了農業需要用的化肥、農藥和農機的生產。為了切實幫助生產隊解決生產資金不足的困難，國家決定通過財政部或委托人民銀行增加對農村的低息及還款期較長之貸款，有些更採「無償投資」的形式，用以支援一部分生產資金特別困難而又沒有償還能力的生產隊。據統計，六二年銀行發放農村社隊的各項款項全年累計十九億九千多萬元，佔當年農業生產資料供應總值的百分之三十三。於六三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建立中國農業銀行，統一領導農村的信用合作工作。
4. 國家還決定大幅度提高糧食、油料、生豬、家禽等副食品及棉花等經濟作物之收購價格，六一、六二兩年內提高了百份之二十七，並退賠一部分平調款，此等政策促使農村恢復元氣，以扶植社隊和擴大生產，增加農民的收益，刺激他們生產的積極性。

以上國家推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及支援農業發展的四項措施對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2) 加強工業企業管理，貫徹按勞分配，以促進工業品生產

為克服大躍進期間企業混亂現象，從而把各項企業工作引上軌道，黨中央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簡稱〈工業七十條〉)、〈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及其他文件，以期逐步扭轉工業工作的被動局面，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可歸納為下列多項：

1. 針對過往權力下放過多的現象，將權力重新集中，以保證削減生產指標和建設規模能順利進行，並針對市場的需要，集中力量增加輕工業日用品及農業生產資料，以穩定市場。此外更強調產品必須達到一定的質量標準，並建立品質管理制度，凡經檢驗不合

格的產品，不得流入市場。

2. 加強對企業的管理要求。國家在保證供應足夠的原材料、燃料及勞動力後，規定企業要對國家實行五保(即保證產品的品種及質量、保證不超過工資總額、保證完成成本計劃、保證完成上繳利潤、保證主要設備使用限期)，在這原則下，企業必須注意工作效率，不作虧本生產，以完成利潤指標。國家並規定凡是消耗物資過多、產品質量低劣、成本過高、長期虧本而短期不能改善的企業，須按個別情況，或停止生產，或全部分關閉，或部份關閉。面對著這樣的壓力，企業大大加強了生產效率，減少了浪費及不負責任的情況。
3. 基於企業單位需負起自負盈虧、上繳利潤的責任，故此國家在企業內重新建立各種責任制度，以便各幹部能各司其職，對企業生產狀況能更為關注。
國家規定企業在黨委領導下，建立一個廠長負責的統一生產行政指揮系統，集中領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保證全廠生產能有秩序地進行。在廠長下，建立生產、技術、財務等各項責任制度，使各副廠長、工程師、技術人員及產業工人能分工明確，各負其責。
4. 改善工人的勞動時間、待遇和物質生活，以物質獎勵的方法提高工人的工作興趣。當時曾規定不論實行哪種工資形式，實行甚麼樣的獎勵方法，工人勞動報酬的多少都應當照技術水平、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決定。

以上各項強調企業和個人責任制的政策，鞭策著工廠內各員工努力生產，增加效率，在生產者能享受其勞動成果的前提下，使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皆有顯著的提高，或緩和了當時的經濟危機。

四 消滅財政赤字，回籠貨幣，抑止通脹，穩定市場

上文曾經指出，從五八至六一年，國家財政出現大量赤字，與之相伴的是貨幣發行過多，加上生產供不應求，導致市場不穩和通貨膨脹的

現象、人民生活水平大受影響。

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大幅壓縮基建投資、各項行政支出和國防費用，以減少財政開支。其次便是增產日用工業品及支援農業，扭轉企業的虧損情況，以增加商品供應，提高財政收入。這兩點在以上經已詳細論述，其他主要政策，還包括下列兩點：

- (1) 為回籠發行過多的貨幣，在堅決穩定十八類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即實行固定低價政策）的基礎上，對糖果、糕點、自行車、尼龍襪子等部分商品實行高價政策，並開設高價飯館，以開闢貨幣回籠渠道，這樣做很快就回籠貨幣六十多億元，穩定了市場，平抑通漲。
- (2)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了〈關於加強銀行工作的集中統一，嚴格控制貨幣發行〉的決定。當時，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投資過多的原因是由於許多地方政府隨意要求地方的銀行增加貸款，擅自挪用銀行貸款作為財政開支，使國家發行了過量的貨幣。針對這種情況，中央強調銀行工作必須由中央領導，收回幾年來對銀行工作下放的權力，對銀行業務實行徹底的垂直領導，經國家及銀行總行下達的信貸計劃、貸款辦法和其他規章制度，地方不得擅自更改。此外，更嚴格信貸管理，非經人民銀行總行批准，任何地方、部門企業單位，不得在計劃以外增加貸款，而各級黨政機關皆不得像過去那般強令銀行增加貸款。

經過上述各項工作後，國家財政狀況得到改善，六二年財政收支相抵有結餘八億多元，達到預期的效果。

第五節 「務實路線」下的知識分子、教育、文藝及其他政策

在全面經濟調整的同時，黨中央還對知識分子、教育、文藝及統一戰線方面的政策進行了調整。

一 重視專家和知識分子

在大躍進期間曾大力鼓吹「大搞群眾運動，大走群眾路線」，在一定程度上，只顧生產而忽略了學習文化的需求。劉少奇等領導人針對這種情況，強調「不要忽視書本知識、不要忽視專家的作用」，他們指出：「被領導者沒有文化，很難發揮充份的意見；領導者沒有文化，很容易簡單粗暴。」

當時中國由於教育經費嚴重缺乏，很多適齡兒童被剝奪了入學的機會，故此，劉少奇提出了「半工半讀，亦工亦農」的建校方針。除了現有全日制的學校外，國家還增加少量的教育經費興辦半工半讀或半農半讀的學校來普及教育。

雖然如此，務實派亦十分強調高等學校的重要性，在他們制定的〈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中，強調高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努力提高教學質量，正確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方針，加強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課程的教學。生產活動、科學研究、社會活動的時間，應該安排得當，以利教學。故此，劉少奇有意識地將全日制和半工半讀的辦學目標分開，他強調不同學校由於性質相異而各有偏重，全日制學校以讀書為主，工廠、工社辦的技工學校、業餘學校則以生產為主。劉少奇曾對合肥工業大學的學生說：「你們學校現在還應當以讀書為主，只用一部分時間勞動，因為現在大學教育還沒有普及，大學還不多，現在大學要以讀書為主，工廠和農場辦的學校則應當以生產為主；一種以生產為主，一種以讀書為主，這樣才有利於我們的建設和教育事業。只有在將來，才可以使二者逐步接近，最後變成一樣。」（註三十五）

此外，務實派並調整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以調動知識份子的積極性。

- (1) 六一、六二年間周恩來曾多次重申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副總理陳毅更在科學工作會議和戲劇創作會議上指出：「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
- (2) 基於了解專業知識的重要性，務實派准許非黨知識分子對某些他們

熟悉的專業作具體領導，以調動知識分子工作的積極性。文化部長周揚曾說過：

「一個學校好不好，主要看你有沒有好教授。」「校長的權威就建立於教授權威的基礎上。你的教師是第一流的，教材是第一流的，培養出的學生是第一流的，校長就是權威了。」

劉少奇並容許非黨知識分子加入握有管理學校實權的校務委員會中，在編寫高等學校教材時，也容許專家的參與，使他們的專長得以發揮。

- (3) 務實派更強調學生應該尊敬老師，不能以破除資產階級思想為名而對教師進行迫害。周揚指出：

「學生是先生教育出來的，第一、要感謝先生；第二、先生有不對的地方要批評先生；第三、批評之後，還要向先生學習。」「先生要把知識正確地傳授給學生，學生不恰當意見，先生有責任加以指出並提出反批評。」(註三十六)

- (4) 除尊敬知識分子外，務實派並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准許在完成工作任務後，可搞點研究或寫文章之類的業餘活動。此外更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如廣東省委就制定了七項物質照顧的方法：每月額外增配糧食、治病時有特別優待、休假時遊覽風景區只需四分之一費用、恢復出版學術刊物、舉辦俱樂部及提供充份研究時間……等，使知識分子能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活動。

務實派既然重視知識，也就把「專」比「紅」看得更為重要，他們曾指出「對大學生紅要求不要太高」，「青年人只有三分紅就是革命者了，應當把更多的時間放在鑽研業務上。」(註三十七)基於這個原則，當時的教育政策甚至發展到否定「階級成份第一」的原則。從六一年起，工、農階級出身的學生在學校中的比例逐年下降，而非工、農子弟比例則逐年增多，入學「分數」越來越受到重視，一改以往注重政治背景選拔學生的局

面。（註三十八）

二 開放的文藝創作

在文藝創作方面，務實派一改以往只准作家寫共產黨革命、反封建主義的題材，以致令各種作品「千篇一律」的情況。據電影名編導陽翰笙於六二年指出，當時文藝界中對各項藝術創作有多個框框，這分別是一定要寫重大題材、英雄人物和尖端人物，不敢寫人民內部矛盾（尤其是領導和被領導者的矛盾）、諷刺劇、悲劇、英雄人物及黨的缺點；在寫作方面，則一定要參加集體創作，限期完成並得領導的批准。

文藝界的務實派希望改變這種現象，他們指出文藝創作在題材、人物造形及表達手法中應有所突破，不只寫「光明面」及重大題材，更需寫身邊鎖事、人民內部缺點；不只寫正面、反面人物，更要寫心理狀態較為複雜的中間人物。劉少奇提倡的較開明文藝路線，除可以蓬勃文壇的創作氣氛外，更能達到一定的政治效果，為其穩健的經濟及社會政策鋪路。劉少奇曾指出文藝創作應該題材多樣化，甚至明言大躍進的失敗也可以寫，他說：

「可以寫大躍進的缺點，滿腔熱情，碰了釘了，又改正過來。對大躍進的缺點可以批評。」「作家只要把這種生活如實地記載下來，用不著加工，這就是革命的浪漫主義了。」（註三十九）

廣東省領導人陶鑄也指出生活是多方面的，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壞的方面，要允許作品中寫缺點，在生活、工作中一點缺點也沒有是不可思議的，總而言之，作家應真實的反映我們的生活。（註四十）

經務實派幹部鼓動後，文藝界和學術界出現了建國以來創作最蓬勃的局面，戲劇、雜文和各種文藝作品都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值得注意的，就是當時很多文藝創作的背後都隱藏著一種指桑罵槐、借古諷今的傾向。例如北大副校長翦伯贊在其文史著作中，就大談對農民的讓步政策，稱讚歷史上開明皇帝輕徭薄賦的恤民措施，並批評橫徵暴斂的君主使民不聊生，著作暗諷毛澤東極左之經濟政策，要求農民不停勞動而不

能獲得適當之物質分配，更間接批評建國以來高累積、低消費的經濟發展策略。在文藝界中，黨中央宣傳部門領導人陸定一帶頭出版「魏徵傳」，提倡節氣風骨、反抗皇帝、為民請命。而名作家鄧拓歌頌明末東林黨詩句中，亦強調知識分子應不懼強權，為真理而鬥爭：

「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盧擲處血班斑。」「力抗權奸志不移，東林一代好男兒，攀龍風節揚千古，字字動心絕命詞。」

在當時，針對毛澤東政策最具代表性及震懾人心的可推趙劍秋的〈孫安動本〉及吳晗的〈海瑞罷官〉兩齣京劇，這兩齣京劇的主人翁孫安及海瑞都是生活樸素、性格剛直、耿介的清官，他們反貪污，反浪費，主張用重刑嚴懲貪污，建立廉潔清明的政治局面，並抑制豪強地主，大力興修水利，減輕苛捐雜稅，重視審判案件，平反冤獄。他們堅決與為非作惡的權貴鬥爭，並不惜冒生命的危險，向皇帝直斥這些權貴之非而遭打擊報復，這些戲劇的結局往往是出人意表，大快人心，令人拍案叫絕。六五年毛澤東曾對陳伯達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的批語從側面引證了當時這些題材大膽的文藝作品有極其現實的政治涵義。

三 甄別平反，調整統一戰線內部的關係

在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鄧小平專門討論了甄別平反的工作。四月黨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規定，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運動中遭錯誤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幹部，均需給予迅速的平反。

六二年四月間，中央統戰部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檢查以往在處理民族關係、宗教關係、歸僑關係和階級關係等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決定加強與非黨人士的合作。於五月下旬，黨中央決定對歷次運動和政治審查中因海外關係而被錯鬥的歸僑進行平反和恢復名譽。九月，統

戰部更召開第二次全國改造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

第六節 各項經濟救亡措施的結果

經過幾年的調整，使各項措施迅速地取得明顯的效果，克服了大躍進以來的經濟危機。

一 農業生產水平得到恢復

在農業生產關係普遍轉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後，加上三自一包政策的推行，基本停止了共產風，使農民的積極性逐漸調動起來。六二年間農村勞動力已超過五七年的水平，牲畜連年減少的情況亦改善了。由於工業支農方向的落實，農用機器如拖拉機及排灌動力機等都有所增加，從農產品產量來說，有很多地方已恢復到或超過五七年的水平。

二 經濟結構改善

基本建設規模進一步壓縮，農業和工業的比例關係有所改善。六二年的農業生產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六點二，結束了連續三年下降的局面。另一方面，工業生產的發展速度繼續放慢，比上一年降低百分之十六。在工業生產中，由於進一步壓縮重工業及基建投資，使工業內部的重工業和輕工業間的比例關係也有所改善，輕工業總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六零年百分之三十三增至六二年百分之四十六點五。

三 財政金融局勢好轉

隨著工農業恢復生產和發展，加上各項開支受到壓縮和控制，國家扭轉了前四年連續出現的大量赤字，財政收支出現平衡，使貨幣發行過多現象有所改變，大大緩和了通貨膨脹壓力。在六二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與六一年基本持平的情況下，貨幣流通量減少了十九多億元，多達貨幣發行量百分之十五。全國集市貿易的價格也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

五，城鄉人民生活開始有所好轉。總的來說，國民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國家恢復了生機。

註 釋

- 註一 郝夢筆等《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下)，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521頁
- 註二 呂廷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紅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2-23頁
- 註三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272頁
- 註四 同註二，第27頁
- 註五 同註一，第531頁
- 註六 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208頁
- 註七 丁望《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第一卷)，明報月刊社，一九七一年，第314頁
- 註八 同註三，第478頁
- 註九 《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328-331頁
- 註十 同註六，第212頁
- 註十一 同註三，第403頁
- 註十二 同註九，第421頁
- 註十三 同註九，第361-367頁
- 註十四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399頁
- 註十五 同註六，第214頁
- 註十六 同註三，第479頁
- 註十七 同註三，第482-483頁
- 註十八 《陳雲文選》(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191頁
- 註十九 同註一，第537頁
- 註二十 同註六，第215頁
- 註二十一 呂廷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艱難探索》(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紅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63-164頁

- 註二十二 同上註
- 註二十三 同註六，第253頁
- 註二十四 同註十四，第425頁
- 註二十五 同註六，第252-255頁
- 註二十六 同註三，第513-514頁
- 註二十七 周太和等著《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96-101頁
- 註二十八 同註三，第382頁
- 註二十九 同註十八，第154-156頁
- 註三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542頁
- 註三十一 北京高級黨校《東方紅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
- 註三十二 房維中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一九四九至一九八零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306頁
- 註三十三 柳隨年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188-189頁
- 註三十四 同註二十一，第161頁
- 註三十五 孫宗溶〈當前教育革命中的幾個問題〉《中國青年》，一九九五，第二期
- 註三十六 《光明日報》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
- 註三十七 江蘇文〈駁匡亞明的智育第一〉《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 註三十八 《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
- 註三十九 《文學戰報》第六期，一九六七年四月廿八日
- 註四十 《香港明報》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一日，轉載許冠三《劉少奇與劉少奇路線》，中道出版社，一九八零年，第252頁

第二十二章 從獨立外交到中蘇分歧

第一節 韓戰後中國和平獨立的外交政策與中蘇蜜月期

一 外交政策的轉變

中國在韓戰中與第一軍事強國——美國打個平手，大大增加其國際威望，更強化了史太林對中國的信任，並提高了中國領導人的信心。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時指出：「在抗美援朝這一仗以後，我們的軍隊更強大起來了。自己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起來。……我們開始能製造汽車，也開始能製造飛機了。……」(註一)

為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中國也付出不少代價。中國在韓戰中的生命傷亡高達數十萬，不願被遣返中國的戰俘多達三萬多人，使中國丟了面子；在戰爭費用方面，政府除向國內人民拿取六億美元的捐款外，還向蘇聯借了十一億美元的戰費，蘇聯的貸款是以軍事物資折價計算，分十年清償，使中國經濟加重了負擔。

韓戰後，從五四至五七年，中國開始檢討其外交政策，決定對蘇聯推行比較平等的聯盟關係，對美國則既鬥爭又談判。在亞、非國家方面，中國則以一個剛爭取到民族解放的新興國家姿態，以獨立的方式推展和平外交。政策轉變的原因可歸納為兩點：

(1) 締造和平外交環境

通過和平外交，減輕亞、非國家對曾被聯合國裁定為「侵略者」的「共產中國」的恐懼，藉以緩和與亞、非國家的關係，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並創造一個相對平穩的國際環境，方便國內的建設。

(2) 摆脫蘇聯的影響力

通過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鞏固自己的實力基礎，儘量擺脫蘇聯的

影響力。雖然中國領導人經常公開強調中蘇合作無間，但強調民族主義的中國領袖對蘇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控制東歐諸國的歷史是相當警惕的。後來在中蘇分裂後，中國才把其內心真正感受公諸於世，批評蘇聯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假借國際分工的名義，反對別的國家發展經濟，迫使這些國家放棄工業化，使這些國家變成蘇聯的經濟附庸，供應蘇聯所需的原料，並成為蘇聯推銷剩餘產品的市場。（註二）中國更批評蘇聯常不擇手段，動輒對兄弟國家施加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壓力，並任意「干涉兄弟國家的內政，進行顛覆活動，力圖從各個方面控制」（註三）

二 和平外交政策的推行——萬隆會議

一九五四年，中國總理周恩來曾和印度及緬甸兩國簽訂「和平共處五原則」，主張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不互相排斥。這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與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同年九月，中國制定的第一部憲法正式指出：「我國根據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原整的原則同任何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的發展，已經獲得成就。」建國初期和平外交進行得最成功的事件，當首推於五五年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

萬隆會議共有二十九個亞非國家參加，與會者都希望在世界事務上有更多發言權，反對殖民主義，支持民族自決和種族平等，以建立國際上的和平環境，發展經濟以趕上世界其他國家。然而，參與國之間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這主要是主張避免結成任何反共軍事聯盟的「中立主義國家」，及把共產主義擴張視為嚴重威脅而強調應與西方國家締結軍事聯盟的「反共軍事聯盟」間之矛盾。

作為「共產中國」的總理，周恩來就是分歧的核心，但他在整個會議期間採取了低姿態，扮演著「一個有耐心的、好打交道的、甚至可以說是防禦性的角色」。（註四）周恩來從不捲入中立主義者和反共主義者唇槍舌劍的交鋒，甚至當有人攻擊共產黨時，他也始終保持平靜。後來當周恩來發言時，他更表達了中國對萬隆會議通情達理及心平氣和的態度，他

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周恩來強調中國參與會議的目的「是求同，而不是立異」，而各國的共同之處就是「解除殖民主義者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註五）

當然，一個短短的會議並不會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實際利益，但周恩來的言行卻能使別國相信中國正積極推行和平外交，成功爭取了多國對中國誠意的信任。萬隆會議時，周恩來更聲稱願意和美國談判，討論緩和遠東及台灣等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五五年至一九七零年之間，中美斷斷續續的舉行了一百三十多次會議，初期會議對釋放韓戰時戰俘和留美學生回中國等問題達成協議。此外，更由於雙方可以交換情報，解釋立場而互相取得諒解，避免了多次戰爭危機，為七十年代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三 中蘇關係的蜜月期——五四年赫魯曉夫訪華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蘇聯新領導人赫魯曉夫率領龐大的代表團抵北京，參加中共建國五年國慶。代表團在中國住了近半個月，與中國達成多項協議，使中蘇兩國達到親蜜友好的最高峰。

促使赫魯曉夫對中國給予慷慨的援助的原因，主要是史太林死後蘇共領導層內進行鬥爭的結果。一九五四年秋，蘇共內部鬥爭仍激烈進行，赫魯曉夫一系並非史太林嫡系，雖然稍佔上風，但仍受到史太林派的馬林可夫與莫洛托夫等頑抗。為了鞏固勝利果實，徹底打敗對手，赫魯曉夫需爭取國家與黨內外的群眾，以及國外兄弟黨領袖的支持。基於這個原因，中蘇在雙方簽訂的文件中承認了下列多項協議：

- (1) 蘇聯軍隊自旅順海軍基地撤退，一切設備無償交還中國。撤退及交還設備，須於五五年五月底前完成；
- (2) 將中國國境內四家中蘇合股公司內蘇聯所持的股份，從五五年一月開始全部轉讓給中國。股份價值，將於數年內由中國輸出貨物至蘇

聯清債；

- (3) 雙方簽訂科學技術合作設備，並修建兩條通運鐵路，蘇方承諾給中方技術援助；
- (4) 蘇聯政府給予中國五億二千萬盧布長期貸款，幫助中國再建十五個工廠，並將依據前約供給的工廠添供設備，增添設備的總值達四億盧布；
- (5) 蘇聯更以該次代表團名義，贈送一座大規模國營穀物農場的全套機器與設備給中國。（註六）

五四年可說是兩國關係最密切的時候，在這以後，雙方就不斷出現衝突及矛盾，終於導至六十年代的全面分裂。

第二節 中蘇分裂的由來

有些人認為，中國在建國初期推行一面倒政策，主要是中蘇意識形態相同，雙方都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至於六十年代的分裂，乃是中共堅持自己為馬列主義的正統，而批評蘇聯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結果。

假若上述分析是正確的話，那麼又怎樣解釋七十年代中美關係會有迅速的發展呢？中美雙方的意識形態可謂各走極端，什麼因素促使「共產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呢？此外，又有什麼原因導致中蘇在八十年代開始有緩和現象呢？是否中共推行的四化比蘇聯還要「修」，還是有其他因素？以上的一連串問題，可以理解到意識形態分歧在國與國間所扮演的角色根本極其有限。在外交決策上，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國家利益，這主要包括國家安全及經濟建設。中蘇於五十年代初期的友好關係，主要是由於國家安全及經濟建設的考慮，六十年代鬧翻的原因，亦是基於這個因素。在以下的討論裡，將會就中蘇分裂的原因與發展逐一分析。

一 歷史的因素及韓戰的惡果

(1) 國共內戰期間毛澤東與蘇聯的分歧

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內便潛伏著本土派與親蘇派的鬥爭，作為本土派代表的毛澤東，自然得不到史太林的信任，史太林曾批評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共產主義者，他們是麥淇琳(即人造牛油)式的共產主義者。毛澤東於一九五六年曾與南斯拉夫領導人系統地提出中蘇兩個在歷史上的嚴重衝突，毛澤東指出：

1. 過去(指中共四九年建國前)的王明路線實踐的就是史太林路線。它當時把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區搞垮了百分之百，對中國革命損失很大；
2. 第二次是抗日戰爭時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見史太林的，這次則搞右傾，王明提出一切服從國民黨，並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不要自己有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天下就太平了；
3. 第三次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後，史太林決定把中國全部都給美國和蔣介石。毛澤東嚴厲的批評史太林道：「當時從物質上和道義上，尤其是道義上史太林都沒有支持我們共產黨，而是支持蔣介石的。」
4. 「說我是半個鐵托或准鐵托，並懷疑中國是否真正的革命。」(註七)

六二年九月，毛澤東於八屆十中全會中，更對中蘇關係有如下講話：

「一九四五年，史太林就是阻止中國革命，說不能打內戰，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後，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後，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鬥爭的。他不願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後簽了。史太林相信我們從什麼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註八)

毛澤東在五八年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時，亦指出史太林懷疑中國領袖是十分正常的，因為從史太林方面來說，「第一，你們反王明；第二，不要你們革命，你們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史太林訂條約、要收回長路，那麼神氣。」(註九)毛澤東對史太林的批評沒有錯，在四八、四九年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蘇聯大使比西方列強任何大使對國民黨政府表示更友好，他們更是南京被中共攻佔後，追隨國民黨政府遷至廣州的唯一使節。

(2) 中蘇於中共建國初期的衝突

假若詳細分析一下蘇聯的外交政策，可以理解其目標根本不是堅持什麼革命理想，援助被壓迫民族，而是恢復沙皇時代的擴張主義政策。先不討論蘇聯於二次大戰後侵佔東歐各國的歷史，在遠東對中國的政策上，亦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英美蘇三強簽訂的雅爾達條約上，史太林強調要「恢復一九零四年喪失的俄國的權利」，這包括了「大連商港國際化，但確保蘇聯對它享有優先利益，租借旅順，作為蘇聯海軍基地。」史太林更要求「中蘇共同經營中東路與南滿路，並確保蘇聯在這上面的優先利益」。有些人認為史太林侵佔中國利益的原因是希望幫助共產黨，使其有更深厚的基礎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事實亦不然，這一方面可從史太林阻礙共產黨革命，要求共產黨自動解散軍隊，與國民黨合作的史實得知。更為重要的，就是中共建國後，蘇聯也死抱著這些利益不放。毛澤東曾指出：

「一九五零年，我和史太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們不同意就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還有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裡。」

史太林對中國問題最關心的，就是如何能確保蘇聯在東北、新疆及蒙古等地的特殊利益。與一切侵略者一樣，他希望中國政府是一個容易控制及無力的政權，在這原則下，國共兩黨保持勢力平均而導致中國長

期分裂將是一個蘇聯最容易駕御的局面，這就是為何蘇聯阻礙中共革命的深層原因。新中國的建立徹底粹碎了蘇聯的美夢，中國「一面倒」政策的背後實隱藏著兩國無數的矛盾。韓戰爆發後蘇聯要求中國出兵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加深中美的對立，客觀上延遲中國的建設，並在中國損耗大量元氣之後，不得不加深對蘇聯的依賴。韓戰一役，迫使中國向蘇聯借貸十一億元軍費，用以購買蘇聯的軍事物資，而這筆貸款需十年還清，對此，國務院國防委員會副主任龍雲後來曾抱怨道：

「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來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蘇軍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註十)

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共於六四年二月給蘇共中央的信中，重複了龍雲的論點：

「蘇聯對中國的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於抗美援朝戰爭之中。……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民也承擔了重大的犧牲，付出了巨大的軍事費用。……長期以來，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付利息，它佔去了我國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註十一)

總結來說，抗美援朝戰爭使中蘇關係面臨第一次較大的潛在衝突。

二 蘇共二十次黨大會的震盪——中蘇分歧的公開

五六年二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蘇共第二十屆黨代表大會，是史太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後的第一次黨大會。此次大會雖有多項報告，但重點則為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說和總結報告。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說，主要指責斯大林建立個人迷信，實行獨裁統治，採取集體屠殺的恐怖手段殘害異

己，殺害了大批共黨領袖，並迫使南斯拉夫反蘇。為了糾正個人崇拜的惡劣影響，赫魯曉夫堅持必須實行集體領導。總結報告的主題在於指出資本主義體系和共產主義體系的和平共存問題，赫魯曉夫強調第三次世界大戰並非不可避免，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存。

對中共來說，蘇共二十大的決議，是不能接受的。故當其他共產黨紛紛響應的時候，中共始終保持著沉默。參加是次蘇共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朱德於四月三日返北京，次日，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商討對策。四月五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註十二）來答覆蘇共，文章指出：

「有人認為史太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史太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史太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

此外，毛澤東更多次向蘇共領導人表示不同意清算史太林的方法：
——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向米高揚討論史太林問題時指出史太林「功大於過」，對「史太林要有具體分析，要有全面估計。」
——五六年十月、十一月毛澤東接見蘇駐華大使尤金時，多次強調不同意以對敵人的方式，對待史太林。
——五八年毛澤東於成都會議上講話，指出「一九五六年，史太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註十三）

面對中共不同的觀點，赫魯曉夫立命米高揚訪問中國，解釋蘇共的觀點，於四月八日更與中國簽署兩項協定，由蘇聯增加援助價值二十五億盧布的五十五項工程，另貸款五億多盧布，還有從蘭州修築通往蘇聯土爾克斯坦至西伯利亞鐵路上阿克斗卡站鐵路聯運協定。

在前面章節裡曾經指出史太林一向與中共有很多矛盾，阻礙革命及促使中國捲入韓戰，以圖進一步控制中國，照常理來說，批判史太林應

符合中國的意願，為什麼中國領導人會表示不同的意見呢？

(1) 事先不與中共商量，使中共處於被動地位

雖然中國領導人與史太林有很多矛盾，但中國政府一向在公開場合裡奉史太林為神明，並在群眾中建立起史太林不可侵犯的形像，蘇聯突如其来批史行動，使中國領導層感到非常狼狽，很難給群眾一個滿意的解釋。尤使毛澤東感到不滿的，是中國長久以來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也必然在反史太林的浪潮下受到影響，觸犯了毛期望受到崇拜的心病。中共也不高興蘇共在制定這些對各國共產國家影響重大的決策前，事先不與它商量使其有所準備，後來中共評論蘇聯時證實了這一點：

「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全盤否定了史太林，對於這樣一個關係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問題，事前不同兄弟黨商量，事後又要強迫兄弟黨接受既成事實。」

(2) 中共認為全盤否定史太林將製造藉口給西方列強攻擊，大大損害社會主義陣營的威信。

在反史太林運動中，東歐各國的史太林分子亦遭整肅。這固然是由於蘇共新當權者的意旨，但更重要是由於群眾中潛在著反官僚壓迫，要求民主化的真誠願望。

東歐於五六年夏秋間開始了民主化的浪潮，在一些東歐國家內，部分掌權的史太林分子被鬥倒落台，代之而起的是較為開明的領袖。東歐各國群眾亦希望借助是次民主化的機會，企圖擺脫蘇聯長期對其本國的控制，使反史的鬥爭逐漸變成爭取民主及尋求民族獨立的革命。六月發生於波茲南的波蘭工人起義及十月的匈牙利革命可說是運動的高峰。十月廿日，波蘭共產黨召開中委會，被蘇聯批判為犯有民族主義偏差的戈慕爾卡當選為第一書記，他發表了攻擊蘇聯的演說。赫魯曉夫曾率領代表團飛抵波蘭華沙，企圖阻止他當選，但不成功，後來只好被迫承認戈慕爾卡的地位。匈牙利革命於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從首都布達佩斯發

生，波及全國，當時首都有三千大學生示威，要求民主政治。在鬥爭中，軍事倉庫、電話交換台、電台及報社等被佔領。同一天晚上，匈牙利共產黨中央決定由納吉出任政府總理。十一月一日，納吉致函聯合國秘書長，通知說匈牙利政府立即廢除與蘇聯簽訂的華沙條約，宣佈中立，要求西方大國給予援助來保衛匈牙利的中立，并要求立即將匈牙利問題列入聯合國的議程。

對於波蘭反蘇，中共是支持的，並予以鼓勵。五六年十二月，中共就東歐發生的事件，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東歐各國之所以不滿蘇聯，是因蘇聯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偏向」，基於此，假若要加強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大國就不應有沙文主義，小國亦不應有狹隘的民族主義。但對匈牙利事件，中共則表示反對，且勸蘇聯出兵。據中共後來透露，蘇共在匈牙利革命勢力佔據首都的緊急關頭時，曾準備放棄匈牙利，後因中共堅決主張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革命，蘇聯的軍隊才前往鎮壓，「維護了蘇共的威信」。

中共對兩個革命採取不同立場，在波蘭事件上，強調的是民族獨立，這對一向批評蘇聯有民族利己主義的中共來說可謂正中下懷。然而，匈牙利革命所要求民主的呼聲，卻會「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萬一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受匈牙利事件的鼓勵，紛紛起來要求民主，革共產黨的命，則會使中共政權面臨嚴重的挑戰。毛澤東不就是承認中國曾出現了小匈牙利事件，「一九五六年，在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基於這個情況，毛澤東等就趕緊要求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革命以及推行大鳴大放運動，以疏導人民對現政權及各項政策的不滿。

（3）美蘇和解使中國對美鬥爭陷於孤立

令中共對蘇共二十大感到最大不滿的，就是是次大會正式提出要推行和平共存路線。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和平共存，實際就是美蘇兩國間的和平共存，但是並不表示美國會與中國和解，停止干涉中國——阻礙中國解放台灣的行動。對中國來說，如中美繼續敵對，而蘇

美又搞和平共存，則蘇聯將不會履行對中國的義務，這無疑會嚴重影響中國於亞洲的政策。

三 意識形態的分歧

五十年代後期與六十年代初，中蘇兩黨環繞著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作出激辯。理論鬥爭的背後，反映了兩國在不同國策下的外交路線。意識形態分歧包括了如下幾點：

第一是和平共處的問題。蘇共認為和平共處是當前共產主義的戰略基礎，它不僅是時代的要求，是解決國際社會最主要問題的唯一可行道路。同時更由於不少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皆主張和平共處，更加強蘇共提倡和平共存政策的決心。而中共則認為只有在把和平共處用作欺騙西方，使西方軟化的情況下，方可採用和平共處的政策，否則將會使一些殖民地的共產黨人喪失戰鬥精神，有礙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

蘇聯在六十年代國力足以與美國抗衡時，採取和平外交，結束冷戰局面可謂理性的決策，這可使蘇聯能在安定的國際環境下，集中精力於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政府的威信，從而減輕史太林時代政府與人民緊張的關係。然而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雖然他們也渴望和平的國際環境，甚至與美國商討解決台灣問題，但由於美國第七艦隊於台灣海峽駐守，顯示了美國堅決支持國民黨政府的立場，要實行解放台灣的任務將不得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美蘇兩國關係的緩和，無疑使蘇聯於中美鬥爭中保持中立，從解放台灣的角度來分析，蘇聯實是出賣了中國的利益。

第二是關於戰爭是否可以避免的問題。蘇聯認為由於國際階級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世界社會主義的巨大威力有可能粉碎帝國主義的戰爭計劃。蘇聯並且指出，不要等到落原子彈和氫氣彈的時候，才展開反對新的世界戰爭危險的鬥爭。現在就應當進行這一鬥爭，並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主要是及時制服侵略者，防止戰爭。

中共則強調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就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土壤。中共

認為有各種各樣的和平，有各種各樣的戰爭，把正義戰爭同非正義戰爭不加區別地混為一談，一律加以反對，這是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觀點，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中共強調對正義戰爭及人民革命戰爭，必須給以全力支持，更認為由於蘇聯軍事力量已領先美國，可以阻嚇資本主義國家發動全面大戰，所以局部戰爭不致擴展為世界大戰。蘇聯雖亦聲稱支持正義戰爭，但卻恐怕因此而觸發核子大戰，因為任何一個小小的局部戰爭都有機會成為引起世界大戰的火種。

第三是有關和平過渡問題。蘇聯認為在各西方國家中，共產黨革命策略將會越來越多樣化，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同內戰連在一起。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在它先鋒隊率領下，目前已經有可能把絕大多數人民團結在自己領導之下，取得議會中穩定的多數，並且使議會從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構變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

中共則強調暴力革命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中共認為迄今為止，世界歷史上還沒有過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先例。因為統治階級是不會自願讓出政權的，所以在剝削階級對人民使用暴力的條件下，就必須考慮另外一種可能，即非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

第三節 國家利益衝突——中蘇全面分裂經過

上面指出的意識形態分歧實不足以導致兩國外交破裂，因為國家利益才是外交決策考慮之重點。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中蘇兩國在許多牽涉本國利益的重要問題上產生衝突，最後引致全面分裂。

一 兩黨關係的惡化

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宋慶齡、鄧小平等再訪蘇聯，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次世界共黨大會。當時中共曾與蘇聯討論和平過渡及個人迷信等理論，以及蘇聯援助中國推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等問題，然而，赫魯曉夫預計在大會上將得到大多數與會者認可其政策及人事調整，故

一定要毛澤東先贊同和平共存政策，方討論經濟援助中國等問題。從會議發表的共同宣言得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各不相讓，以致使宣言中同時列出以中蘇兩國為主流的不同觀點，而在另一方面，毛澤東所要求的經濟援助亦落空。

毛澤東回國後，於五八年五月便決定了推行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開展大躍進計劃，這些政策推行當然有很多客觀原因，但其中一個理由是中國希望蘇聯知道，她可以利用自己國內力量，獨立自主地建設經濟。對於大躍進的發展方針，赫魯曉夫當然不以為然，五九年一月他曾不指名地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為「平均共產主義」，「性急而匆忙地實行不成熟的東西只會歪曲和敗壞我們的事業。」

在這裡有一點值得提出的，便是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個人關係。一開始，他倆相處得並不好，誰也不服誰。赫魯曉夫倚仗著蘇聯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以國際共產主義領導者身份自居。在毛澤東方面，他對蘇聯領導人一向以來「擺架子」的做法不滿，例如毛澤東曾批評米高揚說：「他罷老資格，把我們看做兒子。他擺架子，可神氣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來西柏坡的時候，架子就很大……」至於中蘇關係，毛澤東自嘲地指出：

「什麼兄弟黨，只不過是口頭上說說，實際上是父子黨，是貓鼠黨。」「我對米高揚在我們八大上的祝詞不滿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議。很多代表都不滿意，你們不知道。他擺出父親的樣子，講中國是俄國的兒子。」（註十四）

而自從史太林死後，毛澤東就成為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最有權威的領袖，在整個國際共運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並無他對史太林那樣尊敬，而赫則認為毛是一個史太林式的、粗魯的獨裁者，赫曾批評毛澤東：「與史太林一樣患了自大狂症。他用病態的觀點看其他人。」「他說話太像史太林了，這使我震驚。……他把任何事都塗黑，對什麼東西都不說好話。」五六年蘇共二十大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導致中共黨內採取限制黨領袖權力的措施，客觀上觸動了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問題

的心病。在史太林去世初期，赫魯曉夫為了鞏固其在莫斯科領導層的權力基礎，曾不惜以經濟利益爭取中共的支持，然而，當他的地位鞏固後，他便再也不賣中共的帳，並經常強調不能有餽贈。在另一方面，在眾多的國際問題上，中國極希望走自己的路，擺脫蘇聯的控制，雙方的分歧就自然加深，而兩人性格的衝突更使分歧引向極端，甚至出現意氣之爭的局面。中共曾批評赫魯曉夫一而再、再而三把兄弟黨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親。中共進而抨擊赫魯曉夫沉醉於這種封建主義的自大狂，簡直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蘇共領導根本不把兄弟黨協調一致的原則放在眼裡，從來習慣於獨裁專橫，發號施令。他們任意撕毀兄弟黨的共同協議，擅自對兄弟黨有重大影響之問題作出決定，強迫兄弟黨接受既成事實。

二 中蘇對攻打台灣的嚴重分歧

中共領導人一向視統一全國、解放台灣是其神聖的任務，五四年九月，中共因為美國宣佈與台灣簽訂協防條約，憤而向金門、馬祖等島嶼開炮，以抗議美國干預中國的內政。五八年八月廿三日台灣海峽再度出現危機，中共希望迅速解放台灣而兩次導致雙方激烈的炮戰。

中蘇就攻台事件的分歧可追溯至雙方的外交路線，五八年七月，伊拉克和黎巴嫩出現革命、英美等國出兵干涉，引起了緊張的國際局面。為解決這次戰爭危機，赫魯曉夫主張召開有蘇、美、英、法及印度五大國首腦出席的高峰會議，以緩和緊張的國際形勢，以貫徹其和平共存的國策。然而，中國卻對解決事件的方法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觀點。在七月廿日，即赫魯曉夫提出五大國會議的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不能袖手旁觀〉的社論，說「帝國主義者從來就是欺軟怕硬，只承認力量的。只有進行堅決鬥爭，才能教訓這些慣於進行侵略、干涉和戰爭冒險的帝國主義強盜，迫使他們接受和平。」中共「堅決鬥爭」的方式，就是乘美國專注於中東事務時，先攻取靠近大陸的金門馬祖諸島，從而攻佔台灣。對中共來說，這策略不單可完成統一的神聖任務，更能如毛澤東所說的「搞點緊張局勢」，「踢他(欺侮中國的美國)一腳」，假若美國回師協助防守台

灣，則亦可分散美國的注意力，援助中東的革命。從蘇聯的角度來說，攻台不單不能迫使美國接受和平，更會把戰場擴大，將局部戰爭演變成世界大戰，加深危機，這和蘇聯主張緩和國際緊張局面的政策背道而馳。

蘇聯對中共於五八年八月攻擊金門馬祖、發動解放台灣戰爭之事表示反對。蘇聯雖於九月七日致函美國對中共作口頭聲援，但實際並未作實質的支持，例如中共曾要求蘇聯履行五七年十月雙方簽訂的新防務協定供應飛彈，但被蘇聯拒絕。就蘇聯而言，發動對台戰爭將會令美蘇關係惡化及直接衝突，蘇聯批評中共此舉正好迎合美國軍事集團的意圖，因為美國當時正致力打擊蘇聯力圖消除國際緊張局勢的方針。而毛澤東在此時刻採取此強硬政策，客觀上將加深蘇美的對立，並由於蘇聯和中共的條約關係將使遠東地區的衝突擴大到兵戎相見。蘇聯不滿中共在這樣嚴重的政治事件上竟不先與其商量，蘇共更批評在五八年七月底，毛澤東和赫魯曉夫曾於北京會晤，當時中方正部署戰爭，但毛澤東並未向赫氏透露，足見中共居心不良，硬要把蘇聯拖到大戰的邊緣。後來蘇聯領導人蘇斯洛夫便猛烈抨擊中國政府從一九五八年開始，以自己的未經協商的行動在國際舞台上不僅給蘇聯，而且也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困難。

無論如何，五八年的攻台事件，對日後中蘇關係產生極大的影響。蘇聯批評中共罔顧全局利益，為了幾個島嶼就不惜將盟國拖入戰爭。而中共則責備蘇聯只懂得向美國投降、拉關係，破壞中蘇合約，不援助正義的反帝戰爭，背棄社會主義的理想。

三 建立聯合艦隊及廢除「國防新技術協定」的鬥爭

攻台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年，於五九年六月間，蘇聯片面廢棄五十年十月中蘇雙方簽訂的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後來蘇聯解釋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國當時不具備核生產條件；二是能造二三個原子彈並不能解決問題，反給經濟造成巨大消耗；三是中共明智的政策應是發展經濟文化，提高人民福利。

然而，中共則認為蘇聯緊緊地抱著自己的核武器，唯恐旁人也有，打破他們的壟斷地位。中共更批評如果蘇聯認為假若中國搞出兩三類原子彈，帝國主義就會用許多原子彈對待中國，這實際上是挑唆帝國主義用原子彈來威脅中國。中共並指出蘇聯撕毀協定的真正原因，是由於中共於五八年拒絕蘇聯企圖從軍事上控制中國的要求所致。

五八年七月廿一日，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向毛澤東轉達了赫魯曉夫關於蘇聯同中國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的建議，并希望周恩來、彭德懷去莫斯科進行商討，毛澤東當即表示：「首先要明確方針：是我們辦，你們幫助？還是只能合辦，不合辦你們就不給幫助，就是你們強迫我們合辦？」（註十五）

實際上，毛澤東對蘇聯提議共同「合作」建立聯合艦隊的建議十分惱火，在七月廿八日與尤金大使的會談中，毛澤東猛烈批評蘇聯過往對中國的橫蠻態度，並指出他之所以批評蘇聯：

「都是由於搞核潛艇合作社引起的。現在我們決定不搞核潛艇了，撤回我們的請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線交給你們……不要混在一起搞，你們搞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我們總要有自己的艦隊，當二把手不好辦。」「為什麼現在又搞海軍合作社？你們建議搞海軍合作社，怎麼向全世界講話？……搞合作社有一個所有權問題，你們提出雙方各佔百分之五十，你們昨天把我氣得一宿沒有睡覺。」（註十六）

有些分析家更指出，中共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反彭德懷鬥爭，與中蘇分歧亦有一定的關係。五九年四至六月，彭德懷應邀往東歐及蘇聯訪問，六月十四日返國，六月二十日蘇聯即通知中國撤銷「國防新科技協定」，七月廬山會議中彭德懷發表了反三面紅旗運動的談話。由於彭德懷就三面紅旗的言論與赫魯曉夫某些觀點不謀而合，而且在軍事上彭亦主張實行蘇軍式的一長制，故被視為親蘇分子而遭罷免。中共於一九六四年指出，「赫魯曉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對中共中央領導同志表示，中國共產黨內的反黨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讚揚中國的反黨分子攻擊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說什麼這是『有足夠的勇氣』的行

動。」(註十七)一九六七年文革期間，《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彭德懷的「『反黨活動』，有蘇聯的赫魯曉夫撐腰打氣。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跳出來以後，蘇聯赫魯曉夫就公然無恥地吹捧彭德懷是『正確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事實十分清楚，彭德懷就是配合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裡通外國分子。」

四 中蘇於中印邊境糾紛及處理古巴危機之分歧

五九年三月，西藏發生動亂，離心分子宣佈撕毀與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三月十七日，達賴喇嘛等人逃往印度，在印度境內與美國及國民黨拉上關係，導致中國政府很大不滿。同年八月，中印軍隊在朗久地方首次發生衝突，蘇聯政府於九月十日發表一篇呼籲和平調處的「中立」聲明，說蘇聯的領導人深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不會容許此事件成為那些不要緩和國際局勢的勢力藉口，以坐收漁利，因為國際局勢的尖銳化，正是此等勢力不欲緩和國與國之間緊張局勢的目的。中共對於蘇聯此種中立的態度，十分不滿，中共指出：「在這一天，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顧中國方面多次說明真相的勸告，迫不及待地通過自己的國家通訊社對中印邊界事件發表了一項聲明，這個聲明不問是非曲直，對中印邊界衝突表示『遺憾』，實際上指責中國的正確立場……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遭到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武裝挑釁的時候，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但不指責發動武裝的反動派，反而指責自己的兄弟國家，這在歷史上倒真是第一次。」

五九年九月底，赫魯曉夫以此聲明為「見面禮」，到美國和艾森豪威爾總統舉行大衛營會議。十月初，赫魯曉夫乘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十週年紀念時，再度與毛澤東會談，赫批評中共「像公雞好打架那樣熱中於戰爭」，並勸毛澤東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更需對印度和解與讓步。印度政府明顯得到蘇聯的暗中支持，故此不出一個月內，雙方又造成了更嚴重的武裝衝突，中蘇關係又進一步惡化。

一九六二年期間，基於大躍進的災禍及蘇聯的鼓勵，新疆地區爆發了「難民出逃」事件，使中蘇關係更為緊張。一九六一年，印度政府採取

「前進政策」，在中印東段和西段邊境的爭議地區內加強巡邏及建立武裝據點，使武裝衝突的危險增加。六二年十月，中印邊境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戰事，蘇聯更公開給予印度政府軍事及經濟之支持，十月廿三日塔斯社指出「蘇聯根據蘇印簽訂的協定，將幫助印度設計和建設一座生產軍機的飛機工廠，並為印度提供十二架米格二十一型飛機。」雙方衝突的結果是印度方面一敗塗地，中國軍隊在戰勝後立刻後撤至戰爭未爆發前的地點，並單方面宣佈停火。然而這次武裝衝突之後，中蘇關係便陷入低潮。

蘇聯支持印度對華戰爭的原因可總結為兩點：一是蘇印在對華邊界上皆與中國有所分歧，蘇聯支持印度迫使中國接受中印邊境問題之安排，可為將來中蘇邊境會談製造有利於蘇聯的先例；二是蘇聯極希望與美國緩和，但中印戰爭的爆發大大加劇了緊張的形勢，假若蘇聯緩助中國的話，將無疑迫使印度全面傾向美國，這亦影響了美蘇的政治平衡。

在中印武裝衝突的同時，爆發了轟動世界的古巴導彈危機。六二年蘇聯策劃於古巴興建新軍事基地，部署導彈，美國偵探到此事後，甘迺迪總統宣佈美國海空軍封鎖古巴，迫使蘇聯拆除新建的飛彈設備，兩國瀕臨戰爭邊緣。在千鈞一髮之際，蘇聯作出讓步，赫魯曉夫致函甘迺迪說，如果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以及制止其她的盟國對古巴侵略，則蘇聯準備從古巴運出被美稱為進攻性的武器。十二月七日，蘇聯撤走在古巴的轟炸機和火箭，美國乃於二十一日宣佈取消對古巴的封鎖。由於中蘇關係已在決裂邊緣，中國便乘此機會，發表聲明支持古巴，反對妥協，更發動群眾遊行，掀起反美浪潮。十一月初《人民日報》社論指出「任何談判和妥協，絕不允許拿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做交易」，次日，《紅旗雜誌》又指責蘇聯犯了「和平主義、改良主義、民族主義、人道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等錯誤。針對中國的批評，蘇聯於十一月開始回應，柯西金認為「在這種情況中，是誰向誰讓步了呢？我們認為是雙方的讓步，是對理智與和平的讓步」，完全是「明智的妥協」。蘇共書記庫西寧亦指出，中共當時的行為只是在帝國主義面前，「大膽的揮舞著口頭上的武器」，但對古巴卻無力提供一點實際支援。

五 嚴重的直接衝突——撤回專家、新疆事件及邊界糾紛

基於雙方國策的分歧與及各方面的利益衝突，中蘇兩國於六零年六月在由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針鋒相對，會後蘇聯突然知會中國，宣佈撕毀援助中國的六百個合同，撤走全部在華專家一千三百多人，并帶走所有的援建工程圖紙、計劃和資料，停止供應中國需要的設備，使中國二百五十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陷於停頓及半停頓狀態，給經濟建設帶來極大的損失。

後來中共在公開信中大力抨擊蘇聯背信棄義：

「你們強迫蘇聯專家中斷自己的工作，撤回蘇聯，使我們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學研究項目被迫中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入生產。你們這種背信棄義的行動，破壞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原定計劃，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巨大的損失。……你們的行為，充份說明了你們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相互援助的原則，把派遣專家當作對兄弟國家施加政治壓力，干涉它們的內政，限制和破壞它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註十八)

一九六二年九月，《人民日報》及《紅旗》同時指控蘇聯駐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新疆伊犁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並於四、五月間，引誘和脅迫幾萬中國人跑到蘇聯。當然，逃亡的原因不會因為是蘇聯的「引誘」和「脅迫」這麼簡單，更重要的理由是三面紅旗帶來的大飢餓、當地的回漢矛盾以及幹部與人民間的衝突。然而，這並不等於說蘇聯一點責任也沒有。從清朝開始，蘇聯一直希望加強對中國邊境地區的滲透和控制，這個政策在蘇聯十月革命後也沒有停止，四九年中共建國後，蘇聯對新疆基本實行兩項政策：

(1) 控制經濟命脈

由於中國的經濟政策及建設皆以蘇聯為藍本，這造成新疆的經濟極端倚靠蘇聯。蘇聯針對中國此弱點，在中蘇關係緊張時對新疆實行經濟

封鎖，停止各項援助及物資供應，使許多工廠生產停頓。此外，更斷絕對新疆的外貿關係，使新疆土產大量積壓無法銷售，凡此種種皆進一步加深了新疆的經濟危機，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也使人民與幹部的關係更為惡化。

(2) 進行顛覆活動

此項活動以北疆之伊犁與南疆之喀什為基地，聯蘇曾散佈分離主義思想，並支持六零和六一年於喀什和莎車的暴亂，驅逐漢人離開新疆，此兩場暴亂被政府敉平；而聯蘇於喀什之領事館亦被迫關閉。

基於上述情況與六二年的疆民逃亡事件，使中蘇走向直接衝突的道路。從一九六十年開始，中蘇的邊防人員經常發生武裝衝突，據中國於六四年二月致蘇共中央的函件中指出：

「隨著蘇聯領導反華活動的發展，近年來蘇聯方面不斷破壞邊境現狀，進佔中國領土，挑起邊境事件。更嚴重的是，蘇聯方面還明目張膽地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公然通過報刊和廣播，挑撥中國各民族的團結，煽動中國少數民族從祖國分裂出去，并且誘騙和脅迫幾萬中國公民跑往蘇聯。」(註十九)

據中國的統計，僅從六四至六九年三月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發生之前的一段期間內，蘇聯在邊境製造的衝突事件即達四千多宗，這些衝突都是蘇聯邊防人員入侵中國領土所引起。蘇聯方面則批評所謂邊境衝突，實是中國單方面要求歸還一些領土所引起，「在中共的民族主義分子轉而公開從事反蘇鬥爭後，他們即開始在蘇中邊界上製造人為的尖銳情勢，向蘇聯提出領土要求，并利用此一事件，以達其在國內煽起民族主義的反蘇情緒。」蘇聯更指出，「僅在一九六三年的一年之間，此種事件超過了四千多次。」

中國於中蘇邊境糾紛的基本立場是：不承認在清朝時由沙俄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不過中國了解蘇聯根本不可能放棄其佔領中國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故此，中國並不堅持收回因這些條約而失去的土

地，而是希望以這些條約為基礎，採取談判方式解決邊境衝突。此外，中國還認為蘇聯多佔了超出這些條約所規定的領土，可是蘇聯的領導人卻認為蘇聯和中國不存在任何領土問題，蘇中邊境是歷史地形成的，只可以說在必要的地方對邊界作個別的核定：「現在，工人階級掌握著政權，而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共產主義，它將使國界逐漸失去從前的意義，在這個時候人為地製造領土問題，簡直是不明智的。」既然蘇聯一直不肯從理論及實際上讓步，雙方的衝突便不斷加深，終於引發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戰役。

註 釋

- 註 一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九七一年，人民出版社，第267—288頁
- 註 二 〈中國共產主義理論文輯〉(之一)，一山圖書，第211頁
- 註 三 同上註
- 註 四 《周恩來在萬隆》，第6頁
- 註 五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153頁
- 註 六 三原《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信達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29頁
- 註 七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52頁
- 註 八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432頁
- 註 九 同註七，第326頁
- 註 十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 註十一 同註二，第288頁
- 註十二 同註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第3—16頁
- 註十三 同註八，第163頁
- 註十四 同註七，第324頁
- 註十五 同註七，第322頁
- 註十六 同註七，第328—329頁
- 註十七 同註二
- 註十八 同註二，第289頁
- 註十九 同註二，第287頁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 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成因與社會基礎
- 第二十四章 文革的醞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 第二十五章 文革的發動——評《海瑞罷官》到全國第一張大字報
- 第二十六章 環繞派遣工作組的鬥爭——批「資反線」與劉少奇的跨台
- 第二十七章 紅衛兵運動與劉鄧的反覆掙扎
- 第二十八章 文革期間的派系鬥爭——「保守」與「造反」
- 第二十九章 全國的大清洗——「一月風暴」與全國的奪權行動
- 第三十章 軍事幹部對造反奪權的反擊——「二月逆流」與「三月黑風」
- 第三十一章 中央文革再度「支左」，引發大武鬥與武漢兵變
- 第三十二章 最高戰略部署——妥協局面與「新思潮」的湧現
- 第三十三章 大鎮壓、剷平山頭與文革的結束
- 第三十四章 文革期間極左思想統治下中國人民的心理狀態
- 第三十五章 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 第三十六章 總結——對文革的簡短評論

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成因及社會基礎

導 言

被執行改革開放的中國政府評定為「十年浩劫」的文革，是中共建國以來一次最複雜、影響最為深遠的政治運動。上億的群眾瘋狂地介入、國家領導人被批鬥、群眾組織間爆發激烈的武裝衝突、以及在一九六八年文革後期的大鎮壓等，皆使中國出現很多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劇，而左傾思潮的泛濫及社會的動亂亦使中國經濟及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出現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

現時文革已正式成為史實，而我們亦有責任冷靜地思考，從這政治運動的進程中反省一下中國存在著的問題。究竟文革的產生是否只是一小撮野心家如林彪及四人幫等篡黨奪權的詭計？若是這樣簡單，則為何文革能夠引起數以億計的人民沉醉的參與呢？文革究竟是否真的全無是處？還是留下一些不容否定的歷史教訓？此外，最基本及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歷程究竟是甚麼的呢？

文革這一篇主要分為五大部分，一共十四章，第一是文革爆發的成因及社會基礎，第二是深入地討論文革的歷程，第三將會探討一下文革期間市民的心態，第四是分析文革的影響，最後則是評論。這一章希望以一個宏觀角度，從經濟及社會基礎等方面去討論文革，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把文革的歷程介定為從一九六二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至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共黨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作為結束，而往後的林彪事件、四人幫與穩健派的鬥爭等則被視為文革的延續。

討論文革成因時，有一點是特別值得留意的，就是我們不能將文革的出現完全歸咎於一小部分現時被批判為野心家的中央領導人，隨心所欲地發動的運動，否則我們將無法解釋為何這麼多的群眾會介入文革。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以及從群眾廣泛的參與來看，這次運動肯定有深厚

的社會基礎。此外，野心家或個別中央領導人的願望雖然對文革的進程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這並不等於說文革期間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皆被這些領導人控制於股掌之中。從文革的實際歷程可得知，當時發生的很多事件都不是以領導人的願望為依歸的。

一 毛澤東、劉少奇建國路線之分歧

(1) 毛澤東的平均主義理想

中國共產黨自建國以來，即在如何達至一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上出現內部分歧。以毛澤東為首的激進派(理想主義者)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後，社會上仍然存在著激烈的階級鬥爭，其主要原因為：

1. 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總是千方百計希望復辟

毛澤東曾警惕地指出：

「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但是對於這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鬥爭，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註一)

2. 社會主義也會出現新的階級分化

由於社會主義仍存著小生產(例如個體經濟)，及實行按勞分配(即每個勞動者皆有按自己勞動的數量，而取得等量報酬的權利)。然而，由於每個勞動者的體質及其他條件的差別，再加上家庭負擔不同，他們實際上所取得的報酬是不平等的，有部分人由於享有較優厚的條件而得以累積較多資金，而形成階級分化的基礎。

基於上述分析，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雖然消滅了階級，但是在

發展過程中也會有某種既得利益集團問題……例如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對他們很有利。」^(註二)據毛澤東等的邏輯來說，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將他們的利益傳遞給他們的親戚、子女及朋友時，他們便會發展為一新階級。而這些新資產階級的黨內代理人便是毛澤東大力批判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劉少奇及鄧小平等。

除上述兩個分析外，毛澤東對階級問題的理解在建國後有進一步發展，以往毛澤東主要是從經濟角度分析階級，以辨別敵我關係，即階級鬥爭主要是一些經濟階級集團(如工人、農民)打倒另一些經濟階級集團(統治階級如地主、資本家等)。然而，到了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發覺雖然國家推行了全民所有制及集體所有制，但是人的劣根性(自私自利的自我主義)卻未消滅，任憑它繼續發展將使中國重新墮入萬劫不復之境地。毛澤東發現地主、資產階級經濟集團雖被消滅，但這並不等於社會上便沒有階級鬥爭，小生產及按勞分配將會使富有者變為新的統治階級，社會嚴重分配不公的情況會再度出現。故此，毛澤東認為要達至一個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所需要的不單是豐富的物質基礎，更重要的是一个完美無私、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人格。從上述觀點出發，中共自建國以來，一直都進行一些政治運動，去改變人民的思想，防止人民的思想走向修正主義(即自私自利的思想)，從而形成了毛澤東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基於此，在六七年五月，正值文革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毛澤東曾作出引導性的詢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甚麼？」，當場有人答，是「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然而，毛澤東卻指出：

「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主要任務，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中央一再強調要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為世觀是不能強加的……世界觀不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能叫勝利呢？世界觀不改造，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兩千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註三)

從上述分析可以理解，為何在六六年八月八日，由中共中央通過的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一推行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中，第一段便是：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註四)

在具體政策方面，為臻美好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激進派強調平均式的經濟分配政策，以防止貧富懸殊重新在中國出現，他們更主張刻苦耐勞之無我精神，不計酬勞地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然而，正是由於他們對人性作出過份樂觀之估計，過份強調主觀能動性的作用，所以很多時候都不遵照人民的實際需要及感受來推行激進的經濟政策(如大躍進)，從而帶來經濟上消極的後果。

(2) 穩健派（務實派）的建設方針——重視物質刺激

至於以劉少奇為首的穩健派方面，則提出在五六、五七年間資本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各個企業推行國有化後，國內「敵人已經基本上被消滅……這『階級』兩個字是值得考慮了」，「公私合營以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也解決了」，因此，「國內主要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或者說基本上解決了」。既然地主及資產階級已被消滅，故此，劉少奇一派便主張中國當前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力。

在面對大躍進所帶來的經濟困難問題，穩健派採取了很多與激進派相對立的政策(更詳細的觀點在經濟大躍進時期一篇中的《經濟救亡運動》一章中已提及)，穩健派與激進派最為對立的幾點包括下列兩項：

1. 強調「單幹」及「包產到戶」

劉少奇曾主張「工業要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幹」；

2. 強調按經濟方法管理經濟

首先是物質刺激，例如劉少奇曾指出：「老老實實勞動的好好獎勵他一下」，「不加點錢，生產積極性不夠，不好好給你生產。」此外，劉少奇

還強調利潤掛帥，例如他指出：「一個工廠一定要賺錢，不賺錢就應關門，停發工資。」

（3）毛澤東對穩健路線的批判

為解決大躍進的難題，劉少奇的政策是十分合理的，實際證明一定要強調物質刺激、按勞分配，方可以刺激工人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而「包產到戶」及「單幹」等則可扭轉因人民公社制而導致的農業生產減少的困難。然而，就是這些針對時弊的救亡措施，引起了激進派大大的不滿，劉少奇的經濟路線遂被批判為修正主義，主因基於下列三點：

1. 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破壞

毛批評劉少奇推行三自一包政策（恢復自留地，自由市場，企業自負盈虧，推行包產到戶），將會瓦解集體所有制，而單幹風之盛行，更會引致兩極分化，毛澤東曾批評：

「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幹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註五）

2. 導致新階級的出現

在分配政策方面，激進派批判劉少奇大搞獎金掛帥，物質刺激，並推行高工資、高資金、高稿酬的「三高政策」，在分配上搞高低懸殊，強調個人主義，導致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分化，麻痺人民革命思想，導致政治醒覺下降。

3. 規章制度將把工人淪為工資奴隸

在工業政策上，激進派批評劉少奇反對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與勞動，工人參與管理，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而工人、幹部，專家共同治廠），而大搞一長制、專家治廠，否定工人是

企業的主人，試圖將社會主義企業滑入資本主義軌道。此外，激進派更批評劉少奇推行的「卡、壓、扣、罰」等規章制度是不合理，工廠可以開除工人，緊縮員工，實際上是把工人當成工資奴隸，把勞動力當作商品。

二 毛澤東大權旁落到爭奪黨的實際領導權

中國自從五六第八次全國黨大會開始，中共便根據蘇共領導階層的經驗，限制領袖個人的無上權力。在共黨第八次全國大會中，從黨章中刪除「以毛澤東思想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句話，並撤銷毛澤東兼任的、負責共黨實務的中央書記處主席的職務，並使書記處直接向政治局常委負責，這些制度上的調整使中共的管理模式從個人獨裁逐步轉變至集體領導。此外，隨著大躍進的三面紅旗政策的失敗，經濟上出現極為嚴重的危機，毛被迫放棄了國家主席的職務，而政治局更被分為「第一第二」兩線，毛澤東退到第二線，聲稱集中精力研究蘇聯變修的經驗，而將國家實際事務交予劉少奇及鄧小平等穩健派領導人管理。

務實派領導人的經濟政策雖然為中國經濟重新帶來了生機，但從毛澤東等理想主義者的觀點來說，限制人民公社的發展、單幹、鼓勵利潤及物質刺激的政策無疑會將中國帶至修正主義的深淵。此外，當時社會上一些輿論亦對毛澤東的權威作出直接的挑戰。例如劉少奇所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在六二年再版，特別的是書中增加了反教條主義、左傾主義的字句，劉少奇更批評了個人崇拜和無原則的黨內鬥爭，書中並指出：「我們黨員群眾不會擁護那種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有個人野心和虛榮心的人，來作我們的領袖。任何黨員都沒有權利要求其他黨員擁護他作領袖或保持他的領袖地位。」而在六二年前後，中國的學術界和文藝界，也出現了很多指桑罵槐的言論，直接或間接批評毛澤東的政策。毛澤東對此大為光火，故於六二年他曾猛烈批評道：

「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想要推翻一個政府，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形態。」(註六)

除了社會輿論對激進派的觀點作出隱晦性的抨擊外，毛澤東亦感到在大躍進後「大權旁落」，他的意見不被黨內某些高層幹部尊重，「我就感覺到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註七），「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鄧小平對我是敬而遠之。」（註八）在文革期間，江青亦曾批評鄧小平道：

「鄧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一貫獨攬大權，擅作主張，和毛主席分庭抗禮。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開會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時，鄧小平不向毛主席請示，擅自決定會議的一些重要問題的安排。毛主席批評說：『哪個皇帝決定的？』一九六四年，毛主席還嚴厲地批評鄧小平是一個獨立王國。但是，鄧小平頑固地抵制毛主席的批評……毫無悔改之間。」（註九）

在一九六四年時，毛澤東曾發動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但鄧小平卻公然反對，並批評道：「現在沒有人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演戲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註十）此外，鄧小平更批評自從六十年代社會開始的神化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現在苛捐雜稅太多，亂抓亂管。有的機關每天下班後規定學習毛選……其實，效果很差。是在那裡搞疲勞戰術，實際上是社會壓迫。」（註十一）

面對輿論的批評及黨內高幹的抗拒，毛為繼續推行其建設社會主義的理想，於是發動了文革。當然，當年積極支持文革的幹部如林彪、康生及四人幫等皆有一定程度上的野心，希望藉文革進行清洗計劃打擊異己，從而掌握黨的實際領導權，故此在整個文革的進程，一些被整肅的幹部遭到極不人道的迫害。

三 批判官僚主義與大清洗的計劃

文革的目的除了是鬥爭黨中央與毛澤東建國政策不同的所謂「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外，還以批判官僚主義為號召，從而贏得億萬群眾的響

應，中共更開展了範圍牽涉奇廣的全國大清洗計劃。

官僚主義一向是中共高層打擊的目標，例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後，中國也爆發了學生罷課及罷工的事件，毛澤東認為「鬧事的直接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因此，毛澤東說「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註十二)然而，就官僚主義的定義而言，則有下列兩個不同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幹部的特權與作風。早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即指出：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自滿的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增長」，後來，他更批評有些幹部「自私自利，假公濟私、監守自盜……作奸犯科，投機倒把，危害黨國，壓制民主，打擊報復，違法亂紀，欺負群眾」(註十三)

此外，在對待群眾方面，官僚們「唯我獨尊……動輒破口罵人，作風粗暴」。(註十四)，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曾舉出一個很生動的例子，「在我們這次會議期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裡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註十五)以上的情況，反映了群眾與領導幹部間之鴻溝及緊張關係，作為黨的領導人，毛澤東當然是希望改變這種情況，保證民意能及時上達，使社會矛盾不致進一步加深。

第二個層次為「科層化」的官僚制度(筆者按：這裡提出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是中立名詞，它與壓迫群眾的官僚主義不同，官僚制度一詞並無貶意)。隨著社會的發展，企業及國家的組織規模漸趨龐大，出現強調專業分工的科層化的官僚制度是必然的趨勢。然而，毛澤東卻認為合理的管理模式需要強調群眾的參與，這種群眾導向的管理方式基本上是毛澤東所說的「兩參」：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毛思想者經常批評劉少奇等指出的「要鼓勵大家向專深方面發展，越專越好，越專越紅」、「應把更多的時間放在鑽研業務上」(註十六)等強調專業知識的觀點為修正主義。從毛的思想來說，領導幹部們應以群眾的身份，在基層工作，與普通市民一起勞動，又當兵、又當官。毛澤東經常鼓勵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主旨是希望能減輕上下階層的身份歧視，以防止特權階層的出現，

故毛澤東對「科層化」制度中強調的專業分工甚不以為然。

在對待幹部的特權與不良作風問題上，為純化共產黨的組織，無論激進派與穩健派也沒有很大的分別。然而，在「科層化」官僚制度問題上，彼此的分歧便很清楚了。穩健派認為「科層化」官僚制度是自然而合理的發展趨勢，是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然而，從毛思想者角度來看，過份強調專業、只偏重知識，將無可避免地為社會培養出一群精英分子，導致幹部與群眾的差距擴大，形成特權階級的基礎。

中蘇論戰期間，中國發表了〈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之公開信，信中詳細分析了蘇聯特權階層出現的情況，基本反映了毛派的思想，信中指出：

「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是由黨政機關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幹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的。」公開信並舉例指出：「烏茲別克一個絲織廠的廠長，同總工程師、總會計、供銷科長、車間主任等人結成一伙，成了新的企業家。他們通過各種關係套購了十幾噸人造絲和純絲原料，生產不入帳的產品。他們私自招收工人，實行十二小時的工作制。」(註十七)

究竟為何會出現以上情況呢？毛思想者認為這主要是高額薪金制的結果，他們指出：

「赫魯曉夫用所謂物質刺激，……不是縮小而是擴大極小部分人同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之間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有領導地位的蛻化變質分子……加劇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註十八)

從上述的分析得知，毛派認為新階級及官僚特權與作風的出現，部分原因是基於過份強調專業知識、分工精細的科層制度、物質刺激及高工資等政策之結果，換句話說，就是背叛了社會主義。故此，假若繼續執行劉少奇的經濟政策，毛澤東就恐怕：

「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那就不要很多時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註十九)

要徹底批判官僚主義，清洗黨、政府、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毛澤東強調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他說：「我國人民靠人民群眾，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一種重要的革命鬥爭形式。」(註二十)基於清洗官僚的原因，在文革期間毛澤東號召群眾造反，批判各級政府官員，從而達到純化黨組織，防止中國走向修正主義的目的。

然而，就文革的成因是為打擊官僚一點，曾經歷過文革的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王希哲表示他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他指出毛澤東不討厭官僚制度，他發動群眾造反，以由下而上的方式批判共產黨員，是他嫌黨內「存在著一種反對他的力量，使他不能過於隨心所欲地擺佈人民的命運」。(註二十一)中共在建國初期，毛澤東曾以「救星」的身份出現，扮演著一個新創造的國家的價值與原則的化身，然而，在同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亦變成中國合法統治的核心。由於政府和黨的工作已逐漸走上正軌，因此國家亦有明顯的需要，把毛澤東個人的吸引力與號召力轉移給整個共產黨，使國家制度走向更合理化的道路。故此，在五十年代中期，當政府官員或共黨幹部的力量日益增長的同時，毛個人的吸引與號召亦已實質上移轉為整個政府制度所取代。此外，自從大躍進運動後，黨內很多幹部皆對毛澤東激進的經濟路線作出保留，故此，毛澤東希望以黨內和平民主合法鬥爭方式去改變劉少奇路線已變成無能為力了。要推翻劉少奇路線，既然不能倚靠既存的制度，留下來的唯一方法便是發動群眾，以鬥爭官僚為藉口，把反對毛激進路線的幹部打倒，從而使其路線得以貫徹。故此，甚至可以這樣說，毛澤東利用十七年來人民積累起來的對中共幹部及政策的不滿，發動群眾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打擊對手。

就是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可以看見在文革中毛澤東訴諸群眾造反的方式受到掌握政府實際行政權力的各級幹部反對，為務求使這種反對群眾運動的力量能發生最大實效，各級幹部利用整個黨的力量控制局勢，去防止毛支持的群眾運動擴大。故此，在文革初期劉少奇就派出以黨員為核心的「工作組」到各單位「領導」文革，其實際動機是希望把運動局限在黨可以控制的某一範圍內。然而，毛澤東卻正好相反，他希望群眾能「踢開黨委鬧革命」，鼓勵紅衛兵批判劉少奇提出的要求黨員服從黨決定的「馴服工具」理論。毛曾指出「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持抵制」，「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甚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不是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提倡奴隸主義。」

四 針對蘇聯而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論

中國在國際舞台方面，自從一九六二年與蘇聯公開分裂以後，在國際舞台上十分孤立，中國與蘇、美、英、日等國家的關係都鬧得很不愉快。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傾向蘇聯。此外，中蘇兩黨之論戰升級為兩國的爭端，促使蘇聯不斷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這就迫使中國開展反對蘇聯侵略的鬥爭。在這情況影響下，中國遂開展了反修防修(指反對蘇聯)的運動。

一九六三年以後，國際反修鬥爭的持續與一系列反修防修理論的提出，大大影響了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看法，為甚麼蘇聯會由兄弟國家墮落為「任意干涉兄弟國家內政，進行顛覆活動……把兄弟國家變成他們的經濟附庸……變成供應他們原料的基地」(註二十二)的侵略主義者呢？當時中國理論界指出這情況的出現是由於一小撮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黨政大權，復辟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蛻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社會，為著獲取更大的利潤，蘇聯的官僚大量地向國外輸出資金，擴張經濟勢力、企圖控制其他國家的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

既然修正主義就是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這就更鼓舞著充滿民族感

情的中國群眾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因為這鬥爭本身便是愛國主義及反國際孤立形勢的表現。此外，從批判蘇聯變修的過程中也引起了中國領導人高度的警惕，擔心資本主義會在中國復辟，毛澤東十分擔心資本主義上台的危機，他曾指出「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不相信馬列，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註二十三)要防止中國步蘇聯的後塵，則必須在國內推行反修正主義的運動，故此，國內與國外反修的鬥爭便逐漸混為一體了。例如，在六十年代初期，毛在批評幹部作風問題時，便指出「死官僚主義者」的概念。一九六三及六四年，中國在批評南斯拉夫及蘇聯的國家體制時，提出了「官僚資產階級」及特權階層的概念。當這些概念運用到分析國內的情況時，就很容易把一些推行較實務經濟政策的領導人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以上的分析，文革從某一角度來說是一個反侵略、強調民族主義、吸收蘇聯變修教訓，以及把國際反修防修連結國內階級鬥爭的政治運動。

五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與發動

以上討論文革成因的四點，主要指出毛澤東認為國家實際領導權被修正主義者把持，故有需要發動一場政治運動，去清洗官僚及防止國家「變色」。然而，毛澤東究竟憑甚麼能力將這主觀願望化為實際行動呢？林彪對此有了適當的說明：「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靠兩個條件：一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威望；再是解放軍的力量。在這樣兩個條件下，我們才敢放手發動群眾。」(註二十四)林彪所提出的第一個條件，毛的個人權威和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偶像地位，實是發動群眾、衝擊官僚、打爛黨組織的一大政治力量。前面曾經分析過，在五十年代中期開始，黨和國家的「制度權威」已逐步取代領袖個人的權力，大躍進失敗後，更使各級幹部對激進經濟路線作出保留。面對這種情況，要徹底推翻劉少奇路線，在制度內已無可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倚靠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發動黨外的力量，利用群眾推翻現存黨組織，然後重新建立一個真正以毛思想為依歸的共產黨。

基於個人崇拜對理想主義政策是否能被貫徹執行有極大的重要性，故毛曾指出：

「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甚麼不崇拜呢？」（註二十五）

在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時，承認中國有個人崇拜，毛並認為當時需要有更多的個人崇拜，他更指出，蘇聯赫魯曉夫垮台的原因是因為他完全沒有搞個人崇拜。十分明顯，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十分明白自己的處境，他要通過「造神運動」來積聚力量，號召全體人民起來反對劉少奇的實務經濟路線，可以說，毛採取個人崇拜的策略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理性決定，是一種推倒政治對手的有效鬥爭武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經濟建設的成果與及國際地位的上升，使毛澤東於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不斷提高，尤其是經過廬山會議，林彪取代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後，他在軍隊及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高潮，毛的著作大量發行，他的思想也被神化了。例如，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曾指出：「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軍隊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第二個條件，經歷過解放戰爭，「槍桿子裡出政權」，毛澤東當然明白軍隊的重要性。然而，毛澤東亦了解到劉少奇及其他穩健派領導人在軍中的影響力也很大，不少軍隊中的高級幹部和其他黨和政府領導人一樣對激進經濟政策產生很大的反感。故此，毛澤東在罷免彭德懷後，就委任那位一次又一次對毛澤東稱頌的林彪為國防部長、軍委會副主席，並鼓勵林在軍內大搞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以便進一步樹立其個人威信，保證軍隊永遠對他本人效忠。一九六一年初，林彪在〈關於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強調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重要性，是要「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四月，

林彪在部隊中又指出「部隊的每一次政治思想教育，都必須以毛主席的著作作為思想指導。」

這樣，毛澤東遂被描繪為智慧、偉大和慈父型的人物。他的所有演說、文章及評論，無不被尊為傑出的著作，而從軍事、政治直到藝術文學及日常生活經驗，他都被稱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神話人物。對毛澤東崇拜的高潮，可算是出版《毛主席語錄》的時刻，解放軍報從一九六一年五月開始刊登了毛澤東的講話，直到六四年五月，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解放軍報刊載過的語錄，補充編成《毛主席語錄》一書出版，引起全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當時，差不多全國人民皆手持一本毛語錄，在群眾集會及相聚期間，他們會高舉毛語錄，而在普通朋友交談、到商店購買東西及乘公共汽車，大家少不免隨口背上幾段毛語錄，以表示對最高領袖的無限忠誠。在得到市民絕對的支持下，毛澤東便開始放手發動群眾，推行他的大清洗計劃了。

現時文革已過去了，極端個人崇拜的時代已一去不返，然而，文革的歷程值得我們思考究竟基於甚麼原因造就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熱潮呢？

(1) 歷史的因素、中國傳統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

正如中共於八一年歷史決議指出的「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制，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份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註二十六)

(2) 黨對整個社會絕對控制的制度

中共的政治結構是金字塔型的，權力的頂尖是黨主席。四九年後，中國實行一黨專政，黨權遠超政府之上，黨絕對控制著一切。此外，社

會上各個基層組織如學校、工廠、生產隊等皆駐有黨的支部，全國的傳播媒介如報紙、電視、電台等亦為黨所控制。這樣，假若黨內缺乏制衡，不能實行集體領導而讓黨主席個人指揮一切，則他要推行一套思想、一套價值觀予人民，是十分容易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中，領袖和黨的關係未能正確地解決，蘇聯在史太林時期將所有權力集中於他一人之手，形成領袖終身制及集體領導的破壞，這樣，就為推行個人崇拜製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土壤。

(3) 中國革命的特殊情況——通過個人崇拜製造民族意志的集中點

一八四零年後的中國，國難連年，人民生活困苦，中國面臨亡國的危機，在這樣急迫的環境下，市民心中極渴望有一位民族英雄出現，以統一民族意志、喚起民族意識，以對外來不斷的挑戰作出有力的回應。四九年中共革命的成功，大大增強了毛澤東於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他們認為毛領導著共產黨，推行正確的路線，趕走了帝國主義。加上建國初期，經濟發展成功，人民生活改善，更加強了人民對毛澤東的信任，每一家庭、學校、工廠及公共場所皆掛有毛的畫像，他成為人民心目中衷心尊敬的偉人，例如《東方紅》的歌詞寫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可見毛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直到六十年代，美國採取圍堵中國政策，而中國亦與蘇聯公開分裂，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民族主義進一步膨脹，毛得以再用他的威望，成為民族意志的集中點。

很多心理學家指出，一般人相信英雄造時勢，在關鍵的時刻，人民需要堅決認同一位「領袖」，以達成某個政治目標，而這「領袖」實際上代表著群眾的「超我」，即群眾自身對權威崇拜的反映，這就是人民崇拜權威心理之所在。不少西方研究中國問題學者認為文革乃是典型的崇拜操縱，藉文革運動，群眾得以發洩其天生就具有的對英雄人物的敬畏情感。群眾似乎認為，只有在黨真正受毛澤東領導時，才不會出現問題。

其實，不單止一般群眾對毛澤東有著深厚的崇拜，就是連一些黨內最高級的幹部也對毛澤東有著深厚的感情，基於四九年前解於戰爭的經驗，他們對毛澤東的領導衷心的欣賞及敬佩，在國內最近出版的一篇報導文學中的描寫中，頗能反映當時高幹們的心情：

「在朱德的意識裏，也像許多老帥老將一樣，堅信毛澤東具有科學預見的才能，能夠在常人還不清楚的複雜的形勢下找到唯一正確的道路。毛澤東是他們心目中的絕對權威。失去對毛澤東的信任，也就失去了他們生命中最主要的支柱。」

「朱德雖然對文革產生了疑問，然而，他不斷趕走這些疑問，要自己相信最近的將來一定會證明毛澤東這一次又是正確的。……混亂的局勢就會明朗，就會發生奇妙般的變化。一定會這樣的！他深信不疑，心頭一陣輕。」

另外。文章還寫到毛澤東接見軍隊高級將領的場面：

「受到主席的接見——就是對元帥和將軍們來說，也是難得的一種榮譽，大家都感到一種突然攫住自己的激動情緒。……當毛澤東同志走進來的時候，四周就立刻響起熱烈的掌聲……接見是在親切的氣氛中進行的……毛澤東的講話……深入淺出。在他的前面，幾排折疊沙發椅上，隨『沙沙沙』的筆尖在紙上劃動的聲音，將軍們都在集中精力一字不漏地記錄著他的話語，就像新兵在重複班長的口令。」(註二十七)

雖然上述的描繪可能會有些誇大的成份，然而，我們卻無可否認，除了少數領導人如彭德懷、鄧小平、陳毅、彭真等敢對毛澤東的判斷當面據理力爭外，其他很多領導人皆由於解放戰爭的經驗，深深佩服毛的才華，或受他的領袖魅力所震懾，他們就算有自己的觀點，但對毛澤東下決心所作的決定皆唯命是從，不敢正面對抗。假若他們真的認為毛的決定不符合實際，他們亦只得表面奉承，而在實際推行上執行另一種路線以作抵制，運用陽奉陰違的策略，把毛的指示納入他們自己的構思當中。

六 文革的社會基礎——人民對社會不合理部分的回應

雖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起及領導的，沒有他最初的號召，根本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面，文革之所以能一經毛發動，便得到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的響應，實有一特定及深厚之社會基礎，而這就關係到人民對社會上不合理的制度的回應。

(1) 經濟上的成因，群眾將生活的不滿向黨發洩

在文革期間，我們可看見工人在這次運動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們大批離開生產崗位，迫使工廠停工，造成公路阻塞、停水、停電及交通意外等事故。在一九六六年底被中共批判為「經濟主義」風潮期間，工人不單離開工作崗位，還包圍銀行，紛紛提款，要求增加工資福利，訴新社會的苦，及「造無產階級的反」等。

工人對新社會的不滿當然是基於中國的客觀經濟條件先天性落後，再加上城市人口眾多，以致無法不實行如勞動部副部長指出的「我國的勞動工資的方針政策，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勞動工資政策。此外，中國政府長期實行著高累積、低消費的經濟政策，使工人的工資長期維持在低水平，得不到調整。然而，在勞動方面，由於激進經濟政策及官僚主義的影響，卻經常迫使勞動者需超時的工作。一九五六年六月《工人日報》承認「很多基層單位職工工作時間一般在十小時以上，有的長達十四、十五小時」，同時指出「企業的領導者熱衷於加班加點，把加班加點當成完成生產任務的竅門和捷徑……認為完不成生產任務是大錯誤，加班加點是小錯誤，寧願犯小錯誤，不願犯大錯誤。」一九五七年《工人日報》又指出：「煤礦工人的勞動條件很差，井巷長期不維護檢修，巷道積水過多，風量不足，淋水作業，煤塵和粉塵飛揚。由於勞動條件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煤礦職工患矽肺病、滑囊炎、風濕性關節炎、胃病等慢性病很多。」此外，報導指出很多幹部只重視生產，忽視安全，命令工人

冒險作業，引起工人很多的不滿。

由於大躍進經濟政策的失敗，六十年代初期，中國發生了大饑荒，這情況亦反映到部隊中，據南京某部隊坦克支隊指出「從春節到五一節，只吃過兩次肉，副食品供應不足，達不到坦克灶的標準。伙食管理也不好，按人分飯，有的不夠吃。因為營養條件差，坦克駕駛員的體力下降，很多人駕駛一個多小時就發生頭昏和嘔吐現象。」「目前幹部中的流行病不少，特別是肝炎。浙江省軍區十六個負責幹部中有七個人生病。其他地區領導幹部生病的也不少，有的甚至全家得肝炎。○九三七部隊秘書科全部得血吸蟲病。有些幹部因為子女多，糧菜不夠吃，直接影響到幹部本人的生活。」(註二十八)

軍隊及幹部的情況尚且如此，一般人民生活的苦況真是可想而知了。面對生活的困難，憤怒的人民會簡單地把所有苦難歸咎於統治者身上，例如四川的農民在一九六一年往偷挖軍隊的香蕉根而被勸阻時，便大發雷霆的批評道：「把你們養胖了，挖點香蕉都不准」，「和國民黨軍隊一樣！」「槍是嚇人的，老子不怕！」(註二十九)

經濟上的困苦往往是引發大動亂最根本的主因，上述工人、農民、甚至幹部的困境肯定會使他們對現政權產生不滿。然而，令分析文革的專家們驚訝的是，「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並非在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或者比較困難的局面下發生的，恰恰相反，是一九四九年來最繁榮的局面下發生的。」(註三十)在文革的前夕，即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這三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建國以來最快的，當時劉少奇等針對大躍進後的經濟困局，雷厲風行地推行著種種經濟調整政策，大大改善了市民的生活。此外，據一本描繪積極推行文革的康生的報告文學中，也從另一個側面中指出了經濟困境並非是導致文革的主因，文章指出在一九六一年江青曾與康生研究發動文革的問題：

「眼下時機不成熟」康生謹慎地說：「全國都在餓肚子，瓜菜代糧，人心思變，誰還那有份閑心思來關心甚麼罷官不罷官的問題。現在關心的是吃飽肚子的問題。」他勸慰江青說：「不必慌，再等等，經濟形勢好了

以後，政治問題自然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現在就要用心搜集材料，到時候，咱們一齊上，擔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註三十一）

雖然經濟上的困境並不是群眾支持文革的主因，但經濟學者朱嘉明卻指出由於六三至六五年經濟的好轉，使得那些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被掩蓋的經濟矛盾重新明朗化，這分別是吃飯穿衣問題並沒有最終解決、消費品還未能滿足市民的需求，能源仍然短缺，以及勞動者存在著追求物質利益的傾向，到文革前夕，勞動者提高收入的要求正逐漸普遍化。（註三十二）

此外，在分析文革的經濟成因，或為何有部分工人會積極參與造反時，實必須了解文革前中國社會裡最受剝削的城鎮臨時工及合同工。這些人有工人之實，但無工人之名，他們的待遇比起正規工人差別甚大，正規工人可享受免費醫療，分配到宿舍，能領退休金。然而，相比之下，臨時工和計件工的工資卻很少，工作毫無保障，還要受介紹單位的抽佣剝削。臨時工和合同工的制度在大躍進後被中共正式規定下來，當時由於城市人口過多，工作崗位提供不足，為安排城市工人就業，只得推行臨時工制度。劉少奇曾指出「我們現在只有一種勞動制度，固定工，有勞動保險，來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難。以後……要盡量用臨時工，合同工……就是用季節性的工人，有工作就來，沒有工作就回家。」（註三十三）臨時工、合同工的出現可說是一應急措施，但這些工人卻是經濟地位及待遇最低下的人。故當政治運動出現時，他們為爭取自己的權益，遂成為一股革命的力量，向工廠的領導要求改善他們的生活。

（2）群眾對官僚特權的回應

一九八零年，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曾猛烈抨擊官僚主義，除了好說空話、辦事拖拉及不講效率外，還「高高在上，濫用權力……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註三十四）。其實，中共四九年建國後不久，已發覺官僚主義問題十

分嚴重的了，例如薄一波在一九五一年「三反」運動大會上便指出：「現在，在我們黨內……相當普遍地滋長了貪污腐化的現象，有些人已經完全墮落，變成了偷竊國家資財的盜賊和損害經濟建設的叛徒了。」

在文革期間，一些高幹被批倒後，往往有很多描繪他們怎樣享受特權及魚肉百姓的資料出現，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從側面看出部份高幹的腐化生活及市民對他們的憤恨：

「在蔬菜淡季、暖房有二、三十種新鮮蔬菜，有時還滿足不了他的要求。只好到農業科學研究單位的試驗室打一些一寸多長的菜苗來炒給他吃，他仍不滿意。他吃的東西要有一定的溫度，熱也不行，冷也不行，稍燙一點就把碗一推，大發脾氣。」(註三十五)

「他興師動眾，下令所需食物要廣東出產的山珍海味和野生動物……結果從廣州運去的野生動物應有盡有，遙遙數千里上有專機空運，下有火車專卡，還有幾個幹部專為護送……專機和火車卡的運費就花了一萬七千多元，平均每桌宴會四千多元。」(註三十六)「四處動用國家公款，建築大量繁華的賓館、別墅……光一道橋就花了三百多萬人民幣。」(註三十七)

「這位市長老爺人老心不老……近年來被他奸淫的婦女就有四人……這個人面獸搞女人的手段，就是威迫利誘，軟硬兼施……他平時誰的電話號碼都不記，光記他經常玩弄的那些女人的電話。」(註三十八)

「在三年自然災害、國家困難時期，他一面號召青年……幫助國家解決困難，自己卻經常跑高級賓館，一次吃掉二、三十元(相當於普通工人半個月工資，或農民五個月的勞動收入)是很平常的……他住的房子，平均每八二十五平方米，超過一般居民十倍。」(註三十九)

劉少奇等的務實路線雖然為國家經濟帶來了生機，但總的來說，整個國家的吃飯穿衣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就在這個時刻，市民看到了特權階級的腐化生活，故當毛澤東號召他們批鬥走資派時，群眾長期積壓的

憤恨就像火山爆發般激發出來，猛烈批評官僚主義。在文革後期，出現了一股批判官僚制度的思潮，它指出：

「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為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資本家的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群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註四十）

（3）群眾對社會上的等級制度甚為不滿

早在五六、五七年鳴放反右運動期間，知識分子王尊就曾指出全國人民可分為四等。第一等最高貴的人是共產黨員、第二是共青團員、第三是民主黨派，第四是群眾。人民大學女生林希翎也指出中國並不是以德才衡量一個人，而是看資格、看是否是黨員、團員，在等級制度裡面，幹部發桌子、紙簍都分等級，等級制度已深入到各個方面。

對一般群眾來說，幹部享受特權，魚肉百姓，他們當然是恨在心裡，然而，這畢竟是他人的事。至於等級制度，情況就大大不同了，不同的級別不單影響著個人的地位，還實際決定了一個人的前途。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最受歧視的是所謂「黑五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及右派分子及其子女），由於社會經常強調家庭成份，這些出身不好的人，雖然幾經努力，也不能被社會所接納，文革期間猛烈抨擊出身論的遇羅克寫道：

「每年大學招收完畢，前高教部總發表公告：『本年優先取錄大批工農子弟、革命子弟』，不少大學幾乎完全不招收黑五類子女。」

「有位校長對青年教師說：『有兩個孩子同時說一句反動的話，出身好的是影響問題，出身不好的是本質問題。』」

「工廠這種現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幹部，幾乎無一例外是出身好的。……有的工廠還規定，出身不好的師傅不許帶徒

工，不許操作精密機床」，運動初期還有規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選舉權但沒有被選舉權……表現是出身的結果呢，還是出身是表現的結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財會、保管等各種工作，也不能外調。」(註四十一)

不公平的封建等級制度為每個人深深打了烙印，而在這金字塔的上層，牢牢地被共產黨員或各級幹部佔據著，故當毛澤東號召群眾造反時，很多以往由於出身不好而遭歧視的人熱烈地響應，異常地積極投入反特權階級的造反行動。

(4) 對長期思想、組織控制的反彈——青少年的革命心態

中共對青少年的政治教育十分重視，它著眼創造年青人的愛國心，忠於領導與組織，堅持集體主義，增加對公眾事務的興趣及參與，使他們熱衷於政治運動，加強對法令規章的接受，使他們尊敬黨和政府的權威。

「文革前，青年人透過共青團被控制在共產黨之下，做黨的馴服工具。劉少奇之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入共青團必讀的文章，內容無非要求年青人做黨的馴服工具，這點在入團宣誓中也可以見到。我自己離開學校後，亦是聽黨的召喚而去農村，而我所屬的軍區直屬農場，一切都聽團組織的支配。」(註四十二)

在文革前，年青人都缺乏個人自由意志：

「一個人從小到大，不能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包括教育，興趣、說話或沉默，以至職業、住宅、戶口、口糧，一切都是被決定的。」(註四十三)「中國的政制是絕對不容許民主、自由的，他們想為國家出力往往受到限制，比喻即使想做倒糞工人，為人民服務，也必須由勞動局分配，它不分配你，你甚至一輩子沒工作。」

除了不能自己支配命運外，青少年亦面對很窒息的社會環境：

「又有行政鎮壓的方法：向班主任提意見太多，會被批評，記過和入檔案，影響自己未來的出路。很多人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其實不過因為和黨的意見發生衝突……事實上，文革前未聽過有人向黨提出反對意見而有好下場。縱使提意見，也只能提如何更好地執行黨政策的方法，例如可以提意見如何學雷鋒，在大躍進時你可以提出折鐵窗鍊鋼的意見，但提反對意見就不行。」(註四十四)

由於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提意見就會被指為對組織不滿，故此，很多青年空有滿腔熱情也被迫憋於心。

在高中時，同學們學習政治多了，逐形成一種觀念，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非常完善的制度。但對比之下，卻經常發覺現實生活並非和想像中那樣美好，而在當時的制度下，不好的是不准提出的。故此，當時很多年青人都表示十分喜歡黨，喜歡毛主席，但卻不喜歡自己所處的黨支部或團支部，認為他們做的根本不符合社會主義。

文革號召年青人造反，對現行黨組織進行批判，這就給年青人一種擺脫組織控制的快感。文革期間，他們的思想與行為，很大部分都要由自己抉擇，他們可以批判以往對其控制的黨領導，可以公開地發洩長久積壓的不滿，可以四處走，甚至去全國串連。就這樣，文革在年青人的響應下，逐雷勵風行的開展了。

總結而言，文革的爆發不能單單歸咎個別野心家篡黨奪權的陰謀，它是兩條不同建國路線的結果。毛澤東深感大權旁落，為防止中國重蹈蘇聯變修之經驗，他遂憑其個人聲望，發動以批評官僚、鬥倒走資派為號召的清洗計劃，動員群眾。而普遍市民亦由於長期對社會上等級制度的不滿，對官僚主義的怨恨，及年青人希望決定自己命運等因素，一經毛澤東大力推動下，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遂開展起來。

註 釋

註 一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407頁

- 註二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同註一，第192頁
- 註三 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載同註一，第677頁
- 註四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 註五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同註一，第425頁
- 註六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載同註一，第435-436頁
- 註七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同註一，第658頁
- 註八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上的講話〉載同註一，第661-662頁
- 註九 郭志冰編《鄧小平》，中國文化中心，一九七七年，第21頁
- 註十 同註九，第23頁
- 註十一 同註九，第64頁
- 註十二 《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三57-358頁
- 註十三 中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編輯《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一山圖書供應公司，一九七五年，第102頁
- 註十四 同註十三，第100頁
- 註十五 同註一，第406頁
- 註十六 江蘇文〈駁匡亞明的智育第一〉，《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 註十七 《中國共產主義理論文輯》第258頁
- 註十八 同註十七，第262-263頁
- 註十九 〈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載有林、鄭新立等編《國史通鑑》第二卷，紅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524頁
- 註二十 同註十七，第276頁
- 註二十一 《王希哲論文集》，七十年代雜誌社，一九八一年，第108頁
- 註二十二 同註十七，第211頁
- 註二十三 〈毛澤東致江青信〉載《中國共產黨林彪事件原始文件彙編》第143頁
- 註二十四 〈林彪於六七年八月在軍委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載同註十二，第148頁
- 註二十五 同註一，第162頁
- 註二十六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註二十七 所國心、樂欣《活捉四人幫內幕》新秀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第32-33頁，53-54頁

- 註二十八 蕭華〈在南京地區部隊考察工作後向林、賀、聶副主席並軍委的報告〉
- 註二十九 《工作通訊》一九六一年第十五期
- 註三十 朱嘉明〈文化大革命——其經濟根源和經濟後果〉
- 註三十一 林青山《康生外傳》，第二〇七頁
- 註三十二 同註三十
- 註三十三 《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472頁
- 註三十四 《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287頁
- 註三十五 《彭德懷問題專輯》第四九〇頁
- 註三十六 註三十五，第92頁
- 註三十七 同註三十五，第500頁
- 註三十八 同註三十五，第504頁
- 註三十九 同註三十五
- 註四十 楊曉光《中國向何處去》載葉洪生編著《中國向何處去》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65-94頁
- 註四十一 遇羅克《出身論》
- 註四十二 《學苑》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八日〈紅衛兵談民主〉
- 註四十三 《國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吳畊訪問錄
- 註四十四 同註四十二

第二十四章 文革的醞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第一節 政策向左轉的標誌——八屆十中全會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是中國在大躍進失敗後經濟調整期間一次向左轉的標誌。大躍進失敗後，為挽救面臨崩潰的經濟危機，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及鄧小平等領導人推行了一連串救亡的經濟政策，在一些災情嚴重的地方實行分田單幹，大批人民公社被解散，在工廠裡推行崗位責任制，實行獎金制度，這一連串強調物質刺激的措施大大增強了人民生產的積極性，使國民經濟重見曙光。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中，毛澤東還對大躍進的錯誤進行自我批評，承認：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我注意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註一)

然而，事隔七個月，形勢就起了變化，毛澤東開始感受到劉少奇等的經濟政策將會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復辟道路，故在六二年八月六日黨中央北戴河召開的工作會議中，毛對單幹等問題作出極為嚴厲的批評：

「一九六零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於是提出任務：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一邊富裕」(註二)

毛並強調在社會主義中雖然消滅了剝削階級所有制，但並不等於解決了意識形態的問題，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鬥爭沒有了，毛澤東指出：

「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於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

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資產階級是可以再生的。」（註三）

此外，毛澤東又多次在會議小組上發言，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下階級還存在，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而這種鬥爭將貫徹整個社會主義時期，他還指出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這個工作會議以較長的時間討論了毛澤東的講話，並以他的發言為基調，為即將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開會文件。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正式召開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在開幕演詞中把階級鬥爭提到空前的高度，他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企圖復辟，所以，階級鬥爭：

「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註四）「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後，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餘，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甚至要復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這種反覆，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註五）

在階級鬥爭觀點的影響下，會議批評了「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把部分黨中央領導人對當時經濟困境真實的估計批判為只講黑暗，不講光明的「黑暗風」；把某些地區的農民和幹部為克服大躍進期間搞的平均主義而採取的、包括包產到戶等形式之「生產責任制」，批判為「單幹風」。當時積極推行包產到戶、以務實見稱的的黨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更被點名批判為「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準備的人」，後來，會議並乾脆取消了由鄧子恢領導的農村工作部；在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代表大會後，中共加快對在大躍進期間被批判為「右傾」的幹部平反。六月十六日，彭德懷給黨中央及毛澤東寫了長篇申訴書（即八萬言書），申訴他被指責的裡通外國、組織反黨小集團是不存在的。然而，毛澤東卻認為這

都屬於「翻案風」。他說：「近來刮平反之風不對，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因為他們的罪惡實在太大了，沒有審查清楚之前，沒有資格參加會議……也不要他們上天安門。」(註六)

由於毛澤東之無上權威，黨員就算有相反意見也不敢發表，況且，經過五九年彭德懷事件後，黨內民主實際上已蕩然無存。然而，由於大躍進後經濟情況仍異常惡劣，故毛澤東亦不得不同意劉少奇的建議，把經濟調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但是，毛澤東階級鬥爭的觀點卻引發以後階級鬥爭的理論不斷升溫，為文革的極左理論基礎作出了準備。

第二節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的導火線

一 「前十條」的提出——強調農村階級鬥爭

八屆十中全會後，一些地區如湖南及河北等省進行了「整風整社」和「社會主義教育」。河北保定地區進行小四清（以區別後來毛澤東的「四清」），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及清理工分，並查出一些幹部多吃多佔，貪污盜竊等行為。其實，小四清的出現是針對農村中欺壓群眾的幹部，以解決幹部與農民的矛盾。一九六三年，針對城市內的問題，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開展「五反」運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的指示，五反運動遂在城市中逐步展開。

根據各地運動的情況，毛澤東對十一個省作了調查之後，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杭州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前十條〉強調農村形勢已經好轉，而絕大多數基層幹部是好的，故強調要依靠農村基層幹部。在肯定農村幹部工作的同時，毛制定的〈前十條〉卻誇大了農村的階級鬥爭，並且斷言，進行階級鬥爭是農村中根本的問題，是關係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前十條〉最後引用了毛澤東對一個批語的話，指出如不搞階級鬥爭，「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卻不聞

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就是這樣，黨中央就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在全國人民面前提出，要求黨委重組革命的隊伍，推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以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

二 〈前十條〉與〈後十條〉的對抗

非常明顯，「四清運動」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已由一個針對基層幹部搞特殊化、多吃多佔及貪污腐化的鬥爭，上升為兩條路線的鬥爭，故「四清運動」的內容也正式被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

當時劉、鄧等領導人覺得〈前十條〉就階級鬥爭的提法實過於激進，但他們又不敢公然違抗毛澤東的指示，故只得運用陽奉陰違的方法，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具體執行時，納入他們原先設想的清理基層幹部的軌道。一九六三年九月，劉、鄧根據各地試點的經驗，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以具體政策來轉移運動的方向。〈後十條〉指出要把進行復關活動的階級敵人同那些一時糊塗而被敵人利用的群眾加以分別，要把投機倒把活動與正當的集市貿易加以區別。此外，劉少奇更號召幹部到農村具體解決問題，以推行「四清運動」。一九六三年二月，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樸，到河北桃園公社推行「四清」，當時劉少奇對王光美說：「做事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甚麼問題解決甚麼問題。」王光美到桃園後，發覺有些幹部在掌握實權後，便蛻化變質了，故她提出：「我們要解決怎麼把他們變回來這個問題，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的革命問題。」^(註七)桃園大隊原有四十七個幹部，其中竟然有四十人跟「四不清」拉上關係，而遭批鬥。

一九六四年九月，黨中央根據桃園經驗，正式公佈了〈後十條〉（修正草案），改變了原來依靠黨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改為強調扎根串連，放手發動農民，以解決幹部腐化的問題。文件指出「首先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農民群眾發動和團結起來」，「再進一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的幹部」。並規定整個運動由中央指派的工作隊領導，至於基層幹部，在分析調查後，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依靠。後來黨中央並指出「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

由於針對基層幹部以鞏固基層政權為目的之「四清」，以搞群眾運動的形式推行，再加上當時「左」的意識泛濫，故使運動的打擊面過寬。有的省領導人在給中央的報告寫道：「領導權不在我們的手裡，不是有沒有三分之一，而是不止三分之一的問題。」「出現了以基層幹部為代表的新富裕農民階層」，「社、縣、地、省的各級領導機關，都有一批人爛掉了。」，此外，由於整個運動由中央派遣的工作隊領導，一切權力歸工作隊，廣大基層幹部基本上只是「靠邊旁」，故形成了人人「過關」的局面。許多地方出現了鬥爭過火的現象，傷害了不少基層幹部。劉少奇後來在文革期間遭批判的時候，承認「對當時各地方許多單位的階級鬥爭的嚴重性也估計過份，對幹部中犯四不清錯誤的嚴重性也估計過份」(註八)

三 毛澤東的反擊——〈廿三〉條的出現

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修改〈前十條〉時，不強調批判資本主義，而把矛頭指向基層幹部的做法十分憤怒，他猛烈抨擊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四清工作」是「傾盆大雨」、「人海戰術」、「繁鎖哲學」、「神秘化」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他明確地下達文件廢止〈後十條〉，並於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會議中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廿三條〉)，後來周恩來透露：「在一九六五年毛主席擬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廿三條時，他已對劉少奇失去信心。劉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註九)

無可置疑，〈廿三條〉對打擊基層幹部過寬的問題有了糾正，〈廿三條〉中指出：

「幹部的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看待幹部，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對於犯輕微四不清錯誤和交待好的幹部要盡早解放出來。」

「不一定要十分乾淨。犯過錯誤的，也可以參加，一方面便於教育改造他們，另一方面，他們有些人可能熟悉內情，對工作有用處。工作隊要不斷總結經驗，定期整頓。」

然而，在另一方面，〈廿三條〉，卻又過份強調階級鬥爭，它批判了黨內對「四清運動」不同的看法，指出社教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明確指出：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陣地。」

並說資產階級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

「在上面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

這樣一來，就為文革期間衝擊中央領導的行動提供了合理基礎。

後來在文革期間，於六七年十一月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及解放軍編輯部名義發表的〈中國農村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文，對黨內是次鬥爭作了系統性的描繪：

「按照毛主席這條路線，就要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這個綱……就要依靠工人階級、貧中下農、革命幹部……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十條〉發佈不過四個月，他（指劉少奇）就急不及耐地炮製出一個〈後十條〉……用反革命釜底抽薪的手法，抽掉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這一根本內容，把毛主席在〈十條〉中所規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丟得一乾二淨。它打著要劃清『具體政策界限』的幌子，千方百計為農村資本主義勢力開脫……把矛盾指向貧下中農和好的比較好的幹部，以包庇走資派不被揭露……為此，他拿出壓制群眾，打擊幹部的手段，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掩蓋階級鬥爭，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過場……轉移鬥爭目標，打擊一大片，以保護黨內走資派，保護他們自己。」

四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衝突表面化

由於毛澤東深感大權旁落，加上他對劉少奇的不滿與日俱增，在六四年底一次聽工作匯報的會議上，毛澤東語帶諷刺的指出：

「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註十)

在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前，鄧少平以為是一般的匯報會，曾對毛提出，毛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毛澤東十分不高興，在會議期間，劉少奇不贊同毛澤東提出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觀點，而提出「情況很複雜，還是有甚麼矛盾解決甚麼矛盾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甚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毛澤東對劉的發言十分生氣，並說一個(指鄧小平)不叫我參加會議，一個(指劉少奇)不叫我講話。(註十一)毛澤東更拿著《憲法》與《黨章》在大會上質問我們這些人還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註十二)

六五年一月，毛澤東與一些省區的領導人談話，指出：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京，經過許多地方都沒聽到反應。」(註十三)

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再在大區書記會議上批評劉少奇：

「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會議寫出第一個十條，為甚麼剛過了三個月，九月北京又搞出個十條，只有三個月，那麼多經驗？」(註十四)

毛澤東更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一個是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註十五)

從以上〈前十條〉與〈後十條〉的抗爭中，可得知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已到白熱化，毛澤東更深感其意見不為中央的「獨立王國」及地方黨政領導人的接受，故他在此刻下定決心，一定要鬥倒劉少奇。

五 對四清運動的評論

第一，最初「小四清」的原意是針對農村基層幹部與農民惡劣的關係，希望能打擊基層中的官僚主義，鞏固基層政權。後來在毛澤東的介入後，使整個矛頭都變了質，變成打擊資本主義的運動。但劉少奇在具體執行「四清」時，強調清賬目、倉庫、財務及工分等具體問題，並命令基層幹部退還由欺詐而來的錢糧交予農民，這樣無疑對於解決基層幹部違法亂紀、強迫命令作風、經營管理混亂及嚴重損害農民利益等問題，起了很大的作用，並通過這運動緩和農村幹部與農民的矛盾，提高了生產的積極性。然而，由於以政治運動方式解決幹部的偏差問題，必然會造成一窩蜂處理的現象，禍及無辜及打擊面過大的情況無可避免。再加上當時此運動是在整個左傾思潮下推行，這就更容易將個別的錯誤無限上綱，導致嚴重地誇大犯錯誤者的力量，反過來使鬥爭更為廣泛。

基於此運動的教訓，將來為避免矯枉過正情況出現，當權者實不應以容易造成一窩蜂現象的政治運動解決問題。要打擊官僚主義或經濟犯罪，應採取加強法制及依法檢控等制度化處理方法，方可避免禍及無辜，造成冤案。

第二、在社教運動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劉少奇等以陽奉陰違、偷天換日的方法，接過毛澤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理論，而推出自己的綱領和方針政策，在文革進行期間，可以看到更多類似的現象。

在文革初期，如劉少奇的得力助手彭真主動領導文革五人小組，企圖將運動局限在學術論爭的範圍；劉少奇於一九六六年下旬派出工作組，進駐各校領導文革，希望將打擊對象轉移到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黑五類分子」，或對幹部作風不滿的人，從而保護後來被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幹部。一九六七年毛澤東號召全國奪權後，一些被批鬥的地方幹部也同樣地發動一向支持自己的群眾組織，進行「假奪權」，以

保留自己的實力。出現上述怪異現象的主因是毛澤東個人威望太高，他亦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真理」，在一九五九年彭德懷事件後，黨內民主實際上已蕩然無存，面對毛澤東種種政策，即使有不同意見，亦得無奈或「變通」的執行。當然，這樣的「變通」的方法也會出現很多問題，拋開更為助長領袖個人獨裁一點不說，繼續「變通」「執行」指示的領導必需盡力尋找一群代罪羔羊作為打擊對象，而為表示自己對領袖的忠心，打擊的程度有時更為殘酷。

註 釋

- 註一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於〈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413-414頁
- 註二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同註一，第425頁
- 註三 同註二，第424頁
- 註四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載同註一，第431頁
- 註五 同註四
- 註六 同註四，第436頁
- 註七 《造反有理報》第四五期特刊：〈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毒草〉，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 註八 〈劉少奇的自我檢查及供詞〉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
- 註九 法新社東京電，載於趙聰《文革歷程述略》第一卷，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第106頁
- 註十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602頁
- 註十一 同註十，第602-604頁
- 註十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131頁
- 註十三、十四、十五 同註十，第604頁

第二十五章 文革的發動——評《海瑞罷官》到全國第一張大字報

第一節 批評大躍進輿論的湧現

一 「以古諷今」的文藝作品之內容

在一九六二年前後，在劉少奇推行較為開放的文藝及學術政策的時刻，中國大陸的文化界及學術界分別出現很多影射大躍進極左政策及批評當時社會黑暗面的文學及學術著作。總括而言，這些作品以「借古諷今」之方法，將歷史事件加以修改，以戲劇及小說的形式發表。由於作品題目尖銳，表達形式新穎有趣，針對時弊的觀點呼之欲出，故能引起市民廣泛的共鳴。這些作品的內容主要來說環繞幾個問題，分別是：

- (1) 批評大躍進期間廣泛存在的浮夸風氣；
- (2) 針對在推行人民公社運動時，要求各生產隊將生產資料全數歸公，對推行平均主義而影響農民積極性的過左政策大力批評，並大力鼓吹退田（即自留地制度）及輕徭薄賦之恤民政策；
- (3) 就幹部與群眾對立的情況作警告，進而指出人民生活於水火之中；
- (4) 提倡風骨氣節，為一些反抗「皇帝」（實針對毛澤東），為民請命的而遭罷免的廉潔清官鳴不平，為他們的翻案作出輿論。

二 《海瑞罷官》等作品的內容與分析

當時學術界中，歷史學家翦伯贊大談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對農民的讓步政策，讚揚一些開明皇帝輕徭薄賦的措施，使農民能安心耕種。在文藝界中亦出現了許多劇本如《魏徵傳》、《謝瑤環》、《孫安動本》及《十奏嚴嵩》等，這些劇本多是描述一些廉潔清官的風骨氣節，為解決民間困苦，不惜得罪朝廷親貴，甚至冒死向皇帝上諫，為民請命。這些歷史戲劇的現實社會功能是十分明顯的，《謝瑤環》的作者田漢曾指出：「史劇作

家的主要任務，是在於根據歷史事實，創造出足以教育今天人民的動人的歷史人物形象」，「歷史劇照樣可以反映當前的現實鬥爭，也可能在一定情況下發揮強大的現實意義。」

當然，當時最受爭議的人物就是著名史學家、北京副市長吳晗，他參與執筆的專欄小品《三家村札記》成為後來在文革期間被重點批判的對象，而其京劇《海瑞罷官》則更為成為揭開文革序幕的導火線。在一九五九年中共於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期間，吳晗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海瑞的文章，而在六零年底，他更完成了歷史名劇《海瑞罷官》的劇本，頌讚海瑞這位明朝的清官。雖然遭朝廷罷黜，但吳晗仍指出他「縱然丟官不見諒，清名千古永流芳。」並指出「這年頭，越是好官，越要丟官。」為清官們喊冤叫屈，抱打不平。

雖然現時中國官方反覆強調「吳晗與彭德懷同志既無工作關係，也素無私人往來」，吳晗無意為彭德懷翻案（註一），但假若能詳細分析吳晗的作品，則可以感受到他是以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之胸懷，深感大躍進政策導致哀鴻遍野，民不聊生，而當彭德懷元帥將現實反映，以圖疏導民怨時，則竟被打擊、被罷官，黨內竟從反冒進即時轉變為反右，黨內民主被全面摧殘。當時由於形格勢禁，再冒險犯難只會帶來不必要的犧牲，故吳晗只得運用指桑罵槐的方法，引出自己憂國憂民的思想。他曾指出歷史和歷史劇「裏面的歷史人物決不是僵屍的復活，而是為活人服務」，「寫這個人、演這個人，都要著眼於他……對於後一代的人們的啟發作用。」由於《海瑞罷官》一劇於文革史上的重要性，故下面摘錄兩小段劇本之精華，以方便了解它為何能深入民心。

由於海瑞推行的平冤獄、退民田，嚴懲貪官的政策，侵犯了朝廷親貴的利益，故被誣告而遭免職，在他得悉罷官的決定時，仍然頂天立地，與奸官們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唱出社會的情況及他廣闊的胸懷：

「江南大害是鄉官 強佔民田稼穡難
冤獄重重要平反 退田才能使民安」

「居鄉里 縱子弟 田產豪攘

搶民女 行賄賂 喪盡天良
你縱然 使奸計 欺君罔上
誣蔑那 老百姓 如虎如狼……
我海瑞 丟烏紗 心胸開朗
有一日 再居官 重整紀綱」

第二節 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文革的正式發動

面對社會輿論隱晦的攻擊，毛澤東大為光火，再加上他認為劉少奇等之經濟政策將會把中國帶返資本主義，而在三面紅旗後，他於黨內威信及權力亦旁落。在社教運動中，他更目睹劉、鄧等領導人採取「陽奉陰違」方法，將鬥爭矛頭指向基層幹部，使他感受到再無法以黨內合法渠道，以由上而下和平罷免方式解決黨內「走資派」問題，從六二年至六五年期間，可以看到毛澤東已深謀遠慮地部署，準備發動一場推翻政敵的政治行動。毛澤東的部署計劃有下數點：

一 加強個人崇拜

毛澤東十分明白，既然在中央制度內已無推倒劉、鄧的機會，故只能靠他從建國以來便在人民心目中享有的崇高威望，發動制度外之群眾力量，向黨的組織施加壓力，迫使劉、鄧在社會大批判的衝擊下接受他的主張。

林彪在一九五九年出任國防部長後，與毛澤東互相配合，在解放軍中加強造神運動，反覆強調毛為當代最偉大的共產主義者，而軍隊指戰員應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在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又指示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這就等於要全民學習擁護毛澤東個人的運動。接著林彪更將毛著作中的精句，編錄為一本《毛主席語錄》，在軍中及全國大量發行，牽起了個人崇拜的高潮。就這樣，毛澤東成功地將黨和國家制度的權威重新轉為其個人威信所取代，群眾變為他的實力基礎。

二 逮捕羅瑞卿，鞏固林彪於軍中的地位

提出「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毛澤東十分明白軍隊的重要性，故他於軍隊中除加強造神運動外，更著手清除劉、鄧及對其政策持異議的軍人之影響力，以保證軍隊能效忠毛個人。

羅瑞卿於一九五九年開始擔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及解放軍的總參謀長，林彪由於身體不好，故軍中具體的工作實際上都由羅瑞卿決定。長期以來，林彪與羅瑞卿對很多問題皆有不同看法，再加上權力鬥爭的因素，故於一九六五年底，毛澤東於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及「篡軍反黨」等罪名，將羅瑞卿隔離審查。在六零年林彪提出頂峰論、突出政治和最高最活等崇拜毛的口號時，羅曾大潑冷水，認為『最高』等於說毛澤東思想不能再發展，『最高』，難道還有次高嗎？最活，難道還有次活的？為對抗林彪過份突出政治，在沒有請示林彪的情況下，羅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而被批評為「衝擊了政治、衝擊了學習毛主席著作。」(註二)

實際導致羅被捕的主因，在於他與劉少奇的關係及其與林彪的權力鬥爭。劉少奇曾公開指出，羅瑞卿是林彪的接班人，這就不得不引起林彪的恐懼。此外，羅亦被批判為強迫林彪讓位，有一次更向林妻葉群建議她叫林多休息，少管事。他還多次違背毛澤東的指示，例如在六零年毛指出「要從主力軍中抽出若干個師給沿海各省，作為地方武裝骨幹。羅瑞卿對這一極為重要的戰略指示，既不傳達，也不佈置執行。」(註三)於是，逮捕羅之行動便顯得順理成章了。

三 於上海另立據點，開展文藝界之大批判運動，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在六三年底期間，毛針對文藝界借古諷今的現象，作出嚴厲批評：

「各種藝術形式……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到今還是死人統治著。」毛更指責「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如不改變，

就改名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

基於毛澤東的壓力，黨中央於一九六四年成立了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統籌文化部及文聯各協會的整風及批判作家的工作。

文藝界的批判運動，影響到史學、哲學及經濟學等學術領域。報紙先後點名批判了史學家翦伯贊的「讓步政策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哲學家楊獻真的「合二為一論」，經濟學家孫治方的「重視物質利益原則和企業利潤」的經濟觀點。以上的學術觀點皆是學術界長期爭議和討論的老問題，但現在卻以政治批判方式解決，這就大大打擊了從六零年初開始較為活躍的學術討論氣氛。

毛澤東於一九六五年針對海瑞罷官一劇對陳伯達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當時毛澤東批判「走資派」的總體策略是希望從批判文藝作品入手，從而引出掌管此項政策的文化部以及北京市委的責任，再而將火頭上燒，直接批判劉、鄧等高層政敵。

然而，發表批判吳晗文章的行動被北京市長彭真抵制著，作為北京市長，彭真對姚文元不打招呼就批判他的副市長吳晗感到十分不滿。基於彭真的抵抗，毛澤東被迫於上海另立據點，事後毛曾指出文革：

「應從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一些部門……被修正主義把持，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彭真同志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中，無能為力，只好到上海去組織。」（註四）

姚文元寫的〈評歷史名劇海瑞罷官〉，曾九易其稿，毛澤東親自修改了三次，結果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於文匯報上刊登了，文章重點在於批評海瑞罷官一劇是為右派分子翻案，借古諷今地批評毛澤東政策，並宣傳階級鬥爭調和論。

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一個甚受爭議的觀點，就是「如何評價歷史上的清

官」，吳晗認為海瑞等清官是站在人民立場反抗惡勢力的好官，但姚文元則認為清官無論多麼好，他們畢竟是為地主階級向人民專政的官員，其推行恤民政策無非是希望麻痺人民，繼續延長封建統治的一種手段。姚更批評吳晗主張階級鬥爭調和論，認為統治者與人民的鬥爭可通過統治階層某些恤民改良政策便可達到，而不需要鼓勵人民以革命鬥爭方式改變其受剝削之地位。

驟眼看來，姚對吳之批評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假若再深入分析姚文元的觀點，那豈不是貪官比清官還好？因為貪官能激化矛盾，迫使被剝削者以武力推翻封建皇朝，但這樣一來，秦二世比李世民好，秦檜比岳飛好，而把中國搞到民不聊生的貪官污吏我們反而要給他們最高的評價！然而，若能再深入的分析，當可發覺若整個封建經濟基礎維持不變時，通過農民起義上台之新政權領袖仍會受制於整個封建生產制度，其平等理想會被溶化，進而變成新的地主官僚階級，而人民同樣照舊受封建制度之剝削。這些例子在歷史中經常見到，農民革命領袖在當權後隨即變為新的、甚至更腐敗的統治階級，例如元末朱明皇朝的強暴、清末太平天國掌權後的封建化傾向等。這些轉變之主因並非由於農民領袖個人貪圖享樂而造成，而是在封建經濟基礎下，任何政權所不能衝破的客觀經濟制約，而始終要實行封建地主制度。要徹底改變封建制度並非由個人意願、貪官激化矛盾及大規模的農民戰爭等所能達到，而應將眼界放於改變經濟基礎，出現新的生產方式（如資本主義）等角度分析。基於上述原因，歷史上的清官總比壞官員好，因為縱使清官與貪官一樣不能夠改變封建制度，但清官卻能給人民帶來很多生活上的改善。

第三節 毛劉環繞批判海瑞罷官問題的鬥爭—— 〈二月提綱〉與〈部隊座談會紀要〉的對立

姚文元的文章於十一月在上海文匯報刊登後，反應異常冷淡，毛澤東鑒於各地報紙皆不轉載姚文元那篇點火文章，故只得下令將姚的文章

印成單行本發行，並促上海市委打電報予北京新華書店，詢問其是否訂購，結果竟無回覆，在此情況下，毛遂猛烈抨擊北京為「獨立王國」。北京新華書店沒反應的原因是它為國務院文化部的一個系統，而文化部及黨的宣傳部都在彭真控制之下，在面對毛澤東對吳晗寫的《海瑞罷官》的批制加溫時，彭真曾針對地指出：「〈海瑞罷官〉這齣戲我早已看過了，毒害不是那麼大。」彭真更直接挑戰姚文元：「對姚文元文章的錯誤地方也要批。」^(註五)對於彭真的抵抗態度，進一步加強毛澤東打倒彭真的決心，毛澤東曾對康生指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了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從不要批准，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閻，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宮。」
^(註六)

由於兩派爭持不下，後來只好由周恩來出面調停，說服彭真以避免震動太大，故於十二月底開始，全國各報開始陸續轉載姚文元的文章。環繞著姚文元的文章，毛與劉、鄧派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毛澤東希望將學術問題擴大至階級鬥爭層面，從而開展對劉、鄧、彭真等當權派的進攻，而劉、鄧則自然希望將論爭問題局限於學術領域上，使火頭無法擴大，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場激烈的鬥爭，可反映在兩張報紙針鋒相對的編者按語上。由彭真控制的《人民日報》強調環繞《海瑞罷官》的論爭應採取說理方法，實事求是，容許批評與反批評。相反，在林彪控制下的《解放軍報》則明確指出《海瑞罷官》是大毒草，「作者用歪曲歷史真實和借古諷今的手法……要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人民去學習海瑞的所謂退田、平冤獄以及所謂剛正不阿的大丈夫精神……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嗎？」^(註七)

此外，彭真並多次強調「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陸定一更以史太林的經驗為戒，指出「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覆。」^(註八)

在彭真的控制及發動下，《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等報紙，接二連三地刊出了很多為吳晗辯護，駁斥姚文元的文章，希望通過百家爭鳴的局面，把鬥爭火種撲滅。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於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成立專責小組起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二月提綱〉要求在文革的進程中，參與學術討論的人，擺事實，講道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專橫，對待吳晗，隨政治問題外，也應涉及學術問題。簡而言之，以上的一切皆可反映當權派希望把毛發動的鬥爭局限於學術範圍內，為文革制定一框框。

在另一方面，為將雙方鬥爭政治化，林彪委托江青，在文革五人小組開會前一天，於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議指出建國以來的文藝界存在著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並強調這條黑線專了我們十七年的政，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該是我們去專他們政的時候了。會議根據江青的講話草擬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報毛澤東批准，〈紀要〉強調要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號召解放軍在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中要起重要的作用，這裡可看出毛澤東的用意，他希望將雙方的鬥爭尖銳化，將學術論爭引向政治層面。

學術文章觀點激烈的論爭、不同報紙針鋒相對的評語、以及〈提綱〉與〈紀要〉的對立，皆可反映兩派激烈鬥爭的情況。毛派於事後曾追述道：

「一九六六年二月，是一個不平常的二月，……我們黨內出現了兩個對立的文件……兩個文件，是從兩個代表不同階級的司令部裏發出來的兩種號令。……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馬克斯列寧主義路線，同以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註九）

第四節 〈五一六通知〉及林彪有關政變的談話

面對彭真等抗拒，毛實在是等不下去了，在六六年三月十七日的政

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直接指出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並批評吳晗及翦伯贊「實際上是國民黨」。當時由於劉少奇在軍中的支持者羅瑞卿已遭審查，再加上毛澤東的重重壓力下，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政治局常委再召開擴大會議，撤銷了由彭真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由其通過的〈二月提綱〉。毛更激烈地批判彭真，說他是混進黨內的渺小人物，沒有甚麼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毛並指出：

「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攻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註十)

此外，會議更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草案(史稱〈五一六通知〉)，決定提交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中討論。在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正式批准了〈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初期一個較有系統及能反映毛澤東奪權意向的文件，〈通知〉指出資產階級代表正霸佔著政府各級的高職，他們在時機成熟時，便會奪權而復闢資產階級專政，〈通知〉更隱晦地針對劉少奇指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註十一)〈五一六通知〉更明列〈二月提綱〉的十條罪狀，批判〈提綱〉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來看待學術批判和形勢，放棄階級鬥爭的立場，並要求各級黨組織停止執行〈二月提綱〉，並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在是次會議中，正式批倒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及楊尚昆四位高幹，指責他們為「四家店」，停止他們一切職務。在組織及人事方面，會議通過了下列各項決定：

第一、撤銷文革五人小組後，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又稱「中央文革」，直接隸屬政治局常委之下，作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核心組織；

第二、改組北京市委會，由李雪峰代替彭真出任第一書記；

第三、改組黨中央宣傳部，由陶鑄出任中宣部長。

五月十八日，林彪殺氣騰騰的發表了關於政變的談話，強調政權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故要防範資產階級的奪權，林並指出彭真、羅瑞興、

陸定一及楊尚昆等，有搞政變的傾向：「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文化戰線頭、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的是楊尚昆。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杆子、文武配合……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註十二)林彪有關政變的講話是意有所指的，當時曾盛傳中央軍委會第二副主席賀龍元帥曾企圖策動兵變，推翻毛澤東，康生曾宣稱賀龍在北京郊區修建碉堡，並給體委發了槍炮，進行兵變計劃。(註十三)現時中國官方已堅決否定了賀龍當年曾策劃兵變的傳言，並指出這純是林彪、康生等誣告害老帥們慣用之伎倆。但在一九六六年，相信毛林希望藉此「事件」而打跨彭真，在有關政變的談話中，林彪指出在近幾個月來，毛十分注意政變問題，並採取了很多預防措施：「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註十四)

總括而言，從彭真等下台可以看到毛澤東攻破政敵核心的方法，他藉個人威望，逮捕羅瑞卿，發動社會批判行動，通過打擊文藝界作為鬥倒彭真的橋樑。雖然在文革初期彭真以〈二月提綱〉、學術討論自由及抵制的方式拖遲了毛的攻勢，但始終毛基於其威望以及策略運用得宜，彭真被推上政治的審判台。然而，仍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直到發表〈五一六通知〉時，毛仍未有把握藉彭真問題把矛頭直指劉少奇。由李雪峰及陶鑄取替彭真及陸定一，仍只可被視為兩派互相讓步的結果，因為李亦是劉少奇的心腹，而陶則是在思想較靠近劉、鄧的另一頑強當權派。要鬥倒劉少奇，再不能單靠由上而下的罷官方法，而需借用群眾力量，以由下而上、內外配合的戰略將清洗計劃推向更高層。這就造就了全國第一張大字報的出現了。

第五節 聶元梓與全國第一張大字報

為借助群眾力量，以策動推倒劉少奇的計劃，站在毛澤東一邊的康生通過其夫人聯絡到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人，鼓勵他們公開批判當

時學校內的黨委及領導幹部。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等七人聯名發表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貼了出來，大字報指控陸平等人反抗文革，在全國掀起文革運動時，北大這個領導五四運動的最高學府竟然按兵不動，死氣沉沉。

雖然聶元梓發表的只是一張小小的大字報，然而在當時卻有重大的意義。因為以往黨內的鬥爭，從來都是依靠由上而下罷官的形式，由黨嚴密控制著的進行，一般市民是不知就裡的。而聶元梓的大字報，則是以群眾由下而上的造反批判方式，公開將矛頭直指一向被視為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黨委。雖然有些群眾暗中同情聶的觀點，但批判黨委在當時來說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經過五七年反右向黨委提意見而遭報復的慘痛經驗，一般群眾皆不敢貿然響應聶的行動，而採取一觀望的態度。

接著，在北大黨委的佈置發動下，上千張反對聶觀點的大字報貼出來了，聶的觀點被批駁得體無元膚。然而，北大黨委今次卻盤算錯了，聶的大字報不是擅自行動，而是毛澤東希望藉群眾運動由下而上批判劉、鄧的一項破天荒策略。六月一日晚，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廣播聶的大字報¹，而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又以頭版刊載了這張大字報，並發表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大加讚揚。

在《人民日報》的支持下，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聲援聶的信件及電報飛向北大，而在北大的影響下，北京很多大專院校和中學皆掀起了鬥爭黨委書記的浪潮，弄得整個形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註 釋

- 註 一 子伶 子真〈吳晗和海瑞罷官〉載於《歷史在這裡沉思》之二 華夏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第2-3頁
- 註 二 中共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一九六六年五月
- 註 三 同註二
- 註 四 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674頁

- 註五 嚴家其 高舉《中國文革十年史》大公報出版 一九八六年，第九頁
- 註六 毛澤東〈打倒閻王 解放小鬼〉載同註四，第640-641頁
- 註七 《解放軍報》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註八 同註五、第13頁
- 註九 《紅旗雜誌》第九期 一九六七年
- 註十 同註四、第641頁
- 註十一 《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 註十二 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 註十三 黑雁男《十年浩劫》一九八六年七月
- 註十四 同註十二

第二十六章 環繞派遣工作組的鬥爭—— 批「資反線」與劉少奇的跨台

第一節 劉、鄧向各院校派遣工作組，企圖撲滅 文革的火頭

一 毛澤東將文革大權交劉鄧

聶元梓及各大專院校學生反黨委的行動，使黨於各院校的權力搖搖欲墜，為穩定各院校的秩序，劉少奇決定向各院校派遣工作組，以接替被鬥倒黨委的工作，以及領導文革的發展。這裡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劉、鄧一派的大將彭真雖於五月被鬥倒，但劉、鄧仍握有黨政大權，況且劉少奇五月的挫折也是兩派妥協的結果，火頭仍未燒到劉、鄧身上。此時更戲劇化的是毛澤東竟於六月離開北京，將文革的領導權交予劉少奇，而自己則往華東等地視察。雖然劉、鄧曾親往杭州請毛返京主持大局，但卻為毛所拒絕。毛澤東此舉相信是一種鬥爭策略，故意讓劉、鄧控制及領導文革，從而挑出他們的錯誤，而借此為藉口將矛盾再激化，繼而把他們打倒。

劉少奇針對當時學校混亂，黨委書記被鬥爭的現象，決定向下派遣工作組以控制局面。其實，向下級派駐工作組是中共自建國以來推行政治運動慣用的方法，其目的是讓完全了解中央政策的幹部在進駐較基層單位後，能發動基層群眾響應中央的號召，推行中央的政策，而中央亦能通過工作組將各類政治運動牢牢控制於股掌之中。對劉少奇派遣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顯出模稜兩可的態度，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批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可以不派嘛，亂就亂他一陣」。（註一）

二 劉少奇作出派工作組等部署以圖控制文革

劉少奇是次派遣工作組的實際目的，是希望撲滅聶元梓等由毛支持

的造反派超越黨委擅自行動的烈火，而將群眾運動重新放置於他們嚴密控制之下，從而使毛澤東不能藉群眾運動將他們推倒。故此，劉、鄧曾強調工作組要代替學校黨委的領導，「那裡出事哪裡派人去，派工作組要快，要像消防隊救火一樣快派」。除了工作組外，劉、鄧還為運動定了下列幾點政策：

(1) 將運動嚴格控制於校內進行，盡量防止對社會帶來衝擊

劉少奇制定了〈中央八條〉，為校內文革定出了框框，八條強調「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及「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等。十分明顯，劉少奇是希望能藉這些規定限制文革的殺傷力，而將運動納入其控制的軌道。北大的工作組為維持局面，曾下令封閉校園，並發出向工作組提意見就是不相信黨中央，聽不聽工作組的話就是聽不聽黨的話的標誌。在工作組嚴密控制下，北大校園恢復了平靜，毛支持的造反行動一度被壓抑。

(2) 批判一些掌管文化及較基層的幹部

由於文革是從批判吳晗、翦伯贊等人開展，而牽連到一些掌管文化部門的官員。故此，各地方亦起而效法，例如廣州就把矛頭指向作家秦牧、歐陽山等人，此外，更把廣東省掌管文化的王匡拉出來作批判對象，以表示對中央批判陸定一及周揚等人的響應。

除了作家和掌管文化的幹部外，一些基層幹部亦遭受批判，據廣州一份紅衛兵小報統計，一九六六年八月前，廣東省各級機關被圍攻的重點，都是一般幹部，例如有一個局，被點名批判的幹部佔單位人數百分之八十，然而，真正掌權的當權派卻大多不受批判，整個運動都在當權派嚴密監視下進行。在工作組控制的各單位中，大批中、下層幹部挨整，人人自危，造成互相爭鬥、無中生有揭發的局面。在運動中，許多幹部遭受人身侮辱、被帶高帽遊街、遭受抄家及關入私設的牢獄等。(註二)

曾經歷過文革的梁恒在其回憶錄中曾敘述一張攻擊其父親梁山(一位

基層幹部)的大字報，相信頗能反映一些中下級幹部被批鬥時的情況，這張大字報指出：

「梁山是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新聞工作者，是我們報社的『三家村』。……他寫了許多反動文章，其中有一篇是關於向日葵的。他膽敢放屁說向日葵是依靠它自己的力量成長，這是多麼的惡毒！三家村說，太陽有黑斑，有陰影，言下之意是黨有錯誤，但是梁山說向日葵根本不需要太陽，這個反動思想的本質是：沒有共產黨，中國也可以強大。這難道不是跟資產階國民黨反動派唱同樣的調子嗎？……打倒梁山。」(註三)

就憑一句向日葵便定個人的罪狀，真可謂人間悲劇。

(3) 轉變鬥爭方向，將鬥爭矛頭指向知識分子及平常對基層黨組織不滿的人

為了控制局勢及響應毛澤東批評「右派」的號召，以便向毛交待，與毛對立的黨政幹部便重施「四清運動」時的策略，將鬥爭的矛頭指向知識分子，將一些學生及教師打成右派。部分中央領導人曾指出，大學文化革命「主要是搞教職員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在他們的策動下，文化大革命遂脫離毛希望批鬥黨中央當權派的道路，而變為另外一次針對那些平常對黨組織不滿的人之第二次「反右運動」。這個「反右運動」十分迎合當時各級黨委的需要，因為他們又可以大張旗鼓地批判右派分子。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是一些出身不好(例如地主、資本家)及有若干歷史問題的人，他們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曾犯過錯誤，平時亦喜愛發牢騷、批評現實生活或與黨領導關係惡劣的人。

三 受工作組批判的對象

一般來說，黨政幹部往往會將一個組織內的群眾分為下列幾類：

- (1) 「依靠對象」——黨、團員中的骨幹積極份子；
- (2) 「爭取和團結對象」——家庭出身好，對黨政幹部言聽計從的人；另

- 一部分雖然家庭出身不好，但政治表現好，行動積極；
- (3) 「孤立和教育對象」——家庭出身雖好，但平時的表現卻較具批判性，喜向領導提意見，不太聽使喚的人；另一部分為表現雖不太好，但家庭出身不好；
- (4) 「被整的鬥爭對象」——這包括在中共建國後十七年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受批判的、或者是中共認為其歷史背景有問題的、以及在過往政治運動期間表現出對幹部有不滿情緒，和在文革初期向領導者寫大字報進行批評的人；另一些是家庭出身不好，又不服從的人。(註四)

例如，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共廣州市委派出工作組進駐《廣州日報》社，從其行動中可以大概了解工作組工作的方法，工作隊的第一步工作是根據檔案材料和出身成份，將報社人員劃為分左、中、右三派。在進報社的三天內便指定一些人為「左派」，在各部門內成立「左派小組」，作為臨時權力機關，在工作組領導下掌管報社的運動、學習和業務等大權。此外，工作組更把矛頭指向一般幹部和知識分子，並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將鬥爭矛頭針對下邊；各部門的左派小組圈定黑名單，按照人事檔案資料和個人在以往政治運動的交心材料，羅織罪名，大多數工作多年的知識分子皆在被鬥之列，以致做成一片白色恐怖籠罩「西瓜園」(報社之舊址)。(註五)

在這個反右運動中，往往出現很多誇大事實、無中生有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少幹部希望滿足工作組的命令，向上邀功，而有部分幹部則更藉此機會來公報私仇。據曾參與文革的凌耿在《天讎》一書中回憶道：工作隊規定每個學生都要寫十張大字報，陳述五十條罪狀來揭發老師和校長，指控老師的罪狀內容不拘，小至上課遲到，懲罰學生，大至抱怨共產黨，都可包括在內，目的無非是無中生有，如果某老師曾埋怨過生活困難，這就可被引申為反黨或仇視無產階級專政。(註六)

當時有一部分政治觸覺敏感的人，感到是次文革與以往的反右運動不同，工作組的工作方式未必能反映毛澤東個人真正的意向，加上部分學生被毛支持的聶元梓大字報鼓勵，認為劉少奇的〈中央八條〉廣泛派出

工作組及反右運動，實是將文革引入歧途。六六年六月十九日，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提出要趕走工作組，他指出：「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中，那麼，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註七)

基於蒯大富直接挑戰工作組及黨的權威，劉少奇遂令其夫人王光美進駐清華園，以控制混亂的局面，當時王光美曾得到三點指示：1、把蒯大富當作活靶子來打；2、批倒了蒯大富，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3、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資產階級民主。六月下旬，清華校園開展了鬥爭蒯大富的大會，蒯遭關押。

總的來說，派工作組、制定框框、針對基層幹部，開展反右，可以說是反毛澤東推行文革的幹部對毛政策又一次陽奉陰違的表現。毛發動文革是以鬥爭「黨中央當權派」為目的，而並不是針對社會上傳統以來的「黑五類」及右派分子，但由於運動的領導權操縱於反文革的幹部手中，他們等根本不可能推行打倒自己的政策，然而，鑑於毛的無上權威，只好將運動矛頭指向出身不好、愛發牢騷的人，因為這樣既可批評「右派」，又可貫徹毛批判資本主義的指示(因為右派通常與資本主義有關)，實屬一舉兩得。

第二節 毛澤東的反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撤銷工作組

當劉、鄧派工作組控制文革時，毛澤東仍徘徊於上海、杭州等地。在六六年七月，他以七十三歲高齡在長江乘快艇參觀有五千人參加的游泳比賽，並下水一顯身手，橫渡長江，毛澤東此舉在於向世界宣佈他的健康和氣魄足以容許他領導文化大革命。

此外，當時一些外國記者亦指出北京曾發生很大的變動，北京市盛傳林彪已把大批軍隊從華中地區調到北京，將整個北京市包圍起來。(註八)北京軍區黨委於六八年亦曾透露由牟立善率領的三十八軍在

文革中經由毛澤東、林彪調至北京，負責保衛毛、林的工作。

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澤東突然返京，在第二天毛會見劉少奇時，毛澤東便明確批評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做法，後來毛更指責劉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反線）。七月二十一日，毛更下達撤銷工作組的指示，他猛烈抨擊工作組是怕字當頭，「工作組一個多月，起阻礙革命的作用，實際上是幫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組是坐山觀虎鬥，看著學生鬥學生。」^(註九)毛更表示他返北京後，感覺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更連大門都關上，甚至鎮壓學生運動。他指出：

「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只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志，應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面鍛煉自己，改造自己……有些同志鬥別人很凶，鬥已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註十)

由於派遣工作組領導政治運動是中共慣用的方法，面對毛澤東的指責，劉少奇有點不知所措，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一個萬人大會上他指出：

「怎麼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清楚，不太知道，問我們革命怎麼辦，我老實回答你們，真心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不懂，黨中央其他機構工作人員也是不知道。」^(註十一)

除公開批判工作組外，毛更利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學生中頻繁的活動，意圖在工作組事件中，再度加強劉少奇與群眾更對立的情緒。七月二十一日，毛的嫡系陳伯達派人探望仍在押的蒯大富，而江青亦頻頻到北大活動，她與中央文革其他成員於二十五日在北大召開萬人大會，康生在會上還強調「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大大挑起群眾反工作組的情緒。^(註十二)而會議更將派工作組領導文革列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批判。

為了增強衝擊黨中央當權派的力量，毛澤東大力支持由年青人所組成的紅衛兵，八月一日，毛於回覆清華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件中指出他

們的大字報：

「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註十三)

清華附中是全國第一個組成紅衛兵的單位，六六年五月當毛表示支持聶元梓的大字報時，一些政治觸角敏銳的學生領略到毛澤東的意圖，相繼組成了紅衛兵的組織，紅衛兵是意指保衛紅色政權、保衛毛澤東的兵，他們響應毛澤東造反的理論，強調要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愈亂愈好。雖然這些紅衛兵在開始時都是由高幹子弟所組成，他們以一種社會地位優越感及政治狂熱的表現投身入文革，而其針對的對象亦是社會上傳統的右派及對黨組織不滿的人。然而，基於劉鄧等希望嚴密控制文革進程的原則，五、六月期間工作組還強調由這班年青人所組成的紅衛兵是搞非法的地下組織，煽動群眾而遭勒令解散。但在七、八月期間，隨著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些一度被抑壓的紅衛兵運動又再活躍起來，成為推動文革的一股民間力量。

第三節 文革〈十六條〉與劉少奇的垮台

一 毛澤東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

經過毛澤東嚴密的部署，中共在批判資反線的運動配合下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開中央委員會(史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會議中毛大力批判劉少奇，但遭後者的反抗，毛澤東曾指出，現在的共產黨鎮壓學生運動其實與北洋軍閥及國民黨毫無分別，(註十四)他的談話遂引起劉少奇強烈的反抗，劉指出五不怕，即是罷官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及殺頭不怕(註十五)。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堅拒認錯，故於八月五日發表了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以給劉、鄧更大的壓力，在大字報中，毛認為在他離開北京的：

「五十多天，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都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執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嗎？」(註十六)

二 文革〈十六條〉，確定要針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八月八日，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史稱〈十六條〉。〈十六條〉指出要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將鬥爭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批判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由於是次運動重點是打倒黨內走資當權派，故〈十六條〉強調應「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即使才是真正右派，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才處理。」(註十七)〈十六條〉更提出要充份利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讓群眾在運動中教育自己。在推倒各機構的走資當權派後，〈十六條〉批准這些機構可以運用全面的選舉制，選舉出文革小組、文革委員會或文革代表大會，這些代表必須接受群眾的批評，如工作不稱職，可被撤換。

對毛澤東來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可謂他一個重要的勝利：

- (1) 改變了過去中央劃分為一、二的方法，恢復了毛實際的領導地位。此外，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林彪成為黨唯一的副主席，陳伯達、康生等擁毛派當了政治局委員及常委，劉少奇及鄧小平實際上處於被批判的位置。
- (2) 通過文革〈十六條〉，確定了要鬥爭「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使文革運動的發展方向走上毛期望的道路。

(3) 在以往四年來毛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全會皆予以追認，載入會報，相反對劉少奇推行的政策，則加以否認。

雖然如此，毛澤東亦並未得到全面的勝利，後來毛澤東曾追憶道：

「……我只好將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討論，我才得到半數多一點的同意。當時許多人仍然不通，李井泉(西南第一書記)不通，劉瀾濤(西北局第一書記)也不通。伯達同志找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註十八)

基於毛澤東的構思實際上仍受到地方當權派的抵制，故在六七年一月，他遂推行一個全國由下而上的大清洗計劃。

三 群眾大力批判「資反線」

受到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鼓舞後，部分不滿本單位領導的職工開始造反，大力批判「資反線」。他們勒令幹部交出職工在文革初期給本單位領導寫的大字報底稿及其他可以作「秋後算帳」的「黑材料」，當幹部不願交出材料時，職工便動手搶，在此過程中，職工發覺在幹部的檔案室中原來還有更多可供將來報復用的「黑材料」，這樣，被整黑才料的職工之群情更為洶湧，成為堅定的「造反派」。另一方面，中央文革為了為前一階段受工作批判的「右派」平反及貫徹集中能力鬥當權派，中央於十一月連下了〈關於革命群眾平反的緊急通知〉和〈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兩份文件，正式為那些受工作組批判的人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假若曾「扣發他們的工資的，都應當予以補發」，而「因為給工作組領導提意見而被開除的職工都應恢復工作」。此外，中央亦決定工作組編寫的整群眾之檔案與材料，都應宣佈無效，「全部清出，一律當眾焚毀」。以上的平反浪潮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迴響，各級領導幹部覺得很不服氣，因為一向以來的政治觀念都教導他們要留意那些攻擊黨與社會主義制度的人，然而這次卻要大張旗鼓地為這批「右派」平反，賠禮道歉，而這次文革的鬥爭對象卻又是「黨內走資本

主義的當權派」，究竟誰是當權派呢？他們又犯了甚麼彌天大罪呢？一向以來，黨員都被教導要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服從中央指揮，但這一次，形勢卻大大不同了。由於各級幹部對文革充滿了懷疑，就促使各級黨政幹部對文革採取了抵抗的態度，因為革命有可能隨時革到自己的頭上去！

在另一方面，被工作組批判的學生及知識分子則對毛感激流涕，他們認為毛救了他們，認為毛是一個最開明、最民主的黨領導人，毛澤東批准群眾獨立的思考，辨別是非，而無須向錯誤的路線屈服，就這樣，在劉鄧派工作組期間被批判的群眾就更忠於毛的文革路線了。《革命之子》作者梁恒的父親梁山，由於被工作組錯誤的批判，而嚴重影響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在家庭面臨分裂前的一刻，梁山一家通過收音機聽到了〈十六條〉的決定，當時的情景頗能反映一般群眾的心態：

「過去幾個月培養出來的習慣使然，我們衝向桌上的小收音機，大家圍著它側耳傾聽，廣播出來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八月八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項聲明的目的之一似乎在澄清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我們愈聽，心中沉重的石頭就愈來愈輕，尤其當我們聽到第五條時：『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目前這個運動的重點是整當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應該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和那些擁護黨與社會主義，但說過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甚至寫了一些錯誤文章的人嚴格分開來。』當所有十六條都播完時，父親眼中含著歡欣的淚水，意氣風發地說：『看吧，你們的爸爸不是反革命分子。』」（註十九）

四 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遭批判與毛提出「准許劉鄧革命」

從六六年八月十一中全會到十月期間，劉、鄧雖已受到批判，但他們仍是黨內要員，受到各級黨幹部實際的大力支持。故此毛對他們仍需

保持一定之禮貌，在毛於六六年中下旬八次檢閱紅衛兵的行動中，劉少奇亦有出席，而毛曾當眾與劉少奇交談。但即使如此，劉一日不倒，文革亦難於推行，故毛遂在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強迫劉、鄧作自我檢討，承認錯誤，劉少奇被迫承認以往很多反毛的行動，如六四年為對抗毛而制定的〈後十條〉，六六年趁毛不在京時大派工作組平息群眾運動等。在劉、鄧認錯的同時，林彪和陳伯達分別宣佈劉、鄧的罪狀，公開批點了劉、鄧路線，挑起黨內矛盾，毛澤東更指出：

「現在倒鬧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如土改會議，天津講話，山西合作社，大捧王光美……到北京開會，你們開六天，我要開一天還不行……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樣辦？我就感到北京對我的意見不能實行，為甚麼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而在上海發起呢？因為北京沒有人辦、現在北京的問題解決了。」

值得留意的，是劉少奇遭批判期間，毛澤東多次表示要保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指出：

「鄧劉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只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就好。要准許劉鄧革命，允許改。」（註二十）「對犯錯誤的同志，也要給他出路，要准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註二十一）「甚麼路線錯誤，改了就算了，誰要打倒你們！」（註二十二）

後來在六七年，毛澤東為平息國內敵對派系互鬥的局面，故推出劉少奇作為大眾鬥爭的目標，以轉移全國視線，在此情況下，劉少奇慘遭逼害至死。（此發展將於第三十一章詳細討論）

此外，六六年底的中國在徹底批判資反線及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煽動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黨委皆受到衝擊，在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中，林彪更提出「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理論，指出：「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尖銳的對立。」在此情況下，黨組織在很大程度上癱瘓了。從上述資料顯示六六年底劉已被鬥倒，而文革亦應完結。但是正如〈十六條〉指出，文革不單是鬥爭黨

中央當權派，更是希望藉群眾運動以推行黨內的大整風，基於此情況，革命發展到一個「地方奪權」的階段，而終於弄至一個不可收拾的局面，整個國家面臨內戰的危機。

註 釋

- 註一 嚴家其、高皋《文革十年史》，大公報，一九八六年，第27頁
- 註二 《一月風暴》(廣州)，一九六八年 第二期
- 註三 梁恒《革命之子》，遠東評論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57頁
- 註四 袁懋如《腥風血雨》，第23-25頁
- 註五 海峰《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友聯研究社，一九七一年，第24頁
- 註六 凌耿《天翻》新境傳播公司 一九七二年，第4頁
- 註七 同註一，第31頁
- 註八 南斯拉夫記者報導，原載南共《政治報》
- 註九 毛澤東〈對撤工作組的指示〉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644頁
- 註十 同註九，第649頁
- 註十一 《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中共研究雜誌社，一九七零年，第378頁
- 註十二 同註一，第36-36頁
- 註十三 毛澤東〈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
- 註十四 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的插話〉載同註九，第650頁
- 註十五 河北省保定大中學校紅代會〈紅色造反團〉報第十二期，一九六七年六月
- 註十六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載中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一山圖書供應公司，一九七五年，第29頁
- 註十七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載同註十六，第30-40頁
- 註十八 〈毛主席對外賓一次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
- 註十九 同註三，第162頁
- 註二十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載同註九，第653-656頁
- 註二十一 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載同註九，第652頁
- 註二十二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同註九，第660頁

第二十七章 紅衛兵運動與劉鄧的反覆掙扎

第一節 紅衛兵運動的一般狀況

一 毛發動紅衛兵的戰略

由於三面紅旗失敗以來，毛的指示不被貫徹執行，為推翻黨內多數派的統治及對各級幹部進行清洗，毛只有採取由下而上、放手發動群眾的方式，破壞黨紀國法，衝擊固有黨組織，以作為打倒政敵及清洗官員的策略。毛澤東作為整個共產制度及官僚體系的最高領導及象徵，竟作出最激烈的行動，將「極端保守」與「極端激進」結合於一身，以黨主席之尊進行「毀黨行動」。

在發動群眾方面，由於青年學生較為天真，感情較易被煽動，政治思想及觸覺皆比一般工農敏感，而且無家庭負擔，無牽無掛，故較易被發動。基於此，毛首先發動青年學生，由他們衝開整個社會由於長期受黨嚴密控制的悶局，進而再發動社會上各不同階層及較游離的分子投身入這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中，以達其政治目的。

中國最早出現的紅衛兵，是六六年五月毛表示支持聶元梓大字報後於清華大學附中（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六六年五月，他們已與校長萬邦儒鬥爭，並在大字報中發誓：「一輩子做黨中央和毛主席最忠實最馴服的紅衛兵」，在批判資反線期間，毛多次對他們的行動表示支持，而這些青年學生亦被賦予下列在黨長期嚴密控制下的封閉社會裡不可想像的優厚權力：

- (1) 大民主。在紅衛兵組織內，不受各級幹部的領導，以民主選舉的方式自行決定領導人選；
- (2) 批判權。可以運用大字報及各類宣傳刊物，攻擊各級黨政領導人並揭發社會上種種不平現象，一嘗行使權力的滋味；

- (3) 免費全國串連。毛澤東准許學生停課，並給予免費搭車乘船往各地旅行的權利，食住由當地領導人接待；
- (4) 供給經費設備。紅衛兵組織被供應辦事處，並發給經費，可自印報紙，有的還能分配到車輛甚至武器。

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八次接見各地雲集在北京的紅衛兵，每次參與接見的群眾多達百萬人以上，他們以瘋狂崇拜的心情於接見當天零晨四、五時便到天安門廣場集合，他們不斷揮動毛主席語錄，不停地高喊「我們要見毛主席」，當毛澤東出現在人群面前，青年學生們大多強忍著激動的淚水，大聲高呼「毛主席萬歲！」，現在，就讓我們回憶一下當時紅衛兵的興奮心情吧：

「這次真的來了！整個人群馬上像海洋般地翻騰起來，大家一邊跳一邊在喊『毛主席來了！』『毛主席萬歲！』我當時排在第九、十行左右，前面的人一直在跳躍，我無法看見，情急智生，我馬上接著前面一個人的肩膀，一就爬在他的背，於是就清楚的看到毛澤東跟林彪……當我跳下地的時候，有一個北方青年抓住我的雙手使勁地搖，一邊大聲對我喊：『我見到毛主席！我見到毛主席了！』……只是見他好像瘋了一樣，一邊搖，一邊喊……我可以肯定，當時人們的反應不是造作。」(註一)

二 大串連策略與紅衛兵的政治任務

這樣，紅衛兵便充當了毛澤東的奪權工具，他們按著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開列的名單，給予的檔案資料，由中央到地方全面衝鋒陷陣，鬥爭被點名的幹部。

與紅衛兵運動一起出現的是規模龐大的全國「大串連」行動，紅衛兵獲准離開自己的家鄉，交通食宿費用全免的往外地旅行。毛澤東發動「大串連」的目的，除加強學生參與造反的積極性外，還希望藉串連來改變文革初期冷清的局面。

文革在發動初期，由於各地區及機關長期被當地黨政幹部嚴密控制，本地群眾因害怕當地黨委無上的權威，故不敢響應毛的號召對他們進行批判，以免將來遭受報復。但由外地而來的紅衛兵，卻是有恃無恐，他們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發動起批判地區當權派的鬥爭，外來的紅衛兵若遭受圍攻及鎮壓，他們大不了是一走了之，從這角度看，紅衛兵的「串連」實際上是打破各地長期互相分隔局面的一種鬥爭策略，「串連」更加強了各地造反組織的交往，而將批判運動推向更深化的發展。故此，由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要員所控制的紅衛兵，在全國大批判中，更負擔極其重要的任務：

- (1) 他們是地方造反奪權的發動者，秉承中央文革的旨意，發動和督導各地區紅衛兵的造反行動。
- (2) 與各地地區紅衛兵組織掛鉤，成立聯絡站，組成一個全國性的情報網，將各省市有關鬥爭及奪權的進展第一時間反映到北京，例如廣州的紅衛兵組織「中大紅旗」和「中大·八三一」便跟中央文革成員有單線的聯絡，可以說它們是中央文革放於廣州的重要棋子，它們既表達了中央文革的意圖，又得到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註二）
- (3) 它們並負有特別的任務，例如向當地當權幹部下達中央文革的指示，或協助中央文革逮捕一些被點名批判的高幹回京受審。

然而，也有一些機智的地方高幹，明白到外來的紅衛兵會對他們帶來致命的威脅，故此他們盡量煽動本省人的排外情緒，企圖以群眾慣性接受的地域觀點，以阻擋針對他們的外來壓力。其實，外來串連的紅衛兵也有很多令當地人士感到不滿的地方，好像當時廣州的情況：(1)南下的紅衛兵以串連當作吃喝遊玩的樂事，一下火車，即大吃大喝，耀武揚威，目無法紀，導致當地人不滿；(2)他們肆意破壞廣州人民心目中具有深厚感情的文化古跡，引起當地人憤怒；(3)一部分與中央文革有聯繫之紅衛兵，常以中央大員身份，頗使氣指，引起當地人民及地方紅衛兵之反感。（註三）

第二節 「紅五類」紅衛兵與「革命造反派」紅衛兵的鬥爭

一 「紅五類」紅衛兵之湧現

(1) 紅五類紅衛兵的心態

研究紅衛兵運動有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中旬所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高級幹部的子弟。這些高幹子弟自小生活在富裕美滿的家庭，受慣了父母的愛護和普通市民的尊重，他們對自己家庭的歷史深感自豪。在歷史課堂中這些年青人學習到自己的父輩怎樣推翻國民黨，在解放戰爭過程中共產黨人是如何艱苦的奮鬥，而在革命成功後，地、富、反、壞、右的分子卻千方百計破壞土改及合作化、罔圖推翻中共的統治，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又多充當間諜，串連外國政權，準備「變天」。例如一位「保守派」的「紅五類」紅衛兵的媽媽對兒子說：

「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我們的今天，現在這些右派要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反，要推翻共產黨，我們絕不能讓他們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們全力支持你。」(註四)

此外，這些年青人看到很多將迫害和殺害政敵描寫成神聖的階級鬥爭電影，頭腦充滿了革命回憶錄和電影中神化共產黨對「階級敵人」迫害的故事。(註五)他們心裡含著對階級敵人的仇視，時常都希望毀滅舊社會遺留下來腐蝕人民革命思想的封建思想及封建文化，紅衛兵在造反運動動中的表現是近乎瘋狂的，出現這種狂熱情緒的另一原因是大陸青年們長期生活在政治壓力、強調服從黨領導的一個結果，在抑壓著的沉悶環境中一旦解放必會造成極端的及過度活躍的反應，而對右派的仇恨亦會促使這些年青人發展出好勇鬥狠的攻擊性暴戾性格。

文革初期湧現的「紅五類」紅衛兵十分強調階級成份，北京航空學院

紅衛兵在組成時的宣言中寫道：

「我們憑甚麼當毛主席的紅衛兵？就憑我們是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子的子弟……歷史是誰創造的？我們紅五類的父兄……我們就是紅五類子弟！」他們更認為「權，本來就是我們的，我們是無產階級江山的當然主宰人……權永遠應該在我們手裏，如果不在，我們當然要把它奪回來，這是天經地義、公公道道的事。」

為了替高幹子弟掌權作輿論，「紅五類」紅衛兵更大力鼓吹「自來紅」的思想，極力宣傳他們血統的高貴，例如：

「老子拿下的江山，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就一代一代往下傳；」「高幹子弟掌權當仁不讓。」

「我們是天生的造反者，我們的血統是無比高貴的。」

「我們在娘胎裏就是紅的。」(註六)

由於這些「紅五類」紅衛兵組織過份強調出身背景，以至連工農子女和工人都被排斥加入。他們在組織內部更制定了森嚴的等級制度，這可從他們佩帶的袖章可以分辨出來，袖章上的質量、尺寸皆分等級，這主要按其出身的不同，及父兄的官職而分帶各種不同袖章，而在其袖套背面，往往還印有其父的官階和名字。

在文革運動初期，部分極端的「紅五類」紅衛兵把大批非「紅五類」出身的，及反工作組的師生員工打成右派，強行編他們入勞改隊，並對他們定出多條禁令如不准學毛著、不准帶毛澤東像章、不得參加政治運動，並要求他們交出自行車和手錶，降低生活水平。(註七)在當時毛澤東極端個人崇拜的影響下，被剝奪參與文革的權利對青年來說可謂是極大的災難，在面對重大壓力及自責出身不好的情況下，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因被社會離棄而被迫得精神失常甚至自殺。

(2) 紅五類紅衛兵的工作

「紅五類」紅衛兵的活動在毛批判資反線後迅速大規模展開，然而，

在開始時它並沒有走上毛澤東批判走資當權派的道路，而將注意力集中在下列工作：

1. 文化方面

- i. 更改街名、校名及商店字號。紅衛兵認為所有含有封建主義及資本主義等思想者皆需修改。例如將北京大使館雲集的地方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協和醫院由於是美國人創辦，故紅衛兵遂找出其極少數失敗的病例，誇大其「罪惡」歷史，把它改稱為反帝醫院。然而，由於很多的名稱都是反帝、反修，使很多街道或建築物都失去原來的特性，使人一時難於辯認。
- ii. 更改人名。毛澤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宋彬彬時，曾問宋的名字，宋回答後毛再詢問：「是否文質彬彬的彬彬？」宋回答稱是，於是毛澤東就說道：「要武嘛！」果然，第二天，宋彬彬就將名稱改為宋要武。乒乓球單打冠軍李富榮因感到榮字有封建色彩，故改名為李富勇，而很多年青人也將名字改為「向東」、「衛東」、「永革」及「永紅」等。此外，紅衛兵在清算廣州粵劇伶「紅線女」時曾改其名字為「黑線女」。
- iii. 破壞古物、移風易俗、迫害宗教。這方面主要是改革衣式及髮型，禁止理髮店修指甲，禁售化粧品，在執行方面部分紅衛兵甚為專橫，衣著不符合規定者均當眾毀壞，髮型不符合者遭當眾剃光。紅衛兵還刻意對他們認為是帶有封建色彩的古書古物肆意破壞，以致很多國家重點保護的文物如岳墳、蘇小小墓、虎跑泉的老虎塑像、甚至敦煌的文藝瑰寶均遭嚴重破壞。在迫害宗教方面，紅衛兵強迫封閉天主教學校、驅逐外籍修女出境、破壞廟宇佛像，甚至連家庭中所供奉之祖先靈位亦遭破壞。

更嚴重的是，紅衛兵完全認同紅色及堅持寧左勿右，故此，舉世通行的交通訊號也要修改：紅燈才是通行無阻，綠燈改為停止前進，對交

通造成其大的滋擾，後來還是周恩來出面勸阻了事，把紅燈停止前進解釋為「遵守革命的交通秩序」。

2. 經濟方面

主要包括建議停止付給一九五三年開始的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資本家之利息和紅利，建議廢除高薪制及獎金制度。並「勸喻」擁有私有房產的家庭「自動」上交屋契及停收住客租金等。

3. 政治方面

政治方面主要是批鬥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歸僑，以及「黑五類」，指他們為特務及破壞社會主義的壞分子，並要求修改憲修中規定保護私有財產之條款。此外，紅衛兵並推行瘋狂的排外運動，舉行大規模示威集會，批判美帝及蘇修，甚至侵入大使館，毆打外交人員。

(3) 隨意的抄家行動

紅衛兵最不受非議的是隨意抄家的行動，雖然憲法明文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被侵犯，公民住宅不被侵犯，但紅衛兵們卻被「革命」的烈火蒙蔽了理性。他們認為很多居民的住宅都會藏有用作推翻共產黨的槍械或很多封建及資本主義的東西，此外，肆意掠奪私人財物以中飽私囊的例子亦不計其數，在紅衛兵的極端行動下，市民的日常生活經常處於極其恐慌的狀態中，現在就讓我們回憶一個北京典型之抄家情況：

「一陣急促的、催門欲倒的敲門聲和喊叫聲傳進了幽閉著的獨家居住的四合院內，當房主人連跌帶爬跑來打開大門時，『狗地主』、『他媽的』、『混蛋』之類的叫罵聲便充塞院內。手中甩著又寬又長皮帶的紅衛兵推開『怠慢』了他們的房主人……迅速把守住各個房間的門口，把在家的人都喝出來……剃成陰陽頭，喝令全體跪下。鞭打、足踢、要『地主分子』交代把『地契』、『變天帳』藏到哪裏去了。說不出來，則是更狠的一頓毒打。同

時，抄家者開始四處搜查，稍微像樣一點的傢雜便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抬上停在大門上的大卡車上，連生活必須的衣服、被褥、床架、床板也不放過。剩下的是翻得滿屋滿地無法拿走的破破爛爛的東西。……還要把孩子們珍愛的玩具洋娃娃踩在足下……把油、鹽、醬、醋、糖到處撒。為了找『地契』、『變天賬』，以及『反攻倒算用的槍枝彈藥』，紅衛兵還將屋牆、院地亂刨亂挖。當一個紅衛兵靈機一觸，找出一本又黃又舊的本子，交給隊長，說是『變天賬』時，隊長翻看之後，明明白白知道是這是小學生的算術作業本，卻硬裝出神氣活現的神態，將本子舉在手中搖晃著，逼人承認這是『變天賬』。伴著『還不老實』的喝斥聲，皮鞭又像雨點一樣抽打下來。當紅衛兵滿載『戰果』，把所剩不幾的傢雜戳滿窟窿揚長而去時，留給劫後餘生人的話是『全家遣返回原籍』！」（註八）

以上的情形幾乎可以說是部分「紅五類」紅衛兵行動的重要內容，他們的行徑實際上是政治優越者壓迫群眾的瘋狂表現，他們把矛頭指向在共產黨統治下一向抬不起頭來的「賤民」，可以說，他們根本是工作組的一個延續，實際上將毛澤東訂定的鬥爭方向轉移。毛發動文革的目的並不是針對「傳統上」的「右派分子」，其實毛正是要打倒「紅五類」紅衛兵的父兄輩（即當權派），既然紅衛兵是高幹的子弟，他們根本不可能對自己的家庭開刀。然而，毛澤東及林彪等卻十分明白，在文革發動初期甚有需要利用這群「誤入歧途」的紅衛兵來衝鋒陷陣，搞亂整個社會，營造鬥爭氣氛。在當時中國，有膽響應毛澤東造反的，實際上亦只有這班高人一等的幹部子弟，一般青年人或出身不好的人在黨委的控制下根本不敢貿然從事，響應毛的呼召衝擊當地的當權派。正是這個原因，毛澤東在接見紅衛兵時曾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而當紅衛兵使用更多的暴力時，林彪亦鼓勵道：「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註九）另一方面，在文革進行得火熱的期間，與文革派對立的黨內的當權派對「紅五類」紅衛兵也抱著接受的態度，因為它的矛頭並非對著自己。正因如此，當中國在毛澤東的壓力下開始批判「資反線」，而當權派亦被迫將工作組撤走時，他們都希

望將權力移交予這些紅衛兵組織。

二 中央文革改變立場決定支持「革命造反派」紅衛兵，並大力批判「紅五類」紅衛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有另外一些學生響應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號召，進行批判工作組，炮轟各級黨委的行動。這些年青人的行動與堅持血統高貴的「紅五類」紅衛兵有很大的區別，他們便是在整個文革進程中真正受毛澤東及中央文革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紅衛兵了。他們的組織再也不單純叫紅衛兵組織，如北京航空學院的叫「紅旗戰鬥隊」、北京地質學院叫「東方紅公社」等。這些革命紅衛兵並非來自高幹的家庭，他們多來自社會上較為中等的階級如手工業者、職員、商販、知識分子，有些更來自社會的低層如家庭有歷史污點，父兄當過國民黨官員、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等。這些人都是在社會上受壓迫的人，以往所有的政治運動都針對他們，使他們成為被批判、被打擊清洗的對象。由於深受現存制度的壓迫，他們經常發牢騷，以致與黨委的關係鬧得很不愉快。文革的〈十六條〉給予他們很大的鼓舞，敏銳的青年感到是次政治運動與以往的甚為不同，打擊的對象是平時掌握實權受社會尊重的當權派，而他們的造反行動亦得到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支持，故此，他們便迅速地組織起來了。

在中央文革方面，毛澤東及中央文革的領導人愈來愈感到「紅五類」紅衛兵已完成其搞亂社會、煽動造反情緒的歷史功能，若再讓它繼續發展，勢必會成為鬥爭當權派的阻力。故此，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於六六年十月便開始批判「紅五類」紅衛兵了，他指出「高幹子弟在各校、各單位文革中佔有領導地位，最好讓給工農兵、普幹子弟擔任。高幹子弟把持領導地位是不利的。」（註十）他的提法立即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支持，而後來毛澤東也指出：

「紅衛兵幫助我們，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鏡、口罩，手裡拿著棍、刀到處搗亂、打人、殺人……這些人多數是高幹子弟。」（註十一）

紅五類紅衛兵殺人最凶殘的例子之一，可算是大興縣三百多名所謂四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被屠殺的事件，在是次大屠殺中，有二十二戶人家被殺絕。（註十二）中央文革愈來愈感覺到「紅五類」紅衛兵的利用價值已經完了，故決定立刻取締之。首先被中央文革取消的組織是「西城糾察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共發出通告強調不論任何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犯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註十三）十一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組與「二司」（紅五類組織）代表談話，明確表示支持「造反派」紅衛兵「三司」，並批評「二司」違反政策，私設刑堂。十二月十七日，周恩來及陳伯達等更出席「三司」召開的大會，作了講話，以表示對「造反派」紅衛兵堅決的支持。

三 環繞「出身論」的爭論——家庭及社會對個人的影響問題

一九六六年下旬，很多中央高幹被正式批判，面對形勢的逆轉，迫使很多「紅五類」紅衛兵商量對策，受父兄輩遭批判之激憤情緒影響，他們將「血統論」推向高潮，寫出了無奈的申訴：

「想當初小將可愛造反有理，
看今朝血統高貴甚麼東西。
橫批：一落千丈。署名，想不通。」（註十四）

引致兩派紅衛兵短兵相接的焦點，便是環繞著紅五類紅衛兵的一副有名對聯之辯論，對聯謂：

「老子英雄兒子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

這對聯一出現，便引起激烈的爭駁，陳伯達、江青為了打倒高幹的目的，便指出對聯充滿封建性，不夠全面，他們並建議將對聯改為：

「父母革命兒接班，
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

當然，陳、江等人的勸告並不符合紅五類紅衛兵的需要，他們堅決地捍衛著原先的對聯，針對陳、江的建議，改寫為：

「父母革命兒接班——當然；
父母反動兒背叛——很難。」(註十五)

當「血統論」在北京盛行之時，曾引起了一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遇羅克的批判，遇在其名著〈出身論〉中指出，界定一個革命者的標準，在於其政治上的表現。家庭或出身固然對個人的表現構成一定之影響，然而，社會的影響往往超越了家庭的影響力。地主、資本家的子女，由於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生活，受社會的影響很大，故此，雖然其父母曾一度是剝削階級，但卻不能從此推斷他們一定是社會上的壞分子。遇更尖銳地指出假若對聯的觀點能成立的話，那麼「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正正由於這種封建性的血統論，使很多有為的青年，變為「狗崽子」，成為專政的對象，「死於非命，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中。」於是，社會上「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註十六)雖然遇羅克的觀點與陳伯達、江青的言論接近，但〈出身論〉卻是他獨立思考的結果，不是中央文革刻意的安排，縱使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震盪，鼓勵著受壓迫者的心靈，但卻由於遇的個別行動超越了中央文革的軌道，遇羅克這位有為的青年後來終於被捕，並於一九七零年慘遭槍決。

第三節 紅五類紅衛兵的掙扎與「十二月黑風」

一 組成「聯動」，對抗中央文革

在面對劉、鄧等高幹正式被批判的衝擊下，部分「紅五類」紅衛兵於六六年底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一開始，

他們就遭受中央文革的打擊，公安部逮捕了很多「聯動」的成員，在此情況下、「聯動」衝擊了抓人的公安部，並喊出「誰敢亂捕革幹革命子弟小心狗頭！」「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的口號，幹部子弟更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指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中央文革破壞大民主。隨便動用國家機器，逮捕紅衛兵……誰要是對中央文革不滿，誰要是給中央文革提意見，就給誰打成反革命……顯然是國民黨的作風。」他們更寫了一首詩攻擊江青，指出她的反覆無常：

「遙憶當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愛我，
且看今日送果人，戴上手銬把牢坐。」（註十七）

「聯動」更於六七年一月一日發出文件，指出其任務為「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締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忠於馬列主義和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此外，有部分「聯動」成員更指出「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看」及「我不敢學習毛選，越學越反動。」（註十八）他們還喊出劉少奇萬歲的口號。從上述情況可以得知，「聯動」成員在大批判的壓力下已意識到他們的命運將隨當權派的下台而終結。「紅五類」紅衛兵過份強調出身，堅持封建制的血統論而把矛頭指向社會上被壓迫者的做法固然絕不可取，然而，他們批評中央文革見高幹就揪、專橫獨斷的意見卻未嘗不合理，正是這殘酷的鬥爭迫使雙方的暴力再推向另一極端。

二 劉鄧的反擊

除了「紅五類」紅衛兵的反抗外，劉、鄧一派在六六年十二月底亦策劃了反擊的行動，林彪於六九年召開的九全大會中指出當時劉、鄧曾進行了一次大反撲，希望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並為劉少奇翻案，這就是後來被批判的「十二月黑風」，與文革派對立的當權派反中央文革的策略約有下列幾點：

- (1) 挑起群眾鬥群眾，並發起工農圍攻紅衛兵，以致發生了連場大武鬥。（註十九）
- (2) 掀起經濟主義風暴。有部分地方黨領導人受到群眾的批判，市民藉此歷史空隙提出了他們抑壓著的不滿，如工資長期凍結、合同工生活毫無保障以及工傷得不到賠償等問題。機巧的地方當權派，聰明地利用了群眾這個希望改善生活的情緒，鼓勵工農群眾大批脫離工作崗位，並發出津貼支持他們往北京告狀。此外，他們更批准農民進城工作，有的還甚至煽動工人罷工，指使群眾包圍銀行，強行提款，造成經濟上的震盪。在上海的當權派默許下，更出現了停電、停水、停交通的三停事件。當權派這些策略在於轉移社會矛盾，加深群眾與整個黨的對立，從而迫使毛澤東在群眾及經濟壓力的雙重打擊下，盡早結束文革，從而達保障自己的目的。
- (3) 劉少奇對十月間所作的檢查翻悔，反口不承認派工作組是錯誤，並拒絕到群眾中接受批判。此外，劉更強調應看後的一個階段，希望最終能把權奪回來。（註二十）一九六七年一月《人民日報》及《紅旗》的社論共同指出：「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大肆宣揚秋後算帳論，揚言還要把革命群眾當作『右派』處理。」

基於劉少奇的反抗，再加上地方黨政首腦對文革的抗拒態度，促使毛澤東決心發動全國性的群眾運動，號召造反派奪權，以全面徹底打擊抗拒文革的力量。

註 釋

- 註 一 〈從謨拜到反叛——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回顧〉載《黃河》雜誌，一九七六年十月
- 註 二 海峰《廣州地區文革歷史述略》，友聯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第55頁
- 註 三 同註二，第49頁
- 註 四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58頁
- 註 五 同註四，第63頁

- 註 六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一九六七年七月
- 註 七 同註六
- 註 八 嚴家其 高舉《文革十年史》，大公報，一九八六年，第76-77頁
- 註 九 同註八，第82頁
- 註 十 陳伯達〈對兩個月來文化革命運動的總結〉，一九六六年十月
- 註十一 毛澤東〈和卡博、巴盧庫同志的談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664頁
- 註十二 同註八，第74-75頁
- 註十三 中共北京市委〈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的重要通告〉
- 註十四 同註六
- 註十五 同註六
- 註十六 邁羅克〈出身論〉《中華文革報》一九六七年
- 註十七 同註六
- 註十八 同註六
- 註十九 《北京井岡山報》一九六七年，第九、十期
- 註二十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祖國》月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第二十八章 文革期間的派系鬥爭—— 「保守」與「造反」

導 言

在文化大革命中，與紅衛兵中的「紅五類」與「革命造反派」的對立情況一樣，整個社會基本上分裂成為對立的「造反」與「保守」兩派，例如在內蒙的呼和浩特市，當地的組織也分裂成為兩派，一派支持呼三司（「造反派」），另一派則支持軍區及擁護軍區的群眾組織（「保守派」），那時，人們相見時，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呼三司觀點還是軍區觀點？」有時更因為觀點不同，一個家庭往往會分裂為兩派，朋友之間也會反目成仇。此外，社會上經常可以看到很多組織在互相武鬥，有的甚至動用最先進的武器，殺到血流成河的恐怖局面。此外，這些群眾組織亦不斷的在分化、重新組合，並出現新的鬥爭，種種錯綜複雜的矛盾往往使研究文革的人感到無所適從。在這章中希望能扼要地把文革期間的派系鬥爭勾劃出一個簡單輪廓，以方便理解派系出現的原因，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說是理解文革動亂情況的一條鎖匙。

第一節 保守派、造反派與逍遙派

在文革期間眾多群眾組織成立的過程中，很多時候出現了物以類聚的情況。當時主要的群眾組織可以簡單的劃分為保守派、造反派及逍遙派。

一 「保守派」

「保守派」是指維護文革以前的社會秩序的人，他們的成員主要是「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的子弟），在共產黨領導下他們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建國廿年的潛移默化使他們對整個社會制度作出衷心擁護，他們強烈的支持各級黨組織，對毛澤東竭

心忠誠，並且常提防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的破壞。在文革初期，「保守派」人士首先加入由黨領導的工作組行列，鬥爭傳統的右派分子，在面對紅衛兵的不同派別時他們支持出身好的「紅五類」紅衛兵，而對「革命造反派」紅衛兵則抱有懷疑及否定的態度，他們完全不明白毛發動文革的目的，對鬥爭高幹的行動亦不理解，況且他們平日與領導關係良好，聽黨委吩咐，做黨的馴服工具是他們政治上的座右銘。他們批評「造反派」紅衛兵是變天分子，剝削階級的子女，企圖在黨內鬥爭中佔便宜，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據在文革中曾發表著名理論著作〈中國往何處走〉的楊曦光後來指出：

「保守派最仇恨造反派，認為造反派是一群對共產黨不滿的地主資本家『狗崽子』，他們認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紅五類」紅衛兵不甘「我們父輩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不能就這樣讓江青這些傢伙斷送掉，我們不能看著她被這些奸臣亂賊斷送掉。」（大略）（註一）

由於形勢使然，在文革中期，「保守派」也被迫參與造反，跟隨政治形勢去鬥爭各級黨委，但他們一般的態度都十分溫和，只是對一些被中央文革正式公開點名批判的上層領導人如劉、鄧等破口大罵，而對本地區，特別在他們所在單位的領導人則採取審慎及保護的政策。這些「保守派」的組織的前身是由當地黨委直接領導的工會或農會，文革期間他們仍堅持接受黨委的領導，並由黨組織甚至軍隊給予武器，去充當對抗「造反派」的工具。文革時毛澤東號召群眾造反，黨委在面對革命「造反派」的挑戰下，也舉起群眾運動的旗幟，「打著紅旗反紅旗，挑起群眾鬥群眾」，暗中支持「保守派」組織以保護自己，在文革期間，「你造反，他也造反，你奪權，他也奪權，你說是革命造反派，他也自稱革命造反派，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註二）由於當權派亦得到長期與其關係密切的群眾組織支持，故「造反派」並不輕易把他們打倒，況且，那個派別才是真正的造反組織，哪個黨委是毛澤東必須鬥爭的對象，不等中央文革的表態是無人可預知結果的，故此，地方當權派乃致力發展「保守派」群眾組織的力量，在群眾互鬥的過程中徹底毀滅「造反派」，造成既定事實來迫使毛接

受其合法地位。

在文革進程中，除了毛於六六年八月大力批判工作組及「資反線」與一九六七年反「二月逆流」的期間外，保守派組織在人數及實力上皆佔盡上風，主要原因有下列幾點：

- (1) 軍區和黨委皆支持保守派，由於軍區有槍在手，中央文革基於壓力也要考慮軍人的意見，故在某程度下並不能給「造反派」太多支持；
- (2) 「保守派」的組織原先長期經由黨委經營，人數眾多，而多習慣聽從命令，紀律較好，而「造反派」方面則是自發結合，經常內鬨，而削弱了團結力量；
- (3) 社會上相當大的一部分人由於建國十七年來潛移默化的影響，習慣接受黨委的領導，他們大多靠近保守派；
- (4) 農民心態由於較為保守，而長期又受農村黨委的控制，他們很大程度上皆支持保守組織，在人數眾多的農民撐腰下，保守組織的實力自非造反派所能比擬。

二 「造反派」或稱「革命造反派」

這類組織成員多數是一些平民，或甚至可以說是政治質量較差、出身較不好的人，他們由於得不到幹部黨委的讚賞，加上與領導關係又不好，以致很難出人頭地，成為新社會下被壓迫、被歧視的人，他們很多與單位內的領導人有一定之矛盾，往往成為政治運動中被打擊的對象，內心對整個制度有一定的不滿。由於經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們較為關注社會上不公正的現象，他們反對官僚主義或「紅五類」等特權情況，在文革中將火力集中在與自己有直接利益衝突的本單位黨政領導身上。他們愛好思考，閱讀一些不同的著作，他們喜歡讀馬列原著，以經典的理論來量度現實社會，他們感覺到黨的領導與其理想距離甚遠，他們非常喜歡毛主席，但在現實生活中卻發覺自己的所在單位有很多的問題，他們不明所以。這類人亦有很多具體的要求，如知識青年要城市戶口、搬運工人希望加薪、工廠的合同工及臨時工要求改為正式工人，改善生

活環境等。

這批「造反派」組織受到毛澤東及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們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走上批判走資當權派及清洗各級官僚的道路，造反派響應毛的鼓動投入批判工作組，在受到「紅五類」紅衛兵鎮壓時，他們大力地支持批判「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封建理論，他們視毛為救命恩人，黨中最民主、最能代表受壓迫群眾的代表。基於此，王希哲曾十分尖銳的批判「造反派」、指他們「實際是最大的保皇派」「最頑固、最反動的保皇派。他們造反，要保衛的就是『布爾什維史太林——毛澤東』專制制度。」^(註三)

「造反派」由於在自己工作單位內職位較低微，人數亦較小，故此在文革期間他們致力走出社會、脫離個別單位的領導而形成跨行業、跨單位或跨地域的造反派組織。由於他們致力批判社會不平的現狀，其觀點一般較易被市民所接受，況且他們一般乃是前一階段瘋狂抄家的受害者，故其對一般群眾的行動相對來說也較為溫和，當然，在鬥爭地方當權派時情況可就不一樣了。在文革後期，由於黨意識到恢復生產，重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故中央文革也命令各「造反」團體成員走向自己的原單位鬧革命，然而，這樣一來，「造反派」的力量即時大幅下降，面臨瓦解並遭取締。其中原因是「造反派」於等級森嚴的本單位中地位低微，力量微小，他們的影響力主要是在走出社會時，聯繫其他造反力量方能造成的，返回本單位就等於拆散其跨行業，甚至跨階層的造反組織。由於「造反派」曾將矛頭指向自己單位的負責人，所以到文革後期在本單位中自然不能逃過被打擊及遭排斥的命運了。

在文革初期，「保守派」在破四舊的「紅色恐怖」日子中，迫害不少「黑五類」分子，這些受迫害者大多數成了後來的「造反派」。此外，「造反派」憑著自己的判斷，針對社會上的不平現象而作出批評，他們的觀點往往為普遍市民暗中所接受，然而，由於「小市民」怕事心理，以及長期接受黨領導的習慣性，能大膽走到台前表示支持「造反派」批判黨領導人的群眾始終是少數。況且，由於工會或農會等直接聯繫基層的組織長期為地方黨領導人所牢牢控制，故毛發動「造反派」批判黨委

時，黨委及當權派的對抗策略便是以群眾鬥群眾，毛澤東也深明這點，他亦了解到支持他的造反派群眾畢竟只是少數，故為保護「造反派」，毛澤東在其大力支持的文革〈十六條〉中，強調「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裡。」此外，〈十六條〉亦規定「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

在另一方面，由於「造反派」成員的出身往往並非紅五類，故於鬥爭時此弱點往往成為敵對派系重點攻擊之目標，「紅五類」保守派組織經常向造反派宣傳：「非紅五類子弟，你要幹革命嗎？……要革命就站過來，站過來我們就歡迎，就團結。站過來是條件，團結是結果。先站過來，然後才是團結，絕不能顛倒！」為與造反派「不光彩」的歷史包袱辯護，毛澤東曾指出：

「階級出身和本人表現也要加以區別，重在表現，唯成份論是不對的，問題是你站在原來出身的那個階級立場上，還是站在改變了階級立場上。」林彪亦指出：「紅五類也有不好的，黑五類也有不黑的，不要唯成份論。」「絕不能以是否衝軍區劃分左派右派，……不要單純從成分純不純，黨員多不多，幹部多不多來分左派右派，來看問題。成分是需要的，但不能唯成分論，主要要看站在什麼線路上。」(註四)

有了毛主席語錄及林彪講話等護身符，造反派便能理直氣壯的批判保守派為「假革命、真保皇」了。

經過文革期間反覆的鬥爭，部分思想較為成熟的造反派開始醒覺了，他們認識到造成社會上種種不公平現象的並非是甚麼劉少奇路線，甚麼個別領導人，而是整個壓迫性的官僚制度，故此，他們引用馬克思就有關民主選舉的原則，要求徹底打碎舊有的國家機器，不能讓舊官吏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然而，這樣的建議卻提得太高了，超越了毛澤東始終是堅持黨領導的原則（毛所批判的只是個別「犯錯」的黨領導人），最後造反派還遭鎮壓。

總的來說，造反派是文革中的悲劇人物，他們響應毛的號召去造反，但卻始終敵不過根深蒂固的黨軍官僚組織及社會的習慣勢力。在文革後期，他們遭致命的打擊而全盤瓦解。然而，他們當中部分人醒覺到社會不公現象應從整個制度入手解決，經過理性的思索後，遂孕育出一九七八年的中國民主運動。

三 逍遙派

「逍遙好，逍遙好，不摸黑，不起早，出了事情沒人找！」是逍遙派人的座右銘。逍遙派是指一些不積極參與運動的人，他們充當逍遙派，乃基於形勢過份急劇變化，昨是而今非的情況使他們消極下來，他們也許是洞悉先機，理解到過份投入運動將會為自己及家人帶來損害，故他們對一切鬥爭皆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遊行集會無專車接送不來，盡量致身於各組織及鬥爭之外。

第二節 派系的勢力分佈

這一節的重點在於研究社會上各不同細胞如工人、農民、政府機關部門職工、軍隊及學生對「造反」及「保守」的態度，可以說，這是對文革期間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對理解文革進展、當權派策略及當代中國是十分重要的，此節觀點主要參考劉國凱及海峰的著作。（註五）

一 工人階級

由於有著嚴格的規章制度，工廠內強調服從，黨的控制亦較嚴密，而工人由於有家庭負擔，處事較為慎重，再加上幾十年的教育，要求他們對黨忠誠，他們亦是現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享受較高的薪金及種種福利。基於此，在工廠內造反派勢力較難發展。工人對黨委態度溫和，對造反派分子亦持否定態度，工人們大多認為這些人藉文革混水摸魚，發洩平日對社會主義的「仇恨」。故此，工廠裡大多數工人皆加入保守組織，組成赤衛隊支持黨委對抗造反群眾。

然而，工人組成「造反派」向廠長奪權的事例也是有發生的，但這主要是集中於中、小型的廠內。原因是假若有一百名工人在一個人數多達數千人的大廠裡造反，他們面對的將是數千人的組織，而廠的幹部亦是一些有光榮歷史的紅軍幹部，進行造反鬥爭是十分困難的。但在中小型廠內的情況就不同了，一百人的對立面可能亦只是百多人，廠長亦只會是一些黨齡較短的幹部，阻力少得多。

此外，亦有一些長期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合同工及臨時工加入造反行列，他們薪金少，工作時間長，職業無保障而又缺乏正規工人所能享受的種種福利，故他們於六七年一月便起來造反，把矛頭直指黨委，要求改善生活。

二 農民

農民的文化水平較低，政治上不甚敏感，加上歷來農民的保守及服從權威的慣性，使他們成為保守派的最忠誠支持者。長期以來，農民的組織都由黨員去組織及領導，據廣州的造反派的調查員在〈廣州郊區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註六)中的研究，在文革期間農民普遍存在著「反對書記就是反黨」、「造反未必有理」、「造反未必成氣候」的觀點。雖然有的地方黨委被鬥倒，但農民看到與黨委關係密切的軍隊仍握有實權，再加上自己一向跟黨政幹部關係密切，在權衡輕重後，還會自覺地力求保護自己一向靠攏的建制力量。

在一些鬥爭激烈的地方，當權派發動保守的農民組織，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企圖一舉消滅居於城市中的造反派。由於農民與城市一向隔絕，彼此無深厚的關係，故農民在城市中的行為很多時表現得更過火，以致迫使中央文革三申五令禁止農民進城。(註七)

當然，農民中支持造反派的組織也是有的，但一般來說力量則較為薄弱，農民造反組織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學生的游說，使農民同意其造反觀點，再加上農村幹部平時的特權化，也激發起一些較膽大的農民希望藉批判運動打擊這些「土皇帝」的威風。

三 政府機關幹部

機關幹部保守分子遠佔大多數，原因十分簡單，各級幹部長期在黨的控制下，習慣因循成規，不敢冒險，況且，國家幹部亦是社會上之既得利益者，自然排斥「造反派」的行動。幹部作為知識分子，其態度也極為謹慎，習慣了建國以來多次的政治運動，他們十分明白批判黨委的人始終不會有好下場，基於現實利益的考慮，他們就更傾向保守組織了。

四 軍隊

軍隊和各級黨委一樣，都是現存建制的保護者及領導者，軍人在文革繼續深入發展的過程中親眼看見社會大亂，自己在黨及政府機關內的老同僚被不斷殘酷批鬥、科研組織遭衝擊，經濟出現大混亂，作為穩定社會秩序的最後支柱，軍隊多數會最終選擇支持「保守」組織，打擊衝擊社會秩序的「造反派」以維持社會穩定。在文革中，可經常看到軍隊訓練各保守組織，甚至發槍枝予他們，甚至出動直接協助其武鬥。

在文革期間，面對兩派的武鬥，軍隊若用一貫的階級分析方法到群眾中尋找左派，那軍隊就十分自然會選那些黨員較多及大多數成員出身好的組織作為支持對象，況且這些保守組織成員與政府關係一向良好，不會批鬥幹部，而只會把矛頭指向出身不好的黑五類，故對現政權及既存社會秩序無威脅。在另一方面，軍方卻懷疑「造反派」奪權的目的乃是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讓這些出身不好的人掌權，後果一定不堪設想，故鎮壓「造反派」就成為文革期間軍隊差不多一貫的立場了。

在文革期間，有一個更直接原因促使軍方對「造反派」採取敵視態度，這就是「造反派」基於種種原因，如軍方保護受批鬥的黨政幹部、幹部將「造反派」的檔案存入軍區以備將來「秋後算帳」之用等，而不停的衝軍區，據中央軍委於六七年一月的統計材料指出：八大軍區全遭到造反派衝擊，全國軍分區以上單位有百分之八十遭衝擊，百分之七十的主要領導被揪鬥；全軍有一千四百多名幹部戰士被打傷，二百五十八人被打死。（註八）

然而，在文革中，亦有部分軍人支持造反派，原因有如下幾項：

- (1) 軍隊內部的權力鬥爭，使鬥爭的雙方各支持一派群眾組織，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
- (2) 毛澤東、林彪所統轄的嫡系部隊，他們服從毛林的指示，以中央支左部隊之身份支援造反派；
- (3) 真正忠於毛路線的地方軍幹部，他們響應毛的號召，支持造反派組織奪權。

由於軍隊內部出現不同取向，故在文革中曾出現一些毛林嫡系的中央支左軍事首腦在進駐地方以支持「造反派」時被衝擊的現象。例如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在下達《四川十條》命令後，便派出軍事將領張國華和梁興初到四川成立革命委員會（註九），當這兩位將軍乘飛機抵達成都時，從機場到市內的交通，已被「造反派」組織的對立面「產業軍」（保守派）所封鎖，在這條機場專用的公路上，鋪滿了仰面朝天的鐵犁耙，汽車根本無法通行。張、梁為安全起見，只好從機場坐直昇機飛過這條危險的公路，以防不測。（註十）

六七年四月中旬的內蒙，亦出現類似情況，當時，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被中央派往內蒙支左，當飛機抵達內蒙機場時，機場人潮洶湧，旗幟標語遮天蔽日，原來是保守派組織正在以示威的方式，迎接這位支左的軍方大員，據有關資料回憶：

「當時滕海清一行被困在白塔機場，長達數小時。到吃中午飯時，有人搞來一些食品，但僅夠幾位首長充飢，隨行人員只好餓肚子。最後，當滕海清一行終於趕到城裡的時候，又被『紅衛軍』等群眾組織和軍區的部分幹部戰士團團圍住，群情激憤的人們把已經暈頭轉向的滕海清拉到軍區禮堂，鬧嚷嚷地大聲質問：『根據什麼定我們是保守派？！』『為什麼不讓我們革命？！』『我們要上北京，我們要見毛主席！』（註十一）

從上述例子得知，當時的局勢是如何的緊張。

五 學生組織

學生組織內保守與造反兩派的勢力較為平均，支持保守派的是出身背景較好的人，而造反派隊伍多來自社會上的低下階級，這問題已在上章分析紅衛兵運動時談過了，故不重述。

六 對派系勢力分報之研析

基於上述的分析，兩派勢力的分佈大體是，在各大省會及大城市中，造反派勢力佔優，而在農村 則保守派勢力較強。原因首先是城市市裡的知識分子人口比例較多，學生組織中造反派勢力較雄厚；其次是保守組織於農村力量強大，所以當兩派衝突後，保守派若被打敗後便會逃往農村依附更大的勢力；第三是大城市中的黨領導倒台屢次出現，更有些高級地方幹部被中央直接指名批判，保守派便失去憑藉，勢力則更形薄弱。

此外，由於工農及機關幹部多加入保守派組織並得到地方黨政官員的支持，故在中央發動群眾批判黨委領導時，黨委們便以群眾鬥群眾的方式保護自己，發動工農群眾大力圍剿親毛的造反派組織，而另一方面又向中央報告，聲稱由於社會上有著這麼多不同的派別，故根本分不清誰才是真正革命的左派。由於毛所支持的造反派受到由黨委策動的工農群眾組織致命的打擊，故毛澤東曾指出：「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情況都是一樣的，都是組織的工農反學生，都是錯誤的……發社論告訴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註十二) 於六七年中下旬，中共中央下達四條通知，強調：

- (1) 不准用任何藉口及方式，挑動或組織工人、農民及市民反學生；
- (2) 凡出現挑動和鬥爭學生的地方，須公開認罪，承擔責任，平息工農、市民與學生的糾紛，絕不許將責任推向群眾；
- (3) 勸說工農、市民不要干預學生運動，相信學生絕大部分是革命的，若對學生有意見，可以向上級機關提出，不要和學生辯論，以免彼

此發生衝突；

- (4) 各級黨領導，不要怕學生、怕工農群眾，要放下架子到群眾中去，與群眾商量解決問題，走群眾路線。

總的來說，文革出現的兩派皆淵源於毛的階級鬥爭論，不同的是，造反派之鬥爭論曾經過毛澤東的改造，故已再不是鬥爭非紅五類或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剝削階級的傳統鬥爭論了，而是將矛頭指向所謂「黨內走資當權派」及各級官員。

第三節 永無止境的派系鬥爭——山頭主義

一 文革不同階段派系鬥爭的情況

文革期間，基於不同的階級利益，「保守」、「造反」兩派劇烈打鬥，彼此皆運用先進武器，將武鬥演變為內戰的規模。由於這兩派代表著社會上對立的利益，有一定之社會基礎，故此，其鬥爭也可反映社會上某種長久對立的現象。然而，在整個文革中，卻亦可以發覺造成激烈鬥爭的原因並非單是基於上述利益分歧，而是意氣用事，互相復仇攻殺的結果，使雙方的結怨到了你死我活的階段。此外，再加上小團體，山頭主義的因素，遂使相同背景的團體也出現無止境的傾軋，使社會已是混亂的情況搞到一發不可收拾，下文將簡略的描述在文革不同階段派系鬥爭的概況，以方便了解文革中群眾運動、互相鬥爭的歷程。

- (1) 文革初期，基於大串連的開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的紅衛兵組織如「首都紅衛兵指揮部」等南抵廣州，他們一到步後便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指手劃腳，頗使氣指，並立即貼出大字報，攻擊當地的當權派。八月二十五日，北京的紅衛兵更貼出大字報，指廣州市是「美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流氓地痞、投機倒把、資產階級殘餘分子的集中地，有如一個賊窩。」並揚言必須清掃。他們亦在破四舊運動中，隨意破壞廣州市人民心目中具有深厚感情的建築物及名勝古蹟。這些行為不能不引起普遍廣州市民的憤慨，而群眾這心理

亦被地方當權派巧妙的利用，成為保障他們的有效力量。為保護廣州的尊嚴，廣州市的紅衛兵也貼出大字報，反擊北京紅衛兵說：「文化毒草，係由北京產生、蔓延到全國」。

- (2) 在文革中段，於一九六七年的各省奪權鬥爭中，地方當權派鼓勵由其長期控制的工農組織及保守派群眾，以打著紅旗反紅旗，挑起群眾鬥爭的策略，以反擊毛派紅衛兵的奪權計劃，這可算是十分典型的造反、保守派鬥爭，而這亦是整個文革期間兩派鬥爭的主要內容。然而，在另一方面，在鬥爭中亦可發覺在兩派內亦會出現不斷的分化，在本派內部也會出現嚴重的鬥爭。這情況之所以出現乃由於本派內的不同組織希望爭奪該派的領導權而導致的。試舉廣東及上海造反派奪權的例子以作說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廣東部分造反組織希望向省領導進行奪權，在推行奪權行動前這些組織希望能擴大聯盟，邀請其他造反組織參與，但是不同組織對造反的行動和看法有所差異，有些組織認為奪權時機已成熟，另一些則持相反意見；有些組織覺得各造反團體間的認識還不深入，要先組成大聯盟才開展奪權計劃，但另一派卻認為大聯合應是在大博鬥之奪權的行動中形成的，故要進行聯合，事先必須立刻進行奪權鬥爭；此外，更有些組織認為奪權行為過份冒險，而實質上他們是妒忌另外的組織已事先壟斷了奪權的全部行動和部署，而自己卻不了解全盤計劃而有一種被忽視的感覺。終於，在奪權成功後，很多曾參與的組織退出，造反派內的衝突日益擴大，終於造成嚴重的分裂與打鬥。六七年二月九日出版的造反派刊物《新北大》評論當時負責整體統籌奪權工作的「省革聯」說：「他們沒有實行革命的真正大聯合，多少革命造反派的組織被他們排斥在大門之外……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同廣大革命造反派組織充份討論、醞釀，自以為聰明，通過秘密外交，聯合少數他們認為革命的組織，匆匆忙忙實行奪權。」

在被稱為全國奪權典範的上海奪權事件中，也曾經過五次反覆才成功。據領導整個行動的張春橋事後轉述，在頭幾次的奪權行動

中，一些工人及紅衛兵組織事先不與其他團體商量，擴大聯合陣線，結果在奪權後由於得不到其他組織的支持，造反派立刻出現大分裂。在第五次奪權時，造反派組織又再分裂為兩大派，一個擁有三十八個造反團體的組織建議奪權後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而另一個影響力較少，但亦有二十五團體擁護的造反組織卻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雙方不斷爭吵，使奪權行動遲遲無法推行。最後還是由於張春橋是中央指定加入地方造反政權的必然成員，而地方政權不能有兩個，故張無論加入那個就等於宣判對立面的造反組織為非法。經過張不斷的游說勸服後，兩大組織才肯妥協，同意在奪權後每個組織皆可在慶祝奪權成功的大會上派出代表上主席台，而為了避免各單位在登報慶祝成功奪權的問題上爭名次先後，故決定不登報，經過多方面的協調，奪權行動才得以推行。

- (3) 在一九六七年中旬開始，中央強調已奪權成功的省份需推行三結合——即軍隊幹部、地方幹部、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所組成「革命委員會」，革命群眾組織肯定不會批准「反動組織」的代表參加，故對每一派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利益分配問題，故此，武鬥雙方皆希望盡最後一口氣把對立面組織打為反動組織，使他們永不翻身，從而保證自己一方能冠冕堂皇的登上革委會寶座。六七月毛澤東發出指示號召大聯合後，造反派再也沒有文革初期批鬥官僚的氣概了，相反，他們蛻變為軍方及官員爭奪權力的群眾工具，為自己在革委會內獲得一官半職而惡鬥不休，他們考慮是否支持一些幹部並不是以他們的理論觀點、才幹及對群眾的態度作衡量，而是看這些幹部是否支持他們那一派，有利他們爭取席位。

二 中央批判山頭主義、「多中心論」

由於造反組織長期分裂，無法通過大聯合組成革命委員會，故文革後期中央開展了對「多中心論」的批判，中央抨擊很多組織在大聯合問題上，抱著「唯我獨左」、「老子天下第一」、「以我為核心」的態度，這些組

織通常自封為當之無愧之核心，由於自我中心主義，他們把其他造反組織看成是聯合對象，甚至要把兄弟組織壓倒、壓垮，以至造成「山頭對峙，群雄割據，處於分裂狀態」，有些「看自己的組織總是百分之百正確，看對方總是百分之百的錯誤……他們相信只有自己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才是真恨、真鬥，再不相信對方也是真鬥，總覺得人家是在假批判，撈政治資本。因此在跟對立組織搞聯合批鬥的過程中，千方百計地突出自己，壓倒對方，加高自己的小山頭。」中央還批判這些組織「散佈懷疑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對上要多中心，對下要以我為中心」，實際上一切要以我為中心，由於過份強調山頭主義，故在支持那一位幹部的問題上，這些組織「只有私利而無全局……敵我不分，人鬼不辨，凡同意我的觀點，不管是人是鬼，是烏龜王八都稱為同志，不准別人觸動，凡不同意我的觀點，即使是同志，也統統當成敵人。」

以上所述繪的可說是文革派系鬥爭的一個淋漓盡緻的表現，以我為中心的自私心態，釀成眾多毫無意義，純為爭名奪利的鬥爭，只有在造反派面對保守組織及支持它們的黨組織及軍隊攻擊時，才由於外來壓力而迫使造反派互相的重新合作，但畢竟造反派於群眾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群眾再不支持這些曾敢於批判社會不公平現狀的造反組織，而文革的群眾運動亦漸漸從中國的政治舞台消失了。

註 釋

- 註 一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87頁
- 註 二 新華社青島電，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 註 三 王希哲《走向黑暗》，民主大學出版，一九九六年，第127頁
- 註 四 林彪〈八九重要講話〉載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一九七三年，第352頁
- 註 五 這節觀點主要參考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及海峰《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
- 註 六 海峰《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友聯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第139頁

- 註 七 中共中央、國務院〈禁止挑動農民構成武鬥的通告〉載同註四，第47頁
- 註 八 地久致武《血與火的教訓》新疆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95頁
- 註 九 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載同註四，第157頁
- 註 十 袁懋如《腥風血雨》，第73頁
- 註十一 圖們、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41頁
- 註十二 毛澤東〈對青島、長沙，西安問題的指示〉載中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一山圖書供應公司，一九七五年，第49頁

第二十九章 全國的大清洗——「一月風暴」與全國的奪權行動

第一節 從上海開展的全國大奪權行動

一 從上海開展的「一月風暴」

雖然在六六年八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中毛澤東成功通過〈十六條〉，明確規定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文革的最主要任務，然而，毛得到的只是險勝，據他事後指出：

「有時只剩下我自己，我的看法是過時了，我只好將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去討論，我才得到半數多一點的支持，但許多同志仍然是不通的。李井泉不通。劉瀾濤也不通。」(註一)

李井泉與劉瀾濤都是十分有影響力的地方領導人，基於黨內各級高幹對文革實際上仍存懷疑，甚至抗拒的態度，以至黨的新領導層仍是親劉派及中間派的天下，要徹底改變這個情況，毛希望通過發動群眾，鬥爭各中央及地方的抗拒文革及毛路線的黨政領導人，以群眾奪權的形式迫他們交出權力，再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級的新領導機關，讓自己的親信掌握全國各級職位的實際領導權，從而再推行其富有理想色彩的激進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

毛曾指出全國奪權乃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要「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主要原因乃是「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中間有一部分被篡奪了，這一部分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所以要革命。」(註二)故此毛估計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元旦《紅旗雜誌》社論指出，「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的攻擊的一年。」

上海是全國奪權行動的起點，而以控制輿論工具開展。六六年底，

極左派幹部張春橋及姚文元便制定鬥爭的策略，當時正值全國「串連」高潮，北京的文革紅人聶元梓也參與了上海的奪權鬥爭。十二月上旬，由中央文革支持的上海群眾組織製造了持續九日九夜圍攻《解放日報》社的事件；一月三日和五日，《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相繼被造反派奪了權。為抗拒造反派的行動，上海的黨政當權派乃以群眾鬥群眾的方式，號召保守派圍攻造反派群眾。此外，更發動「經濟主義」，隨意增加工資、福利、濫發各種補助費、支持群眾強佔公房，鼓勵工人就生活改善問題大批上京告狀，造成工廠停工、鐵路中斷、公路阻塞及港務停頓等現象，把政治鬥爭引至經濟鬥爭道路上去，企圖迫使造反派就範（這點在後面將再討論），當時張春橋曾指出：「對市委不必再抱甚麼幻想」。一月四日，上海十一個造反組織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譴責上海市的當權派以停水、停電及停交通的「三停」陰謀，企圖扼殺奪權行動。一月六日，造反派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宣佈推翻舊市委，並當眾宣讀了三項公告：一、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及市長；二、命令陳丕顯交待反革命罪行；三、要求市委改組前，各部門工作人員繼續執行生產和日常工作。

毛澤東對上海奪權大表支持，他指出「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一月十一日，中央文革、中共中央、黨中央軍委及國務院發表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賀電。從這天開始，上海市各地區，各單位對當權派便開展全面奪權工作。然而，上海的當權派仍握有很大的力量，操縱著不少群眾組織，造反派在鬥爭市委領導時，曾到上海郊區發動一批被前上海市委強迫到農村工作的工人，也起來向市委奪權，然而，想不到市委乃將計就計，大量印發復工證，鼓勵支農工人（即被下放到農村支持農業發展的城市工人）回上海市復職，頓時弄至局勢大亂。一月底，三十三個造反組織呼籲鄉的支農工人不要離開農村、要在農村中造反。

除面對當權派的反抗外，造反派內部也出現不少問題，其中主要是山頭主義及派性等自私觀念作怪，以至有些組織在奪權時被張春橋勸阻，以防止此等組織自我壟斷政權，以引致造反派內部更大的分裂，按

張春橋後來說法，上海先後經過五次反覆奪權方能成功，時間落後於山西、廣西、貴州等省市。

二 中央文革對各地奪權行動的保留

到了二月五日，造反派才能勉強穩住局勢，並發表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指出在奪權後，領導人將按照巴黎公社(即普選形式)產生，而在過渡期內各造反組織則先組成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由群眾組織、人民解放軍及革命幹部三結合組成，然而，中央卻封鎖了這段消息，直到二月下旬，根據毛澤東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委會」。

否定「上海人民公社」並不只是字眼問題，而是牽涉到毛澤東及黨內實力派軍人對群眾運動的看法，假若真正依據巴黎公社原則由群眾選舉領導人，那就十分自然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民主政制了，既然這樣，就再不需要由共產黨由上而下領導，這點不單是當時大混亂的形勢不許可，也是超出毛澤東所能容忍的範圍。他曾指出：「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那裡呢？……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能代表黨嗎？」(註三)故此，很多分析家皆認為毛澤東對群眾運動其實是「葉公好龍」，他支持群眾造反，但假若人民真正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再要黨的領導時，毛與所有共產黨人(包括他要打倒的對象)一樣是絕不能容忍的。

受上海一月風暴影響而進行奪權的省份，有些搶在上海之前，宣佈奪權成功，有些卻成了「假奪權」，得不到毛及中央文革的認可。第一個宣布奪權成功的是山西省。一月廿五日，《人民日報》刊登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通告，宣布奪了山西省委、省人委等黨政機關的軍政大權。《人民日報》更為此發表社論，指出這次奪權是山西的革命造反派、山西省的革命領導幹部、山西省軍區聯合進行的，隱然含有三結合之意。奪權的高潮出現於一月下旬及二月初，被奪權省份包括青島、廣東、貴州、黑龍江、廣西、湖北、陝西、雲南及西藏等。然而，在所有被奪權的地方除上海、北京、黑龍江、山西、山東及貴州所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外，其餘省市的奪權皆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承認，例如廣東造反組織「省革

聯」一月廿三日的奪權、重慶市「革聯會」一月廿五日的奪權及甘肅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會」二月六日的奪權等，都被中央文革批判為「和平過渡的假奪權」，究其原因，乃是這些被奪權的地方的實際領導權仍落在舊黨政當權派手中，而毛所信得過的人於革委會內並未有重大影響力。

三 地方黨政當權派的反擊與「造反派」之分化

面對造反派的挑戰，各地方黨政當權派皆運用下列方法以作反擊，而成為文革期間突出的「保守派」（或稱保皇派）與「革命造反派」的鬥爭：

- (1) 黨政當權派利用握在手中的黨權，「把自己說是黨的化身，把自己的言行說成是黨的領導」，要求黨員及群眾「無條件的服從上級等等」，以打擊向他們奪權的造反派。當權派以維護黨的領導為理由，直接將反對他們的人，打成反黨分子或認為是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而加以鎮壓；
- (2) 利用自己長期控制群眾組織的力量，發動及組織一些「紅色政權保衛軍」、「捍衛團」等「保守」群眾組織，以群眾鬥群眾的方法，保護自己；
- (3) 以上海例子發動「經濟主義」，運用掌握在他們手中的財權，爭取工農群眾為其保駕，還組織罷工、罷市，發動農民進城，搞亂經濟秩序，並準備主動讓權，而把他們所造成的爛攤子，往造反派肩上推，使其成為眾矢之的而壓垮造反派；
- (4) 策劃「假接管，真保權」，指使一些「保皇」之「保守」組織，演出假奪權、將權力交予傾向自己的「保守派」組織，以保存實力。例如西藏拉薩當權派為緩和造反派挑戰，於六七年一月以「毛澤東思想文藝兵戰鬥總部」名義，將文化部及政治部接管，進行假奪權，以化解造反派的挑戰。

除當權派的反抗外，造反派內部也迅速分化，出現各類鬥爭，張春橋曾指出：「提到奪權二字後，我們就看到派性、自私自利、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都出來了。當自己受壓迫時，被人打成反革命

時，就沒有想到這些，一到奪權時，有些人私心雜念就出來了。」就以安徽的情況為例，造反組織「安徽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由於沒有事先進行大聯合，故奪權後受到其他團體所反對，但指揮部自恃實力，鎮壓敵對派，造成極度混亂局面，奪權而不能掌權，無法收拾殘局。

第二節 經濟主義——真正的工人群眾運動及中央對其批判

當毛澤東於北京第八次接見紅衛兵時，上海工人以「赤衛隊」的名義出現於北京街頭，他們指出抵達北京的主要目的是來告狀，以改善生活，並指出問題若不解決，生產將搞不上去。一九六六年下旬，中央自從開展批判「資反線」以來，地方當權派開始被斥責。看慣了學生進行的批判運動，工農也藉此機會申訴他們的要求，他們從實際生活感受出發，指出工資長期被凍結、數目龐大的合同工、臨時工人長期不能轉為正規工人，他們工資少，並不能與普通工人般享受醫療福利，分配眷屬宿舍、退休金，有些臨時工比喻自己的地位還比不上舊社會的童養媳。此外，青年就業、勞工保障、工傷賠償及拖欠加班費等問題也被提出討論。

一 地方當權派利用群眾要求，製造「經濟主義」向中央文革施壓

面對這個真正的群眾要求，精明的幹部很快就研究出解決方法，他們明白工人羣眾的要求無非是希望改善生活，並沒有如紅衛兵般要他們批倒下去的意思，故他們立刻向羣眾道歉，提出要「大慷慨國家之慨，批條子、撥經費」，如上海捲煙廠，忽然出現一個增加夜間津貼的通知，工廠黨委同意把廠內幾十萬元生產資金發放，其他地方也一樣出現提高津貼、增加福利、補給加班費，甚至調整工資和實行將合同工轉為正式工人的方案。

此外，當權派也向工人指出造成生活困難之成因乃是中央經濟政策

失當所致，故組織並發動他們離開工作崗位，北上告狀，以造成停工、停業、罷工的狂潮，使生產停頓，鐵路、公路、航運中斷及港口碼頭癱瘓的情況。另外，當權派更發動農民以串連為名，離開工作崗位，湧入城市，在農村中將生產資金盡量分光，而且更縱容農民不交應還給國家的貸款、定金、稅項及公糧。當權派這個策略十分明顯，是希望爭取大部分工農群眾，將責任全推給中央，更利用生產停頓、市場混亂而給中央文革派施加壓力，使他們明白到再推動奪權，勢必引起社會大動亂，畢竟，長期抑壓的生活壓力始終會匯合爆發為一場真正的針對共產黨的、爭取經濟生活改善的工農革命行動。

工人群眾運動開始時，工人困苦的處境曾得到江青的支持，她聽到臨時工的申訴後，同情得兩度哭泣，連話也說不下去，並曾當面斥責勞動部官員說：「勞動部簡直是老爺部，解放這麼多年了，想不到這麼多工人還這樣苦，你們勞動部究竟知不知道！合同工難道是後娘養的？你也去做合同工去。」由於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工人喜上眉梢了，這樣，就掀起更大的震動。

二 中央文革批判「經濟主義」

但不久，中央文革就醒覺起來，他們明白工人的困難實際上是長期經濟政策的結果，高累積、低消費的發展策略的代價，根本是無法在短期扭轉過來的。此外，毛發動文革之目的並非為改善工農生活，而是藉此運動批倒走資派，而「經濟主義」本身根本就是地方走資當權派利用經濟問題，保存自己的策略，故此，中央文革很快就作出反擊「經濟主義」的決定了。他們批判北上告狀、發放工資等純是走資派收買工人的行動，企圖以經濟福利問題來轉移鬥爭的大方向。上海之造反團體於一月九日曾發出緊急通知，號召各地串連的工人及機關幹部立刻回上海，並廢止各單位簽發的串連證、追回串連費，凍結機關及事業單位動用必需以外的流動資金等十條規定。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以防止當權派提高福利，破壞經濟的策略。

當然，「經濟主義」是當權派反抗文革的策略，但這行動得到廣泛的

支持，反映出群眾在當時確實承受著很大的生活及工作壓力，而希望藉著造反行動向中央傾訴他們的困境，以求改善，故此，這行動可算是文革期間一次為爭取改善生活的真正群眾運動，但畢竟由於它的爭取矛頭並不指向地方黨政當權派以及牽涉太大，故迅速被中央文革否定了。

第三節 軍隊介入奪權與成立革命委員會

一 中央要求軍隊介入，支持「造反派」奪權

「一月風暴」後由於當權派的反擊，武鬥四起，經濟混亂，社會秩序亂成一片，引致造反奪權計劃受阻，面對這情況，毛澤東遂下令軍事介入。造反派之所以能於上海、北京、黑龍江、江西、山東及貴州等地真正奪權，主要便是得到「親毛」的軍隊支持，協助鬥倒當權派及穩定局面。張春橋於上海奪權成功後曾指出奪權「必須有解放軍的支持」，又說：「上海的陸、海、空三軍對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幫助很大。」

毛澤東下令「三支兩軍」(即支持左、支持工、支持農、軍事管理及軍事訓練)，發動部隊「支工」、「支農」藉以維持生產，「軍管」及「軍訓」則為維持各造反派的紀律及穩定社會秩序，至於「支左」一條，則是希望軍人能協助「造反派」奪權，毛當時認為林彪曾於軍中大搞學習毛澤東思想，應可對解放軍操縱自如，故除了為了穩定社會，改變無政府狀態外，更希望在軍管下，從中央到地方各單位，實行徹底奪權，完全取締親劉少奇的各級幹部。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指示林彪：「應該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革命，以後凡是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該這樣作。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註四)要求軍隊能鎮壓反革命分子，更重申「如果他們要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指出：

「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奪權鬥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註五)

在此之後，中共軍隊全面介入奪權鬥爭，雖然軍隊應支持「造反派」的文件在鬥爭開始時增強了「造反派」的聲勢，然而，事實證明，真正服從毛澤東支左的部隊實在十分有限，除了上述六個被中央文革承認的省市外，其他地區的解放軍皆加入地方當權派的行列，協助「保守派」圍攻造反派組織。例如新疆的造反派組織「紅二司」、「兵農造」等向當權派奪權，但卻被由復員轉業軍人組成的「八一野戰軍」一萬餘人和駐石河子的軍隊以各種武器進攻，造成多人死亡和五百人失蹤的「石河子慘案」。內蒙的造反派亦遭軍區武力鎮壓而造成流血事件等。

二 革命委員會內的「三結合」人物

當群眾推翻舊的黨政機關後，跟著成立的便是以三結合為基礎的革命委員會了，三結合所包括的人物為：

(1) 革命群眾的代表人物

由於山頭眾多，故中央文革強調他們應在大聯合中產生。然而，他們在一些擁有多年黨齡及手握軍權的軍事幹部面前，這些群眾只成為點綴門面的工具。

(2) 當地的駐軍代表

軍隊介入奪權行動，成為參與革委會的實力派，在軍事管制政策下，軍隊幹部掌握著地方政權的各個方面，《紅旗》雜誌曾指出：「從上至下，凡要奪權的單位，都要有軍隊代表參加，不論工廠、農村、財貿、文教、黨政機關、民眾團體都要這樣做」。(註六)

(3) 革命幹部

文革期間，大多數幹部皆成為鬥爭對象，後來為穩定業務的需要，解放了很多幹部，要求他們認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繼續執行工作。

由於奪權鬥爭衝擊著社會各個方面，在推翻舊有國家體制後，重新

建立起來的革委會便負擔著「抓革命、促生產」的工作，一面仍繼續領導推進奪權鬥爭，鞏固新政權，對少數被打倒的幹部進行鎮壓，而另一方面則負責維持地方秩序，促進生產。據以往原地方政權的體制而言，盡管黨權實際高於一切，但在形式上，黨的組織管政策，行政機關管業務，地方的權力分別由幾個不同體系的機構來行使，但革委會不但推翻了舊有的組織結構，而更統一管理黨權及政權。革委會中雖包含群眾代表，使它在形式上好像是由造反奪權的各團體、各階層代表所組成，但實際上真正握有權力的，卻是擁有槍杆子的軍事幹部，故在文革後期，當所有省市都成立革委會後，中國遂變為一軍事獨裁的局面了。

註 釋

- 註 一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674頁
- 註 二 毛澤東《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載同註一，第668頁
- 註 三 同上註，第671頁
- 註 四 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載中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一山圖書供應公司，一九七五年，第99頁
- 註 五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通知。〉載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一九七三年，第63頁
- 註 六 一九六七《紅旗》，第五期〈論革命的三結合〉

第三十章 軍事幹部對造反奪權的反擊 ——「二月逆流」與「三月 黑風」

第一節 軍事幹部對造反奪權的基本態度

一 軍方成為地方黨政幹部的保護傘

由於毛澤東號召批判資反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文革要求各級幹部交出六六年中旬工作隊工作時整群眾的材料，以及發動「造反派」進行奪權行動，有一些被「造反派」鬥爭的地方領導人紛紛將各類機密文件轉移至當地的軍事單位，這些文件部分涉及國家機密，但在「資反線」期間挨整的憤怒群眾卻認為這些幹部蓄意收藏起他們的黑資料，以便秋後算帳。

故此，在六七年一月初進行奪權行動的同時，部分「造反派」更將矛頭指向解放軍。為此，中央曾下達〈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在號召群眾不得衝擊軍區的同時，中央文革下令地方幹部不得把整群眾的材料轉移往軍事機關，並提出假若群眾對機密文件中有整群眾材料的質疑時，可由軍事機關與群眾共同查封。拿廣州為例，造反組織「千鈞棒」為追查工作組期間整人的材料，會同其他「造反派」組織，鬥爭了軍區司令部的幹部，當廣州軍區得悉此事後，卻派大批軍人對「千鈞棒」武裝包圍，並予以取締。

二 軍人打擊「造反派」的原因

此外，雖然毛澤東號召軍人介入文革進行支左（即支持造反派）奪權，但實際情況是各地方大部分軍隊都支持「保守派」，壓制「造反派」。根據六七年上旬紅衛兵的資料指出，除北京、上海等少數地方外，各省的軍隊似乎皆對毛澤東支持的「造反派」採取敵視的態度，這個時間軍隊

壓制「造反派」，多是通過支持「保守派」而進行的，例如廣州的「造反組織」在一月奪權時佔領了廣州市公安局，但隨即廣州軍區便支持保守勢力進行反奪權，造成對造反組織一個很大的壓力。軍隊反對文革的態度，曾觸怒了中央文革，故此，六七年一月下旬開始，可以見到了很多「造反派」衝擊軍區的例子，如一月廿六日衝擊福州軍區及二月初衝擊廣州軍區等。衝擊軍區的行動自然引起了軍事幹部對「造反派」的鎮壓，他們在行動前大多數有向中央軍委進行匯報及請示，並得到鼓勵，這也就是後來一些高層軍幹被鬥爭的原因。究竟為甚麼在文革期間軍人與地方當權派多聯成一陣線而對毛支持的造反奪權行動採取對抗態度呢？原因約有如下幾點：

(1) 作為政權的支柱，軍方支持一向擁護黨的民間組織

軍隊是協助共產黨統治中國的重要力量，軍事幹部與一般幹部一樣，是整個新政權的支柱。當時中國社會分析階級的重點，多是看家庭出身及與黨領導的關係，若持這角度研究問題，軍人很自然便會發覺那些黨員人數多、尊重黨領導，平時少批評及處事穩重的組織較為易接受，此外，軍人的妻兒子女及朋友皆大多數參與了這類高質素的組織，故此，軍人便把這些「保守」的組織定為真正左派。與此相反，軍人卻對那些質素參差、對黨抱怨、亂衝亂撞及鬥爭地方幹部的「造反組織」極為不滿，軍人認為這幫人乃混水摸魚，試圖藉文革把共產統治推翻，故他們對這些由毛及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組織採取否定的態度。故此，在文革期間除極個別大軍區外，多數大軍區都支持了共產黨員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復員轉業軍人多的、勞動模範多的及比較遵守紀律的組織。(註一)

當然，軍隊並不會公然反對毛澤東，抗拒文革，他們的做法與地方幹部一樣，向中央聲稱他們根本分不清哪一派才是真正的革命群眾，但實際上卻大力支持「保守派」以武裝力量徹底打垮「造反組織」，造成既定事實，再向中央施加壓力，強迫中央承認其所做成的既定事實。軍人這個行動也帶有很大的戰略意義，因為各地在奪權後均需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雖然軍人肯定能佔一席位，但究竟讓哪些群眾代表與自己共

事也是一頭痛問題，若由「造反派」上台，他們肯定對軍方的行動構成阻力，故此，盡早瓦解它們，從而支持遵守紀律的「保守」代表加入革委會，則軍人的工作一定會容易輕鬆得多。

（2）與各級幹部一樣，軍人皆對毛澤東的極左經濟政策及鬥爭策略採取抗拒態度

劉少奇、陳雲的經濟救亡路線剛使他們感到經濟形勢出現轉機時，毛澤東又推行這個以鬥爭自己同僚為目的之奪權行動。地方軍事幹部對他們的老上司在北京遭受殘酷鬥爭感到激憤異常，他們在地方亦見到長期與自己共事的黨政領導竟在一夜之間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而自己一向掌握的軍事單位亦竟破天荒地被這些「造反派」衝擊，有些軍事幹部亦遭推上審判台，所有是非黑白似乎全顛倒過來，對黨長期不滿的「變天分子」現在卻是趾高氣揚，成為由毛澤東支持的「造反派」，而他們這班老革命卻被著令檢查錯誤。這對那些一向位高權重，有槍杆子的軍人來說無論如何也是忍受不了的。故此，在彭德懷及賀龍有實際影響力的西藏及甘肅等地方中，多次爆發了軍人鎮壓造反派的事件。中共軍委領導人葉劍英對有些「造反派」不顧老幹部心臟病發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鬥的做法，表示十分憤慨！他批評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他更嚴厲的指出：「有人衝我們的國防部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註二)此外，更由於造反行動衝擊了科研單位，在錯綜複雜的鬥爭行動裡面，一些高級科技人員遭受批鬥，社會出現動亂，也引起一些軍人對國家前途憂心忡忡，如當時一篇報導文學引述了當時的混亂局面，反映此情況：

「『聶總啊，哈哈哈！』

沉思中的元帥被震醒了，蕭工？元帥的心立刻像被人狠狠揪了一下。眼前這個瘋漢，正是『紅箭一號』火箭發動機的設計師蕭工。

『蕭工，我是聶榮臻。』元帥隔著幾十步就喊了起來。

『哈哈哈！』蕭工狂笑著，一雙眼迷茫無光，『科學有罪、有罪……你

不見，有了化學就有了毒氣，有了鏈式反應就有了原子彈。……』隨即，元帥跑前緊緊抱住了瘋漢。

神智昏迷的漢子在聶帥懷中掙扎著，撕扯著他的軍大衣。

『小蕭，聽話，別鬧……』聶帥噙著熱淚，像哄孩子似地喃喃說道。『人類需要科學，小蕭。如果我們掌握了熱核發電，就能讓每個人佔有一千千瓦，一萬千瓦！這就是光明，就是溫暖……五百萬軍隊，七億人民都要對你們說聲謝謝的……』說著說著，聶帥臉龐上滾下了兩行淚珠……』(註三)

這篇報導文學也指出聶榮臻曾向朱德匯報，「我這次去新疆，順便捎帶地跑了十二個單位，其中十個單位已經亂套了。有個前線機場，飛行師晚上挨批判，白天還要指揮飛行訓練，人半月裡瘦了二十多斤。」(註四)

當然，批鬥知識分子的罪行並不能全推在造反派身上，「紅五類」紅衛兵及工作隊亦需負上一定的責任。然而，這卻不能否定假若中國社會不是出現了這翻天覆地的文革，上述悲劇亦應不會發生，所以，怎樣穩定局面，恢復社會秩序、就成為軍人關心的問題。

(3) 軍方一向重視紀律，反對混亂

在文革中可發覺有部分軍人亦支持毛的奪權行動，這可能是由於他們為毛林的嫡系，認同文革的觀點，但卻有一部分軍人支持「造反組織」衝擊軍隊，批判軍隊領導人，目的卻是為自己權力更上一層樓的權力鬥爭行動，這自然受到軍事當權派的反抗。

在文革開始，負責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及其他軍委的領導人皆強調「無論天下怎樣亂，一定要穩住陣腳。只要軍隊不亂，天下就保得住。」(註五)葉劍英更要求軍隊必須聽從統一指揮，一律不准上街遊行，一律不參加地方的批判大會，他並指出「軍隊與地方不同，軍隊運動一定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不能亂，不能隨便揪鬥、處分幹部。」(註六)

然而，在六六年八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形勢開始逆轉，「踢開黨委鬧革命」變成風尚，群眾造反運動日趨激烈，林彪亦開始對軍隊中「冷

冷清清的狀態表示極不滿意，他指責軍隊的領導怕字當頭，縮手縮腳。六六年十月五，中共中央軍委根據林彪的提議，提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要軍隊院校取消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並要和地方院校一樣，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項指示，是軍隊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由穩定演變為混亂的重要轉折。

六六年冬季，葉劍英、聶榮臻、陳毅、徐向前及劉伯承等幾位元帥經常在西山見面，交換情況，他們皆對文革期間的混亂狀況感到憂慮。

「一天，陳毅氣憤地說，把老幹部都打倒了，軍隊和國家能保住嗎？葉劍英深有同感，說：『這樣搞，把我們的老傳統都搞亂了！』『軍隊無論如何不能亂』，並談了繼續穩定軍隊的辦法。陳毅聽了，舉起雙手說：我到陰曹地府也舉雙手贊成你！」

有一次，幾位元帥在西山聚會。年高體弱、雙目失明的劉伯承元帥，激動地問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見，現在是甚麼樣了？』他邊說邊走到其他的元帥身邊，伸出隻手，一個一個地從上到下撫摸著老戰友。大家握著他的手，熱淚盈眶，捨不得放開。陳毅沉痛地說：『現在看不見最幸福，看了更是糟心。』（註七）

六七年元旦剛過，全國出現「大奪權」，為配合「造反派」的奪權行動，掃除群眾運動的「絆腳石」，林彪提出針對軍事首腦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一月四日，解放軍報社論批判妨礙徹底推行文革的阻力，「主要是來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次日，《人民日報》轉載此篇社論，「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迅速蔓延至全國。

一月十一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央軍委發出改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新的全軍文化小組由中央軍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領導，不再隸屬於總政治部。當時全國皆出現了衝擊軍區的浪潮：

「北京、沈陽、昆明、福州、廣州、南京、蘭州、成都、新疆等軍區和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許多負責人遭到揪鬥，被逼得東躲西藏，奔赴異地。告急的電報、電話紛而沓來，要求葉老帥給以保護。」（註八）

來自南京的報告說：一些軍事院校的學生，大造南軍區的反，軍區有八個領導人被揪鬥，被罰跪。軍區司令許世友情緒不好，經常喝酒，聲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開槍（註九）後來，許世友躲進大別山，打電話向葉劍英求救，葉劍英設法把許接到北京，住進京西賓館把他保護起來。（註十）

來自瀋陽軍區的報告則說：軍區領導機關受到嚴重衝擊。副司令員唐子安被造反派揪鬥遊街，還被殘酷的肉刑迫害，險些致命。（註十一）

而福州軍區司令亦來電指出：「『首都三司』的學生到福州胡鬧，弄得戰備工作都無法搞下去了。」他憤慨地說：「如果再這樣搞，我就要上山打游擊去了。我懷疑毛主席身邊有壞人，可要警惕啊！」（註十二）

徐向前元帥亦回憶道：

「當時，軍隊亂得一塌糊塗。各大軍區的主要領導同志紛紛來京，住在京西賓館『避難』。駐京部隊的許多領導幹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無法無天，到處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軍事機關、搶劫武器彈藥……軍隊指揮失靈，無法擔負戰備任務，我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當然著急。」（註十三）

當時由於「造反」的氣焰高漲，中央全軍文革小組對各軍區的求救只能採取較中立態度，例如徐向前曾就內蒙軍區的求救作出批示：

1. 軍隊不得動武；
2. 對兩派群眾組織情況不明時，不要輕易表示支持任何派；
3. 如群眾組織發生武鬥，派部隊徒步前去勸解。（註十四）

基於軍隊出現混亂，在軍人的壓力下，中央軍委會於一月底公佈由林彪口授並經毛澤東批示的〈八條命令〉（註十五），〈命令〉要求參加串連的群眾返回本單位鬧革命；一律不準衝擊軍事機關；不准搶劫文件、檔案和資料；對於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革命分子，准許軍隊對他們採取專政措施；在軍隊內進行大辯論時，應用擺事實、講道理方法，不允許用對待敵人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無命令自由抓人及體罰等。〈八條命令〉使軍隊有了鎮壓造反派的法理根據，由於甚麼是證據確

鑿的反革命組織並無客觀定義，軍人便可把衝軍區、批鬥幹部的「造反組織」定為反革命而加以鎮壓，在另一方面，由於軍方與「造反派」的矛盾激化以及中央文革對造反派的支持，衝擊軍區事件仍連續發生，一些軍幹被抄家、機密文件遭盜劫，面對這種情況，軍事當權派終於與中央文革爆發一場正面鬥爭了。

第二節 軍隊抗爭與「二月逆流」，中央文革與實力軍人的正面衝突

「二月逆流」的本質是軍人與中央文革第一次正面對抗。面對社會上混亂局面，幹部被批、生產停頓，實使很多老革命家憂心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在六七年一、二月間的中央軍委會上，特別是在二月十四和十六日周恩來主持的於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之政治局碰頭會上，軍人及老幹部陳毅、葉劍英、譚震林、李先念及徐向前等與中央文革領導人江青、康生、陳伯達及謝富治等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軍人及老幹部提出三個重要原則問題：

一 文革要不要黨的領導

葉劍英質問張春橋：「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甚麼！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譚震林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甚麼東西？是形而上學。」

二 文革期間要不要穩定軍隊

葉劍英批評中央文革：「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徐向前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

三 老幹部應不應該都被打倒

葉劍英指出：「老幹部都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產，對犯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那有隨便打倒？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樣做工作？」徐向前質問中央文革：「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了？要讓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譚震林更指出：「蒯大富，是個甚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陶勇、閻紅彥有甚麼罪？都給整死了！四十年的革命，落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我一輩子沒哭過，現在我真想哭上三天三夜。」李先念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李先念更為「紅五類」紅衛兵辯護：「聯動怎樣會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嗎？」(註十六)就此點，聶榮臻也作回應：「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毛澤東在軍委八條命令中特別加了一條，各級幹部要嚴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責任就在父母，不能為了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註十七)

二月十六日晚，江青等人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紀錄呈交毛澤東，毛澤東大為憤怒，大力批判譚震林，連周恩來亦遭責難，毛說：「如果有人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我就反對他。如果你們這樣幹，可以把張國燾和王明請來。我帶林彪和葉群去南方。把江青和康生留給你們。可以砍江青的頭，把康生充軍也不要緊。」

第三節 「三月黑風」——軍隊對地方造反派的鎮壓

譚震林及其他老幹部的二月抗爭行動，僅是軍事當權派反擊文革的一面。更為重要的是從北京到地方的軍事幹部皆對造反派進行鎮壓，在《八條命令》、中央軍事高幹抗爭，與軍方組織握有實權的優勢下，大批「造反派」組織被軍方解散，「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遭逮捕。

在三月底當北京「造反派」以大字報攻擊葉劍英、陳毅及徐向前等軍事領袖時，多數軍區曾於同日舉行武裝遊行，進行示威表示抗議，表達了軍人對他們的老上司遭批鬥的嚴重不滿。在〈八條命令〉後，衝擊軍事機關的風很快便被煞住，軍隊大規模鎮壓造反派的情況在各地陸續發生，其中事件包括有：

第一 濟南軍區於二月下旬調動駐軍取締以「山東省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總部」為主體的十多個造反組織的成員，逮捕了大批造反群眾，並宣佈這些造反組織為反革命組織，鎮壓過後還連續數天出動大批滿載全部武裝士兵的汽車示威遊行。（註十八）

第二「青海二·二三」事件中，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對「造反派」進行鎮壓，在二月廿三日一天內，「青海八一八紅衛戰鬥隊」和北京駐青海紅衛兵多人被殺，二千多人受傷，數千人被逮捕監禁，軍區宣布「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為反革命組織，予以解散。（註十九）以上一切情況，趙永夫皆向葉劍英作出電話報告，葉劍英並指出：「你們打得對，打得好！」（註二十）

第三 武漢軍區把很多「造反組織」取締，骨幹人物遭逮捕，一般成員亦須登記及檢查。武漢於三月十七日深夜一時全市統一行動，逮捕造反派群眾。三月二十一日，軍區又發表〈通告〉宣佈解散「造反」組織「鋼工總」及其所屬組織。在軍人的壓力下，很多尚未被取締的組織紛紛面臨瓦解的危機，很多成員宣佈退出，在另一方面，對立面的「保守派」群眾組織卻得意洋洋，在面對造反派批評軍方鎮壓行動為「三月黑風」時，他們則說：「三月東風浩蕩，軍管成績輝煌。」

在實力軍人對造反派採取強硬手段的情況下，毛澤東的造反行動遭遇遇到文革進行以來最大的挫折。

第四節 中央高層鬥爭與地方鬥爭的關係

這節主要以四川的「二月鎮反」事件，來反映高層鬥爭與地方鬥爭（軍人與「造反派」）間的微妙聯繫。

就在中央懷仁堂會議的第二天，即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葉劍英簽發由成都軍區起草的中央軍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等造反組織的公開信。從二月十八日開始，成都軍區先在成都地區，後在全四川，用飛機散發這封公開信，信中宣傳了中共中央一月十四日〈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宣傳了〈軍委八條〉，指出造反派把鬥爭矛頭指向解放軍，提出「砸爛成都軍區黑司令部」的口號、向軍區靜坐示威及企圖衝擊軍區的行為是嚴重違反中共中央的決定。^(註二十一)信中並警告造反派：「你們不要把鬥爭鋒芒指向人民解放軍。嚴重後果由你們負責。」^(註二十二)然而，造反派根本全不理會軍方的警告，他們肆意衝擊軍區機關，軍方在雙方衝突加劇的情況下，抓了數萬群眾，曾經參與四川文革的袁懋如從「造反派」角度對此歷史片段有以下的敘述：

「二月十七日上午，成都軍區出動若干架飛機在全省範圍內，散發他們早已印好的大量的所謂『中央軍委的二·一七來信』，成都市的政治空氣突然變得異乎尋常的緊張，下午全市保皇派以『成都產業工人戰鬥軍』為首，聚集在人民南路廣場，會後向造反派遊行示威。」

「晚上，從七時開始，全城戒嚴，大逮捕開始了，這是由成都軍區、成都市公安局、以產業軍為首的保皇派的聯合行動。整個芙蓉城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籠罩，載人的大卡車、吉普車，晝夜不停的駛向成都市各大監獄，手銬釘噹聲，皮鞭的抽打聲，繩索的捆綁聲，造反派戰士的怒吼聲，不絕於耳。……」^(註二十三)

「與這些行動相配合，成都軍區出現了大批軍用吉普車、摩托車，並攜著各式武器，以及通話機等，日夜巡梭在全市的每一條街道上。……在成都市各主要街道和鬧市地區貼滿了『鎮反！鎮反！鎮反是當務之急！』『抓革命，促鎮反！抓鎮反，促生產！』『堅決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積極行動起來，堅決鎮壓反革命！』……」^(註二十四)

後來，中央形勢急轉直下，在二月十八日夜，即成都軍方逮捕「造反派」的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毛在會上極為嚴厲的

指責譚震林等領導人，其發言的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這次文革失敗了，我就和林彪再上井崗山打游擊。又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說罷退場（註二十五）

由於毛澤東的表態，文革派頓時佔盡上風，各軍事將領遭批判，中央的態度隨即影響地方文革的進度，中共央於五月七日作出〈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指出「成都軍區一部份負責人，在二月下旬以來，被當權派操縱，援助保皇組織，把革命群眾組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八二六兵團）當成反革命組織，逮捕了許多革命群眾，同時隨便派遣軍隊到宜賓，支援宜賓軍分區，鎮壓革命群眾，並逮捕許多群眾，鎮壓萬縣示威遊行時，造成大流血事件。」（註二十六）

註 釋

- 註一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200頁
- 註二 范碩、丁家琪《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574頁
- 註三 所國心、樂欣《活捉四人幫內幕》，新秀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32頁
- 註四 同上註，第31頁
- 註五 同註二，第567頁
- 註六 同註二，第568頁
- 註七 同註二，第576頁
- 註八 同註二，第579頁
- 註九 張雲生《林彪秘書回憶錄》，存真社，一九八八年，第58頁
- 註十 同註二，第579頁
- 註十一 同註九
- 註十二 同註九
- 註十三 同註一，第195頁

- 註十四 圖們、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一九九五年，第28頁
- 註十五 〈中共中央軍委會命令（八條）〉，一九六七年一月廿六日 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一九七三年，第64-65頁
- 註十六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407-409頁
- 註十七 昌隆編《元戎蒙維記》，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第40-41頁
- 註十八 新華社，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
- 註十九 新華社，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
- 註二十 同註一，第204頁
- 註二十一 同註一，第203頁
- 註二十二 同註二，第589頁
- 註二十三 袁懋如《腥風血雨》，第39-41頁
- 註二十四 同上註，第42-434頁
- 註二十五 同註一，第216頁
- 註二十六 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載同註十五，第157-158頁

第三十一章 中央文革再度「支左」，引發大武鬥與武漢兵變

第一節 中央文革再度「支左」——造反勢力再次興起

文革前林彪在軍中曾大搞崇拜毛澤東的造神運動，以為藉著毛的威信一定能促使軍人支持「造反派」奪權，控制局面並完成清洗計劃，誰知事與願違，出了個「二月逆流」及「三月黑風」，造反派組織幾乎全面被軍方瓦解。假若在此時刻順勢結束文革，盡快解放曾被鬥倒的幹部，並安排這些幹部重新工作，相信局勢很快會平靜下來。然而，這樣做無疑與毛事先計劃的大清洗、徹底搞垮劉少奇於黨政內的全部基礎的政策互相違背，故此，毛澤東遂利用其權力，改變「造反派」被鬥爭的頹勢，進行一次反擊。

一 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反擊軍方的策略

除了前章提到的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對軍事首腦們極為嚴厲的指責外，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在二月下旬開始進行了一系列反擊活動：

（1）為「二月逆流」定性為反革命事件

針對中央及地方軍事首腦對文革的抗爭，毛澤東明確批示當時「從上至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註一)，跟隨著毛澤東的思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陳伯達亦提出軍事首腦的抗爭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的復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註二)並提出要「迎頭痛擊復辟資本主義逆流！」^(註三)而林彪亦於三月二十日的軍隊以上幹部會議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註四)林彪進而批評有些黨政幹

部，在社會主義時期「蛻化變質，變成資本主義分子」，他進而肯定文革帶來的混亂，認為這是把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得落花流水，把他們打亂了。這樣的亂，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註五)

文革派通過對「二月逆流」的定性，迅速把反擊軍方的行動推向各地。

(2) 下達文件與社論，為各地「造反派」平反

一九六七年在四月初，中共中央連續下達多個文件，號召軍隊愛民，並為各造反派組織平反，四月一日的〈一一七號文件〉說：「不得隨意宣佈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註六)，並指出不能把群眾打為反革命，許多外地學生幾次衝入中南海和一些軍事院校，但中央軍委並無斥責他們，講清問題後勸他們回去就是了。既然中央也是如此，文件強調那些因向軍區提意見或衝軍區而被打為反革命的群眾，應立刻釋放平反。四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強調「造反派」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正確。

(3) 制定中央軍委〈十條命令〉，以否定過往軍委的〈八條命令〉

〈十條命令〉中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准開鎗」，這一「不准開鎗」的命令，使軍隊失去了抵抗能力，〈十條命令〉更嚴令軍隊不許亂指群眾組織為反革命組織，不准隨意捕人，已解散的組織一律恢復。〈十條命令〉更提出不能僅僅根據是否衝擊過軍事機關這一點來分左、中、右。(註七)此命令表面看來是要求軍方正確對待群眾，但實際上是為「造反派」平反及打氣。

(4) 批判軍事首腦

在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為「二月逆流」定性後，中央於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三日接連召開七次「政治局生活會議」，對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及譚震林等軍方將領進行圍攻批判，康生指著徐向前道：「徐向前呀，軍隊不是你的，你有甚麼了不起呀！你要為劉少奇，鄧小平翻

案，想要反黨嗎？」(註八)江青則道：「你們的目的是想維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註九)

在三月鎮壓期間，由於地方軍人在打擊造反派組織時皆有向中央的全軍文革小組匯報，故為打擊軍人的鬥志，六七年一月到八月全軍文革小組曾發生三次大改組，一月十一日的第一次改組，清算了小組組長劉志堅，換了徐向前；四月中的第二次改組，撤換了徐向前，改為由蕭華擔任組長；八月的第三次改組，則又批倒了蕭華，換了吳法憲。各人被打倒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地方軍人鎮壓造反派、抗拒文革的進行有關。此外，在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工人體育館中，中央文革召開了十萬人的批鬥大會，批鬥台上站著的彭德懷、賀龍、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及聶榮臻等四十七位高級軍幹，他們被當作為「帶槍的劉、鄧路線」的代表，以及「二月逆流」的黑幹將，故被揪出來示眾。中央文革揪鬥這些老帥的目的是希望警告地方軍人，指出他們若不聽從中央文革的指示支持造反派的話，他們將會與他們的老上司一般，得到被鬥倒的下場。

四月中旬，軍委召開大會議，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逼葉劍英等元帥作檢討，並緊接著製造一系列事件：

1. 改組全軍文革小組，宣佈徐向前不再管全軍文革的事；
2. 六七年五月十三日，軍隊文藝界的兩派在北京展覽館劇場發生武鬥，林彪利用此事件打倒中央軍委政治部主任蕭華，號稱砸爛「總政閻王殿」。
3. 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後「造反」、「保守」兩派的矛盾，追查地區軍方「罪魁禍首」趙永夫的「黑後台」葉劍英。(註十)

(5) 民間對軍方的反擊與地方軍區被迫檢討

與上層的批判大會互相配合，中央文革亦在社會上掀起大規模的反擊「二月逆流」的群眾運動，首先是三月上旬，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學生領袖譚厚蘭帶領千多名學生衝擊譚震林主管的農業展覽館，康生亦到場支持，高呼「譚震林欺騙毛主席，罪該萬死」口號。(註十一)

三月十四日，北京更出現十萬學生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反擊「二

月逆流」，打倒國務院五位副總理和軍委四位副主席，以及「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為口號。(註十一)

基於文革派凌厲的反擊行動，地方軍區暫時停止了鎮壓行動，同時還採取了其他緩和「造反派」情緒的措施，在這期間多個軍區領導人並相繼被迫發表聲明，承認在支左工作中曾犯嚴重錯誤，要求革命群眾幫助改正。例如：

1. 福州軍區被迫承認「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許多錯誤，犯有方向路線錯誤」，「我們又錯上加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把所謂肅清『一、二六』(衝擊軍區行動)的流毒，與打擊牛鬼蛇神的活動混在一起，並強調反對這方面的右傾情緒」，「出面共逮捕、拘留了兩千多人，取締和解散了八十個大小組織，嚴重地打擊了一部分革命群眾，使運動一度冷冷清清，並導致許多地區一派壓一派的局面。」(大略)(註十三)
2. 廣州軍區則自我批評「沒有肯定革命小將的鬥爭大方向，而把他們的某些錯誤看得過重，並以對所謂「四大事件」(即衝軍區、衝廣播台、衝公安局和舊省委們奪權)的態度來判別群眾組織的性質，以致模糊了識別左中右的界限，打擊和壓制了某些革命組織」，「擴大了打擊面，抓了一些不該抓的人，我們還壓制了某些革命群眾組織的活動」(大略)(註十四)
3. 廣西軍區亦指出：「在南寧市的支左工作中，支持了一派，壓制了另一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給「造反派」四四二「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壓力，起了壓制造反派的惡劣作用。」(大略)(註十五)

中央下發了青海及安徽問題的決定，指出「青海二·廿三事件」為反革命政變，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被指責為反革命分子，(註十六)立即受拘押。〈安徽決定〉(註十七)則命令軍方立即釋放被其逮捕的群眾，並為「造反組織」平反。此外，中央更將四川、青海、內蒙、河南等鎮壓造反派行動，歸咎於當權派王昭、王逸倫、王鐸及李井泉等人策劃，而它的背後有中國赫魯曉夫(即劉少奇)的支持。

二 中央文革強調不能以階級成份劃分「左派」

在這段期間，中央領導人多次勸告軍人不應只以成分、黨團員的人數多少，來判定哪個組織才是真正的左派，林彪曾指出：「你們絕不能以是否衝軍區劃分左派、右派……不要單純以成份純不純，黨員多不多，幹部多不多來分左、右派，來看問題。成份是需要看的，但不能唯成份論，主要看站在甚麼路線上。」(註十八)

在六七年四月初的幾天內，形勢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使「造反派」大感鼓舞，「造反派」組織迅速恢復，並吸收更多的人參加，「造反派」衷心感謝毛澤東在資反線後第二次解放他們，而更死心塌地為毛的奪權行動服務。在另一方面，軍方一時感到手足無措，不准開槍的命令無疑等於叫他們向這些不顧社會秩序的「造反派」投降，但不久，軍人就開始重新運用地方黨政幹部的策略，暗中支持「保守組織」與「造反派」對抗，這就引起了六七年五、六月間大武鬥的風波。此外，軍人也明白到一日他們手中有槍桿子，中央文革始終不能對他們怎樣，但為著敷衍中央的三申五令，軍人們多寫檢查書，承認支左的錯誤。

三 周恩來的兩難境地——為「造反派」平反及平息軍人憤怒

當時中央文革實處於一種兩難境地，它們一方面要為「造反派」平反，但又不敢過份開罪軍人，以免造成社會過大的動亂，導致經濟崩潰。能肩負起這極度困難任務的，就要靠周恩來了。周從毛發動文革開始，便感覺到這運動根本無可抗拒，故他遂站於毛的一邊協助推動，為文革小組解決若干實際問題，成為毛推動文革的潤滑劑，但在另一方面，他在不明顯違反毛的意旨下，盡力維護各級領導幹部，阻止武鬥，維持秩序和紀律以及經濟的發展。此外，他並盡力調解中央文革與實力軍人的糾紛，使軍方首腦不致逼虎跳牆，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例如周於六七年四月在廣州的行動，足以反映出他當時的

苦心及高度的政治技巧。為替「造反派」平反，周恩來於四月上旬於中山紀念堂召開了有廣州兩派及軍人出席的八千人集會，一位當時曾參與會議的「造反派」——旗派——紅衛兵十分傳神的回憶當時情況：

「老周(周恩來)首先分析廣東形勢的複雜性和重要性，進而批評我們旗派(造反派)衝擊軍區的錯誤。這給予我們迎頭一盤冷水，沒有希望了。東風派(保守派)那邊人馬正在勢烈鼓掌，幸災樂禍呢。『衝擊軍區也算不了大問題，毛主席也允許革命小將犯錯誤，只要以後不衝便行了』，老周又給我們一顆定心丸，於是戰友中有人站起來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等口號，我們開始有些信心了。

『廣州的三面紅旗(指「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是左派組織。』老周真夠眼光，我們開始雀躍起來，東風派被老周這一句嚇到目瞪口呆。萬歲、萬歲的口號聲在我們千萬紅旗戰士間此起彼伏。

『黃永勝同志(軍區負責人)是毛主席信得過的』老周當眾提保，也即是批評我們炮打黃永勝是不對的。這時東風派顯得甚囂塵上。

『有人說，地總、紅總是老保組織，我就不同意這種說法……』老周還未說完，狂風暴雨似的掌聲由『老保』響起，片刻後，掌聲還未完全停下來，老周繼續說：『他們只不過偏於保罷了。』這一點話使沸騰起來的『東風派』的情緒突然降到冰點以下，我們的掌聲代替了先前他們的掌聲。』(註十九)

從周恩來於廣州的活動可以看出，為了按照毛澤東的旨意給「造反派」組織平反，並同時安撫軍人，緩和「造反派」與「保守派」的仇恨，從而避免社會的大衝突，周恩來用盡其政治手腕，極力討好各方面，使文革能較有秩序及穩定的進行。

另外，周恩來在四月底就福建問題的講話中，也堅持各派在鬥爭當地黨政領導人葉飛的同時，應該容納其他組織，共同搞大聯合。此外，由於福建之戰略地位，鄰近台灣，軍隊必須負起繁重的偵察任務，故周恩來勸喻造反組織不得再衝軍區，並希望他們與軍隊的領導人保持友好

關係。

從周恩來以上兩次行動可知，他致力勸阻造反派再衝擊軍區，以免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在另一方面，他亦對福建及廣州軍區作出指示，督促其作檢討，以扭轉三月時支左方向的錯誤。最為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在肯定造反派得以平反的同時，號召大聯合，使廣州能順利召開春季商品出口交易會，以及福建軍區能繼續肩負起偵察敵情的任務。然而，周恩來的行動卻不一定是經常可順利的推行，例如內蒙的保守派組織由於並不同意中央文革於六七年四月支持造反派的《4.13決定》，故在一次接見會中對親自解釋《4.13決定》的周恩來大喝倒采，當時很多幹部群眾當場鼓噪，呼口號，鼓倒掌，吹口哨，甚至中途離場，這種混亂的場面，是周恩來幾十年革命生活中極少遇見的，以下是當年接見會的一個片斷：

「周恩來：我們理解你們的心情，喂，靜一靜！(繼續呼口號)同志們！同志們！我們理解你們的情緒，同志們！同志們！同志們！(繼續鼓掌)同志們！同志們！同志們！不要再鼓掌了，同志們，我們理解你們的情緒，我們理解你們的情緒，你們聽我講嘛！同志們(鼓掌)，不要鼓掌，聽我講嘛！……」(註二十)

第二節 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大武鬥

由於中央再度支左，造反派組織迅速壯大起來，他們憑藉當時的優勢，奮起向軍方抗爭，要求釋放仍被拘押的「造反派」成員，及迫令軍方承認支左問題的錯誤。從四月開始，面對造反派大肆批評，使軍方及保守派大為氣憤，雙方的罵戰迅速激化。造反派由於理直氣壯的批判社會不平現象，得到群眾普遍的默許。在雙方進行文鬥的同時，「保守派」在軍方暗中支持下與「造反派」開展武鬥，當時由於不同派別的矛盾在激化，以及要急速建立革命委員會，這就很難避免出現一派壓一派，你死我活的鬥爭。而在壓服對方的過程中，武鬥的程度大為升級。武鬥開始時，人數眾多的保守派大佔優勢，再加上軍方暗中向他們提供武器，以

致形成造反派遭受捱打的局面。然而，情況亦出現了變化，由於〈十條命令〉規定不准解放軍開槍，因而開始有部份造反派組織開展了搶槍行動。

中央面對當時普遍發生的武鬥局面，恐懼武鬥擴展為內戰，故於五、六月期間，不斷發出反對及嚴禁武鬥的指示，其中較為重要的是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立即制止武鬥〉及六月七日黨中央發表的〈通令〉〈七條注意事項〉等，這些文件主要的內容為強調嚴禁打、砸、搶、抄、抓，不准動用交通工具，調動人員參加武鬥，並批評有些團體抓住對方的缺點不放，拚命上綱，熱中於打內戰，人為的製造對立，以導致武鬥，文件更規定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抓人及私設公堂等。然而，這些文件好像石投大海，根本無人響應，武鬥更是迅速蔓延。

到後來，中央文革及江青等更從保護一直處於被捱打的地位的「造反派」角度出發，公開表態，她在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接見河南代表團及九月五日接見安徽代表團時，明確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在勸喻對立雙方不要訴諸武力解決問題的同時，叫造反派不能太天真爛漫，「當階級敵人向你們進攻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麼行呢？故聲明有人要和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還擊。」（註二十一）

四川成都的武鬥異常激烈，保守組織「產業軍」得到成都軍區的支持，與造反派開展大規模流血衝突，在六七年五月六日，他們使用衝鋒槍、手榴彈、毒氣等，打死造反派七十餘人，傷兩千餘人。五月十三日，軍區支持「保守派」兩萬多人，襲擊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和當地的造反派，導致宜賓至自貢鐵路中斷，保守派包圍造反派至十七日，造反派兩百多人死亡，一千五百人受傷。

在河南地區，「造反派」學生及工人在街頭舉行五四運動慶祝遊行時，受到「保守派」攻擊，有廿四人死亡，六百多人受傷。直到六月一日，河南的武鬥仍未停止，鄭州至山東袁州鐵路中斷，航空聯運亦停止，情勢非常混亂。據「造反」組織「二七公社」的資料顯示，對待俘虜的手法甚為殘酷，造反派指責：「老保把我方人員一百多人抓到六廠赤衛隊總部後，他們把我們同志的腿擋在凳子上，然後用棍子往下猛打，一百多人腿全部被打斷，有的同志胳膊也被打斷了，只有一層皮連著，很多人昏迷過去，生

命危險。」（註二十二）當時保守派更調動周圍縣城的農民進城，農民去一天有一塊錢及一盒煙，由於在同一城市內「保守派」攻擊造反派往往還要留點餘地，但農民情況卻不一樣，他們毫無顧忌，使鬥爭更為殘酷。

廣州的武鬥從六七年七月開始，較為慘烈的是七·二三中山堂事件，「造反派」中的「旗派」部分成員前往越秀山體育場舉行追悼會的途中遭保守派的攻擊，有些成員當場被殺，有的被抓進中山堂。在這事件中，保守派以極不人道的手段對待被俘的旗派成員，「廣州鋼鐵廠工人范炎祥被『主義兵』用匕首插進右胸，並順勢往下一拉，割開了近一尺的傷口。」（註二十三）

此外，有記載指出：「被抓進紀念堂的旗派人員被施以割耳朵、挖眼睛、吊打、拔河分屍等酷刑，女學生還慘被輪姦、割乳，並斬成碎塊。」（註二十四）

然而，在廣州的情況，有些大武鬥乃是由「造反派」報復性挑起的，如攻打「保守派」據點省總工會大樓等。

毛澤東在七月至九月間談論江西的情況時，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中國當時混亂的情況。當匯報人員向毛談到撫州一派控制了九個縣時，毛指出「他們是想擴大勢力，進攻南昌……性質是叛亂，是總襲擊。說中國沒有內戰，我看這就是內戰，不是外戰。是武鬥，不是文鬥。在贛州、吉安、宜春等地，還搞農管，一個生產隊抽一個人，一個大隊抽十幾個人，採取強迫的辦法，記工分，一天六毛錢。現在農村包圍城市」。（註二十五）

雖然「保守派」在武鬥中佔優勢，但輿論始終對「造反派」有利，例如一個傾向造反派的報導指出：「譬如在廣州，九月十一日總派遊行，沿途群眾均向他們大喝倒彩，馬路兩旁的樓房上處處有人向他們扔倒垃圾。隊伍在馬路上沒走多遠，就被阻滯，於是他們惱羞成怒，向兩旁的群眾開槍，扔手榴彈，造成多人傷亡，這更激起廣大市民的憎惡。還有造反派被打死了，要開隆重的追悼會，打傷人，任何一間醫院都及時治療，而保守派的善後工作做得很差勁。受了傷，只能往陸軍醫院送」。（註二十六）

第三節 打倒劉少奇及揪叛徒

一 打倒劉少奇的政治含義

六七年四月毛澤東決定徹底打倒劉少奇。其實在六六年八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劉少奇遭批判，全國開展了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毛澤東仍把劉少奇問題當作黨內矛盾看待，而並無徹底打倒劉少奇及對他立案審查之意。

在六六年十月毛澤東於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指出：「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不管甚麼小集團，不管什麼頭，都要關緊關嚴，只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就好。要准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和希泥，我就是和希泥的人。」(註二十七)

六六年十一月，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群眾大會上，毛澤東有意識的在攝影鏡頭前與劉少奇交談，此情景，通過電視傳播往全國，六七年二月，毛澤東在三次談話中還指出：「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註二十八)

然而，在六七年三月，即軍事首腦對文革出現抗爭後，毛澤東改變了不打倒劉少奇的態度，其原因有下列幾點：

- (1) 由於軍方出現二月抗爭，地方奪權受到當地黨政幹部及軍人的反抗，毛遂認為劉少奇雖然被鬥倒，但其潛在勢力仍在，各級政府中皆有「劉少奇代理人」對文革的干擾，即從上至下各級都有各種反革命復辟現象，為徹底推行文革，故決定徹底打倒劉少奇。
- (2) 轉移群眾互鬥視線，以批判劉少奇來促進對立兩派群眾的聯合。

在六七年一月全國奪權以來，全國各地皆同時出現「保守」、「造反」兩派激列的鬥爭，雖然毛澤東基於打倒政敵及全國清洗幹部的戰略考慮，決定支持「造反派」群眾組織，然而，毛澤東亦十分清楚，「保守派」組織其實亦是對他及其領導的共產黨忠心耿耿，他們的保皇行動實際上是為了保衛共產黨，毛澤東曾相當自覺的為「保守派」辯護，毛澤東指

出：

「廣大工農、黨團骨干，在批判反動路線過程中受了蒙蔽」，「我從來認為，廣大的工農兵是好的，絕大部分黨團員是好的」，「廣大的工農是具體的勞動者，自然了解上層的情況少，加上廣大黨團骨幹是內心對黨，對党的幹部無限熱愛，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都打著『紅旗』反紅旗，所以他們受了蒙蔽」，「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註二十九）

既然「造反派」與「保守派」對毛澤東來說根本無理由要長期對立，故此毛澤東極希望兩派能盡速實現大聯合，毛曾指出：「『一月風暴』以後，中央就一再著急大聯合問題，但來得奏效——因為各個階級、各個政治勢力都還要頑強地表現自己。」（註三十）

為促使兩派大聯合，改變兩派無休止的鬥爭，使兩派共同為毛澤東及中央文革的戰略服務，毛澤東決定以「大批判」來促進大聯合。所謂大批判，即「更集中力量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註三十一）將矛頭全集中在劉少奇及其他已被鬥倒的中共領導人身上。毛澤東的意圖明顯為利用劉少奇等人作為群眾鬥爭的目標，使兩派從互鬥轉到共同批判劉少奇上來，通過批劉這共同鬥爭對象以達成兩派大聯合的目的。

就在此背景下，從一九六七年四月開始，中央文革便開展革命大批判行動，指出文革不但要在組織上奪「走資派」的權，而且更要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開始將矛頭指向劉少奇。四月一日，《人民日報》轉載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第一次以權威文章在中央報刊強調「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拉下馬。」並指責劉少奇「你根本不是甚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五月初，《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批准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給劉少奇加上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莫須有」等罪名。八月中旬，黨中央再號召把「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批深批透，又規定在中央和地方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中央及地方的「走資當權派」三十四人。（註三十二）客觀上為奪權的造反派打氣，並為兩派群眾制

造出一個共同同針對的箭靶。

二 掀叛徒的狂潮

為清除各級黨改幹部對文革的對抗，配合中央文革的造反奪權行動，一九六七、六八年，中國刮起了掀叛徒的風暴。

中央文革蓄意制造多個重大冤案，如針對對文革採取敵對態度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之「六十一人叛徒」冤案；針對周恩來，誣陷周曾於國共戰爭時期背叛共產黨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由於誣告政敵曾在四九年前國民黨共產黨鬥爭時背叛中共是一個絕佳的打倒對方的借口，六八年二月，中共中央曾指出：「劉、鄧、陶（鑄）及共其同伙彭（德懷）、賀（龍）、彭（真）、羅（瑞興）、陸（定一）、楊（尚昆）、安（子文）、蕭（華）為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隱藏在黨內，佔據了党政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結成了叛徒集團。」中央並要求：「堅持群眾路線，徹底清查敵偽檔案，把隱藏在各地區、各部門、各角落的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徹底清查出來。」（註三十三）

第四節 中央文革迫使軍人攤牌——武漢兵變

在一九六七年「三月黑風」及武鬥期間，毛及中央文革推行了很多策略對付各地方掌握黨政軍大權，以「打著紅旗反紅旗，挑撥群眾」的實力軍人。

一 中央文革打擊地方軍事首腦的策略

（1）鼓勵紅衛兵衝擊軍區及揪鬥軍事首長

例如六七年四月十六日，江青向「造反派」說：「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秘書在接見「造反派」時指出：「武漢問題主要是同軍內一小撮的鬥爭」，「需要把全國的老造反派統一組織起來」，「中央五月十六日要發文件點軍內的問題，這是支持你的，你要借東風，要激化矛盾。口號要明確，一是要打

倒陳再道（武漢軍區司令）」。

（2）從軍隊內部掀起造反與奪權

文革開展後，中央文革皆於各軍事單位埋伏相當多的造反分子，在一月奪權時，他們也支持軍內的造反奪權，例如親林彪一系的軍人吳法憲曾先後給武漢空軍的劉豐等打了多次電話，要他們獨立思考，不要聽大軍區的。但是由於軍人的組織和紀律嚴格，除了少數軍區外，其餘皆沒有成功。

（3）罷官與調職

為配合紅衛兵的衝和揪，及軍內造反派的奪權，中央文革更對一些抗命的軍人實行罷官與調職，並命令他們需回京向中央匯報地方的情況。例如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及蘭州軍區司令張達志等皆遭免職及調職。

（4）中央派員或下達明確指示迫令軍隊明確調轉槍頭，支持中央文革認為是真正革命組織的「造反派」

例如六月下旬，中央文革直接給武漢軍區下達指示，「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個由軍人支持的「保守派」組織）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兇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

由於軍區以群眾組織太多，天下大亂，分不清誰才是真正革命組織等藉口以壓制「造反派」，故中央乃採取一種釜底抽薪方法，分批派出中央大員親赴各地，與地方軍方首長攤牌，明確指示哪個組織是由中央文革支持的真正的「造反團體」，點出軍方支左方向錯誤，強迫他們改正。然而，這就牽起了「武漢兵變」的強大震盪。

二 中央文革派出「欽差大臣」介入武漢的派系鬥爭與「武漢兵變」

一月奪權開始，湖北武漢的局勢便相當緊張，當地的群眾組織主要有兩大派，「百萬雄師」和「工總司」兩大派壁壘分明，連場武鬥，無法進行大聯合。「百萬雄師」得到軍區及公檢法幹部的支持，他們認為武漢軍區支左方向正確，並批評「造反派」團體「工總司」不應把矛頭指向解放軍。「百萬雄師」勢力強大，在七·二〇「武漢兵變」之前，據「兵變」主角陳再道指出「百萬雄師」：「已擁有一百二十餘萬人了，其中黨員人數佔全市黨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漢部隊廣大指揮員，思想感情也一致傾向『百萬雄師』」，(註三十四)「百萬雄師」的對立面為造反組織「三鋼」、「三新」及「工總司」等，人數約四十萬，他們以工人和學生為多，這些組織由於沒有太多既得利益，自然敢於造反，並把矛頭直指支持「百萬雄師」的軍區領導。據武漢地區造反派的資料指出湖北省上有多個「造反組織」被打為反革命，被捕的群眾有一萬多人，另有三百人遭殺害。武漢周圍地區有五十多萬名工農群脫產，參加武鬥；於六月上旬，「百萬雄師」更封鎖長江大橋、漢口中山路和南京路，製造了嚴重的流血事件。

在這形勢下，中央文革極希望能解救其支持的「造反組織」，並給同時期大動亂的四川、河南等省作出榜樣，故此中央決定派出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及謝富治往武漢以釜底抽薪的方法迫使軍隊表態，謝富治批評武漢軍方說：「你們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錯了，街上幾歲的娃娃都知道『三鋼』『三新』好，『百萬雄師』壞。『三鋼』『三新』揪武老譚(指在武漢的譚震林式人物——即陳再道)，是把矛頭指向當權派，大方向是對的。你們要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註三十五)，他們更進而批評「百萬雄師」和「四川產業軍」是同類型的保守組織，搞武鬥厲害的頭頭要處理。(註三十六)王力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出席武漢軍區的會議中，王力更宣佈了周恩來根據謝、王的報告作出的四項指示：

- (1) 確認「三鋼」、「三新」等為造反組織；

- (2) 軍區支左工作犯方向及路線錯誤；
- (3) 恢復「王總司」的名譽；
- (4) 「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

當時參與會議的八二〇一軍隊負責人，立即表示異議，並認為四條批示為王力偽造。七月二十日「百萬雄師」在部隊支持下，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並將王、謝拘押。王力被捕後曾遭毆打遊街，並威逼他承認偽造指示。另外，「百萬雄師」的群眾也進攻武漢鋼鐵廠，彼此開展垂死鬥爭，雙方死傷無數，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武漢兵變。

三 「武漢兵變」加深中國內戰危機

中央文革在獲悉謝王被扣後，立刻作出下列決定：

- (1) 命令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立即將謝王送返北京；
- (2) 公開譴責八二〇一軍隊的錯誤行動；
- (3) 調動原駐武漢市郊的八一九一部隊(空降兵師)及駐孝感的十五軍，開入市區鎮壓；
- (4) 命令東海艦隊開赴武漢，以造成封鎖包圍武漢之勢。

上述事件足以反映文革已發展到瀕臨軍事內戰的邊緣，有一點更足以反映當時險峻形勢的，就是毛澤東在「兵變」時亦在武漢。早於七月十五日，為緩和武漢兩派間，以及中央文革與地方軍區嚴重對立的情緒，毛曾直接指示「要給工人總部平反，放掉朱鴻霞(造反派領袖)。『百萬雄師』是群眾的組織，謝富治、王力派專人做他們的工作。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陳再道支造反派，造反派是會擁護陳再道的。」(註三十七)陳再道於「兵變」後曾強調當時根本沒有絲毫危及毛安全的跡象，然而，據一九六八年四月在廣州出版的《文革通訊》第十四期報導，「武漢兵變」期間毛澤東的危險境況：

「七月十九日深夜，陳再道、鍾漢華之流調動叛軍××，百萬雄師，公檢法等，刀出鞘，槍上膛，出動了上千輛卡車，武裝包圍了武漢軍區

大院和中央首長駐地，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泰然處之。……衝進東湖的匪徒，按照陳再道之流的指使，得寸進尺，狂妄之極，一直衝進了謝副總理的臥室。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謝富治同志挺身而出，對匪徒的長矛大刀，大義凜然地說：『我就是謝富治，要綁要殺隨的便！』從而轉移了匪徒們的注意，冒生命危險，保衛了毛主席。……陳再道之流，當他得知毛主席在軍區大院時，竟冒天下之大不諱，於七月二十一日凌晨，重新糾集叛匪，妄圖第二次包圍毛主席住地，正當他們在武昌集結時，毛主席已於三點二十分離開了軍區大院，叛徒於三點四十分趕到，撲了個空。」

雖然，紅衛兵雜誌的報導未必能全面反映事實，毛澤東後來亦替陳再道開脫，認為假若陳再道真的企圖對他不利的話，毛本人根本無法離開武漢。然而武漢軍區逮捕中央文革的「欽差大臣」亦足以反映中國當時內戰一觸即發的緊張形勢。

「武漢兵變」是一件極為嚴重的政治事件，因為它是軍人直接介入，公開扣押中央代表，突破了過去所有黨內軍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界限，令中國隨時有爆發全面內戰的危機。七月廿二日下午，謝王等返抵北京，中共多位大員皆到機場作隆重之歡迎。廿三日，造反派連續數日在各大城市發動群眾和軍隊舉行大規模慶祝集會和示威遊行，表示堅決支持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鬥爭，誓作他們的後盾，同時聲討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武漢的代理人犯下的滔天大罪。廿五日，北京天安門也舉行了約有一百萬人參加的歡迎謝富治大會，距天安門群眾大會開會時間只差兩小時，林彪突然表示希望參加：「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註三十八)在大會上，林彪指出：「武漢問題不只是武漢問題，武漢問題是全國的問題，以前我正愁沒有題目作文章，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大作文章，把壞事變好事。」

七月廿六日，解放軍發表社論提道，「解放軍堅決支持你們」，文章

指出「對於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要他們揪出來，鬥倒、鬥垮、鬥臭，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八月一日，《紅旗》雜誌又再刊出兩社論，繼續支持「揪軍內一小撮」。得到中央明確的支持，「造反派」便明正言順的開展衝擊解放軍的行動，並將搶槍行動推至另一高潮。為配合「揪出軍中一小撮」的行動，中央繼續對各地抗命的軍人施加壓力，例如河南省軍區首腦何運洪因鎮壓造反派「二七公社」被送往北京學習，「二七公社」得以解放。湖南省軍區首腦龍書金亦遭調離，中央隨即表示「工聯」、「湘江風雷」等為左派組織，批准立即平反。

註 釋

- 註一 王年一《大動亂的時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第216頁
- 註二 同註一，第217頁
- 註三 紀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記〉載《歷史在這裡沉思》華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75頁
- 註四 同註三，第76頁
- 註五 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載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一九七三年，第361頁
- 註六 同註一，第218頁
- 註七 同註一，第219頁
- 註八 同註三，第71頁
- 註九 曉地《文革之謎》朝華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第64頁
- 註十 范碩、丁家琪《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第591頁
- 註十一 同註九，第65頁
- 註十二 同註三，第76頁
- 註十三 〈中共福州軍區黨委常委關於在福建支左工作中錯誤檢查報告〉載同註五，第158-159頁
- 註十四 中共廣州軍區〈關於在廣州地區支左工作中所犯錯誤檢查〉載同註五，第172頁
- 註十五 中共廣西軍區〈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查報告〉載同註五，

第176頁

- 註十六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
- 註十七 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
- 註十八 林彪〈八九重要講話〉載同註五，第352頁
- 註十九 海峰〈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友聯研究所 一九七一年，第352頁
- 註二十 圖們、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 一九九五年，第42-45頁
- 註二十一 江青〈九五講話〉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 註二十二 《二·七戰報》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 註二十三 同註十九，第153頁
- 註二十四 同上註
- 註二十五 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第683頁
- 註二十六 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
- 註二十七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載同註二十五，第655-656頁
- 註二十八 黃崢〈劉少奇專案組始末〉載《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第262頁
- 註二十九 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載同註二十五，第675頁
- 註三十 同上註，第676頁
- 註三十一 毛澤東〈偉大的戰略部署〉載同註五，第214頁
- 註三十二 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595-596頁
- 註三十三 同註一，第228-229頁
- 註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親歷記，
載昌隆編《元戎蒙難記》中國文聯出版 一九八九年，第169-300頁
- 註三十八 嚴家其 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大公報 一九八六年，第270頁

第三十二章 最高戰略部署——妥協局面與「新思潮」的湧現

導言——文革的急剎車：平息實力軍人的怨憤

「揪出軍中一小撮」其實是毛澤東及中央文革的既定政策，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開始，造反派紅衛兵和其他團體就開始衝擊軍區了。江青的嫡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林傑曾明確指出：「奪權必須奪軍權，不奪軍權等於無權。」(註一)但是「揪出軍中一小撮」這個口號反覆於中央權威刊物登出及強調的，卻是在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並隨之在全國製造了大量衝擊軍區的事件。由於武漢事件的重要意義並不只限於武漢地區，而實際上反映了各地多數實力軍人的共同立場，深切明白「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毛澤東自然了解到軍隊的反抗將會使中國正式墮入內戰的漩渦，為安撫實力軍人，毛批評《紅旗》提出的「揪出軍中一小撮」為「大大毒草」，毛更提出要「還我長城」(意即要保衛解放軍)。此外，江青也公開發言表態：「早些時候有這麼一個錯誤口號，叫做抓軍內一小撮。……不要上這個當，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只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不科學，結果弄得到處亂抓，軍區不管好壞，差不多所有的軍區都衝了。」(註二)

第一節 毛澤東提出最高戰略部署——強調「大聯合」，從而結束文革

一 毛澤東提出「鬥私、批修」，促進大聯合

在「造反」、「保守」兩派仍相持不下、「造反」派與軍方關係緊張、局勢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毛澤東於六七年七月到九月，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十月七日，黨中央轉發〈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毛意識到在武漢兵變後提出

「揪出軍中一小撮」的口號，已遭遇到猛烈的反應，為避免武漢兵變的事件再度出現，他來一個急剎車，停止造反奪權，並提出了「最高戰略部署」，強調各派組織要在「鬥私、批修」的立場上，批判「多中心論」，停止武鬥，解放曾受批判的幹部，加速進行各派的「大聯合」，以盡快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結束文革，恢復生產秩序。毛澤東於六七年七月至九月於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中指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誓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註三)

毛更告誡各派紅衛兵：「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並建議採取軍訓、軍管、辦學習班等辦法對他們進行約束，六七年九月，毛更批示道：「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註四)

毛澤東當時提出的「鬥私、批修」是針對各派群眾組織互相殘殺，激烈爭權的情況下提出的。由於各派皆「私」字當頭，無法達至真正聯合，毛的策略是希望利用批判劉少奇的高潮，轉移群眾組織間的鬥爭目標，緩和「保守」與「造反派」的矛盾，以「大批判」(劉少奇)來推動「大聯合」。天津地毯廠原來對立的兩派在一次批判會上表示：「咱們恨，要恨中國赫魯曉夫(指劉少奇)，恨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除「鬥私、批修」號召外，毛再強調武鬥雙方停止攻擊，在〈九·五命令〉公佈的當天，他指示「過一兩個月要發動群眾檢舉壞人，嚴重的殺人放火事件要作處理。今後誰要搞殺人放火事件，到一定時候就宣布為『法西斯組織』。今後誰再停產，誰就犯罪。……如果生產間調動人去武鬥，就給戴上帽子」。(註五)

六七年九月十三日，陳伯達和戚本禹在京召見紅衛兵講話，陳十分氣憤地說：「現在很多學生正在磨刀，準備大武鬥……你們這樣幹是甚麼意思？你們現在搞武鬥的都要解散，甚麼敢死隊、飛虎隊……這樣死了是不是值得……我們自己不要隨便死掉，也不要隨便把人家殺掉。」(註六)戚本禹也申斥道：「如果誰把人打死，受重傷，軍代表要處理，必要時用軍隊把他們綁起來，情節嚴重的槍斃。」

二 平息軍人憤恨的措施

為了平息軍人的怨憤、以及落實「鬥私批修」的部署，毛更被迫採取了幾個措施：

(1) 追究《解放軍報》及《紅旗雜誌》號召揪「軍內一小撮」的責任

武漢兵變被「保守派」群眾鬥爭的當事人王力，及另外兩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及戚本禹遭清算。毛曾指出「王力本來就是壞人，江青很早向我反映了王力和關鋒的問題。現在外交部敢不敢打倒王力、姚登山，是革命與不革命的問題。(註七)此外，北京並指出已揪出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由王、關、戚等人操縱的極左組織，「五一六兵團」。十分明顯，以上是毛澤東希望平息軍人反抗的「棄車馬而保將帥」的策略，目的是使軍人點到即止，避免矛盾再度擴大。

後來周恩來、江青和陳伯達等多次談話中，都盡力避免再談「五一六」的問題，江青曾指出「不要在《紅旗雜誌》和中央文革身上作文章。林傑的問題都不要你們管嘛！王力、關鋒也不要你們管，大字報不要貼，已經貼的要蓋掉。」(註八)

(2) 《紅旗雜誌》被勒令停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

(3) 下達九五命令

九月五日，中央下達一道嚴厲的命令，停止紅衛兵串連，由軍隊負責維持秩序，在這著名的《九·五命令》中，中央更強調：

1. 不准搶解放軍的武器，不得進駐軍事機關；
2. 已經搶奪的人民解放軍的武器，應一律封存，限期歸還；
3. 當軍隊在執行上述任務，在勸阻和警告無效、並遇到拒捕抵抗時，有權自衛還擊(這即等於說軍隊可以向對他們不利的紅衛兵和群眾組織開槍了)。

(4) 開展擁軍愛民運動

《人民日報》在八月廿八日〈更大規模地展開熱烈的擁軍愛民運動〉的社論中指出：「人民解放軍要盡一切責任，愛護無產階級革命派……同樣，無產階級革命派、紅衛兵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要盡一切責任，擁護人民解放軍」。九月二日，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有十萬多人參加的集會，中央文革代表指出「誰膽敢挑撥軍民關係，把矛頭指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們就堅決和他拚到底。」而軍方代表則指出「要真正做到愛左派之所愛，恨左派之所恨，想左派之所想，爭左派之所急，幫左派之所需。」(註九)此外，中央文革的康生於會見軍事幹部時亦指出：「他們……挑撥中央文革同部隊的關係，如說我們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把人民解放軍整得妻離子散，無家可歸……這是敵人的有意挑撥，希望同志們千萬不要上當。」(註十)

(5) 中央文革多次接見「造反派」，勸喻他們不能再衝軍區，並要改善與軍方的關係

江青曾在六七年九月五日及二十六日分別接見來自安徽、河南和湖北等地的軍隊幹部、群眾組織和紅衛兵，江青在接見會上就當時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向與會者交底，提出：

「武鬥是要傷害人的嘛，總是要破壞國家財產的嘛，為甚麼要做敗家子呢？」「你們雙方不要回去都搞起『武衛』來，戴上柳條帽，拿起長矛來，那就不好了。」「軍隊不能那樣亂衝，不能去奪他們的槍。」「我才不相信人民解放軍廣大指戰員、全國廣大的黨員、革命幹部，會跟那一小撮壞八走。不會！」「人民解放軍和紅衛兵都是最聽毛主席的話的。」「過去我們有些同志和紅衛兵小將們接觸得少，接觸多了，你們就會覺得他們是變可愛的……正規軍——人民解於軍，後備軍——紅衛兵，就會步調一致起來。」(註十一)

面對這急轉直下的形勢，「造反派」一時不明所以，衝擊軍區、揪出軍中一小撮不就是毛澤東最高的指示嗎？為甚麼這些「正義行動」竟遭批

判？在另方面，「保守派」則是守得雲開見月明了，我們擁軍擁對了。由於中央文革的種種措施，當時的社會局勢暫趨緩和，而毛澤東亦進一步開展他結束文革的計劃，但正在此時，新的矛盾又再發生，終於導致一九六八、六九年的血腥大鎮壓。

第二節 落實「大聯合」政策與反對「多中心論」

一 推動兩派聯合

在大武鬥被基本控制後，中央文革便著手處理各地方問題，方式是號召兩派到京學習，開會訂定雙方的協議書，促使在京談判的代表向「大聯合」的目標發展。例如在六七年九月下旬，周恩來對來北京談判的廣州代表擬定了一個方案，這分別是促使兩派代表擬定一個全面協議的草稿，推動兩派聯合，並討論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籌備工作，使廣州由軍管過渡到成立革命委員會。九月廿七日，周恩來對兩派代表指出：

「偉大領袖毛主席回到北京告訴我們，要求所有革命群眾組織，凡是應該聯合的，都要聯合起來。在甚麼基礎上聯合起來呢？主席說了四個字，一個是批修，就是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批修的問題上要聯合起來。盡管你過去造反精神是旺的，現在還要看你矛頭是不是批修，是對準走資派，還是揪軍內一小撮……第二是鬥私，為甚麼許多革命組織，就是造反組織之間內部矛盾也是重重……就是沒有很好鬥私……你們在北京一個多月，學了不少東西，《文匯報》的社論你們也學了嘛，不管你造反早、功勞大、人數多，不一定非要以你為核心。人家後造反的，功勞少的，也有權利批修嘛。只要批修，就可以聯合起來。（註一二）

二 復課與上山下鄉

十月十七日，中央發出〈關於按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指出「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都必須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系

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以利於革命三結合的建立。」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中央還號召學生停止串連，全面停課。十月十四日，中央發布的〈關於大中小學復課鬧革命的通告〉指出：

- (1) 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
- (2) 各學校都必須執行毛主席關於鬥私批修的指示。
- (3) 各學校應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教學的班、級、系的系統，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建立革命三結合的領導班子。
- (4) 各大、中、小學都要立即積極籌備招生的事宜。

此外，中央還發出了〈關於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員必須堅持在農村抓革命促生產的緊急通知〉，要求仍逗留在城鎮上的上山下鄉青年迅速返回農村去，就地鬧革命，而幹部更要帶頭動員子女返農村。據八月十七日天津新華社電：「天津市各中學的廣大畢業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走向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到邊疆去、到農村去，目前已有三批中學畢業生到內蒙古等地農村安家落戶。」其實，號召上山下鄉乃是中央壓低學生地位的一種具體措施，文革初期，由於年青人較為敏感及衝動，他們變成毛奪權鬥爭的工具，進行造反工作，現在既然要結束文革，除了強調停止武鬥，促進大聯合外，還要對一些抗命、仍堅持「山頭主義」或繼續奪權的年青人，進行再教育工作，具體方法之一是把他們送到遠離鬥爭中心（城市）的遙遠農村，使他們不能再參與奪權行動。六七年九月上旬，毛多次強調工農的重要角色，間接地貶低知識分子的作用：

「我從來認為廣大的工農兵是好的……工農兵實際上不過是工農，因為兵不過是穿軍服的工農。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廣大青年先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後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去完成。」（註十三）毛在另一個場合說：「廣大的工農兵起來才徹底的衝垮了資產階級那一套，革命的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不得不退居到從屬的地位……從黨內到黨外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註十四）

三 解放幹部與反「多中心論」

以上的一切工作，其目的皆旨在穩定混亂的局面，為再進一步建立業務班子，以進行日常的各項管理工作，毛再三強調要解放曾被鬥爭的幹部，並恢復他們之權力，他指出：

「大部分幹部要解放」「我從來認為廣大工農兵是好的，絕大部分黨團員是好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又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所以他們受了蒙蔽，甚至較長一段時期轉不過來，這是歷史因素。受了蒙蔽改了就算嘛，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他們又成了主力軍了。」周恩來亦指出「在革命大聯合的基礎上，才能解放幹部，否則就是你保我打，我保你打，幹部解放不出來，這都是派性。一般地說，在大聯合之後，經過群眾的揭發批判，就可以解放一大批幹部，這才符合毛主席的幹部政策。」

然而，在整個組成三結合的革委會之過程中，卻出現了另一種有別於「造反」與「保守」之爭的派爭情況，很多原本站在同一陣線的組織，為了爭取革委會更多席位或推薦傾向自己的幹部進入革委會，一夜之間反目成仇，例如在湖南省曾全力為造反組織「湘江風雷」平反而奔走的長沙「工聯」，竟與平反後的「湘江風雷」動武，主要原因便是為了革委會中的席位，「湘江風雷」認為自己組織龐大，應該在革委會中多佔席位，而「工聯」則表示不服。而武漢的造反組織也於武漢兵變後分裂，雙方面皆認為自己的勢力最大，受苦最多，理應能多佔席位，他們更希望推薦一些跟自己觀點較近的幹部進入革委會。從上述例子得知，很多造反派組織已喪失了原來批判社會不平現象的氣概，而淪落為軍事幹部或地方官員爭名奪利的群眾工具，雙方皆為自己能獲得更大權力而喪失立場，爭鬥不休。（註十五）

由於各組織間不停的鬥爭，以致「大聯合」的目標無法達成，於六七年底開始，中央開始展開了對「多中心論」的批判，猛烈抨擊各組織的「派性」，總結而言，中央批評「派性」有下列多條罪狀：

- (1) 凡是爭席位、爭核心之日，正是派性惡性發作之時，他們混淆敵我

界限，包庇階級敵人，同意「我」的觀點，不管是特務、叛徒，都是同志，不同意「我」的觀點，即使是同志，統統成了敵人，故在解放幹部時一律以是否有利於我這一派為標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 (2) 山頭主義，各霸一方，把控制的地方變成潑水不進、針插不入的獨立王國。唯我獨尊，唯我獨裁，看自己一切都對，看對方一無是處；
- (3) 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令，有利於己的大力宣傳，不利於己的就加以抵制、曲解及封鎖，並散佈懷疑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對上要多中心，對下要以我為中心。

第三節 「造反派」的反省——新思潮的湧現

一 「造反派」反對妥協，反對交槍

文革後期雖然大部分的「造反派」皆墮入「多中心論」、互相傾軋、無原則之爭權奪利的深淵，但仍有一小部分較為成熟、思想敏捷及觸覺力強的青年，冷靜地思考這幾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中國問題的根源，他們在文革期間被稱為「極左思潮」。這思潮在「造反」組織中散播，如廣州的「八五公社」，武漢的「北、決、揚」(北斗星學社、決心把無產階級進行到底派、揚子江評論)，而最為震動中外的，則是湖南省的「省無聯」(湖南省無產階級聯合會)。這些極左思潮的理論水平已遠超黨內兩條不同路線鬥爭及派性傾軋，而把眼界放到整個共產革命後的中國社會，提倡新的階級分析。

觸發極左思潮出現的主因為文革期間反覆無常的變化及「造反派」中理想青年的良好願望。一月風暴後成立的「上海公社」，使人民感到中國將很快有機會進行普選，大民主即將來臨。然而，戲劇性的變化隨即扼殺這新生事物，換來了一個由幹部、軍隊為主要操縱的「革命委員會」。在二月鎮壓期間，造反派紛紛被取締，六七年中旬的殘酷武鬥激發起造反派搶槍之行動，然而，毛澤東為平息軍人反抗，避免內戰，主動批判

「揪出軍中一小撮」的口號；揪出王（力）、關（鋒）、戚（本禹）為中央文革的代罪羔羊；命令造反交槍；迅速按系統進行大聯合以建立革命委員會。在造反派看來，以上的妥協無疑是全面放棄批判官僚的成果並置造反派之生死於不顧，更重要的就是中央文革出爾反爾的態度，例如衝擊軍區，揪出軍中一小撮的口號，明明是《紅旗雜誌》及《解放軍報》的意見，這表示它一定得到毛的支持，然而當毛澤東面對軍人壓力時，則立即反臉不認，對「揪軍人」的口號大力批判及推出個別中央文革成員成為代罪羔羊，這點是造反派所不能接受的。

此外，就交還槍械的命令，「造反派」亦作出抵制，例如廣州的「造反組織」《廣醫紅旗》在一篇題為〈談封槍〉的文章中承認：

「我們仍然掌握著武器的主動權。針對廣譚（軍區）的血腥大屠殺時，我們要隨時準備拿起武器……我們還不拿起武器，那就是十足的右傾投降主義。我們造反派的抑制和讓步是有限度的，江青同志指示我們：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

廣州旗派「造反派」的小報《指點江山》更警告：

「更有些糊塗的人，當蠢大地主（指保守派）還拿槍殺我們同志的時候，就把槍交了出去。我們要向這些人大喝一聲：危險啊！這樣下去，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多少造反派戰友的鮮血才凝結成『文攻武衛』的結論，要我們否認掉？多少造反派出生入死才換回這批槍枝，要我們單方面交出？辦不到！一萬個辦不到！誰交出去，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註十六）

部分造反派更引用毛澤東在《重慶談判》一文中的語錄號召：「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決不應該交出去！」（註十七）

至於毛澤東號召各派停止串連，進行按行業、按系統的大聯合，造反派乃大喊這是「反革命復辟」的前夕，因為按行業、按單位及按系統聯合，就表示「造反派」要解散由各方面人仕聯合組成的跨行業、跨地域的

大組織。當這些「造反派」從社會返回工廠內，他們肯定立即變為力量甚小的少數派。相反，「保守派」的成員由於多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大多數在單位內有一個處於較為領導地位的職務，一回到單位內他們就可發揮出其優勢，而將「造反派」放於一甚為不利的地位。六八年一月，在廣州出版的造反派報紙《八一戰報》中強調〈廣州還需大亂〉。二月，《八五戰報》發表了〈激戰前的沉寂〉的文章，指出：

「在一片鑼鼓的喧鬧聲中，人們不自覺到在珠江兩岸籠罩著一股激戰前政治沉寂的氣氛，」「在當前階級社會條件中，在保守勢力甚囂塵上的情況下，所謂『剷平山頭』『無條件大聯合』，實際上是一場以和平的形式，用蠶食的政治手法，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向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垂死掙扎性的反撲。」「有些單位，黨委活躍起來了，甚麼政治處、人事科、保衛科、生產臨指的整套舊體系原封不動地開始甦動了」。(註十八)

二 新思潮——批判整個官僚制度

「湖南的」省無聯與廣州的「八五」理論家有差不多相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一月風暴後成立的中華公社(意指上海公社)是第一次文革的成果。在這次奪權風暴中，百分之九十的高幹被批鬥，國家的黨、政、財、文大權和城市裡的工、商業，由官僚手中轉到工人階級手中，社會上出現了「類似巴黎公社的群眾專政的狀態」。可是一月風暴還未接觸到革命的要害——軍隊問題，在這情況下毛突然反對上海公社，並提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就「變相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們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則成為軍隊和官僚起主導作用」的政權形式。由於一月革命的深刻教訓——高幹靠邊站、財產、權力再分配，激使紅色官僚採用殘酷手段，鎮壓革命，紅色官僚的總代表——周恩來，在二月逆流的勝利下，企圖在大陸各地建立革委會。中央文革對他的企圖，立即反擊，文章指出，事實證明：

「八月的捨槍運動是偉大的，它不僅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空前，而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變為事實……群眾第一次不是自上而

下的恩賜，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從官僚手中奪取了槍枝，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自己的槍枝。」

針對毛的最高戰略部署，盡早結束動亂的局面，「省無聯」認為：

- (1) 紅色資本家，利用亮相，騙取了人民的信任，並決定他們篡奪八月風暴（即提出揪出軍中一小撮的時期）的勝利果實的必然客觀規律。
- (2) 血的教訓使人認識到走資派是一個階級，除非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那徹底的社會革命就可能實現。
- (3) 在野戰軍還沒展開全面支左（即支持造反派）時，要求勝利是左傾盲動。
- (4) 農村的文化革命運動，還沒有起來。
- (5) 八、九月來黨內資本主義官僚，向中央文革進行大規模的怠工、破壞。故意製造軍隊的混亂，造成經濟方面的停滯，這些危機迫使中央文革大幅退卻，採取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建立革委會，無限度的放寬幹部政策，使一批又一批紅色資本家再度當權。（註十九）

「省無聯」對中國政治架構及階級的看法，總的一句是「新官僚資產階級」。他們認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都是紅色資本家、阻礙生產力發展和阻礙歷史推向前的腐朽階級，這個特權階級再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利用軍隊鎮壓革命群眾。而軍隊因為掌握在軍內走資派手中，從解放前的與人民如魚水一般的關係，變成到解放後的鎮壓革命的工具。「省無聯」認為官僚及其控制的軍隊「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群眾被壓抑和剝削的基本上的，要實現中華人民公社就必須推翻這個階級。」他們認為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是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註二十）

三 「造反派」於文革後對文革及造反的反思

總括而言，「極左思潮」提出砸碎國家機器，成立由人民民主選出的「中華公社」，當然是揭發及打倒當時的領導層的一個最徹底方法。然而，真正建立民主制度的理想是需要人民有高度的政治醒覺及民主傳統，並配合著適合的經濟及社會環境才有可能逐步實現的，在當時社會大動亂、人民渴望結束文革、恢復經濟秩序的情況下，省無聯的建議是否脫離實際呢？迅速成立「中華公社」，但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經濟及多方面改革與之配合，那結果是否會又再導致另一批官僚上台呢？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高幹，帶頭解決各種糾纏不清的仇恨，平息社會的混亂情況，「極左思潮」當然可以批判周恩來為官僚復辟的總代表，但在另一個角度周卻又是真正代表了廣大人民的結束文革動亂、恢復經濟發展、予人民休養生息的願望。

在文革後，經歷過深刻的社會實踐，很多在文革期間持「極左思潮」的「造反派」理論家皆在很大程度上修正過往他們對周恩來及「穩健派」幹部所持否定的看法。例如「省無聯」的代表人物楊曦光對經周恩來支持而復出的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開展的「整頓」工作的感覺是：「使人感到政府的理性正在恢復」「社會上出版的可讀之書越來越多。」(註二十一)「當時大概稍有理性和良心的人都會覺得鄧小平這些觀點比江青、毛澤東的那些大話空話平實得多。」(註二十二)

此外，曾積極參與文革的民運理論家王希哲亦指出：「周總理是正派的人，是值得信賴的。我不由得對……周恩來所要保護的老幹部們——譚震林、陳毅、余秋里——產生了同情，並在閱讀那些他們抗爭的『反面材料』的同時加深了對他們的理解。」(註二十三)

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之專著《理性與瘋狂》中，學者王紹光總結了文革期間「造反派」對周恩來、鄧小平在文革後的「務實政策」的觀感：

「到一九七五年夏……在鄧的新政策下，團結正在形成，除了鄧的天然同盟者——保守派群眾和黨政幹部外，許多前造反派分子也被包括在內。」

「那些主要因經濟原因而起來造上級反的前造派分子現在終於認識到鄧在講話中所包含的真理：動亂會破壞全國經濟，而經濟的持續下降又會減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那些擁護新風氣、新思潮的人也發現，在他們與鄧為首的中央穩健派領導人之間有共同基礎。例如，他們都不贊同『不革』派的絕對平均主義。」

「他們都希望鄧的新路線能保持下去，在不久將來把中國建成一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技術進步的國家。」(註二十四)

從以上事實分析，「極左思潮」有很大的局限，然而它的出現始終代表著新一代超越派系利益衝突，冷靜思考的結果，為文革寫上群眾運動的新一頁。

註 釋

- 註 一 廣州出版的《三軍聯委戰報》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 註 二 江青〈對安徽來京代表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 註 三 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681頁
- 註 四 陳東林〈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自身錯誤的認識與糾正〉載《當代中國史研究》一九九五年一月
- 註 五 毛澤東〈關於制止武鬥的指示〉載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一九七三年，第212頁
- 註 六 大連《各地通訊》第四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 註 七 毛澤東〈對清算王力問題和批判陳毅問題的指示〉載同註五，第212頁
- 註 八 《紅戰報》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
- 註 九 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
- 註 十 康生〈在接見武漢、湖北、河南武裝幹部訓練班全體同志大會上的講話〉
- 註十一 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在接見河南、湖北來京參加學習班的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會議上的講話〉載《江青同志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第51-69頁

- 註十二 海峰〈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友聯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第253頁
- 註十三 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七年，第675頁
- 註十四 毛澤東〈視察江西時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九月
- 註十五 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
- 註十六 《指點江山》第二期，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 註十七 王希哲《走向黑暗》民主大學出版，一九九六年，第40頁
- 註十八 《八五戰報》一九六八年二月
- 註十九 省無聯《中國往何處去》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 註二十 同上註
- 註二十一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68頁
- 註二十二 同上註
- 註二十三 同註十七，第35頁
- 註二十四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70-271頁

第三十三章 大鎮壓、剷平山頭與文革的結束

第一節 中央文革的兩難困境

一 中央文革及造反派的最後反擊

從最高戰略部署到六八年中旬，各省緩慢地建立著革委會，各派的鬥爭仍然糾纏不清，鬥爭的焦點主要仍是環繞著革委會的席位分配，直至六八年七月，全國進行了一場大鎮壓行動，以武力結束各派的抗拒，從而加速了革委會的成立。從各方面資料顯示，當時的中央文革面臨著兩難的困境，既支持「造反派」奪權，繼續維護「造反派」，而另一方面亦需維持社會的安定，盡早結束文革。當時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奪權工作，包括下列幾方面：

（1）造反派搶槍行動

造反派紅衛兵從六七年九月起巧妙利用江青「文攻武衛」的口號，廣泛開展搶槍行動，積極武裝，伺機進行反攻。

（2）成立中央支左部隊

七·二〇兵變後，中央文革任命謝富治為中央軍委支左小組組長，負責指揮於六八年六月成立的「中央支左部隊」，進駐各大軍區進行支左工作。中央支左部隊的權力很大，例如「有權監督地方駐軍的支左工作並糾正其在支左工作中的錯誤傾向」，而「地方駐軍負責人因在支左工作中犯原則性的錯誤而又拒絕中央支左部隊的糾正和幫助者，可以拘留查辦。率部抵抗者得解除其武裝力量，上報處理。」^(註一)十分明顯，中央支左部隊的出現主要是毛鑒於地方軍人之抗命，鎮壓造反派，並向「中央要開槍權、要掃蕩權」，威脅著「造反派」的生存而組成的。當然，「中央支左」部隊的工作還包括收回被搶走的槍枝以及調和群眾組織互鬥等。

從六八年七·一三四部隊司令員林發揚的被拘捕，以及林彪要求「北京軍區、山西軍區，六十九軍都要檢查錯誤，縣崖勒馬」中得知，軍人的怨恨甚為激烈，為防止兵變再度發生，中央調派支左部隊駐紮軍區管轄範圍之內。而超越軍區的領導，直接受命於中央文革。

(3) 整肅軍隊將領——「楊余傅」事件

六八年三月，中央文革突然整肅了三位高級將領，即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治委員余立金以及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據當時林彪及江青等人的說法，是「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們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註二)除了奪權外，林彪還指出楊成武曾命令傅崇碧衝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搞江青的黑材料，實際上成立了這種專案，來迫害江青。」(註三)

然而，據四人幫倒台後官方發表的資料顯示，整肅「楊余傅」的實際原因是他們抗拒中央文革的命令，竭力保護被打倒的軍政幹部，而楊成武更希望為「二月逆流」翻案，例如在「武漢兵變」受批判的軍方首腦陳再道在北京遭造反派紅衛兵衝擊時，「就被傅崇碧藏進熄了燈的懸在半腰的電梯裡而受到保護。」(註四)

此外，由於北京軍區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當時，中央文革有一個策略，就是借重林彪系軍人的勢力，穩定北京軍內的形勢，而通過穩定北京軍區內的局勢達到穩定全軍及全國局勢的目的。(註五)再者，楊成武及傅崇碧早先於「晉察冀」地區工作，被認為是軍隊中「晉察冀山頭」的，而「晉察冀」最高軍事首長是反文革派的聶榮臻，當時社會上「炮轟聶榮臻」的聲音很多。而余立金原為新四軍，老首長為陳毅，故整肅他們三人，可使文革派對控制北京局勢更有信心。

(4) 開展「三右一風」運動

中央文革在揪出「楊余傅」後，便開展了批判「三右一風」的運動，指出「右傾翻案風」是當前的主要危險，而這股風是由右傾機會主義、右傾

分裂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所形成，並指出「當前出現的一股右傾翻案的妖風，就是要為中國赫魯曉夫等一小撮走資派翻案，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註六）故此，中央文革強調要發動造反派群眾，認真厲行「『自下而上的監督』，來控制各省市的革委會，以貫徹毛的文革路線。」

（5）中央文革改變了批評「派性」的言論

文革派的張春橋及謝富治在「反右傾主義」的新形勢下提出：「我們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經很危險」，「反掉無產階級派性還行嗎？過去講錯了，毛主席給我們糾正啦！」（註七）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及《解放軍報》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指出：「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派性。」（註八）這些為「派性」平反的言論，大大鼓勵著造反派。

（6）《紅旗》雜誌復刊

在提出「揪出軍中一小撮」後，由於遭受軍方壓力，《紅旗》雜誌被迫停刊，然而，在六八年七月，它卻又突然復刊，並刊登了一篇〈發揚黨的緊密聯繫群眾的作風〉的社論，警告各省市領導人不要鎮壓群眾，並引用毛的談話「人民自己不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並堅持六八年三月批「楊余傅」以來的「反右」方針，指責走資派仍大刮右傾翻案風，最後，社論要求「革委會主動接受革命群眾的批評和監督。」十分明顯，這篇社論旨在為造反派打氣，支持他們繼續爭取成為革委會的主人，而對革委會的實力軍人進行監督批判。

以上六點可說是毛號召準備結束文革以來的一次反覆，面對造反派被全面鎮壓的趨勢，中央文革希望再一次支左，對地方當權軍政幹部進行牽制，以保留文革派一定之勢力。

二 中央文革的行動失敗

然而，在另一方面，毛澤東也深切明白經歷過幾年翻天覆地之大動亂後，人民極需休養生息，況且，劉鄧等重要政敵已被打倒，毛的極左

經濟路線已被充分肯定，在這情況下，停止無休止的鬥爭，盡早建立新生的政權——革命委員會，以維持社會秩序，恢復生產，乃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此外，中央文革也對一些「造反」組織不聽指示，對一些中央已批准成立的革委會及其組成的幹部作出猛烈抨擊的行動甚為反感，認為這些「造反」組織只顧自己的山頭，在自私的「派性」驅使下，致整個全局部署於不顧。

在各地方的革委會中，軍人也對造反派繼續的批評大為不滿，他們一方面暗罵中央文革仍然支持造反派，一方面又向中央文革告狀，施加壓力，表示無法再開展重建政權的工作，以迫使中央文革在「穩定秩序」及「支持奪權」這兩個無法妥協的要求中作出決定。更為重要的是，軍方領袖也明白到政治實力乃是談判最有效的工具，故在告狀的同時，已開始武裝保守派群眾，操縱支持革委會的一派組織去攻擊反對建立革委會的另一派，並堅決抵抗中央支左部隊的進攻，以期做成既定事實，讓中央文革在穩定秩序的形勢下，同意他們的行動而加以追認，就在這個極為微妙的背景下，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全國開始一場大鎮壓，由軍方直接使用武力結束各地「造反派」組織的反抗行動，在中央文革無奈的默許下，文革以戲劇的方式結束。

第二節 六八年的大鎮壓行動

一 大鎮壓行動的特點與幾種結果

一九六八年的武鬥及鎮壓行動，無論是次數、規模及死傷人數皆比六七年下旬的大武鬥嚴重得多，〈九五命令〉下達後，武鬥漸趨平息，然而在「楊傳余」事件，批評右傾翻案風後，「造反」與「保守」兩派的鬥爭又達高潮，六八年七月中旬由於軍隊出動掃蕩，佔領紅衛兵據點，逮捕其領袖，才將鬥爭戰火撲滅。

比較六七年及六八年的武鬥，可以看出危機深化的局面，六七年的武鬥，軍隊雖已介入，但其方式多只是表態或暗中將武器發予其支持的組織，而殊少直接出動軍隊戰鬥，但六八年的武鬥，軍隊則幾乎普遍介

入，中央支左部隊與地方軍區直接對抗，造成局部內戰局面。

六七年的武鬥，主要以木棍、長矛等為武器，但六八年的武鬥則普通使用現代化兵器，而以完全殲滅對方為目的。

六七年的武鬥，多是較為偶發及報復性的衝突，而六八年的則以攻佔整個地區或城市為目的，演變為長期的鬥爭。武鬥雙方為爭奪某一據點，戰事可以延長至數月，這就增加了武鬥的殘酷性。

六八年的大鎮壓以消滅「造反派」為焦點，然而，這場大鎮壓及大武鬥的殘酷程度在各地方均有差別，重點大致可分為下列三種。

第一種是典型的「保守」與「造反」對立，彼此壁壘分明，實力軍人誓要將兩年來不斷衝擊軍隊及揪鬥地方黨政幹部的「造反派」完全取締，徹底打垮，這情況下的鎮壓行動較為慘烈，以絕對佔優勢的一派（保守）完全打倒號另一派（造反派）收場。這方面顯著的例子為廣西及廣東等，而屬於這類實力完全懸殊的地區，在鎮壓「造反派」後政局基本穩定。

第二種是「保守」與「造反」兩派均有軍方後台，勢均力敵，這些地方的鎮壓行動則不甚殘酷，敵對的軍隊通過妥協制止「保守」與「造反」兩派的武鬥，交出槍枝，釋放被補人員。這類地區在文革後時亂時好，政局較不穩，屬於此類的地方包括湖南、安徽等，而以四川為最典型。

第三種情況是基於中央文革的干預，「保守派」組織被迫解散，在此情況下鎮壓「造反派」的行動較溫和，這類地方的例子較小，最突出的為湖北省武漢市，經歷「七二〇武漢事件」後，「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被取締，軍事首長遭中央文革鬥爭，「造反派」組織「鋼工總」獨樹一幟，避過如其他省市之「造反派」遭鎮壓的厄運。（註九）

二 全面鎮壓的典型——廣西與廣東

在全國的大鎮壓中，廣西的情況最為激烈，在文革的奪權鬥爭中，廣西雖然成立了很多造反組織，但從六七年五月開始，基本上分為支持地方實力軍人韋國清及歐致富的「聯指」，與及反韋國清的造反派組織「四·二二」、「聯指」得到軍區和黨委之支持，成員多為機關幹部和工農，明顯的支持恢復舊有社會秩序，而「四·二二」的成員主要為青年學

生，傾向批判舊有的社會秩序，在大城市中佔優勢。由於韋國清乃實力軍人代表，得不到中央文革完全信任，故毛乃派遣由孫鳳璋及郝忠雲率領的中央支左部隊入廣西，支持「四·二二」的鬥爭。

據六八年四月「四·二二」出版之《湘江怒潮》刊物透露，從當年四月開始，廣西梧州軍分區指「四·二二」為反革命組織，將武庫中的野戰砲、汽油彈和瓦斯彈配發給「聯指」，向「四·二二」進行大規模進攻，並聲稱「『聯指』和『四·二二』的鬥爭，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聯指』是共產黨，『四·二二』是國民黨」。四月中旬，數萬名聯指兵圍攻梧州，「四·二二」堅守三星期全城陷落，雙方死傷無數，一些街道被夷為平地，在這鬥爭中，「四·二二」上千人被俘，五月十八日，聯指舉行追悼會，將「四·二二」常委林登華砍斷雙腿，拖著遊行，又將其主要成員十一人當場打死，在被俘的人中，三一七名「四·二二」成員被槍殺陪葬於八百里公墓。(註十)

此外，柳州、桂林、南寧以及其他縣市皆有激烈的武鬥，在圍攻柳州時，「聯指」動用了十三個縣的武裝農民四萬人，「四·二二」指出「四月二十八日以來，僅一個多月他們向我大軍根據地發炮五千多發，衝鋒數十次，使用了定向炸藥包、毒氣彈、燃燒彈等新式武器向我居民齊集地區投射，引起十多條街大火，燒去房屋一千多幢，炸毀了水輪機廠……等主要建築，使數萬名居民無家可歸，全市工廠停產、商店停業，還打死革命群眾百數十人，尤其殘酷的是『聯指』暴徒對被俘的造反派戰士施以割奶、挖舌、鐵絲穿臂，然後槍斃等酷刑。」(註十一)

六八年六月廿三日，得廣西軍區支持的「聯指」發出攻擊「四·二二」的〈總攻擊令〉，指出：「『反共救國團』深藏於『四·二二』組織之中，『四·二二』的頭頭就是『反共救國團』」。〈總攻擊令〉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行動起來，清查『反團』。對『抗拒緝捕者，可以就地處決。』」(大略)(註十二)

據中國大陸研究有關廣西文革的資料指出，六八年八月八日，「聯指」大規模攻擊「四·二二」，「據不完全統計，圍攻解放路和展覽館打死一千四百七十人，抓獲『俘虜』九千八百四十五人。俘虜都被當作『殺人放

火」、「四類分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團」等『要犯』、『首犯』處理。被『俘』人員交各縣拉回去『處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大略）（註十三）

此外，六八年八月十日，「河池軍分區奉廣西軍區之命，在東蘭縣人武部召開『關於用武力解決鳳山七·二九（廣西四·二二鳳山縣七·二九革命造反大軍）問題緊急會議』。……東蘭縣會議結束後，各縣人武部堅決執行『命令』，組織帶領各縣『聯指』武裝人員到鳳山後，對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員全面包圍，抓捕了一萬多人。僅這一次『圍剿』，全縣槍殺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經過武裝圍殲掃蕩後，鳳山縣革委會終於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大略）（註十四）

從上述例子及龐大的殺人數目可以看出，廣西省武鬥的激烈及殺人的情況實相當嚴重，此外，從「四·二二」大規模的被鎮壓的情況可得知，中央支左部隊並不是地方軍區的敵手，面對「聯指」及軍人的鎮壓，「四·二二」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搶槍行動，連援越南的軍用物資也搶了，並導致交通中斷，為此，中央曾發出〈七三通告〉，命令各派停止搶奪解放軍武器、恢復交通運輸、釋放抓去的人員及停止武鬥等命令。在此時，中央文革已意識到在軍人的掃蕩下，為穩定國家秩序，停止武鬥，恢復生產，犧牲「四·二二」已成定局了。

在廣東省，參與武鬥的主體是造反派「旗派」及保守組織「總派」，六八年五月開始，廣州武鬥高潮迭起，在這段期間港澳海面不斷發現自該省各地漂至之浮屍，即是明證。在五月十一日，「旗派」分子衝進「總派」盤據的該市電力廠萬福路宿舍投擲手榴彈，當場炸死百多人。六月上旬，「總派」企圖向「旗派」發動全面攻擊，但為旗派獲悉，乃採先發制人方法，捕殺「總派」群眾。「總派」為向旗派報復，乃組織敢死隊，潛伏該市各街巷，遇有旗派分子即予槍擊。在六月十四至十八日兩天雙方連續展開激烈武鬥，街頭陳屍五百多具，社會極端混亂。從上述資料可知，六八年的鬥爭是多麼的激烈。

由於兩派的鬥爭嚴重影響社會秩序與經濟生產，再加上軍方施加壓力，中央於七月二十四日再發出通告，批判挑起武鬥，「連續衝擊人

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的指戰員」的組織，並再重申要立即停止武鬥，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恢復中斷的車船交通，交回搶去的現金、物資與解放軍的武器裝備等。

三 「造反派」的最後掙扎

面對嚴峻的形勢及一連串的鎮壓行動，各「造反」派組織紛密謀對策，例如在六月下旬，廣州「造反」派組織「旗派」的負責人舉行了形勢座談會，提出了「右傾翻案風是當前運動的主要危險」，並指出了革委會成立後種種右傾翻案情況，例如：

- (1) 以圍剿派性、剷山頭及清理階級隊伍為名，打擊「旗派」；
- (2) 在幹部問題上，一大批「旗派」認為有嚴重問題的幹部被委任加入革委會，而「旗派」所支持的幹部則被冠以黑手的黑名而遭排斥；
- (3) 革委會復舊，在革委會成立後，一些舊幹部進入革委會後，就把自己嫡系原班人馬全帶進去，甚至提出了「充分發揮原機構的作用」等理論；
- (4) 在革委會內，群眾代表被排擠，充其量只能作陪襯；
- (5) 保守勢力更積極的集結、挑起武鬥，大舉鎮壓「旗派」，而軍隊則以「支左不支派」之名，實際上充當「保守派」的後台，而公安局、檢察局及法院等亦被利用為鎮壓「旗派」的工具。（註十五）

在這次座談會中，旗派強調應迎擊右傾翻案風，以奪取最後勝利。由於六八年期間全國鎮壓「造反派」的風潮，迫使全國各地「造反」組織的頭頭聚首聯絡，商討對策。六八年七月十七日，全國各地「造反」組織的領袖於北京航空學院開會，討論兩派的形成及軍隊支持保守派、開槍打「造反派」的情況，會議並提出建立全國性的通訊網和全國「造反派」的總部，試圖策劃大反攻。然而，是次全國性的造反派會議卻給康生的手下探到。

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大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會議一開始康生

便批判兩派武鬥造成的情況：「廣西問題，鐵路不通車，施了兩個月……現在援越抗美物資被搶去了，火車不通了誰高興？美帝高興！叛徒、特務高興，你們口裡喊革命，實際上是反革命。」(註十六)基於反擊軍方鎮壓，故搶槍多是造反派做的，所以這些中央大員便嚴厲地批評造反派，周恩來指出：

「現在鐵路要恢復通車，首先要停止武鬥，那派也不要侵領地方。對工機聯、造反大軍的考驗就把搶去的援越物資，全部交回，把搶去的槍全部交回。」「四·二二……方面的錯誤大。特別是中段鐵路運輸，放火燒了那麼多房子，嚴重得很！」(註十七)

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更親自召見北京「造反派」的紅衛兵首腦，批評他們不斷武鬥的情況：

「年青人就作些好事……你們說中央文革沒打招呼，林彪同志，周總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講了話，又開了十萬人大會。……可是下面還打，好像專門和我們作對。我們這個道理，第一條要文鬥，不要武鬥。如果你們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兩方都有土炮，你們算什麼打嘛！你們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賓槍、大炮都使出來，像四川一樣把高射炮對天上打。」「如果誰還繼續造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然而，在這次接見中，毛澤東也表示了保護造反派的決心：

「你們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們工作有多少缺點錯誤，都要看護你們，你們工作也確實有很多困難。文化革命我沒有經歷過，你們也沒有經歷過。」(註十八)

話雖如此，但毛澤東始終改變不了造反派及一些出身不好的群眾被鎮壓之惡運。

第三節 鎮壓出身不好的「黑五類」之政治運動

一 無中生有的鎮壓行動

雖然在軍方壓力及中央文革的認可下，「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已基本上土崩瓦解，其領導人紛紛被捕，他們個別在批鬥會上被當場處決，有些則立即逃亡以保性命。然而，整個鎮壓行動並未結束，更殘酷的清洗還在後頭。

在取締「造反」組織的過程中，個別地區的敵對派系無中生有的指責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壞右是「造反派」組織的後台，要徹底清洗「造反派」組織則非鎮壓這班長期隱藏在背後的黑手不可，於是這些地方都成立「群眾專政法庭」，將這批所謂「幕後黑幫」抓起來。據研究各地區文革進程之資料顯示，在各地鎮壓出身不好群眾的慘劇中，以廣西省的情況最為慘烈，在六八年五月後，廣西省中張貼了一張通告，謂在南寧市破獲了一個叫「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而在各地區的保守派群眾，在民兵的配合下，以群眾專政的旗號，廣泛輯捕「反共救國團」成員而引起殘酷的鎮壓行動：

據中國大陸新疆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血與火的教訓》引述的資料指出，「武鳴華僑農場1300人集體上京告狀，要求中央保障歸僑人身安全。當時的縣革委調動民兵在雙橋鄉攔截，當場抓捕74人，並宣布上京告狀是反革命事件、歸僑和國內織工1337人被列為審查，鬥爭對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關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人家被抄。」(註十九)

另據了解當時情況的人回憶：

筆者當時居住南寧，近在咫尺的武鳴縣，首先傳來了令人為之毛骨悚然的集體大屠殺的消息。這個縣的陸幹公社，趁群眾趁墟的日子，由「革命」群眾押了六十多個反革命分子來到墟場，命這些人一排跪定之後，便由一個拿了鐵錘的人，依次砸開每個人的腦門，一個個砸得腦漿迸裂，血流滿地，許多趕墟的人當時都被嚇得魂不附體……

陸幹公社帶頭之後，該縣的鑼墟公社也立即緊跟。他們也是利用群眾趕集的日子，把近四十個反革命份子趕來墟亭，命令這些人圍繞墟亭跑步，誰掉隊便亂棍打死誰，跑到最後，所有的人都再也跑不動了，只好一個個於亂棒下喪生。」（註二十）

此外，在六八年七月廿四日，「全區進一步掀起了所謂對『敵』執行『群眾專政』，刮起了殺人的『十二級台風』的狂潮，從城鎮到農村，成批亂殺人。僅賓陽縣每個公社都成批殺了人。從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天，全縣被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佔全縣在『文革』中死三千九百五十一人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三。」（大略）（註二十一）

以下是廣西其他一些大屠殺個案：

「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副局長、農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與『反團』有關，迫害致死。全縣11天打死338人。

整個河池地區被打逼死7864人

欽州地區7個縣市打死、逼死、失蹤人數達10,420人。」（註二十二）

「靈山縣被打死3200多人，都安縣被打死441人，百色地區被打死1073人，開鳴縣被打死698人，河池地區被打7000多人，其中有五個縣被打死千人以上。」（註二十三）

此外，在湖南的道縣，亂殺人的慘劇亦經常發生，據有關資料指出：「當時道縣的一份材料這樣記載：『今年八月以來，道縣農村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事件，被害人數上萬。老至80歲，小至幾個月的胎兒，除四類分子及地富子弟外，還有共產黨員。』」（註二十四）

廣東省的情況也是一樣，個別地區甚至出現集體處死的情況，有的全家一起被殺、有些屍體被吊在路口，並在屍上貼上條子：「這是『旗派』後台的下場。」有些地方把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帶到偏僻的地方說是辦學習班，而用已事先準備好的機槍掃射，導致血流成河。

由於當時很多「造反派」組織成員已逃往深山，「群眾專政法庭」無人

可殺，故將矛頭指向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蒙告他們為組織不純，經常挑戰當地黨政領導的「造反組織」的後台，而加以屠殺。當然，在屠殺行動中也有很多公報私仇的情況，在政府已無法控制，殺人已可以隨心所欲的形勢下，與當權組織結有私怨的人很難逃過厄運。

二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六八年八、九月間，中央又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洗對象為有政治問題、歷史問題的人，總結一句，也是基本上出身不好的人。運動指出文革實際上是對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故此「清理階級隊伍」的宗旨在挖國民黨的根。例如，湖南省領導人在清隊、開展對敵鬥爭進軍的大會中指出：「清理階級隊伍和徹底揭開舊省地市縣委階級鬥爭蓋子，是一件事情兩個側面。鑽進我們黨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兩面派，他們是國民黨反動派以及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的代理人，後者是前者的社會基礎，我們要採取上清下查，內外夾攻的辦法。」（註二十五）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後，曾經衝擊過周恩來的「五·一六」兵團也重新被提出來，各單位又先後開始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在文革結束期間，這些運動一個一個的翻天覆地掩蓋過來，使一般市民生活在極其恐怖的環境當中。從浙江省公安部頒發的〈治保工作通令〉中可以得知，這些運動是如何影響到每個家庭的生活，此通令的重點如下：

- (1) 把各地可疑分子分別彙成檔案，掌握他們一切言行，了解他們的家庭情況、錢物的來源；
- (2) 在五戶或五至七戶中，要佈置自己人在內，了解身邊各人的言行和情緒，若發現可疑的，立即偵查、疑點大的要跟縱，予以窮追猛打；
- (3) 各地單位要迅速成立「治保工作核心小組」，使研究敵情的工作打好基礎，給予敵人有力的、更大的懲治；
- (4) 在治保工作中幹出成就的，一律要予以多方面的獎勵。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中央也提出了「五查五控」的辦法，要查本

村、本單位、本地區每一分子在共產黨統治大陸前誰做過什麼事，控告歷史的反共份子，包括現有的、死去的、在家的、在逃的或混入共產黨內部的，全部需要調查清楚等。在這裡希望能引述一些曾經歷過此段恐怖時期人士的感受，例如女作家韋君宜在《洗禮》中描寫清查「五·一六」的一些情況：

「不讓被審的人吃飯睡覺。一熬就三天三夜。……六六年橫眉立目的造反派，一個個忽然變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組織關係和三反罪行」；「一位很會訓人的女造反派，不知為甚麼也變成了五·一六，被送到衛戍區去監護……可是被關押了半年多，她出來以後竟瘋了……一些幹部帶到學校的半大孩子們可找到了最好欺侮的『鬥爭』對象。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一拳就把這精神病人從很高的草堆上推得翻滾下去，然後孩子們亂拳齊下。」「已經揪出五·一六竟達到了四百多人。軍宣隊還在大會上動員，不能對揪五·一六抱有右傾思想。」（註二十六）

此外，一些無中生有的莫須有罪行簡直到了極為兒戲的地步，例如：

「一個同學也揪出來了，為嘛呢？他寫大字報，寫完涮筆水啊那麼一甩，在毛主席像臉上一溜兒，嚇壞啦。他趕緊疊巴疊巴，也不敢燒，壓在自個褲子底下了。過些日子他給忘了。後來學校鬧臭蟲，挨屋打藥時發現，當場就揪出來了。駐軍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馬上進監獄，馬上就判，快極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厲害了就是。比白色恐怖還厲害。」（註二十七）

在這些殘酷的鬥爭浪潮中而飲含離開人世的還有中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夫婦、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和乒乓球壇三傑傅其芳、姜永寧和容國團等等，而在文革初期批判血統論而成名的遇羅克也於此期間遭槍決。

可以總結的說，文革起初的發動是以整知識分子、歸國華僑或出身不好的所謂「資反線」而揭幕的，其中經歷過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向地方

黨政領導奪權失敗後，又再一次以「造反派」及這些一貫以來在中國社會最低層的「黑五類賤民」的鎮壓來結束，這真可以算是中國人民的最大悲劇。

三 派遣「工宣隊」進駐學校，徹底剷平山頭

為了再徹底剷平一切紅衛兵山頭，六八年八月下旬，《紅旗雜誌》刊登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文章透露了毛澤東的另一最新指示：「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份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全部鬥爭、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基於毛的指示，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軍方的配合下，宣傳隊分批進入各級學校。毛澤東號召工宣隊進駐學校的主要原因，乃是有感於派爭仍未停止，社會還出現動亂，故將大權交予工農力量來壓制學生繼續造反與制止武鬥，由於工宣隊握有很大的權力並得軍方支持，他們「堅持同革命師生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同革命大批判」，^(註二十八)這行動迅速散佈到每一個角落去，以發揮監視行動的功能，使學生十分困難的集合起來，共同商討對抗的策略，因而陷於孤立而被逐個擊破。當時工宣隊駐校的情況可從如下的片段得到反映：

「我記得工宣隊一進校就說，我們工人階級是佔領學校的，是毛主席派來的。……講話時說，我們工人階級就是大老粗，『唰』地這個扣子開了，一條腿蹬在講台上……當然這裏邊有個別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而這種老工人正成了他們工人階級佔領學校的籌碼。有個老工人來憶苦，那是真苦，伸出手來沒幾個指頭。憶苦是為了嘛呢？還得進一步鬥知識分子。」^(註二十九)

工宣隊開進學校後，學生的反應是抵制、藐視、拒絕批評或心懷痛

恨，學生說：「工人老大粗，不會做人的思想工作。」「這次工人是來整學生的，紅衛兵的天下過去了。」「他們妨礙、抵制、不高興、不積極、散佈種種似是而非的論調，來抵制工人宣傳隊。」或者「對工人宣傳隊吶喊歡迎！背後卻咬牙切齒，恨之入骨。」（註三十）

此外，曾參與文革的虞雪也曾描繪工宣隊進佔學校時的一些極端情況：

「令筆者震慄的事件發生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筆者和幾個同學在中山大學教工俱樂部大樓讀書，忽然，校門外響起刺耳汽車喇叭聲，兩輛裝滿武裝士兵的毛澤東思想宣傳車開進校園來了，尾隨在後的工宣隊、貧宣隊上百人，手執木棒、利器、蜂湧而入。我們當中一位姓郭的同學跑到大樓門前的草坪，跟一群農民碰個正著，他腹部挨了一刀，他用手捂著血湧如注的傷口，高聲喊：『我是工人子弟，咱們是階級兄弟嘛，幹嘛動武！』人群裏爆出一陣刺耳的笑聲，幾把明晃晃的匕首向他身上刺去。『嘿，老子今日開殺戒來的！』『旗匪！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階級敵人，剷了他！』姓郭的同學昏死在血泊裏，兩個農民抓住他的頭髮，拋上解放軍宣傳車去。這天，筆者和同組織的同學都被抓進中大『革委會』的地牢，我們被押到地牢門口的時候，那裏早圍著一群人……他們狂笑著，抓我們的頭髮，向我們唾口水，扔石頭，我們在押的一群人中有一位三十來歲的婦女……她仍不停嘶喊：『我孤兒出身……你們說我是地主女，反黨反毛主席，冤枉呀！』她因為叫喊而遭到鞭打……整整一夜，筆者倒在地上，隔壁受刑者的慘叫聲不絕於耳。」（註三十一）

四 大鎮壓反映中國局勢失控

殘酷鎮壓造反派及「出身不好」階層人民的行為，是中國社會在缺乏法制、泛濫的「階級鬥爭」論、以及社會在失去秩序，全面大混亂下出現的民族大悲劇。

雖然執行鎮壓任務的某些幹部和組織與當地軍方可能有某程度的配合，而這些消滅「造反派」的行動客觀上亦代表和維護著既存的黨政及社

會秩序，並起著抗拒中央文革及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然而，這並非表示部分「保守」派群眾組織所採用的令人髮指、無法無天的殘酷手段正確，更並非表示這些殘酷鎮壓人民的行動受到在中央抗拒文革的穩健派和實力軍事首腦所支持。相反，這些過火的鎮壓行動大都是某地區的民兵，配合著當地群眾組織自把自為，失去理智，自以為其行動最能實踐「階級鬥爭」理論的結果，而很多時屠殺行動都是瞞著上一級的政府而進行的。

例如在殘酷鎮壓「造反派」及出自不好的人的廣西，對上級封鎖消息的情況十分嚴重，據知情者回憶：「當時為了『關門打狗』，全區各地遍設關卡，凡是有來歷不明的人，抓住後一律格殺勿論。」(註三十二)此外，在廣西省某些地區，在大鎮壓期間竟然出現生剷吃人的現象。(註三十三)然而，由於山高皇帝遠，這些慘無人道的罪行竟被殺人者封鎖，後來才經由富有正義感的中共老地下黨員王祖鑒通過于迴的渠道突破重重郵檢，將五封告急信成功急呈周恩來(註三十四)，據說周恩來在得知「吃人」的事件後，曾喝令當地軍方領導當眾起立，怒不可遏地嚴加責問，在周恩來的干預下，廣西軍區負責人帶兵急赴「吃人」之地區，並指著當地區負責人拍案大罵，才制止了吃人的運動。(註三十五)

此外，上述曾提過的湖南省道縣大屠殺，此事件驚動了長沙的地方高級幹部，他們派出軍區6950部隊去制止武鬥，軍隊召集了包括公社、區武裝部長在內的有關人員的「全縣緊急會議」。會上軍隊強調：「『無論任何人，沒經過政法部門的批准隨意殺人，都是違法的，必須立即停止！』然而會議剛完，就有人公開聲稱『我們殺的是地、富、反、壞、右，有甚麼不能殺？』『管他是6950部隊、7950部隊，誰干涉我們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對壞人實行專政，我們就同他拼到底！』」(註三十六)

在文革期間被毛澤東及中央文革鬥倒的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再度復出當權後，立即開展平反中共在四九年建國以來的各類冤案，據統計，公安部門、檢察院、法院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三月平反案件接近一百一十萬件，其中大部分是文革期間的冤案。(註三十七)不少在文革期間借消滅「階級敵人」為名來公報私仇、鎮壓異己的犯罪分子被判刑。

一九八三年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指出純潔中共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徹底清理在文革期間犯下嚴重罪行的打砸搶分子。經過這次整黨行動，更多在文革期間犯下嚴重罪行的黨政幹部，遭受開除出黨處分並交法律制裁。

第四節 九全大會的召開——文革的正式結束

經過全面取締「造反派」組織、剷平各個不肯進行「大聯合」的山頭，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進程得以加速，直至六八年九月五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委會同時成立，至此，全國二十九個省市都已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七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指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全部成立，宣布了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各地區的代理人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陰謀的徹底破產……全國山河一片紅……標誌著整個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鬥、批、改的階級。」

十月七日，北京召開了大會慶祝「全國山河一片紅」，慶祝文革成功，但正如一些研究文革的學者指出，這次大會只得十萬人出席，地點不在天安門廣場而在工人體育館，而毛澤東及林彪這兩位實際領導文革的重要人物竟然不出席，可以反映中央文革及毛澤東失望的情緒，江青在大會發言中，強調「不要忘記了革命的青年，紅衛兵小將在文革的初期，在革命的中期，都建立了豐功偉績。」「在現在有少數個別小將犯了這種或那種錯誤，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改正。就是有個別單位，有甚麼武鬥，那也是很滑稽的……工人階級，領導的階級，要好好地保護紅衛兵小將，要幫他們，教育他們。」(註三十八)

六八年中共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宣佈永遠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於北京召開，除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極左理論，肯定文革的必要性外，還正式在黨章中加入了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一條。

十一至十二日期間，毛再發出年青人「上山下鄉」的號召，這樣不單

可以保證造反派不能再於城市中鬥爭，更希望能藉此運動解決文革以來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畢業生需要就業的嚴重問題。在當時中共的宣傳上，更強調上山下鄉運動為改造青年思想、接近工農、反修防修的政治行動。然而，據部分實際參與下鄉運動青年指出，下鄉實際上需忍受非人的生活，如在《血淚三年》這篇文章中，指出部分下鄉青年所受的苦況：

那些幹部說：「知識青年是出身不好的，來農村改造的，下鄉無好人，好人不下鄉，他們迫下鄉青年從事重勞動，颱八級颱風也要駕船出海，有病不給醫，動輒亂扣帽子鬥爭、清算、處罰」，「三百多名到花縣『下把水』血吸蟲役區（九曲河），食用、洗面、洗澡都在那裏，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年出現了皮疹、乾咳、高燒、眼病又痙攣」，「三水農場還專門設了一個下鄉青年勞改隊，公然把下鄉青年當作勞改犯看待！」

（註二十九）

就是這樣，這場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就以開除劉少奇出黨及鎮壓造反派行動中靜靜地謝幕了！

註 釋

- 註一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中央支左部隊進駐各大軍區、省軍區的若干指示〉載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一九七三年，第79-81頁
- 註二 林彪〈在整肅楊成武大會上的講話〉載同註一 第367-372頁
- 註三 同註二
- 註四 嚴家其 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大公報，一九八六年，第277頁
- 註五 王年一《大動亂的時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287頁
- 註六 文匯報（上海）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
- 註七 王希哲《走向黑暗》，民主大學出版，一九九六年，第33頁
- 註八 同註五 第295頁
- 註九 〈剖析中國大陸之動亂〉載《黃河》一九七六年十月
- 註十 《西江怒潮報》一九六八年六月
- 註十一 廣西四一二革命造反軍赴京匯報團出的大字報，第一期

- 註十二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編《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97頁
- 註十三 同上註，第115-116頁
- 註十四 同註十二，第117頁
- 註十五 鋼八一通訊（廣州）一九六八年七月
- 註十六 工革聯（廣州）小冊子，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
- 註十七 同上註。
- 註十八 毛澤東召見首都紅代會員負責人的談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第687-716頁
- 註十九 地久、致武《血與火的教訓》，新疆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73頁
- 註二十 爭鳴雜誌，一九八三年八月，第12-14頁
- 註二十一 同註十二，第111頁
- 註二十二 同註十九，第72頁
- 註二十三 同註十九，第75頁
- 註二十四 同註十二，第188頁
- 註二十五 湖南廣播，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
- 註二十六 同註四，第293頁
- 註二十七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第一輯，香江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第115-116頁
- 註二十八 浙江人民廣播電台，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
- 註二十九 同註二十七，第117頁
- 註三十 新華社 上海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電
- 註三十一 虞雪〈中國人要從毛澤的死胎掙出來〉
- 註三十二 同註二十
- 註三十三 鐘山縣公安局預審卷宗，易晚生殺人案《關於鄧記芳的剖腹案調查報告》第二頁，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華視文化公司出版，第51頁
- 註三十四 鄭義《紅色紀念碑》，華視文化公司出版，第130頁
- 註三十五 同註三十四
- 註三十六 同註十九，第194頁

- 註三十七 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講話》，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145頁
- 註三十八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下，百葉書會，一九七六年，第352-353頁
- 註三十九 支農紅旗 一九六八年一月(廣州)

第三十四章 文革期間極左思想統治下中國人民的心理狀態

導 言

研究文革歷史，固然要從國際形勢、經濟、政治及社會各方面分析這段歷史時期的史實，然而，絕對不能忽視的，就是在研究上層權力鬥爭及民間「造反」、「保守」兩派對立之同時，應把眼光放到普遍中國人民心態之上，這一點非常重要，是理解文革直至四人幫倒台的一條鎖匙。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在文革期間經常歌頌完美無私的完人性格的同時，又可以看到殘酷的人性，人們互相攻擊、社會充滿虐殺及仇恨，上百萬的善良人民在鬥爭中被屠殺，很多人受不住政治的壓力變成瘋子及被迫自殺。究竟文革期間，在毛澤東思想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中，人民的普遍心理狀態是怎樣的呢？

要回答上述這個大問題，首先要明白當時作為至高無上權威，受萬民崇拜的毛澤東思想。簡單的說，在面對劉少奇的經濟路線下，毛澤東十分擔憂資本主義會於中國復辟，再加上毛認為社會主義仍存在著自負盈虧的個別小生產，而由於每個人的條件差異，部分人可能得以累積較多資金，而形成階級重新分化的基礎。故此，毛指出社會主義雖然已從所有制的基礎上消滅了剝削差級，但假若市民思想上自私的劣根性不被消滅的話，社會始終有一天會倒退而墮入萬劫不復之境。他認為應從思想上劃分階級，要使「八億神州盡舜堯」，將每一個中國人都培養為享有完美無私、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人格，人民不應經常從物質利益處著想，而應該以政治掛帥、以是否能服務他人作為衡量每一件事情的標準。

在實際政治方面，毛十分明白已不能通過黨內合法表決的途徑剝奪劉少奇的權力，故他只好利用其建國以來崇高的威望，藉個人崇拜來鼓勵市民對他的支持，並鼓勵造反派去衝擊各級握有黨政大權的政敵。

在人民群眾方面，基於共產黨於建國以來一連串的成就以及人民渴望崇拜一位永遠正確的領袖之心理，促使長期以來慣受封建思想統治的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製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土壤。在以上的社會背景下，我們可以發覺中國人民普遍有如下六點心理狀態：

一 在極端個人崇拜下的人格個性萎縮

雖然文革期間毛強調造反，反對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認為這是奴隸主義，而要堅決反對，但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卻要人民對其「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大眾傳播媒介不斷宣傳「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甚至「理解的支持，不理解的也要支持。」可以說，這是更為倒退的奴隸主義，劉少奇的《論共產員的修養》只要求黨員及群眾服從上級，服從多數，服從組織，而毛澤東則更要求群眾服從他個人。

人民方面，他們崇拜毛是完全出自真心，他們期望從一個偶像中找到安全感及社會價值的基礎，帶領他們達至理想的目標，例如，東方紅這首歌就道出中國人民心中的希望：

「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該呀，領導我們向前進。」

梁振友，一個被中共宣傳為典型人物的人，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市民普遍崇拜毛的瘋狂情況，他「在參軍以後……不論在崎嶇泥濘的行軍路上，還是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梁振友的心中時刻都有一輪紅太陽——最敬愛偉大領袖毛主席，鼓舞著他出生入死。」「他們每到一地，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掛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像，以便天天看到毛主席。戰士們給親友寫信，第一句話是：『最最衷心地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他們假日外出，唯一的心願就是買到心愛的毛主席像章。有時候，他們要移防，駐地革命群眾向他們要張相片留念，他們留下的是毛主席像。他們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們的一切，我們都要永遠熱愛毛主

席。」

在《雷鋒的日記》中也發覺群眾將感情投在毛澤東身上的現象：

「敬愛的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天天想，月月盼，總想見到您。您的像片，我每天要看好幾次，您慈祥的面孔，我在夢中經常見到……我要以堅強的毅力，忘我的勞動，刻苦學習，做好工作，爭取見到毛主席。」「我在昨天晚上做夢就夢見了毛主席。他像慈父般的摸著我的頭……早上醒來，我真像見到了毛主席一樣，渾身是勁，用也用不完。我決心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永遠忠於黨，忠於毛主席，好好地學習，頑強地工作，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做一個毫無利己之心的人。」(註…)

以上崇拜毛的感情一點都不假，是人民衷心誠意的表現，受盡帝國主義者及封建地主壓迫的善良群眾，把自己及國家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毛的身上，形成對領袖的極端個人崇拜。然而，這種對領袖盲目的崇拜卻往往導至很多荒唐甚至扭曲人性的表現。

一九八零年《人民文學》第十期的小說〈芒果〉中，就描繪了群眾在文革期間瘋狂崇拜毛澤東的表現。由於外國友人為毛送來幾個芒果，一些專負責宣傳毛的部門遂把芒果制成臘品到各地展覽，而在社會牽起一陣轟動的熱潮：

「因為老潘離車站太遠，他沒有看到芒果是怎樣下火車的。他只從喇叭裡聽到先是市革委主任講話，後來是工宣隊代表講話。不過這個代表講的沒有市革委主任那麼激昂慷慨，他只念了幾條語錄，後來就感動地失聲哭起來，再後來是他忽然大聲喊了幾聲『萬歲，萬萬歲！』。」

「一輪十輪大卡車緩緩地開了過來，車上站滿了荷槍實彈的年輕戰士。卡車前邊擺了一張桌子，桌子兩旁站著兩個佩著紅彩綢，帶著大紅花的人……參觀的人有的拿著語錄本，向芒果鞠躬行禮，有的眼淚汪汪地腿直打哆嗦，好像要下跪。還有個人脖子伸的老長，鼻子噥噥吸著氣。」此場面靈活的反映市民對毛澤東瘋狂崇拜的情緒，正是借著民眾崇

拜的魔力，毛澤東輕而易舉的將政敵鬥倒。

此外，在有極度濃厚宗教氣氛的「忠」字化運動時期，個人崇拜的情況可謂無處不在：

「各機關、工廠、商業、學校單位，都空出一個空房，加以粉刷，牆上掛了毛澤東像，像下貼了個『忠』字，有時兩旁還貼有對聯，好像主席揮手我前進，主席指示我照辦等。又設供桌，放置毛澤東選集四卷，稱為忠字室，早上起來，先在屋內向毛像三鞠躬，朗讀毛語錄，稱為『早請示』；晚上睡前向毛像報告一天工作、思想，如犯罪則向毛像請罪，要求寬恕，稱為『晚匯報』。上下班在車上，由售票員帶大家行禮，或呼萬歲，或唱由毛語錄編成的歌。到了學校或工作單位，先集隊在忠字室行禮，讀語錄，呼萬歲，並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如在飯堂、飯店吃飯前，也須語錄、萬歲一番。寫信、打電話開頭先來：『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等等。」(註二)

有一位本性十分善良的習醫少女，由於家庭出身問題整家人被紅衛兵迫得走投無路，最後，少女的雙親要求她協助了斷他們的生命，在這慘絕人寰的悲劇發生後，這少女被捕下獄，「一年後對我判決了、允許見家裡人了，每次見面光是祝願萬壽無疆身體健康，學語錄，就佔去一半時間，剩下點時間光知道哭，說不了幾句話。」(註三)

雖然文革曾有一段時間准許市民嘗試大民主批判官僚，但畢竟他們還是馴服在毛的絕對權威下行事，所以，文革就出現了一個極為荒誕的現像，一方面「造反派」作為獨立的批判者，然而這可貴的獨立性格卻又是極為馴服被動的，心甘情願的作為毛清洗政敵的工具。

此外，群眾對毛的盲目崇拜也對國家產生極大的災禍，他們對毛的所有行徑完全失卻批判能力，極權的家長制發揮到歷史的頂點，例如在大躍進的極左經濟政策下使國民經濟幾乎崩潰，餓死的百姓無數，有些估計甚至高達數千萬人。(註四)但當有幾位真正為民請命的正義官員向毛提出建議而遭打擊時，人民幾乎無一例外地支持毛的「反對右傾主義運

動」，彭德懷等正直幹部受到萬民批判，這真可算是歷史對中國人民的諷刺！在文革後段軍人當權的時期，個人崇拜更被推向另一瘋狂的程度，部分軍事首腦通過大搞個人崇拜表示他們對毛最忠誠，這樣人民便需更服從他們的統治，以軍事首腦的意志為依歸，以表示對毛主席的忠誠愛戴。

二 委身忘我，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的極端殉道行為

若能較深入的分析毛的著作，很容易可以發現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自己小集團或自己個人的利益出發。」「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註五)

總結來說，「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中人格的最高境界，他無時無刻都希望中國人民能朝這理想邁進，它是革命的標準，人生存在的最終意義，以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達至共產主義的最好保證的方法。故此，這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捨己」、甚至「自我否定」的人生觀，「捨己」的目的是為了「委身」，「忘我」地將生命奉獻給群眾、給國家、給共產主義；從另一方面來說，一個人要忘我委身給理想，達至「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神聖境界，則必須放棄個人的價值，甚至喪失自我。

當時的中共宣傳機構經常突出這種委身忘我的工作態度，希望成為群眾學習的榜樣，毛澤東曾號召全國學習支持中國革命的加拿大籍醫生白求恩的忘我精神，他在患了敗血病，人命垂危時，仍堅持為病人動手術，直至生命最後一刻，毛對他的工作表現高度讚揚：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

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註六)

可以肯定的說，在毛澤東個人崇拜盛行的時期，這種徹底忘我，為國家前途理想奮鬥一生的觀點曾深深的刻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裡，成為內化的良心，而引發出許多扣人心弦的英雄故事：例如：

在大躍進期間，「廿七日夜晚，河南省成千上萬的土高爐，徹夜火焰熊熊，火光映紅了紅夜。這一夜，是禹縣英雄公社青年東風煉鋼廠，分秒必爭、斤兩必爭、為鋼鐵奮戰的第十六個夜。當夜幕剛剛降臨，落起一陣小雨，工人們怕雨下大了路濕不好走，就把足供十五天用的礦石、焦炭運到爐前。二十三歲的青年工人傅江，三天前在鋼鐵戰線上參加了共產黨，他已經四天四夜沒有睡覺了。但是在運礦石的時候，幹勁特別大。別人挑一擔，他挑兩擔。他說寧肯把人累倒，也不肯叫爐子停住。李天祥、李東方父子二人，已經戰鬥了六晝夜，別人再三叫他們休息，但李東方卻堅持不肯，一直戰鬥到下半夜三點鐘。」

此外，還有就是人民公社女社員圍海造田的英勇事跡：

「二百多名漁家婦女，要在短時間內築一條總工程達二萬七千土石方的防潮堤壩，困難不少……第一個困難是工具不夠用，大家說：『我們要自力更生，不能向國家伸手』……為了解決堤壩用的石料，七個婦女隊長率領婦女們，爬山涉水到三十多里的地方去找石頭。她們風裡來，雨裡去，把找到的一千四百方石塊，和二萬多塊石條，統統運回來了……正當緊張施工的時候，碰到雪潮南下，氣溫驟然下降，站在冰冷的海水裡打樁，又冷又累！在這關鍵時刻，孫愛春率領大家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帶頭跳下水去，接著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積極份子王汝賢和十二名女青年，也奮勇地跳下去，站在齊腰的水裡打樁……為了順利保護打樁，王淑英、謝蘭瓊等十八名婦女一齊跳下水，手攔手，肩靠肩組成一道人牆，阻擋浪潮，天冷水渾，他們一遍又一遍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

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堅持在水裡勇敢戰鬥。」(註七)

此外，中共軍隊六〇一一部隊某部六連四排奉命護送南昌縣蔣巷區紅衛兵回農村鬧革命，途中，橫渡贛江。當船隻遇險，「船頭陡然下沉，船上的人一下子全被拋進了激流之中……滔滔江面突然昇騰起一片激動人心的呼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共產黨員，副班長李從全，雖然不大會泅水，但全身是膽、全身是勁。那裡有毛主席萬歲的聲音，他就游向那裡，憑著一塊小木板，一連救出三個紅衛兵，最後，當他看到革命小將處在危急中，便毫不猶豫地把木板推給他們，而自己滿懷捨己救人的革命豪情，被激流捲去。」

上述的事跡無疑是可歌可泣，但較詳細的分析，某些問題可能是違背了常理，例如在被大浪沖走時，竟然不喊救命，而去叫毛主席萬歲，一些不懂水性或全不理自然環境而奮力完成任務的人，究竟有沒有想過其他更有效率工作或救人的方式，避免不必要的意外或犧牲，而減輕國家給醫療方面的負擔或減少浪費有用的人才。更甚者，在徹底否定個人的思想下，我們亦可以看到許多違反人性的現象，導致人類可貴的判別是非標準的喪失、絕滅親情及失去人天然的愛美本性，從以下例子中可看到這種現象：

第一，對中國人民心理狀態有深刻反省的虞雪女士曾道出她親歷的經驗：「那是某一年廣州春季交易會期間，筆者路經海珠市場，看見菜攤上擺放著又紅又大的西紅柿，一時忘其所以，趨前詢問售貨員：『這蕃茄多少錢一斤？』三十開外的女售貨員挺認真的回答：『陳列品，擺著為社會主義爭光的。』……這時候筆者是共產主義『新人』的一員，聽了售貨員的回答，自然心悅誠服，滿意的走出市場。理想作為工具，能化腐朽為神奇，化虛假為真實，化荒謬為偉大，西紅柿事例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幽默罷了。」(註八)

第二，為了證明自己能無私，捨己的為人民工作，在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中出了這個例子：

「強烈地震剛過，市委常委……×××剛從倒塌的房屋裡脫險，十六

歲的兒子和十三歲的女兒在瓦礫下喊著：『爸爸，快來救我！』×××正要去救孩子，忽然聽到一牆之隔的路北區委書記邱××一家呼救的聲音。……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共產黨員應該怎麼辦？×××毅然決然地對愛人說：『我先去救老邱！』邱××一家安全脫險後，忙問：『你的孩子呢？』×××說：『不要管他們，你是區委書記，趕緊組織全區進行搶救。』×××回來，兩個孩子已經死去。但是他不後悔，不悲傷，不氣餒。」（註九）

虞雪的分析十分中肯，×××的表現著實使人感到疑惑，他不去救孩子的「唯一理由便是他們是他的親生孩子。換了是別人家的孩子，只要不是狗崽子，他是可以救的。」×××去救區委書記並非一定出於愛心，而只是一種公事，「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共產黨員應該怎麼辦？」他放棄了孩子，但滿足了為人民服務的良心，於是他得到社會的讚賞，然而，在當時的實際情況，究竟是否一定要他的協助，區委書記才能脫臉呢？這篇文章並無交待。然而，無論如何，×××在子女被困的危急關頭上說了一句：「不要管他們！」就可以知道人性是怎樣的被扭曲了。

中國著名作家劉心武在四人幫下台後曾寫了一篇小說〈班主任〉，引起很多讀者的回應，在讀者的來信中，最動人的是廣西工廠團的幹部，她指出其妹妹在文革間接受的思想終於迫使她走上自殺的道路：

「她妹妹一年只穿白、藍、灰、黑四種顏色的衣服，除此之外一概不穿。姐姐有一次到理髮館剪了個運動頭，妹妹為了這件事跟姐姐吵了好幾次，覺得姐姐毫不革命。這個妹妹只讀《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其他東西一概不讀，一律認為是黃色的或者反動的封、資、修那一套。四人幫倒台以後，依然是這種思想狀況。那時妹妹參加工作，在一個街道工廠，回來就生氣，說工廠裡都反動，年青人談衣裳顏色，大嫂大嬸們談家常買菜甚麼的，怎麼不談天下國家大事呢？看不慣。更有甚者是發工資時，她不肯領工資，說怎能要臭錢呢？她不懂她不要錢也還是在用她爸爸的錢吃飯。……她也有幾個朋友，文革大串連時出去認識的，跟這些朋友通信也都是同一格局：先是概述大好形勢，然後引述報紙上最

近的號召，比如最近號召植樹造林綠化祖國，我們就要做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的標兵；然後抨擊現實：現在有些人落後不革命，只有你才是革命的，我們之間是戰鬥的革命友誼，最後互相致革命敬禮。

……這天晚上父親買了個西瓜回來，叫她吃點西瓜休息休息。他就跟她父親吵，說：『要拿西瓜來腐蝕我啊，我就不要吃！』她父親氣壞了，說：『你活了這麼大，怎麼連個人事都不懂！』於是這個妹妹跑到屋裡去，先服毒，然後上吊死了。』

以上的情況相信在中國大陸居住的人不會感到陌生，為了證明能徹底「委身」、「忘我」，很多時候都會做出一些違反人類天然本性行為，穿的衣服一定不能光鮮，新買回來的衣服要撕破弄污打上補釘才敢穿著，凡有政府的號召不管是錯是對立刻帶頭執行，這就是當時某些極端的所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表現。

三 以政治價值取向作為衡量所有事情的客觀標準

毛澤東思想指出達至共產主義不單要經濟發展，還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故此，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決定一切，這概念被運用到社會的時候，就要求市民擁有一種無時無刻都關注政治及提防變修的「泛政治人格」。例如林彪在六六年的指示指出：「要注意不要迷失政治方向，擁護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頭號大好，不然的話，就是頭號大壞，其他都是中好中壞，小好小壞，到底哪一條是第一位，哪一條是第二位，這是兩種幹部政策。一種是注意小節，不注意大節。一種是注意小節，主要是注意大節。有的幹部，小節不那麼好，生活作風，男女關係，工作態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大好，但是他擁護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幹勁。還有一種幹部小節毛病不多，沒有甚麼男女關係問題，人緣也好，是和事佬，他也不偷雞摸狗的，但他反對毛主席，反對突出政治，如果用這種幹部，我們的軍隊就會變成修正主義軍隊，我們的幹部政治，要注意大節。」

就是因為這個突出政治的口號，一個工人技術好，一個科學家學術

地位高或一個農民的農業技術高，卻通常會遭受「不關心政治」及「只專不紅」的白眼，而成為嫌疑份子，以及在政治運動中成為被衝擊的對象。故此，要得到社會的認同，則必須將自己的人格政治商品化，務求達到社會認可的標準，否則將會受到社會的遺棄。

在四人幫倒台前的大陸，連醫院收病人，醫生看病人都要堅持階級概念，吳聰、虞雪的分析十分準確：

「震動中外的斷手再植的成功，新華社報導時強調這是醫務人員在黨培養下懷了對階級兄弟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所獲得的醫學上的創舉，暗示斷手的傷者碰巧是『階級異己份子』的話，這個偉大的手術便不會出現。……每次政治運動下來，總有為數不少的醫生、護理人員被貶斥，罪名不外是對求醫的革命幹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態度不好，感情不深，對資產階級笑面相迎。有過一個時期，求醫者須持所在單位的證明，說明其階級成份，才能掛號看病。甚至對於救死扶傷，實行基本人道的醫務人員來說，在他們的聽診器和X光鏡前的已經不是人，而是政治。」(註十)

一個出身不好或曾經在政治上犯過錯誤的人，則無論他在別的方面有甚麼突出的成就，他始終是社會上最低下的一層，無論升學、工作、接受各項服務，甚至子女的一生都會受到摧殘性的影響。丈夫犯了所謂錯誤，為了保障其他家庭成員，往往被迫和相處多年的妻子離婚，以免其受到株連。

中國在四九年後作為財富劃分階級的時代過去了，但在一九七六年之前之階級鬥爭論泛濫的情況下，一種更為封建式的血統論或階級成份論卻是代之而起，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層。《革命之子》一書的作者梁恒是知識份子家庭出身，自己是一個工人，他在工廠中與一個軍事幹部的女兒小高談戀愛，雙方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小高曾把梁恒帶返家見其父母：

「生命不斷重覆著殘酷的意外，第二天晚上小高來到我房間，眼睛

哭得又紅又腫，頭髮凌亂不堪，她投入我懷中放聲大哭，原來是她爸爸嫌對方家庭不是門當戶對而反對他們的結合：『我的女婿一定得和家人裡其他人一樣穿著綠色軍裝、頭戴紅帽，絕對不能穿著髒兮兮的工人制服，或架著臭知識分子的眼鏡！』小高不肯聽從，他就拉起她的褲腳管，用一條鋼絲抽打她的兩條腿，直打到她答應與我分手為止。……我又痛又恨，眼淚不禁奪眶而出。這真是個絕大的諷刺——一個領兵殺敵以建平等社會目標的人，竟然有這樣的封建思想，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他告訴女兒，這和紅衛兵認為只有『紅五類』才有造反的權利有甚麼兩樣呢？有時我會覺得，我們的社會假使有心努力，是不會偏離社會主義理想太遠的。可是現在卻差得這樣離譜，還讓我所愛的人受到這樣的對待！」（註十一）

由於政治地位對每一個人是這麼的重要，故此，怎樣保持自己優秀的政治地位或改變自己不幸的政治地位就成為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日夜盤算著的事：

虞雪的「一位女同學，漂亮、驕傲，出身於職員家庭（小資產階級）。學校畢業後進了工廠，結識了一個青年，少年的父母是印尼華僑，被劃為『僑商』（資產階級），兩個人情投意合相好了兩年。後來女的參加了共青團，當上了團幹部，形勢便發生了變化：原來男方的家庭成份較她的稍遜，但還相距不大，可以用愛情來彌補，作小小犧牲；現在她當了團幹部，是廠裡的紅人，身價高多了。對於一個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的柔情但見每日消散。青年也自慚形穢。一對情人終於分手。不久，這位漂亮而高傲的女子嫁給了解放軍一個團長，團長憑年紀可以做他的慈愛父親。她並非無產階級出身，原是不大適合的，好在她是團員，又年輕漂亮，庶幾可以彌補她出身之不足。廠裡的女孩子都羨慕她的好運氣，稱讚她會找丈夫。男青年只有心裡佩服的份子兒。她自己也這樣認為，雖然她知道自己不愛這位好團長。」（註十二）

虞雪另一位女同學在下鄉三年幸運的被抽調到廣東韶關鋼鐵廠一公社糧管所工作，她出身資產階級家庭。有人把她介紹給韶關鋼鐵廠一個

「老工人」、這「老工人」四十多歲還討不到老婆，不久前他被提升到廠革委會宣傳組當幹部。兩人見面後便把婚事訂了下來。老工人知道她出身不好，但想到恐怕再難找到自己滿意的女人。虞雪的女同學則認為找到了「紅靠山」，甚麼政治運動來了有他擋住，自己家人也有個避難所；無遮無掩風風雨雨的日子實在過怕了，於是一口答應了婚事。……可是她因為高興得太早，走漏了風聲，糧管所的領導知道了這件事，打了幾份公文到韶關鋼鐵廠革委會，反映了女方的家庭出身。由鋼鐵廠革委會出面規勸男方站穩政治立場。這件好事便告吹了。我們的女同學沮喪得不得了。（註十三）

四 鬥爭、攻擊形的暴戾性格

由於毛澤東經常指出要以階級鬥爭防止舊剝削階級的反攻倒算，以及新生資產階級把歷史倒退的危機，故此一種鬥爭、批判、攻擊的性格就成為捍衛社會主義不能缺少的手段，這個思想大大改變了中國人民溫和、忍耐的性格，而使人民經常處於防犯敵人進犯之提心吊膽的狀態當中。

中共經常以列寧語錄警惕市民要時刻防範資本主義復辟：「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地主和資本家階級反抗的勁頭正由於他們的失敗而增長了千百倍。」故此列寧指出：「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壓迫國內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在中共鼓吹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亦強調了縣委的革命化一定要於鬥爭中成長的。「縣委的革命化不是和平地實現的。沒有黨內的鬥爭，就沒有我們縣委的革命化。」「鬥爭」成為了生長在文革期間中共政權下一個不能忘記的名詞：

「許多青年同志沒有看見過地主和資本家是怎樣進行殘酷的剝削

的……這是一個弱點。加上階級敵人往往偽裝出一副善良的假象……似乎很聽話，就覺得天下很太平，沒有甚麼階級鬥爭了。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有些青年聽了幹部和貧農、下中農介紹的情況，知道了那些地主在暗中搗蛋，如記變天賬等事實，才大吃一驚。壞人也往往正要利用青年人的這個弱點來進行活動。所以，青年人特別要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和階級警惕。」（註十四）

既然要培養青年人的鬥爭性格，使他們一刻都不忘警惕，故此中共強調寧「要小鬪將，不要小綿羊」，「是把學生培養成懂得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敢於批判資本主義的革命小鬪將，還是把學生訓練成資產階級需要的恭順馴服的小綿羊，這是兩種不同培養目標的鬥爭。鬥爭的實質，是按那個階級的世界觀去塑造學生，為哪個階級培養接班人。」（註十五）既然在毛澤東等領導人心目中，鬥爭仍是這麼尖銳，故此，為培養同學們仇恨資本家的情緒，學校就不停教授地主富農們怎樣收藏變天賬，殺死耕牛破壞生產，資本家怎樣利用糖衣毒藥侵蝕工人階級，以為推翻無產階級作出準備，這一切「仇恨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故此，在極左的階級鬥爭思想統治下，中國成了一個批判、仇恨、攻擊的時代。以下虞雪和吳畊引述的例子，可使我們明白當時培養仇恨的大概：

「去年年初（指一九六五年——筆者按），南京軍區後勤部八一保育院……深入地進行了一場幼兒教育工作的大革命……。

他們首先用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審查了教育大綱和教材……甚麼環境佈置要美觀舒適……教育內容是講童話、神話、動物的故事……在看電影時，看到地主恨不起來。這種現象，不能不引起黨支部的注意……

於是，……他們讓孩子們看國民黨反動派殺人的大刀，打人的皮鞭，勞動人民被殘殺後遺留的血衣等寶物，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孩子們……在電影、照片上……看到地主的壞樣子，就氣忿得指手劃腳地說：『打死你這個大壞蛋！』這個可喜的現象，怎樣不使大家高興呢！

……大班一個小朋友畫了個缺了一條腿的美國佬，老師問他為什麼，他說：『那條腿被越南叔叔打斷了。』有的小朋友在畫廊上看到約翰遜的腦袋，就想去把他的眼睛摳下來……。」（註十六）

心中充滿鬥爭概念、並經常處於恐防階級敵人破壞的恐懼當中，就形成當時中國人民過份警惕、互不相信，遇到稍有嫌疑的分子，便窮追猛打、永不放過，以期挖出階級敵人的根，以保社會主義河山萬代不變。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能夠明白為何當時中共各級機構經常都負擔起監督人民一言一行的任務；為何這麼多人甘心情願做國家的探子，向上級組織匯報反映周圍可能出現的「敵人」之情況；為何中共經常強迫出身不好或稍有政治錯誤的人，要他們不斷的坦白交待，向黨交心。在人民衷心的支持下，極左思潮統治下的中國成了對人民監察最嚴密的封閉社會。一般來說，當時部分黨政領導人，對這點並無表示強烈不滿，因為處於互相監視的人民肯定不能串連團結，階級鬥爭的惡夢經常環繞人民的腦袋，形成一種緊張的氣氛，這樣當能懾服對社會或對黨領導不滿的人，以鞏固政權的統治秩序。

文革初期部分紅五類紅衛兵對知識分子及出身不好的人隨意抄家迫害甚至屠殺，文革中期即六七年下旬造、保兩派的武裝衝突，以及文革後期對造反派及出身不好的黑五類之殘酷屠殺，可以從報復、攻擊形的暴戾性格等方面找出心理上的原因。

在文革後期的廣西大屠殺中，可以看到攻擊暴戾形性格的極點：

「在大屠殺席捲全省之初，有一個華僑農場因是對海外進行統戰工作的基地，於是，農場領導考慮海外影響，行動有些猶疑不決。縣人民武裝部獲悉這一情況，馬上派一位副部長親自趕上農場，召集農場革委會的全體成員開會，在會上嚴厲斥責領導『思想嚴重右傾』的同時，點著第一、二把手的鼻子說『我問你們，死他一批人有甚麼了不起？你們說吧！……』於是，兩天之後，總場所在的墟鎮上，便有九個被戴高帽的人被拉來遊鬥了，來到墟亭不到十分鐘，在圍觀的人群後面，有人大叫幾聲：『打死這些反革命分子！』磚頭石塊便從四方八面飛了過來，全死於

亂石之下。亂石之後，因有一人的口還在一張一合地沒有完全氣絕，有人便將一條木棒從他的口中直插進肺部。總場作了示範，各分場和各生產隊也就齊齊動手，枉死者不知幾許。無怪乎有些歸僑曾經痛哭流涕地說：『在印尼排華時，我們都沒有見過這無人道的場面，想不到回歸祖國後，我們竟會慘死在同胞的手裡！』（註十七）

以上的情況在文革期間出現了不少，將毫無犯錯的「地富反壞右」屠殺後，還要殺害他們的家庭成員，包括剛剛出生的嬰兒，據說這是為了斬草除根。數百名所謂「階級敵人」被集體屠殺的恐怖場面在文革後期亦曾出現。一些年齡不過十五、六歲的學生遇到他們認為稍有「嫌疑」的分子時，便毫無顧忌的把對方殺死，之後還心安理得，向人炫耀。更嚴重的是，這種暴戾的氣氛更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成為他們攀上更高社會階梯之工具：

「……大屠殺期間，這人為建立自己的功業，為了掃清自己當校長的障礙，便以韋派頭目的身份大顯身手。一天，他命令民兵把全分場的男女老幼趕進一個院落裡，然後將包括歸僑校長在內的七個人，拉到群眾面前進行殘酷的吊打鬥爭。當這七個人被打得奄奄一息之後，他又下令把他們全拋進池塘裡，後發現有三人在水中仍能掙扎，恐其死不了，於是又叫把這三人拖上來，然後搬來大石，把這一個人的腦袋全砸得粉碎！

就這樣，這個流氓竟因殺人有功，被譽為『在對敵鬥爭中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不但『光榮入黨』，而且在調任分場的保衛幹事後，不久又升遷為總場中學的黨支部書記。」（註十八）

五 無時無刻的恐懼心理

在這樣無情的殘酷鬥爭，動輒得咎的氣氛下，每個人都誠惶誠恐的生活，怎樣保護自己便成為每個人心目中思索著的課題。朋友、同事、兄弟、甚至夫妻間彼此都要互相防範，避免走漏一句半句話而自毀前

程，甚至招殺身之禍。

在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的〈晶晶的生日〉一文中，細緻地描繪了中國人民在當時面對的恐懼心理的氣氛，每個生活的小節，都會引起不安和警戒。例如作者的女兒晶晶第一次認識甚麼叫作「生日」，高興得到處叫嚷，這就引起了媽媽的不安：

「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趕上來糾正，心裡突然懊悔起來。這孩子口無遮攔，如果到處去喊他要過生日，人家豈不以為我們做父母的滿腦子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這樣一想，我趕緊拉了他回家來。一跨進門立刻叮嚀他：再不許提生日的事，否則有一天要變成『老反革命』了。孩子當然弄不清生日提不得的道理，不過，『老反』的意義他是曉得的，馬上聰明了小臉，一板正經地點著小腦袋瓜。看他那樣子我也放心了。」（註十九）

此故事的高潮在於後來晶晶在玩耍時興奮忘形，隨意地喊了一句「毛主席壞蛋」，當作者從一個極為相熟的鄰居中得知此事後，整個家庭立刻瀰漫著恐懼的氣氛，在母親追問孩子的一段中，充份表現了大陸人民在文革期間經常承受的恐懼心態：

「冬冬說，你喊了……『毛主席』——說到這裡，我壓低了聲音，習慣地環視四週下『壞蛋！喊了沒有？』……這一下，孩子似乎記起來了，整個臉立刻僵住了，眼光怯生生地盯著我。

『喊了沒有？』我再追問。

『喊了……』聲音低得像蚊子叫。

『為什麼喊？』我一氣忍不住提高了聲音。

他一臉的麻木不仁，仍是傻傻地張著嘴，眼珠像死魚的一般，黯淡無光彩。我雖在盛怒中，卻也可憐他起來，但憐憫的念頭剛一滋生，心底便敲起了警鐘。多少家長都說過了：一個孩子可以偷，可以搶，但萬萬不能犯政治錯誤，我想到這裡，我狠了狠心，吃力地彎下了腰，用盡氣力打了他兩個巴掌。晶晶吃驚地捧住了臉，『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自從這件不幸事件發生後，恐懼的心情在作者心中瀰漫，周圍一向

熟悉的人好像全變了面孔，使她感到精神崩潰：

「……卓太太一見了我，立刻堆上了一臉笑容。『文老師，早！』『早！早！』我忙不迭地打招呼，一邊留神他們夫婦的臉色。卓先生似笑非笑地對我點點頭，……我腳踩著樹影，腦子裡卻忙著捕捉適才鄰居們的神情……不會把晶晶的事說出來吧？……」(註二十)

在充滿階級鬥爭社會下的恐懼及其所產生的悲劇可以從下列虞雪描寫的事例再看出來：

「廣東省番禺縣一個生產隊長向筆者談到四清運動，說：『那陣子沒有人曉得自己犯有甚麼事，又都以為這次鬥爭的對象一定少不了自己。十幾戶人家的一條村子，家家關門閉戶。從地裡幹活回來，兩個人遠遠見了繞道走，怕別人犯了事遭人家閃躲啊！巴掌大一個生產隊，甚麼反革命壞人不是一眼看到底，但誰也不敢這樣想。大伙都挖空心思坦白交待或揭發材料；要是有錯事自己不坦白待別人給揭發開來，可是罪加一等。後來終於鬥人了，副隊長捱不過，晚上從生產隊偷了把殺豬刀，跑到魚塘邊，向肚子捅進去了才往塘裡倒。……後來查明，副隊長啥事都沒犯，他只是怕，不如死了乾淨。』」(註二十一)

在當時，明哲保身還不足以自保，因為每個人的父母、親屬、朋友都可能被攻擊，這樣，自己也會成為被攻擊的對象，為了洗脫自己與這些親朋的關係，很多人在下意識裡便形成與家庭、親愛者、朋友敵對的心理：

「筆者認識的一個姓羅的女子……父母任職於中山醫學院。……自小受到很好照料愛護。長大入學讀書，慢慢學了一些『道理』……到得唸初中二年級，她又懂得向學校領導老師，揭發指責自己的父母所過的資產階級生活，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腐蝕青少年(她)。她得到學校鼓勵後，甚至把平時觀察的父母的言行，向學校領導報告，向父母工作單位寄去揭發信。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發生後，『血統論』特別盛行時期，人家不理會她如何一早就反叛了家庭，採用『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金科玉律，被

班上的紅五類打入牛欄，每天毆打折騰，她更加仇視家庭，寫了幾十頁認罪兼控告書，控告父親以前當過國民黨軍醫，犯下了十惡不赦之罪。她向監禁她的紅五類請求准許回家以監視父母，得到批准。羅姓女子於是回家吵鬧了一天，怒斥辱罵父母『何其毒也』，在家門口張貼大字報『勒令』父親二十四小時內交出認罪書，觀者如堵。老頭子原是起義軍醫，已經向組織交代清楚了的，想不到還要受女兒恥辱迫害，當天晚上跑到路軌上，一列火車迎面而來，把他碾為幾段。羅姓女子認為這是畏罪自殺，氣憤之下宣佈與家庭脫離關係，得到組織支持，給她辦正手續，從此成為所謂『孤兒』——社會的寵兒。」(註二十二)

六 自誣的贖罪心態

由於毛澤東反覆強調要中國人民在自己的「靈魂深處鬧革命」，以鬥私批修來清除自己的自私劣根性及資產階級思想。在宣傳機關的反覆強調之下，人民出現一個奇特的心態，就是自覺有「犯罪」的感覺，而在對毛澤東及共產黨有無限崇拜的情況下，為清洗自身的污點，不惜經常纖悔，作賤自己，以向組織交心，向上司暴露自己思想或行為的罪惡，並讓別人懲罰，以求良心的慰藉。

尹飛龍是一個向共產黨投誠的國民黨軍官，在文革時他說出自己感人的經歷：

「……『我知道共產主義時，已快三十歲了。』他回憶地說。『那時，我也不清楚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否一定能實現，實現了以後又是甚麼樣的情況。我十五歲時被拉去當兵，吃了多少苦頭。那時心裡只想到怎樣熬過去，向上爬……我從來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所以當有人向我談到共產主義是教人為別人活著，為中國老百姓做事，我開始感覺自己渺小，真骯髒，覺得自己一向都白活了。我記得，我曾經感動得手腳冒汗，握在手裡的馬鞭子變得水淋淋的……』

我向黨投誠後不久，被編在一個學習班裡，每天學習優待俘虜的政

策。幹部號召大家向黨坦白，交心。有人帶頭向黨交代，供出來的罪行真是嚇壞人，槍斃他都有餘，可是都被寬大處理，絲毫都不追究。我們這些官兵都感動得流淚了，人人爭著找幹部談心、交代，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挖出來，把自己說得越壞越光榮似的。我那時還遺憾自己的老子不是軍閥或特務頭子……」（註二十三）

《文革雜憶》的作者陳若曦也談到她和其丈夫世堯向黨交心的情況。

「……『我們應該把自己的身世、經歷、想法都寫出來，像新生嬰兒般無遮無隱，使國家對我們一目了然。』……

世堯可是嘔心瀝血地熬夜苦幹，整整寫了一萬多字，用稿紙抄寫得工工整整……我讀完他的自傳，發現他豈止無遮無隱，簡直透明成為一段真空管。

世堯採取批判從嚴的態度，把自己加碼批判了一通。他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小軍官。奉派參加看管張學良。本來我們以為這是上一代人的政治活動，與我們無關。如今回歸了，無關變有關，而且攸關我們的政治生命。世堯花上幾千字來表示堅決、徹底與家庭劃清界線。……

我在美國念研究院時，夏天去美國之音打工，替休假的職員譯新聞稿。這一段如實寫出，世堯又嫌我沒有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氣魄。

『自我批評要採取高姿態，』他說。『這件事，按照國內的政治標準，肯定要提到階級鬥爭的綱上看待，算是充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註二十四）

虞鷺在廣州有一位學生，因某日上學途中，看到路上有幾片落葉，心感一陣涼意，這原是人之常情，但是「他馬上驚覺到思想不對頭，他檢討著、工人階級會看見落葉而生悲嗎？他們眼中看到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欣欣向榮的春天景象、只有頹廢的知識分子才會產生落葉悲涼的感覺。他痛心異常，一直追究到自己的父母是教師，出身於小資產家庭……另一次，他母親領他上裁縫店量身做衣服，他對著全身鏡，無意中多看了鏡中的自己一眼。他馬上感到內心不安：愛照鏡子，注意自己

外表的漂亮，這分明是資產階級思想在作祟……禁不住羞愧難當」(註二十五)後來，這個青年終於瘋了，後來並感到罪孽深重，而上吊自殺。「他的日記簿上留下幾句話：我深深陷入資產階級思想的泥坑裡，我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註二十六)

另一個例子是虞雪的老師有一次因不留神竟踩了毛澤東像一下：

「她深感不安，她想到自己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雖然十幾年來誠心誠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這次踩踏了毛主席像，終於暴露了自己的階級本性。這樣的彌天大罪，她無法藏在心裡獨自承當。她向學校領導檢舉了自己的罪行，並要求嚴厲懲罰。結果，她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監督改造。她戴著反革命的帽子在鄉下過活，受著殘酷的折磨，她常常被打得遍體鱗傷，鄉民給她白眼，辱罵她。但是，她並不難過，她想：群眾對她越嚴厲，越能幫助她改造思想。她需要最凶狠的懲罰，否則，不能輕釋她內心罪孽的重壓。」(註二十七)

結 語

在個人崇拜期間直至四人幫倒台之前，苦難的中國人民普遍在以上的心態下生活，個性萎縮、喪失獨立性、不停的鬥爭及政治運動使每人都培養出兩面性格，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說話、殘酷的鬥爭使每個人都學會了攻擊別人，保護自己的本領。然而，在他們的心底，他們憎恨製造這造神運動、仇恨觀念、不斷鬥爭的中央文革派，人們只渴望較為無拘無束、平淡的生活。在這普遍心態下，人們將他們的希望寄托於維持秩序、強調恢復生產的周恩來及鄧小平等高幹，而為四人幫的倒台奠定了堅固的群眾及社會基礎。

註 釋

註 一 解放軍報編《雷風日記》第5-7頁

註 二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東亞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54頁

- 註 三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第一輯，香江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第144頁
- 註 四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272頁
- 註 五 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與我們的方針〉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1021-1034頁
- 註 六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620-622頁
- 註 七 光明日報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 註 八 虞雪〈中國人要從毛澤東的死胎掙出來〉
- 註 九 人民日報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 註 十 吳ဓ、虞雪〈中共社會的政治型人格：政治價值取向〉載《明報月刊》一九七七年三月
- 註十一 梁恆《革命之子》，遠東評論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284頁
- 註十二 同註十
- 註十三 同註十
- 註十四 余心言《群眾路線十講》第66頁
- 註十五 《大寨精神育新人》第19頁
- 註十六 《中國婦女》一九六六年第十一期 轉引自吳ဓ、虞雪〈中共社會「人格泛型」試析之二〉載《明報月刊》，一九七七年五月
- 註十七 《爭鳴月刊》八三年八月
- 註十八 同註十七
- 註十九 陳若曦《尹縣長》，文學出版社，第1-33頁
- 註二十 同註十九
- 註二十一 同註十
- 註二十二 同註十
- 註二十三 同註十九，第153-181頁
- 註二十四 陳若曦《文革雜憶》，洪範書店，一九七八年，第135-144頁
- 註二十五 同註八
- 註二十六 同註八
- 註二十七 同註八

第三十五章 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第一節 政治上的影響

一 共產黨權威受挑戰——黨的信任危機

由於缺乏適當的監督與制衡，再加上社會需要集中有限資源，加快經濟建設等因素，共產黨遂變為一個至高無上、控制社會上政、教、財各方面大權的執政組織。由於權力使人腐化，不少腐化了的幹部都成為群眾心中憤恨的對象。文革期間，群眾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造反，多次衝擊這個老大臃腫的統治機構，由於多年積壓的不滿像火山般爆發，很多「造反」群眾都是「見當權派就揪，見當權派就鬥」，把各地當權的省委書記及省長等高幹戴高帽子及遊街，經過文革的群眾大批判運動，消滅部分幹部的官老爺威風，客觀上起了某種程度監督幹部的作用。

文革前，對一般市民來說，黨是一個絕對不能侵犯的神聖組織，群眾對它只是一個馴服工具，黨委書記的談話句句都是真理，但在文革中，黨的種種黑暗面被公諸於世，使人對共產黨產生很大的改觀，了解到黨在某程度上已蛻變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經年的武鬥，幹部間派系的林立及爭權都使人對黨的權威性失卻信心。在文革前，「人民怕幹部」，在文革的大鳴大放群眾運動中，「幹部怕群眾」，而在文革後，可以說，「大家都不怕大家」，就這樣，黨的絕對權威被打破了，蘇聯史太林式的一黨全權控制模式開始受到市民的質疑，黨的信任危機促使市民反省，甚至敢於向權威作出挑戰。

二 領導階層不同派系的形成

在文革期間，可以看到有三股不同的政治勢力浮現，影響未來的十年的政治發展形勢。

第一股上升力量乃林彪的集團。文革初期林彪與毛澤東結成緊密的

聯盟，林大搞個人崇拜，提出「四個第一」、突出政治，指政治可以衝擊其他領域等頌揚毛澤東思想的口號。基於鬥爭策略的需要，林彪的行動得到毛的讚賞。此外，林彪有在文革過程中與他以往在紅一軍團及第四野戰軍的老部下如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將領結成緊密的山頭，再加上林在文革期間極力鼓勵鬥爭其他元帥，例如林曾多次咒罵朱德是「假司令」，「實際上一天司令也沒有當過」，而對一些異己的實力軍人如羅瑞卿、楊勇及廖漢生等，則予以直接整肅。在成功排擠及清洗其他黨政領導後，遂使林彪在黨中、軍中握有重要性的權力，在九大中，林更被指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另一批在文革冒起的人物是毛澤東的嫡系如江青、姚文元及張春橋等人，他們的實力比林系軍人弱得多，只包括上海的秀才班子，即中央文革的宣傳隊、學生的造反派組織以及北京及上海部分的工人造反派。江青一系在文革中橫衝直撞，不單把矛頭指向中央黨政元老，更在不同階段中煽動地方造反派鬥爭解放軍，結果引起各層黨政軍高幹激烈的反抗，使這集團不得不犧牲王力、關鋒及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大員以平息眾怒。然而，這一系則始終倚仗毛的支持及其控制的輿論力量而產生的影響力，而維持在政壇中一定之地位。

第三股力量，也是最扎實的一股勢力，就是軍人，幹部所形成的務實集團。周恩來在文革中扮演著一個極為微妙的角色，在歷史洪流及群眾的參與下，他不得不順應毛澤東的指示出面支持推行文革，然而在文革的進程中，他始終堅持保護幹部和盡量阻止武鬥的方針。他希望平息紛爭，維持生產，恢復社會秩序。在武漢兵變後，他更憑著以往在軍中的影響力，廣泛聯絡實力軍人及國務院系統的老幹部把文革盡快結束，故此，他遂成為造反派中的極左組織所針對的重點人物。在整個政治傾軋中，由於他始終掌握著國家行政的大權，成為社會穩定運作及發展不可缺少的人物，故遂漸形成強大的影響力。在另一方面，毛澤東為了維持政權的運作，以及防止手下某一系統勢力過份強大，必須有幾派力量互相牽制，故也十分樂意維持這一系的力量以作平衡，故此，周恩來遂成黨內一股最有實際影響力的力量。

三 軍人力量膨脹與血統論重新泛濫

由於地方黨政機構在造反派之奪權鬥爭中多呈癱瘓，代之而起的革命委員會中由於軍人握有槍桿子，故軍方遂成為地方新建立的政權組織中最穩固的力量，這情況在九大的黨組織中，也有明顯的反映，例如黨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九人當中，軍事幹部佔了一百二十四人，即是百分之四十四，而在九大的政治局中，其中有十三人是軍人，可以說，當時中國政府逐步變為一個軍人政權，形成某程度上「槍指揮黨」的局面。

軍人政權對當時的中國人民帶來消極性的影響。由於軍人一向的職責主要是維持社會內部治安及防止敵人的侵略，故十分強調紀律和服從，以應付突如其來的激變，假若軍人當權，由於不擅長實際行政事務及經濟工作，為了維持一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十分容易把軍事法則運用於社會生活中，再加上這個極權的軍事政權是在六八年大鎮壓中建立起來的，這就更增加了其極權性，使社會生活秩序更為窒息。文革後期由軍方極力支持推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如「清理階級隊伍」及「清洗五·一六兵團」，可以發覺在六六年下旬的「資反線」有重新復活的跡像，鬥爭的矛頭再一次指向出身不好的人，血統論重新猖獗起來，究竟為甚麼軍方領導人會接受血統論呢？據劉國凱的分析，原因有如下幾點：(註一)

- (1) 血統論強調軍人、幹部的血統高貴，故此，軍人遂成為血統論的最大得益者，處於社會的最高層，享有崇高的地位；
- (2) 推行血統論可以重新將社會分為兩個階層，他們互相的對立，可達至以民制民的目的，從而加強社會的穩定；
- (3) 血統論可以製造一班受批判的對象，讓他們成為眾矢之的，不斷的鬥爭在有聲有色之下進行，可使社會維持一緊張的氣氛，使不滿者忍氣吞聲，從而鞏固政權的統治。

第二節 經濟及社會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一 城市經濟發展受到嚴重衝擊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經濟及社會各方面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例如在六六年八月至十一月間，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及大中小學的師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造成交通運輸嚴重阻塞和國家財政支出巨大浪費。到六六年底鐵路運輸積壓的物資就有一千多萬噸，汽車運輸、水上運輸同樣受到阻塞，嚴重影響各地生產及建設的正常秩序，不少工礦企業和施工單位因物質供應中斷而無法生產，形成嚴重的浪費。此外，各大中城市紅五類紅衛兵的破四舊行動，動輒亂封亂砸商品和商店，衝擊外貿工作，衝擊銀行，並廣泛的抄家捕人。很多主管經濟業務的幹部及工程技術專家都受到批判，不能集中精力於生產建設工作，整個生產指揮系統開始失控，嚴重影響經濟的各方面。例如，中國工業集中的上海市，從文革開始以來，工傷事故特別多，設備維修日差，某些產品產量下降，形成嚴重的經濟危機。

再者，在文革期間很多過往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和規章制度被全盤否定，做成企業管理普遍紊亂，產品質量、成本無人敢予過問，否則會被扣上「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管、卡、壓」及「推行專家治廠」等帽子。這樣，就影響到經濟工作處於無計劃的狀態，本來中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是應於六六年開始付諸實施的，但由於造反奪權的衝擊，實際上根本無法執行，文革期間成為建國以來唯一沒有制訂國民經濟年度計劃的年份。經濟工作的無計劃狀態，必然導致生產建設嚴重混亂及產生極大浪費，這種情況特別影響了交通運輸及煤炭工業兩個部門。

文革期間社會上的動亂情況，導致生產下降，財政收入減少，市場供應緊張。六七年工農業總值為二千一百零四點五億元，比上年下降了近百分之十；六八年進一步下降為二千零一十五點三億元，在六七年下降的基礎上又降下了百分之四點二。然而，值得注意的，就是文革期間的動亂多是局限於城市進行，除了十分接近城市的郊區外，農村普遍並

未受到波連，有趣的是很多農民連甚麼是文革也不清楚，故此，農業總產值普遍未受衝擊，如六七年農業總產值為六百五十一億元，比上年還有輕微的增長，然而，六八年則為六百三十五億元，比上年下降為百分之二點五。財政收入方面，六七年比六六年減幅達百分之二十五，六八年又再減少百分之十三點九。生產下降，交通運輸不暢，市場供應就自然日漸緊張，例如六八年城鄉居民棉布定量供應指標，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九尺，比六七年減少四點六尺。

二 文教事業遭受摧殘

文革使文教事業變為重災區。從六六年開始，各校就陸續推行停課鬧革命，中小學校的癱瘓狀態延續了近兩年之久。很多高等學校兩派對立嚴重，武鬥頻繁，校舍、書籍及設備等皆受到很大的破壞。全國大學連續六年停止招生，研究生則更連續十二年不招生，與國外互派留學生也停止了六、七年。

更為影響深遠者，就是文革的教育主流政策較著重「政治覺悟」而看輕專業知識，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更提出「讀書無用論」、「知識愈多愈反動」的論調，嚴重影響一大批青少年。學生不學習、教師不教書，整整耽誤了一代人的成長。中國的教育事業原本就比較薄弱，六六年只有高等院校四百一十七所，經過文革後，反而再砍去四分一，只剩下三百零九所了。

與此同時，文化藝術事業也遭受嚴重的摧殘。從文革一開始，文化藝術就是運動針對的重點，在「十七年文藝黑線」的口號下，建國以來的文化藝術事業差不多完全被否定。文學戲劇、電影、音樂、舞蹈等等文藝形式，基本上銷聲匿跡，出現了百花凋零的局面，藝術人才的培養也幾乎中斷。圖書、雜誌、報紙的出版數急劇下降，六五年全國圖書出版共二萬零一百四十三種，雜誌出版共七百九十種，報紙出版三百四十三種；到六八年，圖書下降到三千六百九十四種，雜誌為二十二種，報紙降到四十二種。到處都是紅皮書、樣板戲、文藝創作主要是跟隨樣板戲

的方式，用正面的手法，樹立工農兵的形像，用明確的主題，強調階級鬥爭，突出正面人物，反映四九年後生活，以對比建國前的情況，以確保毛澤東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的路線。然而，這些樣版戲內容千篇一律，缺乏揭露現實社會的黑暗面，局限了文藝創作的範圍，使廣大市民的精神生活極為貧乏。

三 嚴重的青少年問題

文革期間，也產生極為嚴重的青少年問題，在全國奪權期間，連續三屆學校畢業生積壓在學校鬧革命，大量地轉化為城鎮的剩餘勞動力，終於在六八年爆發了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畢業生需要就業的嚴重問題。由於無法通過發展經濟以擴大就業來解決這燃眉的困難，於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成為解決就業問題的方法。然而，有很多下鄉的青少年不單無法協助農村增加生產，反而給部分地區的農民在經濟上帶來損失，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區，由於安置人數過多，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形成了與農民爭土地，爭口糧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多數知識青年在農村皆面對口糧、住房及醫療等方面的不足，要靠家庭補貼。由於生活過份困苦，有一部分回流到城市，由於缺乏正常的工作，再加上他們對社會普遍的不滿，令社會的安寧受到影響，而形成一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三節 新思想的啟蒙及文革後的中共官方的改革

在文革的過程中，很多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權利喪失殆盡，人的尊嚴遭受粗暴的踐踏，他們經歷互相武鬥及大屠殺行動，看到了人與人的關係，因猜忌、告密、揭發、提防而極度惡化。他們反省著每天向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的種種宗教式活動，實是在竭力繁殖人民的自悲感和罪惡感。他們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造反，但發覺毛不單沒有誠意推行民主改革的承諾，反而在運動後期容許鎮壓學生的行動。此外，青年更難忘的是下放運動，青年第一次面對宣傳以外的中國農村真實狀況，他們才了解社會主義並非是幻想中的天堂，官僚特權、貪污枉法、持勢凌人

在法制遭踐踏的情況下幾乎是極為普遍的現像。知識青年們開始較為冷靜的分析眼前的一切，思考著中共政權的本質，中國往何處去的呼聲加速了年青人的反省，他們開始明白到中國需要改革的不單是清洗個別不稱職、脫離群眾的個別官員，而應把著眼點放於整個社會制度。

此外，文革期間基於打擊政敵的需要，毛澤東允許了中國人民第一次掌握民主權利的機會。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自發地運用憲法賦與的權利，享受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將心中長期抑壓的憤恨向那些黨政幹部發洩，這個經驗是他們永世難忘的。故此，在文革以後，很多年青人都真正成熟了，他們不再盲從，開始要求實現憲法賦與的權利，並提出很多積極的改革意見，這股潮流終於匯合而成為在打倒四人幫後在北京開展的民主運動。

中國在四人幫下台後，官方開展了一連串甚得市民支持的改革，可以說，這些改革都是從文革的反省中間接引發出來的。文革使中國社會既存在的矛盾深化，赤裸裸的呈現在市民面前，經歷過文革期間的衝擊，掌握過民主的「禁果」的一代，開始反省起來，向中央政府提出改革的呼聲。而中國高層官員方面，由於在文革期間他們也曾遭受過毛澤東一言堂及種種無法無天批鬥的苦果，而在某一段期間他們更實際接觸群眾，了解他們生活的困難，這一切皆促使他們重新思索施政的方針，為了防止災難重演，他們在重新掌權後提出很多改革如健全法制、較廣泛的開放言路、發展經濟及提倡政治改革等。總結來說，沒有經歷過文革的衝擊，中國並不會走七八年後大刀闊斧改革的道路，在評價文革時這一點是不能忽略的。

註 輯

註 一 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

第三十六章 總結——對文革的簡短評論

要評價文革，可以說是一件艱巨的工作，因為文革的發展歷程是由很多社會上錯綜複雜的矛盾交叉而成，往往脫離了統治者預期的軌道，然而，假若我們能掌握文革的歷史事實，了解文革爆發的原因，對人民心態及社會各方面所帶來的影響，還是可以給它作出一點初步的總結及評價的。

一 對建國後兩條路線鬥爭的看法

在中共建國以前，於一九四五年召開的全黨七大會議中，已明確制訂新民主主義路線，容許私有制及其他各種成份的經濟在一段頗長的時間保留著，但是中共對蔣介石鬥爭的迅速勝利，以及一九五三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順利和迅速的改造，皆使極端重視個人理想的毛澤東鼓舞起來，他堅信意志的力量，認為人的力量不單可以推進革命，更能加快社會發展進程，對經濟規律發號施令，他覺得窮苦的農民正由於窮苦所以蘊藏著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故此，他強調以思想道德鼓勵的方法，刺激人民無條件的忘我勞動，使中國盡快踏上共產主義的道路。

然而，隨著三面紅旗的失敗，全國的大饑荒，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接受現實，而將黨政的實權交予劉少奇等收拾殘局。在文革期間，劉鄧的經濟及社會政策成為他們被批判的罪狀。當然，在批判者眼中看來，劉鄧的政策都是鐵案如山的罪狀，可是假如我們將這些罪證和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聯繫起來，就會發現，很多劉鄧提倡的經濟政策都是為了挽救經濟困境的權宜措施，很多政策都是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導人共同接受的意見，就算是毛劉分歧的重點，亦只是雙方對經濟發展的速度及執行方針的不同看法。

可以說，劉少奇是一個較為穩健型的社會主義者，例如，他認為農業合作化的速度一定不能推得太快，一定要等待工業現代化和城市能創造出較多就業機會以吸納農村剩餘人手後才能得到農民擁戴，水到渠

成。他們也不歡喜毛打鐵趁熱，不斷革命的思想所形成的幹部命令主義作風。

當然，也不能否定劉鄧所支持的有利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有相當一部分都是以擴大貧富差距及階級分化為代價的，明顯例子就是工業上的物質刺激以及農業上的包產到戶責任制，以及自留地和自由市場的恢復和擴大等，對毛澤東這位極端理想的平均主義者來說，這些當然是罪無可恕的罪狀。但假若我們能將眼界擴闊，分析一下兩種經濟政策的效果和他們得到人民歡迎的程度，則可以發覺不實際的理想主義往往是違反人性。不錯，在革命或建國初期要求市民暫時犧牲，勒緊肚皮是人民願意為建立強大中國所付出的代價，然而，在平靜的社會下，仍要求市民長時期生活在清教徒式的統治下，則是完全違反市民的需要。按勞分配、物質刺激、重視效率、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將無可避免地擴大貧富差距，但這將為中國帶來發展經濟的美好成果。況且，假若政府能採取有效方式使差距不致過份懸殊，則無可否認在一個較大的餅(經濟成果)下，較為貧窮的人之實際收入也會比在極端平均主義下的收入高得多，不用捱餓。再者，人民不需要再在虛假的心態下生存，不用再光喊口號、不斷鬥爭批修及互相攻擊，對人民的心理狀態也是有益無害的，這才是真正社會主義。

故此，歷史的經驗已明確證明，劉鄧一派的穩健經濟路線才真正符合中國社會的需要，而毛的理想平均主義則只是在某歷史緊迫時刻下才可實行的特殊政策。正如中共於八一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註一)

二 毛澤東是否希望打倒官僚制度？

毛認為新階級及官僚特權作風的出現乃與不正確的經濟路線有關，

過份強調專業知識、分工精細的科層制度、物質刺激及高工資等政策皆是促進官僚主義的重要原因。五六年時他曾指出「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握在他們手裡、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級。」然而，民主運動人士王希哲曾針對性的指出，毛以上批判官僚特權作風的思想其實一點也不出奇，因為任何最高統治者都希望自己的屬下能愛護人民，與人民緊密聯繫，了解他們的需要，「如果最高統治者去肆無忌憚地欺壓群眾的話，那麼就意味著它的整個統治已經面臨著崩潰的危機了。」（註二）

毛批評產生特權階級及官僚主義的理論來自他的「委身」「無我」建設社會主義之理想，然而，他卻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就是共產黨在四九年變為執政黨後，將所有行政、立法、司法等大權全都放在其領導下，由於缺乏民主的傳統與實踐、健全的法制未能建立，故使很大部分黨員成為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的特權分子。故此，官僚主義或特權階級的產生並非單由於物質刺激或高薪制的「資本主義路線」，而是在於毫無制衡的一黨專政制度，故要徹底根治官僚主義者，第一步應該做的便是培養市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而不是去批判所謂的「修正主義路線」。

文革以前的社會是一個按照史太林體制建立起來的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社會，黨領導一切，官僚化成為無可避免的毛病，但毛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卻並不是希望批判官僚主義，建立民主（因為毛從不能忍受任何對其理想或意見持質疑的人），而只是由於毛的建設社會主義思想不能在黨內取得主導地位，而他亦無辦法從合法程序罷免其政敵，故便以打倒官僚為藉口，號召群眾造反，採內外夾攻的方法，迫使劉鄧一派領導人落台，砸爛舊的黨機器而重新改組，恢復他的控制權力，以便在新的黨中牢固地樹立他的革命路線。

在這歷史背景下，文革期間可以看到毛劉雙方的鬥爭以一種完全相反的方式表達出來，毛澤東這個強調封建式個人崇拜、家長制及要求人民無私工作的領袖表現成為反官僚的民主象徵，而劉少奇這個共產黨內的開

明、溫和、穩健改革派卻要利用官僚化的黨政機構來鎮壓經毛發動的群眾。劉少奇在派出工作組、鎮壓造反派後遂成為一個扼殺群眾運動的象徵，而引起造反派對其更大的怨恨，而這亦成了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造反派衝擊黨政官員的方法根本不能為中國帶來民主制度

要建立起一個民主制度，除了公民主動的爭取外，還需要多方面因素的配合，如教育普及、經濟發展、傳媒發達等才可完成。在文革大奪權的風氣下，造反派群眾的主要目的在於響應毛的號召，鬥爭當權派，重建毛的革命路線，他們心目中只有破，而沒有立。雖然上海於六七年的一月奪權及文革後期的省無聯極左思潮中曾孕育著建立民主制度的理想，然而當時絕大部分中國人民卻被瘋狂的個人崇拜及鬥爭風氣控制著，個性被壓抑至極端萎縮，幾乎完全缺乏個性思考，而另一方面，精神卻又處於極度輕奮的瘋狂狀態，在這情況下，根本無從推行強調理性思索、獨立判別是非的民主制度。八一年中共的歷史《決議》正確的指出：

「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推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註三)

四 吸取文革的教訓，避免災難再次發生

官方曾多次強調文革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而應徹底否定，然而，更為重要的就是從文革的過程中總結教訓，從而避免災難再次發生。

首先、不能將文革的責任簡單的完全推在林彪、四人幫的身上，因為這樣將不能正確總結文革的本質。林、四等普遍打擊黨政各級領導幹部固然全無可取，但從文革的過程中得知，很多武鬥及屠殺事件未必一

定完全與他們有直接的關係出現殘酷鬥爭的主因，乃是社會上兩個不同階層對立、兩派鬥爭策略、人民攻擊型心理、過激階級鬥爭思想，以及各方面爭奪具體政治利益等種種因素互相交叉影響而促成的悲劇。假若將文革所有災難全推給四人幫，則十分容易陷入一種錯誤，就是認為只要打倒四人幫則甚麼問題就可以解決。然而，據一九七八年來的經驗，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而直接，中國各方面出現問題實際上有著深厚社會基礎，四人幫的出現不過是把這些潛在的危機引發出來，推翻四人幫只能協助解決問題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針對整體中國問題再作全面的分析，以尋找問題的根源。

此外，文革之所以能發動，並得到城市中的市民廣泛的參與，並不能全歸咎為毛澤東、林彪及四人幫等意志的產物。個人崇拜、左傾理想主義固然是能夠煽動群眾的眾多原因之一，但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造反的號召符合了市民長期抑壓著的反官僚壓迫之願望，從文革造反、保守兩派之爭明顯地可以看見兩派的對立並非偶然，而是既得利益者與被壓迫階級(黑五類)間長期潛在著的衝突之具體表現。另外，極左思潮要求推翻官僚壓迫，建立民主的思想實是解決雙方對立的一個有效方法(當然，這應該從建立法制及循步漸進，配合經濟發展逐步而達成，絕不能是一哄而上，這樣反會導致混亂，對民主有百害而無一利)，可以說是人民反省的結果，其理論十分值得深思而不能簡單的抹殺。若現時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國官方能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政策、改革經濟及政治制度、發展經濟、推行法治、打擊貪污、繼續擴大人大及政協之權力、逐步推行政制民主並准許市民對社會事務發表意見，則一定能疏導民情，避免文革的災難再次發生，並真正的為中國建立一個更合理的社會，落實社會主義追求改善人民生活及均富等理想。

註 釋

- 註 一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註 二 王希哲《王希哲論文集》七十年代雜誌社 一九八一年，第107頁
- 註 三 同註一

第六篇

極左與穩健的爭持

(1970-1976)

第三十七章 林彪事件——文革派的分裂

第三十八章 極左派與穩健派的較量到四人幫跨台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

第三十七章 林彪事件——文革派的分裂

導 言——毛林之爭不能看為黨權與軍權之爭

在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多，另一場撲朔迷離的上層權力鬥爭又在中共政壇上出現，作為毛澤東「親密戰友」及黨章規定的「接班人」林彪，竟然被指稱刺殺毛澤東失敗而被迫出走，林彪在逃往蘇聯的途中飛機失事、機毀人亡。

據中共審判林彪及四人幫的資料顯示，林彪由於個人野心過大，希望提前接班而被毛澤東識破，遂走上武裝叛變之路。這裡值得分析的是為何「偉大領袖」與「親密戰友」間會突然出現分歧，而林彪竟然要出此下策暗殺毛澤東而走上滅亡的道路？某些研究中共歷史的專家認為文革後中共領導集團存在著槍與黨之爭，中共第九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的黨代表多為軍人，而在全國廿九個省市之革命委員會中軍事幹部亦佔最大的勢力，故此，「槍杆子裡出政權」，由軍人主導政治抑或是「黨指揮槍」遂成為軍事幹部與中共領導人之爭。這些專家認為林彪這位在解放戰爭時期功績輝煌的元帥是代表槍，而毛澤東則代表黨，故此毛林之爭實際上是代表黨與代表槍之爭。然而，此分析實流於表面，因為毛澤東是中共軍委會主席，他的個人威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的成功軍事戰略而獲得，故毛澤東才是中共至高無上的軍事首腦。文革期間是毛林的蜜月時期，以毛澤東的崇高威望，都沒有辦法使地方實力軍人聽命，支持受他大力支持的造反派群眾組織，何況林彪在軍中的威望遠不及毛澤東，他只能代表軍事幹部中一個較有實力的山頭，根本沒有辦法使其他各系軍人支持他作為槍的代表。林彪是以擁毛而躍上接班人高位，軍人尚且不隨他盲目崇毛，又怎會盲目支持他呢？還有，在林彪事件後，除了林彪一系的軍事首腦遭整肅外，其他各系的軍事將領仍盤據一方，而毛澤東亦需花很大努力才能調動他們。在七四年中期，毛所控制的宣傳機器仍不斷發出「揚秦」——即讚揚秦代政制的號召，鼓勵中央集權制，暗示中

央希望打擊現實政治上的軍事割據。

第一節 林彪攀上權力高峰與文革後中共的三大力量

一 林彪集團權力上升的原因

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得益者之一，在文革前後，他憑藉下列幾種方法，登上毛澤東接班人的高位：

(1) 大搞個人崇拜，爭取毛的信任

毛澤東基於打倒政敵的需要，對林彪在文革前後大搞個人崇拜極之讚賞。文革期間，毛澤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而林把自己扮演成最堅決擁護、最忠於毛的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一貫緊跟」的「親密戰友」、「最好學生」，這樣有助其攀上高位，並能達至扮演毛澤東的代言者之身份，從而達到鎮壓敵對派系的目的。

毛林在文革期間的關係雖然異常密切，但在某些時候毛澤東對林彪過份吹捧自己，及借他的威望排斥異已的做法也曾表示不滿。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正值文革的高潮，毛澤東給其妻江青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治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相信，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也不行了。……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關於朋友們這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甚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是吹得神乎其神。……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註一)

在鼓吹崇毛後，林彪的親信更提出「三大助手」論，宣揚林彪是最

好，最光輝的助手，吳法憲甚至說：「沒有林副主席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沒有毛主席」，「沒有林副主席……就沒有我們軍隊，就沒有我們國家。」

（2）拉山頭，培植親信，形成宗派

長期以來，林彪在軍內甚有力量。他主持軍委工作時，在幹部的使用和配備上，都有明顯的宗派主義傾向，例如在六五年五月七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逝世，林便策劃當時的空軍政委吳法憲出任司令員，他曾召見吳，並向他指出：「空軍司令這個職務很重要，誰都想當，我考慮由你改任空軍司令員。」接著，林又說：「不要傳出去，還沒有報告毛主席批准。賀龍知道了，他會提別人任空軍司令。這個職務是塊肥肉，誰都想要。我要爭取報告毛主席。」吳法憲立即表示：「我一定不辜負林副主席的期望」，「我這個空軍司令是掛名的」、「真正的空軍司令是林副主席。」（註二）

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吳法憲更遵從林彪的命令，將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提升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部長，並聲稱：「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調動、指揮。」（註三）此外，文革初期，在整肅海軍主要領導幹部時，林的妻子葉群曾對李作鵬說：「那人是反『雙一』的。」李問何謂「雙一」，葉群說就是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後來的歷史也證明，林彪派系的主要將領、號稱「四大天王」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都是林彪在紅一軍團、第四野戰軍的老部下。（註四）然而，並不是所有追隨過林彪的人都成為其派系一分子，例如陶鑄、蕭華兩人追隨林彪最久、楊成武及羅瑞興也出身第一軍區，但在文革中都被清算了一次。

（3）利用文革的奪權行動來打擊異己，盡量剷除其他軍事派系或政敵的力量

例如林彪曾多次咒罵朱德是「假司令」、「實際上一天司令也沒有當過」。六六年八月末，林彪更批判賀龍插手空軍、陰謀奪權，大罵賀龍是

「土匪」、「大陰謀家」。六九年賀龍更被迫害至死，並株連了原二方面軍、一二零師、第二野戰軍和國家體委的許多幹部。

此外，在一九六八年林彪批判的「楊余傅」事件中，林彪借批這幾個軍官，將矛頭指向葉劍英、徐向前及聶榮臻等幾位元帥。由於楊成武長期在華北工作，曾是聶榮臻部下，楊被指責為搞「晉察冀」山頭主義、華北山頭主義，實際上是把聶榮臻等批判為楊成武的後台。（註五）

二 文革後中共高層內的派系鬥爭

六九年的中共全國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可以說是林彪集團發展的頂點，會中，林彪當了黨的唯一副主席，成為黨章規定的法定接班人，其集團的主要骨幹亦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而可能與林彪抗衡的高幹幾乎全受衝擊，十大元帥中只有林彪仍能管事、掌握各方面的實權。然而，正是在林彪權力膨脹的時刻，他和毛澤東之間也因權力分配問題而出現矛盾。

文革後期中共高層基本出現三股互相牽制的政治力量。

(1) 掌握軍政實權之穩健派

這一股力量以周恩來為象徵人物，代表絕大部分實力軍人及國務院系統的幹部。此股勢力一般被稱為穩健派，基本上是建國以來中共正統管治系統的延續，掌握著軍隊及國務院行政之大權，他們的政策取向特點為傾向穩定、贊成緩進改革，實事求是，強調知識，重視發展經濟。他們對文革時的群眾運動所釀成的社會動亂及掀鬥幹部的行為十分反感，故贊成鎮壓造反派紅衛兵，並對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持敵對態度。然而，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由於在革命戰爭時期受毛澤東領導，對毛澤東的才華十分佩服，並認同其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遠景目標，故毛澤東在世時，他們都基本上服從毛澤東的決定。

(2) 堅持階級鬥爭理論的極左派

第二股勢力以江青為代表性人物，此股勢力把持中央文革小組，是

毛澤東的嫡系力量，他們秉承毛澤東的旨意，提出極左的建設社會主義思想，在行動上支持造反派紅衛兵，衝擊各級幹部，與穩健派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值得留意的是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共九大召開後，便被取消，江青系統的人，除任政治局成員外，在軍隊及國務院中沒擔任職務，權力基本被架空。

（3）以林彪為代表人物的軍事派系

作為毛澤東的支持者，林彪在文革期間以其軍中實力，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多次派出中央支左部隊介入地方的派系鬥爭，支持造反派，配合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之奪權行動，故林彪一系軍人與穩健派軍幹發生極大矛盾，而林彪亦藉鬥爭穩健派排斥軍中異己，擴大其軍事集團勢力，在這角度上他們與中央文革保持良好關係。

然而，在另一方面，作為軍事首腦，他們也受中央文革所支持的造反派衝擊，故與中央文革亦產生鬥爭。例如中央文革小組駐外地記者曾發信予江青，指出中南的幾個省之造反派受壓，保守派正在得勢，將矛頭指向林彪的支持者、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註六）江青與林彪系統的矛盾在第九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中更趨惡化，當時林彪集團佈置少投江青系統等人的票。（註七）

從毛澤東的角度來說，他十分希望文革後江青、林彪及周恩來等派系能互相牽制，因為權力均衡永遠是統治者為防止某一派系挑戰自己權威的最有效方法。基於此，雖然毛澤東對周恩來為代表的穩健派幹部有多方面的不滿，但由於周恩來握有國務院管治國家各個方面之盤根錯節的實力，毛仍強調周恩來「這棵大樹不能倒」，從而達至平衡其他派系的目的。同時，毛澤東亦開始對林彪權力過大的情況作出了防備。

較為明顯的例子是當林彪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口號時，毛澤東感到十分不滿，並在七年八月巡視外地時對各地方的軍政幹部批評林彪說：「甚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止

我一個。」^(註八)此外，毛也不滿意林彪利用副統帥的名義發佈強調全軍進行備戰的「第一號命令」。

第二節 環繞設立國家主席的鬥爭

一 為何林彪希望擔任國家主席

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為何還要爭奪國家主席的職務呢？首先，從林彪的立場來看，在中國黨、政、軍架構中，他始終是毛澤東的副手，根本無獨當一面的權力，所有決策必須得毛澤東的首肯方能落實，這就使林彪的心理極不平衡，林彪的夫人葉群曾指出：「林彪不就是個副主席，副總理、國防部長麼！這麼多年來就是這麼多工作」^(註九)「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怎麼辦，往哪裡擺？」^(註十)此外，林彪身體不好，既害怕不能等待自然接班，又恐怕毛澤東會改變指定其為接班人之地位，改為支持張春橋代替林彪。

當時，毛澤東通過個人崇拜握有無上權力，而國務院又是周恩來的天下，既然林彪無法動搖毛澤東的權力，就只好在「政府」方面向周恩來奪權。據中國當時的憲法，國家主席的權力很大，能直接干預國務院的工作，現在既然劉少奇已倒，那麼就名正言順地需要有人繼任國家主席之職位，林彪自己當然認為能夠勝任。在這背景下，可以明白為何毛始終反對設立國家主席的席位，因為假若毛真的讓林彪出任，則將會造成周系力量下降，林彪集團坐大，出現不易駕馭之局面。

在林彪事件中，可以發覺周恩來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直接引致林彪的敗亡，因為假若林彪爭當國家主席的策略獲得成功，最大的受害人將是周系幹部。七一年三月，在林立果與其親信「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之談話中，可以反映林彪集團之心態：「現在首長（指林彪）接班有三種可能：一是和平過渡的接班，等五、六年還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變化很大，很難說首長的地位還一定能保住；二是被人搶班，首長被趕下台；三是提前接班，辦法是搞掉B—52（即毛澤

東），實行武裝起義。」

二 一九七零年廬山會議的鬥爭

按照中共慣例，在黨代表大會後，通常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落實黨的決議，改組政府，故於一九七零年中共第九次全國黨大會之後，毛提出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不設國家主席。然而，對林彪來說，他希望藉人大選舉自己為國家主席，以便提高地位，改變其需依附毛澤東的情況，同時能合法地插手周恩來負責的國務院。據五四年通過的憲法規定，國家主席的主要職權為：

- (1) 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 (2) 可召開並主持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國家大事務；
- (3) 根據人大的決定，公佈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及各部部長。

林彪當然清楚毛澤東不想設立國家主席的用意（見前述），為回擊毛的策略，林彪多次堅持要設國家主席，並提議由毛澤東兼任，他曾指出：「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合適，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但毛批示曰：「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七零年四月下旬，毛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及不設國家主席，「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作孫權。」^(註十一)五月中旬，林彪對吳法憲說，「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七月，葉群終於與吳法憲說出林彪的真正心聲：「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同月中旬，毛第四次強調不設國家主席，指出設國家主席只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八月廿三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陳伯達再一次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批評道，「誰要當國家主席，誰就加上。」^(註十二)全會第一天，林彪發表講話，以歌頌毛澤東為號召，大講天才問題，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林彪在講話中提出：「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

表現出這樣的一種情況的特點，一個是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更指出，這「是三十條中間」「最重要的一條」、「最根本的經驗」。(註十三)林彪這裡說到「國家元首」是意有所指的，因為中共一向對毛澤東的稱呼並無提及國家元首。八月廿四日，在林彪的指揮下，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及邱會作等按照統一的口吻，同時在幾個小組會議上發表談話，陳伯達急不及待首先發言說：「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經過很多鬥爭的。」(註十四)他更草擬了國家主席的憲法條文。跟著，會議上散發了華北組會議的第二號簡報，刊出了陳伯達吹捧林彪、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發言。

毛澤東明白假如他不加干預，林彪設國家主席的策略便會成功。八月廿五日下午，毛澤東召開有各組組長出席的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並嚴令不要揪人。毛還指出：「國家主席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當國家主席，就是要我早點死，你們再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註十五)毛更責令陳伯達檢討。後來毛批評陳伯達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註十六)

七一年中旬，毛澤東曾就這次會議發出嚴厲的批評：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甚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才是對他們一句頂一萬句。」(註十七)

「一九七零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甚麼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裡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

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我看他們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註十八）

七零年八月下旬，毛澤東寫了「給全黨的一封公開信」，批評陳伯達，但這篇談話說得很婉轉，沒有正面批評林彪，還故意把林彪拉在他的一邊，「陳伯達是一個假馬克斯、列寧主義者。長期以來，陳伯達一直就天才問題和我辯論，說天才是天生的，不是來自實踐，不是從群眾中產生，要我承認他是天才，他這樣做無非想當國家主席……現在我提議：必須把陳伯達問題提出來傳達，在全黨展開批判。這封信，已經給林彪同志看了，林彪同志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見。」（註十九）毛澤東在另一份文件「我的一點意見」中指出：

「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第三節 毛澤東對林彪集團的鬥爭策略

在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對林彪加強了警惕，並採取了一連串行動打擊林彪一系力量：

一 公佈陳伯達罪行，開展批陳整風運動，並批評林彪集團分子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中央發出高級幹部要學習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只有讀一些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識別真假馬列主

義。十二月，毛澤東在中共三十八軍委員會〈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上批示，要求北京軍區討論「為何任陳伯達亂跑亂說」，「是何原因使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的太上皇。」(註二十)在同一個月，毛澤東更直接向美國記者斯諾指出林彪所提出的「四個偉大」是形式主義，討嫌。(註二十一)

七零年十二月，中共召開華北會議，進一步批判陳伯達，會上周恩來宣佈改組北京軍區，任命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而據李德生回憶，在這期間，林彪「只是表面上叫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檢討錯誤，而他自己卻不表態認錯，也不願出席會議」(註二十二)在同一時間，毛澤東十分嚴厲的批評黃、吳、李、邱：「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您們自己了！」而對林彪的態度，毛澤東滿臉不高興，但當時因為有黃、吳、李、邱在場，他沒有說甚麼。(註二十三)

七一年一月開始，黨中央陸續發出文件，揭露陳伯達從歷史到現實的種種問題。此外，毛澤東更兩次批評林彪夫人葉群「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並於吳法憲的書面檢討上批評吳法憲等人，「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甚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註二十四)

二 加強江青一派（毛澤東嫡系）的力量

黨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在中央政治局領下，設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並管轄工、青、婦中央一級機構和它們的五七幹校。這個組的組長為康生，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及李德生等。組員中沒有林彪集團的成員，十分明顯，成立這個組織是毛加強其嫡系力量、平衡林彪權力上升的一個重要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此小組為江青集團提供了一塊公開合法的活動陣地，改變了九大以來他們基本上無實際管事權的狀況。

三 甩石頭、滲沙子、挖牆角

毛澤東曾指出，「廬山會議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滲沙子、一個是挖牆角」。

「甩石頭」的意思是由毛先批發若干文件，動搖與林彪、黃永勝一系有關單位幹部的思想。毛指出：批了陳伯達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撥發了三十八軍的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麼長的座談會，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讓大家討論。（大略）（註二十五）

「滲沙子」就是從中央和各大軍區調人參加由林彪系統控制的軍委辦事組，如把青海軍區司令劉賢權，高級將領蕭勁光、粟裕及王樹聲，逐一滲入由林彪一系壟斷的中央軍委辦事組。

「挖牆角」就是改組北京軍區和京衛戍區，撤去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的職務，由李德生接替，並撤除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李雪峰職務，由謝富治接替。此外，更將南京軍區的軍隊，調入北京近畿，以防止林黃一系軍人搞武裝政變。

四 南巡爭取地方軍幹支持

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澤東到南方各地巡視，在武漢、長沙和南昌，分別同湖北、湖南、河南、廣東、廣西、江西、江蘇、福建等地黨政負責人進行多次談話。從毛澤東的習慣看來，凡有重大決策而遭遇阻力時大多會「雲游四方」，個別游說並爭取各地實力幹部支持，推行大躍進前如此，大躍進失敗後到各地糾左如此，發動文革前到華東巡視，以及在文革於六七年遭實力軍人反抗時亦於七、八月期間到各地巡察，最後並發出最高戰略部署之號召，結束文革。

七一年這次南巡，毛澤東著重談了七零年八月廬山會議上的鬥爭，指名批評了林彪、陳伯達及黃永勝等人在廬山搞「突然襲擊」，毛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

「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急於奪權。」「甚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們自己。」毛澤東還說，「雖然在北京開了工作會議，幾個大將作了檢討，但吞吞吐吐」，「林彪不開口，這些人是不會開口的」，「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註二十六)

第四節 林彪、黃永勝集團分析

在九屆二中全會爭奪國家主席的計劃失敗後，林彪、黃永勝集團驚惶失措。一九七一年四月，周恩來更明確指出：「黃、吳、葉、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註二十七)毛澤東及周恩來等一連串批評使他們心中沒底，不知此事是否就此了結。林立果曾作出生動的描述：「軍委辦事處這幫老總也是膿包蛋。黃永勝做夢都哭著喊林副主席救命！李作鵬夜裡在地上打滾。吳法憲這個草包司令，要跳樓自殺，被他老婆拉住了。邱會作表面上鎮靜，心裡也在打鼓。所以林副主席對我講：『你不要上吳法憲的破船，也不要上葉群的破船，要自己幹』……」(註二十八)他們這樣害怕，主要有如下兩點原因：

第一是他們開罪了毛澤東，從林彪集團後來製定的「五七一」(武起義)紀要中，可以看到他們對毛澤東的看法：

「……從十幾年的歷史看，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到後來不會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

罪羔羊。」（註二十九）

第二是林、黃一系的力量已在中央領導層中處於孤立的地位。在文革進行期間，林彪因為支持毛澤東奪權，經常派出中央支左部隊援助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為其他實力軍人所不齒，再加上他打擊異己，更成為各系軍人的眾矢之的。

黃永勝的情況與林彪有點不同，在文革期間黃永勝以軍事實力派身份坐鎮廣州，多次抗拒毛澤東指令，鎮壓造反派，與江青把握的中央文革有極大的矛盾。黃當時之所以能有恃無恐，主要是因為各大軍區首腦人同此心，抗拒文革，聯成一線，連毛澤東也不能奈他們何。然而，當他入主中央成為總參謀長後，形勢卻又有所不同，他被敵對派系批評為搞山頭主義，例如由心腹原廣州軍區參謀長閻仲川緊握參謀部，並在地方軍區上擴展地盤，引起其他派系軍人嚴重的不滿。

此外，黃永勝更公然混淆中共一向強調的黨指揮槍的關係：「我們軍的頭，同時就是黨的頭。因此，黨頭的我，指揮軍頭的我。這是最適當的黨指揮槍。」黃永勝這些觀點，再加上文革期間他鎮壓造反派紅衛兵的表現，無疑更引起毛澤東的憎恨，促成打倒黃永勝的決心。

七一年八月毛南巡時，對林彪作了嚴厲的批評，但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毛澤東始終強調要保林彪，「廬山這次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註三十）就算在九月十一日林彪謀殺毛的計劃失敗後也是如此，「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列車停在豐台站，毛澤東借停車機會把北京部隊和北京市負責人找來，在車上談了兩個多小時的話。他談到了林彪……但是，並沒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敵對的席位上。江青後來說過：『豐台會議，毛保他（林彪），仁至義盡』。」（註三十一）

然而對於黃永勝，毛認為情況嚴重，他說：

「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搞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抓軍隊工作，無非就是路線學習，糾正不正之風，不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講團結。」(註三十二)

此外，毛澤東更借批評由黃永勝把持的廣州軍區，而針對軍人干政的不正常局面：

「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還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搞顛倒了嗎？」(註三十三)

毛澤東更針對文革期間解放軍至高無上的地位，指出：「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不完全，還要加上解放軍學全國人民。」(註三十四)

從後來中共公佈的謀殺毛澤東計劃的資料顯示，整個暗殺行動過程全由林彪指使，由其子林立果及其嫡系親信周宇馳、江騰蛟、李偉信及王維國等策劃、而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及李作鵬等根本沒有參與其事。在八零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中，上述「四大金剛」被控的主要罪名是在文革期間迫害其他黨政領導人，製造地方冤案、七零年廬山會議支持林彪當國家主席、七一年八月黃永勝將打聽到的毛澤東南巡時批評林彪的談話向葉群匯報、以及李作鵬有意放走林彪的飛機等（注意：毛澤東也同意放走林彪！），根本沒有提及他們參與刺殺毛的行動。

林、黃集團的性質，可總結為：在六八、六九年文革後期，黃永勝入主中央，大搞山頭主義而遭其他軍人排斥時，便進一步向林彪靠攏，林彪亦樂意多團結力量，壯大其權力基礎以增強提前接班的實力。在爭取設國家主席事件失敗後，林便以其兒子及最嫡系的力量孤注一擲，而黃永勝等則只是扮演後勤、協助的角色。殺害毛事件失敗後，林彪墮機死於異域，而毛亦藉林黃曾合作之理由借勢解決黃永勝的山頭，將其逮捕，並以比為發端，開始扭轉文革後期軍人權力過大，亦即槍指揮黨之局面。

第五節 刺殺毛澤東的計劃與林彪滅亡過程

一 林彪集團對毛澤東南巡行動的反擊

當批陳整風運動進入深入階段時，林彪集團十分驚慌，而他亦擬定了幾個反擊策略：

(1) 製定「武裝起義」計劃

七一年二月中旬，林彪派林立果到上海，與其嫡系(即秘密組織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研究政變計劃。三月廿二日，林立果等用「武裝起義」的諱音把計劃定為〈五七一工程紀要〉，紀要首先分析了形勢，認為林彪的力量佔絕對優勢，但是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力量正迅速發展，張春橋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們研究了林彪的接班問題，認為要和平接班最好，但必須做武裝起義的預備。在紀要中，他們認為其搞政變有下列多項有利的條件：(註三十五)

1. 政變的社會基礎

- i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 ii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 iii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
- iv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 v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是變相受剝削。

2. 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

- i 危機四伏，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

- ii 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 iii 軍隊受壓，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
- iv 一小撮秀才橫行霸道，並且握有兵權，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 v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幹部，敢怒不敢言。

3. 國防因素

中蘇對立，整蘇聯，我們的行動會得到蘇聯的支持。

4. 其他因素

- i 我們有首長名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
- ii 國土遼闊，迴旋餘地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強，有利於突擊、串聯、轉移、甚至於撤退。

這紀要更把「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即毛澤東)、「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用「民富國強」代替「國富民窮」等作為行動的口號和綱領。並以「打著B-52旗號打擊B-52力量」，採取「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543(中共新發展之秘密武器)、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作為策略，並建議在林彪一系基本力量外，借助「黃(永勝)軍委辦事組」的力量以作呼應，從而奪取政權或製造割據局面。

三月卅一日，林立果按《紀要》規定，在上海召開會議，為執行武裝政變計劃作了組織上的準備和分工，會上確定北京、上海及杭州作為他們的三個點，由北京的江騰蛟進行三點聯繫，使他們互相配合，協同作戰。林彪集團把這次會議稱為「三國四方會議」。

七月下旬，林立果、劉沛豐及李偉信等在廣東深圳及沙頭角上空察看地勢，林立果說：「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首長到香港指揮、搖控。」(註三十六)

(2) 拉攏黃永勝等「四大金剛」

林彪明白要推翻毛的統治不能光靠林立果及其聯合艦隊的嫡系力量，更需爭取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及邱會作等「大艦隊」的支持。對大艦隊的運用主要有如下兩點考慮：

1. 由林立果帶領「聯合艦隊」(小艦隊)進行地下活動，策劃政變，而由大艦隊成員進行公開活動以作配合，一旦政變成功，則由黃永勝等出來維持局面。如果行動失敗，則由他們一部分人到廣州另立中央，以留後路。
2. 在關鍵時刻，把大艦隊作為預備隊出擊，以配合小艦隊的力量。例如在九月十一日，林立果曾指出：「南線先動手、北線接上搞！」(註三十七)

(3) 製造輿論，阻撓批陳整風運動

七一年四月，在中央召開批陳整風期間，林彪十分擔心會批到自己頭上，故於四月十九日由北戴河回到北京進行坐鎮，並準備在必要時以副統帥身份出來講話，以緩和批陳運動。

此外，林彪集團亦到處進行路線交底，強調現在形勢很緊張，有人要奪林副主席的權及現在的鬥爭是爭奪領導權的問題。當時，林立果在廣州曾指出：「當前路線鬥爭尖銳複雜；在九月份，中央要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十月要召開四屆人大，可能出現權力重新分配。要去鬥爭，要搞根據地。」(註三十八)

二 刺殺毛澤東的計劃

就在林彪製定這幾個策略期間，毛澤東於七一年八月到南方很多省市巡視(詳見本章第三節)，他不僅點名批評了「四大金剛」，並指出：「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雖然談話中仍強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但由於毛澤東的巡視及談話是背著林彪而發的，故林彪

等對毛的行動極為懷疑，並想盡各種方法打探其談話內容。九月六日，劉豐將毛澤東的談話密告李作鵬，李遂作出三點總結：二中全會的問題（即指設立國家主席之爭）還沒有完；上綱比以前更高；矛頭似乎指向林彪。林彪更認為毛的南巡是為黨中央在七一年國慶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那時候極有可能揭發自己。由於他感到局勢對其極為不利，於是便按〈五一工程紀要〉的計劃，預備了三套政變方案：

- (1) 趁毛澤東在南方巡視的機會，在上海地區殺害毛。同時，也在北京發動政變以作配合，然後林彪以接班人身份解決一切。奪取全國政權。林立果曾指出：「暗殺後就借主席名義召開政治局會議，把我的敢死隊埋伏在裡邊，把中央領導一個個騙來，不聽我的就幹掉。反正那時我們掌權，專案組都是我們的人，案子永遠也搞不清！」(註三十九)
- (2) 到廣州另立中央，實行軍事割據，聯合蘇聯，實行南北夾擊。
- (3) 逃往境外。

九月七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了一級備戰命令。八日，林彪更下達了「盼照立果、宇馳同志的命令辦」的手令，正式宣佈由林立果、周宇馳執行暗殺毛的計劃。林立果等密謀而研究出三個方法：

第一用火焰噴射器和40火箭筒打毛澤東坐的火車；
第二用100高炮平射打火車，「教導隊」以救毛為名往上衝，乘機殺害毛。

第三用王維國乘毛澤東接見時動手。

由於林立果等人估計毛澤東在九月廿五日前不會離開杭州，故決定於上海下手，然而，毛於九月十日突然離開杭州抵達上海，在十一日，專車又突然直奔北京，這就使林彪的計劃失敗。十一日晚，當林立果等仍在研究殺毛計劃時，得悉毛澤東已離上海，他立即表現了極其沮喪的神態，當時在場的李偉信指出：「林立果流著淚說，首長交給我的任務沒有完成，首長連性命都交給我了，我拿甚麼去見首長。」(註四十)林立果當時立刻乘專機去北戴河與林彪會合，商討進一步應變辦法。

三 林彪集團敗亡經過

九月十二日，林彪準備按照〈五七一紀要〉的設想，南逃廣州，另立中央，製造割據局面。他將256號專機調往山海關，當晚，周恩來接到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報告，知道林彪等人要坐飛機逃跑。十三日凌晨，林彪乘飛機逃往蘇聯，在256號機強行起飛後，地面雷達發現飛機向蒙古方向飛行，周恩來給各大軍區打電話，要求各軍區緊急備戰。隨後，周恩來佈置了幾項應急措施：(註四十一)

- (1) 要監視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機，要人、機並獲，並將情況直接報告毛澤東及他；
- (2) 派衛戍區部隊封閉北京郊區的幾個機場，沒有命令，任何飛機不准起飛，也不允許任何飛機降落。在沒有接到允許飛機起飛的命令時，發現有飛機起飛，要將其擊落。
- (3) 衛戍區要加強對新華社、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等的警衛工作，對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附近地區也要加強警衛。
- (4) 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並部署北京地區防空降的作戰任務。

當周恩來請示要不要攔截林彪的飛機時，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後來飛機在途徑蒙古溫都爾汗時墮落，機毀人亡，而林彪及黃永勝集團的人，或自殺斃命，或束手就擒，一場毛林鬥爭遂告結束。

四 對林彪政變計劃的質疑

縱觀整個林彪事件，雖然可從已發表的材料中追溯到中共高層的派系鬥爭，以及毛林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上的矛盾，然而，有很多地方是令人費解和不合情理的：

首先，為何林彪這位思考慎密、屢立戰功的常勝將軍，會將整套奪權的大計交予經驗甚淺的林立果？再觀乎〈五七一工程紀事〉及與之相關的刺殺毛澤東計劃，都是全無把握，風險甚大，準備及配合不周的行動，勝算根本甚少；

其次，為何林彪在謀殺毛澤東失敗後，要如此倉惶的外逃，而事先根本沒有任何應變措施？對於一個久經沙場戰陣的元帥來說，此點實是不可思議。故究竟整個暗殺毛澤東之計劃是否真正由林彪策劃？抑或由林立果、葉群等人單獨進行，而林彪並無實際參與？若非如此，則為何此政變計劃如此兒戲？

第三、為何周恩來在林彪外逃後，命令機場不准任何機降落？這樣做的客觀效果就是即使林彪有意將飛機降落，但實際上亦做不到，而只得飛離國土；

第四、黃永勝等高級軍事幹部的角色，究竟他們是否有參與林彪整個政變計劃？抑或只是配合，或行動根本由林立果進行，他們對暗殺毛澤東之事也可能不知？

上述疑團，相信需待中共能發表更多有關是次鬥爭的細節資料，方能解決，否則，以上問題可能會是千古之謎。

第六節 林彪事件的影響——初步糾正內政的偏差

一 整肅林系幹部、開展批林整風。

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林彪事件公佈全黨高級幹部，並命令黃永勝等離職反省，交待問題。十月三日，中央決定撤銷由黃永勝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以負責軍委會的工作。中央更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由周恩來負責，審查林彪事件有關的人和事，這項工作主要在空軍、海軍、總後勤部等中央單位和有關省、市、自治區的領導班子中進行。從七一年十月上旬至七二年四月，周恩來曾乘陪同外賓之便三下廣州，而當周恩來第三次到廣州，新華社報導廣州軍區以及廣東省、廣州市的領導班子都進行了改組、林彪集團在各地的力量亦漸被清除。

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中央專案組整理的各有關批判林彪、陳伯達等的資料下發至較基層的黨組織，並在全國開展批林整

風運動。七二年五月二十日，黨中央於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三百多名負責人出席，周恩來更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敘述了與林彪集團的鬥爭過程，更批判了林彪等人。

二 解放在文革時期被批判倒台的幹部

在林彪事件後，中央開始糾正某些在文革期間曾推行的激進政策。七一年十一月，毛澤東對參與成都座談會的幹部說，不要再講六七年的二月逆流，說當時的老幹部是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等的。七二年一月，毛親自參與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的追悼會，並給陳毅致高度評價，他對前來吊唁的西哈努克親王說：「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他更讚揚已故的陳毅「是一個好同志，陳毅同志是立了功勞的。」後來他又說，「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追悼會中，毛更指出鄧小平與劉少奇的性質不同，鄧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佈下了鄧小平於七三年上旬復出的伏線。（註四十二）

在毛澤東的准許下，全國各報刊和廣播電台報導了很多有關「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和「及時解放」、「合理安排」、「大膽使用」在文革犯錯誤的幹部之報導。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提出對待曾犯錯誤的幹部應堅持下列幾個原則：

- (1) 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如屬人民內部矛盾者，應按照「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公式，採教育為主的方針，幫助他們繼續工作；
- (2) 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
- (3) 要顧全大局。文章指出對曾犯錯誤的幹部，要以全黨利益為出發，要關懷他們，教育他們，只要他們識認錯誤並決心改正，就要信任他們，發揮他們的作用。

七二年八月一日，國防部舉行盛大招待會，慶祝建軍四十五周年，陳雲、王震、騰代遠等一批老幹部都有出席。七三年三月，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五月下旬，中央再宣佈

解放譚震林、李井泉等十三名老幹部，並於七四年九月決定為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平反。

三 殘酷的權力鬥爭促使人民對極左路線醒覺，開始質疑毛澤東及文革的正確性

文革期間，鋪天蓋地的宣傳活動使人民對毛澤東、文革及宣揚捨身奉獻的思潮產生極大憧憬，人民跟隨中共的宣傳機器而思考，對社會的不公現象及多位高層領導人如劉少奇、鄧小平等遭批判的不正常現象亦基本上喪失獨立反省的能力。然而，林彪政變失敗公佈後，人民開始驟然醒覺，他們驚慌地從內心詢問為何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竟然會刺殺毛澤東，究竟中共高層表面團結、社會昇平現象的背後仍有多少矛盾及殺機。種種疑問激發起人民對文革反思，並開始從心底質疑毛澤東、文革及極左理論的正確性。這次思想衝擊對中共將來政治的發展甚為關鍵，思想醒覺不但促使人民、甚至促使不少在文革期間支持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人士反省，他們開始質問連綿鬥爭、永無止境的政治運動對中國的發展是否有利，政治的反思促使不少造反派改為支持穩健派幹部，認為他們的建國路線方能帶領中國走上正確的方向。在人心背向的大氣候下，穩健派幹部最終能借助民氣，打倒四人幫，使中國走上大治的局面。

註 釋

- 註 一 〈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一封信〉載《中國共產黨林彪事件原始文件彙編》，國事出版社，第142-144頁
- 註 二 嚴家其 高梟編著《中國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報》出版，一九八六年，第315頁
- 註 三 劉國年等〈林彪反革命政變破產記〉載《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428頁
- 註 四 于南〈林彪集團興亡初探〉載譚宗級、鄭謙等著《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57頁
- 註 五 董保存《楊余傅事件真相》，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4-5頁

- 註 六 王年一《1949-1989年的中國——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386頁
- 註 七 同註四，第85頁
- 註 八 中共中央中發(一九七二)一二號文件——〈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載同註一，第121頁
- 註 九 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熊華源、安建設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168頁
- 註 十 馮成仁〈毛澤東與林彪決裂的關鍵——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目擊証言〉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四月號
- 註十一 郝夢筆、段浩然主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下冊)，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613頁
- 註十二 同註九，第170頁
- 註十三 同註十二
- 註十四 〈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當代中國史研究》一九九五年二月，第47頁
- 註十五 同註九，第171-172頁
- 註十六 同註十四，第50-51頁
- 註十七 同註八，第126-127頁
- 註十八 同註八，第125頁
- 註十九 「毛主席給全黨的一封公開信」(大要) 載同註一，第22頁
- 註二十 同註十四，第61頁
- 註二十一 同註十四，第61頁
- 註二十二 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載同註九，第5頁
- 註二十三 同註二十二
- 註二十四 同註十一，第619頁
- 註二十五 同註八，第127頁
- 註二十六 同註八，第127頁
- 註二十七 同註九，第179頁
- 註二十八 大鷹〈九一三事件始末記〉載《歷史在這裡沉思——1966-1976年記實》二，周明主編，華夏出版社，一九六年，第138頁

- 註二十九 同註一書籍，第86-99頁
- 註三十 同註八，第126頁
- 註三十一 同註二，第366頁
- 註三十二 同註八，第127-128頁
- 註三十三 同註八，第128頁
- 註三十四 同上註
- 註三十五 同註一，第86-99頁
- 註三十六 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沒——揭露林彪一伙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罪行」載同註二十八，第109頁
- 註三十七 同註二十八，第172頁
- 註三十八 同註二，第354頁
- 註三十九 同註二十八，第153頁
- 註四十 同註三六，第100頁
- 註四十一 同註十四，第54頁
- 註四十二 同註六，第440頁

第三十八章 極左派與穩健派的較量到四人幫跨台(一九七二—一九七六)

導 言

隨著林彪集團的跨台，以及面對經濟、社會各項危機，毛澤東開始調整其治國部署，他在致力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權威及必要性大前提下，開始較現實地起用很多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穩健(實務)派高級幹部如鄧小平等，以治療文革期間中國社會的重大創傷。然而，由於毛澤東始終堅持著極左的不斷革命思想，絕不容許任何人對文革作出質疑，故他在任用穩健派幹部的同時，亦大力培養以江青、張春橋等人為首的文革新興造反極左力量，以期對穩健派幹部進行牽制，並希望中國最終能朝文革所標榜的理想方向發展。

基於極左與穩健兩種建國路線的理念根本不同，加上雙方代表的利益各異，以及在文革期間的種種矛盾仇恨無法泯滅，所以在七二、七三年間穩健派幹部復出並糾正文革錯誤的同時，他們根本不可能不對「文革」運動本身進行某種程度的否定。針對這股否定文革的歷史潮流，毛澤東不斷以其崇高神聖的地位，發動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如「反潮流」、批孔、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批水滸及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為文革的必要性辯護，並積極協助極左派於七三年中共十全大會及七五年四屆人大的爭權行動。除輿論鬥爭外，極左派更通過插手軍隊、建立民兵、重新支持、發動地方造反派，以及在中央奪權等策略以加強其影響力。

兩派鬥爭在七六年一月周恩來去世前仍處於膠質狀態，各有得失，但在周去世之後便隨即發生極大轉變，毛澤東將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升級，鄧小平完全站於被批判地位。在同年四月五日，民間出現自發抗議毛澤東及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之後，鄧小平更被迫下台。為平衡民間、穩健派幹部及實力軍人對極左派的不滿，毛澤東推舉華國鋒為總理，以

緩和一觸即發的緊張形勢。隨著毛澤東於七六年九月的逝世，極左派頓失靠山，穩健派在民心所向及軍人支持下，輕易地一舉將四人幫逮捕，中國歷史遂寫上新的一頁。

這一章會討論極左派與穩健派的鬥爭過程，並分析極左派的「資產階級法權」——即社會主義社會會產生資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極左派失敗原因及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意義等，更會討論中國在激烈的上層鬥爭的同時，民間社會對上層派系鬥爭的遙遠回應，以及七四年間廣州出現一份超越派系鬥爭，以討論民主與法制為主題的〈李一哲大字報〉。

第一節 經濟冒進、周恩來糾左與環繞中共十全大會的路線與人事鬥爭

九一三林彪敗亡事件在黨內引起極大震動，不少人開始或加深對整個文革的質疑。雖然毛澤東仍認為文革是正確的，然而他卻同意要採取較務實的治國策略，以挽救瀕臨崩潰的中國經濟。

一 四五計劃、三個冒進與周恩來在經濟上糾左

(1) 以高速發展為重點的中國第四個五年計劃

隨著文革結束以及六九年四月中共第九次全國黨大會的召開，中國政局漸趨穩定，生產開始恢復。七一至七五年是中國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在一九七零年初，全國計劃會議提出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同年八月提交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討論，然而，由於是次會議發生毛澤東及林彪就設國家主席問題的論爭，會議議程被打斷，故此問題未及在會上討論，而只作為參考資料印發。

由於受文革左傾觀點、經濟回升所導致的急躁思想，以及對國際形勢估計過於嚴重等影響，四五計劃強調要備戰，要與「帝修反」爭時間，搶速度，當時四五計劃的主導思想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狠抓備戰，促

進國民經濟新飛躍。」綱要提出四五計劃的基本任務為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後方（筆者按：當時中國將沿海地區定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大三線地區主要是指長城以南，京廣鐵路以西的交通不便，經濟基礎薄弱的地區，建設三線主要為備戰角度考慮），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色、各自為戰、大力協同的經濟協作區，初步建成中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上述搶速度的指導思想下，四五計劃便為各個生產領域定出較高的經濟指標。

（2）中央向地方大幅放權

此外，四五計劃綱要更提出以向地方大幅放權的經濟體制大改革，放權內容為將中央各部委企業絕大部分下放地方管理，擴大地方計劃管理的權限，並簡化了信貸和勞動工資制度，為建立十個各自為戰、自成體系的經濟協作區創造條件。是次經濟體制變動使經濟體制恢復到大躍進時代的情況。是次放權更只著重於中央與地方間的分權，基本全沒觸及政府（包括中央與地方）與企業間的關係，而在文革左傾思想主導下，各種經濟槓杆對經濟的調節作用更基本被取消。在此情況下，在中央向地方放權後，地方政府對企業管得反而更細，企業更加處於無權地位。

而另一方面，由於下放權力速度過急，各方面工作難以配合，宏觀管理失控的問題更為嚴重，地方為儘速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各地出現了「小而全」的經濟結構，計劃外基建規模進一步擴大，職工人數猛增，導致各方面供應緊張，並使各地區經濟領域中的無政府狀態加劇。此情況反映出七八年改革開放前中國指令性計劃的特點，基本上是各地域各自為政，經常與中央討價還價的分權式計劃經濟。

（3）三個突破的出現與國務院在經濟上糾左

與大躍進期間的情況類似，在一九七〇年加速發展及大幅放權的情況下，中國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出現了新的冒進，表現為積累率過高，基本建設過大；職工人數劇增；以及工資總額和糧食銷量控制不住等「三個突破」。

為解決經濟過熱問題，以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在七二及七三年間進行了多項工作，這些措施包括：

1. 加強基本建設的管理，控制基建規模的擴大。
2. 加強對職工工資的管理，強調訂定工資權力在中央政府，並指示不准超計劃招收職工；
3. 通過壓低對糧食的需求，並發展糧食生產，解決糧食購銷差額的問題；
4. 調整四五計劃綱要（草案）的指標。

經過兩年的工作，經濟的冒進情況得到控制，「三個突破」問題得到初步解決。

二 周恩來政治上糾左的努力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主持國家的日常工作，除進行經濟上糾左外，他更機警地利用當時在全國開展的批林整風運動，藉此糾正文革以來的一些極端做法。

周恩來首先平反一些文革時的冤案，解放一批受打擊的老幹部，恢復他們名譽，並安排工作，其中包括為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平反，而葉劍英亦受命主持軍委工作。毛澤東於七二年一月參加陳毅元帥的喪禮，並肯定陳之貢獻。同年四月，《人民日報》發表由周恩來審定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此社論對解放老幹部起了掃除思想障礙的作用。八月一日，國防部召開慶祝建軍紀念招待會，陳雲、王震、勝代遠等老幹部亮相，這是當時老幹部平反時經常採用之方式，而最令人注目的，是在文革期間被批判為第二號走資派的鄧小平，在七三年四月，由毛澤東的表侄女王海容攜扶出席國宴，恢復了他的副總理職務。

為扭轉文革後中國實為軍人統治的局面，中央於七二年八月下旬發出〈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在已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撤銷三支兩軍的機構和人員（註一），軍事幹部陸續撤回部隊，不再管理各級政權機關的事務，此舉為地方幹部重返各級領導崗位創造了條件。

在經濟領域，周恩來主要處理兩件事，一為指示國家計委起草有關加強企業管理的規定，強調貫徹按勞分配，實行獎懲制度，加強紀律性，以針對文革以來企業的混亂情況；二為糾正一些在農村推行的過左政策，允許農民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克服平均主義，並提出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利益。

受著務實政策的影響，中國的外交在這階段亦有驕人的成果，其中包括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席位，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及與日本建交等。在七一及七二兩年中，有三十多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在批林及糾左過程中，周恩來為徹底否定極左思潮，於七二年下旬多次提出要批判左的錯誤，他提出左的東西不批透，右的東西也會抬頭。周更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註1），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並有意地指出林彪是煽動極左思潮的罪魁禍首。周恩來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通過黨內無異議的批林整風，巧妙地將林彪和極左思潮聯繫一起，從而達到否定文革中極左路線的目的。

三 極左派的反擊

由於毛澤東及極左派仍在全局及理論上堅持文革路線，他們自然對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行動大加警惕，再加上七三年八月將召開的中共十全大會，討論路線及權力分配問題，這也加緊了極左派向穩健派攻擊的部署：

（1）批極右

針對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江青及張春橋明確地表示反對，他們認為林彪實是極右分子，並強調「在批判叛徒林彪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註2）在林彪是極左或極右的鬥爭中，毛澤東十分清楚不斷的批判極左一定會導致從理論上否定文革，故他堅決站在極左派一方，指出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註四），並批示只准批判林彪的極右，不准再批判極左，而江青等亦開展了批判右傾回朝，將解放

老幹部的行動攻擊為復辟，矛頭直指周恩來。

（2）批孔頌秦

在召開十大前，極左派有意識地將批林運動發展為針對務實派的批孔頌秦運動。自七三年五月開始，毛澤東就提出要批孔，至七三年七月，他認為文革是一場深刻的歷史變革，但受到很多人反對，「這和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和儒家反對變革有某種相似之處」^(註五)，毛希望通過批孔和肯定法家，來進行肯定文革的思想教育。在十大召開前的兩個多星期，毛澤東向江青念了他寫的「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批判孔子。八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批發楊榮國寫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在社會上開展大規模的批孔運動，以圖給周恩來施加政治壓力，強迫他在十大人事及路線上讓步。江青在八月的政治局中提出要將毛澤東評述儒法鬥爭的談話內容寫入十大政治報告，但被周恩來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時間」為托詞，拒絕寫入。^(註六)

批孔頌秦運動之政治目的，是以借古諷今方法，通過輿論對務實派施加壓力。當時極左派就批孔所帶出的焦點主要為：一、反對「舉逸民」，以針對很多於文革被打倒的幹部在十大復出並將當選中央委員；二、反對孔子「吾從周」，即反對周朝時的封建割據，而讚成秦始皇（比喻毛澤東）的中央集權「郡縣制」，以影射地方勢力坐大，及其支持務實派抗拒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三、讚揚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喻為歷史進步，是鎮壓反動派的必須革命措施，從而帶出文革期間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正確性。

（3）提倡「反潮流」運動

毛澤東曾強調「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實際重申文革時期的「造反有理」行動，目的在推翻抗拒毛路線的穩健派，反對復辟回朝，並向現有的紀律及機關挑戰。

若說批孔是以古諷今，則「反潮流」是以現實社會事件向務實派施壓的另一手段。反潮流從教育領域入手，針對七三年七月正式恢復的「全國

高等院校統一招生」，恢復考試的制度大造文章，號召考試時交白卷，抗拒國務院。極左派利用一個在遼寧省下鄉的知識青年張鐵生，在參加高校招生的物理科考試時交了白卷，並在試卷後寫了一封信的事件，大加渲染，藉以控告高校招生及考試制度會使知識青年脫離社會實踐。七三年七月，毛澤東侄兒毛遠新在遼寧省的《遼寧日報》發表了張鐵生的信，八月，《人民日報》更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註七)為題加以轉載，並將張鐵生捧為「反潮流」英雄。

在毛澤東的支持與輿論壓力下，「反潮流」被納入十大的中共黨章中，正式成為中共政策，實際上為極左派衝擊穩健派開路，毛澤東更在黨章中被稱頌為中共歷史的十次路線中敢「反潮流」的領袖和導師。極左派首腦之一王洪文在十大更提倡在「反潮流」(實即造反有理)中的五不怕，就是不怕撤職、開除黨籍、坐牢、殺頭、離婚。(註八)

(4) 批評國務院

八月，即十大前約一個月，毛澤東在與王洪文、張春橋談話中，直接批評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指出：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註九)對周恩來直接施加壓力。

(5) 緊握文件起草權

為保證十大的政治路線正確，毛澤東指令極左派的張春橋、姚文元草擬大會的兩份最主要文件——政治報告及修改黨章報告，並由毛親自審定，保證「反潮流為馬列主義原則」，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能順利放於黨的章程中，以利極左派能依據合法理論牽制穩健派。

經過一年的角力，中共十大於七三年八月廿四日召開，會議歷時五天，對極左派及務實派來說各有得失。對穩健派有利的為正式將林彪這個靠文革起家的集團徹底鬥跨，削弱了極左派在軍隊中有可能聯合的極左力量。其次是在中央委員會中，大批在文革備受衝擊的幹部如鄧小

平、王稼祥、烏蘭夫等復出，並當選為中央委員，使中央委員會中穩健派幹部佔了大多數。

在另一方面，對極左派有利的，是十大繼承了文革及九大的政治路線，如「反潮流」及繼續革命。尤其重要的是極左派首腦江青、張春橋及姚文元等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即中央委員下的常設決策機構，王洪文及康生更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極左派佔據了部分中央最高層的席位。

第二節 四屆人大會議前後極左派與穩健派之鬥爭

一 極左派奪取國務院權力之策略

雖然極左派在黨中央政治局中佔有大多數席位，然而掌握實際政治及業務運作，握有實際權力的國務院各部門仍緊握在以周恩來為首的穩健派幹部手中。為掌握更多實際運作權力以推行黨中央政治局的決策，極左派在七三年的十全大會後加緊向務實派進攻，意圖在七五年一月召開的四屆人大會議中奪權（人大會議的一項主要功能為選舉國務院總理及各級領導），由江青組閣，以保證極左路線能得以貫徹，為達此目的，極左派採取以下幾個策略：

（1）批林批孔——針對周恩來

大造輿論，將批林整風運動演化為批林批孔運動，並借題發揮，猛烈攻擊周恩來。在批林批孔過程中，極左派大搞影射史學，利用寫作班子，以梁效、羅思鼎、唐曉文等筆名，在全國各地的報刊雜誌發表大量文章。他們根本不批林、假批孔，實際批周公，批宰相，批現代大儒，有的文章更以孔子「七十一歲重病在床」、「端起胳膊」之類的露骨文章直指周恩來，更指七二年來糾左及解放幹部政策為復辟、回潮。（註十）

批林批孔的另一重點是評法批儒運動，大捧呂后、武則天，為江青掌權大造輿論。在評法批儒浪潮中，極左派強調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個法家集團在中央工作，以確保法家路線——實質為保證文革路線得以貫徹。

正如十大前一樣，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大力支持，他緊密地配合極左派行動，在七三年九月廿三日會見埃及領導人時，毛明確指出：「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註十一）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批准轉發由江青、王洪文等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將批林批孔運動推向全國。

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與配合，江青於一月廿四日把北京軍委直屬機關和駐京部隊單位的幹部集中，開了一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第二天，又把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直屬機關的幹部集中，在大會上，江青以全國批林批孔運動總司令自居，批評國務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是抓得不夠」，「主席叫我們抓大事……就是抓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就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會議再重申「要敢於反潮流，抗逆流……革命的事業是在鬥爭中發展的」（註十二），出席會議的周恩來及葉劍英等遭遣責，周恩來更被迫作自我批評。（註十三）

（2）滲透軍隊，放火燒荒，軍區首腦對調，並建第二武裝——民兵

雖然毛澤東是共軍的首腦，然而自從文革以來，各地區軍事首長已與地方幹部連成一體，抗拒毛澤東的發動群眾在地方奪權之造反行動，故此，軍事實力派實際上已和中央的穩健派互相呼應，以周恩來及實力軍人葉劍英等為核心，形成一股抗拒極左派的強大力量。

為實現反周及組織政府內閣，極左派自當希望控制軍隊，或起碼在部隊中加強影響力。由於軍隊從來不聽江青等的指示，故極左派形容軍隊為一塊荒地，希望借批林批孔這把火，「放火燒荒」，搞亂分化部隊，並將軍事領域奪下來。

七四年一月中旬起，江青接二連三以個人名義給海軍、空軍、南京及廣州部隊等領導機關寫信，並召開北京部隊的萬人集會。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極左派批評中央總參謀部「右得不能再右了」，提出對總政治部「可以奪權」，總後勤部「跨得越徹底越好」。三月五日，江青召見三個部隊的幹部，提出「軍閥管你們」、「要整一整軍隊」及「放火燒

荒」。第二天，王洪文在總參謀部提出要「揭蓋子」、「搞總參領導問題」^(註十四)，張春橋在對總後勤部談話時更指出「可不要怕派性，打內戰也可以，有些問題要靠打內戰才能解決」。三月十一日，極左派命令《解放軍報》只准轉發新華社消息，停止自己編發稿件，實際上使《解放軍報》變相停刊。

差不多在江青插手軍隊的同一時間，即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毛澤東提出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的建議，他更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註十五)十二月廿二日，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對八個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是次調動有極深層的意義，自文革以來，各大軍區首腦由於在所屬軍區經營多年，關係盤根交錯，有重大勢力，可說是拔也拔不動，與江青在批孔頌秦運動中指出的地方勢力坐大極為類似，嚴重挑戰中央權威。為防止「地方諸侯」擁兵自重，毛澤東遂與周恩來、葉劍英等合作，促成八大司令員的對調。值得留意的，是在十二月十二日宣佈軍區首腦對調的政治局上，毛澤東更提議委任鄧小平為總參謀長，並作了自我批評，毛指出：「聽了林彪一面之辭，錯整了賀龍、羅瑞卿和楊、余、傅」^(註十六)，並再次說朱德是紅軍司令。以上有關軍區首腦對調，鄧小平當總參謀長及毛澤東自我批評等事件，可以看成是毛澤東與穩健派皆希望改變文革以來地方軍人權力過大的局面，然而，亦可理解為毛澤東與穩健派的一次妥協，以達至軍事形勢的平衡與穩定。而在另一方面，也可看為在毛澤東對調「削藩」行動後，加大了極左派的信心，有利他們插手軍事。

除與實力軍人對抗外，極左派亦希望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他們首先在軍隊中拉攏及培養親己的力量。王洪文曾明確指出，培養接班人「軍隊阻力大些，我就主張找幾個三十多歲左右的人擔任大軍區司令員」^(註十七)。極左派明白拉攏務實派軍人很難，故只得加快提升青年幹部，如將毛遠新提升為瀋陽軍區政委，把營級幹部孫玉國提升為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江青還成功拉攏部分高級軍事將領。在四人幫下台後蘭州軍區政委沈恒漢、南京軍區司令丁盛等被整肅，相信是由於他們與極左派關係密切的原因。

其次，極左派積極建立第二武裝，利用組織民兵對抗實力軍人。七三年，人數多達八十萬的上海市工人民兵師成立，由王洪文當總指揮。這些民兵以產業工人為主，還分擔了維持社會治安及城市管理的工作。王洪文在七三年向毛澤東呈交〈上海市城市民兵情況及調查〉，得毛的稱讚，在毛的支持下，極左派大力推廣民兵經驗，並在江蘇、浙江、江西及福建等地設立民兵指揮部，聚蓄力量與實力軍幹對抗。

（3）培植班底，配合上層的奪權行動

江青除推行政治運動、插手軍隊、發動地方造反派向地方幹部施壓外，更加快組織班底的工作。由於四屆人大即將籌備召開，七三年九月開始，極左派就指示「上海要盡快物色二十名年輕幹部，分別擔任全國總工會、團中央、全國婦聯、公安部、商業部、建材部」等領導。（註十八）

由於得悉鄧小平將在四屆人大中出任第一副總理，故在七四年十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利用風慶輪問題帶頭發難，大鬧政治局，有預謀地圍攻鄧小平，意在鬧掉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的提議。」（註十九）風慶輪為中國建造的第一艘遠洋輪，由於船上一位政委曾對極左派表示不滿，極左派就利用此機會攻擊鄧小平。在是次會議上鄧小平針鋒相對地批駁江青說：「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贊成你意見嗎？」（註二十）

是次政治局會議未能壓服鄧小平，會後，極左派連夜緊急策劃，決定次日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王對毛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們四個人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匯報。趁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周總理雖然有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家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這些人在這時來往得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註二十一）十分明顯，極左派冀望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奪取國務院的權力。

二 穩健派的因應策略

面對極左派奪權行動，以周恩來為首的務實派沉著應戰，針鋒相

對，並巧妙地瓦解各項進攻。

(1) 扭轉運動方向

首先，穩健派以魚目混珠的輿論來扭轉反潮流及批林批孔的極左派大方向。極左派搞反潮流及批孔，重點在針對周恩來的解放幹部及其他糾左政策，而務實派的反潮流及批孔，則提出要守紀律，批判林彪及極左，以下僅舉某些例子：

1. 七三年九月十六日及十一月二日《人民日報》的反潮流文章中，務實派批評林彪「排斥和打擊執行正確路線的新老幹部」，「『政治可以衝擊其它』的反動謬論」，「在林彪反黨集團拋出的割掉私有制尾巴的黑貨影響下美日克草原上有些人提出要取消正當的獎勵政策。」
2. 批判秦始皇，毛澤東一向以秦皇自居，喻文革為焚書坑儒的歷史進步行動，但七三年十一月四日的《人民日報》文章則批判秦皇殘酷的一面，「為充填其貪婪無厭的慾壑，秦王朝肆無忌憚地對廣大農民實行殘暴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廣大農民被迫常年在……飢餓線上掙扎」。
3. 提倡反潮流運動要遵守黨的紀律。十二月份《紅旗》文章指出「反潮流」「是一種具有高度無產階級黨性的行動表現……我們完全可以按照黨的組織原則……明辨是非，統一行動」，「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是保證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等，十分明顯，假若「反潮流」是要遵守紀律的話，則極左派根本不能通過造反來達至動搖既有秩序，從而達至奪權的目的。

此外，務實派也通過批判漢朝的董仲舒及紅樓夢的女角之一王熙鳳，批判極左派「思想只能是一種思想」，以及江青希望借捧呂后、武則天等以樹立女皇形象之行動。「陰險毒辣的王熙鳳……憑一紙書信，……斷送了張金哥夫妻二人性命……這樣的慘事不可勝數……王熙鳳有數不清的債」，矛頭直指江青在文革期間打擊老幹部的行動。

（2）奮起迎戰

除了輿論還擊外，務實派第二個策略就是奮起迎戰。七四年九月，周恩來在癌魔纏身情況下突然出席國慶招待會，大大鼓舞著穩健派軍政幹部的士氣。

（3）加強組織力量

再者，周恩來更加速解放幹部，聯絡實力軍人，強化國務院力量，並通過地方掌權的實力軍幹整肅乘反潮流等一連串政治行動而復甦的民間造反派。

第三節 四屆人大召開與江青組閣的失敗

其實自七二年周恩來患癌症以來，極左派便利用時機，不斷發動政治運動向他猛攻，促其早逝。

四屆人大於七五年一月召開，會議前一個月，當周恩來的癌細胞已擴散時，他仍積極部署，因應極左派的挑戰，有關資料指出：

「周恩來事必躬親，通宵達旦地工作著。……在最關鍵的人事安排上，周恩來更是反覆考慮，煞費苦心。針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竭力要將他們的親信安排在文化、教育、體委等部委情況，周恩來約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幾次研究，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關係重大，不能讓…文化部、體委可作讓步。」（詳二十一）

經過雙方一年多的較量，人大於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召開，會議期間，中共召開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及軍委副主席，在隨後的四屆人大中，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在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構思，提出了建設中國的藍圖。

然而，是次大會的真正意義不在於通過這兩份文件，而是人事安

排，在決定國務院的領導成員中，穩健派穩佔絕大比數，掌握著關鍵部門之權力。而極左派則安排張春橋當第二副總理，以及掌握幾個不太重要的部門如文化、衛生及體育等。可以說，江青組閣的計劃失敗了。

這裡值得討論的是毛澤東對是次兩派政治角力的態度。無疑在七三年以後，毛澤東曾多次對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作出批評，例如：

「不要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針對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等等。

然而，毛澤東的批評主要是以關心與教育為前提的，因為毛始終認為四人幫是其文革路線的最忠實支持者，故此在批評四人幫的同時，毛澤東又說：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註二十三）

更令外界感到震驚的，是毛澤東在由穩健派控制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及四屆人大中缺席。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由周恩來主持的十屆二中全會中，毛澤東缺席會議，但於一月九日會見馬耳他總理。同樣，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毛亦缺席四屆人大，而於十六日會見西德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清楚向外表示他健康無恙，客觀上造成他與穩健派劃清界線的社會輿論效果。

第四節 民間社會的派系鬥爭與要求民主法制的 〈李一哲大字報〉

一 民間社會的派系鬥爭

在六六年底六七年初進行的文革中，毛澤東為奪回傾向劉少奇路線的地方領導人之權力，戲劇地以黨最高權威者的身份號召群眾造反，並

支持一些出身不好、在共產黨統治下受歧視的人所組成的造反組織，衝擊地方當權派。由於地方幹部與軍方合作，造反群眾組織在六八年文革後期遭鎮壓而土崩瓦解。然而，造反派的個別分子仍是社會中一股可重新組合、從而發揮影響力的力量，故此極左派在與務實派的較量中，仍然不忘要鼓動文革期間的造反力量。

在七四年一月中央讀書班的報告中，王洪文尖銳地批判有些省領導人在「搞資產階級專政」，將文革描繪得「像洪水猛獸」，他更指出「有一股右傾思潮在各地時隱時現」，並點名批判新疆的龍書金、四川的梁陳等，指他們企圖對文革「反攻倒算」，「一有機會就想整群眾」。針對這種情況，王洪文提出「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並重覆毛澤東於六六、六七年文革時期的一句重要指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當時的地方幹部針對依附中央極左派的地方造反組織，提出「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歸位，小兵回營」，並指出各地群眾要絕對服從命令。毛澤東因應此情況，針鋒相對地提出「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歸線，小兵提升」，王洪文更號召地方造反派「有條件的服從……符合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的就服從，不符合的就造反。」（註二十四）

由於反潮流已寫入了中共十大黨章，加上毛澤東及極左派的支持，文革期間被地方實力軍人幹部所取締的造反派組織逐漸復活，他們進行跨地區、跨行業串連，配合中央的極左派予穩健派施加壓力。極左派通過各地親信及聯絡站，控制了一些工廠、礦山和鐵路地段，並煽動群眾在地方奪權。在福建、江西、雲南、江蘇、河北、河南、山西、江西及上海的造反活動較活躍，一些地區武鬥重起，並發生搶槍枝、組織民兵武鬥等事件。一些地方領導班子再次癱瘓，或一派掌權，或被重新打倒，或者支持一派壓另一派。

雖然當時中央提出反潮流及批林批孔等政治行動，但在地方派系鬥爭中，造反派及其對立面——即已重新組合的原文革期間的保守、保皇派，皆對孔子及林彪兩位已故人物不感興趣。（註二十五）為應付中央及表示對運動忠誠起見，他們皆要表態批判歷史人物，然而，誰也不會真正

花力氣去搞，他們關心的只是由於政治再次動盪而帶來的可能奪權及權力再分配的機會。

正如文革時期一樣，保守派群眾組織支持地方政府官員是基於「應接受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自然反應，而地方造反派支持極左派向地方政府奪權則更多是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可以說，經歷了文革群眾自相殘殺、政治運動連綿不絕、以及林彪事件的震撼，再對極左派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理論感興趣及誠心支持的人可謂絕無僅有，而更多的前造反派反而對務實派提倡的以穩定及發展經濟的政策表示認同，他們之所以仍支持極左派，乃是基於在文革後他們全處於被批判、被鬥爭的位置，無法翻身，而反潮流等政治運動所帶來的混亂卻帶予他們平反及能分享權力的契機。例如在七四年三月，湖北的造反派得知武漢軍區仍保存很多前造反派的黑材料，故他們利用批孔及反潮流的機會，衝擊軍事機關，搜查人事檔案，當他們在搶來的文件中「有一份名單上開列了省當局曾經打算判處死刑的八十四名造反派頭頭的名字」後，便得出一個結論：「目前的鬥爭是一場生死之戰，他們的唯一選擇就是戰鬥到底」。（註二十六）

七四年五月中旬，毛澤東批發了中央十八號文件，提出大字報可上街，容許外國人看及拍照，以針對周恩來「不准串連，不准武鬥，地方找證據，中央作決定」之指示（註二十七）。配合著毛澤東的各項運動指示，極左派採用「穩住上海搞亂外地，亂中奪權」的策略，從上海向外擴大勢力範圍，而在七四、七五年間（註二十八），他們的主要活動地方是江蘇及浙江。七四年初開始，王洪文幾次到浙江省轄杭州市支持印染廠的翁森鶴向省委奪權，打翻身仗，提出「要搞點自己的武裝」，「突擊提幹」等（註二十九）。在王洪文的支持、翁林鶴的衝鋒下，杭州共有八個工廠停產武鬥，釀成嚴重工潮。極左派更以鐵路工人為重點，通過在鐵路系統奪權，造成全國大停運，希望趁大混亂情況進行奪權。

與文革期間發生的群眾造反歷史一樣，極左派是次地方奪權行動受到地方政府以及各個由黨指揮的群眾團體抵制，而在毛澤東去世及極左派領導四人幫在七六年十月初被逮捕後，各造反組織再次被取締而瓦解。

二 要求民主與法制的〈李一哲大字報〉

在民間，除了穩健及造反兩派的鬥爭外，七四年廣州更出現超越兩派鬥爭、以爭取民主與法制為題的〈李一哲大字報〉。李一哲為廣州青年李正天、陳一陽和王希哲的筆名，以王希哲為主筆，他們趁著七五年一月四屆人大召開及毛澤東批准貼大字報的機會，於七四年十一月在廣州貼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

由於此大字報詞鋒犀利，超越兩派鬥爭，針對社會普遍的幹部特權問題，要求民主法制，故引起廣大市民共鳴。大字報貼出後，引來萬人空巷，外國新聞社爭相報導，成為在當時思想極度抑制下的中國社會一件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事件。

〈李一哲大字報〉利用批林批孔運動，以針對林彪體系為幌子，暗喻中國人民生活在一個充滿特權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社會中，他們批評：

「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成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基礎是從特權中孵化出來的新資產階級。」(註三十)針對當時社會思想窒息情況，李一哲指出「念經式的天天讀……越鬧越荒謬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鼓勵政治投機的表忠，不倫不類的忠字舞，不勝煩瑣的忠孝禮儀——早祈禱、晚贖罪、集會、集隊、上下交接班、買賣東西、寫信、打電話、甚至吃飯等等，都塗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氣氛」(註三十一)，「封建時代獨裁專制的惡習深植於群眾乃至於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註三十二)。

除對特權及思想抑制作出猛烈抨擊外，李一哲並對批評極左派針對穩健派的政治運動為無限上綱、「空頭政治衝擊一切」。在對社會狀況作出剖析後，李一哲遂提出對四屆人大的期望：

- (1) 要法制，不要禮制。提出政府應保護人民群眾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
- (2) 限制特權；

- (3) 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由於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故我們的幹部不應是做官當老爺，而是人民的勤務員。大字報並指出當幹部失去人民信任時，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們；
- (4) 對鎮壓人民者實行鎮壓，以制裁那些製造假案、公報私仇、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的人；
- (5) 落實政策。將經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應長期實行的政策，通過法的適當形式體現；
- (6) 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李一哲針對工人多年沒有提高工資、農民由於政府高比例收購糧食及割掉私有制尾巴等運動，而長期無法改善生活的情況，強調應重視物質獎勵制度：「一個比較積極、認真負責、超額完成任務者或者有所發明創造的工人，為甚麼不可以比他的同級工資多得些適當的獎勵？」(註三十三)

七四年秋天廣州形勢緊張，為增加工資，部分退伍軍人向省政府大力施壓。農曆九月九日，又發生二十萬青年爬山鬧事(註三十四)。〈李一哲大字報〉事件傳到中央，更是火上加油。雖然李一哲能貼大字報是基於毛澤東推行反潮流等政治運動的歷史契機，然而，李一哲並未被極左派利用，反而在大字報中為老幹部及其正確的治國路線鳴冤，並批評張鐵生等，故「江青看後跳了起來，大叫李一哲『想把火往那裡燒？』認為李一哲想分裂中央。」然而在另一方面，由於李一哲的要求在某程度上動搖既存社會體制，而李正天及王希哲等貼大字報亦是脫離黨領導及紀律的獨立行動，故當廣東將其大字報上呈中央要求定案時，部分務實派首腦就作了「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的批語，並在談到社會上出現極左思潮時，指出「全國全省都有此思潮，以廣東李一哲為典型」(註三十五)，廣東方面遂作出對〈李一哲大字報〉的大批判行動。

然而有趣的是毛澤東在召開省委書記會議時，向與會的幹部指出：「你們批得倒李一哲嗎？」(註三十六)他並在另一場合中說：「廣東出了個李一哲是件好事！」(註三十七)究竟是什麼好事？是真正的好事，抑或是可供批判的反面教材？誰也不知道，但由於有了這句模稜兩可的批語，李一哲

免卻了在毛去世前被捕。然而，在四人幫倒台後，李一哲於七七年被捕入獄，七八年底隨著鄧小平、胡耀邦等平反錯案時被放出獄並獲翻案。

第五節 七五年鄧小平的全面整頓

四屆人大加強了周恩來、鄧小平及葉劍英為核心的穩健派力量，當時毛澤東也希望治療文革帶來的社會創傷，發展經濟。毛曾指出：「文化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註三十八) 在這背景下，接替已患重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提出了整頓之口號，鄧小平以其硬朗敢闖的改革作風，著手整頓各個領域，排斥極左派的影響，以期逐步否定文革理論，從而全面發展經濟。

在七五年的全面整頓中，鄧小平提出一個系統的宏觀治國策略——三項指示為綱，即：一、毛澤東提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文革以來強調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鄧小平竟敢將安定團結及搞好國民經濟與階級鬥爭並列，實際是在整體上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在治國策略上與極左派劃清了界線。七五年十一月，當毛澤東覺得鄧小平的整頓實際上是全面否定文革，而對之發動教育革命大辯論時，毛仍希望與鄧小平和解，在文革評價問題上尋求共識。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對文化大革命作一個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但鄧小平卻婉然謝絕。他提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從而表明了他不贊成作這樣一個決議的態度。」(註三十九) 從這事件清楚顯示，鄧小平在原則問題上毫不退讓，為堅持理念而不怕被打倒。

當時鄧小平在各個領域的整頓，核心是改組領導層及重新建立在文革以來被破壞的紀律規章，穩健派在當時提出幾條重要方針：

一 整頓領導班子，反對派性

提出在文革間提升的「火箭幹部」一律掛職下放，剝奪極左派分子的實際工作權力。例如在七五年三月開始整頓軍工企業時，便採取調虎離

山的辦法，把各企業內傾向極左派的造反派召到北京開會，辦學習班，然後迅速調整企業^(註四十)，將極左派掌握的權力轉移到穩健派手上。此外，在整頓鐵路系統事宜上，鄧小平指出：「要把鬧派性的人從原單位調開……鬧派性的頭頭不服調動怎麼辦？不服從調動不發工資。」^(註四十一)

七五年六月下旬，軍委召開由鄧小平、葉劍英等主持的軍委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葉劍英任組長的六人小組，對軍內各單位的領導層作調整，排斥極左派幹部，並號召軍事幹部警惕極左派。在是次軍委會議中，葉劍英指出：「軍隊要高度的集中統一，決不允許有資產階級派性存在。」針對江青在七四年初開始經常給軍事單位送材料，插手軍隊的情況，葉指出：「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你們要抵制。」^(註四十二)

穩健派還針對極左派在各地區發動的造反行動，多次發出指示，並派軍隊加以平息，迅速平定了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鐵路的大混亂情況。

二 在整頓中落實政策，加快解放幹部，以盡速佔領各關鍵位置

針對王洪文於一九七五年夏在浙江提出「十年後再看」的挑戰，鄧小平曾與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商討，決定絕不讓各級領導權落入極左派手中。

穩健派十分重視落實知識份子和幹部政策，希望多些專業人材將科研及經濟搞上去。鄧小平在七五年九月底對胡耀邦的談話指出，要從生活上、政治上多關心專業人員，鄧更對文革以來歧視知識分子的政策回應：「要又紅又專。白專，只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比只佔茅屋不拉屎的、鬧派性的、拖後腿的人好得多。」他並提出教師地位問題：「只挨罵，幾百萬教員怎麼能調動積極性？科技人員叫生產力，就是勞動者。」^(註四十三)

三 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努力恢復過往行之有效的方針 政策和管理制度

針對極左派發動的趁亂奪權策略，穩健派強調紀律章則來規範各單位及個人之行動、以保證社會上各部門之運作能服從以穩健派為主導之國務院的統一指揮。

鄧小平整個整頓政策是從軍隊開始，重點在於加強紀律。調整領導層，強調「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在軍工企業上，重視質量及科技人員的作用。

經濟領域之整頓是從鐵路運輸開始。七四年中旬開始，由於受極左派發動鐵路系統內青年工人造反之影響，不少鐵路出現長期堵塞。七五年二月底，鄧小平制定了中央九號文件，對極左派分子大加整肅，並恢復健全規章制度，穩定了鐵路運輸的秩序。

接著便是改善鋼鐵工業生產問題。七五年五月召開的鋼鐵座談會中，鄧強調要建立堅強有力的領導層，對派性鬥爭，寸土不讓，落實對技術幹部的政策，以及建立強而有力的生產指揮系統和規章制度等。六月至八月中旬，國家計委更起草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文件，強調企業管理以及加強計劃等。

此外，在科研、農業、文藝及黨風等領域內也提出要整頓，重點在於尊重科技人才，而在農村中不能把農民的副業看為資本主義來批判等。

在七五年整頓期間，曾出現了三個由穩健派制定的著名文件，分別是〈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以及〈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三個文件由於受到毛澤東及極左派阻撓而未能下達，後來在批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此三份文件更被指為三株大毒草而遭批判。

第六節 極左派對整頓的全面反擊——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經驗主義、批水滸及反擊右傾翻案風。

一 極左派的理論體系——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一九七五年的中國，可謂實行了「雙軌制」，在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的同時，為保證無人能翻文革的案，毛澤東及極左派進行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及「反經驗主義」等一系列政治運動。與七二年以來開展的各項政治運動一樣，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亦是針對穩健派而有利極左派進行奪權。然而，此運動的特點，是理論性較強，有系統地全面闡述並發展了極左派的整體思想體系，從社會主義經濟領域的層面論證了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故此，當七五年四月張春橋發表其〈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理論文章後，極左派在上海的骨幹將此文章奉為張春橋思想，並指出其「超越了列寧主義，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是第四個里程碑。」（註四十四）

從理論層面來說，極左派認為由於在經濟領域上，「資產階級法權」如按勞分配等原則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被普遍接受，假若任其發展必會引至人民間收入差距擴大，最終導致剝削及資本主義復辟。資產階級法權是針對類似平等的制度，但由於參與者的個人體質及負擔不同，所以也會產生不平等的後果。資產階級法權表現在人民公社的農民評工計分制、企業的計件工資、政府幹部的工資級別及試卷一樣的考試制度等，這些制度在表面是十分平等的，但由於農民、工人、幹部及學生的個人條件不同，例如體質、知識水平及負擔不同，使他們在參與這些制度以及隨之而來的按勞分配時，往往會產生不平等的結果。假若兩家農民獲分配同一面積的土地，理論上這是絕對平等的，然而甲家庭勞動力的體質較差，需要供養的家庭人口較多，由於這些非甲家庭所能控制之因素的影響，甲家庭與乙家庭的收入差距會逐漸擴大，任期發展將會重新產生兩極分化。故此，按勞分配原則所體現的平等對不同的人民來說實際

是不平等的權利。

由於社會主義經濟下的資產階級法權會導至資本主義復辟，故在極左派的重頭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中，姚文元指出：

「強化資產階級法權及其所帶來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的現象，即少數人在分配方面通過某種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徑佔有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貨幣、被這種物質刺激起來的資本主義發財致富、爭名奪利的思想就會泛濫起來，化公為私、投機倒把……等現象也會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原則就會侵入到政治生活……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就會產生把商品和貨幣轉化為資本和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本主義剝削行為」。

姚文元進而提出當資產階級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其代理人便會要求政治上的統治，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他並認為「這就是今天在蘇聯已經發生的復辟過程」。

回應姚文元就資本主義復辟的危機，張春橋在另一篇極左派經典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中指出：「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以上兩篇文章是極左派理論體系的代表作，其核心是社會主義經濟下也可產生新生資產階級，故必須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上應不斷強調階級鬥爭，繼續革命，經濟上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推行平均主義及否定農村自留地、搞副業等，並在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領域實行淨化政策。

七四年十月下旬及年底，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指出：

「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毛特別強調：「要使全國知道」。在理論分析方面，毛澤東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這只能在無

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毛還說：「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註四十五）

七五年二月，毛的上述指示被印發全國，《人民日報》更發表由張春橋、姚文元主持選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三十三條語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迅即在全國開展。七五年三月及四月，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和毛澤東親批，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獲得發表，牽起是項運動的高潮。

二 反經驗主義與批《水滸傳》

在極左派號召學習全面專政的同時，為針對穩健派進行的整頓政策，極左派針鋒相對地提出「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危險」，將矛頭直接指向老幹部。當時全面統籌整頓的鄧小平對極左派的進攻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七五年四月，他就極左派反經驗主義的問題直接向毛澤東反映，並提出不同看法。為平衡兩派鬥爭，以達至穩步發展經濟之目的，毛澤東對穩健派作了一定的妥協，他回應江青等大反經驗主義時指出，「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都是修正主義」（註四十六）對極左派作出批評，並強調安定團結。然而，毛澤東亦即時指出：「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

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及反經驗主義後，極左派又發動評《水滸》運動。七五年八月，毛澤東採納姚文元的提議，開展了一場針對穩健派在全面整頓過程中架空毛澤東的政治運動。

早於七三年十二月，毛澤東曾批評過《水滸傳》，認為「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貪官。後來接受招安。如果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七五年八月，毛澤東更針對性地指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註四十七）十分明顯，極左派以宋江影射周恩來，盧俊義（梁山泊第二號首領）影射鄧小平，說他們架空晁蓋——即毛澤東。江青在七五年八月下旬指出：「主席

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主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註四十八)江青九月於大寨的講話進一步指出：「宋江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麼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大的大地主盧俊義……千方百計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統統弄到梁山去，佔據了領導崗位。」^(註四十九)七五年九月的《紅旗》雜誌更畫龍點睛地指出：「宋江……把極端仇視農民起義的富豪將吏拉上山來……盧俊義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且請他坐了第二把交椅。」將矛盾直指周恩來、鄧小平以及大批在七三年被解放的老幹部。江青更指出：「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鄒人。」^(註五十)

七五年九月廿日，周恩來在進入手術室時，大叫：「我不是投降派。」十二月，他更囑咐葉劍英：「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四人幫手裡。」^(註五十一)

雖然在穩健派進行整頓期間，極左派接二連三的發動輿論回擊，然而由於毛澤東需要穩健派解決社會經濟事務，他對兩派鬥爭做了平衡工作，讓整頓得以在肯定文革理論前提下進行。但問題的核心是堅持文革與整頓根本是不可調和之矛盾，鄧小平主持整頓隨著形勢的發展，無可避免地需要否定文革，故此，毛澤東亦無可選擇地站在極左派一邊反對穩健派了。

三 毛澤東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

七五年十一月，毛澤東態度轉變，他不能再容忍鄧小平對文革進行全面糾正，故從保持兩派勢力平衡轉向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整頓被迫中斷。

當時毛澤東的身體很差，他深居簡出，除了其生活秘書張玉鳳外，只有極少人，(包括其侄兒、亦是毛的聯絡員毛遠新)能見到他。毛遠新在七五年九月至十一月間多次向毛澤東匯報說：「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兇些。」「我很注意鄧小平……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上去了。」^(註五十二)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十分清楚，為平衡雙方矛盾，毛於

十一月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一個肯定文革之決議，此建議遭鄧小平婉絕後，毛澤東便迅速提升對鄧小平的攻擊，停止鄧大部分工作，並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反擊右傾翻案風圍繞中國教育方向而開展。七五年下旬，在教育部長周榮鑫支持下，教育界針對極左派在教育領域內完全突出政治而忽視專業學習情況，指出「教育質量低」、「科研落後了」、「拖了四個現代化後腿」等(註五十三)，提出學制太短、搞政治太多、學科太少太淺等問題，認為此情況根本不適合經濟發展的需要。

針對穩健派的責難，張春橋在十一月八日的一次談話中，責備教育領域的整頓：「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麼人？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註五十四)

七五年八月和十月，鄧小平兩次向毛澤東轉交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批判該校極左派分子遲群和謝靜宜的信，但毛澤東明確表示支持遲群的態度：「我看信的動機不純」，「矛頭是對著我的」，「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註五十五)有了毛澤東進攻的號角，極左派便以批判此信為開端，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教育革命大辯論。張春橋迫令周榮鑫作調查，清華更召開了有一千三百多人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和全校大會，批判劉冰及周榮鑫，把矛頭指向鄧小平。會議公開提出：「鄧小平是劉冰的總後台，劉冰是鄧小平在清華的代理人。」清華大學更成為批鄧戰場，批鄧大字報鋪天蓋地，極左派為擴大影響，迅速組織幹部和單位到清華參觀。(註五十六)

七五年十一月下旬，中共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北京召開有一百三十多名高幹參加的打招呼會，會上宣讀了毛澤東親批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提出清華大學問題「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註五十七)這個講話要點正式奏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號角，務實派持續一年的整頓工作為之中斷，中國局勢出現危機。

第七節 天安門事件與四人幫的跨台

一 周恩來逝世與批鄧浪潮升級

一九七六年是中國一個充滿災難和醞釀戲劇性變化的一年。是年一月一日，毛澤東重新發表其文革前批判修正主義的兩首詞，展開了對穩健派攻擊的第一炮：

第一首詩為毛澤東於六五年五月所填的〈重上井岡山〉：

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另一首是針對修正主義的〈念奴嬌·鳥兒問答〉：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君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煮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這兩首文革序曲無疑是極左派投給周恩來、鄧小平的一顆手榴彈，宣揚文革「鶯歌燕舞」大好形勢，批評穩健派為「蓬間雀」，鼓勵極左造反派「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號召他們在七六年要有「九天攬月」、「五洋捉鱉」的豪氣，達至「天地翻覆」，進行造反，徹底打垮穩健派。

一月八日，經歷癌魔折磨以及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攻擊的穩健派首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由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保護過很多幹部及知識分子，而在七一年林彪集團跨台後他又致力與極左派抗衡，提出一條實務穩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路線，糾正文革極左思潮，治療中國創傷。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說，連綿不斷的人鬥人，強調階級鬥爭運動，宣揚絕對平均的空頭政治理論，以及社會特權普遍、思想窒息、人

民生活困苦的情況已使他們對極左派產生強烈的被騙與厭惡感，普遍群眾，包括文革期間大多數受毛澤東及中央文革極左派支持的原造反派分子，也將中國前途寄望在周恩來、鄧小平及其所代表的穩健派身上。

周恩來的逝世，全國哀悼，人民在周恩來逝世後的第一天，在零下十度的嚴冬自發地步往天安門獻花。而極左派既喜且憂，在慶幸周恩來逝世之餘，又害怕人民悼念周恩來的行動會形成一股對抗極左派的洪流，故一開始他們便極力抑制民間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並大量發表批判右傾翻案風的文章，以其抑壓人民的哀傷情緒，轉移群眾的注意力。

極左派在周恩來去世後即實行「喪儀改革」，提出喪儀從簡，實際希望控制悼周浪潮。此外，姚文元更下令傳媒不許報導從一月九日到十四日（即周恩來追悼會前一天）的悼念活動，《紅旗》雜誌不許刊登周之遺像，以及首都百萬人民淚灑長安街哭送靈車的感人照片。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極左派的重頭文章〈大辯論帶來大變化〉，此文將中共高層內部打招呼會的精神推向全國，在社會層面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再者，毛澤東的表現亦令人感到意外，他並沒有出席周恩來的追悼會，但實際上他的健康並沒即時的嚴重問題，因他曾在周逝世前一星期還會見外賓，在周遺體火化後又會見已退位的美國總統尼克遜。毛的這些表現無異客觀是向全國表明他與穩健派劃清界線。

周恩來逝世後，極左派對鄧小平的批判隨即升級，務實派軍事首腦葉劍英被毛澤東解除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職權（註五十八）。中共中央更明令停止學習鄧小平及葉劍英於七五年七月在軍委上的講話報告。然而，為了平衡兩派勢力，避免穩健派幹部及實力軍人對極左派之全面對抗，毛澤東提名副總理中排行第六、在兩大勢力中較為中立的華國鋒出任代總理，並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華的任命可說是黨內矛盾調和的產物。然而，在另一方面，極左派卻大規模開展批鄧運動。

(1) 七六年二月廿五日，中央召集各地方及大軍區負責人，傳達毛澤東親批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將矛頭直指鄧小平，指示提出：

「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

其餘都是目。」

「一些同志……對社會主義不理解……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 (2) 在中央打招呼會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江青則批判鄧小平「是個大漢奸」，「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註五十九)「鄧小平在四川、雲南，對哪一派都整。凡是造反的都整，凡是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都要整。我是首當其衝的。因為我是努力執行主席革命路線的。」
- (3) 在全國各大報刊發表大量批鄧文章，如：〈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評三項指示為綱〉、〈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以及〈翻案不得人心〉等等。

二 天安門事件與反鄧運動再升級

極左派除批判鄧小平外，更開始對周恩來作出隱晦的攻擊，將群眾悼念周恩來的行動比喻作「哭喪婦」。上海《文匯報》刪掉周恩來生前發表的學習雷鋒的題詞，以及在三月廿五日發表一篇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們〉的文章中竟露骨地提出：「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眾所周知，「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是指鄧小平，那麼「那個走資派」無疑就是周恩來了。群眾對明目張膽的批周表現極大憤慨，南京的群眾反應更為激烈，成千上萬群眾上街悼念周恩來，指責上海《文匯報》，並貼出打倒張春橋的標語，實際上燃點了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火花。

北京群眾亦從三月開始，趁著清明節前夕自發地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他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張貼傳單和詩詞，舉行集會並發表演說，將矛頭直指極左派。群眾的悼念活動在四月初再擴大規模，上

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四月四日，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清理花圈、標語和「反革命」，當夜政府出動大量民兵及公安，將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撤走，並抓走負責看守花圈的群眾。姚文元當時更指出：「為什麼不能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註六十）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在「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下，衝擊政府機關，與民兵警察發生衝突。晚上九時半，極左派正式採取鎮壓行動，動用一萬名首都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個營的部隊，包圍廣場，毆打並逮捕在場群眾。

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由毛澤東提出的兩個決議：第一是由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總理；第二是根據「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四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導，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

在當時思想極端抑制的社會中，出現天安門事件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事件的出現可以歸結為幾個主要因素。首先是經濟上的倒退，不停的政治運動，使群眾對主導中國的極左派的路線極度不滿；第二是周恩來、鄧小平的路線，與群眾要求穩定發展經濟及改善生活要求吻合，故群眾甘願冒極大的政治及生命風險，堅決地維護務實路線；第三是由於文革期間黨權威遭受削弱，群眾在文革期間亦在極有限的時間內第一次進行大規模的自發行動，這種自發行動經驗增強了市民的膽量和信心。

從更深層的角度分析，天安門事件乃是中共建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擺脫黨內鬥爭而自發的民間民主運動。運動過程中曾尖銳地提出：「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由於天安門事件的參與者以青年工人為主，並包括各階層的人，故從參與層次上超越了五七年之鳴放運動。而與文革期間的群眾運動相比，四五天安門事件不單從組織上與高層政治勢力缺乏聯繫，更重要的是參與者表現出理性、合乎當時中國要求穩定發展經濟及改善生活

的歷史潮流，群眾自發地對穩健派治國路線投下了堅定的信任票：

「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群眾支持穩健派亦可理解為希望社會上有較大的自由度，擺脫封建思想抑制。民心所向更加速了極左派的下台。

天安門事件後，極左派進一步開展更大規模的批鄧運動，傳媒出現大批極左派觀點之文章，重點在於宣傳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並大批「三項指示」為三株大毒草，並指出七五年的全面整頓是：

「鄧小平翻案復辟的行動部署。一聲整頓令下，翻案妖風驟起……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一律都要整頓……其實質就是資產階級整無產階級，就是資本主義復辟。」（註六十一）

極左派不僅要打倒鄧小平，更希望撤換一大批老幹部，他們指出要特別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一級盯一級」，「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

七六年下旬，中國又出現了其他重大變故及災難。首先是七月六日中國原紅軍總司令、德高望重的人大委員長朱德逝世。七月廿八日，河北省的唐山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死亡人數多達數十萬，損失慘重，跟著四川潘松地區也發生了七級以上地震。

三 毛澤東逝世與四人幫的跨台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於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毛澤東的逝世使極左派頓失靠山，政治天秤隨即傾斜，缺乏了毛澤東的政治平衡，雙方即時出現面對面的鬥爭，矛盾加劇，如箭在弦。十月六日，離毛澤東世不到一個月，穩健派隨即動用非常手段，倚仗軍事力量，逮捕四人幫，全面打跨極左派力量。

早在毛澤東病重期間，穩健派便開始研究以非常手段逮捕極左派，王震將軍多次向葉劍英進言：「把四人幫抓起來」穩健派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完全是礙於毛澤東的阻力。在一冊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和王震寫序的著作《葉劍英在一九七六》中，作者范碩精彩地刻劃出毛澤東逝世前機

健派軍事首腦的考慮：

王震在七六年中旬拜會葉劍英，指出「天安門的事眾心不服。幹部和群眾恨死那幾個上海幫了。」

「可是，那幾個人是毛主席點將的呀！」葉劍英心裡也恨，只是礙著毛澤東，覺得難辦。王震再說道：「為什麼讓他們這樣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葉劍英還是不動聲色。停了一會兒，只見他做了一個打啞謎式的手勢：先伸出左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兩晃，然後把大姆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這是什麼意思？葉劍英又向他點了點頭。

王震想了想，終於猜明白了：大拇指是指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在世，不宜輕舉妄動，等去世以後再說，要等待時機。(註六十二)

毛澤東逝世後，氣氛愈加緊張，雙方都抓緊時間下手，聶榮臻元帥要楊成武將軍到葉劍英那裡轉告他的話說：「四人幫……什麼壞事都能幹得出來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們先下手。如果他們把小平暗害了，把葉帥軟禁了，那就麻煩了。……採用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只有我們先下手，採取斷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註六十三)此外，華國鋒及其他高層將領亦表達了同樣意見，故此，務實派決定以快打慢，馬上行動。

在那邊廂，極左派也大舉活動，製造輿論，到處串連，向他們控制的上海民兵突然派發槍枝，並提出要準備打仗。極左派亦插手軍隊，「突然調換了北京郊區某裝甲兵部隊的兩個師參謀長，準備隨時指揮坦克車從東南、西北方向開進北京城，造成犄角夾攻之勢。」(註六十四)此外，「四人幫對奪權上台已經作好全面部署，先由他們掌握的上海和長沙發難，要求打倒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四人幫在北京馬上動手抓人，並召開十屆三中全會，宣布上台。為此，上海的民兵已經武裝待命，北京清華、北大的民兵也作了動員準備，而且北京附近一支部隊的指揮官也已奉命到攤牌時刻就把坦克開到長安街來收拾局面。」(註六十五)

雙方加強部署，你死我活的較量已是無可避免，最後還是穩健派行事迅速，在華國鋒支持下，葉劍英等軍事首腦經過周密籌劃，制定了戰略決策，由江東興具體進行，在十月六日晚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名義，誘騙並用武力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抓起來。當晚凌晨，穩健派更進駐各大傳媒機構，並大舉拘捕極左派份子。十月六日當晚政治局在玉泉山召開會議，追認葉劍英的果斷行動。七日，政治局更決定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主席。此後一星期內，中央政治局分批召見各地方及軍區領導，宣佈粉碎了四人幫。

極左派一向全力控制上海，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徐景賢及王秀珍得知江青等被捕後，希望緊急動員，策動武裝對抗。但穩健派採取了周密的策略，首先把當時四人幫的親信馬天水及徐景賢等召到北京，他們一下機就被捕，這隨即令極左派在上海力量瓦解。同時，派海軍政委蘇振華到上海，調動海、陸、空軍，在江蘇、浙江和吳淞口戒備，隨時準備對可能的反抗鎮壓。

粉碎極左派，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市民爭相走告，大肆慶祝，市面上的酒被搶購一空，中國歷史進入了另一紀元。

第八節 極左派垮台之主因

以江青、張春橋等為首的極左派在文革期間迅速冒起，並在林彪事件後的中共十大會議中佔據中央領導高位，在七二年後便與務實派對峙，他們在毛澤東去世後迅速倒台，主要有下列幾個原因：

一 基礎太弱，缺乏政治實力，未獲軍隊支持

極左派的崛起與發展全賴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憑著其歷史及軍事地位、領袖魅力及個人崇拜得到各級實力軍幹及人民支持，極左派依附著毛澤東的權勢，充當推行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先鋒，得到毛澤東的讚賞。然而，從文革的歷史得知，在文革後期地方軍事首腦與地方幹部基本合流，並築成一條抗拒毛澤東造反路線的鋼鐵壁堡。由於毛澤東權威

猶在，以及全國穩定的需要，實力軍人不敢貿然公開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進行正面的抗拒，而只是用架空指示、陽奉陰違等的鬥爭策略，在具體推行政策上將毛的指示瓦解於無形。甚至可以說，毛澤東於文革後期實際上已大權旁落，他只能維持輿論上的統治，但國家實際行政軍事大權卻牢牢掌握在國務院穩健派及實力軍人手中。

四人幫集團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及王洪文等全在文革期間崛起，在黨軍內毫無基礎，基於有毛澤東的支持才得以控制輿論工具、部份青年工人、民兵、以及少數地區如上海等。極左派亦深知在中國共產黨這個以武裝軍事革命起家的組織內沒有軍功，乃是一個致命傷，故他們也希望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攏絡實力軍人，「放火燒荒」、染指軍隊工作，然而，他們只能影響十分少數的部隊，更無法爭取到中央的軍事首腦支持。至於建立以民兵為基礎的第二武裝，也由於正統軍事系統的抗拒及拒絕供應大量軍火，不成氣候。

與極左派對立的穩健派集團，更深明檜桿子裡出政權的真理，在毛澤東及極左派多次政治運動衝擊下，他們雖然願意在黨中央高層位置讓步，但卻死守軍事機關，掌握實權，使極左派無法插手。可以說，缺乏軍事實力是極左派迅速倒台的最重要因素，這也反映當代中國政治中軍隊力量舉足輕重的事實。

此外，極左派也缺乏幹部班底，集團內多是一些只懂得搞政治而缺乏專業知識、有社會名望的人才。故此，他們在七三年期間大搞為期兩三個月的中央讀書班，大批破格地提拔親己幹部，以壯大集團基礎。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極左派基礎薄弱，缺乏軍事基礎，沒有毛澤東的支持，根本無法逃出厄運。

二 樹敵過多，打擊面太廣

極左派在文革期間，利用毛澤東、林彪控制北京的大權，同老幹部結怨太多，他們不單對一些有崇高軍功的開國元老進行輿論攻勢，更對他們年老身軀進行肉體上的私刑，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甚至生命。

極左派殘酷對待異己手法使各級軍幹感到唇亡齒寒，再加上很多掌

握地方實際權力的軍幹本身又是中央被批判的老幹部的舊屬部下，他們對自己的老上司被極左派殘酷批鬥感到悲憤異常，出於自然本能反應，害怕被批鬥情況在自己身上重演，地方軍幹對由極左派支持的本地造反派團體採取敵視態度，他們更與中央務實派集團互相呼應，成為抗拒極左派的堅固力量。這情況解釋了文革後期及七二年後縱使有極左派煽動支持，地方造反派亦不能形成氣候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 空頭政治

頻繁、脫離人性的空頭政治運動，使極左派完全脫離群眾，而只得倚靠抑制輿論，以及高壓的政治窒息氣氛來控制社會。

歷史已證明，極左派一次又一次違反人性，提倡絕對平均的政治理論已被社會實況客觀否定。不單普遍市民對這些空頭政治表示厭惡，就連文革期間傾向極左派的原造反派份子也覺被騙，而對穩健派治國路線表示認同。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充份反映了市民的抉擇，他們堅定的向穩健派投了信任的一票，民心的背向加速了四人幫的倒台。

註 釋

- 註一 鄭德榮等著《新中國紀事》，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516頁
- 註二 同註一、第520頁
- 註三 何理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檔案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第304-305頁
- 註四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84頁
- 註五 趙少荃主編《中國當代史》，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516頁
- 註六 王年一《大動亂的時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470頁
- 註七 李明主編《共和國歷程大寫真》，檔案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592-593頁
- 註八 王洪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載《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

- 會》，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34頁
- 註九 同註六，第469頁
- 註十 朱建華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860頁
- 註十一 同註十，第858-859頁
- 註十二 同註六，第485-487頁
- 註十三 廖蓋隆主編《當代中國政治大事典》，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761頁
- 註十四 同註六，第491-492頁
- 註十五-十六 同註一，第537頁
- 註十七 〈篡黨奪權野心的一次大暴露——武漢部隊某部青年幹部批判王洪文在青年幹部學習班上的一次講話〉《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 註十八 同註十三，第767頁
- 註十九 高文謙〈在最後的日子裡〉，載《史歷在這裡沉思》第一冊，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74頁
- 註二十 紀希晨等〈長沙誣告前後〉載同註十九，第二冊 第198頁
- 註二十一 同註二十，第200頁
- 註二十二 同註十九，第75頁
- 註二十三 同註十三，第767頁
- 註二十四 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
- 註二十五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牛津大學出版社，第252頁
- 註二十六 同註二十五，第256頁
- 註二十七 子川《李一哲與我》，北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46-47頁
- 註二十八 王一平〈上海已成為埋葬『四人幫』的汪洋大海〉，《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註二十九 《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人民出版社，第131頁
- 註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東亞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50、54、58、59、89-96頁

- 註三十四 同註二十七，第26頁
- 註三十五 同註三十，第4頁
- 註三十六 同註二十七，第60頁
- 註三十七 同註二十，第5頁
- 註三十八 同註三，第314頁
- 註三十九 謝宗級等著《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127頁
- 註四十 同註三十九，第114頁
- 註四十一 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第6-7頁
- 註四十二 同註六，第524頁
- 註四十三 同註三十九，第119頁
- 註四十四 同註六，第542頁
- 註四十五 同註十三，第772-773頁
- 註四十六 同註六，第545頁
- 註四十七 同註一，第571頁
- 註四十八 同註六，第548-549頁
- 註四十九 同註十三，第774頁
- 註五十 同註六，第550頁
- 註五十一 同註六，第550頁
- 註五十二 同註十三，第775頁
- 註五十三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7頁
- 註五十四 同註二十九，第224頁
- 註五十五 同註十三，第776頁
- 註五十六 范碩《葉劍英在1976》，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62頁。
- 註五十七 同註十三，第776頁
- 註五十八 史偷〈葉劍英智擒「四人幫」內幕〉《廣角鏡》一九零期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

註五十九 同註六，第562頁

註六十 同註六，第578頁

註六十一 同註六，第588頁

註六十二 同註五十六，第128-129頁

註六十三 同註十三，第564頁

註六十四 同註六，第607頁

註六十五 同註五十八